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

第三篇

全一册

水陆洲 著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二〇一二年九月制作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篇目录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目录

概 述	5
第一章 搞好斗、批、改	73
第一节 九大以后的新形势新任务	73
第二节 继续解决一些省的遗留问题	87
第三节 清理阶级队伍	123
第四节 打击反革命活动	149
第五节 继续清查五一六	160
第六节 整党建党	194
第七节 大中专毕业生分配	203
第八节 教育革命	217
第九节 改革旧的规章制度	241
第二章 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	257
第一节 一九七〇年的新形势新任务	257
第二节 林彪集团逐渐形成	285
第三节 围绕修改宪法的斗争	304
第四节 林彪突然袭击 毛泽东反潮流	322
第三章 批陈整风	366
第一节 一九七一年的新形势新任务	366
第二节 吴法宪叶群的检讨	383
第三节 陈伯达反党问题	397
第四节 召开华北会议	410
第五节 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	430

第四章 林彪集团的反革命政变活动	449
第一节 制定反革命计划	449
第二节 实施反革命政变	464
第五章 毛泽东巡视南方各省	484
第一节 毛泽东巡视武昌	484
第二节 毛泽东巡视长沙	496
第三节 毛泽东巡视南昌	516
第四节 毛泽东巡视杭州	522
第五节 毛泽东巡视上海	531
第六节 毛泽东回到北京	536
第六章 林彪集团的覆灭	540
第一节 林彪等人叛逃	540
第二节 揭批林彪集团罪行	554
第七章 开展外交新局面	569
第一节 毛泽东决定开展中美谈判	569
第二节 基辛格访华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587
第三节 尼克松访华	598
第四节 中日恢复邦交	609
第八章 批林整风	626
第一节 一九七二年的新形势新任务	626
第二节 开展批林整风	637
第三节 批判极左思潮问题	703
第四节 江青接受美国学者采访	712
第九章 召开十大	716

第一节	一九七三年的新形势新任务	716
第二节	继续批林整风	723
第三节	邓小平复出	737
第四节	继续搞好文艺革命	747
第五节	批判教育领域的复辟回潮	760
第六节	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	768
第七节	毛泽东批评外交工作	784
第八节	评法批儒	798
第九节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802
第十章	批林批孔	809
第一节	新阶段新任务	809
第二节	发动批林批孔	826
第三节	各地区的批林批孔运动	859
第四节	批判各领域的复辟回潮	906
第五节	各大军区负责人到北京检查文革中的错误	925
第六节	筹备四届人大	930
第七节	毛泽东论三个世界	951

2012年8月14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篇概述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概述

第三篇是概述简论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即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取得伟大胜利的过程。这一过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一九六九年四月至一九七〇年七月

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完成前一阶段遗留下来的问题，以便逐步向进行斗、批、改的工作过渡。

（一）就是要解决几个省的反复旧的问题。一九六八年底至一九六九年初，有几个省的所谓反复旧闹得比较厉害，在各级革命委员会中引起了较大的分歧和斗争。其中以山东省、湖北省尤为突出。中央在处理这个问题的过程中，严肃批评、处理了主张、支持反复旧的领导干部以及群众组织的头面人物。但是，一般处理过重，甚至有的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如，山东省的王效禹，湖北省的“北决扬”，贵州省的李，四川省的刘洁挺、张西挺，湖南省的章伯钧、梁春阳，等等。

（二）要继续完成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是从一九六八年开始的，在党的九大会议上，毛主席指出，清队工作中存在着扩大化的问题，要注意政策。九大以后继续进行这项工作，但各地违反政策的事仍时有发生。

（三）开展“一打三反”。为了处理前一阶段运动中暴露出来的反革命活动问题，同时也是为了应对当时中苏边境危机，作好打仗的准备，一九七〇年一月，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打击反革命活动，二月指示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投机倒把。在打击反革命的运动中，处理了一批反革命案件，其中涉及到一些犯政治错误的人，打击过重了。还处理了一些文革中杀人、打死人的刑事犯罪分子。有些地方对造反派中有人犯此类案子，处理特别重。如武汉新一冶工安公司的徐正全，是该公司造反派的头头，因几个人殴打百万雄狮武斗队工人王荣炎

致死，他在现场没有指使此事，也没动手，虽然制止不力但也制止过，最终被判死缓。

（四）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

清查“五一六”的工作始于一九六七年年，一九六八年成立以陈伯达为组长的清查小组。一九六九年以后几起几落：

第一次是高潮，一九六九年五月至一九七〇年一月

一九六九年因群众来信反映北京外国语学院的问题，毛主席批示：北京市不抓“五一六”，要市委解决这个问题不容易，请周总理出面去解决外国语学院的问题。

周总理、江青、谢富治等人作了指示。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五日，北京市召开万人大会，北京地区深挖“五·一六”的群众运动逐步开展起来。

当时有一部分单位的领导提出：“对‘五·一六’也要一碗水端平。”也有的单位搞得冷冷清清，不发动群众。

这时毛主席指出，不挖“五·一六”就是右倾。

第二次是低潮，一九七〇年二月至一九七〇年十月

一九七〇年二月，毛泽东关于清查“五·一六”问题的意见

反革命“五·一六”阴谋集团是一个秘密组织，数量很少，很快就发现了，揭发的早，头子关起来了。不要乱挖，面不要太宽了。批判还是要批的，但不要搞逼、供、信，逼、供、信靠不住。

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

以后清理五一六进入低潮。

第三次又是高潮，一九七〇年十一月至一九七一年十二月

一九七〇年十月二十日，毛泽东指出：

“‘五·一六’问题不能一风吹，有些单位已经一风吹了，例如（北京）外语学院”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一日、九日、十八日、二十日，周恩来接见外事口核心组军宣队工宣队负责人时关于清查“五·一六”的指示

“一件事在实践中要反复好多次，才能认识。‘516’问题，又搞又不搞，一会儿说扩大化。他乱咬一顿，形式上扩大化把水搅混；大家互相怀疑，实际上他自己滑掉了。今年三·二七发了个指示，他们又抓住三·二七通知中提到防止扩大化，变成一风吹了。运动规律就是这样，几番起伏。这次无论如何要追到底……火烧英代办处是公开出来搞的阴谋，这也怪我们当时没有追下去，当时当作一时的错误行动……”

一九七一年二月八日，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这次高潮一直搞到九一三事件以后的十二月。

第四次是低潮但不是结束，一九七一年十二月至一九七二年以后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谢静宜向毛泽东汇报清查“五·一六”问题时，毛泽东说：“没那么多吧？有的是打击报复打成的吧？”

清查五一六运动究竟结束于何时？不知道。

一九六九年十月以后究竟清查出了多少真正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不知道。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曾思玉临走前在洪山宾馆召开军队师级以上干部、地方省革委会常委以上干部会议，说：“湖北清查‘北、决、扬’、‘五一六’搞了几十万，不该斗的斗了，不该批的批了，不该抓的抓了。我心里也很难受。很对不起，这个事情搞错了，向被整的人赔礼道歉。”

历史证明：

第一，从事件来说，“火烧英代办处”、“围困中南海”、“揪军内一小撮”等，是极左的、过火的行动，但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是反革命阴谋活动。

第二，从组织来说，这些行动不是“五一六反革命组织”搞的，而是各种群众组织进行的。

第三，从个人来说，“王关戚”不是反革命分子，不是五一六组织的后台；“杨傅余”也不是反革命分子，不是五一六组织的后台；即便是陈伯达，也没有证据说明他就是这些事件的幕后指使人，是五一六组织的黑后台。

一九六九年以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主要作用就是从政治上狠狠地打击了革命造反组织的骨干力量和支持他们的革命领导干部。大大地削弱了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基础。

第二阶段：一九七〇年八月至一九七一年四月

这个阶段主要是围绕九届二中全会与林彪集团的斗争。

（一）与林彪的斗争由来已久，“杨傅余事件”是林彪形成集团开始向党进攻的标志

1，所谓“杨傅余事件”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林彪让叶群去向毛主席报告杨成武的问题。

毛主席对杨的事，格外地重视，亲自召开了四次会，反复详细地听汇报，主席感到不拿掉杨成武是不成的了，甚至要影响到和林彪的关系。

毛主席、林彪、周总理、陈伯达、康生等共同决定：对杨成武的问题，事情要说清楚，结论不要做，暂时停止工作。

林彪说：“杨成武下台，是不得已的事。”

事实上是，林彪为了不让“上海帮”涉足军队，决心放弃杨。

林彪之所以“弃杨留吴”是他认为杨不能再留了，这是不准江青插手军队完全必要的做法。林彪认为：，杨成武对他耍了两面派——既归依自己，又讨好江青（不便直接说毛泽东），竟敢以江青来压自己！他是坚决不许军队有江青的代理人的！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黄永胜被任命为总参谋长。

军委办事组以黄永胜为组长，吴法宪为副组长，李作鹏、邱会作等为组员。

由此，开始形成了林彪集团。也是林彪所谓的“大舰队”。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五日，林彪同黄永胜的谈话（吴法宪、邱会作在座）

林彪说：“去年，全军文革垮了，江青几次提议要恢复全军文革，我都没有表态。要恢复全军文革，就会有人插手军队的文化革命，并在军队内部找他们的代理人。中央军委常委的工作一时也难以恢复起来，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谁来管事。叶帅管事，军队喜欢，他们(指中央文革)不喜欢；徐帅管事，他们喜欢，军队不喜欢。只好用办事组来管大事，这是最靠得住的办法。”

2，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林彪提出反江青宗派主义

八届十二中全会正在进行的时候，有一次军委办事组在京西宾馆会议楼第三会议室开会，黄永胜、吴法宪先到了，并兴高采烈地说：“……他们不止是一个宗派，是一个帮会，是上海帮。”邱会作、李作鹏看到黄、吴正在说话，两人就向外走。黄即说：“你们两个坐下，不要走。今天可以同你们谈点你们听不到的话。黄永胜接着说：“林总提出了反江青宗派主义。这个问题今后会向你们说清楚的。”

从十二中全会之后，林彪对江青的态度就逐渐变了。林彪同黄永胜、吴法宪说：“我们过去对江青的态度完全是为了党的利益(指江青和主席的特殊关系)，现在看来完全没有这种必要。因为毛主席对待江青就是公事公办的。”“他们几个人(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是一个宗派。在适当的时候，提出反宗派主义是很必要的。”

3，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林彪推荐李德生任总政主任。

李的任命，是林彪向主席报告得到同意的，目的是为了挡住江青要将张春桥放在总政主任这个位置的企图。林彪说：“李现在同江青还没有更密切的关系，在同他们的斗争中，他至少可以保持中立。将来如果有变化，可以立即搬下来。”

4，一九六九年初，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过程中，林彪、陈伯达的政治思想立场逐渐表面化。

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主席指定林彪在九大上作政治报告，并指定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协助林彪写出报告稿。

林彪与陈伯达就报告稿的标题《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及提纲，进行了讨论。

陈伯达甩掉了张春桥、姚文元，一个人单独起草。

陈伯达在写完第一部分后，把稿子送毛主席审阅，毛主席没有回复。

对初稿的第一部分的讨论是由周总理主持的。他以陈伯达延误了时间，并且只拿出第一部分为理由，否定了陈伯达的稿子。

江青说：“稿上子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你搞的是唯生产力论，你是以修正主义的观点起草报告的。”

张春桥、姚文元看后批评说：陈伯达是在鼓吹“唯生产力论”。

在毛主席主持的讨论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的稿子的会上，陈伯达说：“还是应当搞好生产，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光搞运动，就像伯恩斯坦说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

毛主席当即指出：“‘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又何必这样急呢！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你就要报复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马列主义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你陈伯达的本质也是不会改变的！在延安时期，你脚踏两只船，原来说愿意给我当秘书，后来又说愿意给张闻天当秘书。一九五〇年，你同我到莫斯科，也是脚踏两只船，你没有报告，也没有经过我的批准，就去见苏联领导。是不是看我这条船快要沉了，就赶紧去大抓一把？”

5，一九六九年四月，李必达事件

李必达是黄永胜从广州军区带到北京来的秘书之一

李必达听黄永胜骂江青，感到吃惊，他就有意识地监听黄永胜与叶群等人的电话，他认为黄永胜的这些话说出去是要杀头的。

李必达告黄永胜骂江青的信，写了两三封。

李必达在信中说：“……黄永胜、吴法宪、叶群等人经常恶毒地攻击江青同志，他们是一个反对敬爱的江青同志的反革命集团！”

4月28日，九届一中全会刚结束，黄永胜派人把李必达抓起来，用飞机送到广州军区关押。

6，在九大选举中委时安排人不投江青的票

吴法宪说：“在选举之前，一次叶群在同我们闲谈时说：‘林总讲，现在江青太张狂了。张春桥、姚文元过去都是榜上无名的小卒，现在的威望都这样高，看来当选中央委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使他们的选票少几张，以杀杀他们的锐气。’”

陈伯达接着说：张春桥在上海不过是个小鳖三。

黄永胜也说：张春桥看不起我们，一次在机场公开说我们是大佬粗，我当场回敬了他一句，说你在晋察冀不过是个小记者。

在这以后，我们按照叶群传达的意思作了安排和布置，指定军队有的人在选举时不投江青等人的票。”

四月二十三日下午正式选举，选举结果，江青只得了 1502 票（参加投票代表 1510 人），江青的选票不仅落后于叶群、也落后于黄永胜、吴法宪、李鹏、邱会作。

7，一九六九年下半年，副总参谋长温玉成被林彪调往成都

温玉成到北京后不久，就以副总参谋长的资格在北京市“支左”。

在军委办事组中，温玉成常常在一些问题上与黄吴叶李邱意见相左。因此，林彪等人就认为温走上了通向江青之路，他手里拿着两张通向江青的“通行证”，一张是支持造反派，一张向中央反映情况——所谓打小报告。

不久，温玉成成为中央碰头会议成员。

为了割断温玉成和江青的联系，林彪把温玉成调往成都，连他的家人也要带走，不能在北京住。

8，擅自发布了“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军委办事组以“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为由，擅自发布了“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

“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的内容：一是抓紧反坦克武器的生产；二是组织战时指挥部，进入临战状态；三是各级领导加强战备值班；四是严密注视中苏边境的形势及时掌握情况，随时报告。

10 月 18 日，黄永胜等人将此令迅速下达全军，使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10 月 19 日，林彪采用电话记录方式，以急件传阅报告毛主席。先送交周恩来总理阅。周总理阅后批示：请主席阅。

汪东兴拿此急件送到主席住处，给主席看。

毛主席看后，对汪说：“烧掉。”汪以为主席是让他拿去烧了，还没等汪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接着，他又拿起传阅件的信封又要烧。汪赶紧对主席说：“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

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主席听汪这样说，这才作罢。

林彪和黄永胜等人知道了此事，下令撤销了这个命令。

围绕修改宪法的斗争

一九七〇年七月，毛主席要着手解决政府工作、修改宪法等方面的问题，提出准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修改宪法的工作一开始，毛泽东就提出：不设国家主席、他不当国家主席。

为什么毛泽东不主张设国家主席呢？这主要是从当时的实际形势来考虑。第一，如果设国家主席，很可能要由他来担任，但是，一，他早已辞去国家主席一职；二，重新担任国家主席一职又要增加许多外交礼仪活动；三，打倒了担任国家主席职务的刘少奇，又由他来担任国家主席一职，就给政治对手留下了可钻的空子。第二，如果设国家主席而他不承担国家主席职务，则必须由其他的人来担任，这样一来可能引发一场新的斗争；一，很可能推举林彪担任，但林彪并不是适合的人选，他的身体不行，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他都很少参加，那么繁重的国事活动和外交活动，他更难胜任；一九六八年以来，林彪的一些活动很不正常，他究竟要干什么，一时还捉摸不透。二，如果推举另外一位常委担任，就只能在康生与陈伯达之间选择，这必然会引起一场新的斗争。三、如果推举常委之外的元老人物来担任，则可能引发更加复杂的斗争。

2，林彪在毛泽东提出不设国家主席、不担任国家主席之后，一反“紧跟”的常态，一再坚持设国家主席、推选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

第一，他捉摸不定；毛泽东不愿担任国家主席究竟是真意，还是谦虚、礼让？但是，不管是那一种情况，要推选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总不会错。第二，如果毛泽东真的不愿当国家主席，那么，这个职位十有八九就是他的了。国家主席一职虽然不增加多少实权，但对于他的接班人的地位来说就更加稳固了。

3，在讨论修改宪法的过程中，一九七〇年八月十三日，中央政治局修改宪法小组的一次会议，是一次关键性的会议。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在讨论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二节“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康生提出不设国家主席。吴法宪坚持要在宪法上写上设国家主席一节。

应该说这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正常的。康生之所以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是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意见、中央政治局的有关决定；吴法宪坚持要在宪法上写上设国家主席一节，是根据林彪的意见，也是可以的。但问题是有人说不主张设国家主席，就是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这就离题太远，近乎“造谣”了。

在讨论国家机构时，张春桥提出删除“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一句话，因为在宪法的其他地方已经有了。而吴法宪认为不能删，这是是否坚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原则问题。

张春桥提出的是文字表述问题，而吴法宪则把它说成是取消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原则问题。这当然是两回事。

张春桥提出从条文中删除“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等语。吴法宪当场尖锐地提出反驳：“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丰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

其实，在“九大”政治报告和新党章初稿中，都曾写上了“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这三个副词，送给毛泽东审阅时，毛泽东都把它们划掉了。这个情况，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知道，林彪、陈伯达、吴法宪等人也应该知道。双方争论时，陈伯达不在会场。

在会议中间，吴法宪又打电话给黄永胜，通报会议上的情况。黄即打电话报告了林彪、叶群。

4，小组会议散后，陈伯达邀吴法宪到他家里，陈伯达说吴法宪今天的话讲得好，“敢于斗争”，并要吴法宪把情况报告林彪。

吴法宪回到家里向当时在北戴河的叶群打了长途电话，报告了情况。过了一回叶群回电话说：林彪很高兴，说：吴胖子放炮放得好。他们认为，这一次抓住了张春桥的“尾巴”，可以狠狠地整他一下。

一九七〇年八月十三日晚和十四日下午，叶群分别打电话给陈伯达、黄永胜要他们准备关于天才方面和四个伟大方面的语录，准备在八月十四日晚政治局会议讨论宪法草案定稿时，支持吴法宪，批判张春桥，准备大干一场。一九七〇年八月十四日，黄永胜给李作鹏打电话说：吴法宪现在很孤立，要李作鹏回来参加宪法小组工作会议，支持吴法宪。可是，在一九七〇年八月十四日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修改宪法的会议上，张春桥没有继续坚持自己要删除的观点。宪法

修改草案获得一致通过。这样一来，林彪一伙精心策划的一场战火没有烧起来。这次战火没有烧起来，并不等于矛盾解决了。而是为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搞突然袭击，留下了伏笔。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搞突然袭击

1、关于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

关于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是在会前就定下的：（一）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问题；（二）国民经济发展计划问题；（三）战备工作问题。

在八月二十二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再次确认了以上三个议题。毛泽东提议增加一个形势问题。并说这是大家最感兴趣的。

会前定的三个议题，已经由有关方面作了充分准备，提出了相关的报告。

常委会决定：第一天的大会，由周恩来、康生讲话。

参加会议的人大多认为需要在会上来解决的问题不多，会议的进行会比较顺利、轻松。有的人甚至作好了在庐山游览、休息的安排。

2、关于林彪在全会上的讲话

其实，林彪在会前作了讲话的准备，并由秘书给他“拉条子”。

但是，在二十二日的常委会上，他明确表示不在大会上讲话。

常委会后，陈伯达专程到林彪处访谈，建议林彪应该在大会上讲话，把张春桥等人的问题提出来。林彪回答：如果讲话，要报告毛主席。

二十三日下午，林彪动身去参加会议前，仍在征求叶群的意见：今天的话讲不讲？

二十三日下午，常委们集合时，林彪突然提出他要在大会上讲话。

有两种说法；一种说，当五位常委集合在一起时，林彪提出他要讲话。毛主席说，那你先讲。一种说，周、康、陈在一个房间，毛泽东和林彪在另一个房间，林彪报告了他要讲话的内容，得到毛泽东的同意，只是要他不要点名。第二种说法是林彪、叶群对人散布的。毛泽东后来说过；林彪的讲话内容事前不打呼。看来，真实的情况是，林彪要在大会上讲话，肯定是报告了毛泽东；他要讲的主要内容是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也可能报告了毛泽东。但他的讲话主要是针对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则可以肯定，没有报告毛泽东。就连陈伯达后来也说，他愚蠢地相信了林彪的话。

说林彪二十三日在大会上的讲话是搞“突然袭击”，并不为过。从披露的事实来看，林彪的讲话虽然早有准备，但他自己也一直犹豫不决，二十二日常委商讨议程，他还表示不讲话，而到二十三日下午临开大会前，他才突然提出要讲话。

3. 关于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在二十四、五日小组讨论中的活动

林彪讲话的内容，从现在保存的录音来看，主要是讲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作用。他既没有直接点出有人反对毛泽东的思想、路线和领袖地位，也没有公开提出要设国家主席、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更没有点任何人的名字。从这篇讲话本身，确实看不出林彪的用意何在。但是，联系修改宪法过程中的争论（康生提出不设国家主席，吴法宪反对；吴法宪提出在国家机构一章中加上一切工作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方针，张春桥反对并说称天才是讽刺），林彪讲话的针对性和用意还是很清楚的。

二十三日晚，在周恩来主持的会议上，吴法宪提出要认真学习林彪的讲话，汪东兴提出把林彪讲话的录音再放一遍。结果会议作出了学习两天的安排，并得到毛泽东的同意。这样一来，实际上改变了会议的议程。林彪夸吴法宪立了一功。

二十四日，叶群与陈伯达、汪东兴、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通气，传达林彪对小组讨论的意见。特别强调不能点康生的名、更不能碰“十一楼”（指江青）。但是要把矛头指向公开出来：有人反对设国家主席，有人反对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有人反对以毛泽东思想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有人反对称毛泽东是天才，有人反对林副主席捍卫毛泽东思想（说称天才是讽刺）。

二十四日，在各组讨论中，几位大将按照林彪的部署活动。

在华北组，汪东兴、陈伯达带头在讨论会上发言：

陈伯达说：“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可以说是斗争的结果。……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话是一种讽刺。……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有的人说世界上根本没有天才，但是他

认为他自己是天才。我们知道，恩格斯多次称马克思是伟大的天才，他的著作是天才的著作。列宁多次称赞马克思是天才。斯大林也称马克思、列宁是天才。我们也称过斯大林是天才。否认天才，是不是要把马克思、列宁全盘否定呢？更不用说要把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一笔勾销。我看这种否认天才的人无非是历史的蠢才。”

他在插话中还说：“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得跳起来了。”

汪东兴也参加华北组的讨论。他也在会上发了言：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他说：有的人不仅不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连毛泽东思想都不要。

他说：我们党内还有这样的野心家，这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路线，是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我看，这种思想是最反动的。我们不容许这种思想在我们党内泛滥。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他说“中央办公厅机关和八三四一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愿望，是八三四一部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

华北组的会议结束，李雪峰、郑维山、汪东兴、解学恭、吴德等都没有走，李雪峰问汪东兴：今天这事毛主席知道吗？

汪东兴说：知道。

陈毅问汪东兴：汪主任，汪主任，我是不是又犯了错误了？

汪东兴说：没你的事，老实呆着。

郑维山说：汪主任，事情有变化啊？

汪东兴说：你这个郑维山，再也不要糊里糊涂了，同志！你要知道，问题严重呢，我们林副主席真是了不起，要不是他发觉得早，又一次出来捍卫毛主席，问题可就严重了。

郑维山说：那么毛主席知道这件事吗？

汪东兴说：知道，不让点名。

萧劲光说：这是怎么一回事？

汪东兴说：你老糊涂，笔杆子压枪杆子，厉害着啦。

在华东组，一些人明确地提出要把那些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揪出来”。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福建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分别写信给大会，要求把坏人（实指张春桥，后假称陈伯达）揪出来。

二十五日清晨，华北组的简报出来了。这份简报集中、鲜明地反映了二十四日华北组的讨论情况，极具代表性。林彪夸奖说：看了这么多简报，就数这份观点最鲜明。林彪的几位大将准备在各组乘胜前进。

二十五日清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了二十四日各组的讨论情况及华北组的简报。江青认为，这是有人反对文化大革命，企图打倒跟随毛泽东、支持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领导人。

4，关于毛泽东、周恩来、康生对事件进行调查

毛泽东听取了张春桥、姚文元的汇报以后，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中央全会上，突然有人企图攻击或打倒一位常委、三位政治局委员。

实际情况究竟如何，这需要进一步调查。但是，根据目前的形势，首先要将小组讨论停止下来，不使形势进一步恶化。

调查研究只能从现象入手，逐步深入到本质。

进攻一方有两层理论包装：其一是赞成设国家主席，拥护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说对方反对设国家主席，反对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其二是拥护称毛泽东是天才，拥护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针（说对方是反对称毛泽东是天才，反对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针）。

毛泽东的调查就首先从这里入手，并且从身边的人——汪东兴着手。

毛泽东质问汪东兴：你知道我多次说过；我不能再当国家主席，你为什么要在外面拥护我当国家主席？这样一来，就揭穿了汪东兴的伪装。汪东兴只好把陈伯达端出来，把责任都推到陈伯达身上。

陈伯达向来是以理论家的面貌出现的，他又在庐山会议上搞了一份马恩列斯称天才的语录。对陈伯达，毛泽东比较清楚。在文革小组工作中，陈伯达与其他人之间产生过一些矛盾。从起草九大政治报告开始，陈伯达的政治态度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可以推测出陈伯达在这次事件中起了重要作用。

另一个情况，在华北组讨论中，陈伯达、汪东兴发言以后，陈毅接着发言，矛头指向也很明显，火气也很大。这意味着什么？是二陈合流、甚至是二月逆流与八月逆流合拢？

在调查过程中，毛泽东、周恩来、康生等找这些人反复谈话、做工作。

汪东兴首先承认错误，表示愿意检讨。

吴法宪表示对林彪的讲话有“误解”，愿意检讨。

李作鹏、邱会作反对吴法宪作检讨。

叶群要吴、李、邱谈问题尽量往陈伯达身上推，不要涉及林彪、黄永胜。

陈伯达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以后，不得不违心地作检讨。

林彪不同意吴法宪作检讨。

5，关于毛泽东处理庐山事件的方针

经过几天调查，对情况有了初步了解，但由于事件发生突然，调查研究的时间很短，而全会正在进行中，不可能悬而不决。这时，只能把它作为一个政治思想问题来处理。

关于宪法中是否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既然是修正案，当然就允许不同的意见发表。赞成的、反对的意见都不能说错。绝大多数人出于真心，也有极少数人出于投机或保护自己，都拥护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但不能把不赞成设立国家主席的人说成是“反革命”。

关于称天才问题，涉及到哲学上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承认有天才，但又不可夸大天才。人的认识（知识和才能）从根本上说来源于人的实践。

陈伯达作为党内的理论权威，他并不是不懂得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常识，而是出于某种政治目的，搞语录、会上发言，鼓吹天才，用作一根棍子来打击别人。加之，他在党内的地位较高，由此影响、欺骗了許多人。根据他在召开九大以来政治态度的变化，他的这次行动决非偶然。

这次事件虽然是由林彪的讲话而起，但是，他在讲话中完全是作正面论述，并没有明确地针对某一部分人。

汪东兴及军委办事组的几个人，虽然在各组发言中，起到了带头作用，但是，搞意识形态斗争并非他们的强项，很可能是受了陈伯达的影响。

陈毅在陈伯达发言后表示积极支持，但是，并没有发现他们之间有串联活动。也可能是受了陈伯达的欺骗、影响。

因此，为了肃清错误思潮的影响，必须以陈伯达为重点批评对象，其他人员受教育，各自多作自我批评。问题不带下山。

6， 全会下半段的进程

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写下《我的一点意见》。

九月一日，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陈伯达。

九月二日至九月五日，各小组开会批判陈伯达。

九月四日，毛泽东提出对陈伯达的处理意见：一，要陈伯达再进一步检查，看来有困难；二，陈伯达以后不再出席大会；三，陈伯达如无历史问题，还保留中央委员。

九月六日，九届二中全会闭幕。

（五）关于几位大将的错误问题

1， 关于陈伯达的问题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对陈伯达进行了初步的揭发和批判。

一九七〇年九月九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陈伯达专案组，对陈伯达进行全面审查。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

在这个指示中，对陈伯达在九届二中全会的上问题定性为“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

这个定性应该说是准确的。不报告中央主要负责同志，未经中央批准，就在全会上煽动一些人，要揪出一个中央政治局常委、三个政治局委员，这难道不是分裂党的阴谋活动吗？

至于在这个阴谋活动中，陈伯达是不是主谋，其他涉案人都是上当受骗？这在当时整个案件正在审查中，只能作出这样的初步结论。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就说过：过去认为是林陈反党集团，现在看来就是林彪反党集团。

通过审查陈伯达的历史，给陈伯达戴了五顶帽子：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

陈伯达为自己作了辩解。但是，根据他的辩解，他自己也不能不承认：

一九二六年，他与国民党右派分子搞在一起，参与了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的活动，修改过这个学会的章程。但是，他说他没有正式参加这个组织。根据这个时期他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表现，说他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并不为过。

一九二八年陈伯达在苏联学习期间，与托派分子搞在一起，托派组织领导人介绍他加入托派组织，他说他没有参加，学校审查对他的结论是“学院派”。根据这个时期他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表现，说他是一个托派也不为过。

一九三一年四月，陈伯达被捕，他承认：由于叛徒许芝兰指证，他供出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等等。一九三二年九月，由于他托人，国民党军阀张贞出钱、国民党特务陈文聪活动，他被保释出狱。他承认：在出狱时，填了悔过书——误入歧途云云。但是他说，他认为自己曾经翻过案，这时填悔过书，不是悔加入共产党之过，只是悔加入共济会之过。这种说法当然只是自欺欺人之谈。根据他的表现，他至少是一个自首分子。

一九三二年九月，陈伯达出狱以后，与国民党特务陈文聪等人搞在一起。他究竟搞了那些不可告人的特务活动？是否参加特务组织？审查报告没有提出更多的证据，他本人也没有作更多的辩解。

至于修正主义分子这项帽子，主要是指陈伯达在建国以后的错误。

2，关于汪东兴的问题

最先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承认错误并作了初步检查。下山以后，表示正在继续考虑问题，愿意作进一步检查。但是，汪东兴九月十五日的书面检查，虽然表面看来是揭露了陈伯达的几件阴谋活动，其实并没有说出多少他参与其中幕后活动及真实意图。毛泽东认为，他和其他几个大将一样，与陈伯达不同，属于好心犯错误。充分肯定他愿意检查错误和揭露陈伯达的态度，并且希望通过他来带动其他犯有同样错误的人。有人说：汪东兴因为是身边的人，毛泽东就特意袒护。有的人甚至说汪东兴是毛泽东安插到林彪集团内的一个奸细暗探。这完全是不顾事实的瞎说。历史证明，汪东兴在九大前后，与林彪、陈伯达的政治立场非常接近，拼命向林彪集团靠拢，九届二中全会上，他积极主动地参与林彪集团的“倒张”（其实是要打倒康、江、张、姚，也可以说是“上海帮”）活动。

3，关于吴法宪的问题

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作过一次检查，一九七〇年九月二十九日，吴法宪第一次写出了书面检讨。他的态度比其他几位大将好，其实，这种好也是表面上的，他并没有交待任何林彪集团内部的真实活动。即使如此，林彪集团已经把他划入另类。时刻防止警惕他牵扯出其他几个人。

4，关于叶群问题

她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幕后协调指挥，小组冲锋陷阵；后期她观测风向，按兵不动。下山后，由于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与她谈话，她在一九七〇年十月十二日，交出了第一次书面检讨。很明显，她这样做是为了丢卒保车。

5，关于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的问题

他们三人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活动，与吴法宪、叶群是一样的，但是他们拒绝承认任何错误，也不作检查。

6，关于林彪的问题

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担任“倒张”事件的后台和总指挥，并且由他亲自发出了冲锋的信号。毛泽东为了保护林彪，把他与整个事件的活动分开。但是，在揭发问题的过程中，许多事情都涉及到林彪身上。因此，九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与汪东兴谈话中指出：连林彪也受他们的骗。据说他要写信给我，叶群和他们不让写。我劝林应好好地想一想，表一个态嘛！今天未想通，待想通后表态也可以。”

一九七〇年九月二十九日，林彪找吴法宪谈话：过去庐山会议我不赞成你作检讨，但是我现在赞成你到毛主席那里去说一下，作点自我批评，主要是把当时和张春桥发生争论的情况再向毛主席谈一谈。

一九七〇年十月六日或七日下午，林彪找吴法宪去谈话。据吴法宪交待，主要内容如下：①要我去向毛主席承认错误作所谓检讨，（这是第一次叫我作检讨），要说明庐山犯错误是出于突然的，在山下事先没有任何准备和联系，就是我八月十三日反映的情况没有核实，林彪听了之后有气，所以在庐山就讲了话。我当时领会他这段话的意思无论如何不要牵涉到林彪、叶群、黄永胜，要说明山下山上无联系，会前无准备，来欺骗毛主席。②错误要往陈伯达身上推，强调上当受骗。③这次庐山犯错误第一是陈伯达，其次是你，如果因为你这次犯错误把

你撤下来，暂时靠边站，也不能乱说乱道，以后会有机会替你说话，不要因为你一个人犯错误就倒一大片。这说明，林彪拒绝了毛泽东的要求。

召开华北会议

华北会议于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召开，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四日结束。周恩来在华北会议上的作了总结讲话。

这次会议主要是为了揭发陈伯达在华北地区的活动。从周恩来的总结来看，这方面的新内容并不太多。

这次会议也是为了查清华北地区领导人李雪峰、郑维山与陈伯达之间的关系。从周恩来的总结来看，这方面的新内容也不太多。在政治倾向上，李雪峰、郑维山与陈伯达是非常接近的；在组织原则上，李雪峰、郑维山并没有明显的违反。

这次会议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清查庐山事件打开一个缺口。由于这次会议清查的几个主要对象——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都不是事件的核心人物，因此，对林彪集团的震动不大。

召开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

华北会议以后，毛泽东对军委座谈会提出批评。

黄、吴、李、邱勉强作了一个检讨。

毛泽东仍然表示欢迎，并提出为他们创造一个机会，让他们公开作出检讨，结束这一桩公案。并以此推动林彪公开作出表态。

为此，政治局决定召开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并决定派周恩来等人去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实际上是要林彪参加会议。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五日，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开幕，

黄永胜、吴法宪作了检讨发言。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八日，汪东兴在批陈整风汇报会的华北组小组会议上作了第三次检查。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九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各组召集人会议，根据毛泽东意见，决定延长讨论时间。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九日，林彪从北戴河回到北京。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日，周恩来致信林彪，送去有关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材料及毛泽东的批示。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将批陈整风汇报会会议情况报告送呈毛泽东、林彪。会议希望主席、林副主席能见大家一次，如能给大家讲几句话更好。不过大家又说，不能因此要求，干扰主席、林副主席出席五一纪念在天安门观看焰火。

毛泽东批示：我这几天不出门。

林彪则不作任何表示。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在会上作总结讲话

强调指出：

在庐山会议及其前后，军委办事组五位同志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

但错误的性质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同反共分子陈伯达问题的性质根本不同。

五位同志对所犯错误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表示愿意通过实践和学习，改造自己。

对犯错误的同志，只要真正愿意改正，我们就要采取欢迎帮助的态度。

从这个讲话可以看出，中央打算对九届二中全会上发生的突然袭击事件，就此划上一个句号。

一九七一年五月一日，中央领导人出席首都人民欢庆五一劳动节焰火晚会。

林彪在到场数分钟后离去

一九七一年六月十五日，林彪又去了北戴河。

看来，林彪并没有就此善罢甘休。

第三阶段：一九七一年五月至一九七一年九月

这一阶段林彪集团的活动，已经从党内的路线斗争转变为反革命阴谋活动。

（一）制订反革命计划

有人说：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彪躲起来了、冻起来了，只是被动挨打，没有任何活动。这是在继续为林彪集团放烟幕弹，骗人而已。

中国召开华北会议以后，林彪就已经开始考虑制订反革命计划了。

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二日，林彪携叶群、林立果到苏州。在这里，他们开始酝酿一个打破危局的计划。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日，林立果从苏州去上海。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林立果又从上海到杭州。在杭州，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与陈励耘进行了十多次密谈，研究武装政变的可能性。

一九七一年三月初，林立果回到苏州，向林彪汇报了他在上海、杭州活动的情况。林彪肯定了武装政变的重要性，他对林立果说：“南唐李后主有两句诗：‘几曾识干戈’，‘垂泪对宫娥’他就是因为不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所以才亡了国。这是前车之鉴，我们不能束手待毙。”（摘自《周恩来年谱》下卷第 440 页）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八日，林立果和于新野从杭州到上海。

当天晚上，林立果在他卧室里对于新野和李伟信说：“根据目前形势，要设想一个政变计划。”他要立即把周宇驰从北京叫来商量，同时叫于新野暂不回北京，主要处理这件事。林立果接着说：“刚才已经把我们在杭州研究的情况，给‘子爵号’说了一下，她说在上海要隐蔽、安全。”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九日，林立果在上海约见江腾蛟。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日，林立果召集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研究制定政变计划。

林立果说：“这件事与首长（指林彪）谈过，首长叫先搞个计划。”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开始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三人商量，后来叫李伟信也去了。

林立果说：“目前从各地区实力来看，首长（指林彪）讲话，还是有一定作用，这件事与首长（林彪）谈过，首长（林彪）叫先搞个计划。”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写出了反革命政变纲领。

他们认为：“和国外‘571 工程’相比，我们的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和十月革命相比，我们比当时苏维埃力量也不算小。

地理回旋余地大。空军机动能力强。比较起来，空军搞‘571’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两种可能性：夺取全国政权，割据局面。”

一九七一年三月，于新野（空军党委办公室原副处长）搜集和摘录的关于政变和谋杀事例的草稿，共二十八例，一百二十六页。

抄正本已送林彪、叶群。

（这个草稿本是从周宇驰、于新野等外逃乘坐的直升飞机上缴获的。）

一九七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林立果在上海召集江腾蛟、陈励云、王维国、周建平等人开会。

江腾蛟[南京军区空军前政委]、王维国[上海军区空军政委]、陈励耘[七三五〇部队政治委员]、周建平[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

林立果说：（庐山会议）这是一次未来斗争的总预演，双方阵营都亮了相。陈伯达是斗争中的英雄，吴法宪是狗雄。我方此次，上下好，中间脱节，三是没有一个好的参谋长，。这些老总，政治水平低，平时不学习，到时胸无成竹，没有一个通盘，指挥军事战役可以，指挥政治战役不可以。说明这一点，今后的政治斗争不能靠他们领导，真正的领导权要掌握在我们手里。

现在的斗争是争夺接班人的斗争。将来百年之后，就是江青、张春桥这些人来接班。夺权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武装形式一种是和平形式。我们是采取和平形式。第一当前的主要工作是抓好部队；第二各个地方的情况不同，可以允许有不同的做法；第三团结。大家扯到这里了，周副司令就负责南京左派吧。王政委负责上海，陈政委就负责杭州吧，你们老政委在这儿，他来拉总协调，你们有什么事情可以多找老政委商量。

五七一工程的内容

五七一工程的内容包括九个方面：（一）可能性；（二）必要性；（三）基本条件；（四）时机；（五）力量；（六）口号和纲领；（七）实施要点；（八）政策和策略；（九）保密和纪律。

从这九个方面的内容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林彪集团的极右的政治立场、政治纲领、政治路线。

从理论基础、指导思想来看；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说什么“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从社会制度来看：他们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说什么“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公开提出：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代替 B52 的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即社会封建主义。

从国家制度来看：他们攻击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说什么“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

从党的性质来看：他们攻击中国共产党是什么“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

从党的领袖来看：他们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什么“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他们公开提出：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

从文化大革命来看：他们攻击什么“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

从社会生活来看：他们攻击什么“农民 [生活] 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 [已经发] 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

从当前的形势来看，他们认为：共产党的领导正面临着巨大危机，“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众叛亲离：（1）一场政治危机正在酝酿，（2）夺权正在进行。（3）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4）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逐渐地和平演变式的政变。（5）这种政变形式是他们惯用手法（6）他们“故伎重演”。（7）政变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8）因此，我们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反之，如果我们不用“五七一”工程阻止和平演变，一旦他们得逞，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中国革命不知要推迟多少年。（9）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而林彪集团则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夺权好时机，“我方力量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

质基础。在全国，只有我们这支力量正在崛起，蒸蒸日上，朝气蓬勃。革命的领导权落在谁的头上，未来政权就落在谁的头上，在中国未来这场政治革命中，我们“舰队”采取什么态度？取得了革命领导权就取得了未来的政权。革命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们舰队头上。

从对外关系来看：他们攻击我党在国际上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说什么“中苏对立。整苏联。我们行动会得到苏联支持。”

从政治路线来看，他们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国富民穷”，而他们要搞的政治路线是“民富国强”。他们公开提出“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

总之，林彪集团的政治纲领、政治路线，就是污蔑、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封建主义，然后打着反对封建主义的幌子，搞资本主义——民富国强。

（二）实施反革命谋杀

第一关节点是一九七一年四月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

林彪集团认为，这次会议最坏的可能性是把林彪端出来。因而他们就加快了实施反革命阴谋计划的步伐。

第二个关节点是一九七一年八月中央决定在国庆节前后，召开中共中央九届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

林彪集团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八月五日至九日派叶群回到北京，与黄吴李邱商量对策。

第三个关节点是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五日毛泽东开始巡视南方几省。

一九七一年九月五日，林彪集团得到了毛泽东在南方谈话的确切情报，认为毛泽东在谈话中已经把矛头公开对着林彪，是要搞掉林彪的政治信号。而且，毛泽东正好处在他们的势力范围中，是实行反革命阴谋的最好时机。

一九七一年九月七日，林彪、叶群召林豆豆从北京到北戴河。林立果向林豆豆交底：提出三个方案：上策是谋杀毛泽东；中策是到南方另立中央；下策是逃到苏联去。这预示着他们要开始行动。

一九七一年九月七日，林彪指示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的命令。当时毛主席在杭州停留，陈励耘掌握着抗州的警备大权，直接指挥毛主席住所的警卫工作。

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晚，林立果从北戴河回到北京。具体谋划南北两线同时进行暗杀国家领导人的活动。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凌晨一点，林立果从北京给叶群打电话：要撤火。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上午，叶群打电话给林立果：打鞭子。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二十二点，林立果一伙得知毛泽东已经离开上海。林立果流着泪说：全完了，没完成首长交给的重托，首长把生命交给了我，我拿什么去见首长？

第四个关节点是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下午毛泽东回到北京。

林彪集团在南方谋害毛主席的阴谋破产。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叶群首先得到毛泽东已经回到北京的消息。她马上通知林立果。

林彪要搞阴谋，他的活动空间本来就不大，而且他一贯的行事风格，就是通过叶群与黄吴李邱等人联系。他既不亲自读文件，更不亲自亲处理文件。现在却有人一定要别人拿出林彪亲自批示的文件作为证据。即便有这样的证据如林彪的手令，又有什么用处呢？他们又会说这是别人模仿的。看来只有林彪的讲话录音才能作为证据了。搞阴谋活动的人把自己在小范围内的讲话用录音保存下来，世界上有这样的人或这样的事吗？何况，即便是录音也可以造假呢？

从一九七一年四月到九月十二日，林彪、叶群、林立果干了那么多事，怎么能说林彪是在那里“等死”呢？说这些事都是林立果干的，叶群可是亲自出马了的，有人证。说这些事都是叶群、林立果背着林彪干的。而九月十一日叶群、林立果都对他们的亲信说过：这次是首长下了决心。如果这又是他们伪造的，那也只能说明：林彪早已成了一具行尸走肉。

（三）实行反革命叛逃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晚，林立果飞往北戴河。行前，他要求周宇驰实施第二个方案，立即研究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行动计划和人员名单。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晚，林立果、周宇驰向王飞谈了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之后，王飞召集鲁珉、贺德全、刘世英、朱铁铮等研究执行这一计划。

于新野在会的中间，把林彪的亲笔信又交给了王飞。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傍晚，周宇驰在空军学院召集江腾蛟、王飞一伙开了一个秘密会议。会上确定，由王飞、江腾蛟负责组织人员，保护黄永胜等人南逃。他们计划：13 日早晨 8 点钟，林彪由山海关机场直飞广州；13 日早晨 7 点钟，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由北京西郊机场直飞广州。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二十一点钟，林立果到了林彪住地。送了一束鲜花给林立衡，表示祝贺。

林立衡看出：林立果回来后，家里好像有事不让她知道。叶群一退场，随即和林立果去了林彪的房间。

林彪、叶群、林立果三个人在一起谈话，叶群说：去广州不行，去香港也行呀！

随后，林立果对张恒昌说：去广州！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晚九时许，由王飞、于新野召集刘世英、鲁珉、贺德泉（即贺德全，空军司令部某部原部长）、朱铁铮（空军党委办公室原处长）、郑兴和（空军司令部某部原处长）等开“七人黑会”，

王飞向他们讲：林立果已经回北戴河了！要他们立即组织一批可靠人员，护送黄、吴、李、邱于明晨（十三日）由西郊机场乘飞机去广州，到广州后另立中央，并与苏联搞联合等。

在这次会上，王飞和于新野组织他们拟定了去广州的人员名单，有二十三人，编为六个小组，并研究了行动时的有关具体问题。如出发时间、车辆安排、如何分工串联，以及到机场后进行动员和配发枪支等等。

王飞还宣布江腾蛟是这次行动总指挥，鲁珉、贺德全是副总指挥。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二十一点多，林豆豆问李文普，他们要到哪里去？

李文普说：主任叫我安排明早六点去广州，先不要通知八三四一部队。

林豆豆说：老虎尽干坏事，要害毛主席，他们要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这不是要外逃吗？你们赶快去报告八三四一部队。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二十三时半，林立果从北戴河给周宇驰打电话，命令停止“南下”，要“北上”。

周宇驰急忙告诉王飞：“暴露了，不搞了”。

王飞在会上宣布去广州计划作废，当场销毁了一些罪证，订立攻守同盟。

并告诉他的亲信：明天不走了，“就当没有这回事”，“有人问今晚我们干什么，你就说是研究办公室副主任分工问题”。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二十三时半，林彪听了叶群的汇报，得知周总理要来北戴河。他说：“我也不休息了，今晚反正睡不着觉了。你们赶快准备东西，我们马上走。”此时，叶群更加惊慌，她也说：“越快越好。”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二十三点五十分，林彪对李文普说：马上夜航去大连，不休息了，有些东西可以不带，够用就行了，到大连住一个星期就回来，回北京过国庆节。你准备一下，现在就走。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晚十二时左右，叶群和林立果闯进林彪的房间，叶群一把拉起林彪：快走吧，有人要抓你啦！

林立果叫小陈和小张快给首长穿衣服。

汽车刚调出库，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就出来了。林彪走在最后，连帽子、大衣都没有带。

林彪经过内勤室时问：东西都装上车没有？

林彪和叶群、林立果先后上了汽车。

林彪问林立果和警卫秘书：“去伊尔库茨克要飞多少时间？”

林立果说：“很快就到。”

林彪问完后，汽车就开动了。林彪的警卫秘书坐在前座上，后边是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

汽车驶到岗哨跟前，姜作寿执行拦阻任务站在路中间，叶群命令司机冲过去。

警卫秘书李文普，叫一声“停车！”司机没有听他的，只是将车速稍微慢了一下，李文普就打开车门跳下车。

这时，林立果开了一枪，李文普开了一枪，八三四一部队中队长肖奇明也开了两枪，打在汽车的玻璃上。

张宏、姜作寿等人看到这些，坐车跟上去。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零点二十二分，林彪一夥乘坐红旗轿车，以极高的速度开到停在机场的三叉戟飞机附近。车还未停稳，林彪一夥就急忙下车。

叶群、林立果、刘沛丰等拿着手枪，乱喊乱叫：快！快！快！快！快！快！飞机快起动！飞机快起动！

叶群披头散发，林彪光着秃头，慌慌张张地跑到飞机驾驶舱门底下，在没有客机梯子的情况下，慌忙顺着驾驶舱的小梯子，一个一个往上爬。第一个上去的是刘沛丰，叶群往上爬的时候，林彪紧跟着往上爬，林彪的秃头都顶着了叶群脚。

从以上几个片段，可以看出：

第一，林彪知道叶群他们是要逃往广州或香港；

第二，林彪知道周恩来要来北戴河以后，立即提出马上走；

第三，林彪对李文普说：马上夜航去大连；这究竟是他真的是要去大连，还是不愿意告诉李真实意图？

第四，叶群一把拉起林彪：快走吧，有人要抓你啦！此时，林彪应该已经知道这次转移决不是平时的动一动，而是逃跑；

第五，林彪走在最后，连帽子、大衣都没有带。这就更说明是逃跑了；

第六，林彪经过内勤室时间：东西都装上车没有？这说明他此时的状态是清醒的，决不是吃了安眠药以后的迷惑状态；

第七，林彪问林立果和警卫秘书：“去伊尔库茨克要飞多少时间？”有人认为，这是李文普一个人提出的孤证，不足以采信。

第八，汽车驶到岗哨跟前，姜作寿执行拦阻任务站在路中间，叶群命令司机冲过去。警卫秘书李文普，叫一声“停车！”司机没有听他的，只是将车速稍微慢了一下，李文普就打开车门跳下车。这时，林立果开了一枪，李文普开了一枪，八三四一部队中队长肖奇明也开了两枪，打在汽车的玻璃上。在林彪的眼皮底下发生的这种惊心动魄的情况，难道林彪还会以为这是一次平常的转移吗？

第九，叶群、林立果、刘沛丰等拿着手枪，乱喊乱叫：快！快！快！快！快！快！飞机快起动！飞机快起动！在林彪的眼皮底下发生的这种惊心动魄的情况，难道林彪还会以为这是一次平常的转移吗？

第十，叶群披头散发，林彪光着秃头，慌慌张张地跑到飞机驾驶舱门底下，在没有客机梯子的情况下，慌忙顺着驾驶舱的小梯子，一个一个往上爬。第一个上去的是刘沛丰，叶群往上爬的时候，林彪紧跟着往上爬，林彪的秃头都顶着了

叶群脚。在林彪的眼皮底下发生的这种惊心动魄的情况，难道林彪还会以为这是一次平常的转移吗？

确定无疑地这是一次逃跑，而且是惊慌失措的溃逃！如果硬要说，此时，林彪还是不由自主的，是被人劫持的，是要逃往大连，这都不过是自欺欺人蠢话！自己走路、自己上汽车、自己上飞机，有这样的不由自主、这样的被劫持吗？大连与北戴河有什么区别？既然是怕有人抓他，逃往大连与呆在北戴河有什么区别！

再回过头来说，林彪为什么要逃跑？为什么要怕有人抓他？那是因为他心里清楚：他指挥搞了谋杀中央领导人的活动，他阴谋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他指使叶群、林立果搞了反革命五七一计划。

够了，够了，林彪的一个逃跑行动，胜过十打声明。其他任何辩解都是徒劳无益的！

第四阶段：一九七一年九月至一九七一年十二月

在全国揭批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

（一）根据内外有别、有步骤地传达的原则公布林彪出逃真相。

第一步：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逃出国的通知

目前只传达到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以上的党组织。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六日至十月十五日，受中共中央委托，李富春连续主持召开部分在京老同志座谈会，揭发批判林彪一伙。

陈毅、聂荣臻、徐向前、蔡畅、邓颖超、邓子恢、张云逸、张鼎丞、曾山、王震等出席。

第二步：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关于扩大传达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

传达到县、区、乡

第三步：一九七一年十月六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扩大传达林彪事件的通知

在十月中旬将传达范围扩大到地方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军队连级党员干部，空军各机组、空勤地勤成员。

第四步：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关于向全国群众传达林彪叛党叛国事件的通知

传达到全体人民，但不向敌人、外国人泄漏。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至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召开在京上层爱国人士人士座谈会。

国内外敌人对我国内形势进行种种猜测，制造许多谣言，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为林彪反党集团辩护。

右倾保守势力以及犯错误的人必然乘机翻案，攻击文化大革命。

群众受过去大树特树的影响，对发生林彪案件感到不可理解。

这些都要做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

（二）抓紧清理有关林彪案件的人和事

1，对黄永胜等人实行隔离审查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宣布的对黄永胜等人的处理决定。

现在宣布对你们实行隔离审查。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关于黄永胜等人离职反省的通知

军委日常工作，中央已决定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主持，并筹组军委办公会议，进行集体领导。

2，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

一九七一年九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建议在叶剑英主持下，组成由叶剑英、谢富治、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陈士渠、张才千、刘贤权十人为成员的军委办公会议。

军委三总部分别由李德生、张才千、余秋里主持。

3，成立中央林陈反党集团专案组

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吴德、吴忠十人组成中央林陈反党集团专案组，下设由纪登奎、汪东兴领导的办公机构。

一九七一年十月三日，中共中央关于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的通知

（三）抓紧处理几个重点地区的问题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研究广州、南京等地清查与林彪有关的人和事的问题，决定派李先念、华国锋、张春桥前往帮助和检查工作。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会议。

会议一致认为：武汉、成都两个军区问题较大，需中央给以帮助。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会议。

听取来京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成都军区和四川省党政负责人关于揭批林彪反党集团的情况汇报。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人员时的讲话

陷得比较深的是广州，他们现在搞得比较好。其次是武汉。

关于成都地区问题，毛泽东说：错了改了就好。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会议。

约来京参加武汉地区座谈会的武汉军区和湖北省党政负责人谈话，了解对与林彪事件有牵连的人和事的揭批情况。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

报告：

武汉地区的会不如成都地区开得好，但后期大有进展。

刘丰会后自杀未遂。

从现在情况看，武汉地区领导同志座谈会不宜再拖下来。

（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对敌

在发生林彪叛逃事件以后，如何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对敌，就成了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特别是对那些在十七年中犯过错误的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犯过错误的同志，应该团结他们一道工作。

但是对于他们曾经犯过的错误，不应该轻易地全盘否定。如“二月逆流”问题。

第五阶段：一九七二年一月至十二月

（一）首要的工作是在全国开展继续批林整风。这又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1, 继续发出批林整风的文件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扩大《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的发放范围的通知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的通知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传达和讨论《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的通知及附件

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七日，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的通知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三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通过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期间征求过意见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和《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通过中共中央转发这两份材料的通知。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日，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传达和讨论《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的通知及材料

2, 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其中讲到会议的文件之五是毛泽东《给江青的信》。

周恩来说：“现在确定的文件之五，是最重要的一篇，就是毛主席给江青同志的信。这个信只有政治局一部分同志看过，在座的你们各省市的，还有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没看过。就是在“九·一三”以后，今年印的吧？这封信是什么时候写的呢？就是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政治局扩大会议林彪在河北厅讲话以后，林彪讲话经过多次改动，送到主席那里，主席总是有点不安，里头有些话过头，叙述政变那种写法也不当。但是当时是为本的要发动文化大革命，鼓革命群众之气，要打击、扫除那种修正主义的风，所以说有些过。但是当时的中央修改以后，还是请主席批。主席觉得不批，这篇东西不能发表，不是等于给群众泼冷水了吗？因为大家希望看到这篇东西嘛。实际上这里头有毛病，有些极“左”的话，有些不恰当的。……主席写这封信是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在武汉

写的，我是七月十一日到武汉。那时见了个外宾，我跟主席报告我到国外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以后，主席要我留一天。第二天上午见主席，主席就把给江青同志的那封信的抄件给我看。是一个底子，那个字是徐业夫同志抄的，有些字还抄错，主席还改了的。……前天，我们政治局决定要请示主席，我昨天去请示主席，原来主席还说等一等，昨天一请示说可以。”

可是，后来有人说：这封信是假的。网络上还传播一篇张玉凤的回忆录，说什么这封信是康生的主意，由江青、张春桥写成，毛泽东是违心同意的，周恩来也上了当。即使张玉凤真是这样说的，即使她说的都是真的，也不能说明这封信就根本不存在。周恩来就亲眼见过，难道他也是说谎？可以推测的一种可能是：这封信的原件和抄件都不存在了（烧了）。康生出主意，由江青和张春桥把它恢复出来。所以政治局请示毛泽东要把这封信作为批林整风汇报会的文件，开始毛泽东没有答应，真到五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再请示才同意了。因为这封信的基本精神保留了原貌，可以把它看成是修改稿。

一九七二年六月十日至十二日，周恩来连用三个晚上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的报告。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在最后一次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的全体会议上，作《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的报告。

3，解决几个省区的批林整风问题

1) 关于新疆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听取李德生、王洪文关于新疆问题的汇报。

2) 关于四川

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九日，刘兴元、李大章等七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问题的请示报告，指出：梁兴初、陈仁麒、谢家祥三同志上了贼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

3) 关于浙江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浙江来京开会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指出：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共浙江省四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关于南萍，熊应堂问题的总结提纲

4) 关于江西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江西来京开会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指出：九届二中全会以后，程世清同志采取了各种办法，对抗中央，压制群众，不准联系江西的实际，不认真进行揭发批判，竭力捂住盖子。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程世清同志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

5, 关于贵州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二日，贵州省地、师级干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总结提纲指出：在我党第十次路线斗争的重要关头，蓝亦农、张荣森同志都是站在林彪反党集团一边，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蓝亦农同志的错误更严重。

6) 关于湖南

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根据毛泽东意见，约见来京参加解决湖南问题座谈会的广州军区和湖南党政负责人。就解决湖南问题打招呼。

7) 关于河南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一日，中共河南省委关于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指出：王新早就上了贼船，陷得很深，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顽固地站在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进行了反党乱军、妄图篡权的阴谋活动。

8) 关于山东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谈山东问题。

9) 关于海军

一九七二年九月，毛泽东对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如何开展批林整风的意见

10) 关于北京军区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关于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意见——中共北京军区委员会三届二十三次全体（扩大）会议纪要，

4, 落实干部政策，调整领导班子

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叶剑英谈话。

毛泽东说：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毛泽东出席陈毅追悼会。

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说：林彪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而毛主席讲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混淆。听说新疆现在还有人讲二月逆流，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叶副主席已经主持军委工作，你们听到那些话，为什么不批驳？

一九七二年三月五日，毛泽东对苏振华来信的批语

此人似可解放了。如果海军不能用他，似可改回陆军（或在地方）让他做一些工作。可否，请中央酌定。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对杨成武家属来信的批语

请汪印发政治局同志研究。此案处理可能有错，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

一九七二年五月十八日，周恩来确诊患膀胱癌。

一九七二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对反映白坚情况摘报的批语

送总理阅处。白坚在我的印象里不错，应为他做出政治结论。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对贺诚来信的批语：贺诚同志来信请中央处理。我意应给予工作。

一九七二年七月七日，毛泽东对廖汉生家属来信的批语

送总理阅处。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未经中央讨论，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此件你阅后请交剑英、德生一阅。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

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一日，毛泽东在林枫家属来信摘要上的批语：连原信一起，请汪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意放他出来治病。林枫问题过去没有弄清楚，有些证据不足，办案人员似有一些逼供信。

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对邓小平来信的批语。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六日，周恩来、纪登奎、李德生等约林彪之女林立衡及其未婚夫张清林谈话。

一九七二年九月某日，毛泽东提议将王洪文由上海调来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九月二十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告知：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同意毛泽东的提议。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对中南海门诊部关于周恩来心脏病情况报告的批语：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毛泽东对刘建章家属来信的批语：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周恩来给纪登奎汪东兴的信

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

此事请你们二人商办，他在桂林摔伤了骨头，曾请韦国清同志注意帮他治好。王良恩同志了解其情况，可问他关于震林同志一家的近情。

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

5，整顿军队

一九七二年一月一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的指示的通知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转北京军区等单位关于对部队进行政策纪律教育的报告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二）继续打开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1，从一九六九年开始，中央就注意抓这项工作。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八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尼克松在一月二十日发表的就职演说。

一九六九年某月，毛泽东提议由陈毅挂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研究一下国际问题。”

同年七月和九月，他们先后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两份研究报告送交中央。在这两份报告里，提出：在中、美、苏“大三

角”关系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在目前美、苏两国都急于打“中国牌”的情况下，中国处于战略主动地位。

一九七〇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会见斯诺和夫人。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会见斯诺说：尼克松他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

一九七一年四月七日，外交部电话通知在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对外宣布：正式邀请美国队访华。

邀请美国乒乓球队的消息一传到名古屋，立刻在全世界引起轰动。日本各大报纸都在头版显要位置登出有关报道，并大加评论。这件事产生的影响，已“超过三十一届国际比赛的消息”。

消息很快传到美国白宫。美国总统尼克松后来回忆道：

“这个消息使我又惊又喜。我从未料到对华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得到实现。我们立即批准接受了邀请。中方作出的响应是发给几名西方记者签证以采访球队的访问。”

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在巴基斯坦方面的配合下，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从伊斯兰堡秘密启程，飞往北京。至十一日，三天内，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基辛格举行了六次会谈，着重就台湾问题交换意见。

周恩来指出：台湾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个人干预；美国必须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必须限期撤走驻台美军，必须废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

基辛格表示：美国承认台湾属于中国，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美国不再与中国为敌，并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逐步减少驻台美军；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历史可以解决。

会谈中双方商定尼克松于一九七二年五月前访华。并确定巴黎作为今后秘密联系渠道，中美华沙渠道不再恢复。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六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公告

公告宣布，获悉尼克松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我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 1972 年 5 月以前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基辛格第二次访华，为尼克松总统访华作具体安排。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晚，在纽约举行的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驱逐台湾蒋介石集团代表问题的提案进行表决。当联合国会议大厅里的电子统计牌显示该提案以七十六票赞成、三十五票反对、十一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时，整个会场立刻沸腾起来。

当得知联合国通过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决议时，毛泽东很高兴，说：“是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

当天下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及外交部有关人员开会，决定立即组团出席联大。以乔冠华为团长、黄华为副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很快组成。

2，一九七二年实现尼克松访华、中日恢复邦交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午，尼克松总统和夫人、国务卿罗杰斯和总统助理基辛格一行抵达北京机场。周恩来、叶剑英等到机场欢迎。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下午二时，毛泽东会见尼克松。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中美《联合公报》发表。

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三日，中英两国关于互换大使的联合公报签字公布。

两国之间自一九五四年起建立的代办级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

接着，中国同荷兰、希腊、联邦德国等国家相继正式建交或实现外交关系升格。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出现重大变化。

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基辛格一行来华访问。

周恩来与基辛格就促进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举行了五次限制性会谈。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四日，中美双方发表公报，一致认为：一九七二年二月中美《联合公报》所拟议的这种磋商是有益的，继续这种磋商是可取的。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五日，田中首相一行应邀访华，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会见田中一行。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周恩来总理和田中首相在中日联合声明上签字。

《联合声明》说：

“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

“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决定自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起建立外交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一日，中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两国外长签署建交公报。

（三）一种倾向往往掩盖着另一种倾向。

一九七二年，在社会上已经刮起了一股右倾思潮。这股思潮认为林彪的路线就是极左路线，林彪的极左路线就是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林彪的路线错了，也就说明文化大革命错了；林彪摔死了，也就意味着文化大革命失败了。

在政治局内部对批判极左思潮的问题也发生了分歧。周恩来从一九七一年以来，反复强调要注意批极左思潮。其他委员有不同看法。这个分歧突出地表现在四件事情上：

一是一九七二年的国庆社论中，是否要写上批极左思潮？

二是一九七二年十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龙岩”的《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学习笔记》文章，是否恰当？

三是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联部、外交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提出：以批林整风为纲，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是否恰当？

四是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写给毛泽东信，支持批判极左思潮，如何对待？

从这四件事来看，它涉及到中联部、外交部、人民日报社这样三个重要部门，而它们的指导思想就是批林彪反党集团就是批极左思潮、批无政府主义。就是要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指导思想。（《毛泽东传（1949-1976）》说：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由于毛泽东的“裁决”而告一段落。事实再次表明：毛泽东，可以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纠正错误，包括调整若干重要的政策；但他不会允许“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也证实了这一点。）

政治局内部对这几件事讨论的具体情况，从一些零星材料可以看出：

关于国庆社论，周恩来最终同意了姚文元的意见，删除了批判极左思潮的提法，改为正面阐述要做什么。

关于人民日报发表三篇文章，周恩来最后也同意了江、张、姚的意见。

关于外事会议的报告，周恩来经过政治局讨论也同意了删除原来的提法。

关于王若水的信，经过政治局两天的讨论，毛泽东召集的小型会议，达成一致意见。并由周恩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找人民日报的领导人谈话。

周恩来指出：我们内部极左思潮要批透，但不是讲林彪整个路线。并表示：这是中央务虚不够，不能完全责备报社工作的同志。

至此，关于批极左思潮的问题，可以说是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对指导当时的批林整风运动，具有重大意义。在这个问题的解决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六阶段：一九七三年一月至十二月

一九七三年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批林整风。同时，反对右倾也成了一项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一）继续批林整风

1，山东省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问题

林彪反党集团的黑手伸向了山东。他们在《“571 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中，把“济南”列为“借用力量”。林彪死党吴法宪、李作鹏、江腾蛟、王飞、程洪珍以及林彪操纵的反革命别动队小“联合舰队”的其他一些骨干分子，先后窜来我省，与易耀彩（北海舰队原政委）、辛国治（北海舰队原副政委）、

吴宗先(济南军区空军原司令员)、包玉清(十三航校原副校长)等，秘密勾结，互相串连，大搞反革命阴谋活动。他们大量秘密印发法西斯分子林立果的反革命“讲用报告”，林彪死党李作鹏还窜到青岛等地作反革命讲演，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大造反革命舆论。他们积极建立秘密的反革命组织，发展反革命势力，进行所谓“路线交底”，组织“左派骨干”，成立“战备机组”，收集情报，安设反革命黑据点、联络点，极力为反革命政变作准备。

省委、济南军区党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有严重错误，他们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站错了立场，支持了华北组反革命简报，而且迟迟不觉悟，对自己的错误和第十次路线斗争在山东存在的一些问题捂了盖子。省委、军区党委对批林整风运动的领导也是有错误的。对第十次路线斗争在山东地区反映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抓纲不突出，对批林整风运动未能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对毛主席、党中央关于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贯彻得很不认真、很不得力。致使我们省的批林整风运动，发展很不深入。对林彪及其死党在山东地区的阴谋活动从组织上清查不力，没有成立清查小组，有些重要线索，没有发动群众，深挖细找，穷追到底，彻底查清。对林彪死党在山东地区散布的种种反革命谬论，批得不深不透，有的没有广泛发动群众痛加批判。对积极参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阴谋活动的易耀彩、辛国治、吴宗先等，没有发动全省军民彻底揭发批判。对一些地方出现的反动的政治谣言，没有严肃对待，认真批驳和追查处理。对青岛批林整风会议的领导上，没有抓住第十次路线斗争这个纲，设有正确贯彻批林整风的方针，转移了斗争大方向。

2, 海军问题

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批转海军“四·五”会议的情况报告
1973.02.20； 中发 [1973] 10 号

一九七二年七月，为了贯彻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精神，海军党委召开四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四·五会议）。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海军的会议，纠缠着历史问题。在批林整风中，在历史问题的旧账上纠缠，容易走偏方向。中央政治局约肖、苏、王、吴同志开个会，解决一下。”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起，这个开了几个月的会议转向批海军司令肖劲光上了林彪“贼船”。后肖劲光写了几次检查。

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中央批转了这个“四·五会议”的情况报告。

说肖劲光上了“贼船”的罪证，大约有如下一些：

- 1) 1967, 1968 年肖给林彪写信，检讨自己，表示效忠；
- 2) 九大前林彪找肖等海军五人谈话，肖同意全力支持林彪死党李作鹏在海军的领导；
- 3) 在九大选举政治局委员时，肖没有选江青等人；
- 4) 九届二中全会上在华北组的发言支持设国家主席和林彪；
- 5) 利用准备与台湾海军作战的“七九方案”搞“北兵南调”，准备策应林彪的在南方另立中央等等。

3, 空军的问题

一九七三年五月十八日，空军党委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情况报告
林彪反党集团在空军的罪行

第十次路线斗争，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林彪反党集团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其罪恶目的，就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分裂我们党，背叛“九大”路线，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这场斗争，在空军表现得非常尖锐、非常严重。林彪抓军队，首先抓空军，下了很大功夫。林彪和他的大小“舰队”进行了猖狂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妄图把空军变成他们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基本力量”和“可靠基地”，利用空军所谓“机动能力强”，“夺取全国政权”。

- 1) 大树特树林彪一家的“绝对权威”
- 2) 拉山头，结死党，秘密建立法西斯特务组织
- 3) “九大”期间，大搞反党分裂活动
- 4) 抛出“两个一切”，向毛主席、党中央夺权
- 5) 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山上山下紧密配合，猖狂向党进攻
- 6) 炮制《“571 工程”纪要》，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

4，一九七三年七月十日，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

鉴于林彪反党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叛党叛国，罪大恶极，中央专案组建议党中央：

1) 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的党籍。

2) 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3) 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特务、叛徒、卖国贼叶群的党籍。

4) 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雪峰的党籍，撤销他们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5) 对参与林彪反革命政变的其他骨干分子，由有关部门负责审查，按照党的政策，区别情况，提出处理意见，报中央审批。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批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

继续任用、解放和调整干部

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商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一九七三年五月三十一日，经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决定王洪文从上海调中央工作，与华国锋、吴德两人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政治局的工作。（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王洪文出生于一九三二年，这时四十岁，做过农民，做过工人，当过兵，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头头。这些使毛泽东对他抱有很大希望，准备在实际工作中加以培养和进一步考察。）

一九七三年五月三十一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工作会议宣布解放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李葆华、廖志高、江华、江谓清、王稼祥、秦基伟、李成芳、方强、陶鲁笏、曾希圣等 13 名老干部。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对叶飞来信的批语
纪、汪酌处，此人似可解放，分配工作。

一九七三年八月四日，毛泽东对郭化若来信的批语
总理、剑英同志：

请考虑可否给郭化若分配工作。并希将孙子序言改版，写一篇批判吸收性的序言。此信并请告郭。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毛泽东对罗瑞卿来信的批语
似可释放。请中央酌定。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邓小平任职（即日起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的通知。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命令。

召开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

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日至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参加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及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共 246 人。会议主要议题是：一、筹备召开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二、讨论批林整风问题；三、讨论本年度的国民经济计划。

会议讨论了《中央关于党的十大代表的产生的决定》，确定代表名额为 1740 人。

会议同意经毛泽东审定的《中央政治局关于修改党章问题的请示》中的各项规定。同意党章修改问题的重点是总纲部分；按毛泽东多次提出的现在还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进行修改，不写入“三个里程碑”的提法。不写入人名，增加毛泽东近年来若干新指示和“第十次路线斗争”的经验等内容。

会议决定由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负责中共党章修改小组，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起草《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

一九七三年六月初，政治局确定政治报告起草小组成员并开始起草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

政治局确定的报告起草小组成员有周恩来、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叶剑英、李先念六人，由张春桥执笔。

一九七三年六月十六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政治报告起草小组讨论情况。

毛泽东在听汇报后，基本认可了报告稿的要点，并提出具体补充意见。

毛泽东提出：政治报告中要指出时代的特点，现在，仍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这个的马克思主义与列宁所处的时代相同，要引用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所说过的话为证。

还指出：报告中要指出一种倾向常常掩盖另一种倾向。

此外，应多引用一些马、列的话。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日，毛泽东批示：原则同意十大政治报告稿。

并确定由周恩来作政治报告。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三日晚，在周恩来主持下，召开了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进一步协商将在十大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名单。会议通过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以及中央领导机构全体成员名单。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十次大会预备会。

会议通过十大主席团一百四十八人名单。

会议通过十大的三项议程：（一）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二）王洪文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三）选举第十届中央委员会。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晚，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

毛泽东主持开幕式。

大会通过的主席团领导成员是：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秘书长张春桥。

周恩来作政治报告

王洪文作党章修改报告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八日，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

在新当选的一百九十五名中央委员和一百二十四名候补中央委员里，除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朱德、董必武、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外，还有在九大上没有当选的一批老干部，如：邓小平、王稼祥、谭震林、乌兰夫、李井泉、苏振华、杨勇、廖承志、陶鲁笏、叶飞等。

据周恩来说：这一届中央委员会中，“工人、农民、现役军人以及其他劳动人民合起来比例约为百分之六十七，其余百分之三十三，很大一部分是革命干部，这里边很多过去也是军人。”

一九七三年八月三十日，召开十届一中全会。

在周恩来主持下，十届一中全会选出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

毛泽东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是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

中央政治局委员二十一名、政治局候补委员四名，政治局常委除主席、副主席外，还有朱德、董必武、张春桥三人。

反对右倾机会主义

一九七三年，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里，右倾风愈演愈烈。

1，一九七三年，有人借文艺作品少，攻击文化大革命、攻击江青等人。

2，一九七三年，在教育领域也刮起了一股右倾风。一九七三年九月，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十二岁的学生黄帅，听了红卫兵节目报道的兰州十四中学红卫兵帮助老师的事迹，受到启发，随后，她于九月五日、九月七日、九月二十八日，给老师写了三篇日记提意见。顿时，师生的关系紧张起来，老师批判他“拆老师的台”、“打击老师威信”、“恶意攻击老师”。而黄帅认为，老师是“压制民主”，“打击报复”。老师拍桌瞪眼在班里说：“直到现在，我还是公开号召同学们和黄帅划清界限”，“跟黄帅一起跑的人立场站错了”。班里还出了板报，点名批判黄帅的日记。班里同学在老师的率领下，不断对黄帅嘲笑讽刺，大轰大哄地进行围攻，甚至个别同学提出把黄帅“批倒批臭”的口号。

3，一九七三年，在意识形态领域，不注意两种对立的思想斗争，放任自流。

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处举行会议。

毛泽东提出：要注意抓路线、抓上层建筑、抓意识形态，学一点历史，批判孔子。

一九七三年七月四日，毛泽东同张春桥、王洪文的谈话

他讲到“批孔”问题，表示不赞成否定秦始皇，认为林彪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

一九七三年七月十七日，毛泽东会见杨振宁时又谈到儒法斗争的问题，

毛泽东说：“我们郭老，在历史分期这个问题上，我是赞成他的。但是他在《十批判书》里边，立场观点是尊儒反法的。”“法家的道理就是厚今薄古、主张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的路线，要前进。”

一九七三年八月五日，毛泽东向江青讲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情况，

毛泽东说：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他当场念了他写的一首题为《读〈封建论〉呈郭老》的七言律诗：

劝君少骂秦始皇，
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
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
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
莫从子厚返文王。

一九七三年八月六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江青在会上传达毛泽东有关儒法斗争的谈话及所写的七律诗，并要求将此内容写入十大政治报告。

周恩来表示：对此需要理解、消化一段时间，不必马上公布。

一九七三年八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杨荣国的《西汉时代唯物论反对唯心论的斗争》。

一九七三年九月四日，北京日报发表梁效的文章：《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

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发表施丁的文章：《“焚书坑儒”辨》

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发表罗思鼎的文章：《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一日，发表劲云戈的文章：《右倾机会主义和孔子思想》。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一日，红旗杂志第十一期发表罗思鼎的文章：《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三日，中央对外联络部长的耿飏在部核心小组会议上说：“听说总理一次看到《光明日报》送审的清样时说，看来批孔文章太集中了。中央还没有正式文件，批孔搞一、二、三次就可以了。”

4，一九七三年，在政治领域，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右倾翻案情绪也公开表现出现了。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一日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议十大主席团领导成员名单。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担任十大主席团主席、副主席的人，也就是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的人选。

主席团主席由毛泽东担任，没有任何异议。

当议到副主席人选时，会上先后提出四人，即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和叶剑英。

这时，政治局委员许世友提出：“我看只要一个副主席就行了！”他所讲的“一个副主席”，是指周恩来。

后来，他又认为有三个老同志（即周、康、叶）就够了。

许世友的态度，表明他对迅速“进入”党中央核心并在十大筹备工作中身居要职的王洪文强烈不满。这种看法也代表了很多老干部的意见。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三日晚，在周恩来主持下，召开了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进一步协商将在十大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名单。

会上，周恩来讲：他着重说明毛泽东选调王洪文到中央工作的情况，表示：主席讲的我要传达，因为主席给我不知说过多少次了。我们应该按照这一精

神，重视选拔青年干部，不能看不起“儿童团”。他又说，我年纪大了，但我还是要为党鞠躬尽瘁的，我们是立党为公，不是立党为私。

到会的许世友仍很不服气，多次插话陈述自己的意见。

会上，当提名为十大主席团秘书长的张春桥批评许世友“反对主席的意见”时，许世友当众大声训斥张春桥：“你有什么了不起！”

轮到王洪文讲话时，包括许世友在内的一些老干部都没有像听了周恩来讲话后那样鼓掌，而是用沉默来表示不满。

十大的政治报告，毛泽东已决定由周恩来作。当讨论由谁来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时，提议王洪文的人寥寥无几。

虽然会议最后还是通过了各项预选名单，但以上这些迹象，已显示中央内部在十大前夕存在的分歧。对王洪文的反感和不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许多人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

5，一九七三年，在外交工作领域，右倾机会主义思潮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九七三年六月五日，毛泽东会见越南领导人黎笋、范文同

毛泽东说：“我们外交部发过通报，说是美国的战略中心是在亚洲、太平洋。后来我得到这个消息，我说不一定。它在欧洲、中东、还有美国本土，问题不少。它总要抽一部分兵力走，不能老在亚洲、太平洋。它管的地方太多，要收缩一点。而且在你们那里，吃了亏了。”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日，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紧急约见中国外交部负责人

勃列日涅夫在访美期间与尼克松签订了《苏美防止核战争协定》、《关于进一步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谈判的基本原则》等文件。

布鲁斯面交尼克松致周恩来信的副本，并提出希望周恩接见的请求。

外交部据此起草了周恩来会见布鲁斯的谈话要点。报请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认为：口气太软，是右倾表现，批示道：“与资产阶级联合常忘掉斗争”。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周恩来会见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我们对美苏签订的核协定持怀疑态度，中国政府仍坚持中美上海公报的立场。历史表明，签订这类条约是靠不住的，现苏

联领导人访美给人以两个大国主宰世界的印象。我们不怕孤立，首先我们不丧失立场，同时我们又是现实主义者。说许多空话，不如做一件实事。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六日，毛泽东看了周恩来与布鲁斯的谈话纪要

毛泽东说：这下子腰杆子硬了，布鲁斯就舒服了。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七日，外交部第一五三期《新情况》刊登一篇题为《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的文章，分析、评论了美苏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以后的世界形势，认为，美苏会谈“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

毛泽东对外交部第一五三期《新情况》提出批评意见。

一九七三年七月三日，周恩来致信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

周恩来从王海容处得知毛泽东对外交部的批评后写信给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要求撤回该期《新情况》。并检讨说：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望你们也应以此为鉴，发挥钻研商讨的积极性，有时也可要求我召集短小的会来交换意见。

一九七三年七月四日，毛泽东同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

毛泽东说：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

美、苏两家开了两次会。外交部的观点，不如几个大使馆，驻法、驻瑞士、乃至驻叙利亚，其他还有许多，都比外交部的意见高明。外交部有一个什么《新情况》，先说大事不好，一说欺骗性更大，又说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大概是铀——235，浓缩铀吧。大家都说好，都说此文写得不错。我一看呢，也许我的是错的，你们贵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比如说，中央总是说国内外形势大好。一个大好，也不是中好，也不是小好，更不是不好。而外交部说大事不好，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这样浓下去，浓到明年，欺骗性变为更大，要升级了。这个欺骗性的问题闹了一年多了。

对于越南问题，美国战略重点东移，我就提出重点西移。欧洲年嘛！人家自己讲的嘛！人家自己要撤兵，有一个国家死也不让撤，说是世界革命风暴在亚洲，亚洲革命风暴中心在越南。如果不打了，就不得了了。就是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咱们就是那号人物了。我是讲我，我这几年名声不好。世界上唯一的马克思、一盏明灯是在欧洲。那个地方放一个屁也是香的！奉为圣旨啊！我就不

理！你奈何得了我吗？鄙人是右倾机会主义。“明灯”是用我的名义写的。我就没有看。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究竟重点东移，还是西移，你们讨论一下。我看多少西移一点吧。人家要走路，死也要拖住。“革命是不能妥协的。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妥协的。”这是哪一条马克思主义？

又是外交部一个什么屁司（亚洲司），说是田中不能上台，上台也不能改善中日关系。

又说是美国不行了，腰杆子硬不起来了。

经常吹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

专门勾结美帝、日本、西德、英国这些坏人的是我。

关于革命不能有妥协这个学说，不是马克思主义。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一九七三年七月五日，周恩来在得知毛泽东七月四日谈话后，在外交部长姬鹏飞为此写给毛泽东的检讨报告上加注：“这些错误与我的政治认识和工作方式有关。”

一九七三年七月五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给外交部的信上批示

此种顽症，各处都有，非个别人所有，宜研究改正办法。

一九七三年七月十五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信上批示

周恩来将将部起草的《〈新情况〉一五三号错误何在？》一文送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将外交部文章中“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一句中“严厉”二字删去。

周恩来附信提出：关于错误的检讨，我当另写报告。

毛泽东批示：检讨不要写了。

（五）批周会议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日，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抵达北京。

基辛格在十一月再次来华，打算在上次访华的基础上，再就中美双方的战略意图、军事技术合作等具体问题同中方沟通，并达成默契。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晚，基辛格举行告别晚宴

告别晚宴结束时，基辛格突然提议，希望再和周恩来举行一次单独会谈，继续讨论一下中美双方的军事合作问题。

当基辛格提出临时动议后，周恩来因事起仓促，来不及请示毛主席，而作为东道主也不便回绝客人的提议，便同意与基辛格就中美双方军事合作的问题又举行了一轮会谈。

会谈只有中方的翻译唐闻生和美方的温斯顿·洛德在场。

关于战争问题，周恩来说：对中国来说，不能不设想最坏的一种情况，作最坏情况的准备，即在一个时期内孤军奋斗，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作战思想；即使包括美方在内的几个方面同时向我们进攻，我们也准备了。

基辛格还提出在中美之间建立热线联系问题。他说：以美国的卫星系统向中国提供早期预警，以便及时采取措施，保护中国的防空、防御系统（轰炸机、导弹等），或者在中美之间签订一个有关意外的核战争的协议（美国已草拟了文本）。

对于基辛格提出的建议，周恩来表示：“有些东西可能对我们会有所帮助。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

十三日夜与基辛格的单独会谈刚一结束，周就挟着皮包匆匆离去。打电话向毛泽东请示，但被告以“主席正在睡觉”。周恩来在办公桌旁走了好几圈急步，认为事情很急，不能等。最后，周恩来下决心承担责任，拍板作了决定。第二天在给基辛格的答复中表示：中美双方指定专人对此继续交换意见。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基辛格离京的当天晚上，毛泽东与王海容、唐闻生谈话

并让她们立即整理出周恩来与基辛格的谈话记录，为此，王、唐二人找周本人核对了谈话记录。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听取了王海容、唐闻生关于中美会谈的汇报，她们认为：周恩来、叶剑英在中美会谈中的态度软弱了。总理在这次会谈

中闯了乱子，被苏联的原子弹吓破了胆，没有请示报告主席，就向美国承担了搞军事合作的义务，接受了美国的核保护伞。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和外交部一些成员开会，

毛泽东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讲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是错的，要打。在陕北时连那个小土围子，不打它就不投降。”苏联“野心很大，力量不够。”

他还说：“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也可以来，在后面排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

他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此次中美会谈中的错误。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晚，政治局会议

周恩来传达毛泽东对中美会谈的意见，并介绍同基辛格会谈的情况。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周恩来两次向毛泽东书面报告政治局会议情况

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对中美会谈的批评和进行讨论的情况，并尽量根据自己的认识作了检讨，说：“美国以苏向东吓唬我们，要我们当心，想套住我们，便于美苏争夺或暂时勾结中做筹码，我们不能受骗上当”，检讨承认他自己“在这次会谈中做得不够”。

信发出后，周恩来又补送一信，说：“应指出，目前的危险是防右，要号召和提倡从中央起，中、青干部敢于斗争老干部的修正主义思想和右倾错误，并养成一种好的风气；要防止和批判国内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对我们的侵蚀。”

承认自己犯了“修正主义”的错误，并完全接受对他的批评。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起，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批判周、叶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

会议一开始，江青就提出，要批判周恩来在外交路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和叶剑英在同美国军方会谈时的“右倾软弱”，

江青说：周恩来有时“左”了，“是霍查主义，主张两个拳头打人”，没有好好执行毛泽东的联美整苏方针。

江青还质问周恩来：在同美国人的会谈中究竟“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并批评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等等。

会上，有人严厉指斥这次中美会谈是“目无中央”、“蒙骗主席”、“卖国”、“屈膝投降”、“丧权辱国”、“投降主义”、“给美国人下跪”，等等。

周恩来当场对江青拍了桌子，说：“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但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会议由原来的政治局会议改为政治局扩大会议。

除了政治局委员外，外交部的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和王海容、唐闻生、罗旭、章含之参加，再加上中联部长耿飚和刚刚复出的邓小平。

会议地点从钓鱼台搬到了人民大会堂。

会议成立了一个“帮助小组”，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华国锋等六人组成。每次开会前，帮助小组连同王海容、唐闻生一起先在钓鱼台开小会，商量如何贯彻毛泽东的意图。

会议主持人由周恩来改为王洪文。

毛泽东指定王海容、唐闻生为联络员，随时向他报告会议情况。

扩大会议一开始，由唐闻生原原本本地传达了毛泽东在最近一个时期对周恩来及外交工作的批评，如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针插不入，水泼不入”；外交部不执行“山雨欲来风满楼，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外交方针，因此要对外交部“甩石头”。“有人对苏联怕得不得了，一旦打进来，他就要当儿皇帝呢！”等等。传达了八个小时。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五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

从十一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五日，会议进行了十天。

邓小平也在会议上发了言，他指出周恩来的问题的严重性：“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已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

会议后期，毛泽东指示：“要开成一个团结的会”。不能搞红卫兵上街贴大字报，打倒总理、叶帅的那一套，要内部开会解决。又要批评，又要工作，几个老同志和他自己，都是不久于人世的人了。

会议最后责成周恩来做检讨。

周恩来要求面见毛泽东当面做检讨，毛泽东回复：要检讨就在会上做。

周恩来在会议上就自己的错误作了检查。

毛泽东阅后批示道：“可以了。”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九日，毛泽东同周恩来谈话。

十二月九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亚。

在会见记录上有这样的记述：

毛泽东同周恩来“长时间热烈握手”，并且说：“总理啊！”毛泽东指着在座的曾向他汇报有关情况的几个人说：“现在的小将不好惹呢。”“把他们提起来，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总理啊，你挨整了，听说他们整得你不亦乐乎啊，说是你爱插我的话，弄得你现在都不敢讲话了，把我搞成了一言堂。”

他一方面肯定了批评周、叶的政治局会议；另一方面又指出：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指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九日，毛泽东与王洪文谈话

谈话内容与周恩来谈话大致相同。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九日，毛泽东与唐闻生、王海容谈话

毛泽东说：这次会开得好，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对总理可以批评，林彪就不行。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指总理）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指江青）才是迫不及待。

第七阶段：一九七四年一月至十二月

一九七四年的主要任务是开展批林批孔。联系实际就是要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右倾翻案思潮，解决革命造反派和支持文革的领导干部遭受打击排斥的问题。

发动批林批孔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二日，王洪文江青就印发北大清华汇编《林彪与孔孟之道》给毛泽东的信

主席：

我们看了北大和清华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这份材料，觉得对当前的批孔有很大帮助。各地也迫切需要有这种简要的材料。我们提议，可否转发各省、市、自治区、各军兵种、各大总部、国务院各部，作为当前批林批孔的参考。现将材料呈上，妥否，请批示。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某日，毛泽东对王洪文、江青报送的《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批语

同意转发。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四日，王洪文在中央读书班的报告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给大家吹一吹，最近接触一些情况，有些省老大难解决不了，主要是路线没有搞对头，有些地方嘛，除少数坏人外，多数是领导人的路线没有搞对头，主要是没有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没有正确对待群众，没有正确对待运动。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带有普遍性。

有的同志直到今天对文化大革命还像七、八年前那样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有的甚至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个别的甚至把文化大革命描绘得一团漆黑，简直像洪水猛兽一样；有的说，一搞文化大革命就毛骨悚然。

有的说文化大革命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今后也不要再搞了。特别是高中级干部，说法是各式各样。

有的说“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取得了伟大胜利，但是在我们这里看不到”。有些人不分青红皂白；有一些单位的坏事归罪于文化大革命，或者说是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最近我们解决四川十二个厂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没有深入批林，关键在这里。大同坦克厂，闹了八年，这次两个月解决了；主要是原来的路线搞错了。

江西省就有人在干部会议上传达反革命谣言：“打扫庙宇，请进真神，老师归位，小兵回营”。这个谣言是从部队里的两个高级干部哪里传出来的。江西省当作毛主席的指示，在几百万人的干部会上传达。毛主席严厉的批判了这个反革命谣言，把它改成“打扫庙宇，请进真神，老师归线，小兵提升”。最近看到

一个电报，现在小兵都造反了，搞两个头头，弄得“不亦乐乎”。我同江西的一些同志说过，你们那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还有人说，文化大革命好是好，但形式是不是非要这样搞？

有些人“称赞”文化大革命，说文化大革命群众不听话，动不动就贴大字报，开会七嘴八舌；这很对嘛！

有人说：“老干部过去南征北战，文化大革命七斗八斗”。

还有一种人，对文化大革命打倒了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个关系到国家不变颜色的事，根本不想，对群众的冲击，总是耿耿于怀，解放了、上台了、一有机会就想整群众，江西省的干部就是如此。

有人说：“文化大革命被揪斗，账总是要还的，不拿利息就不错了，出口气有什么不可以？”

还有一种倾向，认为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是极“左”实质。不久前有个大学有人说：“极左不批，是非不明，最大的证明，是十七年的功过，谁人评说？”

有人说这个“中央下发的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不灵了，说这个“纪要”是极“左”思潮的产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的争论还没有结束，二中全会以来有一股右倾思潮在各地时隐时现，如新疆的龙书金、四川的梁陈、河南的干部都是这样的人物。他们转移批林斗争的大方向，企图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攻倒算。有的地方在讨论修改宪法、党章时，就不同意写上走资派。少数人现在还对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甚至说造反派没有好人！一场文化大革命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不分，造反派中混进了少数坏人，这有什么奇怪呢？有人骂我们是造反起家的。他们有套说法：“老干部回岗位，新干部回单位，支左人员回部队，文化大革命是场大误会”。

毛主席最近还说“中国要出修正主义，同志们要注意呀”。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也不议政。毛主席这些指示，适用于政、军、学。东南西北各个地方，就是告诉我们要抓大事，值得同志们议论。今后出修正主义，还是在上层建筑领域。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三日，江青给空军领导人写信，要求他们开展批林批孔。

江青找迟群等人谈话，将他们派往海军、空军等单位点火放炮。

江青致信国务院文化组负责人，提出：我希望文化组的批林批孔运动能开展、深入下去，开花结果。材料不够，你们可以翻印。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三日，江青看了解放军报内部参考上刊登的关于二十军军直防化连在批孔问题上的反映后，亲自给防化连全体同志写了信。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三日，江青给空军马宁写了一封信。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三日，江青给吴德的信。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三日，叶剑英致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

就江青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联系实际批林批孔点名批评自己一事，表示接受江青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对他的帮助。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七日，解放军报刊登文章《既要讲批评，又要讲谅解》。

一月二十八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召集有关新闻单位开会，批评：这篇文章很坏。并布置写批驳文章。

解放军报发表文章，批评一月十七日的文章：离开批林批孔的大方向，来讲团结的问题；貌似全面，实则片面强调谅解，倒很像是折衷主义，很像是中庸之道。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会议提议：中央军委成立以叶剑英牵头，有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参加的五人小组，讨论处理军委的大事及紧急作战事项。

一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正式向毛泽东提议时，将五人小组增至六人（加苏振华）。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通知及附件

1974.01.18；中发〔1974〕1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转发。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二日，江青同志给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的信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四日，江青致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邓小平的信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四日，中央军委召开驻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召开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周恩来江青迟群谢静宜姚文元讲话。迟群、谢静宜又在讲话中提出上大学“走后门”的问题。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成员接见中央读书班和记者学习班的代表。

周恩来就批林批孔问题发表讲话。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江青给河南郑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下乡知识青年的信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江青致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苏振华的信

一九七四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讨论批林批孔问题。

鉴于运动开始后发生的一些情况和问题，会议提出：在党政机关、军队系统、生产部门和大中学校等应早一点规定一些政策界限，报经中央和毛主席审批后，下达全国试行。其中有：

各野战军和军委、各军区的作战、机要、通信、情报、运输、供给等部门不搞四大；

党政机关则应集中在一个易于观看的地方贴大字报，机关的学习初期可定半天，其他时间仍搞业务；

学校、工厂都不放假搞运动，学校可分出一定时间学习和批判，工厂可在生产外的时间搞，农村公社亦然。凡学习时不任那个单位，都要有值班员，不致误紧急事件。

会议还决定成立由周恩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华国锋和汪东兴等七人组成的小组，代表中央处理批林批孔日常事务。

军队系统则根据李先念的建议，由军委六人小组负责处理有关问题。

一九七四年二月一日，周恩来、王洪文联名致信毛泽东

汇报政治局会议情况。

毛泽东圈阅了此信。

一九七四年二月五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讨论批林批孔运动问题。

会议认为：目前各地各单位运动处在发展不平衡状态，经验还不够多，如果过早地规定政策界限，可能对群众的发动定了框框，不如先看一看，搜集更多材料，多积累些经验，才好提出问题谋求解决。

会议对军队系统要害部门不搞四大、由党委统一领导运动，以及野战军部队不另成立战斗队、不搞外出串连等问题作了布置。

一九七四年二月六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如果只研究走后门一个问题，这又太狭窄了，不正之风决不止此，而走后门又要分析，，区别处理，才能收效。

一九七四年二月九日，毛泽东在江青来信上的批语

江青在一九七四年二月六日给毛泽东写信，将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给她的一封信及反映批林批孔问题的材料转送毛泽东，请求审阅。

毛泽东在江青的来信上批示：

除少数外大都未看，近日体温升高两度，是一场大病！一切人不见，现在恢复中，你有事应找政治局。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日，江青给国防科委情报资料研究所恽仁祥的信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五日，毛泽东给叶剑英回信：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我的意见如此。

一九七四年二月至三月间，王洪文、江青、张春桥相继在军队系统批林批孔汇报会、军队文艺单位负责人会议上，批评军队领导机关对批林批孔消极应付，右倾手软。提出要整一整军队，该夺权的还是要夺，要在军内搞放火烧荒。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一日至十五日，周恩来到三〇五医院作全面检查确诊为癌症复发。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

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七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

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日，中共中央关于当前运动的几项规定

12 号文件发到县团级，可以向广大群众传达。但不能张贴。

12 号文件的基本精神是强调加强党的领导，放手发动群众，搞好批林批孔。

第一段说，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联。

第二段讲，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在三支两军中作出了巨大贡献……，不要揪军代表。有的批评意见可以送到所在部队的领导机关。部队各级党委和被批评的同志应当欢迎。

第三段说：应强调指出，批林批孔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批林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批孔比批林更困难的。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七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

江青：

两信收。前后不一。党的大势不错，悲观不好。不要动摇。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不要主观片面（面）。千万注意。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要请假。钱可略增。无限风光在险峰。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七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

江青：

两信都收到，并收到春风杨柳。后信打退堂鼓，不妥。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可主观片面。多休息好。似不宜请长假。

一九七四年五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政策问题的通知
1974.05.18；中发〔1974〕17号

毛主席已圈阅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

中央最近根据毛主席指示，讨论了批林批孔运动的几个政策问题，通知如下：

一、几个月来的运动，冲破了种种阻力，排除了一些干扰，群众已经发动起来，正在深入发展。当前，要注意掌握党的政策，注意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利于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争取批林批孔的更大胜利，争取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新胜利。

二、在运动中，广大群众揭发批判了许多同林彪反党集团有关的人和事，这是完全必要的。继续把这方面的问题搞清楚，也是完全必要的。但是，领导上必须注意清查的范围应限制在同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问题，不要扩大化。在时间上，应当以毛主席一九七一年八、九月巡视各地打招呼为界；以听到传达中发〔1971〕57号文件为界。在这以前的事，包括犯了严重错误，只要向党讲清楚，同林彪反党集团划清了界限，就不要再算这些老账。中央重申中发〔1971〕57号文件宣布的政策：“中央对于坚决同林彪划清界限的同志，不论他过去是否受过林彪的影响，是否犯过错误，都是同样爱护而不会轻易怀疑的。”中央希望在林彪问题上犯了错误，但是已经交代了问题的同志，放下包袱，振作精神，同广大群众站在一起，投入批林批孔，将功补过。也希望那些隐瞒了某些问题的同志，把问题讲清楚。凡属好人犯错误，都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各级党组织应当为这些同志创造条件，使他们有改正错误的机会。

三、确定陆、海、空军的军（省军区、警备区、科研单位、军事院校不含，野战军含）以下领导机关和部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一律坚持正面教育。这样做，有利于集中力量把军以上单位的运动较快地搞好。请各大军区、各军兵种照此方案安排自己的工作学习，并随时总结这方面的好坏经验报告中央军委。

四、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把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深批透，把孔孟之道批深批透，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哲学、历史、教育、文学、艺术、法律等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领域，还需要我们全党作极大的努力。批林批孔运动中，涌现出了一批搞革命大批判的积极分子，应当注意培养，并且团结一切愿意批林批孔的知识分子，推动他们同广大工农兵群众结合起来，逐步地造成一支宏大的理论队伍，使全党全军能文能武。各级党委都要把这个问题当作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百年大计认真抓起来。

五、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证明了毛主席历来的估计：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是比较好的，我们的党、国家机关、人民解放军基本上是好的，是经得起风浪的。经过八年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巩固的。各级党委应当结合学习毛主席、党中央的历次指示，认真地总结自己的经验，分析形势，加强领导，争取批林批孔运动和各项工作的新胜利。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四日，江青在批林批孔座谈会上的讲话

现在的文章有个毛病，很少提现在的儒。现在批林批孔，除林（彪）、陈（伯达）外，不提现在的儒。现在有很大的儒，蒋介石就是，苏修也是，还有。不然搞这么长的批林批孔干什么？党内就有，刘、林就是最大的儒。中国长期伴随着儒法斗争，前期一定有儒，后期一定有儒，现在一定有儒。要不为什么批林批孔？

尽管有人反对，我还是坚持有现代的大儒，蒋介石、林彪就是现代的大儒。现在的批孔文章，一是不讲古代的无神论，二是不讲现代的大儒。

儒法斗争，从历史到现在都是贯穿着这个斗争，贯穿着复辟反复辟的斗争。当前，还有人搞复辟，搞复辟就把儒家抬出来。

批林批孔要深入、持久、系统、普及，必须把批林批孔放在儒法斗争中来批才能深入，只是单纯的批儒不能深入。单纯批儒，没有对立面，不能从路线高度来看，看不到路线斗争的规律。

批判儒家宣传法家不能只限在知识份子和上层，是广大群众的事，全党全民干，与工农兵结合。……要搞得通俗易懂，对当前有用的东西，使全党全国要懂得儒法斗争的现实意义。这是百年大计，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要用马列主义总结儒法斗争经验，总结对当前有用的问题和经验。古为今用，不是单纯搞历史。这是百年大计。

（二）各地区的批林批孔运动

各地的革命群众，特别是那些在九大以后受到错误打击、压制的原造反派和支持他们的革命领导干部，敏感地觉察到批林批孔运动是一次维护文化大革命成果的新的机遇。他们在各地迅速行动起来，联系本地否定文化大革命、打击革命派的实际，展开斗争。他们的革命行动，不仅得到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领导干

部的支持。中间派在批林批孔运动的革命形势下，也随声附和。而在九大以后犯有否定文化大革命、打击革命派错误的领导干部，则被迫作检讨。

可惜，这方面的材料，已经公布的为数极少。有的，也多数是革命派的个人回忆。从已有的材料来看，当时，山东、安徽、湖北、湖南、云南等地的情况，是有代表性的。

在一些地方，有人沿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经验，组织战斗队，离开工作岗位四处串连，把大字报贴到大街上，抢黑材料。有的地方，一些人甚至搞起了绝食斗争，包围银行强迫提款补发工资、奖金，打开监狱放走在押犯人，抢夺武器搞武斗。

显然，这种情况违背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

一九七四年七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要求各地：不准揪干部，不准打人抓人，擅离职守的领导和其他人员必须返回工作岗位，对把打内战、停工停产的行为说成是反潮流、不为错误战线生产的错误议论必须加以批驳，等等。

从各地的材料来看，中央的这个通知下达以后，各地的批林批孔群众运动基本上就偃旗息鼓了。

在各条战线上，批判复辟回潮，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是，没有抓住要害。

教育战线主要抓了两件事：一是继续批判上大学走后门；二是河南省马振扶公社中学的张玉勤事件。

文艺战线主要抓了三件事：一是批无标题音乐没有阶级性问题；二是批评晋剧《三上桃峰》；三是批评湘剧《园丁之歌》。

新闻战线主要抓了一件事，即批评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纪录片。

主要问题是批过了头。批评者反而遭到了批评。

还有在军事战线上抓了各大军区负责人检讨文革中的错误。

一九七四年八月，各大军区负责人被中央召至北京，检查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

王洪文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发言时别人不要插话，讲完了就完了，大家鼓掌。

这次会议涉及的重点事件是九届二中全会上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等人写信的问题。

一九七四年九月五日晚，在中央召集的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上，韩先楚检查了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路线错误。

他坚决不念别人写好的稿子。那上边写着：我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写了一封支持林彪反革命政变动员令的表态信，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我错怀疑过春桥同志，在这里我向中央检讨，向春桥同志赔礼道歉。

他的心中认为：这个“鱗鱼眼”算个什么东西？不就是历史上那种屡见不鲜的狐假虎威、弄权作奸的丑类吗？却成了“春桥同志”，还要“道歉”？

有两个人来找他谈话，他还是那话：让我检查，可以检查，我也愿意认真检查我的错误。但我不能按照会议发给的《检查提纲》检查，因为我不能瞪着眼睛胡说八道。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李先念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

李先念说：韩先楚对主席可是忠心耿耿的呀！

这次会议涉及的人物众多，级别很高，关系复杂，毛主席作了淡化处理，有关情况严格保密，流落出来的材料极少。现在知道的大概情况是：

韩先楚等人在这个会议上作了一般性的检查。

王良恩在中央办公厅的审查中，“畏罪”自杀。

李德生不久辞去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常委等职务。

周恩来自始至终没有牵扯进去。

（三）筹备四届人大

进入一九七四年下半年，毛泽东的部署发生了重大变化。总的指导思想，就是他说的这样一句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工作重点由批林批孔转入筹备四届人大。召开四届人大的关键是人事安排。重中之重是人大常委会的正副委员长和国务院的正副总理的人选安排。这是新老两股势力、左右两派争夺的焦点。

新的势力的代表是江青（表面上是王洪文）、张春桥；老的势力代表是邓小平、叶剑英。

老人们充分研究了形势，掌握了有利时机，利用新人们的缺点、弱点，制造舆论（如江青开了两个公司：钢铁公司和帽子公司；王洪文主持召开军委会议，借批林批孔煽动打倒军内一批老干部。）削弱新派的影响，争取毛泽东、特别是周恩来的支持。

新人们猛打猛冲，不注意策略，常常陷入困境。如在批林批孔中又批评走后门；在政治局会议上抓住风庆轮事件要邓小平表态。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毛泽东离开北京赴外地前，约中央政治局成员谈话，批评江青：“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也是难改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她（指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一九七四年八月十六日，周恩来约王海蓉、唐闻生谈话，了解王洪文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情况。因为有人反映：王洪文借批林批孔煽动打倒军内一批老干部。

这些说明，攻击新人的舆论起了作用。

一九七四年十月政治局会议上关于风庆轮事件的斗争，只是一个导火索，一个表面文章，实质仍然是关于四届人大的人事问题。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三日，江青致信在京的政治局成员：该报道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康生先后在江青信上批示：完全同意江青的意见，要求抓住风庆轮的问题，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对交通部事先彻底检查整顿。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四日，对江青关于风庆轮的信，邓小平圈阅了，周恩来批了已阅二字。周恩来先后同汪东兴、叶剑英谈话。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七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上，江青继续就风庆轮问题阐明自己的观点。邓小平同江青等人进行争论，拍了桌子并拂袖而去。这是老人们利用有利时机，进行的一次反击，火力侦查，看看各方面，特别是上面的反应。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七日，晚，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共同商量决定由王洪文去长沙向毛泽东汇报政治局会议情况。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八日，王洪文向毛泽东汇报说：为风庆轮的事，江青和邓小平在会上发生争吵，吵得很厉害。看来邓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邓有那样大的情绪，是与最近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周恩来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他们来往这样频繁，是和四届人大的人事有关。

毛泽东听后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回京后多找周恩来、叶剑英谈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要注意江青。

这说明，新人们是主张进行回击的。但毛泽东不支持他们。（一九七〇年九月庐山会议，江青领着张春桥、姚文元告林彪，毛泽东支持了他们。）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九日，毛泽东与王海蓉、唐闻生谈话，他说：风庆轮事件并不像江青他们所说那样，而是他们预先计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好久了。还要继续做些工作，慢慢解决问题。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毛泽东与王海蓉、唐闻生谈话，毛泽东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且李先念已在解决，但江青还这么闹。

毛泽东要她们回京后向周恩来、王洪文转告他的意见：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办理。毛泽东建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毛泽东要她们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毛泽东在江青信上的批示：已阅。务望谨慎小心。注意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把这个批示与七月十七日、十月十九日对江青的批评，联系起来，才能正确了解毛泽东对江青的真实态度。

毛泽东的这一步棋，一是表示对周恩来的信任和尊重；二是表示对邓小平的进一步支持；三是表示不要江青参与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江青参与了，不管怎么说她不代表我，别人总会以为是多半代表了毛泽东的意见。）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在支一派（老人）、压一派（新人）。实质上，其中还包含有深意。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毛在江青的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

贵有自知之明。又及。”毛泽东对江青提出的这“三不”，不就是要江青韬光养晦吗？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九日，江青给毛泽东写信说：自九大以后，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这说明江青一点也不理解毛泽东的苦心。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说：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之后，江青托人向毛泽东提出：由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毛泽东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江青提出由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建议，这应该也算是正常的。当时不正在酝酿人事安排吗？江青作为一个政治局委员，她也有权力提出自己的建议。但是，反对江青的人一定会拿这件事大做文章。干脆，毛泽东自己先把那些人要说的话说出来，这样，就堵住了那些人的嘴。

从最后定的名单来看：

最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

邓小任中央副主席兼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军委总参谋长、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这样邓小平就与王洪文处于同等位置了。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张春桥。

张春桥原本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

现在又是国务院副总理，仅仅排在邓小平之后。

毛泽东又提议他担任军委总政治部主任。

这样，张春桥在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有了两个重要职位。邓小平是第一副总理，张春桥则排在第二；邓小平是总参谋长，张春桥则是总政治部主任。一右一左也可以说旗鼓相当了。

再值得注意的江青。

她在这次人大和国务院的人事安排中没有获得任何职位，但是她获得了毛泽东的全面评价。

毛泽东说：对江青当然要一分为二，她在批刘批林问题上是对的，说总理的错误是第十一次路线错误就不对了。

这里，在不经意间，毛泽东对江青作出了全面评价：对江青要一分为二，她在批刘、批林以及批周问题上都是对的，她的缺点是开了两个公司（钢铁公司和帽子公司），搞了一个小圈子（四人帮），说错了一句话（周恩来的错误是第十一次路线错误）。

2012 年 8 月 17 日初稿

本篇全文约 73 万字

第一章 认真搞好斗、批、改

第一节 九大以后的新形势新任务

壹、本节概述

一九六九年四月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也就是以“斗、批、改”为主要内容的阶段。

一九六九年六月九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高举“九大”的团结旗帜，争取更大的胜利》。

社论指出：“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具体地说，就是要巩固和发展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把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革命进行到底。把斗、批、改各个阶段的任务在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单位落实。

怎样搞好团结？社论指出：我们的团结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泛的革命大团结，是在毛泽东思想原则指导下的革命大团结。

具体地说，这就是：

1，从阶级路线来说，就是工人阶级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加强自己队伍的团结，巩固地团结同盟军，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2，从政治路线来说，就是对后跟上的同志要热情欢迎。有的同志在运动初期一度站错了队，改了就好。不承认人家的进步，把犯过错误又已改正的人还总叫“老保”，是完全不对的。有些最早造走资派的反的人，在革命运动的曲折过程中，也会犯某些错误，也要认真改正。那种“唯我独革”，“唯我独左”的思想是错误的。

3，从领导班子来说，首先是要加强领导核心的团结，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体领导。要巩固革命的三结合。对已经解放了的干部，要大胆使用，不要一犯错误就算老账，重新打倒。对革命群众组织要“一碗水端平”，不要亲一派，疏一派，你支一派，他支一派。

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

毛主席批示：照办

文件指出，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宣传毛主席形像、宣传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上，有些时候，在一些地方，出现了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追求形式和浮夸浪费的问题。为此，特提出如下改进意见：一、各级领导要积极引导群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搞好思想革命化，不要追求形式，要讲究实效。二、重申中央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今后，塑造毛主席像，必须严格按此指示执行。三、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四、各报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五、各种物品及包装等，一律不要印毛主席像；引用毛主席语录也要得当；禁止在瓷器上印制毛主席像。六、“忠”字是有阶级内容的，不要乱贴滥用；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修建封建式的建筑，如有，应作适当处理。七、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活动。

一九六九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中国共产党万岁——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四十八周年》

社论指出：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了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委员会，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唯一的领导中心。全党必须服从统一的纪律。全党必须服从中央。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权力机关，人民解放军，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及其他革命群众组织，都必须接受党的领导，都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这个问题上，要警惕阶级敌人的破坏，要继续批判反动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任何个人，任何组织都要注意，绝不能把自己和党的关系摆错了。

社论指出：整党建党，首先是思想上的整顿和建设。我们要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思想，彻底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批判他的黑《修养》，批

判他的黑“六论”即“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进一步肃清其余毒。

社论指出：对那种不搞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大团结、热衷于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人，对那种居功自傲，停滞不前，图享受，争地位的人，对那种沾染了无政府主义思潮和极端民主化而还不愿改正的人，对那种玩两面派、搞“小动作”而不去认真、刻苦学习和实践毛泽东思想的人，我们要向他们问一声：同志，你是继续革命，还是革命到头了呢？

社论指出：组织整顿的工作一定要做，也一定要采取谨慎的方法。对证据确凿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蜕化变质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应当清出除党，并不准重新入党。对犯了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应该根据毛主席的一贯教导，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多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同时，要认真地把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经过考验的真正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吸收入党，增加党的新鲜血液。

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新华社驻清华大学联合报道《工人阶级向上层建筑领域进军的一周年 欢呼我国第一支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一周年》

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二日，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全军组织性纪律性的指示

指示指出，目前全军形势大好，但“有少数单位、少数人员，甚至个别中高级干部，仍然严重地存在着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派性和无组织无纪律现象”。为此，提出如下要求：一、全军必须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决反对“多中心即无中心论”，反对破坏集中统一、破坏组织纪律、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行为。二、要在全军普遍进行组织纪律和法纪教育，提高全体人员纪律的重要意义认识，澄清各种错误思想和糊涂观念。三、对个别严重违法乱纪、屡教不改的人，必须给以必要的纪律制裁。四、各级干部特别是中高级干部，要加强领导，带头遵守纪律，维护纪律。认真贯彻严格管理与耐心说服相结合的原则。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五、要把加强组织纪律性问题，作为部队革命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经常抓紧，反复落实。

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抓紧革命大批判》

社论指出：“大批判搞得差不多了。”这种看法对吗？不对。

社论指出：革命大批判的锋芒应当指向那里？

第一，要进一步批判修正主义。

第二，要批判党内、革命队伍内部违反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的各种错误倾向和错误思想，加强无产阶级党性，肃清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继续促进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基础的革命大团结。

第三，要批判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倾向。

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八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

为了保卫祖国，保卫边疆，保卫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随时准备粉碎美帝、苏修的武装挑衅，防止它们的突然袭击，党中央命令你们：

一、坚决响应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的伟大号召，高度地树立敌情观念，克服和平麻痹和轻敌思想，充份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加强军民联防，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

二、大敌当前，全体军民要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共同对敌。加强军队内部的团结，加强军民、军政的团结，加强各族革命人民的团结。巩固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坚决反对一切分裂活动，反对一切破坏团结的行为，反对资产阶级派性。

对挑拨和破坏军民团结、民族团结的阶级敌人，必须坚决打击，为首的要依法惩办。

三、驻边疆部队指战员必须坚守战斗岗位，坚决执行命令，服从指挥，严守纪律，做好一切战斗准备，密切注视敌人动向，作到一声令下，立即行动。

军队人员“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不准擅离职守，不准外出串连。经教育不改者，一律严加惩处。

四、一切革命群众组织，必须坚决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实行按系统、按行业、按部门、按单位的革命大联合。所有跨行业的群众组织，要立即解散。任何另立山头，重拉队伍，都是非法的，要强令解散。

五、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七·二三”布告，立即无条件停止派性武斗，解散各种专业武斗队，撤除一切武斗据点，上交一切武器。

凡武斗队强占据点，负隅顽抗者，人民解放军要实行军事包围，发动政治攻势，强制缴械。

六、绝对不准任何人冲击人民解放军，不准抢夺军队的武器、装备和车辆，不准妨碍军队的战备行动，不准泄露和盗窃军事情报。如有违反，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坚决保护军事要地和战备设施，严守国防机密，支援人民解放军搞好战备。

七、要保护交通运输，保证通讯联络畅通。凡破坏铁路、公路、水路运输，破坏通讯联络，切断电线，都是反革命行为，必须追查惩办。

八、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大力支援前线。遵守劳动纪律，坚守生产岗位，努力搞好工、农业生产。

一切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的人，必须立即返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如有不按期返回的，工人、职员停发工资，农民停记工分。并视情节给予纪律处分，直至开除。对煽动威胁职工或农民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的坏人，必须依法惩办。

九、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对那些里通外国、策划外逃、破坏社会治安、抢劫国家财产、破坏生产、杀人放火放毒、利用宗教迷信制造叛乱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对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必须由革命群众严加管制，劳动改造。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日，中央首长对各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成员的讲话

周恩来同志讲话：

“九大”我们选出了新的党中央，我们要拥护新的党中央，拥护党的领导。我们新的权力机构，有缺点，或者代表性不够，自己参加这个机构，自己有资产阶级派性，想把它搞掉，这不符合无产阶级民主集中制。我们有新的党中央，有

问题就通过领导解决嘛！我们过去说过，新的权力机构，是经过广大群众斗争得来的，如果有缺点只能补台，不能拆台，有的可以改组，但不能推翻，朝三暮四，一派代表一派，好象一九五七年批判的资产阶级反革命集团“章罗联盟”，要“轮流坐庄”，那怎么能行啦。各种观点不同，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我们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做标准，走社会主义道路，就会把我们的观点，经过辩论，统一起来，大的的统一了，小的是必要的，可以保留嘛！就会达到毛主席所说的五个统一嘛！你不这样，新的权力机构，稍微不合适就认为是走资派，把它推翻，那就成走马灯似的了，这是发展派性，发展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个人主义，我们是不允许的。

有些地方的问题是自己造成的，如山东的“反复旧”，贵州一派压一派，都是上面自己挑起的，是错误的。就是这样，还是完善它，不能推翻另来。

现在红色政权建立了，更不应该筑工事，搞武斗，打解放军，对解放军抢枪，殴打战士，这不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小将分不清是非的时候了，那时走资派掌权，打起来就分不清；现在很清楚了，现在不允许，再这样做是反革命行为，要由解放军做政治动员，坚持不改的总是少数。山西、新疆都是证明，广大群众是不高兴这样搞的，搞武斗被解放军包围后，结果只有坏头头负隅顽抗，广大人民群众是受蒙蔽的，经过宣传“七·二三”布告、“八·二八”命令都纷纷离开武斗地点，上交了武器。

清华大学武斗的时候，许多学生和教职员工都成了逍遥派，不参加，广大城市居民、革命群众最厌恶武斗，舆论不断，广大群众是不赞成武斗的，真正搞武斗的就那几百人，大学的负责人没有办法说服了，北京市革委也劝不下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派革命工人、解放军组成的工宣队、军宣队进入清华大学，很快就解决了问题，武斗停了下来，付出了代价，死了五人，伤了几百人。

某某、某某地区一小撮坏头头煽动一部分人夺取武器向某某跑，一宣传坏头头孤立了，坏头头被人民解放军抓住了××个人，×个跑散了，以后又抓住了。

如山东问题，青岛单独办学习班也好，把青岛问题解决好。徐海班回去后形势发展很好，连云港还有点尾巴，单独解决一下。山西机关和各地区分开搞，一个一个搞。内蒙古和东北也是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搞。

“八·二八”命令，要求边疆一切为了战争，“八·二八”命令有很多特点，是为了巩固边疆的，象新疆的形势，西藏的形势，内蒙的形势要改变，我们已经在改变中，在东北好一些。我们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沿海有山东、辽宁、河北、天津、连云港、江苏、浙江、广东、广西、云南也是边疆。“八·二八”命令不仅是对边疆的，对全国都适用。

“九大”以后，我们把各省靠边站的干部，没有最后定性的，也让他到工厂学习，也有好处。许多干部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是受了上级的影响，譬如在新疆，王恩茂要负责嘛！下面认为他对，跟着犯了错误，就允许改正，经过批判，到群众中去锻炼，给他信任，在对敌斗争中，到群众中去考验嘛！这个地方工作不行，换一个地方工作。要给出路。

新疆，还有西藏，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原来就在一起，分工不同，犯了错误，要给个改正的机会，首先他自己端正了立场，回到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组织上才有可能给出路。内蒙、贵州也有这种情况。

一九六九年九月三日，中共中央关于报纸、电台上的打仗宣传的通知

通知指出：“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八日中央发布命令之后，在地方报纸和广播电台上，出现了公开号召‘要准备打仗’、‘一切为了打仗’的宣传，这是不恰当的。”“望你们立即停止所属的报纸、电台关于这类口号的宣传。”

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增补、调动、撤换各级革命委员会成员的通知

《通知》规定：一、各级革命委员会需要增补委员、常委和副主任时，要注意增补革命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代表，要着重增补优秀的产业工人代表。二、革命委员会中，有调往他处的或红卫兵从学校毕业后下放劳动的，都不要忙于免除他们的职务；对犯有某些错误的革命委员会成员，应按照“团结-批评、自我批评-团结”的原则进行帮助教育，不要轻易进行组织处理；对于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革命委员会成员的处理，应报请中央或上级革命委员会批准；对于十分急需调动、撤销的革命委员会中的委员、常委、副主任、主任，要在群众民主协商的基础上再上报中央或上级革命委员会，批准后施行。

一九六九年十月一日，林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讲话指出：

现在，我们要继续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全面落实“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落实毛主席提出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进一步搞好思想革命化。要抓紧革命大批判，认真搞好斗、批、改，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掀起革命和生产的新高潮。

在国家与国家之间，我国历来坚持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我们的立场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全国人民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随时准备歼灭一切敢于来犯的敌人。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我们警告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英雄的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不可战胜的。如果你们硬要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我们就坚决奉陪到底！我国辽阔的土地，到处都将是你们的坟墓！

一九六九年十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

社论指出：

二十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就是领导权的问题，就是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或修正主义者手里的问题。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我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保证。

为了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认真注意进一步巩固和完善三结合的各级革命委员会。

为了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在斗、批、改的工作中，必须进一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抓紧革命大批判，把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专政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实现的。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群众都要紧紧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周围，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当前，走投无路的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为了摆脱国内国外的困境，正在加紧互相勾结，妄图策划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甚至放出种种空气，对我国进行核讹诈。老实告诉你们：你们的那一套，我们早已看穿了，没有什么了不起。你们妄想煽动反革命残余势力复辟资本主义，妄想刘少奇一伙反革命分子再上台，这是白日做梦，头脑发昏。你们妄想在我国边疆地区组织叛乱，只不过使我国各族革命人民可以进一步擦亮眼睛，肃清特务，彻底消灭叛匪。你们妄图发动武装侵略，就是自投于伟大的、正义的、反侵略的人民战争的天罗地网之中。你们搞的核讹诈，丝毫吓不倒顶天立地的中国人民，只不过吓坏了你们自己那已经相当衰弱的神经，激起你们国内人民和全世界人民起来声讨和反对你们，把你们烧焚在革命人民的怒火之中。你们的一切倒行逆施，即便全部使出来，也只不过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大大加速自己的灭亡，决无第二条出路。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关于紧急疏散在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通知
根据 10 月中旬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为了防范苏联利用谈判之机进行军事袭击，立即开始加强战备。当晚的通知要求：10 月 20 日以前，在京的老同志全部战备疏散。

此前，毛泽东已前往武汉；林彪已在苏州。

此后，朱德、董必武、叶剑英等人前往广东，陈云、王震等人前往江西，聂荣臻、陈毅等人前往河北，徐向前等人前往河南。

同时，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张闻天也分别被疏散到河南、江西、安徽、广东等地。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中央首长对各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成员的讲话

周总理讲话

现在离开过“九大”已经半年了，不能继续过去的形势，而是面临新的形势。“九大”的胜利，全世界革命人民向往中国，向往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把我国修正主义的根子挖掉了，防止了资本主义复辟。给全世界革命人民、给社会主义国家作出了一个范例。社会主义国家的群众要反修正主义，首先要反自己队伍中的修正主义。不但要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中国也要警惕。经过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醒，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央发了通知，开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挖出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一小撮人，地方上也有一些。但不能说太平无事了，他们一有机会就要动。

我们任何一个政策，都要认真用毛泽东思想衡量。你们再学习，再总结经验，看看过去，想到未来。

如内蒙犯了些扩大化的错误，但纠正扩大化，要防止另一种形势，防止对苏修、蒙修挑衅不管，对坏人不管，如果一味纠正扩大化，不注意这些，“左”的倾向就要走到右的方面去了，以错纠错就不好了。

同样，山东过去犯了“反复旧”的错误，应该纠正。但更重要的问题是把各级革委会真正巩固起来，领导广大群众，搞好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一派掌权的如何补台，而不是重新搞两派斗争，这样就不对了。

再如，贵州是犯了错误，但不能否定贵州夺权的成绩，总是把李井泉、贾启允打倒了嘛。他们后来所以犯错误，是因为不承认有对立面。贵州是大三线，更应该搞好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

四川、云南、广西、湖南也应该做好，把三结合、大联合搞好。那一派有坏人，你这一派也有坏人，要把两派绝大多数革命群众联合起来，消除资产阶级派性，实行真正的革命大联合、三结合。

如果我们不看到这个形势，停顿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凡是对自己不满意的，都看成是走资派、资反路线，那怎么行啊！山东不是犯了“反复旧”的错误吗？还有武汉也犯了。老造反派不能批评吗？好象错了也不要紧，如果错了也不能批评，还有比老革命、老红军老的吗？为什么现在老造反派批评不得？这也是一种迷信，这种迷信没有好处，阻止我们前进。

现在美帝、苏修两个头子正在争夺，他们可能自己打，也可以打革命的人民，他们的主要对象就是对中国。全世界人民向往中国，我们必须按毛泽东思想要有两手准备，我们要继续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国家建得更加强大，使帝国主义不敢冒险。但同时又要有备无患，从坏的方面想一想。中苏边界问题，从三月以来，苏修仍在不断挑衅，现在虽然达成一个协议，十月二十日在北京谈判，还有三天了。但拿我们的历史经验想一想，上一次，一九六四年赫鲁晓夫同我们谈了半年，没有谈成，破裂了，边界冲突更加厉害。这一次也可能象上一次一样，也可能比上一次更加厉害，出乱子更大一些。来谈判找借口，搞突然袭击。我们要这样设想，要从坏的方面做准备，我们全国人民要认真进行战备动员。

陈伯达同志讲话

你们学习得很好，成绩很大。举个例子，韩金海是山工总头头，一来就帮助他，那时很困难。对韩金海我有点粗暴，在人民大会堂点了你的名，我是讲韩金海，另外我讲贵州工代会叫知识分子篡夺了，搞工联主义，实际上讲的是贵州的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知道我讲的是他。对韩金海刺激了一下，也有好处。据说韩金海检查了十几个小时，两派群众都赞成这就很好嘛。但我还有一点担心，担心理论和实践到底能不能一致？象青岛的杨葆华，过去在北京解决山东问题时，杨葆华检查得比较好，把他的检讨在学习班大会上发了。但是，杨葆华回去后，据说没有完全贯彻那一次的精神。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五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注意工作方法》

当前，我们要注意些什么工作方法呢？

- 一、抓好带头人的思想工作。
- 二、抓点。
- 三、抓三分之一。
- 四、要考虑到全局。
- 五、要考虑到群众。
- 六、领导和群众直接见面。
- 七、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 八、开讲用会。

九、少而精。

十、留有余地。

十一、劳逸结合。

十二、讲究实效。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在组织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伟大实践中，各地创造了许多好的形式。

举例如下：

各种类型的“五·七”干校。

插队落户。有的还把干部和教师、医务人员、知识青年等等组织起来集体插队。

领导机关实行“三三制”，三分之一的人下放劳动，三分之一的人下去作调查研究，三分之一的人搞日常工作，定期轮换。

有的实行“两班轮换制”，一部分人下去劳动，一部分人主持日常工作。有的实行半日劳动制。有的由革委会领导干部带领工作人员分批到生产队当社员，到车间当工人。

工厂车间、农村生产队的基层干部，实行跟班劳动，不脱离生产。

参加革委会的群众代表回本单位参加劳动，不脱离生产，这是很重要的，也是一种形式。

干部参加劳动，是毛主席培育的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毛主席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提出的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措施。为什么有些干部会犯走资派错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长期脱离劳动，从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经不起资产阶级种种糖衣炮弹的腐蚀，跌进了修正主义的泥坑。这个历史教训，是一切新老干部，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内都要永远记取的。从革命委员会诞生的时候起，毛主席就反复强调干部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既当‘官’，又当老百姓”。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革命青年的榜样》

金训华同志是上海市吴淞第二中学一九六八届高中毕业生，出身于工人家庭，原上海市中学红代会常委。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投入了摧毁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激烈战斗。今年五月间，他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带头到黑龙江省逊克县逊河公社双河大队插队落户。今年八月十五日，双河两岸山洪倾泻，金训华为了抢救国家物资，奋战山洪，不幸光荣牺牲。根据金训华同志生前的多次申请，有关党组织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关于对内蒙古自治区实行全面军管的决定
1969. 12. 19; 中发 [69] 85 号

1969 年 12 月 16 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关于对内蒙古自治区实行全面军管的决定（草案）的修改稿中提出：由于目前内蒙古地区的工作不能适应形势需要，领导之间思想不统一，决定成立“北京军区前线指挥所”党的领导小组，实行对内蒙古的一元化领导。

12 月 19 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 85 号文件，决定由北京军区对内蒙古自治区实行分区全面军管，由北京军区前线指挥所对内蒙古各项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核心小组和内蒙古军区协助前线指挥所工作。“

北京军区前线指挥所”党的领导小组最后以郑维山（北京军区司令）、杜文达（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黄振棠（北京军区副政委）、张正光四人组成，郑维山为书记，杜文达、黄振棠为副书记。

贰、本节简论

根据上述一系列文件，可以看出：九大以后，主要任务就是继续搞好斗、批、改；加强战备，准备打仗；在抓好革命的前提下，努力促进生产。

2009 年 5 月 11 日初稿

2011 年 12 月 21 日修改

第一章第二节 解决一些省的遗留问题

壹、本节概述

九大以后，有几个省，主要是山东、湖北、四川、贵州等省前一阶段遗留的问题，特别是“反复旧”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中央采取措施抓紧解决这几个省的问题。

一、山东省

一九六九年五月四日至二十八日，参加九大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和济南部队的 27 人在北京集中学习，讨论解决山东问题。毛泽东、周恩来等先后 7 次就山东问题及王效禹的错误作出指示。

一九六九年五月廿四日，王效禹、杨得志、袁升平三同志给中央的报告

由于省革委主要负责人的错误思想指导，在前进的道路上，也出现了一些严重问题，特别从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以来，暴露的更加突出，一种不相信不依靠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怀疑一切的错误思想进一步发展起来，在全省错误地发动了“反复旧”运动，实质上是干扰清理阶级队伍，把矛头指向了解放军，指向了革委会，指向了革命干部，指向了广大群众，破坏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背离了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带方向性的错误。这一错误，不仅对山东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很大损失，而且波及到一些兄弟省，直接影响了“九大”精神的贯彻，后果是不好的。必须认真加以纠正，接受这一经验教训。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央对王效禹、杨得志、袁升平三同志的报告的批示

1969. 05. 25；中发[1969]26 号

毛主席指示：照办。

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济南军区党委：

中央同意王效禹、杨得志、袁升平三同志给中央的报告。

山东省自成立革委会以来，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持下，在广大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努力奋斗下，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在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后，由于个别领导同志违背了十二中全会的精神，在全省进行所谓“反复旧”运动，犯了严重的错误。这种错误是带方向性的，但还是前进中的错误。

中央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根据“九大”精神，既要彻底纠正错误，又要照顾大局，努力稳定山东局势，加强领导之间、军政之间、军民之间、群众之间的团结，共同对敌，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总结经验，落实政策，搞好斗、批、改，准备打仗，抓革命，促生产，夺取各条战线上的更大胜利。

中共中央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经中央批准，充实了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建立了王效禹、杨得志、袁升平、李水清、李耀文、穆林、赵修德等 7 人组成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作为山东省的最高领导机构。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中央首长接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徐海班时的讲话
张铨秀同志的讲话

徐海地区文化大革命，搞成这个样子是我在“三支、两军”工作中，由于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很不理解，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没有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长期陷于资产阶级派性，支左态度不端正，犯了支一派压一派的严重错误，犯了三个过。一上阵就没有很好的遵照毛主席关于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的指示支左，因此介入文化大革命不久，就错误地取缔了一些革命群众组织，压制了一部分革命群众。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成立革委会后，由于对革委会等认识的分歧，徐州市形成了踢、支两派，我们又没有正确对待，而倾向了支派，打跑了踢派；七月以后又在检查纠正前段错误中，又倒向踢派一边，打跑了支派。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三大区的重要指示发表后，我们军的领导没有认真学习贯彻，对照检查，而继续坚持错误。去年七月，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中央文革特许我们来到毛主席身边办学习班，

十个月来，中央首长多次耐心帮助教育等待我们，特别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操劳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百忙之中，给我们很多极为重要的指示。所有这些，本来是我们统一思想，改正错误的最好机会，但由于我们领导上资产阶级派性作怪，存有打官司，争输赢思想情绪，所以在今年一月十一日总理接见军队干部前很长一段时间觉悟很慢，支左态度没有端正，部队思想没有统一，致使中央解决徐海地区问题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指示没有能够很好的落实，还曾发生过一些错误。我们对军队领导不够信任，不够尊重，一段时间请示报告不够，有些指示没有认真执行，还曾出现一些公开“打倒王效禹”同志的错误口号，所有这些，都是很错误的。我再诚恳地向中央首长作检查，请首长给与批评。由于我们的错误，直接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给徐海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严重损失。铁路交通一再中断，煤炭生产长期上不去，影响了生产，影响了战备，使徐海地区的革命和生产都处于落后状态，成了全国一个“老大难”单位。我们这些错误不但造成革命群众组织之间长期对立，部队之间思想不统一，影响“三支，两军”工作，也影响了部队建设，特别是群众组织的联合，问题在我们军的领导，责任主要在我，不怪济南军区领导，不怪兄弟部队，也不怪我们部队的广大干部、战士，更不怪广大的革命群众。

现在新沂、睢宁、东海、邳县，在中央首长接见后，很快要回去成立革命委员会。徐州地专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接见后，步子迈得很大，决心最近几天把徐州地区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我们希望其他县、市都要向他们学习，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认真学习“九大”文献，联合起来，团结起来，争取胜利。徐州市要按照总理改组革委会指示的原则，很快把革命委员会问题解决好，最近有些地方形势很不好，抢枪、搞武斗，我们希望各市、县革命群众组织，把抢夺部队的武器装备，迅速集中封存，立即无条件交还部队，其他武斗凶器也必须上交，在采取紧急措施，坚决停止武斗。

王效禹同志的讲话

刚才张铨秀同志讲了一些错误，这些错误，首先由我负责，是我犯错误造成的。我在处理徐海地区的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给徐海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带来了很大的损失，使两派革命群众组织直到现在还没有联合好。也给部队的工作造成很大的困难，我的错误就是支了一派，压了一派，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问题

的严重性在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了大江南北对文化大革命作了重要指示之后，仍然错误的支持一派。

杨得志同志讲话

由于我们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不高，对毛主席革命路线不理解，对徐海地区部队“三支、两军”工作的领导上，在对待群众的态度上，犯了很多错误，给徐海地区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很大损失，以至中央直接出面解决问题。我们感到非常惭愧，非常痛心。检查起来，我们在运动初期，解散了“红总”总部，在部队的两个学校，一个医院中抓了二十六个人，打击、压制了群众的革命运动。以后对待踢派和支派这两个革命群众组织，又没有掌握端平的原则，特别在毛主席视察六省市发表最新指示以后，批准了对连云港问题的七条错误的决定，错误就更严重了。

我们六·六三部队在“三支”、“两军”第一线，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在工作中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和错误。这与军区工作没做好有些问题处理不当，有直接关系，我们应该负主要责任。

杨葆华同志的讲话

徐海地区两个革命群众组织长期对立，“内战”不休。主要责任是我们山东插手徐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违背了干扰了毛主席一系列关于大联合的指示贯彻执行，犯有支一派，压一派的严重错误。招致了两大派革命群众组织长期不能联合的分裂局面。因此使徐海的革命和生产，尤其是交通运输以至影响全国一些城乡的革命和生产，都受到严重损失，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教训是惨痛的，在此，我受山东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委托，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做深刻检查，向徐海班全体同志并通过你们向徐海地区解放军同志们、两派广大革命群众作深刻检查，并坚决表示：保证我们山东再不插手徐海地区文化大革命，同样要求你们这样做，从此一刀两断。保证一定按毛主席指示办事，坚持支派和踢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观点，支持你们两个革命群众组织，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搞好革命的三结合。

我在 1968 年 11 月 17 日“青岛市各级革命委员会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发动了全市所谓“反复旧运动”，是犯了严重政治错误的。

当时全国军民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主席极为重要讲话鼓舞指引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在各条战线上展开了。轰轰烈烈地扎扎实实地斗批改运动，革命、生产出现一片日新月异蓬勃向前发展的大好景象。我市同全国一样形势大好。但在此时刻，我却抛出了这篇错误讲话，发动了所谓“反复旧”运动，背离了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精神，迎合了社会上有一股对抗清理阶级队伍的反动思潮，在一段时间，背离了大方向，破坏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使斗批改运动受到极大干扰，破坏了革命三结合和革命大联合矛头指向了伟大的解放军，破坏了军民，军政关系，使山东青岛以及其他一些省、市、地区的革命队伍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使无政府主义思潮，对抗清理阶级队伍思潮大为泛滥起来，把运动引向邪路，严重地干扰了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

黄永胜同志讲话

徐海班，是在中央办的各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时间最长的一个学习班。当然，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领导小组，特别是我，对徐海班的工作做的不够，负有很大责任。我们除了同六十八军的同志有些接触，做了一些工作之外，对两派群众组织的同志，直接接触的不多。但我们从间接接触中，我们感到徐海班问题比较多，情况也比较复杂，我们也感到工作难做。

你们两派革命群众组织直到现在还没有联合起来，还在抢枪，还在搞武斗，还在争资产阶级派性的权。你们完全不顾大局，干了不少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你们长期打内战，阶级敌人在那里坐山观虎斗，混水摸鱼。

首先你们对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审定批准的学习班八条注意事项，你们学习班有些同志是置若网闻。你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冲、打、跑、大搞资产阶级派性活动。学习班开学以来，你们徐州两派先后跑回去两百多人次。仅踢派就跑回去一百六十多人次。有的人先后跑回去了八次。连云港“反到底”跑走了四十五人。他这个连云港“反到底”代表团，在头头王长发的带领下，跑回连云港达半年之久，经中央多次督促，至今不回来。特别是在“九大”闭幕以后，中央正在处理徐海地区的问题，你们在学习班又刮起了一股叫做“逃跑风”也好，叫做“逃走风”也好，反正刮起一股往回跑的风喽。踢派头头徐锋带头跑，跑了六十八人。支派的孟宪臣带头跑，跑了三十人。徐锋在学习班先后跑回去四次。五月十九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接见徐海班全体学员后，广大

群众都欢欣鼓舞，正当热烈庆祝这一亲切接见的时候，你踢派的什么陆继坤，这个同志现在在不在我们不知道，就不参加庆祝会，跑到前门外去喝酒，搞非法串联，最后也跑了。

徐海地区抢枪武斗的歪风一直没有停止。特别严重的是大规模地抢枪、武斗都发生在关键的时刻。比如去年十一月，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你们大抢枪。有的头头带头抢，中央下命令要把武器交上来，你们迟迟不交，交又不彻底。这次“九大”以后，连云港两派都大抢枪，甚至于把戒备仓库的枪你们都抢了，四月二十九日，也是我们九届一中全会刚刚闭幕，二十八日闭幕，二十九日，徐州两派发生大规模武斗。

你们踢派的头头顾炳华、栾昌善却公开散布说：“对解放军相信是前提，警惕是关键，斗争是根本”。你们究竟还是相信还是不相信解放军？你们却把矛头指向六十八军，胡说张铨秀就是徐州的“新沙皇”。你们歪曲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派派出所谓“工人宣传队”，进驻已经实行军管的徐州报社、电台、夺军管的权。连云港“反到底”甚至派“工人宣传队”进驻解放军“三支”、“两军”办公室，不让解放军支左。去年十一月十九日，张铨秀同志传达了康生同志提出来的叫你们《徐州工人报》不要登“擒鬼录”的那些反动的东西，要你们停刊。但是你们不听，拒不执行，而且以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发了一个关于帮助群众组织更好地办好报纸、广播的决定。《徐州工人报》、《红色火车头报》、《徐州红卫兵报》还分别地发表“战斗书”。“战斗书”里头说：市革命委员会的决定，给了一小撮穷途末日的阶级敌人毁灭性的打击。你们这个矛头究竟指向谁？这个“穷途末日”是在骂谁？

在去年九月下旬，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教育下，两派达成了大联合的协议。但是，到了十一月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以后，你们中间有些人借口“反二月逆流”，在徐州大搞什么“反复旧”、“反复辟”，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指向军队，使徐海班出现的大联合形势又遭到破坏。今年二月，在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帮助下，徐州两大派大联合气氛又比较好。并且达成上交武器，停止武斗三条协议。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回徐工作团”，返徐落实协议。但是你们有些人却极力抵制“回徐工作团”的工作。并诬蔑“回徐工作团”向群众的汇报提纲是彭真在徐州的二月提纲。今年三月，新沂等四伙

在北京达成了三结合的协议，等中央首长接见后就回县建立革命委员会，但是你们中间有些人大肆破坏，胡说“各县搞大联合，三结合是为了孤立徐州，办不到。”你们在干于县召开两市七县踢派的串联会，反对各县两派在北京达成的革命大联合、三结合协议，胡说在北京的代表“右了”，“修了”，五月中旬，钢山县踢派又借口什么“抓革命，促生产”，要搞八县的串联会，在地方机关开了一千多人的大会，说在学习班达成的协议吹了。还造谣说毛主席根本不可能接见徐海班。

目前徐海班、徐州两派还在革命委员会的问题上争核心，争资产阶级派性的权。中央明确地指示，徐州革命委员会要以现有革委会为基础，按着平等的原则，充分协商，进行改组。你们各取所需，歪曲中央的精神，支派抓“改组”，踢派抓“承认”。你们这样完全是采取各取所需的态度，而有些东西完全和中央唱对台戏。踢派在那里强调“一切权力归革命委员会”。双方争执不下，互相扯皮。

周恩来同志讲话

徐州的运动过程：

首先，一九六七年一月革命风暴以后，徐州的革命群众起来响应，夺走资派的权，三月十八日成立革命委员会。开始还不是有两派的造反派都在一起嘛。山东的就是济南军区的批准了你们，南京军区也批准了，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后来因为你们自己闹分裂，一部分人被排斥在外，变成踢派了。这就形成三月十八日的革命委员会不完全了。

到了一九六七年七月，王效禹同志到你们徐州市，他那时候还是对的呀，说你们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要你们联合起来。你们不听。

到了八月卅一日，踢派又把支派赶走。这个时候，王效禹同志犯了这个错误。六十八军也犯了这个错误。八月卅一日那次武斗是错误的。

后来，有那么一小股采取了土匪的行动，来破坏铁路，断路，断桥，把铁路桥都破坏。那个时候中央采取了断然措施。变成了六十八军，还有安徽的部队，合起来在一九六八年，大概是一、二月份的时候吧，只给那一小股一点打击，捉了一点人。那个时候的名字也叫“淮海八·三一”。因为他“八·三一”被赶出来，他就用了这个名字。但是，实际上并不是所有“八·三一”都参加了。不能把那一小股破坏铁路、抢劫车辆、抢劫物资，算在大家头上。

后来的踢派就单独地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喽，这就是一九六八年三月一日。那个时候就得到济南这方面批准了，南京就没有批准了，这就是第二个革命委员会了。

那支派就更不服了，几次斗争，更影响军队，那么这里又搞了差不多半年，然后才劝支派回来，但是始终搞不起来。

一直到这一次“九大”以后，还发生这次错觉，错误地估计形势。

“九大”刚开过了以后，从四月廿六日起，就有这么一股歪风，说是“九大”开了以后，各省都要回去较量一番。因此，两派的头头都整理行装，不告而走。逃的逃，跑的跑。这次请王效禹同志、杨得志同志、张铨秀同志给跑回去的同志打电报，有一部分回来了，还有一部分说这次电报等级太差了，不来。要中央直接发电报。

你们现在看，王效禹同志检讨了嘛，支持一派不对嘛，杨葆华同志说得很沉痛，而且很诚恳，“反复旧”是错了的，他要把这个版权收回。他承认了错误，要拿他那篇文章做反面教材。

张铨秀有错误，他比较偏“支派”的，虽然后来也参加了“八·三一”的那个镇压，但是他还是有偏向的，但是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他就检讨了嘛，多次检讨嘛。对军队来说，军队也是分成两派。调到北京来学习，我们伟大领袖委托军委办事组黄永胜总参谋长为首的召集他们开过多次会，批评他，他们已承认错误。但到了学习班还有一部分人不通，但张铨秀同志开始通了，通了也不行呀！

张铨秀带着郑统一两人一道回去，踢派还是要打倒，管你通不通。你反正张、郑两位统统打倒。那你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吗？怎么法子能团结合作呀！就象着了魔似的。这是这方面。但是另一面，如果支派比较能够早一点回到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你动手我不动手，就是吃点亏，我还是坚持原则，那也可以不致于两派闹的这样对立嘛！现在不是因为部队总有一部分过去跟支派熟的呀！因为从一月风暴以后就接近的嘛！好，有机会总可以搞到一点枪，用来打几下子。好，你支派一打，踢派伤人，更闹的凶了，说现在徐州就要被包围，又要打起来了。

就拿中央来说，我们抓这个徐海工作抓的不紧，有时过问，有时又丢开了，你们闭得不可开交嘛！过问了，搞别的事情了嘛！以前也派过工作组到连云港去

调查尽管调查的时候是超脱的，不管“公社”派还是“反到底”派，我们都接触的，都承认是革命群众组织。但是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撤回去了，不然要陷进去，要犯错误。这是抓的不得情，有时抓得不紧，有时抓得不得情不能解决问题。

一九六九年六月五日，王效禹传达的中央首长与他谈话的要点

张春桥指出：根本上的问题是对群众的组织缺乏阶级分析。都看成是左派。对部队的态度是错误的。没有自我批评。

康生指出：复旧 15-20%是正常的。

周总理指出：你的骄傲更加突出，私字很多，旧东西很多。

一九六九年六月十四日，杨得志在济南军区会议上的讲话

通过学习，大量揭发，认识到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严重错误，破除了他的迷信，认清了事实的真象。过去受蒙蔽的同志，大胆揭发，并对自己的错误作了检查。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在大家的帮助下，对其错误有所提高。

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在青岛和山东夺权关键时刻起了很大作用，应该肯定。但是由于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很好改造，在前进道路上犯了错误，特别在十二中全会后，在全省搞了“反复旧”运动，大搞独立王国，大树个人威信，大耍两面派手法，挑动群众斗群众，把矛头对准人民解放军，包庇重用坏人，破坏斗、批、改的进行，破坏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大耍资产阶级政客作风。

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的严重错误，不只是他一个人，其他同志也有，我也有错误的。我几次看到他的错误后，总是肯定他的成绩，对他的错误帮助不够。有一次我和袁升平同志同他谈心，三个人谈了五个小时。对他的缺点有所察觉，有过斗争，但对他的帮助还是不够的，这次中央对山东问题作了多次指示，认识到省革委主要负责人错误的严重性，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作为军区的第二政委把矛头指向自己的军队，是我当兵以来从来没有见到过的。过去我对他有些问题有察觉，有些问题没有察觉，这是党性不强，私字作怪，怕字当头。

例如谭启龙同志的问题。省革委在传达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的时候，就不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当时我想提出来，但又怕人家讲我和袁升平同志过去是保谭启龙的，现在又为谭启龙说话，因此没有坚持这个原则。我和袁升平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思想保守，造反精神不强，对谭启龙犯有走资派错误认识不清，犯了错误。以后，对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的错误坚持原则不够，有些问题上我说了一些捧场话，在这个问题上讲，是对毛主席的不忠，对山东文化大革命造成了损失，我是有责任的。又如王新阳同志是省革委常委，在“反复旧”时关进了监狱，一关关了半年。作为我是一个军区司令员，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把一个常委关起来我还不知道，第一次我和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谈起王信阳同志问题是时，他说：王新阳在济南插手，第二次我又问他，什么理由关起来，他说王新阳有问题，但什么问题避而不谈。这样我就不好讲话了，这次王新阳同志对我的批评，我完全接受。

全省“反复旧”所造成的严重错误，由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负责。他把矛头指向我们，我们不好说话。河南刘建勋、纪登奎、王新三位同志的意见我同他讲了，我说他们提的和我们不一样，王效禹说上海和浙江都搞了，反复旧还是对的。山东“反复旧”是从上而下，不象河南的“反复旧”是从下而上。在“反复旧”这个问题上，我们是斗争了的，但是抵制不力。在这个问题上不要层层过关，不要揪住不放，不要上面一犯错误，下面跟着倒霉。

4、凡是由于“反复旧”引起革委会成员的变动，原则上以“反复旧”以前为基础，适当充实、调整，还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但是正常的调整不住此例。

一九六九年六月，王效禹回到济南后，不出席山东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会议。

此后，山东工作实际上由杨得志、袁升平等部队领导人作为核心负起主要领导责任。

一九六九年七月五日，中央首长接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山东班时的讲话
康生讲话：刘崇玉要写自传，看看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刘老师”。

总理：你韩金海、彭士杰、杨恩华说是代表群众组织讲话，你们不以党性为荣，以派性为荣，这是错误，

康老说：韩金海、彭士杰，杨恩华不能参加（学习班领导小组）。

中央首长严肃批评：什么对（省革委会党的）领导核心小组也要搞“三结合”，这有什么三结合？这是糊涂思想。山东笑话多，出怪事，孔夫子思想很有市场，讨论“九大”代表时，杨葆华也提出三结合。韩金海、王竹泉提省核心小组也要三结合，还要经过省革委讨论批准。你的根本不知什么是共产党。杨得志同志给你们解释不听，还反对，过去王效禹一个人说了算，现在几个人说了算，有什么不好，这是党的原则，同王有根本区别。核心小组要三结合，把三结合带到党内来，党内搞什么三结合，还要经过省革委常委讨论。这是错误的。党的核心小组是对中央负责的。

有人说军区夺了我们的权，学习就是要架空我们，这是王效禹的思想流毒没肃清。军队夺了权，否定了你们夺权，这是苏修的论调。

江青：她骗了我（指刘崇玉），和她一起照了像，我让王（效禹）把她抓起来。建立青年班子，搞青年班子的实质是什么？怪事，把老干部都赶走了，只有青年人才革命。

一九六九年七月七日晚九时，康生、李作鹏在山东学习班领导小组呆了五个多小时。主要是亲自处理打人事件（七月二日，红旗区文攻武卫的头头打了一个揭发问题的民警傅存贵）。

康生说：

孟庆芝、张美智在济南干了多少坏事，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不划清界限，到中央来继续干，破坏纪律。写自传写清楚，你们是干革命吗？应该采取什么态度？过去这种影响，王效禹有责任，山工总有责任，韩金海有责任，造成什么后果，孟庆芝是坏蛋，你们跟他胡闹，是反革命，把档案弄走了，是包庇自己，是包庇反革命。

在学习班，有些人对王效禹的反动思想没肃清，什么被“和平夺权”，“被架空”。王效禹反军，不相信解放军，不是今天，已很久了。学习班就是解决山东问题，就是架空，因为有资产阶级派性。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九日，康生姚文元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山东班负责人的谈话中央首长讲：

刘崇玉建的是王效禹的党，是从个人意见入党，这算什么党？

从这些事实中看出“反复旧”的危害性。在“九大”之后，还拉队伍，抢枪，不管多少理由，不管哪一派都是错误的。

个别地方是否有复旧，总之不要简单地肯定，也不要简单地否定。要具体分析。

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三、二十四日，周恩来康生在听取杨得志等赴京汇报山东批判王效禹运动情况时的谈话要点

第一、要坚决贯彻“九大”精神，增强党性，消灭派性。

第二、要正确认识山东形势。从近两个月的形势看，争取好的可能性更大了，更乱的可能性小了，但还没有排除，要既能纠正错误，又能稳定局势，关键在于一个单位，一个工厂，关键在于领导小组，在于领导小组的领导思想。

第三、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四、要教育广大革命群众，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抓革命、促生产，反对重拉队伍，另立山头。

第五、要加强组织纪律性。

第六、群众代表不脱离基层，不脱离生产劳动。

贰、湖北省

一九六九年初，单位的人来家里抓胡厚民，他跑到了青岛，见到了青岛市革委会主任杨葆华。促成胡厚民下决心回武汉发动“反复旧”。

胡厚民在协和医院住院，请朱鸿霞、夏邦银、郭洪斌（Z口区房地局工人、工总组织部长）、田国汉（湖北印刷厂工人、工总宣传部长）等巨头先后上门找吴焱金。胡厚民出院后，邀吴焱金到他家去了一次。讲了抓他的经过和青岛之行

，他说‘反复旧’不搞不行，最好是由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三个人出面挂帅牵头。

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七日，“反复旧”打头炮的是武锅的王光照。王特地选了对工总大逮捕的两周年纪念日，在厂门口贴出大字报，标题是《列宁选集》中的一句话“我们决不半途而废”，这与朱、李、吴署名的《人类解放我解放，洒尽热血为人民》大字报，拉开了武汉“反复旧”大幕。胡厚民又叫朱鸿霞、吴焱金、王光照等人上街演讲，讲保守派怎么回潮，造反派为什么受压，为什么要“反复旧”。王光照在“反复旧”中，在全市各单位一共讲了 60 场大型报告会，与他同台演讲的有丁家显（武汉测绘学院学生，钢二司勤务组成员，武汉市革委会常委）、吴焱金、朱鸿霞和李想玉等人。他概括的是：军宣队拿“三条扁担”、“三根绳子”压造反派，“三条扁担”是指“派性、打砸抢、抢枪乱军”三条罪名；“三根绳子”是指造反派“想当官、想入党、造反动机不纯”三条罪名。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七日，胡厚民等人在汉口工艺大楼街头召开“反复旧誓师大会”。大会由胡厚民主持，朱鸿霞和吴焱金分别讲话，有数万人参加大会，把中山大道堵塞得水泄不通。

一九六九年四月底，中央通知将湖北省、武汉市革委会常委以上群众组织代表接到北京京西宾馆开会。

胡厚民认为：中央某些人打算隔离造反派头头与群众联系，要压制造反派捍卫“文革”成果的努力。临走前，他指派郭洪斌、方斌（工总武汉客车制配厂头头）当“反复旧”负责人，交代说：我们去北京以后，不能打电话，也不能写信，你们在武汉闹得越欢，越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一九六九年五月初，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叶群、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等第一次接见湖北、武汉群众组织代表

进场后每个人发了一份铅印的有关“反复旧”的资料。其中第一篇就是朱、李、吴三人署名的大字报。

周恩来第一句话就问：哪个叫胡厚民？

胡厚民坐在较远的地方，站起来回答了。

“你坐过来，我今天要领教领教你。”

周恩来问，“‘反复旧’是你发动的吗？”

胡厚民说：是我们大家一起搞的。

周恩来又问：“你是根据谁的指示？你‘反复旧’的依据是什么？”

胡厚民回答：“我是领会中央的意图。”

周恩来问：“中央什么时候说要‘反复旧’？”

胡厚民说：“中央两报一刊中提到的：反对复旧。”胡厚民举了很多例子。

周恩来问康生：“康老，你有什么看法？”

康生把“‘反复旧’的资料翻了一下，问了署名的三个人是谁。

康生说：“你们现在都还年轻嘛，‘人类解放我解放，洒尽热血为人民’，你们的雄心壮志还不小。你们对马克思主义了解有多少？从文章中看不出来。现在形势大好，复什么旧？党的九大召开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嘛，你们是反哪个的复旧？”

康生(谈到周恩来在上海搞工人运动，出生入死，那才是洒尽热血为人民。)听说武汉市还在搞“反复旧”，根子就在你们，你们要做工作。

陈伯达也讲了话，大概意思也是你们不能再搞了。

叶群讲话说：“我也算你们半个老乡。你们年轻气盛，看问题不全面，有盲目性。也许你们受了委屈，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你们应该按正常的组织渠道反映情况。你们不是普通群众，你们不应该搞这么大的动作，你们在全中国全世界都造成了影响。毛主席、林副主席都知道这个情况，派我们来就是做你们的工作的。你们今天谈的情况，我回去以后会向林副主席报告的。你们可以写信回去说服他们不要搞了。”

接见后，胡厚民对吴焱金说：机会来了，你把接见的情况写下来，对武汉方面说：方针不变。说中央没有拿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我们只有继续搞，才能反映

群众的呼声，促使中央解决问题。信是由胡厚民口述，由吴焱金执笔，落款仍是朱鸿霞、李想玉和吴焱金。

一九六九年五月，在“反复旧”运动中，原“北、决、扬”成员萧务农创办了叫《百舸争流》的刊物，

他又把被打垮的《扬子江评论》的成员聚集在一起。这些人又为“反复旧”的人制定了纲领式的东西，基本思想是使“工代会”和同级革委会平起平坐，并使后者服从前者的监督。这一提议成了他们的口号。

一九六九年五月中旬，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第二次接见湖北、武汉群众组织代表

周恩来问：是怎么回事？要你们给武汉做工作，武汉的火怎么越烧越旺了呢？

胡厚民说：我们做工作群众也不一定听，他们有切身的问题未解决，你把问题解决了，就是不做群众工作，群众自然就不闹了。

康生声色俱厉地说：群众的工作做不了，头头的工作你们也做不了？！你们的部下，你们怎么不能做工作？你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不是工作做不了，是你们没有做工作，甚至做相反的工作。你们不要搞两面派，不是做不做工作的问题，而是革命还是反革命的问题！你们不要以为不做工作中央拿你们没办法了。

陈伯达、叶群、黄永胜讲得比较缓和：你们不能再搞了。周总理身体这么不好，工作这么忙，为了解决你们的问题，一个通宵一个通宵地陪你们谈，姑且不谈大道理，不知能不能感动你们。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日晚上，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第三次接见武汉的群众组织代表…

周恩来说：毛主席很关心你们，责成我们拿出一个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方案。

周恩来拿出“五二七指示”草稿的打印件发给每个人看了，大家提了一些意见。意见提得最多的还是朱鸿霞和胡厚民，周恩来在现场用铅笔对文件进行修改，修改后又给朱鸿霞和胡厚民两人看，并解释有些意见不能采纳。还说如果没有大的意见，就这样定了。

吃完夜宵后，放映《南京长江大桥》纪录片，周恩来对代表们说，这一次，不能再反复了，除了做下面的工作，你们这次来的人中还要统一思想（暗指胡厚民），周恩来握着朱鸿霞的手说：我相信你们。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五日，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报告

湖北省、武汉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主流是好的，但是省、市革委会在具体工作中，也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主要问题是：对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没有很好抓典型，总结经验，因而落实得不够好。“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在准字上狠下功夫不够，个别单位甚至有逼、供、信和扩大化现象。在工作态度和作风上不够深入、细致和谨慎。对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关心、爱护、帮助和培养不够，致使他们常常受社会上错误思潮的影响。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同意“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报告”的批示：

武汉市、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于一九六八年一、二月相继成立后，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就对斗、批、改说，也有一定成绩。这是运动的主流。但由于缺乏经验，他们没有很好地试点，抓典型，总结经验，落实政策，以点带面，在工作作风上又不够细致谨慎。这些缺点、错误应该纠正，但不能因此并在社会上错误思潮和无政府倾向的影响下，提出所谓“反复旧”运动，把矛头指向省、市革委会、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把三代会、首先是工代会置于一切之上。这样做，是不合毛主席关于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和一元化领导的教导的。

在“九大”开幕以后，武汉市工代会主要负责人和省市革委会的个别同志，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在武汉市发动了所谓“反复旧”运动。他们采取实用

主义的态度，歪曲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和“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教导，把工代会凌驾于革委会之上，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指向革委会，指向革命干部。这在实际上就背离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利于贯彻执行“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这一错误已经波及到一些专、县，对革命和生产有了一些不良后果。但这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七日晚上，中央领导人第四次接见武汉的群众组织代表

周恩来等正式向代表传达中共中央〔中发（69）28号〕文件，即“五二七指示”。

‘五二七指示’下达后，造反派不再进行公开的群众运动了，但是在广大造反派群众中间，与革委会的对抗情绪并没有消除。一些造反派由此对周恩来颇有微词。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日，周恩来讲话中有关反复旧的部分

我们讲了形势，主要是“九大”以后，产生了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各地也早已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革委会是中央肯定的。如果革委会一级有毛病，那是加强问题，改进问题，不能说今天的革委会里是走资派掌权。对新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新成立的革委会，要尊重。中央所发布的布告、通知、通令，都是经中央讨论过的，通过的，同意的，全国都要遵守、执行。有的地方还要闹，还要夺权，你夺谁的权？不是要夺无产阶级的权吗？这就不简单是极

“左”。如果不改，还要闹，后头就必然有坏人。这就值得注意。反复旧，湖北现在还闹。起初出在山东，山东的反复旧传到湖北。他们出版刊物，叫做《扬子江评论》，说什么现在是走资派当政，他们提出要农村包围城市，大搞秘密活动。他们的这种做法，其性质基本上是一九六七年的“五·一六”活动。他们秘密搞，还散发传单。阶级斗争在国内还会有起伏。这样来一下也好，把敌人暴露了。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对武汉问题的指示

(二)根据现在看到的材料,在武汉市出现的所谓“北斗星学会”、“决派”这类地下组织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假借名义、暗中操纵的大杂烩。那些反革命分子的目的,是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反革命复辟。他们不择手段,制造谣言,散布各种反革命的流言蜚语,混入群众组织进行挑拨离间,大刮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妖风。对这类反革命的地下组织,必须坚决取缔。

(三)所谓《扬子江评论》,是一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幕后操纵的反动刊物,肆无忌惮地大量放毒,必须查封。《扬评》的主要编写人员,应由湖北省革命委员会责成有关机关审查,按其情节轻重,分别严肃处理。

(四)对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盛荣、国民党反革命将领干毅、老国民党特务周岳森等犯,必须立即逮捕,依法惩办。

叁、安徽省

一九六九年六月,李德生在安徽省三代会常委扩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一)关于形势问题

去年这个时候,阜阳专区没有一个县成立革命委员会,阜阳两派正在这里办学习班,互相吵架,阜阳地区有人甚至提出口号要“打过江南去,解放全中国”。芜湖、安庆呢,要走徐州的道路。芜湖虽然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还不甘心,要走徐州的道路。安庆那个时候,没有一个成立革委会。

接着一个安庆事件后,

就出现了芜湖的六·二六事件。

芜湖事件刚刚要解决?合肥又出现了七·一六事件。

当前我们看到,这里反复旧,那里也是反复旧,这里反映一派掌权,那里也反映一派掌权。贵池县乌沙公社就成立了一个叫做什么“反复旧”的司令部,把牌子都挂起来了。一个外调的人,到武汉去外调,看到武汉那里反复旧,说现在中央正在支持全国反复旧,谁要是不站在反复旧的这个大方向上,谁就是否认革命,谁就是对毛主席最大的不忠,牌子都挂出来了嘛!有人看到武汉有反复旧的思潮,就往那里跑!我们安庆也是在幌幌动动的。

有的临时工也在闹事，有个别的把我们基层革命委员会的主任也都拉去游街了。

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有些扩大化，在某些地方有扩大化的现象，但这个前进中的缺点，有些由于我们调查研究不够，有些不够揪的也揪了，不该斗的也斗了，在一些单位有这么些现象。

现在的形势是大好的，而且是越来越好，这是当前形势的特点。

什么“你那一派的干部解放多了，我这一派干部解放少了；在下放的时候，我这一派干部下放多了，他那一派干部下放少了；结合到办事机构时，你这一派的结合多了，我这一派结合少了”。我们说这些问题，缺点还是有的，但它毕竟是现象，是前进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还只是在少数单位，少数的地区。而且这些问题并不是难克服的，是容易纠正的。

（二）要加强团结，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

如果把现在的形势看成是一个复旧的形势，要起来“反复旧”，这是方向性的错误。我们各级革命委员会，是完全体现了革命的三结合的，至少不应该说县以上的革命委员会是旧班底，原班人马。

这里要注意两个倾向，一种是在有的单位没有或基本没有按“九条”、“五条”办事，或多或少的、程度不同的存在着一派掌权。在组织变化、人员下放、调整革委会办事机构等问题上，掌握不够好就出现这种倾向，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有一种是片面的反对所谓一派掌权，有片面性就不完全符合事实。要求完全对等，事物总是不能那么绝对的，都是相对的，多一个，少一个，这种现象总是要出现的。这也是当前值得注意的又一个倾向。

（三）坚持“三不脱离”，加强思想革命化，当好群众代表。

一九六九年六月三十日，李德生在安徽省三代会常委扩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譬如讲“反复旧”问题，这个问题是不是大家都认识清楚了呢？“复旧”问题究竟是大问题还是小问题？是主流问题还是支流问题？“反复旧”是不是当前我们斗争的大方向？这些问题大家应当讨论清楚，有一个统一的认识，这才能谈到团结。我们认为“复旧”问题是支流问题，是小问题。“反复旧”是背离了当前我们斗争的大方向。可能有人不同意这个看法，可以讨论。再例如说领导关

系问题，权的问题，都应当有个统一的认识。最近不是有人说“群众组织没有权”呀，“群众代表是陪衬”呀，等等议论吗？我们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有人说，我们还不如一个机关工作人员的权力大，机关人员还可以开个条子，我们连开个条子的权都没有。我们究竟应该怎么看这个问题呢？譬如什么：“反复旧”喽。当然，有的地方清理阶级队伍扩大化是有的，这些问题我们可以通过落实政策来解决嘛！但是，有的地方有的人就借这个机会搞“翻案风”，什么一派掌权喽！下放时你少我多喽！这一派那派喽！这样搞的不好，又可能出现“一风吹”哩！

我们现在的整个形势，是不是一个复旧的形势呢？参加“九大”的同志都知道，“九大”结束后，山东的、湖北的，还有贵州的同志都留下了，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有的地方的形势并不是复旧的形势，但就是非要搞什么“反复旧”。

我们这次会议要解决这么几个问题：团结问题，领导班子问题，发挥“三代会”作用问题，当好群众代表问题：“反复旧”问题，以及“三代会”和革委会的关系问题。当然，要有个重点喽！这中间重点问题是团结问题。

当时曾经撒下一个不好的“种子”，说“九条”是偏听偏信的东西。说当时在北京汇报时一派的人多，材料多，另一派的材料少，中央没有很好的深入了解情况，“是压出来的”等等，这是煽动对“九条”不满的语调。这个问题要很好的认识。“九条”是不是就没有经过深入地了解情况呢？当时各方面的代表不是都在吗？有的小道消息说“九条”是康老一个人搞的，所以安徽就出现有人反康老嘛！

肆、浙江省

一九六九年六月二日，浙江省“红暴”派群众组织不满省革委会对他们的压制，组织了 1 5 0 多人到北京告状，

一九六九年六月六日，浙江省“红暴”派又组织由各地、县参加的赴京代表团，拟写了“上京告状的汇报讨论提纲”，向中央提出《对浙江问题的几点初步要求》。

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二日，“红暴”派近 2 0 0 人到北京新华社总社静坐一昼夜，受到中央联合接待站的批评。

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日，中央决定派北京卫戍区一个连队给“红暴”派办学习班，进行批评教育，动员他们返回浙江。

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对北京卫戍区处理浙江“红暴派”组织赴京告状的通知的批示

6 月 2 5 日，北京卫戍区发出经中共中央批示的通知，指出：“通知方剑文和他同来的人，包围新华社是完全错误的，要他对包围新华社一事，拿出一个触及灵魂、承认错误的检讨，限他 3 天内写出，并叫他和同来的人都立即回去。”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一日，北京卫戍区又宣读了经中共中央批示的第二个通知，指出：“6 月 2 6 日向你们宣布通知后，至今你们没有执行，我们多次动员你们回去抓革命、促生产，有问题在当地解决，把你们送回浙江。从现在开始，你们的一切行动听从我们指挥”。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二日，北京卫戍区将“红暴”派赴京人员 2 0 0 多人分两批护送回杭州。

一九七 0 年三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对浙江舟山地区问题的批示

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全面内战”的影响，浙江舟山地区一直与浙江省革委会处于对立状态，致使该地区不断发生武斗事件。

二月初，南京军区与浙江省革委会召开会议，商议解决该地区问题，并向中共中央提出报告。

三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在批示中指出：中央同意南京军区党委的报告，同意浙江省革委会提出的解决舟山问题的方案，请你们认真工作，让其实现。舟山地处东海前哨，中央殷切希望舟山地区全体军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早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

伍、山西省

一九六九年七月，毛泽东关于山西问题的指示

毛泽东指出：“山西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主要是刘格平、张日清所支持的两派长期打内战所造成的结果。”

中共中央再次召开了解决山西问题的“七月会议”。

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发布了解决山西问题的“七·二三布告”。

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布告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号召鼓舞下，全国形势大好。山西省同全国一样，形势也是好的，但是，在太原市、晋中、晋南的部份地区，混在各派组织中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坏头头，利用资产阶级派性，蒙蔽一部份群众，抗拒执行中央历次发布的通令、命令、通知和布告，犯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反革命罪行：

一、组织专业武斗队，搞打、砸、抢、抓、抄，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破坏社会革命秩序。

二、抗拒实行中央决定的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的方针，破坏已经实现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另立山头，制造分裂，提出“武装夺取政权”的反革命口号，向无产阶级进行反夺权。

三、冲击人民解放军机关、部队，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殴打、绑架、杀伤人民解放军指战员。

四、破坏铁路、公路、桥梁，武装袭击列车，抢夺交通工具，抢劫旅客财物、危害旅客生命安全。

五、抢占国家银行、仓库、商店、私设银行、抢劫国家大量资财。

六、用武力强占地盘，构筑武斗据点，实行反革命割据，残害人民群众，向群众敲诈勒索，派粮派款。

七、煽动、威胁工人停工停产，煽动农民进城武斗，破坏工农业生产和国家计划。

中央认为，这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坏头头破坏落实“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社会主义的罪行，是违反广大人民利益的，山西广大人民极为痛恨。为此，中央决定：

一、中央重申过去发布的“七·三”“七·二四”布告和其他通令、命令、通知、任何组织和个人都要坚决、彻底、全部地执行，不许违抗。

二、双方立即无条件停止武斗，解散各种形式，各种名称的专业武斗队，撤除一切武斗据点，上交一切武器装备。凡放下武器的，或回原单位，或由解放军进行集中训练。

武力强占地盘，拒不执行本布告、负隅顽抗者，由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包围，发动政治攻势，强制缴械，逃跑流窜者，由人民解放军实行追捕，归案法办。

隐藏、转移武器，利用国家的工厂和物资私造武器的行为，都是严重的犯罪，必须依法论处。

三、解放军的武器、弹药、车辆和其他战备物资，一律不许侵犯。抢夺解放军的一切装备，必须无条件地全部退回。对挑拨军民关系的阶级敌人，要给予坚决打击。

四、立即无条件恢复铁路、公路交通运输。撤销同蒲路南段非法的“三·一八次”列车。冲击车站，袭击列车，破坏铁路、公路运输，抢劫车站物资、车辆，搜查、抢夺旅客财物都是土匪行为。对极少数坏头头和反革命分子，要逮捕法办。

五、银行、仓库、商店等国家财产，任何人不得霸占、抢掠。要严办抢劫国家财产的主犯追回抢劫国家的一切物资和资金。

六、对杀人放火和其他罪大恶极的现行犯罪分子，应当发动群众检举；对确有证据者，要列出他们的罪行，交给当地群众家家户户讨论，并依法惩处。

七、对煽动、威胁职工离开生产岗位和工作岗位的坏人，必须依法惩办。至于一般受欺骗而离开生产岗位和工作岗位的群众，应进行教育，动员他们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自本布告公布之日起，逾期一月不回工厂生产、不回机关工作者，工人、职员停发工资。如继续对抗，长期不回者，责成山西省革命委员会视情况给予纪律处分，直至开除。

对回本单位的人应当欢迎，保证其人身安全，不许歧视和打击报复。如加迫害，必须追究责任，严肃处理。

八、凡分裂革命大联合、破坏革命三结合的行动，另立的山头，一律都是非法的，中央概不承认。重新拉起的队伍，都要立即解散，实行归口大联合。

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两派中的坏人，由两派群众各自清理。要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一小撮阶级敌人要坚决打击，同时也要执行毛主席的“给出路”的无产阶级政策。

中央相信，山西两派群众都是要革命的。中央号召山西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和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下认真落实“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发展、巩固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

为使布告尽快得到落实，中央政治局又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会议结束前，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宣布：由谢振华担任中共山西省委核心小组组长。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将刘格平、张日清等调离山西到河北省办学习班。陈永贵仍被保留在核心小组。

根据“七·二三布告”精神，经中央军委批准，省军区调动了北京军区驻晋各部队及从河南调入的第一军一个师共 20 多个团的部队，组成了上百个宣传队，由数十名军、师级领导干部带队，深入到山西各地、市宣传“布告”精神，并统一负责“支左”工作，努力促进对立两派的大联合。并到武斗最严重的地区，如大同煤矿、阳泉市、平遥县、长治市去制止武斗。经过 20 多天的工作，收缴武器 7 万余件，拆除了各机关、学校、工厂内构筑的武斗工事，解散了武斗队达数千人，平息了武斗，稳定了局势。

与此同时，谢振华还立即展开了“拨乱反正”工作。其中的一件大事就是枪毙造反总指挥杨成效。列出的杨成效的四大罪状是：其一，迫害老干部致死。造反之初，他带头夺了省委的权，将当时的省委书记卫恒迫害致死，尸体火化后，才通知家属。因造反有“功”，当上了号称百万大军的“总站派”总指挥。其二，破坏生产，挑起武斗，进行打、砸、抢、抄、抓。山西历次规模大，影响坏的武

斗，几乎都是杨成效挑动的。其三，烧杀奸淫，无恶不作。他奸污无辜的女大学生后，将人从楼上推下致死。其四，破坏社会治安，强占民女，抢掠财物。

一九七一年年十一月十五日，周恩来在接见美国朋友韩丁等人时说：“社会主义社会不是没有个人利益，而只有公共利益。我们的原则是个人利益服从公共利益，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一致起来。所以，像大寨这样，我们叫它先公后私。但是，有极“左”思想的人跑去吹捧陈永贵说：你是大公无私的。大寨在一个时候就骄傲起来。现在，山西省委第一书记谢振华同志闯了一个‘乱子’，他跑去说：大寨是先公后私，不是大公无私。这就得罪了陈永贵同志。因此，大寨就很不满意，而反对他。其实这个话并不是谢振华的发明，而是按照中央的说法。”

周恩来还说：“我们希望每个省都有自己的大寨，不要千里之外求仙名。毛主席最不满意的是把一切事情都说得绝对化了。我也不同意陈永贵同志所说的大寨是大公无私的。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他是从局部看问题，是从他的局部出发。因此，他的思想认识和分析问题的时候就常常弄错了……”。

陆、贵州省

贵州自 1967 年 2 月造反派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以来，掌握革委会权力的一派与另一派不断发生激烈争斗，动乱持续发生。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日，林彪接见四川、云南、贵州负责人时的重要指示

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九日，贵州在京开会代表的意见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日，贵州省军区在京常委对解决贵州问题提出五条措施的报告

由于我们没有认真学习和领会中央解决贵州问题的正确方针，指导思想有错误，把贵州存在的某些问题看重了，要求太急了。省军区党委扩大会议没有很好

贯彻毛主席“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以利再战”的教导和坚持“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原则，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在毛主席亲自批发的“红五条”下达后，我们仍没有深刻领会中央精神，没有放手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宣传贯彻落实“红五条”。当革命委员会工作处境困难时，我们没有积极支持帮助革命委员会，反而对革命委员会的同志有埋怨情绪，影响了军政、军民的团结。

我们的决心是：

- 一、一定要顾全大局，搞好军队内部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
- 二、坚决稳定贵州局势，坚决拥护、支持、帮助贵州省革命委员会，这是贵州的大局。提出“打倒李再含”的口号是错误的。
- 三、坚决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认真向八三四一部队学习。
- 四、积极作好复员退伍军人工作，
- 五、为了有效地解决好贵州问题，我们建议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举办贵州学习班。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转发贵州省革命委员会、贵州省军区处理贵州问题的两个报告

1969.05.23；中发 [69] 25 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贵州省各级革命委员会，贵州省军区、各军分区、各县、市人武部，各地驻军，贵州省“九大”代表，各地革命群众：

中央同意贵州省革命委员会、贵州省军区关于落实“九大”提出的战斗任务和毛主席批发的两个“红五条”的意见和贵州省军区对解决贵州问题提出五条措施的报告。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根据“九大”精神，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学习林彪副主席的政治报告，加强部队内部、群众之间和军政、军民的团结，广泛宣传中央两个“红五条”的指示，纠正各方面所犯的缺点错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稳定贵州局势，搞好抗旱斗争，加快三线建设，实现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部署，争取更大的胜利。

中共中央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一九六九年某月某日，中央（1969）71号文件指出：

李再含“在夺权以后，大权在手，头脑膨胀，逐步陷入了资产阶级派性，搞两面派，闹‘独立王国’，对抗中央，镇压群众，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一九六九年七月，在贵阳发生严重武斗事件。

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关于解决贵州问题的批示（概要）

1969年7月，在贵阳发生严重武斗事件。

中共中央于10月26日批示决定，调整中共贵州省领导小组成员。调昆明军区副政委兼任贵州军区第一政委，在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贵州省核心领导小组组长李再含留京学习期间代理核心小组组长，张荣森为副组长，何光宇、石新安、李立、张明、罗锡康、张健民、刘兴胜、鲍德金、张琦、朱德兰、刘绍贤、徐英年为组员。

调6908部队进驻贵州，担任支左工作。

此后，李再含实际上已离开了领导岗位。

一九七一年三月至四月，中共贵州省核心领导小组进行整风，点名批判了李再含的严重错误。

一九七一年五月，经毛主席批准的贵州省关于召开第三次党代表大会的请示报告，指出李再含曾经同陈伯达、王、关、戚勾结在一起，进行了反党、乱军、篡权的阴谋活动。

毛主席批准了撤销李再含在贵州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柒、河南省

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四日，刘建勋王新在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刘建勋讲话

有的同志运动初期支持了造反派，这是正确的，但革命发展了，到现在还支持一派，甚至笼统地说：“支持造反派就能站住脚”，这是错误的。

整党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有右的干扰，也有极“左”的干扰。不开门整党，不相信群众，想马马虎虎地整党，是右的表现，对错误的东西不敢抵制，也是一种右的表现。也有极“左”的干扰，这就是把党和群众团体等同起来，甚至把群众组织凌驾于党组织之上，他们把自己说成是百分之百的革命派，必须吸收入党，否则就说“压造反派”了，这是以极“左”的面目出现的，实质也是右的。

毛主席发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伟大号召以后，工宣队、军宣队刚刚进驻上层建筑领域，触动了一下资产阶级派性，有人就说是“压了造反派”。什么压了造反派？只是把他那个小山头碰了一下，就叫起来了。十二中全会指出，文化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又出现了“多中心”的干扰。可是，有些同志对工人阶级进驻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搞斗批改，不那么理解，抓住某些缺点，无限上纲，说“压造反派了”，“复旧”了。你的资产阶级派性那么大，把你的派性搞掉就算复旧？所谓“反复旧”这个口号，很适合一些有资产阶级派性的人的口味。贯彻“九大”精神时，我们遇到的问题，实际还是那时所谓“反复旧”的继续。省直机关有些造反派头头，资产阶级派性发作，还要我们支持。我们怎么能够支持？我们不仅不支持，还进行批评教育。现在整党中间有些同志不敢抵制错误思潮，不看够不够入党条件，就吸收入党，这是很错误的。这种不坚持党性原则，拿“党票”送人的情况，是不能允许，不能容忍的。当然，积极要求入党是好事情，但是不能用威胁的办法入党，认为造反派是当然的党员。这种倾向，我们要坚决抵制。

民主革命时期革命的人，有的一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掉队了。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有的搞生产资料所有制革命能够跟得上，可是搞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革命就不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也不很理解。问题的关键是，只要紧跟毛主席，没有私心，一心一意为革命，不为个人，不为保自己，总是比较容易接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闹私字，就容易走到邪路上去了。有个工厂，一些搞资产阶级派性的人，最近写了一些文章，表面上引用了好多毛主席语录，还讲了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但他们玩的是两面手法，打着红旗反红旗，

把矛头指向解放军，企图以一台机器不生产来压军队，叫中央点军队的名。这能算是革命派吗？这是两面派手法。还是刚才说的那个厂，有的人提出“打一场政治建厂的硬仗”，“重振造反派的军威”，实际上，他打硬仗，就是打所谓“反复旧”的硬仗，重振军威，就是重新打旗。他们提出一些错误的口号，什么“‘反复旧’是革命口号，要年年提，月月提，天天提。”真正的复旧我们要反，但是他反的是什么复旧？他反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怎么能够支持，不仅不能支持，而且要坚决反对！

我们办了五百人的学习班，问题一揭开，就是那么几个人在那里干扰，你一批评他，他就说你“压造反派了”，“老保翻案了”。这样，站错队的群众不敢动了，干部也不敢动了，结果生产上不去。现在把问题一揭开，团结教育了广大群众，人的积极性起来了，生产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看来，只要方针政策对头，敢于揭露矛盾，敢于同“左”右错误思潮作斗争，问题不难解决。

国棉六厂建立新党委的过程中，斗争非常激烈，“左”的右的都联合起来，反对新党委，企图搞垮新党委。六厂党委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发动群众进行斗争，这是很好的。我们就是要迎着矛盾走。要敢于斗争。不能退却，不能绕着矛盾走。整党结束了，阶级斗争还存在，不能有松口气的思想。

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七日，王新在河南省通许县的指示
对通许形势的看法问题。

通许县确实有严重问题：（一）“反复旧”问题。十二中全会后，我们省有些人搞“反复旧”。你们县革委作出决议搞“反复旧”。作为县革命委员会作出决议搞“反复旧”，干扰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你们在全省独一无二的一家。（二）争党权。整党中违犯毛主席建党路线，放弃党对整党工作的领导，让一些头脑发胀的非党群众领导整党，批支部，批党员，采取突击的办法搞整党。争党权，“吐疏纳亲”，干扰毛主席“五十字”建党纲领的落实。实际上是反复旧的继续，只是变了一个形式。有些县，有这些现象，是抵制不力，你们县是有某些领导支持，所以搞起来了。（三）四不清翻案，你们比较普遍，没有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是以四清划线，反四清的是好的，不反四清的就是不好的。（四）对青年干部不是关心培养，而是搞糖衣炮弹，毁坏了他们。你们还搞私招乱雇。

捌、四川省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解决四川问题的批示

1 1 月 5 日至 1 2 月 2 7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都军区党委负责人等参加了会议。

由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动乱和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的“反复旧”运动，四川省的工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会议认为，四川的革命和生产落后了，落后的原因不在群众，而在省革委会领导。根据会议讨论情况，写出了四川省革委会、成都军区党委《关于解决四川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和《关于加速四川地区三线建设的请示报告》。

省革委会、成都军区党委在报告中对省革委会成立以来工作中出现的失误集体承担了责任，同时也严肃的揭发了省革委会副主任刘结挺、张西挺的问题。

《报告》提出：成立三线建设领导小组，实行统一领导，改变多头领导和无人负责的状态；按军工第一、三线第一、配套第一的要求，把国防急需的重要项目、配套项目、对全局关系重大的项目和已经基本建成能够很快投产的项目迅速搞上去，改进三线的物资供应。

1 2 月 2 5 日，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共中央对两个报告作出批示，决定调整四川省革委会领导班子，确定了省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和决定成立成都军区支左领导小组、四川三线建设领导小组及其组成人员。

关于刘、张的问题，中共中央领导人明确指出，刘结挺、张西挺是个人野心家，要发动群众揭发批判。此后，刘结挺、张西挺实际已被撤销职务。

（一九七〇年二月至九月底，为进一步解决四川问题，中共中央在北京再次为四川举办了 5 0 0 0 人至 6 0 0 0 人的学习班。

一九七〇年八月一日，中共中央宣布把刘、张“挂起来、靠边站”的决定，一九七〇年八月十六日，中央宣布将他们送北京学习班学习。）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央首长对四川省革委及成都军区学习班成员的讲话

周恩来讲话：

我先读批示，批示并不长，很短，一段一段地讲。

第一段，两个报告，中央表示同意。望你们“坚决贯彻执行”。

第二段，“为了迅速解决四川的问题，加强三线建设和落实战备，中央决定……”在四川省的权力机构——四川省革命委员会里头，成立一个核心领导小组，就是党的领导，领导全川党、政、军、群的工作。这回扩大了。过去人比较少，现在扩大到十五名。这里头军队同志占很大数目，有十一位，当然罗，把刘结挺同志也算在解放军里头，他自己说犯有错误，但还是解放军。应该要求自己严嘛。那么，不是解放军有四位了：李大章同志、徐驰同志、张西挺同志，还有鲁大东同志。因为党的领导必须加强。也必须久经考验的，即使有的犯了严重错误的，但还允许他在集体里面改嘛。增补的就是谢家祥同志，大家都知道的。谢正荣同志是大军区副司令员、省军区司令员。补他们两位为革委副主任。增补胡炳云（大军区副司令员）、胡继成（大军区副司令员）、余潜（省军区政委）、何云峰（十三军政委）四人为省革委常委，然后再补邓经伟（省军区副政委）、顾永武（十三军军长）为省革委委员。另外，免掉的两位，王阴均【女，成都军区总医院司药，“八二六”派军区总医院红色造反者总团负责人，四川省革委会常委】已确定复员了，免去常委。梁善计犯有严重错误，也不适合作委员了。免去他们的常委和委员。蓝亦农【原五十四军政委】同志已经转到昆明军区去了。

第三段“由梁兴初、张国华、谢家祥、王诚汉、胡继成、王东保、谢正荣、段思英、茹夫一等九人组成成都军区支左领导小组……”刘结挺把军区“红总”、“千钧棒”拿出来支左，其他的就成为“老保”了。并在这个带有派性机构的领导下，使军队也陷入派性。现在纠正了。

第四段“由张国华、梁兴初、李大章、徐驰【文革前为冶金部副部长、渡口市委第一书记，1968年后为渡口市革委会主任】、胡炳云、胡继成、茹夫一【成都军区参谋长】、唐兴盛（省军区副司令员）、何辉燕【1969年6月成立的铁道兵西南指挥部司令员】、李安华【应为李华安，成都军区后勤部副部长】、蒋崇璟【文革前为西南局国防工办主任兼四川省委第二工业部部长，时为四川省革

委会常委、生产指挥组副组长】、鲁大东、顾秀【1969年8月前为铁道兵第五师副师长，时为铁五师师长，渡口市革委会副主任】、钱敏【文革前为西南三线建委副主任】、丁钊【成都军区空军指挥所政委】、丁先国【总后勤部重庆办事处主任】、冀绍凯（五机部政治部主任）等17人，组成四川省三线建设领导小组……”

最后部分：“中央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没有狠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四川的代理人李【李井泉，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廖【廖志高，前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任【任白戈，前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重庆市市长】之流，批他们嘛！要把仇恨集中在他们身上嘛！只能在这个基础上清理阶级队伍，然后整党。当然首先搞好革命大联合和三结合，狠抓斗、批、改。按主席提出的程序来进行。一直搞到下放。

结束语：伟大领袖毛主席讲过：“四川很有希望。”但是你们辜负了这个希望。时间又过去这么久，现在我们又把主席这个话拿出来，而且得到毛主席批示“照办”。你们总要达到毛主席这个希望吧？

你们的报告，

首先是讲了这次开会，这次开会应该是说确切点，比以前好多了，比别的省在九大到中央来开会，比起来说，你们这次会是好的。另外你们从绝大多数，从领导同志起，正像你们所说的提高了觉悟，增强了党性，揭发了错误，各自作了自我批评，既弄清了思想，又增强了团结。我们认为，这个估价，是合乎这次开会的事实的。

我们也检查一下中央是不是对你们过问得太少了？是少了点。这件事情，我们看经过，我们有错误，要承认这个责任。没有抓紧就是了。造反派来北京，反对李井泉一小撮走资派的革命群众上北京请愿，我们还是不断接见的，也平反了。刘、张他们过去，李井泉压他们，是错误的，也把这个案子推翻了。解决了四川问题，成立了革筹小组。革筹小组回去，你们不请示报告，也不按中央规定的重庆问题的五条、四川问题十条办事，开始有个报告，我们没有批。那么后头呢，就是武斗继续发展了。情况不明了，你们的报告来得少了。

你们的五条检讨：

第一个是我们主要没有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例如“红十条”，双方都争，真正“红十条”核心的东西就没有去执行。

第二条是没有正确对待群众。就是省革委自始至终个别领导人，就是他们自己写的，错误的以拥护或反对自己为标准。划分“革”与“保”，划分“‘红十条’派”，“反‘红十条’派”。这个当然指的刘、张了。其他人也有的同意他们这个意见。王茂聚同郭林川在“武装支泸”的前线打给省革筹小组的那个电报，坏透了，那完全是诬蔑，乱说。

第三，检讨的是违背了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发动了全省性的所谓“反复旧”。

第四，是革委个别领导人，这个当然是指刘、张，头一个是头脑膨胀，居功骄傲，争权夺位。这是不是个人野心家？就是个人野心家嘛！第二个是利用职权，搞宗派主义，拉拢一些人，排斥一些人。突出个人，独断专横，突出个人，利用一切文化工具，为个人树碑立传。这里也要说王茂聚这个人至死不改了，并以死来威胁，这种人自绝于党，自绝于群众，这种人不能当党员，要开除党籍。特别是刚才说的那封电报，王茂聚、郭林川两年多就那么个态度，所以他挑动、武装群众斗群众，那次省革筹小组也没有把“红联站”估计对，说他们都是保守的，上层不能承认，群众可以承认。这样就给王茂聚一个借口。就是他那武装打死群众的借口。我说这是犯罪的。

第五是强调领导核心不团结。

以后的十一条措施

第一条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毛主席指示，认真学习中央指示，领导班子带头学，带头用，自觉斗私、批修。这是最主要的。这次会议要逐步传达到群众中去，统一步调，要斗私批修。

第二条就是加强党的领导。

第三条，关于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

第四条，你们讲了革委会只能补台，不能拆台，更不能推倒重来。

第五条，关于武斗问题。

第六条，讲干部政策。

第七条，要坚决相信和依靠解放军。

第八条，关于斗、批、改，特别是清理阶级队伍，

第九条，宣传工作上要统一。

第十条，战备工作。

最后一条，要办学习班。

玖、湖南省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转发“湖南省革委会擅自传达毛主席指示检查报告”的通知

通知稿指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未经请示，擅自印发毛主席对湖南工作所作的重要指示，是错误的，是违背中央历次的通知和决定的。中央再次重申：严禁私编、私印和散发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讲话、视察谈话和中央其他同志的传记、抄件、文件、书籍、诗词、画册、图片，等等。凡属以上谈话纪录和文书、图片、画册，各地都应采取措施，立即收回，予以销毁。以后如再有违犯这一通知的规定的，即应执行纪律，严予处份。对于那些为达到反革命目的的造谣惑众、招摇撞骗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分别予以判刑。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都必须严格控制各地区、各单位所属的印刷厂，严格控制纸张的分配、使用。

贰、本节简论

八届十二中全会特别是九大以后，在一些省份如山东、四川、湖北等省，掀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反复旧”风潮。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四，《红旗》杂志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中提出：

反对复旧。凡是领导班子统统是原班人马，没有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没有革命三结合，或者只有形式上三结合而不是革命的三结合的地方，不可能做好发展党员的工作。这样的领导班子，不能同革命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因而很可能吸收一些“中间派”、“老好人”入党，甚至可能被言行不一的坏人、投机

分子混入，而把敢于向阶级敌人冲锋陷阵的、敢于坚持原则斗争的同志排斥在外。凡是有复旧倾向的地方，由于缺乏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常常形成两个中心。这种地方工作往往死气沉沉，华而不实，滞而不进，“独立王国”气味甚浓。在这些地方，应当通过斗、批、改的群众运动，充分走群众路线，吸收无产阶级的新生力量，克服“多中心论”，实现领导班子革命化，在斗争中逐步形成一个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革命核心。

全国最先搞“反复旧”的是时任山东省革委会主任、济南军区政委的王效禹，他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署名文章《击退二月逆流的新反扑》，对全国的造反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些地方的造反派认为他们那里就是《红旗》社论所指的“只有形式上的三结合而不是革命三结合”。省、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初期，“在革委，基本上是军代表说了算，干部代表和群众代表不起作用。群众代表只是个花瓶和陪衬。当时有一种说法，说群众代表是‘开会主席台，看戏前三排，电话一打小车来。’”

一些地方的造反派认为，1968年底，大、中学生大批毕业离开学校到军垦农场、上山下乡，随着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各单位纷纷举办“五不准学习班”，把大批造反派代表作为专案审查对象，军代表支持和依靠保守派利用“清队”来整治反派。同时各单位还发起“捅马蜂窝”运动，以夺取造反派在各级革委会中的政治地位。“三结合”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名存实亡，造成“造反者被造反，夺权者被夺权”的局面。

由此，在一些地方如山东、湖北等省发动了反复旧运动。九大以后，中央为稳定大局，即时对这个问题作了处理。

现在看来：

第一，当时，各地确实存在着一些复辟现象。康生说大约占15—20%。

第二，一些地方，把这种复辟现象看得过重了，掀起了一股矛头指向革命委员会、人民解放军、革命领导干部的运动。这就偏离了中央的战略部署。

第三，批评一些犯有“反复旧”错误的领导干部以及群众组织的负责人是必要的，但一些地方以后又把他们打成“野心家”、“五一六分子”。这就走偏了方向。

2009 年 5 月 18 日初稿

2011 年 12 月 20 日修改

第一章第三节 清理阶级队伍

第一部分 本节概述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江青讲了文艺界要清理队伍，要阵线分明，抓坏人，开展了广泛的群众运动。

江青：造反派要看你是造资产阶级的反，还是造无产阶级的反。造反派容易，要有阶级性。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江青陈伯达在中央直属文艺系统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于有的单位搞得比较好的，革命的大联合搞得比较好，也搞了革命的三结合，那就要全力以赴的搞斗批改，大批判，但总的说还是要树立队伍。

在这些不平衡的单位里头，是不是把队伍先树起来，把敌人狠斗，狠批！批倒、批臭！

对三十年代也好，对十七年来也好，五十天来也好，都要一分为二，因为三十年代也有以鲁迅为首的左派，十七年也有一些革命左派，五十天来那就更多了，起来反抗。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了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过。等到事情出来以后，就看出了现象。”“这绝不是偶然的事，是尖锐的斗争。解放后包下来的国民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国民党特务、反革命——这些就是他们武斗的幕后指挥。”

（毛泽东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2月18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徐景贤对宣传界文艺界谈清理阶级队伍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日，周恩来就国民党伪造“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一事给江青的信

此事在 1931 年、1932 年，凡熟悉上海政情和共运的，均知其为伪造。我在 1943 年延安整风、下半年开的中央座谈会上已原原本本谈过，今年有暇，我当在小碰头会上再谈此事，并予录音，记入中央档案。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深挖叛徒工作情况的报告

通过彻查敌伪档案和群众检举揭发，共发现叛徒线索七千二百七十三名，经过这一段的调查核实，基本可以定为叛徒的一百五十八名，其中有叛徒、特务双重身份的二十六名；现在我省的一百五十六名叛徒线索中，经查实基本可以定性的叛徒有一百一十二名，其中有叛徒、特务双重身份的二十名。在这一百一十二名叛徒中，窃据厅局级以上重要职务的有十八名。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谢富治谈清理阶级队伍

我看江青同志给文艺界的讲话，指出要他们揪出坏人，清理阶级队伍。我看这讲话很好，起了很好的作用。不仅文艺界、学校、工厂、机关，尤其是大学，也很适用。

当然，抓坏人，要象江青同志所讲的要稳、要准、要狠。所谓稳，就是要慎重；所谓准，就是不要弄错了；所谓狠，就是要抓最坏的，不要让坏人跑了。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转发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深挖叛徒工作情况的报告》的批示及附件

黑龙江省深挖叛徒工作所以取得很大的成绩，最重要的是由于：（1）领导重视，军队负责同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狠抓这项工作。（2）贯彻群众路线，采取以军队为中心，调集了一批干部，结合各派革命群众组织（不是一派）和革命干部，共同一道，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联合进行这项工作。（3）认真清查敌伪档案，加强调查研究，注意贯彻党的政策。既彻底清查，狠挖深挖，又实事求是，注意查证核实工作。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中用黑体字刊出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性质的新判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一日，王洪文谈清理阶级队伍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二日，许世友在江苏省暨南京市革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我们要有领导有步骤地清理阶级队伍，纯洁革命群众组织，提高战斗力。各个群众组织一定要有坚强的阶级观点，坚决把混进自己队伍中的那些叛徒、特务、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统统揪出来。各个组织的坏人，要发动各个组织的群众自己去揪。要警惕阶级敌人以揪坏人为名，混水摸鱼，乘机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甚至制造分裂，妄图把矛头引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我们一定要严格区分两类矛盾，对人民对同志一定要和，对阶级敌人一定要狠。

一九六八年五月七日，谢富治谈清理阶级队伍

要执行党的政策，要文斗，不要打人，不要游街，要做好工作，交代政策，指出出路，要他们赎罪立功，检举坏人时，要防止起付作用，不要在批斗时替坏人散布流毒。

搞好这一工作最重要的是充分发动群众，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时，可用检举箱，背靠背的检举，揭发坏人；群众发动起来以后，要求写大字报揭发批判。大字报、检举箱还可以并用，有些没有把握的问题，或者怕得罪人的，可以在检举箱揭发。

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

“我们在延安就规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捉。随便杀人没有手续不好，抓人抓多了也不好。搞逼供信，不讲也得讲。我们还是应该重证据，重旁证，不要重

口供。”“抓一个人来审，这时一般的心理状态，就是希望他供出来的越多越好。”“凡是拼命地逼，他就会供，供了你就会相信，又会要许多人这样去供。这样做也不好。”“投降过国民党就永远忠实于国民党，投降过共产党就永远忠实于共产党，这个规律我就不信。有些人被敌人抓住了，放出来了，登报了，但不一定永远依靠敌人。他还参加了长征，参加了抗日嘛，没有做过大坏事。一抓历史，后一段就都否定了。但也不能讲投降是好事。”“我们党的历史上是有经验教训的。江西的打 A B 团，福建的抓社会民主党，鄂豫皖的抓改组派、第三党，都反映了党的历史，说明当时是不成熟的。”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一日，毛泽东关于武斗、造反等问题的讲话

“整顿队伍，把坏人抓出来，基本上是对的。自从我说了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战争的继续后，抓了一批国民党坏人。抓坏人还是要搞，但是要有条件，要有人掌握。搞到什么时候，就要煞车。”“十六条规定，现行反革命就是杀人、放火、放毒、破坏国家财产。贴了几张反动标语，也不一定要抓嘛！总之，现在现行反革命的范围相当扩大。”“只要不是真特务、真反革命，就不要那么去搞，不要使人毫无出路。”“对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分别，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根本分别，是资产阶级专政同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分别。”

（毛泽东关于武斗、造反等问题的讲话记录，1968年5月11日。）

一九六八年五月某日，高增贵关于呼和浩特市当前阶级斗争形势和任务的报告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五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五日，谢富治吴德谈清理阶级队伍

最近自杀情况严重，我要说一下，特别是农村，其它是学校、工厂。我上次对农村讲了一下。结果更严重了，我认为要停一周总结经验，要把自杀风刹住。

通县有个地主兼资本家，有两个孙子，两个孙女，他把一家孙子、孙女都杀了，他也要自杀，这主要是阶级仇恨要反抗而自杀。也可能是我们没给人家出路。是否可在第四条中加一句“严禁打死人的现象”，“交待政策、防止自杀，即使是坏人也要给出路”。

一九六八年五月某日，新华社《文化革命动向》1220 期刊载《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九日，毛主席重要批示

文元同志：

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先印若干份，分发有关同志，然后在碰头会上宣读一次，加以修改，再加批语发出。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

此厂情况，我已从个别同志那里听过两次。你是否可以去那里看一看，问一问？

他还在这份材料的一些话下面画了粗线，如：“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是跟在群众后面，看着群众这样乱揪斗下去，当群众的尾巴呢？还是站在群众前头，引导群众，指导运动，把群众运动纳入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呢？”“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必须从严要求，也要注意团结。”

在材料中“这是一些‘推一推就可以掉下去，拉一拉就可以站过来’的人”下面，还画了双线。

（毛泽东在新华社《文化革命动向》第 1 2 2 0 期上的批语，手稿，1 9 6 8 年 5 月 1 9 日。）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毛主席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

1968. 05. 25；中发 [68] 74 号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根据毛主席五月十九日的批示，中央决定将此件转发全国，参照执行。

毛主席在批示中特别指出：“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

望你们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学习新华印刷厂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并且注意总结本地区的经验。在清理厂矿，机关和文教系统中的教职员，工的阶级队伍的工作中，要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真学习，掌握毛主席历来关于对敌斗争的一系列的方针政策，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以充份发挥群众专政的巨大威力，有步骤地有领导地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做好。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五日，滕海清吴涛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革委会汇报会的讲话

滕海清说：我们挖黑线、肃流毒，他们没有理由说不挖。有人便借此说是“压制老造反派”“带锹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革命靠群众，我们要支持受蒙蔽站错队的群众起来革命，别人犯了错误就不让人家起来革命，一辈子不让人家翻身，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当然老保翻天有，但是少数，主席讲要三个相信、三个依靠。有些人借机翻案，内蒙这样的情况并不算多，其他地方搞得很凶，实际上是走资派操纵的，是走资派在起作用。他们起来翻案，我们坚定一点就顶住了。

吴涛政委指出，挖肃斗争就是搞阶级斗争，矛头是对准敌人的，大方向完全正确。有些人反映是“整老造反派”“站错队的参加挖肃斗争就是老保翻天”。我们应该全面的看问题，老造反派应当肯定。但造反派队伍是不是百分之百正确，不能这样说，我们党内还有走资派，党外有党，党内有派，革命造反派队伍也是如此，不作阶级分析地讲老造反派是不行的，挖肃斗争清理阶级队伍，并不是对准造反派，有坏人抓出来，你的队伍就更坚强了，更纯洁了，对革命有利，并没有什么坏处。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八日，王效禹谈清理阶级队伍

斗争大方向的问题，特别分清这样几个：现行的问题和历史上的问题。我们着重的重要要掌握现行的问题，历史上的问题要弄清楚是什么样的历史上的问题，历史问题是政治问题呀是经济问题，是什么样的问题，历史问题作过结论了没有？交代了没有？是不是没有弄清楚？没弄清楚的要弄清楚是吧？当前，我们

应当着重政治问题，不应过多的追究经济方面的问题。再就是历史问题、成分问题，现在这个成分问题上，我看了以后同志们抓得比较多一些，有时候这个成分就不好解决，他一生下来就定下来了嘛！但是，成分问题和当前的表现，毛主席也讲过这个话，要结合起来看，要不就我们光在成分上解决问题呀，看这个成分问题也容易打击面很广的，总起来，这些问题建议同志们在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一定要按主席经常教导我们的，要区别对待，这一个政策界线，如果不这样作，我们清理阶级队伍可能打击面会广一些，这样打到自己人身上，我想当前我们来讲正是个热潮的，在这个时候和同志们讲讲这个问题恐怕有好处的。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张春桥谈清理阶级队伍

对于国民党员的问题，要作具体分析，分清哪些是打击对象、批判对象。有的是集体加入的，所以面不要太广。

领导同志要坚决维护党的政策，要掌握好党的政策，不然的话，一个个跳楼，这是不行的，不能解决问题，你们（华东）师（范）大（学）一下子搞了这么多，人家要告你的状来了。学生要处理好，不要打击面过广。这和搞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有所区别。要大胆搞教师队伍，但不要搞人人过关，个个看档案。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冼恒汉谈清理阶级队伍

〔冼恒汉：甘肃省革委会主任。〕

对于一小撮阶级敌人既要狠狠打击，也要分化瓦解，指明出路，要注意严格区别以下几种情况：

（1）把混进革命队伍的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同有一般政治历史的人区别开来，有政治历史问题也要把过去已经交待的同隐瞒反动历史区别开来。

（2）把历史反革命同现行反革命要区别开来，主要是打击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中又要区别交待过的同隐瞒隐藏的，主要是挖隐瞒的，已经交待的又要区分安份守己的同不安份守己的。

（3）对跟着坏头头干过一些坏事的这些人同坏头头要区别开来。

（4）把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同犯了严重错误，而又愿意改正错误的干部区别开来。

(5) 在旧人员中，旧的人员在我们这个队伍里头在旧社会干过事的旧职员、旧官员这是不少的，把坚持反动立场继续进行破坏活动同接受改造没有作过坏事的要区别开来。

(6) 把恶毒攻击人民解放军、阴谋分化瓦解解放军、破坏军民团结同由于派性作怪，冲击过军事机关，骂过解放军，向解放军提过一些错误意见的要区别开来。

(7) 把政治上反动的坏分子同有一些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人要区别开来。

(8) 对揪二套班子这个问题不要扩大化，现在有些乱套，省上有二套班子。你那个单位就一定会有二套班子？这样套是不行的。

一九六八年六月一日，李再含在贵州省革委会生产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李再含：贵州省革委会主任】

在对敌人斗争中我们要注意依靠广大的群众揭发批判。同时，要重视调查研究。重视证据，不要轻信口供，如果只有口供，是定不了案的。必须要有证据，而且要有多方面的证据，这就是包括人证、物证、旁证。我们要注意斗争的策略。这里我举个例子，如，对待有一些特嫌的。特嫌，就是特务嫌疑，对特嫌我们主要的是依靠群众来提供情况，更重要的是要很好的调查研究，把它落实下来。特嫌本身是特务嫌疑，是还没有定的，他也可能是特务，也可能不是特务，是嫌疑。如果你还没有搞到证据，来证明他是特务的情况，你就把他揪出来，这是失策，是不策略的。为什么？如果他是好人，那么你把他弄出来就冤枉了好人；如果他确实是特务，就等于向敌人告密。特嫌本来是我们内部掌握的，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的。你弄出来过后，如果他是特务，等于向他一敌人告密；而且特务，往往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总还有什么联系呀。你这样一弄，不就是打草惊蛇，把情况告诉了敌人。这样的问题，是我们内部掌握的问题，是我们要去作艰苦的调查研究工作，发动群众去落实的问题。

要注意政策和策略。在这个问题上一定不要搞逼、供、信，搞逼供信是向敌人告密。你一逼，他就供。过去彭真、罗瑞卿的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那一套。你一逼，他就供，你就信。这常常影响到把真正的敌人搞出来，甚至放跑了敌人。

你一逼，他就乱咬，他就乱供。我们再不加以分析，轻信口供，到最后要定案的时候，他就说，这些东西都是你们逼着我讲的，你们要给我平反。为什么说又是向敌人告密呢？你搞逼供信，就说明你没有掌握他的什么材料。你在没有占有他的材料，没有掌握他的情况的情况下，只有搞逼供信，如果他是真正的敌人，他就知道你没有掌握他的材料。由于你没有掌握他的材料，只能采取逼供信的办法。在同敌人斗争中，要根据我们占有的材料，有计划地，当着他不老实的时候，我们给他放出一两发“炮”，给他打出去，这一下他就知道我们是掌握他的情况了。在对敌斗争中，我们一定要掌握政策和策略。

搞逼供信有一个很大危险性，就是搞不好，他乱咬一口，就搞混乱了，使我们找不到头绪，敌人就可以蒙混过关，可以跑掉。还有一个很大的危险性，你轻信他的，就会弄得到处都是阶级敌人，搞得草木皆兵、特务如麻。我们过去有过经验教训的。过去我们有的单位，一弄就是百分之几十的特务，都是坏人。结果，真正的坏人混到好人中去了，不是集中力量打击他，他就跟着好人一道平反了。

在对敌斗争中，我们要注意几个结合：

一个是专案工作与广大革命群众相结合，缺一不可，而且主要的依靠广大群众。他本人的口供交待要和旁证、证据相结合。本人的口供、交待是重要的，不可忽视的。从他本人的口供、交待中可以发现问题，可以分析出问题，可以找到线索。同时，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去作好调查研究，找出证据。有了证据，他就跑不掉了，就赖不掉、滑不掉了。

内查外调要相结合。同他面对面斗争、发动群众起来和他斗争，同时主要的是同敌人斗智，这也要很好地结合。敌人是很狡猾的，我们要善于和敌人斗智。我们要有计划、方案，打一仗总结一次，提高一次，而且带头总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活学活和毛泽东思想，来提高我们对敌斗争的水平、本领。

一九六八年六月一日，吴大胜在南京工学院革委会学习班上的讲话摘要

当前，同志们都知道，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夺取全面胜利的关键时刻，阶级敌人更加隐蔽，更加阴险，更加毒辣。当前特别最危险的是反革命的右倾翻案风、右倾粉碎、右倾机会主义。右倾翻案妖风的形式是多样的，匡亚明曾经想翻案嘛，还有人这样讲嘛。我们造反派头头去找个人调查，要了解个情况，他讲：

“有没有介绍信？”讲“有，你先讲，我马上拿来。”他讲“不行”，架子很大。他说革命大字报是黑材料；说“过去彭冲同志你们不是要打倒吗？现在照样当省革委会副主任嘛”，威胁造反派。所以有的人就不敢去斗，不敢去揭他，怕以后他再来领导。这是右倾投降，我们要特别警惕，特别注意。第二个方面，当前在右倾方面，我们说对一个造反派组织来说，你说是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啊？本组织的坏人自己总是不去揪，总是千方百计地去掩盖，你说揪到一个黑手揪到一个坏人，他总感到自己受到压力，我就奇怪，就想不通，坏人与你组织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两个阶级的决战嘛，就是要把国民党反动派在我们里边的代理人揪出来嘛。我听到一个笑话，一个战士问一个组织的头头，现在形势怎么样？他说：“现在压得厉害呀。”群众就反驳他，我就不感到压。他说不是这样就是右倾。往往把那个别的敌人、坏人，同群众组织混在一起，这个不能混淆。我们群众组织也要注意这个问题，看到你那个组织揪出一个坏人就高兴，是不是你这个就很纯洁呢？不见得，无非是一个多一点少一点嘛。一个群众组织混进一个两个坏人，在大发展的时候嘛，不奇怪。坏人主动揪出来嘛，就有功了嘛，与群众组织无关，组织仍然是革命群众组织，与他无关嘛，不要把坏人、反革命与革命群众联系起来，我看到有些大字报是不满意的，往往总是把坏人与群众组织纠缠起来。另一种看法也不对，揪出一个坏人总感到压得气透不过来，我们就是要揪坏人，我们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个问题，我觉得江苏南京地区处理得不够怎么好。我建议同志们在这个问题上很好地加以考虑，很好地加以解决。有人说我们受压制，揪××，批判××，我们就受压制。我说你本来身上没有疮蛮好，为什么一定要把他与你联系在一起呢？我们应该得到妥善的解决，有些地方处理得不够好，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就影响了我们共同对敌，发现任何一个阶级敌人，应该是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共同敌人，我们有共同责任，不管他隐藏在那里，隐藏得多深，都要挖出来，对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团结，对我们的阶级敌人，应该要狠，应该共同的揪出来，揪出来是我们革命造反派的胜利，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在南工没有听到这个事，社会上有这个问题，在社会上抓了一个人，一个阶级敌人啊，压得我气都透不过来，干什么？另一个说：“这个坏人与那个组织有关”，这与组织有什么关系？阶级敌人削尖了脑袋往里面钻嘛。我希望每一个群众组织立新功，把自己组织的坏人先揪出来，不要互相

揪，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办，一定要按照党的政策办事，混进这个组织一个坏人，这个组织不要掩掩盖盖的，生了一个脓胞，把它割掉嘛，割掉就好了嘛，就不会作怪，是一个胜利，一个功绩，我们学习上海的风格，互相提供材料，互相相信，这个问题不解决，打击敌人就不狠，就不能共同对敌，你们南工，基础是原来国民党的伪中央大学（众：对），你们看到北京新华印刷厂的经验啦？（众：看到了）我们一定要把潜伏的阶级敌人揪出来，在这场斗争中立新功。我们一定要很好地动脑子，调查研究，不要不从调查研究而从估计，从猜想搞，我们一定要按党的政策办事，过去历史隐瞒没有交待的，号召他们主动交待，那些顽固堡垒还是要去攻的嘛！既要交代政策，又要去攻，既要在社会上对江、陈、包、李、王、高、杜批判，又要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我们要两条腿走路，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在阶级斗争中不要你保我打，我保你打，一定要共同审查。阶级敌人不管是什么人，不管过去跟我讲了多少甜言蜜语的好话，一定要打倒他，一定要按无产阶级党性办事。如果不下决心把坏人揪出来，明明知道是个坏人不揪，那就是个立场问题，当然走资派、特务、反革命两面派，我们要揪，干部不能站在那一边我就揪，要看他站在那一边，干了些什么事，有了错误检讨嘛！过去支持了一派，压制了一派，允许犯错误改正错误，问题揭出来看错误性质再定，不能站到哪一派就揪，在这个问题上纠缠得很厉害，影响着我们的阶级斗争，影响着我们的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不管他站在那一边，只要不是走资派、叛徒、特务，有错误检讨了，改了就好了嘛。同志们一定要正确地对待这个问题。有错误检讨了改了就好了，一是不要去保，一个要客观，一定要客观地看问题，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影响到我们许多问题不好解决。当前南京这个现象要注意，有些干部解放不出来，也在这里。有错误的应该解放的干部也解放不出来。没有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结果真正应该打倒的也打得不狠，因为我们的力量就是不集中嘛。我们学习“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嘛，怎样团结大多数，狠狠打击一小撮啊？学了就要用，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我们在斗争阶级敌人的时候也要讲政策，不要随便打人，不要随便抄家，真正的反革命分子抄家要报，东西也要交上来。林副主席说，武斗只能触及皮肉，不能触及灵魂。同志们，政策很重要，是毛主席讲的，是党的生命。当前要持久地不间断地向阶级敌人进攻，排除一切干扰。这是一个当前阶级斗争的问题。

一九六八年六月六日，王效禹在山东省各地市革命委员会座谈会上的讲话
关于清理阶级队伍问题

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群众发动得很广，群众情绪很高，从城市到农村，现在大家都在集中力量解决这个问题，进一步揭开了阶级斗争的盖子，挖出了一批隐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及其他反革命分子。有些是隐藏了几十年的，也挖出来了。主流是很好的。

当然，这么大的群众运动，难免出点缺点和毛病，那是支流。现在，有的地方是否把缺点毛病扩大了一点，看运动的黑暗面多了一点？运动不会没有缺点、毛病，作为领导同志来说，如果不警惕，继续发展下去会犯错误，使运动遭受损失；但是如果把问题扩大了，泼冷水也不好，会压抑了群众。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在群众运动中，不要指手划脚地指责群众，要爱护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我们要积极领导群众，使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更健康地向前发展。如果工作中有某些缺点和错误，也要善于引导群众经过群众自己的觉悟才能纠正。这是如何对待群众运动的根本态度问题。

什么叫阶级队伍？清理阶级队伍主要是清理那些人？依靠那些人去清理，用什么方法去清理？达到什么目的？这都是重大问题，要很好地进行研究。

首先，要把总的概念弄清楚：清理阶级队伍，清理谁？重点是那些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们已经夺了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的权。现在，正在通过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进一步从政治上、思想上把他们的一套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东西批深搞臭。所谓清理阶级队伍，就是要把中国赫鲁晓夫的黑班底——暗藏在党内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及其他反革命分子，从组织上清除出去。清理阶级队伍，主要是这么个意思。

为什么这样讲呢？从组织上讲，中国赫鲁晓夫长期以来招降纳叛，组成了一个黑班底，就是钻进我们党内隐藏下来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及其他反革命分子。我们和他们的斗争，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要从组织上把他们清除出去，这是一个很艰巨、很严肃的政治任务。

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这是贯串运动始终的大方向。清理阶级队伍，不能和前段运动脱节，要紧紧地围绕这个大方向去进行。就是说，重点还是指向党内一小撮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很多事实证明：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有很多他本身往往就是叛徒、特务；有的即使本身不是国民党员、地主分子，但已成为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代表。因此，清理阶级队伍的主要目标，第一是党内的，第二是过去的领导层（不是指现在的革命委员会），重要的是挖暗藏的，就是混进党内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及其他反革命分子。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他们都是整人家的，而他们自己则被中国赫鲁晓夫保护下来。有些家伙隐藏得很深。有的隐藏了几十年。如果不大搞群众运动，是挖不出来的。这是关系到领导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的重大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的领导权才能巩固。因为过去他们是掌握领导权的，现在虽然被夺了权，但是如果不从组织上把他们清除出去，领导权还会被他们篡夺了去，就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这些人总是少数，但是相当危险。清理阶级队伍的重点，就要要解决这些人的问题，就是要把中国赫鲁晓夫的黑班底从组织上彻底清除出去。这样，大方向就掌握准了。

清理阶级队伍，把重点指向隐藏在党内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及其他反革命分子，这样就和进一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解放干部、整党建党紧密地结合起来了，就能彻底解决问题了。有些干部执行了资反路线，犯了严重错误，但基本上还是好同志，这个敌我界限划开后，经过革命群众的批评帮助，就可以解放出来；如果是属于混进来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就从组织上清理出去。

清理阶级队伍，最根本的做法，就是放手发动群众，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最大限度的孤立和狠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要放手发动群众，打“人民战争”，大揭露，大批判，大鸣，大放，大字报。只有这样，才能把暗藏的敌人揭露出来，也才能和革命的大批判紧密地给合起来，而不至于形成单纯地为了揪几个人，脱离了革命的大批判这个大方向去孤立地进行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

清理阶级队伍，必须坚定不移地依靠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为了发现问题，总结经验，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同志要下去走一走，看一看，但是一律不要派工作组、工作队，已经派了的，要马上收回来，以免包办代替，压抑群众积极性。

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严格执行党的政策，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要特别注意正确处理那些“推一推就可以掉下去，拉一拉就可以站过来”的人的问题。

要注意调查研究，见政治挂帅，不要材料挂帅，但一定要有材料。“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如果光信口供，会造成麻烦，以后很被动。“要严防反革命分子暗害好人。”

“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严禁打人、游街和变相体罚。武斗并不能解决问题。敌人是害怕的是揭露事实。要教育群众，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制服敌人。

要给出路，对于挖出来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同时又应注意体现党的区别对待、给出路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挖出来的敌人，只要彻底坦白，老实认罪，真诚悔改，就宽大处理（当然不是宽大无边），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重点是清理党内的、上边的、暗藏的，那么，社会上的、公开的要不要搞？也要搞，但这和我们说的清理阶级队伍不是一回事。我们和社会上地富反坏右分子的斗争，是阶级斗争，但不属于我们清理阶级队伍的范围。对于社会上的，着重是搞现行反革命集团和现行反革命分子。特别是那些恶毒地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恶毒地攻击中央文革、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一旦发现，就要狠狠地打击，毫不留情。对于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一般的是否还是用过去通常用的办法（例如过去农村沿用的每隔一定时间给他们训一次话，等等），其中突出地表现不老实、有现行破坏活动的，也要批判，但是，清理阶级队伍重点不在这里。因为中央指示很明确，清理阶级队伍，就是清理隐藏的、混入党内的敌人，特别是领导层的。这是主要危险。而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是公开的，也有危险，但不很大，好解决。事实上，有些地富反坏右分子所以敢于搞破坏活动，往往是在我们内部有他们的后台和代理人。所以，重点还是

要解决党内的、领导层的问题。如果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连社会上的也一起普遍的搞，是否面就宽了。

绝对不允许借着清理阶级队伍的机会，压制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现在各地也揪斗的人不少，是个很大收获，但也不会都那么准的，这么大的运动，也很难那么准。如果再这样搞下去，搞不好就会压抑了群众。有的地方是对准了造反派，光上造反派里去抓“坏人”，对他们是个压抑。同时，如果不注意，很容易光看出身成份，走老路。我们一说这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有的就不管他过去是否交待了，一看历史上是国民党员就揪斗；一查档案出身成份有点问题，不问现实表现如何就揪斗，这是唯成份论，和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结合不起来。如果再搞上这么一段，不加以总结，可能出现更大的偏差。

革命群众组织里混进了坏人，总是极少数。那个群众组织里混进了坏人，要由那个组织的群众自己去揪，别的组织不要去揪，以免形成群众斗群众。

在清理阶级队伍这个问题上，如果讲的清理的对象、要求和做法对头的话，那么，敢不敢于放手发动群众这样去做，以便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这是区分是否右倾保守的一个重要标志。如果不敢，就是右倾保守。没个界线要划清。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四日，王洪文在上海市“深入开展对敌斗争大会”上的讲话

上海有那么一个办事处，这地方只有四百多人，他们就在这 4 百多人的单位里面揪出了一些国民党的特务、叛徒等和国民党残渣余孽二百多名。

有一个地区他们把曾经干了六十多年特务工作的一个老家伙揪了出来。

有的单位把那个蒋介石的臭老婆宋美龄的秘书也揪了出来，把工贼头子陆京士的小妹子，张闻天的妹子——大地主反革命都揪了出来。

阶级敌人向我们斗争的新的特点：

第一种情况：就是造谣歪曲、迷惑群众。有一小撮阶级敌人，造出谣言，他们胡说什么清理阶级队伍就是整造反派，有的就散布，“现在又要整老造反了！”也有的胡说什么“前一阶段是整当权派，是搞走资派，而现在就要整群众了！”也有的说我们执行了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等一些谣言。比如在浦东最近就

传出了在 35 岁以上的一些人都要经过审查，都要过关，也有的说，在市区里传出来，45 岁以上都要审查，等等谣言。制造这些谣言来企图扰乱我们的阵线，转移斗争大方向。

第二种情况；他们有的以极“左”面目出现，乱打乱点名，把矛头指向了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已经搞清了的一些人，或者是在生活作风上有一些小问题的人，一小撮阶级敌人就狠狠整这一些人来企图转移斗争视线。有的还说，这一次凡是参加过护工队的一般队员都要开除出造反派，参加国民党的一般党员也要开除出造反派，参加三青团的一般团员也要开除出造反派等等。以上面的这些流言蜚语制造混乱来扰乱我们的阵线。也有那么一些别有用心家伙，一小撮阶级敌人，甚至把一些对他们知情的人揪出来，进行批判，进行斗争，企图进一步压制群众对他们的揭发，或者他们打击一些次要的人物，把一些主要的阶级敌人保护起来，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丢车保帅”或者说是“丢卒保车”等等。比如我举个例子：上海光学仪器厂，自从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以后，他们就回到厂里边揪出一批小业主，把一批早已被群众监督起来的，地富反坏右揪出来斗，打一顿，他们还说是什么“最大的阶级斗争”，实际上呢？他们这里边有真正的阴谋，狡猾的阶级敌人还在他们幕后操纵着这个单位的造反派，他们就这样造谣或者打击一般的一些人员来转移斗争的视线，当然，对地富反坏右的斗争是应该的。但是我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绝对没有要你把主要矛头对准这些人，其他人就不揪了，我们更没有要你把斗争的矛头指向这一些小业主。他们企图以这样来掩护自己。有一些阶级敌人呢，有意制造了一些小偷小摸来转移群众和领导的视线，比如有一个单位有一个问题严重的人，当群众发动起来时，他自己害怕了，他采取了什么办法呢？他把人家的饭票、菜票、线票都偷掉，把自己的饭票，菜票，线票也拿掉，然后马上再去报案，他说我的东西丢了，因此就煽动群众要他去告状，以这种污蔑方法来转移群众的视线。有些单位，还有些阶级敌人蒙蔽了部分群众去斗争一些站错了队的党员、团员和一般干部，企图压住这些人对他们问题的揭发。有的呢，一揭到他们的问题就是“老保翻天”或者就是“右倾翻案”，戴上顶大帽子。

第三种情况呢，就是搞右倾分裂，策划武斗，两派没有联合或者联合不巩固的单位，敌人就充分利用了一些人的资产阶级派性，搞幕后操纵，制造分裂、策划武斗。

第四种情况就是制造事故，有的是制造破坏生产事故。比如最近有一个棉纺织厂，一个清花车间一共二十九个马达，一次在同一个时间里边全部烧掉，这个厂有两个班生产的布，全部是坏布，给国家损失了几万元。还有一个纺织厂，为了选择一个工长，这么一个小事，一群坏家伙就趁机挑动，挑动了这个布机车间有一千多台布机停工两个多小时。有的也制造凶杀事件，比如上海××厂出现了这么一件凶杀事件，把一个刚从部队回来的，五月份曾经见过毛主席的一个复员军人，现在是他们厂革委会的第一把手，把他拉出去毒打，打成了粉碎性的骨折，把胳膊上的筋也给割断了。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徐景贤在上海“深入开展对敌斗争大会”上的讲话

我们不但要把这些走资派，把这些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代理人揪出来，而且要把他们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摧毁掉，现在我们应该打响的这场清理阶级队伍的人民战争，就是起到了把这一小撮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进行复辟的社会基础彻底地摧毁这样一个革命的伟大作用，对于这样一场伟大的斗争，这样一场对敌斗争，不但是从组织上把这些社会基础摧毁掉，而且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地把这一小撮阶级敌人和他们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倒。所以当前一个很迫切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把清理阶级队伍和革命的大批判结合起来，怎样把清理阶级队伍和整党建党的工作结合起来。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八日，滕海清对内蒙古文艺界的讲话

文艺界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很大成绩。在挖肃斗争中间，揪出了挖出了各种不少的坏人。现在揪出了二百人。你们揪出二百多人，是否都是打倒对象？我认为这二百人中间，当然有些是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等等。但有些人犯了严重错误，但还不是敌人。

我们文艺界搞得并不比别的地方晚，江青同志讲话之后，我们就搞。但由于有三个原因，一个是敌人顽抗，一个是造反派内部的右倾，再加上领导不力，所以文艺界文化大革命拖了时期。如果搞的好一些，迅速一些，成绩比现在可能更大些。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九日，陈锡联王从周在沈阳市工代会上的讲话

陈锡联说：要认真清理阶级队伍，放手发动群众，把混进党内和工人阶级队伍的叛徒、特务、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彻底摧毁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革命社会基础。

一九六八年七月六日，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关于当前挖肃斗争中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全区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为了进一步全面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严防阶级敌人乘机破坏，更深入地开展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的斗争，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特作如下通知：

一、不准随意抓人。凡属必须依法拘留和逮捕的反革命分子、犯罪分子，除由各级公安机关军管会按规定权限执行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不得私自抓人。

二、必须坚决贯彻执行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关于在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斗争中几个具体政策问题的意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处理刑事犯罪案件中，要把武斗的指挥者和幕后挑动者同受蒙蔽参与武斗的一般群众区别开来，要把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流氓犯罪、赌头赌棍同一般犯有偷摸行为、另星私贩行为、一般生活作风、偶而参与赌博的行为区别开来。

三、各级革命委员会要加强对群众专政指挥部的领导。当地支左部队和公安机关军管会对群众专政指挥部要积极支持，热情帮助，并派人具体指导。群众专政指挥部的任务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稳、准、狠的打击敌人，坚决捍卫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保卫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并积极协助各级公安机关军管会执行专政任务。群众专政指

挥部的领导班子，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密切联系群众。成为执行、捍卫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模范。因此，参加群众专政机构的工作人员，必须政治可靠，作风正派，大公无私。

群众专政机构，只能在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旗(县)以上的城镇建立。两派对立严重的地方暂缓建立，已建立的要进行整顿，待实现革命大联合后，再组织统一的群众专政指挥机构。各基层单位不再设立“群专”分部或小组。公社以下一律不建立群众专政指挥机构。过去建立的，立即撤销。农村牧区应坚决依靠广大贫农(贫牧)下中农(下中牧)，团结中农和农村其他劳动人民群众，把一切暗藏的阶级敌人统统地挖出来，对地、富、反、坏、右就地进行监督管制，劳动改造。

群众专政指挥部一定要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把斗争矛头始终对准一小撮阶级敌人。不准利用群众专政支一派，压一派，不准一对另一派专政，不准利用群众专政报私仇，打击好人，包庇坏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四、对于应该实行群众专政的人，除有现行破坏活动，必须依法惩办外，都应交给群众批斗，就地监督改造，一般不要集中看管。

五、关于“群专”，隔离反省的批准权限要从严掌握。今后凡需实行“群专”的对象，应由本单位革命群众讨论，经当地群专指挥部审查，报请所在地的革命委员会批准执行。必须实行隔离反省的干部，应按干部管理权限报批后执行。过去未经批准而实行隔离反省的，由群专指挥部审查处理。

六、严格执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对一小撮阶级敌人既要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进行批斗，同时也要交代政策，指明出路，分化瓦解。

要遵照毛主席关于：“对任何犯人应坚决废止肉刑，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的教导，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六六”通令，严禁私设公堂和变相地私设公堂，严禁私自抓人、私设拘留所、私制刑具；严禁武斗和变相武斗；严禁体罚和变相体罚，坚决反对逼、供、信。在批斗审讯犯人要允许本人申辩。

对于违犯“六六”通令的肇事者和背后操纵者，对于打死和打伤人的凶手，公安机关军管会和群众专政指挥部及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有权追究，查明情况，根据情节轻重，依法惩处。

七、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一个组织里的坏头头，要靠那个组织自己发动群众去处理。”的教导，严禁两派群众组织互相揪人、抓人及查、抄。如果发现对方组织里有坏人，要将材料交给对方组织，要相信那个组织的广大革命群众会把坏人揪出来。

八、对儿童犯罪的处理，要坚持正面教育。对幕后操纵、唆使儿童犯罪的坏人，要发动群众进行批斗，情节严重的，要依法惩办。家长和教师都有责任把儿童教育成无限热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的红后代。

九、凡需采用抄家手段获取罪证的，应由各级公安机关军管会或“群专”指挥部批准，未经批准的，一律不得查抄。查抄时主要是查抄犯罪证据和政治性的反动物品，证件、枪支、弹药、凶器、毒品和赃款赃物。对生活用品，衣、物不准查抄和毁坏。查抄的物品，必须按照中央有关规定，一律上交银行、财政部门和军事单位。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不得挪用，违者从严处理。以往抄查扣留的财物，应立即补报公安机关军管会或“群专”指挥部。

十、各革命群众组织和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应该成为学习、宣传，执行、捍卫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中央有关政策规定的模范，积极协助公安机关军管会和群众专政指挥部执行任务。随时警惕阶级敌人乘机破坏，如有发现，定予严厉打击。

以上各条，希望向广大群众认真传达，坚决贯彻执行。

一九六八年七月九日，中央办公厅关于查阅中央档案馆档案材料的规定（中央文革小组在一九六八年七月九日重新批准）

一九六八年七月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查阅中央管理干部的档案的规定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二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

在谈到陕西问题，毛泽东说：“这些省所谓解放是怎么解放的？把胡宗南一扫就解放了。东北装了个口袋，一个也没有跑掉。没有这次文化大革命，这些坏人搞不出来。至于钻进我们队伍里的坏人，一下子也搞不清楚，一个工厂需要几

个月。”“这次文化大革命，才有社会主义革命之气，是群众自己搞的，是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

（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8年7月12日。）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对广州军区、广东省革委会《关于广州地区敌情的报告》的批语

广州军区、广东省革委会报告说：“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一直在进行着变天活动。据统计，全省光是军、政、警、宪、特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和匪首、汉奸、反动会道门中小道首即达四十二万人，占全省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这些人是翻案复辟的急先锋。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打进了我们的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事业单位和各种文化界。”

毛泽东在报告上批道：“各地大都如此，不独广东一处。”

（毛泽东对广州军区、广东省革委会《关于广州地区敌情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68年7月21日。）

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闭幕式上讲话。

清理阶级队伍，请大家应该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要做到稳、准、狠，重点还是这个“准”字。你如果搞得不准呀，你也狠不起来，也就不那么稳了嘛。所以，还是要注意调查研究，要重证据，不要重口供，不要打人，不要搞“喷气式”。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一日，毛泽东对北京新华印刷厂在对敌斗争中执行“给出路”政策的经验报告的批语和批注

“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

对报告中讲到要解放一位厂党委副书记的地方，毛泽东批注：“像这样的同志，所在多有，都应解放，给予工作。”

（②毛泽东对北京新华印刷厂在对敌斗争中执行“给出路”政策的经验报告的批语和批注，手稿，1968年12月1日。）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对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稿的修改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草拟了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稿。

毛泽东又加写了两段话：

“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悔改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

“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子女，也不要称他们为‘黑帮子女’，而要说他们是属于多数或大多数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间的一部分（简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别。实践结果，会有少数人坚持顽固态度，但多数是肯定可以争取的。”

（毛泽东对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稿的修改，手稿，1968年12月。）

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五日，毛泽东对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就落实政策问题作了一篇很长的谈话。他说：“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搞了很多人去搞调查，没有目的地到处乱跑。还有抓人太多，关人太多，解放的人太少。有些人站队站错了，还没有转过来，一个学校那么多教师、教员都不要，怎么办呢？你不改造他？就是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也要给出路。对走资派也要区别。有些走资派，开始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很厉害；但所谓死不悔改，难道一万年也不改吗？不做工作又怎么改呀？这些人都不不要怎么行？都把他們推到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那里去了。我们讲钱伟长、梁思成（钱是著名力学家，梁是著名建筑学家。——引者注），可以作为典型，要找标兵嘛！有人说，人家有历史问题。有历史问题不要紧，人都是有历史的嘛。人就是历史。有的人和美国、国民党有关系，就是有嘛，不要怕嘛！那都是摆在那里的嘛！拼命搞外调，又搞不清楚问题，盲目地乱跑，结果花了很多时间精力，问题还是搞不清。为什么不要他坦白、叫他自己交代呢？关的人太多，统统放了，只要不是杀人、放火、放

毒、破坏，至于写几条反动标语，那有什么要紧？有的人放出来，只要不继续杀人就行了，可以继续教育。他再杀人，再抓嘛！这是第一。一个是关，一个是放。一个不关不行，我们说是大部不抓，一个不杀。现在那么多教授、干部，不解放是不妥当的。我们历来讲坏人是少数，可以教育争取的是大多数。一讲就是一窝黑，几十个，甚至四分之一，三分之一，了不起了。开始有些老工人、解放军，一讲就是一窝黑，一个样，那样不是把人都推到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那里去了？”

（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3月15日。）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一日，毛泽东在九大一次大会秘书处和各大组部分召集人的会议上讲话。

有一个问题和同志们商量一下。在北京市小组的简报上说，现在有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清理阶级队伍有一种倾向，就是扩大化。”

“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清理阶级队伍是中央规定要搞的。下面一搞，有些地方就扩大化。在历史上有不少这种事。”

“军队要谨慎。南口有个工厂，八个人搞了一个专案，把党委书记搞成狗特务，后来交给群众去查，不是特务，是个好人。搞专案的人搞的材料不那么准确，不那么可靠。他们的观点是抓得越多越好，好像我们过去行军捉虱子，越多越好，少了不过瘾。搞专案的人搞错了要翻案很不容易：搞了这么久，翻案还得了？所以人家不敢讲话。还是超脱一些好。我不搞专案，超脱了一点，就好讲话。”“把人家既关起来了，不容易放。要放怎么办呢？你还要讲点理由：你为什么抓我，现在为什么放我？总要讲个理由。有些人关在牛棚里不少，有些人还关在地下室。有些犯错误的人推一推就下去，拉一拉就上来了。” “现在扩大化的问题，我们各级主要领导同志要注意，当成一件主要事情来处理。鉴于历史的经验，各个时期有一种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要使我们的同志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

（毛泽东在中共九大秘书处和各大组部分召集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9年4月11日。）

一九六九年六月一日，新华社报道：首都工人、解放军驻清华大学宣传队总结落实干部政策的经验 坚决地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及时解放犯错误而有了觉悟的好人。最近他们帮助犯走资派错误的清华大学原党委第一副书记提高觉悟，获得解放的过程，就体现了这方面的经验。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七日，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报告《发动群众总结经验，团结起来落实政策》

北京大学的红卫兵小将和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积极投入战斗，写了一张响应中央号召的大字报，奋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夺了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权，进行革命的大串连，开展革命大批判，立下了功勋。但是，在运动的中、后期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使北大成为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内战”不休的“老大难”单位。

一九六八年八月，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北京大学，热情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做了大量工作，制止了武斗，促进两派在组织上实现了按班、系的革命大联合，开展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等，取得了不少成绩，学校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由于对待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一碗水没端平”，特别是在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中，造成扩大化，客观上起了支一派压一派的作用，致使两派群众在思想上的对立，长期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去年宣传队进校后，从十月至今年二月的清队工作中，继续了这个错误，造成了扩大化。搞了许多群众，特别是搞了学生。先后立了大量的专案，打了一批“反革命小集团”，批斗了許多人。有的戴了反革命分子帽子，还有一部分人根本没有问题也被牵连进去，被说成是“反革命小集团”的“外围”和“外围的外围”，有的被当成“同伙”和“知情人”打击了，有的毕业后还给转去了所谓“反革命”材料。所以有的同志说：“打击了一批，牵扯了一串，压制了一片”，使很多人背上了包袱。如原“井冈山”派的一个骨干支队，原来对立面组织就想搞他们，宣传队进校后，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点了这个支队的名，又搞了逼、供、信，把个别别人的问题上纲，逐个进行审查，最后在这个六十多人的支队中搞了一个所谓“反革命小集团”，冲击了二十多人。在干部中揪所谓“黑班底”时，干部参加了一派有的就被说成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黑手”，没参加的有的就被

说成是“第三势力”，搞得干部无所适从。有的人有历史问题已经搞清并有了正确结论，也要老账新算。这样做的结果严重地破坏了党的政策，加剧了原两派群众的对立情绪。

造成扩大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缺乏阶级斗争经验，对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领会不够，主观上想抓反革命，但打击面宽了；有的是受了社会上极“左”思潮的影响，“宁左勿右”、“宁严勿宽”，正象有的同志说的：“过去唯恐放过一个坏人，从不考虑冤枉一个好人”；有的是资产阶级派性作怪，硬把对方的一些群众说成是“反革命”或“反革命小集团”。

一九六九年九月四日，北京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关于清理和改造阶级敌人的情况报告

北大两大派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现了革命大团结以后，于七月上旬转入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截止九月二日，告一段落。初步查清北大前身（旧北大、燕大）中统、军统、国民党、三青团等五十一个反动组织；在现有四千七百一十一名教职员工中，清出叛徒三人，特务五十五人（其中潜伏特务十七人），历史反革命分子二十一人，现行反革命分子九人（内含学生一人），地、富、坏分子十四人，共一百零二人，其中大部分人已定案处理；给十三个右派分子摘掉了“帽子”；还清理了一些人的非敌我矛盾性质的重大历史问题；同时，澄清三个人的问题。从而使北大的阶级阵线基本明朗。

贰、本节简论

文化大革命中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一九六七年十一月至一九六八年四月在各省开展试点，首先是文艺界。

第二阶段：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五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至一九六九年三月在全国各界普遍展开。

第三阶段：一九六九年四月至一九六九年底落实政策，纠正扩大化错误。

对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的评价，可以概括几点：

第一，进行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是完全必要的。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条件下，一小撮隐藏在内部的坏人，自己跳出来，进行各种破坏活动。

第二，这项工作是在各级革命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的。

第三，由于一些领导人的“左”的倾向，工作中发生过扩大化的错误。

第四，也有一些领导干部抓住群众的历史问题或某些错误行为打击革命造反派。

第五，还有一些造反派的头头一见到从本派中揪出了坏人，就认为是打击了造反派。

2009 年 5 月 25 日初稿

2011 年 12 月 27 日修改

第一章第四节 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〇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

自从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和“要准备打仗”的伟大号召鼓舞下，全党全国亿万军民紧密团结，斗志昂扬，“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形势大好。但是，国内外阶级敌人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苏修正在加紧勾结美帝，阴谋对我发动侵略战争；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机蠢动，遥相呼应。这是当前阶级斗争中值得注意的新动向。

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妄图仰赖帝、修、反的武力，复辟他们失去的天堂，加紧进行破坏活动。有的散布战争恐怖，造谣惑众；有的盗窃国家机密，为敌效劳；有的乘机翻案，不服管制；有的秘密串连，阴谋暴乱；有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有的破坏插队、下放。这些人虽然是一小撮，但无恶不做，为害很大。毛主席教导我们：解放以后，我们肃清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反革命不多了，但还有反革命，而且还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情况下，国内外阶级敌人总是会乘机兴风作浪的，所以这种现象的发生，并不奇怪。它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规律性的表现。当前国内外阶级搏斗激烈，反革命分子必然要跳出来，或者由国外派进来，进行破坏和捣乱，对此必须提高警惕。

为了落实战备，巩固国防，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有反必肃”的教导，对反革命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必须坚决地稳、准、狠地予以打击。为此：

一、要放手发动群众。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使群众认清，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打击帝、修、反“别动队”的斗争，是打击苏修侵略阴谋的斗争，实际上也是一项重要的战备工作。号召广大群众，对反革命分子检举、揭发、清查、批判，从而把隐藏的敌人挖出来。

二、要突出重点。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对那些通敌叛国、阴谋暴乱、刺探军情、盗窃机密、杀人行凶、纵火放毒、反攻倒算、恶毒攻击党和社

会主义制度和抢劫国家财产、破坏社会治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

三、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清敌我，区别轻重。根据“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的原则，对不同的犯罪，予以不同的处理。对于那些气焰嚣张，罪恶累累、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分子，要坚决杀掉。对于那些罪恶虽属严重，但民愤不大者，可分别判以死缓或无期徒刑；罪行较重，必须判刑者，可判以有期徒刑。对于那些罪行较轻者，可交群众严加管制。在斗争中要实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促使他们坦白交代，立功赎罪。

四、要大张旗鼓地、广泛深入地做好宣传、动员。杀、判之前要交给群众讨论，“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杀、判时要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判，立即执行。这样才令人心大快，敌人震慑。但是，杀人不可过多，杀的应是极少数，关的亦不应多，管的是大多数。不论是杀、是关、是管，都要搞得很准，必须罪证确凿，判处得当；都要交给群众批判、斗争，把它斗倒、批臭。只有如此，才能达到群众专政的目的。

五、要统一掌握批准权限。按照中央规定杀人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报中央备案。重要案犯需作紧急处理的，可用电报宣报中央请批。

六、要加强领导。必须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具体指导，深入实施。要加强调查研究，做到心中有数，“严格地审查捕人和杀人的名单”；要提高警惕，防止阶级敌人报复，特别要严防用资产阶级派性来混淆敌我，在那些思想上、组织上还没有真正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地方和单位，应通过清理阶级队伍，把钻在本派里的反革命分子清理出来。

要加强各级革命委员会和军管会对公安工作的领导，建设一支无限忠于毛主席的公安队伍。

望各地接此指示后，认真讨论，切实执行。

（此件只发到省、军级领导核心，以下各级均由省、军级派人口头传达。本件不再印发；更不许登报、广播、出文件。）

一九七〇年二月五日，中共中央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及两个附件

1970.02.05；中发 [1970] 6 号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各总部，

各军种、兵种，中央和政府各部委的军管会、军代表：

现将中央办公厅信访处《文化大革命信访简报》一九六九年第六十八期和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关于柳州市搞非生产性建筑的调查报告发给你们。

当前全国军民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的教导，正在积极进行战备，随时准备粉碎美帝、苏修的战争挑衅。可是，有些单位大兴土木，讲排场，摆阔气，请客送礼，挥霍浪费国家资财。这种铺张浪费的资产阶级作风。严重地影响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当前的战备工作，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中央认为，坚持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是关系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大事。“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发动群众，雷厉风行地开展反对铺张浪费的斗争，坚决刹住这股资产阶级歪风；保持和发扬无产阶级勤俭节约，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优良传统。

中央重申：

一、严禁新建、扩建和改建楼、堂、馆、所，已施工的要一律暂停下来，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根据当地情况，分别移作他用，然后重定节约施工计划，付之实施。

二、任何地方不许兴建高标准的城市建设工程，不许随意拆迁房屋。目前正在施工的，责成省、市、自治区革委会重新审查，酌情处理。

三、一切新建、扩建企业和“五·七”干校，应当发扬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一切非生产性建筑和生活设施必须从简，提倡延安精神。

四、一切机关、部队、团体、学校、企业、事业单位，一律停止添置非生产性设备，必要时由内部调剂解决。确需购置的，地方经省、市、自治区革委会批准，军队经军以上党委批准。严禁用公款购买沙发、地毯、钢丝床、电冰箱等各种高级消费品。

五、严禁用公款请客、送礼、看戏、看电影。不要搞不必要的庆祝活动，更不许借庆祝活动搞铺张浪费。

六、违反上述规定，继续铺张浪费的，给予党纪处分和行政处分，十分严重的要给予刑事处分。

七、要严格遵守财政制度和财经纪律，节约开支。各级财政、银行部门和财务人员，必须坚决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加强财务监督。必须切实实行群众性监督。

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遵照毛主席“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伟大教导，结合当前的斗、批、改，开展革命大批判，厉行增产节约，坚决杜绝一切铺张浪费现象。

各级领导接到本通知，应立即进行传达，认真检查处理。

一九七〇年二月五日，中共中央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

毛主席批示：照办。

当前我国革命和生产形势一派大好，随着斗、批、改的深入开展，一个工农业生产的新高潮正在出现。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一小撮阶级敌人不仅在政治上伺机反扑，而且在经济领域里对社会主义也发动了进攻。他们同暗藏在国家财经部门的坏人，内外勾结，利用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煽动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趁火打劫，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破坏备战，破坏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有的侵吞国家财物，霸占公房、公产；有的利用机关、学校和企业、事业单位的撤消或合并，私分公款、公物；有的倒贩票证，倒卖国家物资；有的私设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地下包工队、地下运输队、地下俱乐部；有的行贿、受贿、走后门，私分商品；有的大搞黑市活动，牟取暴利。他们千方百计以“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的手段，企图瓦解革命队伍，破坏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这是新形势下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对于这种情况，有些地方已经引起重视，正在发动群众，展开斗争，并取得了成绩。但是，还有不少地方认识不足，打击不力。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粉碎阶级敌人在经济领域里的进攻，是保卫社会主义的斗争，是全党的一件大事。必须把这场斗争看作如同打击现行反革命的斗争一样重要。一样要发动广大群众去进行。一样要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要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开展一场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群众运动，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违法犯罪事件，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直至枪毙一

小批最严重的贪污盗窃犯和投机倒把犯，才能解决问题。

一、各地要根据斗、批、改的发展情况，全面规划，具体部署，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掀起一个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高潮。要选择一批典型案例，交给群众，广泛讨论，召开群众大会，大造声势，发挥无产阶级的政策威力，狠狠地打击阶级敌人的反革命气焰。号召犯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罪行的人，坦白交代，检举揭发，立功赎罪。

二、要自始至终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批判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彻底肃清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余毒。使广大群众擦亮眼睛，及时地识破他们，抵制他们，揭露他们。使阶级敌人无处藏身，没有活动的市场，巩固城乡社会主义阵地。

三、要实行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给出路的政策。着重打击大贪污盗窃犯、投机倒把犯，对中小贪污盗窃犯、投机倒把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批敌人。贪污盗窃必须一律退赔，私分公家财产必须一律追赔，投机倒把必须补税、罚款，不许例外。

四、要通过这场斗争，认真整顿财贸队伍。对混进来的坏人，要坚决清洗；一贯表现很坏、不适合做财贸工作的，要区别情况，予以处理。要选调一部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积极分子，充实财贸队伍。

五、为了杜绝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不给阶级敌人以可乘之隙，中央重申：

（一）除了国营商业、合作商业和有证商贩以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准从事商业活动。

（二）集市管理必须加强，一切按照规定不许上市的商品，一律不准上市。

（三）除了经过当地主管部门许可以外，任何单位，一律不准到集市和农村社队自行采购物品。不准以协作为名，以物易物。不准走“后门”。

（四）一切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地下包工队、地下运输队、地下俱乐部，必须坚决取缔。

（五）一切单位的经营管理和群众监督必须加强，建立与健全规章制度；严格财经纪律，堵塞漏洞。

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

斗争的教导，在党的领导下，积极行动起来，团结一致，对资产阶级的进攻，展开坚决的斗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一九七〇年二月五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一九七〇年二月十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通告
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

为了加强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的专政，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搞好首都革命秩序，最近再公审宣判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现将顾文选等五十五名罪犯的材料发给各单位，请各级革命委员会，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革命群众认真讨论，提出处理意见，速告市公法军管会。

此材料只供内部讨论，不准张贴。

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七日，王新在河南省通许县的指示

听了县直的“一打三反”运动，是否可采取集中办学习班的办法解决。

贯彻中央三个文件，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大宣传、大揭发、大批判，特别是县直机关，一定要搞彻底，政治上、经济上都要搞透。人员要适当集中，彻底揭。揭出的案件，属于敌我矛盾的要认真批斗，老的分子有新的罪恶要批斗，新的反革命分子批斗更有教育意义。不管你是那一派，有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有什么罪就算什么罪。要完全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把敌人批倒批臭。证据要确凿、要准、要稳、要狠。经济问题一样。“一打三反”运动，要搞彻底，你们县的运动和整党，地革委要把关。这里派性严重，阶级敌人插手，混水摸鱼。毛主席的指示没有落实。这个仗一定要打好，要放手发动群众，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出现四个情况。

（一）涌现出一批真正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这是好的。（二）由于世界观改造的不好，犯了这样那样做错误，要教育。（三）有的中了糖衣炮弹，腐化了，严重的违法乱纪，但够不上敌人，不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这些人要在适当的场

合进行揭露和批判。犯有一般资产阶级派性的人要教育，不要脱离当前阶级斗争的现实，单独处理，但他们包庇了阶级敌人，那是另外一回事。（四）混进革命队伍的坏人，揪出来就是了。他们根本不是群众的代表，要把他的造反的假面具摘掉。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要把混进的坏人和严重违法乱纪的区别开来，狠狠打击阶级敌人。要很好的揭发批判。你们县革委给一个群众代表的父亲、关押释放犯送棺材，把县革委的名誉丢光了。还有什么威信？社直力量来不及，可以集中起来办学习班，分期分批搞，一次搞他三分之一也可以嘛。

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

毛主席批示：照办。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斗、批、改的群众运动正在深入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焕发出来的亿万人民的冲天干劲，正以排山倒海之势，推动着生产建设的新高涨。今年以来，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和铁路货运量大幅度的增长，基本建设重点工程进展很快，农业战线上夺取丰收的斗争热火朝天展开。全国范围内，一个加强战备，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农业生产新高潮，正在蓬勃兴起。革命和生产形势一派大好。在新的的大好形势下，必须进一步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充分发动群众，坚决地依靠工人阶级，大抓增产，狠抓节约，更好地适应各方面需要的不断增长，促进国民经济的新飞跃。当前，生产建设上增产节约的潜力是很大的。不少企业劳动效率和设备能力还可以大大发挥，生产消耗和产品成本还可以大大降低，库存积压物资还可以充分利用。只要我们坚决克服“生产到顶”，“潜力挖尽”的保守思想，千方百计动脑筋，想办法，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就一定能够把生产建设推进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我们六亿人口都要实行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这不但在经济上有重大意义，在政治上也有重大意义。”是增加生产，厉行节约，还是因循守旧，铺张浪费，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关系到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巩固社会主义所有制，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事。必须进一步深入地开展革命大批判，肃清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各级党组织、革命委员会，军管会和军代表，

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发扬民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切实加强对增产节约工作的领导。

为了实现这一任务，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一个声势浩大的深入持久的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

一九七〇年七月十六日，刘建勋关于整党建党的讲话

正当我省整党，建党运动深入开展的时候，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发了中央“三个文件”，来了个“一打三反”运动，大家可高兴了，这个运动真是好得很。我们紧密结合“一打三反”进行整党建党，使整党建党更加深入地向前发展。

在当前，抓阶级斗争，就是要抓好整党建党，抓好“一打三反”。要放手发动群众，揭开社会上阶级斗争的盖子和它在党内的反映，要搞好斗私批修。抓住这个问题，就是抓住了纲。大家经过文化大革命，觉悟都提高了嘛！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千万不要忘记无产阶级专政，千万不要忘记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千万不要忘记高举毛泽东思想像大红旗。“纪要”中写的三件事，头两件都是讲的要抓阶级斗争，要把整党建党和现实阶级斗争相结合，和“一打三反”运动相结合。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八日，王新刘建勋在河南省各地市领导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

王新同志讲话

我们要以批修为纲，狠抓阶级斗争，抓紧“一打三反”运动。

“一打三反”，深挖“五·一六”，当前进展情况不同。“一打三反”，城市工厂多数搞了，有些单位过去领导核心不好，盖子揭得不够；农村是结合整党进行的，有些大队的盖子揭了，有些大队盖子没揭。要进一步抓紧这项工作。当前，在几个城市。结合“一打三反”，进行了深挖隐藏的反革命，深挖特务、间谍和清查“五·一六”的工作。要进行“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罪行的教育，在教育的基础上，要发动群众搞。群众揭发要背靠背，小字报。郑州市有些单位揭得比较深，现在要注意核实材料。要把群众性的揭发和专案调查结合起来。

特别要注意掌握党的政策，把反党乱军、阴谋搞反革命的分子和有“五·一六”罪行的分子，同极“左”思潮相区别，同一般的打砸抢，同被“五·一六”利用的相区别。不要把后者都当成“五·一六”去清，不然就会造成扩大化。但也要防止“一风吹”，对一些较大的问题，都要进一步查清。这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要过细，要搞准，要实事求是。比如我们省里，有的地方一下子抢那么多的枪，要搞清是什么人在背后支持，这个阴谋怎么搞起来的。这里面真正的坏人是极少数，他不一定公开出面，多数人是受骗的。所以不能把抢过枪的群众，都按“五·一六”对待。总而言之，要按照中央指示去办，要打得稳、准、狠，要执行抗拒从严，坦白从宽的方针。凡公开批判的，材料要落实，先批判罪行，领导上暂不要给定性质。千万不要把一般的材料和没有核对的材料当成定性质的依据，领导上要严格把关。

对已经查清的重大案件，目前可以搞革命大批判，关于杀、关、管的处理，省公安会议以后再实施。

机关“一打三反”和整党建党，不能忽视，

当前，在我们省有些地方突出的有两股歪风，一个是说假话，一个是打人骂人。这不是无产阶级的作风，而是剥削阶级的恶劣品质，一定要严肃对待，坚决刹住。讲假话，虚报成绩，隐瞒错误，这完全是造谣言，搞欺骗！打人骂人，是国民党的作风，是军阀主义残余，对待我们阶级兄弟，为什么那么恨？自己到底站在何种立场上？！我们有些干部，因为官僚主义，对情况不清楚，或者因为认识水平低，对某一件事物没有能够反映它的客观实际，反映不那么正确，这不是说假话，这是个认识问题。反映客观实际只能是近似的，事物有个发展过程，人的认识也有个发展的过程。但是故意把假说成真，把无说成有，歪曲事实，颠倒是非，就是骗子。这种歪风要搞臭，对说假话的、违法乱纪的要严肃处理。

下面说假话，有的是同领导作风不民主有很大关系。如果我们领导同志，是唯心论的“先验论”，一听不符合自己的口味，就训人家。他就得出了经验，你不让他讲真话，于是就投你所好，看你眼色行事。所以，我们一定要民主作风。有不同的意见允许讲，讲得不对再帮助纠正。别人给你提意见提错了，可以解释，但不准打击报复，不准打人骂人。今后对打人骂人的，打击报复的，要坚决反对，坚决制止，严加处理。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群众有缺点，有错误，只能说服教

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能打骂，打人是犯法行为。

刘建勋同志讲话

关于作风问题。中央三号文件中所举的不正之风的表现，在我们许多同志身上，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我们也有骄傲自满，要认真克服。当前，我们特别要把打人骂人、打击报复和讲假话、搞浮夸的歪风刹住。我们有些人头脑膨胀，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是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不负责任的表现。过去有过这样的教训，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可是我们有些同志却忘记了这个教训，这是很不应该的。我们一定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要讲。讲假话不是革命干劲的表现，而是资产阶级的恶劣品质的反映。再就是一定要有民主的作风，要造成浓厚的民主空气。这个问题，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作了精辟论述，请同志们认真学习。我们的干部，如果丢掉了民主作风，就丢掉了群众；而离开了群众，将一事无成。党章规定，我们共产党员有事要同群众商量。可是我们有少数同志，却是听不得不同意见，人家给他提了意见，就要同人家记一辈子成见，还要“斗争到底”，甚至搞打击报复，打骂群众，这是不能允许的。今后，对上述两种恶劣行为，都要严肃处理。

关于“一打三反”运动中经济退赔问题。省里已经转发了安阳地区的一个文件，目前还不够完善，你们试行中遇到的新问题和解决意见，报来我们研究，经过几次试行修改，逐步就完善了。这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政策问题要求太死了不行，不能搞一刀切，有个大体的原则界限，你们要根据实际情况，具体研究处理办法。对人的处理，要取慎重态度。定敌我矛盾的，开除公职、开除党籍的，一定要掌握好，把好关。落实好材料。

贰、本节简论

一九七〇年在全国开展的“一打三反”运动（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是与当时正在进行的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分子、整党工作等等相结合进行的一项社会治理工作，是当时深入进行的

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有的地区，把有社会历史问题或有错误的人当成反革命加以打击，这就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还有的地区，借“打击反革命”之名，打击革命造反派的成员，这就完全是一种政治报复行为。

也有的造反派头头因为本组织中揪出了坏人，就认为是打击造反派。这就是敌我不分的小团体主义。

2009 年 6 月 1 日初稿

2011 年 12 月 27 日修改

第一章第五节 继续清查五·一六

壹、本节概述

一九六九年某月，毛泽东批评北京市不抓“五·一六”

外国语学院“红旗”造反派成员章含之向毛主席写信，告市里谢富治的状。她说谢富治支持的一派“六一六兵团”是反周总理的，是反周保谢的，海军宣传队进驻外国语学院后一屁股坐在“六一六兵团”一边。毛主席当时对她的信作了批示。批示大意是：北京市不抓“五一六”，要市委解决这个问题不容易，请周总理出面去解决外国语学院的问题。

毛主席还说：“五一六”从极左跳到极右。

（见吴德回忆录《风雨十年记事》）

一九六九年某月，毛泽东又一次批评北京市就是不抓“五·一六”

毛主席对北京市有关北师大的一个报告上的批示：北京市就是不抓“五一六”。

在北京市报告中提到“有些造反派是坏人，也可能是‘五一六’分子”的地方，毛主席在旁批写道：这就好了。

周总理找谢富治谈话，指示要李作鹏、谢富治和吴德研究解决外国语学院的问题（到外国语学院“支左”的是海军）：一是“支左”海军军宣队作检讨；二是市革委会作检讨；三是海军的“支左”人员撤出大部分，留下一小部分，派 8 3 4 1 部队进驻外国语学院领导斗批改，这样可以使海军、北京市革委会解脱出来。

（见吴德回忆录《风雨十年记事》）

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对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谈话中有关清查“五·一六”的内容

“五·一六”是利用 1967 年发表《5.16 通知》搞起来的，他们抓的很快，主席抓的更快。姚文元 9 月份发表文章点“五·一六”是反动组织，主席 8 月份

就抓住了，主席看的准……“五·一六”串连，小报上都透露了，主席很快就发现了，矛头不对。原来后台就是王、关、戚。起头，我们想分化他们，把戚本禹分出来，实际上他们是一伙。

一九六九年七月三十一日，周恩来对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谈话中有关清查“五·一六”的内容

要先从提高思想、落实政策方面入手。

你们要把“五·一六”、大批判、清队、整党搞好。

一九六九年八月十四日，江青等接见文艺口同志的谈话中有关清查“五·一六”的内容

江青：“五·一六”是个反革命组织。他们的后台杨、余、傅，还有混进中央文革的坏人王、关、戚。这六个人一方面打着人民解放军的旗号；另一方面打着中央文革的招牌，搞形“左”实右，这就难免有人上他们的当，所以我们对于“五·一六”问题，要认真对待，不许他们翻案，只要交待好的，完全可以从宽处理，可以不扣反革命的帽子，交待得不好的，隐藏起来，那要查出来，可就不客气了。

谢副总理：清理阶级队伍不能让敌人漏掉了。“五·一六”少数骨干分子是很凶恶的敌人。不管在哪方面，我们坚决要和他们斗争。把“五·一六”都揪出来，一个也不能漏。宣传队绝不能推拖。

总理：坚决贯彻江青同志讲话精神，把“五·一六”搞一搞。

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五日、八月二十八日，周恩来接见全国全军卫生工作会议代表时的讲话中关于清查“五·一六”的部分

吴传启、叶心清、杜南，卫生系统“五·一六”就是叶、杜打头的。叶心清是个江湖医生、政客，文化大革命中兴风作浪。在卫生口，他是“五·一六”挂帅的，杜南是跟他的，他出谋划策，利用广大群众，群众是受蒙蔽的。孙正同志是党委书记，他不同于群众，他有责任。先念同志向群众代表传达的话比我讲的

还轻，结果回去后要打倒李先念，还大贴李先念大字报，说先念同志歪曲我的话。这完全是“五·一六”的话。

“五·一六”问题，你们各单位革委会、大联委自己搞清楚。社会上的“五·一六”，是由公安部专案三办负责查处，他们让你们查就查，要防止扩大化。

在清理阶级队伍，整党中，对真正的坏人不应放过。比如“五·一六”分子叶心清、杜南，是极少数的。我不能说卫生系统只有叶、杜两人，也可能有第三第四个，要把人证、物证、旁证拿出来。“五·一六”在每条线都有他们的人。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日，周恩来讲话中有关清查“五·一六”的部分极“左”（后边的坏人）不能说外交系统一个也不存在。“一外”批极“左”就搞得不深不透。

批极“左”，不仅是外（语学）院没有批深批透，从整个中央机关来看，也还没有搞深搞透。

原来搞“五·一六”、挖“五·一六”的时候，我们提了四条：第一，不要扩大化；第二，不要让老保翻天；第三，要区别对待，第四，要促进大联合。提了这四条，当时是需要的。现在，抓了大批判，区别了什么是无产阶级，什么是资产阶级，当然仍要把一时的极“左”同搞阴谋集团区别开来。但是，不能强调了不扩大化，就不敢动了，就缩手缩脚了。中央各单位还没有搞深搞透嘛！扩大化，不加区别，不要区别对待，不对，但是，不敢动，不搞深搞透搞彻底，也是不对的。要防止两个极端。

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九日，谢富治在教育部文化部学部的讲话中关于清查“五·一六”的部分

在这些单位目前要放手发动群众，把清理阶级队伍搞透，特别是把“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搞深搞透，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放手发动群众，让他们起来揭发批判，同时号召“五·一六”分子自己起来坦白。但是要坚决搞，放手搞，发动群众搞，不要只是少数人搞，要群众与专案相结合，发动群众是主要的。

一九六九年十月，毛主席指出，不挖“五·一六”就是右倾。

谢副总理代表中央，在九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召开的万人大会上做了清查“五·一六”的指示和动员，北京地区深挖“五·一六”的群众运动逐步开展起来。

当时有一部分单位的领导同志不理解，提出些错误的口号：“对‘五·一六’也要一碗水端平。”也有的单位搞得冷冷清清，不发动群众。

这时毛主席指出，不挖“五·一六”就是右倾。

一九七〇年一月十一日，吴德在北京市举办的局县区级学习班上的讲话

从北京市来看，极“左”思潮影响大，“五·一六”活动较严重。反革命王关戚他们是极“左”思潮的根子，“五·一六”是他们组织起来的，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他们派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一个周景芳，是叛徒、反革命分子，而且派进 160 到 170 人，周景芳是从学部哲学研究所来的，同反革命吴传启、潘梓年有联系。周本人是叛徒，在抗日初期叛变投敌的，而又接受敌人任务回来的。周调市革会，并调来很多人未经过核心组，有的是戚本禹派来的，来把持市革会的工作。其中许多人是“五·一六”分子，实际是夺领导权的，以极“左”面目出现，打着“造反派”的旗号，利用职权，背着谢副总理和核心组，干了很多坏事。他们反对谢副总理，写一封最后通牒的信，进行攻击。周到上海学习，到山东学习。去上海学习有二个目的，一个是搞张春桥，一个是拿上海的经验回来搞谢副总理。到山东对王效禹讲，北京市核心组是保守势力。回来一本一本作报告，煽动极“左”思潮，挑动群众斗群众。几乎北京的武斗都是他们组织挑动起来的，然后又把别人派出来处理武斗。处理好、处理坏都是搞你，他自己从未出来一次制止武斗。周在学部专门整理周总理的材料，把国家的机密印出散发，另外，周利用职权把市革会主要几个组都控制起来，政治组周兼组长，自己控制，副组长是学部来的，另一部分是动态组，组长王乃英（现行反革命、林杰的老婆）。他们搞每日动态（收集情报、特务活动）。原来不知道，在一次会议，周出去，刘建勋一看，是每日动态，他们没有人在就看，有人来就压在屁股下，是鬼鬼祟祟的，他是什么“造反派”？管干部的是王乃英，文教组也是他们调来的李贯英当副组长，实权在李的手里，把组长丁国钰架空。市革会办事组长杨袁，从学部调

来，是“五·一六”分子，是留苏学生，有反对赫鲁晓夫的，他都要报告。再一个注意的是工交组××，不是个党员，他是工交组政治组组长。王若明是戚本禹派来的，在 1967 年写过文章，反解放军的。周景芳在工交系统派许多的调查组，王乃英到京棉二厂，矿务局也去过，财贸组支持“财贸尖兵”，西单武斗是周景芳布置的，就是我们傻瓜，去制止武斗。还有火烧英代办，当时我很着急，叫周景芳同我一起去，他不去，英代表要求解放军保护，影响很坏。他们是牛鬼蛇神，他们到市革会前二个月就开黑会，北京市的“五·一六”活动，就是在市革会指挥的。

他们在市革会和在学校安插一帮人。陈伯达同志告诉我，你们被控制了，我们还了解情况。有一次开会是否叫周去，伯达就不同意。1967 年以后才知道，就逐步处理，先把周调走，把杨袁调到修改党章办公室，以后把周、杨逮捕。

王、关、戚一手抓天派，一手抓地派，凡是一派的地方，都要分为两派，挑动群众斗群众。对王、关、戚，首先是中央发现的，那时市革会忙于大联合、三结合，对于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不够。譬如出现反复旧，是极“左”思潮，山东、武汉搞了一下反复旧，市工代会也有反复旧小组，他们把好人打下去，坏人上来掌权，搞无政府主义，把个人、群众组织凌架于党之上，革委会之上（刘插：有些老大难单位，极“左”思潮没有批透。）过去是极“左”，现在是极右，这是阶级斗争，思想迟钝抓得慢，是错误的，是跟毛主席不紧，阶级斗争觉悟不高，领导一般化，官僚主义，现在回过头来看，过去认为对的，现在不一定对；过去认为不对，现在也可能是对的，要总结经验提高认识。

一九七〇年一月十二日，谢富治对批判极“左”思潮和清查“五·一六”集团的几点意见

对这个问题，毛主席很早就作过重要指示，但是我们没有很好的理解，没有很好的落实，斗争得很不力，这是一个错误，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不忠。现在对这场斗争必须采取坚决的态度，对王、关、戚、周景芳、林杰等一伙等反革命分子煽动和利用的极“左”思潮，必须从思想上批深批透，把“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彻底挖出来，肃清它的影响。

还要注意他们在思想上与王、关、戚、杨、余、傅、周景芳等有没有特殊的关系。

以什么标准来划分极“左”思潮和“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问题。这是以对毛主席的态度，对林副主席的态度，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对周总理的态度。以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和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态度为标准来划分。他们主要是反对“三红”，但是不能因为冲击、反对哪个革命委员会和市革委，反对本单位解放军和某个人，就做为极“左”思潮和“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来进行批判和清查，这样就会乱了。

另外，对打、砸、抢，也要使具体分析，它是否带有政治性。同时还要注意他们在思想上与王、关、戚、杨、余、傅、周景芳等有没有特殊的关系。

一九七〇年一月十四日，吴德北京市举办的区县局学习班上的总结发言

在北京市到处伸手，反革命分子周景芳来市革委会妄图篡夺市革命会领导权的。周景芳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里头“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头子，周景芳在各方面伸黑手，而且发展“五·一六”。他发展支队，发展司令、副司令。在卫生系统他也干了许多坏事，在财贸系统也派去崔许龙。崔许龙是“财贸尖兵”的后台，和洪振海，王景瑞勾结在一起，西单武斗指挥机关在市革委会。上有周景芳，下有财贸组崔许龙。

主要是把群众发动起来，把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群众运动搞起来。

极“左”思潮，“五·一六”干了许多坏事，但是有极“左”思潮的人不一定是“五·一六”分子，不一定是坏人。极“左”思潮严重的没有加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组织，也可能有其他坏人，其他反革命分子。

还有的厂整党打板的，有的党员挂起 50%，这行吗？有的“纳新”把他的老婆也纳进来了。这种人是靠不住的，对这种人不要斗争吗？不批判极左思潮，对有些人的问题弄不清嘛！

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康生江青接见中央直属系统文化部学部教育部等单位的军宣队代表讲话

周恩来讲

下面把“五·一六”著名的头头讲一下。

一个是吴传启，湖北人，是国民党特务，参加过伪国大竞选，是宋洛介绍入党的。这条线，还有叛徒潘梓年，

王力在山东，他本人加入国民党，他妻子是叛徒，王力在大革命时参加革命，王力的老婆的妹妹的丈夫在教育部是个司长，他有两个女儿，一个在张家口搞无线电，很活跃，和三军冲派联系；一个在“一外”，也是红卫兵团的，和 616 在一起。王力是支持王稼祥的“三降一灭”、“三和一少”。六二年在莫斯科参加国大，完全代表修正主义的东西，回来他还说是对的……邓小平很称赞他，后来挽救他，他说要和王稼祥划清界线。后来让他写文章，以后到中央，他实际上是暗中有联系。王力在八月七日要夺外交部大权，八月七日的讲话人们取名叫“王八七讲话”，于是“五·一六”就贴出天安门的两条标语，“热烈要求姚登山代理外交部长。”、

关锋根子在学部，和军队有联系，原来是萧华的部下。他老婆在红旗杂志社，完全做“五·一六”的联系，和文化、宣传、学部联络，和林杰联系在一起。关锋企图篡军权，“抓军内一小撮”他是和王力大喊大叫的。“热烈要求关锋代理总政治部主任”的大标语，小字报也登出来了。

戚本禹是个野心家，是跑腿的，活动能力很强。

他们组织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两个系统，大的以学部为中心，还有外事口、政法口、农林口、工交口、文化口、教育、宣传、民族、统战，军队一个口，大的是方面军。还有学校叫小“五·一六”，大专院校以学生为主，工交以张殿英为主，农林以农业大学，林学院为主，外交以一、二外为主，财贸以商业、财经、商学院为主，体育以体育学院为主，学部是“五·一六”兵团。现以查清“五·一六”红卫兵团的文件有一个宣言，七月一日通过的，另外“616”跟着发表一个宣言，这两个宣言，矛头是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

不仅是中央有而且地方也有，在地方插到了广西、湖南、石家庄、湖北、四川、山西、贵州、武汉等地。

康生同志讲话：

今天讲王、关、戚、杨、余、傅，萧华，他们搞反革命阴谋，也不外乎走这个道路，抓文艺、机要档案。

江青同志讲话

据我看王力是头头，关锋是第二把手，戚本禹是跑腿的。

所以说，六七年七、八、九月是我党、我军、全国革命人民的紧要关头，主席到上海时，我接到一个电话，他们要搞多少万人的示威，整许世友同志，要许世友同志陷害主席，我当晚派文元同志到上海，飞机差点触电。文元到上海后，主席派春桥同志用直升飞机去接许世友同志。他有个怪脾气，但是个好同志，许世友同志当时围困退到了三线，已无路可退。许世友见到主席时感动得流泪。另外他们还整黄永胜、陈锡联、杨得志……一句话，要搞乱我们的军队，搞乱我们的党，搞乱我们的革委会。

在文艺战线上，他们的黑干将是金敬迈、李英儒、于秀、陆公达、刘巨成、林杰、郑公盾、李广文、赵易亚、唐平铸、胡痴。

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四日，林彪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就抓“五·一六”问题作出新的指示

林彪号召，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五·一六”彻底搞出来。

一九七〇年二月，毛泽东关于清查“五·一六”问题的意见

反革命“五·一六”阴谋集团是一个秘密组织，数量很少，很快就发现了，揭发的早，头子关起来了。不要乱挖，面不要太宽了。批判还是要批的，但不要搞逼、供、信，逼、供、信靠不住。

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

一、“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反革命两面派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关锋、戚本禹操纵下，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罪大恶极。有些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对清查“五·一六”极为抵触，甚至为他们翻案，是完全错误的。

二、现在，清查“五·一六”的斗争已经展开，有些单位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五·一六”是一个秘密的反革命阴谋集团，目前有的单位在过去公开的群众组织中也大抓“五·一六”，有的单位七分之一以上的人都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这种扩大化的情况、各级党组织、各级革命委员会、各军管会、军代表、各工军宣队的负责同志必须引起特别警惕和注意。揭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重点应当是揭露它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要区别骨干分子和一般成员，区别参予“五·一六”有组织的阴谋破坏活动和受社会思潮影响犯错误的人。对于各种违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极“左”的和右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潮，应当深入批判，在批判中要注意严格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因为受欺骗而犯错误的人，在他们老老实实交代了问题，就不要戴反革命帽子。就是骨干分子，在交代罪行以后，也要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给予不同的出路，其中表现好的，也可以从宽处理。总之，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

三、有的单位在清查“五·一六”的斗争中，搞逼、供、信，甚至采用体罚或变相体罚的手段，这是完全错误的，是违背毛主席一贯教导的，必须坚决制止。逼、供、信那一套，不仅搞不到真正的反革命，反而会把阶级阵线搞混，伤害革命群众，掩护真正的敌人。有的单位任用了一些坏人或者上了坏人的当，这些坏人就故意制造混乱，破坏革命斗争，保护反革命，同志们切记不要上当。

四、在防止清查“五·一六”扩大化的同时，不要放松对其他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应当根据中央历次指示，将这些反革命清理出来，是什么组织就叫什么组织，是什么性质就定什么性质，不要一律叫“五·一六”，好象除了“五·一六”以外就没有别的反革命似的。同时，要防止有人利用清查“五·一六”，挑动资产阶级派性。

来源：根据群众组织出版物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当时党建政工教研室《“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北京：[内部出版]，1988年，中册

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一日，毛泽东在会见黎笋时说：

“……今天打倒周恩来，明天打倒叶剑英，后天打倒李先念。现在明白了，有那么个小团体，叫‘五·一六’兵团，趁此机会要夺取政权。”

一九七〇年十月八日，毛泽东在会见金日成时说：

外交部也有两派，在一个短时期，一九六七年八月，七、八月，是在极“左”派的统治之下，烧了英国代办处。你看，这个领导的是一个反革命秘密组织，它的名字叫“五·一六”，五月十六日。这个组织非常秘密，人不多，可是煽动性很大，在大街上公开贴标语，打倒周总理，打倒李先念这些人。

一九七〇年十月二十日，毛泽东指出：

“‘五·一六’问题不能一风吹，有些单位已经一风吹了，例如（北京）外语学院”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一日，周恩来接见外事口核心组军宣队工宣队负责人时关于清查“五·一六”的指示

〔周恩来总理 11 月 1 日、9 日、18 日、20 日四次接见外事口核心组、军宣队、工宣队负责人，谈话中关于清查“五·一六”的部分摘要〕

一、对 1970 年“三·二七”通知的阐述

“九大”以后，文艺单位提出清查“五·一六”。1 月 24 日我们才讲的，其他单位以前不知道。中央 3 月 27 日发了个材料，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反革命两面派萧华、杨、余、傅、王、关、戚操纵下，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罪大恶极。有些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对清查“五·一六”极为抵触，甚至为他们翻案，是完全错误的。后面说清查“五·一六”斗争已经展开，其实也没有大展开，没说清楚，有些单位“五·一六”很隐蔽，一搞深了，情况就不明。有的单位出现了扩大化，后面几段主导思想是防止扩大化。

文件共四段，前一段不要说没有，后几段思想是防止扩大化，没有讲罪状和揭露后怎么搞法，专案工作组内查外调相结合，当时是需要的，扩大化主要讲文艺单位和学部，一个文件只能讲个主导方面，搞得很全面不可能。

二、关于“五·一六”的性质问题

“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这个集团定性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重点是反革命。他们搞阴谋，反对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毛泽东思想，他们专门搞小道消息，你要他不搞什么，他就非搞。不要他去安营扎寨，不要他去夺权，他非要去。只要文革里有一个人出来说，或者是他们下面的一些人林杰、林津时、周景芳一说就相信。我们搞正正当当光明磊落的文化大革命实践，他们去搞阴谋活动，搞阴谋活动就是“五·一六”，而不在其名称是什么。这些事不是一个人做的，是个集团，重点不在这个组织是否叫“五·一六”。“五·一六”这个名称是“五·一六”通知发表后，他们借口“五·一六”通知一年以后发表有意义，要挖出赫鲁晓夫式人物，利用这个名称，煽动搞阴谋活动。所以不一定都叫“五·一六”的组织。填表不填表都不是主要的，主要是他们的反革命活动，他矛头针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要重在罪行。主要是查他们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三、关于专案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问题

办法还是要发动群众，承认了的所以容易翻，就是因为没有群众，群众不知道，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要内部揭发检举和外部调查结合。

专案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材料要交给群众讨论批判。

四、要重本质，要抓罪行的问题，对一些重大案件要查个水落石出。

是不是参加组织，填表没有，不是主要的。要重本质，罪行就是本质，形式是第二位的。当然也要弄清楚。黑会都开的。就等于组织关系了。彭德怀，黄克诚的活动就是反党的，还需要成立什么组织？真正的核心不一定填表参加组织，他们背着中央开会集会这种行动就是罪行，有集会就是有计划的行动。只要罪行确实，抓住几件事就可以。

卫生口突破了“3.10”就解决了大问题，外事口是多几个：火烧英代办处，“8.11”大会，安营扎寨，外交部夺权，封部党委、政治部夺权，这几件事已经够了，几年来走了弯路，我们有责任，以前没有讲透，这次把它讲透，上面有一个阴谋集团指挥，下面不一定叫这个组织。吴传启在“五·一六”成立时已经不在这里了，他可以说和“五·一六”没有关系，刘雨来说他比“五·一六”还“五·一六”，那好就定嘛。把组织填表看得太重了，有的地方成立组织，有的地方还没有来得及成立，就是为了要得个“五·一六”的表格，组织问题就不能

定案，这真是可笑的。“五·一六”就是利用《5.16 通知》作号召，搞反革命阴谋活动，他们在一起开黑会，搞秘密反党活动，就是“五·一六”组织活动。如火烧英代办处，冲中（央）机（要局）都有谁，怎么去的，要讲清楚，慢慢地头头就清楚了。他认罪了。你不处理，去追组织，不定案，就是宽大无边，和好人一样看待，就是一风吹。

五、要有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要把材料准备好

总要有些材料才有意思。光有那些抽象的，一般的不行，要有站得住脚的材料，公诸于众，才能发动群众。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四日，周恩来关于清查“五·一六”的谈话

〔时间：1970.11.04，11.09，11.18，11.20〕

“从 67 年宣布‘516’是反革命组织。主席在姚文元文章上写了‘516’是反革命组织一段话，当时没有用黑体字发表。1968 年一二月份发现了王、关、戚是‘516’后台不久，又发现杨、余、付。当时只成立‘516’专案叫第三办公室，是公安部搞的，专案就是当专案搞。在群众方面，1967 年 9 月讲了一下，重点讲的‘516’是反革命阴谋集团，材料掌握得不够。1968 年 3 月 24 日、27 日开大会批判杨、余、付，讲了一下以后，大家听了林副主席的录音报告，以后就没有继续发动，后来就开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又开‘九大’，又搞了一次……”

“……在文化大革命中利用群众查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同志的病历，都查到家属头上去了。戚本禹说，查出来了材料交给他，就有问题了，他拿去干什么？就是彭真的病历你拿去干什么？……北京医院死了个赵尔陆，是心脏病暴发死的，后来，几个坏人一定要追查，要写成吃安眠药死了，这不许可嘛！后来查出来是几个坏医生搞的。……比赵尔陆早死的还有一个孙志远，至于跟贺龙、邓小平紧一点，是工作关系，他是管国防工业的，我告诉医院要注意一下，谢华不晓得，我亲自去抓，有多少个部长住在里面，这是中央关心不关心的问题。当然也有坏的，如吕正操啦，还是好的多，我去看他们，组织抢救，林副主席打电话要我去看，有人就查林副主席通过谁打的电话……国防工业‘915’‘916’都去查，现在介绍信都找到了，抢救孙志远是对的……”

“孙正搞了个‘3.10’。他看了几个发言稿子，把老爷卫生部和中央首长的病历混同在一起……内容都是攻击性的。……刘维栋在卫生战报第 49 期上他把对方许多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集中起批评对方，把内部东西公开暴露了，我下命令把他拘留起来。你把这些事情报中央是好的，但你铅印是不允许的。这些事情是不好的，是反革命阴谋活动，但方法是错误的，当时拘留是为了防止扩散。”

“3.10 对抗中央指示，我们让不要开。他说已经停了，后来发现没有停，先念同志打电话追查，他说停了，实际没有停，就把我和先念同志的话告诉他才停了。第二天又开黑会，不久贴出‘打倒×××’（估计是李先念抄者）的标语，说‘×××同志是大叛徒’，这是反革命行动。主席看样板戏时说‘这口号是怎么来的？’主席在接见了朝鲜代表团时也说：‘不知道这口号是怎么回事。’这件事卫生系统始终没有大讲特讲……”

“1967 年的‘3.10’黑会，名为打倒城市老爷卫生部，名字是冠冕堂皇的，群众的心情是好的，会的本身群众要求开是好意的，客观效果很坏，起了放毒的作用，被阴谋家利用，被孙正利用……是反中央的，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九日，周恩来关于清查“五·一六”的谈话

“‘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是在一个光明正大的运动中专门搞阴谋活动的。……姚登山没有填表，他说没有必要参加。他就是 516。……”

“‘516’专案组把几件大事搞出来，弄清楚就行了，如 8 月 11 日批陈大会，围困中南海，谁参加了？谁的头？当时我在中南海，我就是不走，戚本禹对我说：要走。当时刘、邓都在中南海，我要走了，冲进来就不行了。……”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八日，周恩来关于清查“五·一六”的谈话

“……后来又利用了 48 小时的声明，这个事我应该负责，我批了。不过他们总是要找借口的，不是 48 小时他们也要找别的借口。那个时候，香港当局封了三个报馆，都是外围的外围。不是《大公报》，也不是《文汇报》。包括《晶报》在内，而且香港当局也只说封一年。事情没搞清就送来批，制造借口。他们

利用这个借口，搞了火烧英国代办处，这是个阴谋。到现在还有人说火烧英国代办处是民族义愤，有什么了不起！现在还这样说法，不晓得是什么精神面貌！……主席和外国朋友谈起‘516’，总要举例讲火烧英国代办处。……（原文此处一段不清楚）我们同英代表一说他们就懂了，英代办乖乖地躲到解放军的岗楼里，说有你们我们很放心，他们是活命哲学。……”

“六六年刚开完十一中全会，就得到一本北航出的《战略战术》，那是什么战略战术，把戈培尔那一套都用上了，说撒谎久就成了真的了。我一看大吃一惊，你说不对，他偏相信那些东西，不让他搞非要搞。”

“武汉的事情，本来主席只叫富治同志去，那里的部队原来是他指挥的，和他熟，陈再道这些人他都熟。王力后来也要去，说他们小萝卜头留下来干啥！富治打电话来说，‘他们也要去’。你说他支持地派，可是他带的人都是天派的，不要以为他们只是支持一派的，都插手了。”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日，周恩来关于清查“五·一六”的谈话

“一件事在实践中要反复好多次，才能认识。‘516’问题，又搞又不搞，一会儿说扩大化。他乱咬一顿，形式上扩大化把水搅混；大家互相怀疑，实际上他自己滑掉了。今年三·二七发了个指示，他们又抓住三·二七通知中提到防止扩大化，变成一风吹了。运动规律就是这样，几番起伏。这次无论如何要追到底……火烧英代办处是公开出来搞的阴谋，这也怪我们当时没有追下去，当时当作一时的错误行动……”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纪登奎李先念关于卫生部清查“五·一六”运动的讲话精神

纪登奎讲话：

最近抓了一下卫生部的的工作，前阶段抓“五·一六”运动从三到六月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也有些单位有点扩大化，搞逼、供、信。中央发了3.27通知后，有所改变，通知的主要精神是防止扩大化，有的单位犯了一风吹的毛病，最近总理、康老有指示，抓“五·一六”要抓紧，总理讲重罪行，重证据，把问题搞清楚，但最近外交部传出不要组织，组织不组织是次要的，说总理讲的，总理没讲。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纪登奎到农林部给核心组成员关于清查“五·一六”的指示

“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是很凶恶的阶级敌人，不肃清会有后患。农林部关于“五·一六”问题是个没有揭开盖子的单位，罪行是有的，先要搞事实：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毛主席在会见斯诺时说：

“一九六七年七月和八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这一来就好了，他就暴露了，不然谁知道啊！……这个敌人叫‘五·一六’，在中央文革小组里边有4个人……王、关、戚，还有一个下次我给你讲。”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周恩来接见卫生部领导同志的讲话

一九七一年二月八日，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

1971.02.08；中发〔1971〕13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为统一五·一六专案的清理，审查和核实，为密切配合中央和地方各有关部门的五·一六专案调研同群众运动检举相结合，中央决定以吴德同志为组长，李震同志为副组长、杨俊生、黄作珍、于桑、杨德中、迟群、王连龙、李韬、刘西尧、丁江、李忠、耿建民同志为组员共十三人组成中央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经批准后，立即开始进行工作。联合小组即以原公安部的五·一六专案组为其办公机构。

在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过程中，既要防止扩大化，又不要一风吹，就必须集中力量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一系列罪行，将它一个一个落实，而不要一开始就笼统地追查组织关系和是否填了表格。在核实罪行上，要首先分清是非，要查清时间地点，重人证、物证和旁证，而不要轻信口供，不许使用逼供信和诱供、指供。在处理罪行上，要清出坏头头、主谋者和幕后操纵者，要区别主犯、从犯和被胁从、受蒙蔽的人；要区别敌我和人民内部的两类矛盾，坚持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方针；要强调和认真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给出路”的政策。

为搞好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要号召大家认真学习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还要贯彻执行毛主席在当时关于“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指示。至于现行反革命主犯和重大刑事犯，当然不在此例。

早在一九六七年八月，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指示姚文元同志在写《评陶铸的两本书》时，点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名，并揭露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因此，姚文元同志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值得我们很好学习。

目前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重点在北京，应由联合小组分别轻重缓急排个队，以利突破重大案件，便于联系各有关地方和部门进行清查。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林彪对清查五·一六的指示

军队是专政的工具，我们要深挖五·一六，一个也不能漏掉。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八日，王新在河南省各地市领导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日，吴德黄作珍在北京第一机床厂汇报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情况时的讲话

一九七一年六月三十日，陈伟关于清查“五·一六”运动的讲话

三、从北京揭露出来的情况，看“五·一六”的阴谋、罪行和组织

1. “五·一六”的阴谋和罪行。

第一，煽动极“左”思潮。提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动口号，煽动无政府主义。戚本禹提出：“不搞打、砸、抢不是造反派，最多是个温和的保皇派。”还有什么：“机密要掌握在左派手里，对保密要做阶级分析。”他们宣扬“义和团”、“红灯照”精神，戚本禹说：“红灯照就是现在的红卫兵。”到处介绍资料，煽动排外思想，妄图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外交路线。

第二，制造谣言，欺骗蒙蔽群众，大造反革命舆论。例如，说什么“当前矛盾是旧政府与新文革的矛盾”，提出“打倒旧政府”的反动口号，反对敬爱的周

总理；说中央常委有分歧，说什么四比三，三比四；还搞政治陷害，湖南有个 007 号密令事件，说什么湖南军队要在六七年元旦搞政变，说是下的命令他们已看到了，字迹象是总理的，跑到北京来第二天假马克思主义者就接见了，说是支持他们，他们关心国家大事，很好。这些纯系谣言。

第三，以反死人为名，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讨孔”就是一例。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在戚本禹、林杰指使下，在假马克思主义者的支持下，到山东曲阜去讨孔，这是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干的。她带了 200 多人到山东去，攻击周总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说孔庙是国务院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要造反，还搞什么《致国务院公开抗议信》。假马克思主义者打电报去说，砸碑主要是明清以后的，明朝以前的不要砸。在他的暗示下，谭厚兰等最先砸了国务院的碑。在《致国务院的公开信》中，公开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狂叫，不管他地位多高，资格多老，都要把他拉下马。还说什么“讨孔”有现实意义，要结合现实，单搞死人就失去意义。

第四，以反××为名，全面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各项政策，攻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例如，戚本禹让徐凯把财政部的何畏弄到北师大，告诉他什么话都可以讲。何畏就抛出《何许人也？》洋洋七万言，全面地、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将许多毛主席的话说成是刘少奇的话，进行污蔑。

第五，以搞××专案为名，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例如，卫生部搞了黄树则专案。黄树则是搞保健的，他们通过搞专案，泄露中央领导同志的健康机密。将主席一家的材料都搞了。还有借搞李立三专案，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

第六，为地、富、反、坏、右翻案，组织“左”派队伍，即反革命队伍。例如将陈里宁打扮成新时代的狂人，舞台上公开搞打、砸、抢，丑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陈里宁到处做报告，说他在神经病院被吊打，逼着吃屎等，完全是造谣。他们还为外交部疯人院翻案，成立“受迫害大队”，公开提出翻十七年的案。戚本禹派到二七厂去的徐凯，在修理厂把劳改都叫成工人，说他们是“受压者”，造反精神强，要他们赶快起来造反，否则是石沉大海，永无翻身之日。这些犯人被煽动起来造反，矛头首先指向军管会，把军管会主任打的几个月不能起床。他们成立了 20 几个反革命组织，提出几天血洗×××的极端反动的口号。

第七，从帝修反的反动报纸、杂志上搜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文章。北京图书馆事件就是戚本禹组织的。他们从那上面找出最恶毒的敌人的语言，用来攻击我们的中央领导人。

第八，召开劳模座谈会，煽动劳模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在大庆，他们逼着王进喜同志起来干，王进喜同志坚决反对，他们派往大庆的“学大庆”战斗队就整王进喜。

第九，毛主席在十多年以前指出：“反革命分子攻击少数人，不过是一个策略。自从汉朝吴王刘濞发明了有名的“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策略以后，很多人都采用这种策略。”（参看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按语）“五·一六”就是继承了这种“清君侧”的策略，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矛头指向周总理、康老和江青同志，最后是为了反对毛主席。为了反对周总理，对几个副总理也同样地采用了这种策略，提出对几个副总理两个打倒，两个炮轰，两个辩论。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架空毛主席，实现其反革命的野心，恶毒之极。

十、反解放军的手法是针对毛主席每一个最新指示，捣乱军队。

一九六七年初，军队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刚刚投入三支两军时，在一月二十三日他们就提出军内一小撮”，叫嚷“军队支保不支左”。结果到处冲军区，围攻军区领导。

一九六七年三、四月，主席提出“拥军爱民”，他们又发动第二次乱军高潮，提出什么“揪出军内一小撮是最大的拥军”，到处抓“老谭”。

一九六七年七、八月份他们又讲什么“文化大革命进入夺军权阶段”，提出要武装夺取政权，反对黑警司（警备司令部），他要成立什么红警司，抢武器弹药，盗窃军事情报，殴打解放军指战员，在全国各地揪“×再道”。“七·二〇”致武汉地区一封信，毛主席审定后，他们狗胆包天，又加上“军内”二字，把“揪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改成“揪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北京围困中南海，说什么八月五日有重大行动。这个行动是什么，还没查清。

第十一，对新生革命委员会，他们首先是妄图夺权；夺权不成，则派人打入，掌握实权，就搞反复旧，搞垮革委会。

对群众，先造成分裂，分成两大派，他们再混水摸鱼。

2. 北京地区排的十五件大事件：

第一件，夺中央外交大权，烧英国代办处，一九六七年七月二日抗缅大会，原准备先到外交部游行，后临时改为到缅甸大使馆。

第二件，围困中南海，连地图都搞了，妄图冲入，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

第三件，揪军内一小撮，派人到各地去，大搞反军乱军。

第四件，抢劫国家机密档案，如卫生部、化工部等。还搞了一次抢劫二十六个部的政治部的机密档案一千多份。现在查到，好多机密确实落到了特务手里。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方面都有，丢失很多。

第五件，冲中央机要局，篡夺中央机要大权。

周总理、康老、江青同志指示，机要部门不要搞串联。中央首长指示后，戚本禹马上接见，胡说“保密也有阶级性”。在他的煽动下，机要部门有些人成立什么“大喊大叫”战斗队。

第六件，卫生系统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黑会和盗窃中央负责同志的保健机密。周总理知道后，派李先念同志在会前去阻止。他们不听，会议照样开。总理批评后，他们还说什么“压制”，是“二月逆流”。

第七件，夺中央财政大权。财政大权是中央的，总理几次讲，只能监督，不能夺权。“五·一六”煽动一些人夺了。

第八件，妄图夺北京市革委的权。他们开始想要戚本禹挂帅，未得逞，就派周景芳率领几百名亲信，打入北京市革委，掌了实权。

第九件，利用搞专案为幌子，搜集整理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同志的材料，加以编造，进行攻击。包括北京图书馆事件。

第十件，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冲三军演出，是个政治流血事件。

第十一件，一九六八年六、七月，在北京航空学院等地开会成立全国无产阶级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不仅在北航开，别的地方也开。简称北航黑会。

第十二件，演黑戏，出黑书，开黑会，做黑报告。包括天津黑会。

第十三件，搞反革命基地。到河北、山西去察看地形，准备失败后，到太行山去打游击。

第十四件，私设电台。北京邮电学院、北京地质学院等地都有，有的还进行广播。

第十五件，组织反革命阴谋集团，如“五·一六”等。

此外还有盗窃档案馆，七月二十七日清华大学开枪打工宣队等等。

3. 组织方面的情况。

学部，“五·一六”的罪行很多：

上层勾结在一九五八年就开始了。关锋、吴传启、林杰勾结起来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用撒仁兴（仨，三人行）笔名发表的《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攻击张春桥同志。文化大革命前共抛出二十四篇文章。

一九六一年二月一日在《光明日报》上开辟“灯下漫笔”等两个栏，用何鸣等笔名发表文章，恶毒地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直到一九六二年十月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才停止不出了，共抛出三十六篇。

困难时期，他们经常在一起聚餐，策划夺史、经、哲的权。他们还到云南考察，狂言要写出超过恩格斯《国家、家庭、私有制起源》的文章。

一九六四年十月关锋、戚本禹、吴传启、林杰、邓立群等在通县翟里大队搞四清，推广桃园经验，五十三个干部斗了四十四个，对判过刑的，他们给予平反，搞反革命基地。出村前，一家赠送一本黑《修养》，有个老贫农不识字，不要，他们说，“留给子孙后代”。临走时还学王光美，树碑立传。这时加上了戚本禹。

一九六五年，他们勾结了彭真。

一九六六年，他们勾结陶铸，攻击毛主席，吹捧刘贼。

姚文元同志《评陶铸的两本书》（误：应为评海瑞罢官）发表以后，在一九六五年冬，一九六六年春，他们对吴晗搞学术批判。后来他们窥测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意图后，想搞政治批判。《二月提纲》出来后，马上又按《二月提纲》的调子改了稿子。一九六六年四月假马克思主义者、关锋、戚本禹、林杰等成立批判小组，仍然搞学术批判。所以说他们是刘少奇的黑班底。

一九六六年三月关锋支持吴传启写大字报。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吴传启的大字报贴出来以前，请示过关锋。关锋说可心贴出去。一九六六年六月五日，关锋、吴传启、林杰策划让潘梓年站出来。关锋亲自访潘梓年，给他出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站出来，中策是出去疗养，下策是不站出来，不动。结果潘梓年取了上策，站出来了。

一九六六年六月六日经关锋修改后，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林杰的老婆杨德华的文章：《北京日报》领导上让我写访问记的文章。以后还陆续发表了一些把他们一伙打扮成左派的文章。

一九六六年九月陶铸保他们是革命左派，此后他们在学部稳定了阵脚，王力、关锋、戚本禹指向他们杀向社会，夺国家机关的权。群众识破了他们的阴谋。一九六七年四月江青同志点出，对他们不能保。他们乱了阵角，就组织了秘密组织，搞了二套班子。

一九七一年七月二十八日，陈伟在国务院各部委清查“五·一六”专案协作会议上的讲话

现在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区别极“左”思潮犯错误和“五·一六”罪行，这是当前运动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什么是受极“左”思潮影响犯错误的？什么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罪行？什么是“五·一六”骨干，什么是一般成员，什么是受蒙蔽的群众，这个问题也不是那么容易分清楚的。现在有个说法，有了组织才是罪行，没有组织就是思潮，“组织定性论”，这是片面的。有组织的也好，没有组织的也好，思潮是思潮，罪行还是罪行。并不是说有组织就是罪行，没有组织的就是思潮，并不是那样。

当前运动进入到一个深挖罪行，查阴谋阶段，这个阶段是关键性的阶段，如果这个阶段突破了，难题就解决了。如果这些阴谋搞不出来，难题就解决不了。当前大部分单位进到这个阶段，表面的，明目张胆的那些活动基本上查清了。主要是那些幕后策划的，搞阴谋的那些。

清查“五·一六”是清队的一部分。清查“五·一六”是挖隐藏的反革命，不是挖漏网的走资派。

这个“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他们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军乱军，在七、八月份有三起重大的反革命事件，一个是破坏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夺外交部的权，火烧英国代办处；第二是围困中南海；第三是揪军内一小撮。他们在这三个方面互相呼应，配合得很好。这都是在七八月份搞的，并不是偶然的。同志们可以想想，当时，他们攻击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有策划的，尤其是针对敬爱的周总理、康生和江青同志。

他们为制造围困中南海的反革命事件大造舆论，开始首先就搞政治陷害，在湖南有一个反革命分子造了谣言，现在正在查，所谓 007 密令事件，其实是造谣，完全是为了制造舆论。说是哪一天拣了个什么条，条上写着湖南省军区那一天发生政变，说这条上的字迹象总理的。这家伙就跑到北京来告状，“小小老百姓”打电话叫刘志坚接见了，并通过刘志坚对他说：“你们这样关心国家大事很好，中央正在注意这个问题。”这个物证已经拿到手了。这些反革命分子回去以后，利用这个就立刻掀起反无产阶级司令部，反总理的妖风。以后就是利用揪陶铸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后来就是利用反“二月逆流”还是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一直是升级的。他们配合的很好，策划的很周密，因此，这也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

单从围困中南海来说，他的起因也不是很简单的。起因是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引起的。“八·一”团开始是极右，是保刘少奇的，后来跑到极“左”，怕人家说他是老保、右倾。

对于他们揪“刘少奇”，总理亲自向他们传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可是传达以后，“揪刘”不仅没有降级，反而升级了，这个问题就不简单了，肯定有幕后操纵者，不然为什么总理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以后，不是降级而是升级呢？这是什么问题呢？他们阴谋目的就在于欺骗蒙蔽群众，戚本禹交出刘贼的认罪书，单独交给“新八·一”，不是在两派“揪刘”的时候。“老八一”有点孤立，揪了揪不行，它就回去了。刘贼七月九日的认罪书交给了“新八·一”，就是一个大阴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老八·一”马上杀回来了，当时声势不是低了，而是升级了，策划了绝食。戚本禹亲自前往绝食现场慰问，以后又策划了贾建被打一事，送到反帝医院住院，戚本禹又亲自打电话叫医院接受，这个阴谋策划的很周密，但是贾建究竟是谁打的，是他自己还是别人，弄不清楚。事情发生以后，戚本禹直接给他打电话，并派王道明、焦玉山去问候，这样，就把绝食逐步升级了，以后，戚本禹在“老八·一”和“新八·一”之间进行了操纵，他们都参加了“揪刘”，这是他们的策划。当然，这是从整个围困中南海的反革命事件来看的。两派还是对立的。天派和地派几乎要发生武斗。八月四日晚上进行了反革命阴谋活动，现在来看，实际上他们配合的很好，特别是“八·五”行动，开会的时间都差不多，策划人内容也基本上是一致的，看起来，这个反革命事件是联系着的，他的反革命策划手法是很高的。

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一日，陈伟关于清查“五·一六”运动的讲话
关于十三号文件的精神，

（一）“四抓”：一是抓罪行；二是抓重大案件；三是抓阴谋；四是抓重点。

（二）搞好几个区分：第一，区分是非。第二，要区分极“左”思潮犯错误与“五·一六”的罪行。第三区分正当的工作关系，还是反革命的勾结。第四区分“五·一六”骨干、一般成员和受蒙蔽的群众。

怎样认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

1. 他们为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首先一条就是煽动极“左”思潮，提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革命口号，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破坏运动的发展和秩序。他们为了抢劫国家机密档案，他们就煽动机密要掌握在“左派手里”，还把抢档案改成是“保护档案”。他们叫嚷“对保密要进行阶级分析”，“对造反派无密可保”，他们就是采取这些手段来抢档案的。

他们为了破坏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他们大力宣扬“义和团”、“红灯照”。以前的“义和团”、“红灯照”是排外主义，见洋人就杀，这是毛主席已经批判过的，对外国人要进行阶级分析，不能一概排斥。他们为了破坏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就大力宣扬“义和团”、“红灯照”，还说“今天的红卫兵就是过去的‘红灯照’”，煽动极“左”思潮，他们还讲“红卫兵要管外交”，“二十几岁的人可以当部长”等等，煽动极“左”思潮。

2. 第二个阴谋就是用制造谣言的办法来欺骗人民群众。

他们制造所谓“新文革和旧政府的矛盾”，还造谣说“中央常委有分歧”，什么“三比四”、“四比三”等等。这些谣言是他们造出来的，是为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

他们还制造了所谓湖南“007号密令文件”。湖南一个“五·一六”分子赵××六六年十二月份造谣说，他在湖南省军区门前看见一辆摩托车过去了，车过去后，他拾了个纸条，这纸条上写着：命令你部在六七年元旦进行政变。说笔迹像是总理的笔迹。完全是造谣陷害。这些家伙来到北京找“小小老百姓”，“小小老百姓”派刘志坚接见了他们，“小小老百姓”让刘志坚告诉广州军区注意一

下湖南军区。刘志坚还对那些家伙说：“伯达同志说，你们关心国家大事这很好”，“你们反映的问题中央注意了”。就这样煽动起来。“小小老百姓”到外传播谣言，完全是胡说八道。

3. 围困中南海时，“小小老百姓”带着蒯大富、韩爱晶“视察”揪刘帐篷，到帐篷第一句先说你们该回去了，可是第二句就说“你们也真辛苦，你们吃的怎么样，住的怎么样？”“你们还有揪谭震林的任务呀！”这些家伙心领神会，知道这不是叫回去，于是马上把“揪刘少奇”变成了“揪谭震林”、“揪王光美”。

“小小老百姓”还用自己的汽车送韩爱晶、蒯大富到清华园。韩爱晶在汽车上问他：“现在形势怎么样。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象辛亥革命时期一样，人民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而革命果实却被反革命两面派抢去？”“小小老百姓”听了不回答。汽车到清华大学西门时，他两手作揖给他们说：“无限希望，无限前途，无限光明，行百里半九十，你们才走了半里路。”他们心领神会。

“小小老百姓”就是这样在背后耍阴谋，阴一句，阳一句。

4. 他们通过反死人来反活人，如“讨孔”就是搞这些阴谋。他们是为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而煽动“讨伐孔老二”。山东曲阜有个孔庙，是国务院规定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他们污蔑说“国务院是牛鬼蛇神的保护伞”。要把孔庙砸掉，还开了大会，给国务院写抗议信，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相当反动。当时那些家伙还不敢砸国务院立的保护文物的碑，就回来问“小小老百姓”怎么办？

“小小老百姓”回答他们说：明朝以前的可以保护，清朝以后的谁都可以砸。就这样一句话，他们就首先砸了国务院的那块碑。污蔑国务院是牛鬼蛇神的保护伞。他们反死人不是目的，反死人是为了反活人。他们公开说：“讨孔要结合现实，单搞死人就失去了意义。”

5. 再一个他们表面上是反对哪一个同志，大字报上也说要打倒那一个同志，如国家机关工交口表面上是对准先念、陈毅、秋里等这些同志，实际上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现在来看这些家伙，他公开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不敢。如果他要那样做，马上就会把他抓起来。他的手段很狡猾。他们还采取借口整哪一个反革命分子的材料为名，而整某一个领导同志的材料。他们还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些指示列入刘少奇的罪行，通过这种手段搞阴谋。有一些很清楚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而他们硬说是刘邓的，

这是他们的一个反革命手段。当然刘邓的反革命修正本义路线应该反对，但是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列入刘邓的罪行，这就是阴谋。

6. 再一个手法是，表面上打着搞某某的专案的名义，实际上是搞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所谓材料。在卫生部，他们以黄树则专案为幌子，实际上是搞无产阶级司令部。在粮食部有个陈国栋专案，实际上也是搞无产阶级司令部。陈国栋还说这个办法不错，他还支持他们这样搞。在交通部他们以孙大光专案搞无产阶级司令部。

7. 为坏人翻案，这也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阴谋的一部份。最清楚的是为陈里宁翻案，陈里宁这家伙疯狂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反革命分子。但是过去刘少奇、罗瑞卿这些家伙们搞陈里宁，他不是为搞他反对毛主席的那一部分。陈里宁对社会主义对整个共产党那是仇恨在心的，那些坏家伙他们不搞他攻击毛主席的那一部份，专门搞他攻击刘少奇的。戚本禹他们明明知道陈里宁攻击毛主席，但他们硬替他翻案，把他打扮成“新时代的狂人”，到处演黑戏，做黑报告，放他出来，污蔑无产阶级专政的机构，搞打砸抢，还把打砸抢搬上了舞台。他们这样搞，完全是为了造反革命舆论，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

外交部的“五·一六”给冯×翻案，在反革命分子×××操纵下，成立了“反迫害大队”，这些人都是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他们闹着翻案，说“过去都是受迫害的。”

戚本禹还派徐凯跑到北京一个劳改农场去煽动造反，公开地称这些劳改犯为“同志”，说现在你们不快起来造反，今后就翻不了，就石沉大海，永无翻身之日了。那些家伙一听就跳起来围攻军管的同志，军管的同志有的被打伤，好几个月不能上班。

8. 再一手法，他们还从国民党、帝、修、反的反动书刊杂志上收集国民党攻击共产党的材料，从黄色书刊、杂志上收集敌人攻击我们领导同志的材料，来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北图（北京图书馆）事件”就是这样一个反革命事件。

9. 他们对无产阶级司令部采取的一个反革命策略是“清君侧”，就是把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同志一个一个地反掉，把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架空起来。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攻击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他们为了反总理，搞了好多阴谋。他们首先企图把几个副总理一个一个地反掉、搞垮，一直把矛头指向几个副总理。把副总理一个一个反掉了，到机会就反总理，进而架空毛主席和林副主席。

10. 关于反军问题，就是他们对抗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一个部份。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提出一个战略部署，他们就针锋相对地提出一个反动口号。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中央要起草一个文件不准把矛头对准军队，他们一面起草，而一面又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动口号。“揪军内一小撮”这个口号，最早是六七年一月十一日提出来的，是关锋他们提出来的。毛主席说，军队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他们马上把矛头指向军队，说：“军队支左支错了，支持了保守派”，到处冲军区，完全是唱反调。以后，伟大领袖毛主席又在六七年四月二十日发出了要“拥军爱民”的伟大指示，他们又马上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就是最大的拥军”“军队支持造反派是最大的爱民”这里的“造反派”是指他们自己说的。

11. 七、八月份从后，那是两个司令部生死搏斗的时候，中央领导同志讲，是我们党的紧急关头。在这个紧急关头，他们搞了些什么东西？那时发生了三个大的事件。发生的背景，

一个是在国际上，他们想办法故意制造国际紧张局势，破坏我国和周围国家的关系。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提出：对于缅甸的问题我们不怕断交。因为当时缅甸反华。他们却硬迫着和缅甸断交，完全是为了破坏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对港英的斗争毛主席提出不动武，他们就采取谎报军情的办法，说港英当局打死了我们二百多人，实际上以后查大概是一个也没有打死，他们为了策划出兵香港，就设置了“四十八小时”的圈套。那时，今天砸了这个大使馆，明天砸那个大使馆，最后把英国代办处烧了，就是为了制造我国与一些国家的紧张局势。

在北京，把中南海围了三个月，围的水泄不通。

在全国各地“揪军内一小撮”，妄图把军队搞乱。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非常阴险，非常狡猾。中南海他们都围起来，围的水泄不通，党中央、毛主席办公的地方他都可以围，全国各地那个地方他不可以围？“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这些家伙非常凶恶，当然，这主要是指“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不是指一般成员。

12. “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也是采取各种反革命手法，首先是想办法夺，把权力夺到手，夺不到手就打入新生的革命委员会里边去，把革命的领导同志架空起来，如果这个办法再不行，就用“反复旧”这种手法把你反掉、搞乱。

13. 对群众组织的手法，就是想办法制造两派。毛主席说：要搞大联会，他们就对抗说：“不能陶醉于那个”，“《共产党宣言》不是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到现在一百多年了，还没有联合起来。”没有两派他们就想办法制造两派，特别是在接见的时候，王、关、戚这些家伙，就别有用心地问：你们那里有没有两派？人家说没有，他们就说“没有两派的地方运动不深入”。

14. 还有一个手法，他们就是阴一句，阳一句。五月二十七日，“小小老百姓”到计委去看大字报，戚本禹也去了，实际上是去搞反革命活动去了。计委两派群众，一派要打倒余秋里同志，一派要执行中央对余秋里“一批二保”的指示，搞的不可开交。有的家伙就问“小小老百姓”：可以不可以提“打倒余秋里”的口号？他不正面回答，他说：“炮轰余秋里不等于炮轰无产阶级司令部”。戚本禹又加了一句：“炮轰余秋里不等于反总理。”这些家伙没有得到明确的指示。所以等他们上了汽车又问他，到底能不能这样提？他说：“可以打倒陈伯达。”戚本禹马上煽动说：“他们连余秋里都不敢打倒，他们还敢打倒你？”用这些话来进行煽动。这一下他们就明白了。

现在来看，在围困中南海、“揪军内一小撮”、火烧英国代办处等问题上，真正前台的这些人不是主谋。火烧英国代办处在前台的不是这些人，“反帝反修联络站”，“揪刘”东站和“揪刘”西站第一、二把手都不出来，都在幕后指挥，“五大领袖”也在幕后指挥。“揪军内一小撮”也是这个情况。派到各地的联络站、调查组也是这样。清查大事件重点是搞他的阴谋部份，一些明目张胆的罪行，表面上的东西要搞清，更主要的是谁操纵着干的，主要是把幕后的挖出来。要掌握好政策。

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一日，陈伟在燃料化学工业部专案座谈会上的讲话

蒯大富搞的三十六条“权经”，从这三十六条中可以看出蒯大富等人的反革命野心。

徐凯的十八条。徐凯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这两个东西是“五·一六”的反动纲领。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吴德关于“批清”运动部分的讲话

“批清”运动我们已经进行了一年多了，应该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运动中某些单位也有些问题，但总的来说运动是健康的，这么大的运动，有一百多万人参加，经过群众议，摆、查，揭发出有“五·一六”嫌疑有五万七八千人，触动的有一万四五千，办各种学习班的包括留宿的，走读的三四千人，根据大家报的重点人七百多人。

总的讲成绩是很大的，但是现在又发现一些单位是不是面宽了一点，因此，我曾经讲过一次，战线太长，要集中力量找重点的问题，我可能讲的不清楚，就是要抓住重点，甩开那些受蒙蔽的，把那些没有罪行的先放一放，不是“五·一六”不要抓，是要把重点案件抓一抓。我们的条件很好，现在全国都在抓“五·一六”，搞协同作战，在毛主席亲切关怀下，不断得到中央的帮助。全国抓“五·一六”的形势很好，北京地区又是重点。

第六建筑公司四营共有职工 1052 人，在一段时间里 20 几天，搞出“五·一六”嫌疑 283 人，占职工总数 27%，占在职干部 43%，占党员 28%，占老工人 26%，不少人都“揪斗”了。好一点的“帮促”，搞过揪斗、“帮促”的占 60%。

面宽的有的到了 30%、40%、60%，有个单位把一派群众组织都说成是“五·一六”，这不对嘛！现在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我们的面搞大了些，有乱咬乱供的现象，也有逼、供、信，以假乱真，真真假假，真假难辨。我们有的同志对这个问题还没有重视起来，这就不能很好地把“批清”运动深入下去，或者上当搞乱。有的工厂把二分之一的职工都搞成了“五·一六”嫌疑对象，还有的把一派组织 90%列为嫌疑对象，有个人一供就二、三百。清华有个人某年某月，有一天他坐什么车，带什么手枪，去钓鱼台捉谢副总理，进的哪幢楼，谁接待的，怎么进去的，怎么出来的，说得很玄乎，经过研究，认为是假的。给他说“不对”要他推翻。他说是真的。后来问他进去见到了什么，他说进去那里有“钓鱼台”三个字。进门地方恰恰没有。经过很多工作后，他才说交代的是假的。

火烧英代办处是重大的反革命事件，大量事实证明“小老百姓”，王关戚、杨余傅、姚登山、周景芳这些王八蛋们搞的，他们污蔑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说要大干一场，搞了四十八小时的最后通牒，现在查实了，他们操纵了“反帝反修联络站”的坏头头任佩銜。“红联站”这些头头历史很复杂，是周景芳插手管的。拿周景芳来说，他是叛徒、特务，认日本翻译的母亲为干娘，他是带着任务混进革命队伍来的。都是“小小老百姓”、王关戚、杨余傅这伙乌龟王八蛋搞的。还有一个“批陈联络站”，蒙蔽了不少群众，冲砸英代办处，搞打、砸、抢，点了第一把火，但谁派点的，现在还没搞清。我们工代会徐凯、王景瑞这些人也做了些具体希望，这些人都是戚本禹、周景芳安插的。

“围困中南海”是以揪刘为名，向中央施加压力，也是“小小老百姓”王关戚这些人干的。他们提出“谁不让揪刘少奇就揪谁”，大家可以想一想，谁能决定不让刘少奇出来，不单是总理能决定的，这就不难看出，他们把矛头对准谁了。当然围困中南海的不一定都是“五·一六”，有 20 万人，四千多个组织参加，但阴谋策划的是一小撮，多数是受蒙蔽的，是不明真象的。

“揪军内一小撮”实际上也是“小小老百姓”他们搞的，现在查得很清楚了，连“小小老百姓”的手稿也搞到手了。这个问题不是从“七·二〇”才开始的，而是从一月就着手了。一到八月他们通过报刊发表了一百多篇反军文章，说在八月间要掀起总攻击，进入夺军权的阶段，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妄图搞乱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妄图达到篡党篡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日，陈伟在燃料化学部谈清查“五·一六”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谢静宜向毛泽东汇报清查“五·一六”问题时，毛泽东说：“没那么多吧？有的是打击报复打成的吧？”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吴德关于清查“五·一六”的讲话精神

现在是“左”的右的都有，值得注意的是面大了一些，谢静宜同志向主席汇报时，主席说：“没那么多吧？有的是打击报复打成的吧？”

一九七二年四月，吴德关于清查“五·一六”的讲话

围困中南海，参加有的有四千多个组织 20 多万人，现在拟列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重点审查的不过 30 几个人。又如火烧英代办处，参加的一万七千人，现在拟列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审查的不过十几个人。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的谈话

毛：我们这个国家也有人家骂我们，说是整了左派。我们的“左派”是什么一些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

周恩来：头子在班房里。

毛：那些年轻人是受骗的。我们这里早几年天下大乱，你还不知道呢。

班：我听说了一点。

毛：全国各地都打，全面，内战，就是 ALL-ROUND CIVIL WAR。现在好多了。

班：就是自己人之间打内战吗？

毛：两边都发枪，一共发了一百万支枪吧。这一派军队支持这一派，那一派军队支持那一派，打。

周：名义上是抢枪，实际上是送枪。

毛：他们外交部，她们（指王海容、唐闻生）这一派是“右”派，就是保守派，靠边站，弄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班：为什么？

毛：被那些“左”派夺了权。一个半月，权不在我们手里，在那些所谓“左”派的手里。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没有多少问题，几个月过去了，几年过去了，总后台的人现在也过去了，叫林彪。（班夫人点头）坐一架飞机往苏联去，其目的是想见上帝。

班：见上帝？

毛：是啊，摔下来了，见上帝去了。

班：噢，我明白了。（众笑）后来飞机怎么样了？我不大清楚。飞机掉下来了，还是过到苏联去了？

毛：我也不知道。他自己要摔。

贰、本节简论

清查“五·一六”的工作，拖延的时间很长，从一九六七年八月开始，直到一九七二年上半年才基本结束。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各个阶段有不同的特点。

第一阶段：一九六七年的八、九、十月，这时在北京的一些高校发现了一个名为“五·一六兵团”组织，专门进行炮打周恩来的活动。这个组织的少数头头被群众扭送公安机关。

第二个阶段：一九六九年五月至一九七〇年三月，

一九六九年五月，毛泽东批评北京市不抓“五·一六”。

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周恩来说“五·一六”的后台就是王、关、戚。

一九六九年八月，江青说：“五·一六”的后台是杨、傅、余、王、关、戚。

“五·一六”不仅北京有，别的地方也有，一定要搞出来。他们的组织一定要摘掉。

由此以后，北京及全国各地开展了批判极“左”思潮和清查“五·一六”的活动。当时有一部分单位提出：“对‘五·一六’也要一碗水端平。”也有的单位搞得冷冷清清，不发动群众。

一九六九年十月，毛主席指出，不挖“五·一六”就是右倾。

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说：“（“五·一六”）有两个系统：大的以学部为中心，还有外事口、政法口、农林口、工交口、文化口、教育、宣传、民族、统战，军队一个口；还有学校叫小“五·一六”，大专院校以学生为主。

一九七〇年二月，毛泽东说：反革命“五·一六”阴谋集团是一个秘密组织，数量很少，不要乱挖，面不要太宽了。

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通知一方面指出有些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对清查“五·一六”极为抵触，甚至为他们翻案，是完全错误的。另一方面又指出：现在，有些单位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目前有的单位在过去公开的群众组织中也大抓“五·一六”，有的单位七分之一以上的人都被打成“五·一六”分子。

此后几个月，清查工作暂时停顿了一下。

第三阶段：一九七〇年十月至一九七二年上半年

一九七〇年十月二十日，毛泽东指出：“‘五·一六’问题，不能一风吹。”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周恩来多次讲话强调指出：一件事在实践中要反复好多次，才能认识。‘516’问题，又搞又不搞，一会儿说扩大化。今年三·二七发了个指示，又变成一风吹了。运动规律就是这样，几番起伏。这次无论如何要追到底

此后与批陈整风、批林整风相结合，重点在查阴谋活动，而不在于五一六这个组织。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说：我们这个国家也有人家骂我们，说是整了左派。我们的“左派”是什么一些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总后台的人叫林彪。

清查的结果如何呢？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吴德关于“批清”运动讲话：

他说：北京市的运动有一百多万人参加，经过群众议，摆、查，揭发出有“五·一六”嫌疑的人有五万七八千人，触动的有一万四五千，办各种学习班的包括留宿的，走读的三四千人，根据大家报的重点人七百多人。

他说：有好的经验，也有坏的教训。如有搞逼供信的，违犯政策的，也有打死人的，“五·一六”也不应该打死嘛！有的说白天不出活，晚上出活，夜间熬夜搞体罚，搞逼供信，指供、诱供，第六建筑公司四营共有职工 1052 人，在一段时间里 20 几天，搞出“五·一六”嫌疑 283 人，占职工总数 27%，占在职干部 43%，占党员 28%，占老工人 26%，不少人都“揪斗”了。好一点的“帮促”，搞过揪斗、“帮促”的占 60%。面宽的有的到了 30%、40%、60%，有个单位把一

派群众组织都说成是“五·一六”，这不对嘛！审查重点人，重点人说不清楚了，就把职工名单交给他看，他就在上边画圈，一画一二百。有的工厂把二分之一的职工都搞成了“五·一六”嫌疑对象，还有的把一派组织 90%列为嫌疑对象，有个人一供就二、三百。

他们是一小撮，不像我们现在说的那么多，有五六万人，可编一个军。

他说：有些重大案件，可以说，基本查清了。如夺外交部大权，围困中南海，火烧英代办处，揪军内一小撮，夺中央的权，财政部闹得最厉害。为陈里宁翻案。

火烧英代办处是重大的反革命事件，大量事实证明“小老百姓”，王关戚、杨余傅、姚登山、周景芳这些王八蛋们搞的，他们污蔑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说要大干一场，搞了四十八小时的最后通牒，现在查实了，他们操纵了“反帝反修联络站”的坏头头任佩銜。“红联站”这些头头历史很复杂，是周景芳插手管的。拿周景芳来说，他是叛徒、特务，认日本翻译的母亲为干娘，他是带着任务混进革命队伍来的。都是“小小老百姓”、王关戚、杨余傅这伙乌龟王八蛋搞的。还有一个“批陈联络站”，蒙蔽了不少群众，冲砸英代办处，搞打、砸、抢，点了第一把火，但谁派点的，现在还没搞清。我们工代会徐凯、王景瑞这些人也做了些具体工作，这些人都是戚本禹、周景芳安插的。

“围困中南海”是以揪刘为名，向中央施加压力，也是“小小老百姓”王关戚这些人干的。他们提出“谁不让揪刘少奇就揪谁”，大家可以想一想，谁能决定不让刘少奇出来，不单是总理能决定的，这就不难看出，他们把矛头对准谁了。当然围困中南海的不一定都是“五·一六”，有 20 万人，四千多个组织参加，但阴谋策划的是一小撮，多数是受蒙蔽的，是不明真象的。

“揪军内一小撮”实际上也是“小小老百姓”他们搞的，现在查得很清楚了，连“小小老百姓”的手稿也搞到手了。这个问题不是从“七·二〇”才开始的，而是从一月就着手了。一到八月他们通过报刊发表了一百多篇反军文章，说在八月间要掀起总攻击，进入夺军权的阶段，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妄图搞乱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妄图达到篡党篡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但是，历史证明：

第一，从事件来说，“火烧英代办处”、“围困中南海”、“揪军内一小撮”等，是极左的、过火的行动，但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是反革命阴谋活动。

第二，从组织来说，这些行动不是“五一六反革命组织”搞的，而是各种群众组织进行的。

第三，从个人来说，“王关戚”不是反革命分子，不是五一六组织的后台；“杨傅余”也不是反革命分子，不是五一六组织的后台；即便是陈伯达，也没有证据说明他就是这些事件的幕后指使人，是五一六组织的黑后台。

一九六九年以后的清查反革命阴谋活动，真正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分子，如“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大小舰队等等，并没有抓到，反而主要起到了打击革命造反派的作用。

2009年6月8日初稿

2011年12月28日修改

第一章第六节 整党建党

壹、本节概述

一九六七年一月，毛主席提出要修改党章，首先要动员基层党组织参加修改党章，把这个任务首先交给上海的同志。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央、中央文革根据上海同志采取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来修改党章的经验，向全党、全军、全国发出了关于修改党章的通知，发动各个方面特别是基层党组织参加这个工作。这个通知发下去以后，在全国范围内一场波澜壮阔的群众性的修改党章的运动就展开了。全国上下各个地方，凡是有条件的地区、部门、单位都广泛地发动了党内的革命群众进行了热烈的认真的讨论和修改，并且提出了许许多多的修改草案。

中央机关凡是有条件的都起草了一份。组织部起草了一份，中央办公厅起草了一份，党校起草了一份，各省市综合了一下下面的意见，送到中央来的一共一百二十六份。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二中全会各个小组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各式的修改意见。中央文革根据十二中全会的意见写成了党章草案，然后再发下去讨论，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至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二中全会到“九大”以前，又在下面充分的进行了讨论，集中了各方面的意见到中央来，然后中央吸收一些好的意见，经过修改，作为党章（草案）提到“九大”。

一九六九年四月，“九大”各小组又充分地进行了讨论，四月十四日才最后通过。

九大后，各地根据新党章，开展整党建党工作。

一九七〇年二月十一日，北京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关于整党建党的情况报告

- 一、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大学习、大批判，实行开门整党
- 二、提倡斗争哲学，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
- 三、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提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自觉性

一九七〇年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整党建党座谈会的通知

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康生一九七〇年二月五日送审的这个通知稿中说，中央决定于二月下旬召开一次整党建党座谈会，贯彻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有关指示，推广北京六厂二校（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化工三厂、北京南口机车车辆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北郊木材厂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经验，研究“吐故纳新”政策，统一思想，加强领导，进一步搞好整党建党工作。

通知稿中附有中央组织部业务组郭玉峰关于当前各地整党建党情况的报告。

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发出了这个通知。

一九七〇年三月十二日，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工厂整党建党情况报告

从去年七月至十一月进行了整党建党。

- 一、加强党的领导，狠抓两条路线的斗争
- 二、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开门整党
- 三、认真贯彻党的政策，搞好吐故纳新
- 四、建立坚强的党支部，加强领导班子革命化

一九七〇年四月二日，上海国棉十七厂关于整党建党情况的报告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开始进行了整党建党工作。

一九六八年初建立了党的核心小组。

有八千六百三十二名职工，其中党员一千零四十八名。

- （一）充分发动群众，在斗争中整党建党
- （二）整党中始终狠抓思想整顿

- 1, 对广大党员进行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教育。
- 2, 对广大党员进行“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的教育和党的根本任务的教育。
- 3, 对广大党员进行毛主席关于党的学说和新党章的教育。

(三) 搞好吐故纳新, 加强领导班子的建设

- 1, 正确对待“老造反”。
- 2, 正确对待“站错队”的同志。
- 3, 正确对待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志。

对于基层党组织的建立, 我们提出了四个条件: 一, 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比较巩固; 二, 通过清队, 阶级阵线基本清楚; 三, 整党取得了成就, 党员普遍提高了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 密切了党群关系; 四, 在斗争中已经涌现了一些优秀的党员骨干。根据上述条件, 成熟一个, 建立一个, 不成熟的帮助创造条件。

通过整顿, 全厂三十一个支部、七个总支和厂党委, 共有委员一百七十二名, 其中新的占百分之六十九。在三十八个支部和总支书记中, 有二十八名是新干部。

一九七〇年四月十八日, 康生接见出席中央和全军整党建党工作座谈会全体同志时的讲话

“九大”通过的新党章有五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 新党章重新明确规定了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第二个特点, 明确规定了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

第三个特点, 就是概括的阐述了毛主席继承、捍卫和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第四特点, 新党章根据毛主席建党思想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明确了我们党最终的和当前的战斗任务。

最后, 我们这个党章是吸收了国际国内过去党章中的长处, 否定了那些形式主义的东西。

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批发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工厂、上海国棉十七厂整党建党情况的两个报告

毛主席批示：照办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中央和政府各部门的军管会、军代表：

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工厂和上海国棉十七厂整党建党情况的两个报告，写得很好。这两个工厂整党建党的经验，很值得各地参考。请你们把这两个报告及其附件，同伟大领袖毛主席三月十五日批示“照发”的北大宣传队关于斗、批、改经验总结的三个报告，印成小册子，发至县团级党的负责同志参考，并望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进行学习和讨论。

一九七〇年七月，毛泽东对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关于王光美处理意见的报告
的批语

暂时还不宜判刑。一切这类专案，对罪犯都宜调研从严，处理从宽，保护犯人，使他们感觉有出路，以便保存活证据，对将来有利，此事请中央一议。

（注：此件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提供的。）

一九七〇年七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关于整团建团工作的通知及附件

1970.07.12；中发〔1970〕51号

毛主席、林副主席已批阅

中共中央关于整团建团工作的通知

目前全国整党建党运动正在继续深入发展，整团建团工作也要跟上来。各级党组织应该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发出的“还有一个一个团支部，整团的问题，也提出来了”的指示，把整团建团工作提到党的议事日程，加强领导，认真地把共青团组织整顿好，建设好。这对于“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加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加强战备，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整团建团是关系到一亿五千万青年的大事，必须引起各级党的领导同志的充分重视。在整团建团中，一定要突出思想工作，引导团员和青年认真学习

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和青年工作及团的建设的一系列教导，彻底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建团路线，通过三大革命运动把共青团真正建设成为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共青团，建设成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在整党工作已经大体搞好的地方，团的组织应在思想整顿的基础上，恢复团的生活，建立一个好的领导班子，搞好“吐故纳新”，做好组织处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一批先进青年吸收入团。还要逐步地做好超龄团员的离团工作。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及党的核心小组，对目前整团建团进展的情况，应认真进行一次调查研究，对于附件中提到的一些政策性的问题，提出你们的意见。目前应抓紧试点工作，在十一月底前，望各地能向中央提供一至二件典型材料和修改团章的草案，作为中央召开整团建团座谈会的准备。

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对共青团和红卫兵的领导，积极开展团和红卫兵的活动，使共青团和红卫兵组织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带领广大团员、红卫兵、青年，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朝气蓬勃地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充分发挥突击作用。

一九七〇年七月十二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可翻印，但不许张贴，不许广播和登报。）

附件：一九七〇年七月二日，当前整团建团的情况和问题

一九七〇年七月十六日，刘建勋关于整党建党的讲话

一九七〇年十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地方各级党代表大会的通知

《通知》指出：召开地方各级党代表大会，产生新的党委所必须具备的 5 个条件是：一、广大党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大大提高。二、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是巩固的。三、经过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和“一打三反”运动，阶级阵线基本分明。四、绝大多数基层党组织通过整顿，进行了吐故纳新，纯洁了党的队伍，密切了党群关系。五、形成了一个革命的，联系群众的领导核心。

《通知》提出，各地区可以分期分批召开省、地、县各级党代表大会和建立各级党委，在 1971 年 7 月 1 日建党 50 周年之前，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基本上建立起来。

《通知》要求：在各地方各级党的代表大会中，工人、农民、解放军、劳动人民的优秀党员要占绝大多数；妇女党员一般不少于 15-20%；在有少数民族的地方，少数民族党员要有一定的比例。

《通知》最后决定：新的党委成立以后，不另设重叠的办事机构，革命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基本上就是党委会的办事机构。

《通知》发出后，自 11 月 24 日至 1971 年 8 月 18 日，全国 29 个省、市、自治区都先後召开了地方党的代表大会，成立了新的省、市、自治区党委。

一九七一年一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毛主席建党路线的胜利》最近，有一批省、市相继隆重举行了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省委和市委；其它省、市、自治区也正在积极准备召开党的代表大会，选举新党委。

按照新党章的规定，召开的地方各级党代表大会，建立的新党委，具有鲜明的新特点：突出地抓了思想建设；认真地贯彻了民主集中制；体现了老、中、青三结合。

毛主席教导我们：“除了开好代表大会以外，党的各级委员会把自己的领导工作做好，是极为重要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问题。贯彻执行正确的路线，要有正确的作风。要解决路线的问题，作风的问题，各级党组织必须切实地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首位。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八日，刘建勋在河南省各地市领导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整党建党工作，“九大”前的确抓得不好。从指导思想来说，那时候新党章还没有下来。我们的思想没跟上中央的要求。在获嘉开的整党建党现场会，主要是没有强调首先解决领导权问题，没有强调揭现实的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从发展党员来看，我们是十三万，可能占全国第一位，主要问题是有的不够条件，也被发展入党了。所以，“九大”以后，我们基本上又重新整顿。这是一个教训。

当前，我们特别要把打人骂人、打击报复和讲假话、搞浮夸的歪风刹住。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四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共上海市委“关于筹建共青团上海市委的请示报告”

1972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共上海市委《关于筹建共青团上海市委的请示报告》。中央批语要求：各省、市、自治区，经过整团建团，在绝大部分基层团组织建立的基础上，可以建立县、地两级共青团委员会，并着手筹备工作，在条件具备的时候，把省、市、自治区一级的团委建立起来。

中央批语要求，各级党委要加强共青团工作的领导，中央拟成立一个共青团工作小组，负责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协助中央联系和处理各地共青团的工作。

中央批语还指出：全国少年儿童组织统称红小兵，各级共青团组织要加强对红小兵的领导。

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生气勃勃地开展共青团工作》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了，并选举产生了共青团上海市第六届委员会。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共青团代表大会，也即将陆续召开。

当前，批修整风是全党的头等大事。各级团的组织，要动员和组织广大团员、青年，积极投入批修整风的战斗，紧紧抓住刘少奇一类骗子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揭穿他们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从政治上、思想上把他们的修正主义谬论批深批透，准确地划清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界限。

动员和组织广大团员、青年，坚定地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团组织的重要任务。

共青团在紧密配合党的中心工作的同时，必须大力开展适合青年特点的独立工作。

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一日，中共中央转发北京市委、上海市委关于召开工会代表大会的请示报告的批示

中央同意北京市委，上海市委关于召开北京市和上海市工会代表大会的两个请示报告，现转发给你们参考。

当前，各地整顿和健全工会的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批林整风这个纲，进一步深入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要联系工会工作的实际，……准确地划清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界限，促进和加强工人阶级的革命大团结。

整顿工会要以基层为重点，同时积极进行筹备，在工人运动基本上实现革命大联合等条件具备的时候，首先召开省、市、自治区和工业集中的大、中城市的工会代表大会，将省、市、自治区和大、中城市的工会组织建设起来。要坚持工会的阶级性，同时坚持它的群众性，除混入工人队伍的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外，工人群众中包括进步的、中间的和落后的，凡是要求参加工会的，应当让他们参加。既要反对关门主义的倾向，又要谨防阶级敌人混入工人阶级的组织。

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进一步发挥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作用》

北京市工会第六次代表大会和上海市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了，并选举产生了北京市总工会、上海市总工会新的领导机构。在条件具备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工业集中的大中城市，也将相继召开工会代表大会。

贰、本节简论

党的九大以后，开始进行整党工作。

经过试点，一九七〇年在全党普遍推行。

整党着重在对党员进行思想整顿。通过学习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and 建党理论，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建党思想，提高党员觉悟，加强党组织的战斗力的。

通过整顿，绝大多数党员都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清除出党的只是查有实据的叛徒等极少数人。

整党工作完成以后，又接着进行了整顿共青团、整顿工会、妇联等等群众组织有工作。

2009 年 6 月 15 日初稿

2011 年 12 月 28 日修改

第一章第七节 毕业生分配、上山下乡

壹、本节概述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一日，首都中学红代会《中学红代会呼吁书——走彻底革命化道路》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周恩来接见广州各派代表的讲话

上山下乡是毛泽东思想。你们群众内遗留下一些问题未解决，首先是支农青年问题，不尽你们地区有，武汉、上海、南京、长沙也有。有人说上山下乡是黑指示，这一点首先不成立。上山下乡是主席思想，本来我国城乡是畸形发展的，现在要消灭城乡差别，要工农结合，面向农村。我国农村地区辽阔，搞结合在农村的容量比工厂大得多，不能城市的青年都在工厂，农村的青年在农村，这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应该更多的青年走到农村。有一部分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有一部分干部子弟不安心在农村，有些尽管是工人阶级出身的也不安心在农村，因此想利用这个机会返回城市，特别是广州下乡青年还有一个户口保留这是陶铸搞的。现在毕业生还没有完全安排工作，要工作农村是广阔天地，说上山下乡是黑指示的人，本身就是还留恋城市，是受陶铸毒害的。下乡就应安心于农村。当然有的地方生活安排不够好，应该由各机关安排解决。第二个原因我替你们解释一下，是武斗要帮手时，给这些人一点钱粮，就容易出来，夺枪用了他们，当然我不是指责哪个组织，谁有就自己批评了，你们不要指责某些组织，现在搞复课闹革命，按系统、行业大联合，曾经帮助过你们的朋友成了你们的包袱，你们也不好处理，但是都不要指责对方。

现在有人说上山下乡是黑指示，对中央文件挑三挑四，对中央文件怎么能怀疑呢？对中央文件，指示攻击诽谤的人都是错误的。说黑指示的人是有坏人在煽动，也有立场问题。说这种话的人就是错误的，现在广州支农青年有三万人左右，这个统计可能高了一些“10.8”文件下达后，回去一些，少了一点，大概还有一万多。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六日，红中会长沙一中《夺军权》一兵《长沙知识青年运动考察报告》

知青运动的兴起最明显的暴露出引起文化革命的尖锐的社会问题，最实在的显示出文化革命的理论性质。文化革命的引起正如伯达同志所说：“中国社会出现了阶级变动的最新动态”。中国社会形成了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中国现存的政权形式基本上是官僚机构，掌握官僚机构的特权阶层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座山。他们通过城市剥削农村来塞满自己的腰包，他们的高薪就是工农和知青的血汗。广大劳动人民与特权阶层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终于在毛主席的引导下形成文化革命的滚滚洪流。刘少奇所代表的特权阶层，十七年就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加剧了阶级分化。知识青年——农奴阶层的出现就是这分化的明证。知识青年被特权阶层压在社会的最低层，他们是特权阶层的廉价劳动力。他们成年劳动都养不活自己，他们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他们劳动并不是不卖力，为什么养不活自己？是特权阶层通过种种巧妙方法，刮走了他们的血汗。他们看不到自己的前途，他们刚下去是有雄心壮志的，也作了吃苦的精神准备，但是现实呢？插队的就是变为小私有者的前景，办农场的就是养不活自己的生活。最近揭发出来的惊心动魄的事实中甚至有把知识青年当农奴搞变相贩卖。知青阶层和特权阶层的怪胎——联动的那些少爷小姐是我们社会阶级分化的一个最尖锐最鲜明的对照，知识青年处在这种地位，他们对社会矛盾最了解，他们发现刘少奇正在把我们国家往资本主义拉，这种阶级分化现象不就是复辟的暴露吗？因此知青要求推翻压在他们头上的一座大山：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根基——特权阶层官僚机构的统治，这乃是文化大革命暴发的真正原因和直接目的。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六日，首都中学志愿去祖国边疆农村牧场插队的红卫兵战士《志愿上山下乡的革命小将给毛主席的致敬信》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国务院关于社来社去农校学生要求国家统配问题的批复

1968.03.17； [68] 国发文 48 号

江苏省军管会：

三月八日电悉，同意你们处理“社来社去”学生的四项措施。中等农校从公社招生，毕业后回原社、队当社员（即“社来社去”），或统一招生，规定毕业后到农村当社员的办法是正确的，是符合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毛主席号召“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全国农村发展纲要》第二十一条中规定：“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在十二年内，要从具有相当生产经验和一定文化程度的农民中间，为农业合作社培养初级的和中级的技术人员，以适应合作经济发展的需要”。一九六五年一月，毛主席批示“同意照办”的卫生部党组的报告中指出：“这样的学生，可以从城市来，也可以从公社来，回公社去，拿公社工分，不由国家发薪”。因此“社来社去”的毕业生和统一招生规定毕业后到农村去参加生产劳动的学生，就应该一律按办学部门原来的规定到农村去，回原社，队去，当社员，拿公社工分，国家不发工资。

农业学校毕业生到农村当社员，同贫下中农结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关系到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和灭资兴无，移风易俗的大事。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好。各级领导部门和学校，应当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对学生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组织他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以“斗私，批修”为纲，破私立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农村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自己，做出贡献。要教育师生提高革命警惕性，防止阶级敌人，走资派和坏份子的借机捣乱。对于那些打，砸，抢，抓和破坏，盗窃变卖国家财产的指使者，组织者及首要分子，应按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处份。

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日，毛泽东对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报告的批语

总理、伯达同志：

我看这个文件好，可否转发各地参考，请酌定。因毕业生分配是个普遍问题，不仅有大学，且有大量中、小学

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转发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报告的批示

1968.04.04；中发 [68] 54 号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报告很好，特转发给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革命委员会、革筹小组、军管会或军管小组讨论、参考执行。

毛主席指出：“毕业分配是个普遍问题，不仅有大学，且有中小学。”希望各部门、各地方、各单位、各大中小学的领导机关和负责人，按照毛主席这一指示，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对大、中、小学一切学龄已到毕业期限的学生，一律及时地做出适当安排，做好分配工作。

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文件汇编，1966.5-1968.5 [内部参考]》，1968年5月出版，编印者不明）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一九六七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

一，毕业生分配工作，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指示，彻底改变知识分子脱离劳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状况，彻底打破大专院校毕业生一出校门只能分配当干部，不能当工人，农民的旧制度。

在教育战线上，始终贯穿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毛主席的教育路线，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真，陆定一等一夥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是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必须清算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教育路线，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二，毕业生的分配，必须坚持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方针。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

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又说：“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群众相结合”。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七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包括研究生），一般都必须先当普通农民，当普通工人，虚心向工农群众学习，使“知识分子劳动化”，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逐渐树立起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分配当农民的毕业生，由各地区，各部门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安排到解放军，地方和中央部门举办的各种国营农场去。根据国家需要，分配去当中小学教员和担任医疗工作的毕业生，也必须一面工作，一面劳动。

三，大专院校毕业生，都必须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彻底批判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彻底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斗私，批修”，大破个人主义，大破无政府主义，加强全局观点，坚决服从国家分配，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工矿去，到内地去。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要带头当普通农民，当普通工人，带头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做服从国家分配的模范。

一九六七年毕业生，不论分配到全民所有制单位或集体所有制单位，在工资制度未改革之前，其工资暂按原定的标准发给。分配到集体所有制单位的，其工资除了集体经济分配的劳动收入以外，不足原定毕业生工资标准的部份，由国家予以补贴。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分配一部份大专院校毕业生到解放军农场去锻炼的通知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一九六七年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半工半读学校毕业生分配的通知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七日，国务院关于一九六七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工资发放办法的通知

一九六八年七月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今年学校放暑假问题的通知

一九六八年七月五日，军委办事组批发总后勤部《关于接受地方大专院校毕业生到军队农场锻炼问题的报告》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二日，总后勤部关于接收地方大专院校毕业生到军队农场锻炼问题的报告

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大专院校一九六七年毕业生分配工作情况报告

北京市大专院校一九六七年毕业生共有二万二千六百余人，除清华、北大、北航、京工、科技大学因国防机要部门减退一千七百余入，有待重新分配外，其他院校毕业生，都已离开学校，到工农兵当中接受再教育。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一九六八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一九六八年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半工（农）半读学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新华社记者报道：《热烈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兰州武汉大批中学毕业生去农村 许多家长坚决支持子女到农村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光明大道》

兰州市一万八千多名初中、高中毕业生怀着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雄心，最近陆续到农村去安家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武汉市已有两万多名高、初中毕业生陆续奔赴农村安家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红旗》杂志评论员《革命青年的榜样》

向青年同志们推荐本期发表的金训华同志的日记。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成长起来，坚决实践毛主席的教导，决心走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的革命青年一代的心声。

金训华同志是上海市吴淞第二中学一九六八届高中毕业生，出身于工人家庭，原上海市中学红代会常委。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投入了摧毁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激烈战斗。今年五月间，他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带头到黑龙江省逊克县逊河公社双河大队插队落户。今年八月十五日，双河两岸山洪倾泻，金训华为了抢救国家物资，奋战山洪，不幸光荣牺牲。根据金训华同志生前的多次申请，有关党组织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二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家计委“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下乡工作的报告”

《报告》指出，对于知识青年下乡工作，各级党组织和革命委员会必须十分重视，领导干部必须亲自动手一年抓几次，定期派人下去检查。下乡知识青年较多的社、队，可在党政机构领导下，成立由干部、贫下中农、知识青年代表参加的“三结合”小组。各地要抽调干部到知识青年中去，参加劳动锻炼，协助领导。

《报告》还提出，京、津、沪三大城市可在边疆地区试办集体所有制的五七农场，安置知识青年；农场要实行经济核算，采取评工记分的办法，不宜由国家包下来发固定工资。

一九七〇年六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转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应届毕业生的情况报告”

1970年6月26日，中共中央转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应届毕业生的情况报告》。

中央指示要求各地参照这个报告把应届毕业生的工作做好。

《报告》介绍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通过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对毕业生进行鉴定工作的做法，提出对少数犯有严重错误的学生，要重在教育。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要帮助他们继续做到“划、清、站”。对极少数属于敌我矛盾的学生，要“批”字当头，立足于“拉”，执行“发动群众，认真监督，就地改造”的方针。

一九七〇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关于1969至1971年大专院校应届毕业生分配的通知

要求：1969、1970、1971年应届毕业生从本年7月开始分配，一般于7月底前分配完毕。各校要认真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使毕业生服从革命需要，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工矿去，到基层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在三大革命的第一线作出新贡献。其分配办法、工资待遇等，均照1968年分配时的中央有关规定执行。已外迁的大专院校的毕业生，原则上就地分配，不再回到北京和其他大城市。7月18日，国务院又发出《关于外语院校应届毕业生分配办法的通知》，提出具体办法。11月9日，国务院又转发外交部的报告，指出凡在军队农场进行劳动锻炼的1967、1968届及少数1966届毕业生，也予以分配工作。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翻印者未注明

一九七〇年七月九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抓好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要抓紧抓好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最根本的就是要加强政治思想上的领导。

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青年一代的斗争是很激烈的。在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中，必须狠抓阶级斗争。要坚决地打击一小撮拉拢、腐蚀、迫害下乡知识青年的阶级敌人，要有力地抵制城乡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残余势力对下乡知识青年的侵袭和影响，要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彻底肃清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读书做官论”、“下乡镀金论”等反革命修正主义余毒。

为了搞好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省、地、县要有专门班子抓，社、队要有专人管。各级党组织和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干部，都应当亲自动手。要认真总结和及时推广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贫下中农教育知识青年、社队领导下乡知识青年工作等各方面的先进经验。要抓好典型，树立标兵，带动一般。面上的工作，一年要认真地抓几次。城乡之间，有关部门之间，应当密切配合做好下乡知识青年工作。目前，有些地区采取由干部带领知识青年下乡落户的做法，效果很好。这些干部，一面自己参加劳动锻炼，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面协助社、队加强对知识青年的领导，既促进了自身的思想革命化，又带动了知识青年的革命化。这个经验，各地可以推广。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李庆霖给毛泽东的信

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有半年或更多一些日子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 200 来斤，外加 2、300 斤鲜地瓜和 10 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粮了。那 200 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 100 多斤。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轻力壮时期，更是会吃饭的。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去再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其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 1969 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他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

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儿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困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优先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即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的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

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复信

李庆霖同志：

寄上 300 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一九七三年六月十日，中共中央转发李庆霖来信和毛主席的复信

1973.06.10；中发 [1973] 21 号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党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对李庆霖同志的来信作了重要答复。现将毛主席的复信和李庆霖同志写给毛主席的信，印发给你们，请印发至公社、街道以上各级党委，并传达到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广大群众。各级党委要认真学习，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严格检查，加强领导，总结经验，上报中央。

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在开党委扩大会议时，可分出一天时间，宣读学习毛主席的信，并对你们从五月中央工作会议带回去的《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下乡工作中几个问题的解决意见》，以及这次印发给你们参阅的中共福建省委《关于认真学习毛主席给李庆霖同志的信的通知》，进行讨论。准备在六月下半月，

由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各派一人（内有专管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的一人），来中央汇报和统筹解决这一问题。

一九七三年八月四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

1973.08.04； 中发 [1973] 30 号

毛主席已圈阅。

中央同意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报告，现在转发给你们，望认真贯彻执行。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件大事。各级党委要以批林整风为纲，以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教导为指针，层层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纠正不正之风，以极大的热情和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做好这项工作。应组织力量，深入群众，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情况，严格地全面地进行检查，抓紧解决目前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并且总结经验，表扬先进，推动全面。

此件发到公社、街道以上各级党委，传达到城乡广大群众和知识青年。附件发到省、市、自治区党委，望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本地区的具体规划和实施办法下达。

中共中央一九七三年八月四日

（发至县、团级）

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四日，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

在各级党委的领导和贫下中农的关怀下，广大下乡知识青年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做出积极贡献，涌现出大批先进集体和邢燕子、侯隽式的先进人物。他们中间，有从天津市到山西平陆县毛家山插队的三十名青年和一名教师，同贫下中农一起，艰苦奋斗，粮食总产量三年翻了一番。河南光山县孙铁铺公社郑堂青年生产队，在贫下中农协助下，艰苦创业，一年建队，二年自给，三年有贡献，四年粮食总产从七万斤增加到二十万斤，棉花地拉沙改土，

加强管理，使亩产从十斤提高到一百多斤。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某部由知识青年组成的担架连三排，在珍宝岛反击战中，配合边防部队，为保卫祖国领土立了功。在云南勐腊县山寨扎根的上海知识青年朱克家，成为爱尼族人民最喜爱的多面手。河北涿鹿县的插队知识青年程有志，在培育优良品种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在陕西延川县插队的北京知识青年孙立哲，成为能做较大手术的赤脚医生。到黑龙江农村的上海知识青年金训华，为了抢救社会主义财产，光荣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经过实际斗争锻炼，广大下乡知识青年在思想上政治上不断成长，已有五万九千多人入党，八十三万多人入团，十四万多人被选进各级领导班子。更多的人成为各种各样又红又专的人材。

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的有些领导干部，把这项重大战略部署当作临时措施，抓得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不少下乡知识青年生活困难长期得不到解决，培养、教育无人过问。有些领导干部“走后门”，把子女留在城市或者调离农村。一小撮阶级敌人和蜕化变质分子，极力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他们甚至篡夺了个别单位的部分领导权，实行法西斯专政，残害下乡知识青年，而我们有些领导同志对迫害、摧残下乡知识青年的犯罪分子打击不力，有的甚至纵容包庇。

会议讨论和议定了六条统筹解决的办法，并起草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和《一九七三年到一九八〇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初步规划草案》。

一九七三年八月四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

1973.08.04； 中发 [1973] 30 号

毛主席已圈阅。

中央同意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报告，现在转发给你们，望认真贯彻执行。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件大事。各级党委要以批林整风为纲，以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教导为指针，层层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纠正不正之风，以极大的热情和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做好这项工作。应组织力量，深入群众，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情况，严格地全面

地进行检查，抓紧解决目前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并且总结经验，表扬先进，推动全面。

一九七三年八月七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

贰、本节简论

到一九六八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两年多了。小学、中学特别是专科、大学积压下来未事先分配的毕业生已经有三届了。而且，各级革命委员会已经基本建立起来，各单位已经进入了斗、批、改阶段，因此，毕业生的分配工作提上了日程。

毕业生的分配分为两个部分：

一是小学、初中、高中毕业生的分配。由于这个时候大学、中学一般尚未恢复招生，小学毕业生可以升初中，初中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就只能动员他们上山下乡，到农村去参加生产劳动。有的地方规定每户必须有一个子女下乡。实事求是地说，初中毕业的孩子刚刚满十五岁，就远离父母到农村去参加劳动，实在是有点勉为其难了。这些初、高中毕业生到农村，一部分是安排在国营农场，集体的插队落户；一部分是安排在人民公社的生产队单个的插队落户。前者比较易于加强管理，后者就比较疏于管理，出的问题也比较多。

几年以后，有一部分人陆续考取了职业中专或分配到城市的国营单位工作。也有一些人被保送到恢复招生以后的大学学习。

一部分是大学专科、本科的毕业生的分配。这部分学生大部分是分配到国营农场进行劳动。几年以后，陆续分配到了新的工作单位。

知识青年到工农中间去的大方向应该肯定，实施中的经验教训也应当总结。

2009年6月22日初稿

2011 年 12 月 29 日修改

第一章第八节 教育卫生文化等领域的革命

壹、本节概述

一九六八年七月一日，毛泽东关于大学教育改革的谈话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二日，《文汇报》、新华社记者《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

编者按：我们向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向广大的工人、贫下中农、青年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们推荐这个调查报告。这篇报告生动地描写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一个方面即工程技术人员的队伍方面引起的伟大变革，显示了社会主义新事物强大的生命力。这篇报告题名为《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但它同时也提出了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

毛主席最近深刻地指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是我们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战斗纲领。是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全国各级革命委员会，工厂、学校和其它战线上一切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批判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打破旧的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要坚决走毛主席指出的同工农兵结合的道路，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科学研究部门和领导单位，也应当好好读一读这个报告。这对于进一步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科技路线，是一个锐利的武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它在各个方面产生的有深远意义的影响，现在才刚刚显示出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必然为我国新的工业革命准备

条件。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力量，将不断创造出为资产阶级庸人和右倾保守主义者所意想不到的奇迹。奉劝那些患有近视症但还不是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的人们把眼光放远一些，奉劝那些轻视工农、自己以为很了不起的大学生放下架子，迅速赶上亿万革命人民前进的雄伟步伐。

《调查报告：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深刻变化

上海机床厂是著名的生产精密磨床的大厂。全厂拥有工程技术人员六百多人。这支技术队伍由三方面的人员组成：从工人中涌现的技术人员约占百分之四十五；解放后大专院校输送进厂的约占百分之五十；其余是解放前留下来的老技术人员。

第一，无产阶级革命派真正掌握了全厂的领导权，包括技术大权。

第二，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技术路线和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受到了深刻的批判。

第三，工人和技术人员的关系变了。

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

上海机床厂青年技术员（包括三十五岁左右的人）来源于两方面：大专院校历届毕业生（约三百五十人，其中百分之十是研究生和留学生）和工人中提拔的技术人员（约二百五十人，其中少数中间曾派往中等专科学校进修几年）。实践证明，后一部分比前一部分强。一般说，前者落后思想较多，实际工作能力较差；后者思想较前进，实际工作能力较强。

从工厂看教育革命的方向

第一，学校培养的必须是毛主席所指出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决不能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那样，培养那种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工农群众、脱离生产实践的“三脱离”的“精神贵族”。

第二，学校教育一定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第三，应该由基层选拔政治思想好的，具有两三年或四、五年劳动实践经验的初、高中毕业生进入大专院校学习。

第四，从学校出来的大量技术人员应该积极参加革命大批判，组织他们分期分批去当工人，或者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到车间去劳动，帮助他们走上和工人相结合的道路，走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道路。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张春桥在上海机床厂现场会上的讲话
大学今后要从工人、农民中招收学生，高中毕业升大学的路就堵死了。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张春桥在上海教育革命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根本的在于内容而不在于形式。

大学生包括中学生最难了解的是农民，知识分子最难的不是到城市，跟工人转一转还可以，而是到农村跟农民。

（二）不当普通劳动者，搞的还是修正主义。

（三）社会分工的消除，要相当长的时间。

（四）注意调查研究，总结经验。

一九六八年九月三日，毛泽东为发表调查报告《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写的《红旗》杂志编者按

这是上海市的又一个调查报告，现发表，供参考。全国各大、中、小工业城市所属各工厂的工程技术干部情况如何，各理工科高等、中等学校教育革命的情况如何，希望各地革命委员会组织一些人做些典型的调查，报告中央，本刊将择要予以发表。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正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其中必有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以报导，以资鼓励。实在不行的，即所谓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及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民愤很大需要打倒的，只是极少数。就是对于这些人，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上述各项政策，无论对于文科、理科新旧知识分子，都应是如此。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日，《红旗》杂志编辑部《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调查报告》

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就是好
一场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
怎样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

- 1，必须解决由那个阶级掌握领导权的问题。
- 2，理工科大学的学制以二至三年为宜。
- 3，理工科大学还要担负起办好业余技术教育的任务。
- 4，建立一支无产阶级的教师队伍。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日，《红旗》杂志编辑部《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上海市的调查报告》

从“赤脚医生”的成长来看医学院校的教育革命

- (一) 医学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 (二) 医学院校的招生对象主要应是“赤脚医生”和卫生员。
- (三) 坚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八日，新华社报道：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切关怀下 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 这是首都工人阶级领导上层建筑斗、批、改的巨大成果 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决心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认真搞好斗、批、改，完成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

一月二十五日，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宣告诞生。

一九六九年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对江青关于京剧《智取威虎山》改名等问题请示信的批语

牵动太大，至少暂时不要改动戏名和主要人物名字，地名暂时也不宜改动。对小说作者的批评也宜从缓。

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

《通知》的主要内容是：国务院各部门所属的高等院校（包括半工半读、函授学校），设在北京的仍归各有关部门领导；设在外地的，可交由当地省、市、

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领导；与厂矿结合办校的，也可交由厂矿革命委员会领导；设在其它地方的，交由当地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领导。教育部所属的高等院校（包括函授学校），全部交由所在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领导。高等院校在本校所在省、市、自治区以外设有分校或教改机构的，则实行以总校为主、当地革命委员会为辅的双重领导。下放给地方的高等院校，除了为当地培养人才外，还要为国家培养人材，因此，学校的招生和毕业生的分配，都纳入国家计划。

一九七〇年一月，毛泽东在康生转送陈垣来信的报告上的批语
同意。要争取这样的知识分子。

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康生将原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的一封来信转报毛泽东时写道，陈垣原来的秘书和服务员在文化大革命中回校参加运动，陈的生活无人照顾，经与学校商量，已将陈的秘书和服务员派回陈处，故陈来信感谢党中央对他的关怀。陈要将他的书籍及四万元稿费献给党。我们在政治局会议上交换了意见，觉得可写一信对他的这种精神加以鼓励，但向他解释，目前北京图书馆正在进行斗批改，他的书籍文献，暂由他自己保管为好。关于他的稿费，拟说服他自己保留，以照顾他的生活。

毛泽东阅后，写了这个批语。

一九七〇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转发“关于南方十三省、市、区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的通知

1970.01.31；中发〔1970〕2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南方十三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并其他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
现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南方十三省、市、区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转发给你们，中央同意这个报告。伟大领袖毛主席历来十分关怀和重视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曾作过一系列重要指示。为了加强领导，中央同意会议拟定的领导小组成员名单，由张春桥同志担任组长，卫生部军管会副主任谢华同志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徐景贤同志任副组长，重新建立中共中央南方十三省、市、区血防领导小组。

会议制定的关于“南方十三省、市、区消灭血吸虫病工作规划（草案）”，中央认为基本上是可行的，希望南方十三省、市、区积极行动，付之实现，并应将防治丝虫病、钩端螺旋体病也列入这一工作规划（草案）中去。血吸虫病危害和威胁广大人民健康，直接影响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对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从战备观点出发，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斗争为纲，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并且要放手发动群众，打人民战争，要抓紧时机，一鼓作气，连续打它几仗，力争在较短时间内消灭血吸虫病，实现毛主席“送瘟神”的光辉思想。

北方地区的省、市、自治区，可参照南方十三省、市、区防治血吸虫病工作的精神，加强对克山病、大骨节病、布氏杆菌病等地方性疾病的防治工作，要从战备观点出发，抓紧时间，尽快做出成绩。

一九七〇年三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
计划于今年上半年开始招生，两校共招生四千一百名。

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九日，中共中央转发血防领导小组和卫生部军管会“关于丝虫病和钩端螺旋体病的调查报告”的通知

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在二十五年前就教导我们：“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丝虫病和钩端螺旋体病，严重危害广大贫下中农的健康，直接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应当积极进行防治。希望有这两种病的各省、市、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加强党的领导，全面规划，充分发动群众，加强调查研究，总结和推广行之有效的防治经验，以期尽快地控制和消灭这些疾病。

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七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具体意见（修改稿）

一九七〇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关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请示报告的批示

1970.06.27；中发〔1970〕46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军委各总部，各军种、兵种，各大军区、省军区，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军管会，军代表：

中央同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请示报告，现发给你们，供参考，各地在安排招生工作时，可结合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办理。

一九七〇年六月五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姚文元报送的《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和《上海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座谈会纪要》

毛泽东批示：两件均阅，很好。待你回来后，将清华经验与上海纪要，印发政治局各同志看过，并经过讨论修改后，即可发表。此外，文科教改怎么办，上海是否可以找一些人开一次座谈会，请你和春桥同志酌定。

附件一：

一九七〇年五月，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

附件二：

一九七〇年六月二日，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在上海召开了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座谈会。

一九七〇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血防领导小组“关于南方十三省、市、区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进展情况报告”的通知

毛主席批示：照办

现将中央血防领导小组一九七〇年六月三日“关于南方十三省、市、区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进展情况报告”转发给你们。中央同意这个报告。望南方十三省、市、自治区结合各地实际情况，认真落实报告中所提出的四项重要措施。同时，中央并转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九七〇年六月十四日“关于上海贯彻南方十三省、市、区第二次血防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给你们，供参考。

北方地区的省、市、自治区要学习南方十三省、市、自治区对血防工作认真负责的精神，加强对本地区的普遍性和地方性疾病的防治工作，做出成绩，报告中央。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在夏天农忙季节后，要展开一次爱国卫生的群众性运动。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除四害的根本精神，是清洁卫生，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各地讲卫生，除四害、预防疾病的运动必须在城市依靠工厂、矿山、商店、学校、机关和街道的基层组织群众，在农村公社依靠生产队的群众，由领导人员亲自动手，广大群众轮班参加，结合本地实际，在运动中养成重视卫生、持之以恒的好习惯。一年抓几次，久了便会像江西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一样，在全国实现毛主席“送瘟神”的光辉思想。

附件一：

中共中央血防领导小组关于南方十三省、市、区血吸虫病防治工作进展情况报告

附件二：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上海贯彻南方十三省、市、区第二次血防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

一九七〇年七月五日，中共中央关于内部刊物扩大订阅范围的通知

通知决定：对新华社出版的内部刊物《参考资料》、《国际共运参考资料》、《参考消息》，从8月1日起扩大订阅范围。《参考资料》和《国际共运参考资料》扩大发行到省、军级；《参考消息》扩大发行到工矿企业车间和农村生产大队、解放军连队的党支部。

12月6日，中共中央为进一步明确以上3份刊物的订阅范围，再次发出通知，建议凡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省革委会委员及军级党委委员等均可订阅《参考资料》、《国际共运参考资料》、《参考消息》的订阅范围也相应作了调整。

一九七〇年十月三十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接见文化组成员时的讲话

江青：

文化组是在一九七零年三月成立的，因为富治同志病了，总理工作很忙，所以以后就没有找文化组开会。

文化组三月成立以来，做了大量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原因是大家刚凑在一起，有的同志民主集中制注意不够，个人发号施令。今后在吴德、贤权同志领导下，实行群言堂，要搞民主，当然也要集中。八年来很不容易的，我们搞了这么点东西，主席肯定了我们。出现问题要一分为二，要细致。对缺点错误要分析，正确的意见要接受，不正确的意见其中也有好的好心人提的。我这么多年是细致的，不细致是站不住的。文艺关键是树立先进的人物，中间人物大量存在，反动是少数，我们用先进人物改造中间人物。我们对反革命的攻击要顶住。

一九七一年五月七日，《人民日报》编辑部《革命化的必由之路 纪念毛主席发出《五·七指示》五周年》

一九七一年七月二十七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四月十五日到七月三十一日在北京举行。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伟大胜利。

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国务院有关部、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主管教育的同志和一百九十八所高等院校（包括军队系统院校）的代表，共六百三十一人。

会议遵照毛主席关于“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教导，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批修整风。与会同志怀着极大的愤慨，揭发、批判了刘少奇一伙的滔天罪行，批判了他们散布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学习了马、列主义关于教育革命的论述和《毛主席论教育革命》，批判了刘少奇一伙长期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总结了教育领域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这次会议，着重对大学教育革命中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交流了经验，也初步讨论了中小学教育革命的若干问题。

同志们一致认为，这次会开得好。进一步分清了什么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什么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增强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提高了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自觉性。会议将有力地推动教育革命胜利发展。

(一)

会议分析了当前教育战线的形势。一致认为，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教育战线的反革命专政，粉碎了他们长期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夺回了教育战线上被他们窃取的那一部分权力。开始从根本上改变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教育革命发表了一系列新的光辉指示，亲自抓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斗、批、改，为教育革命树立了样板。在毛主席教育革命路线指引下，全国各地工人，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领导广大革命师生，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开展革命大批判，建立三结合的权力机构，清队，整党建党，使斗、批改的群众运动不断深入发展。大学开始招生，出现了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新局面。原来干部和教师到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锻炼，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得到程度不同的提高，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正在成长。全国各地广大群众沿着《五·七指示》的道路，创办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学校，积累了许多生动活泼的经验。毛主席“教育要革命”的伟大思想已经在全党各级领导和广大人民的心坎里生根。崭新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通过各种试验，正在逐步建立和巩固起来。

会议认为，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大好形势，得来不易。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刘少奇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长期斗争取得的胜利。

长期以来，在教育战线上，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教育战线领导权的斗争。这个斗争不是孤立地进行的。它是整个社会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开始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以后，这条战线上的斗争更加尖锐起来。

伟大领袖毛主席历来重视教育战线上的斗争。毛主席不但为我们党制定了各个历史阶段的总路线、总政策，而且制定了一整套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路线和政策，并且亲自领导了教育战线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许多重大斗争。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时期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毛主席并且提出了包括教育在内的整个思想文化战线的任务。解放初期，遵照毛主席关于以老解放区的教育经验为基础，“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主义事业的改革工作”的指示，对旧学校进行了一些改革，办了一些抗大式的学校，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也收到了积极的效果。毛主席发动对电影《武训传》、对《红楼梦研究》、对胡适、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等的批判，在教育战线发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个时期，一贯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刘少奇一伙，在教育方面，提出学校应当“基本照旧”，就是说不要触动国民党的教育制度，又照抄照搬苏联的一套，妄图把中国的教育制度变成封、资、修的混合物，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服务。

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两篇光辉著作，系统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且批驳了刘少奇一伙的修正主义谬论，规定了“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一九五七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斗争的胜利，使教育战线的资产阶级势力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一九五八年，毛主席号召：“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在党的总路线的指引下，掀起了一场教育革命，许多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冲破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压迫和破坏，蓬蓬勃勃地生长出来，但是，由于当时无产阶级对教育部门的领导权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场革命刚刚起来就被刘少奇一伙破坏了。他们诬蔑这场革命是“乱、糟、偏”，疯狂地反攻倒算。一九六一年，又通过制定高教“六十条”，使“教授治校”、“智育第一”、“业务挂帅”等黑货更加系统化，加紧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达到十分猖狂的程度。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及时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更加完整地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这一时期，毛主席对教育革命问题作了一系列指示，并且尖锐地指出：“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才，

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刘少奇一伙竭力封锁、抵制毛主席的指示，利用他们窃取的权力，到处推行资产阶级的“两种教育制度”，妄图继续霸占住教育阵地，对无产阶级专政。

历史事实证明，解放后十七年，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照耀下，教育战线的广大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对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旧教育制度进行了多次抵制和斗争，教育方面，也有一些进步。但是，由于刘少奇一伙网罗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把持教育部门的领导权，疯狂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几乎全是旧的一套。从这些学校出来的学生，有些人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原因大概是：或本人比较好，或教师比较好，或受了家庭、亲戚、朋友的影响，而主要的是受社会的影响）能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有一些人则不能。甚至有的工农子弟，进了大学，受到资产阶级的腐蚀，“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变得同工农兵格格不入。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在教育战线上，这种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的严重现象，引起了全国广大工农兵的强烈不满。一九六六年，毛主席在《五·七指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文化教育阵地开刀，是非常及时的，完全必要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教育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仍然是尖锐、曲折的。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广大红卫兵小将和革命教职工奋起造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造了旧教育制度的反，夺了走资派的权。一小撮阶级敌人不甘心失败，他们极力煽动右的和形“左”实右的反动思潮，疯狂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操纵“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插手学校，挑动武斗，镇压群众运动，造成了学校长期“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的严重局面。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起，在毛主席“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号令下，工人阶级和它的巩固的同盟军贫下中农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长工人、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浩浩荡荡开进学校，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创举。为工人阶级掌握教育阵地的领导权，用毛泽东思想从根本上改造教育阵地创造了条件。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二十二年的斗争充分说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教育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生死斗争的一条重要战线。由于无产阶级还没有自己的宏大的知识分子队伍，而资产阶级在这方面还比较有力量，他们就竭力使学校成为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场所，成为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无产阶级要战胜资产阶级，就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的胜利，使教育战线的形势开始发生根本变化，但是，斗争仍然是长期的，艰巨的。需要我们坚持不懈的努力。谁如果不认识这一点，谁就不可能真正理解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也就不可能坚持地百折不回地把教育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二）

毛主席早在一九五七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就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教导我们：“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要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全体人民，人人都要懂得这个任务，人人都要努力学习。有条件的，要努力学技术，学业务，学理论，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新部队（这个新部队，包含从旧社会过来的真正经过改造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这是历史向我们提出的伟大任务。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部队没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会议认为，造成这个新部队要靠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各个战线上共同努力。但是，应当指出，搞好教育革命，办好大学，使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和革命干部在正确路线领导下得到学习提高的机会，是造成这个新部队的一个重要条件。应当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去深刻地认识办好社会主义大学的重要性，正确处理教育革命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在当前教育革命斗、批、改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必须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方针、政策，着重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这是无产阶级把文化教育阵地牢固地占领下来，用毛泽东思想把它们改造过来，彻底摧毁剥削阶级教育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根本保证。

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就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的。巩固工人阶级在教育阵地的领导权，必须加强党的建设，首先要建立一个思想上、组织上革命化的党委领导班子。现在，有些学校领导班子很不健全，应当加强，特别要注意配备得力的主要领导干部。有些干部缺乏办学经验，又受到资产阶级散布的教育工作“危险”论的毒害，因而不敢大胆领导，这是不对的。没有经验可以从实践中取得经验。无产阶级不能巩固地占领教育阵地才是真正的危险。只要我们“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深刻领会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又能坚持走群众路线，遇事同群众商量，谦虚谨慎，多做调查研究，抓好典型，不断总结经验，我们一定能够逐步学会领导学校工作。党委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要长期留下来，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政治作用。校、系两级领导班子要有宣传队员参加。革委会是党委领导下的权力机构，实行军干群、老中青三结合。要继续认真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充分发挥学校原有革命干部的作用，并大力培养新干部。要加强党对共青团的领导。

领导首先是政治领导，领导工作就是政治工作。要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一切工作中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大力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贯彻两个“决议”，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开展四好连队运动，用毛泽东思想建校育人。

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宣传队要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始终保持无产阶级旺盛的革命意志，防止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应当记取无产阶级派到文教战线去的人，在不长的时间内被资产阶级腐蚀的许多历史教训。要克服“临时”观点，树立牢固占领、彻底改造教育阵地的决心。宣传队员轮换不要频繁。结合进领导班子的要相对稳定，对这一部分人的调动，要经地方上级党委批准。各省、市、自治区要加强对宣传队的统一领导、管理，派出单位要保证宣传队员的质量和一定数量，关心他们的思想、工作和生活。

二、坚持《五·七指示》的道路。毛主席指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在“七·二一”指示中又指出：“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各地的实践证明，毛主席指示的这条道路，是彻底破除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工农兵群众的旧教育制度，把教育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实践紧密结合起来，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正确道路。教育必须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用政治统帅业务，把转变学生的思想放在首位，要坚持以学为主的原则，上好政治课和社会主义文化课，保证教学时间和质量。要把学文和兼学别样结合起来，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工农兵学员在学校过程中仍要参加实践，在实践的基础上着重向理论方面学习。要重视基础理论课教学。反对单纯学理论和轻视理论学习的两种偏向。要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继承抗大的革命传统。

建立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三结合的新体制。教育同三大革命实践结合，应以厂（社）校挂钩为主，多种形式，开门办学。“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医药院校应坚定地把重点面向农村。各级领导和有关单位要统筹规划，组织好厂（社）校挂钩，使学校与社会互相促进。校办工厂（农林院校的农场）应把培养人放在第一位，贯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结合教学和科研，以小型为主，既有一定批量生产，又要搞研究试制。防止贪大求全、片面追求科研生产指标的倾向。各省、市、自治区和有关部门应把校办工厂的供、产、销纳入国家计划，配备一定数量的固定工人，并认真解决劳保福利等问题。要重视实验室的改造和建设，开展科学研究。

遵照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号召，学校要加强战备教育，组织师生学军，进行野营训练，开展民兵活动。发展体育运动。

各地遵照《五·七指示》和“七·二一”指示，已陆续创建了一些厂办工人大学，遵照毛主席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指示信中关于“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分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的教导，在农村创建了一批“五·七”大学或“五·七”学校。这些学校已经多、

快、好、省地为当地培养了一批人材，受到群众欢迎。各省、市、自治区要抓好典型，总结经验，逐步推广。同时要大力办好各种业余教育。

三、要批判资产阶级。教育阵地过去被剥削阶级长期垄断，封、资、修的流毒年深日久，资产阶级的偏见和它的传统势力十分顽固。它渗透到各个学科领域里，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旧体系。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这些旧思想，总是以新的形式顽强地表现出来，阻碍教育革命的深入。因此，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关于“不破不立”的教导，深入持久地批判资产阶级。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开展批修整风，这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要结合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深入批判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所鼓吹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这些反动谬论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理论基础。“全民教育”、“天才教学”、“智育第一”、“洋奴哲学”、“知识私有”、“个人奋斗”、“读书做官”、“读书无用”等等就是它的突出表现。在各个学科的资产阶级理论中，这些谬论更是普遍。这是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精神支柱，只有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神武器把它彻底摧毁，才能为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不断开辟前进的道路。

要加强对革命大批判的领导，深入发动群众，克服那种认为革命大批判搞得“差不多”的思想和“走过场”、“一阵风”的错误倾向。领导要亲自动手，调查研究，紧跟国内外阶级斗争新形势，密切结合教育革命实践，联系师生的思想实际，有计划地开展对资产阶级的批判。要批判右的和极“左”的反动思潮。要重视对各个学科领域中反动思想体系的批判。批判要深入，就要进一步学好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善于对事物进行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

四、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工农兵、革命技术人员和原有教师三结合，建立一支无产阶级教师队伍，是创建社会主义学校的重要任务。

工农兵教师是三结合教师队伍的骨干力量。要采用多种形式广泛吸收工农兵参加教学活动，主要是就地聘请。要从工厂、农村、部队选调一批工农兵和同工农兵结合较好的革命技术人员充实教师队伍，也可以选留工农兵毕业生担任教师。各级领导和有关单位要积极支持选送教师的工作。

对原有教师队伍要继续坚持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原有教师队伍中，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的，是少数；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但是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对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涌现出一批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因此，必须继续抓紧对原有教师的再教育，引导他们走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自觉地改造世界观，着重解决为谁服务和怎样服务的问题。防止只使用不改造和只讲改造不敢使用的两种倾向。要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原有的教师队伍中凡属人民内部矛盾，包括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人，都应重在教育，加以团结和任用。凡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就要严格按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对待，在使用中继续考察、教育和改造。对于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或一批二看，或一批二用，或一批二养，总之，批判思想，给以出路。对顽固坚持反党反社会主义立场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要坚决予以揭露，批倒批臭，作为反面教员，教育群众。对极少数坚决的反革命分子，则应根据党的政策适当处置。

知识分子的问题首先是思想问题。他们在教育革命的实践中暴露出一些旧思想是正常现象，“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要耐心帮助他们纠正错误，继续大胆实践。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科学中的是非问题，要通过讨论和实践去解决。在教育革命中要提倡各种不同意见的讨论，允许不同方案的试验和比较。

要两点论，不要一点论。在注意到一种倾向的时候，也要注意可能掩盖的另一种倾向。在强调对知识分子改造的时候，要注意防止“左”的倾向；在强调团结的时候，要注意防止右的倾向。

要创造条件，让原有教师分期分批到工厂、农村、部队，政治上接受再教育，业务上进行再学习，尽快地适应教育革命的要求。年老体弱的，可分配他们力所能及的工作，需要辞职、退休的，应根据国务院规定妥善安置。

五、工农兵学员是教育革命的生力军。要充分发挥他们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作用。遵照毛主席关于“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

的思想”的教导，工农兵学员要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始终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

要坚决地改革旧的教学方法。学员和教员都要执行毛主席指示，“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是充分发挥工农兵学员的主动性、创造性，还是把学员当敌人那样管起来？是培养一批善于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人，还是培养一批书呆子？这决不是小事。教学方法不改革，一批生动活泼的工农子弟仍然有学用脱节或者啥也没真正学会，身体搞垮了的危险。因此，必须废止注入式，采用启发的、研究的、实验的方法。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练兵运动”，教师应发讲义或讲授提纲，提倡自学。

根据初步的经验，大专院校招生的主要对象是具有二至三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的工农兵，年龄在二十岁左右，身体健康，一般是未婚的，一般应有相应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老工人、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入学，可以根据情况放宽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选拔工农兵学员要严格坚持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坚决反对草率从事和“走后门”。五年以上工龄的工人、或者学制在一年左右的进修班、短训办学员，学习期间工资照发，其他学员发生活费，家庭生活困难的，由原单位给以适当补助。

大学学制暂以二或三年试行，进修班为一年左右。学员毕业后，一般返回原单位、原地区工作；特殊需要的由国家统一分配，待遇由国家另行规定。

六、教材要彻底改革。这是教育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

要积极编写新教材。应当深入实际，学习和总结工农兵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的丰富实践经验和发明创造，使教材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需要。大破唯心论、形而上学，坚持政治和业务、理论和实际的统一。教材内容要少而精，要便于学员自学。

对原来教材要根据不同情况，加以分析、批判、改造，推陈出新。适应选编一些反面材料，供批判用。要办好图书馆。

对改革教材的工作，必须加强组织领导，坚持群众路线，有工农兵参加。教材由各地编写和交流。

七、高等院校调整和管理体制问题。

根据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加强战备的需要，经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有关部门协商，对全国原有高等院校（不包括艺术院校）提出了调整方案，会后继续试行。要逐步改变院校布局不合理状况，撤消专业要慎重。

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多数院校由地方领导；部分院校由地方和中央部门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少数院校由中央部门直接领导。原部属院校下放后，在中央统一计划下，实行以“块块为主”的管理体制。地方党委应加强对学校的一元化领导，中央有关部门应积极协助地方把学校办好，既要反对“条条专政”，又不要撒手不管。充分发挥两个积极性。

八、会议就中小学教育革命中的若干问题作了研究。认为我国中小学教育革命同样取得了很大成绩，形势很好。

为了使学生“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必须全面落实毛主席关于“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的指示。要组织学生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社会主义文化科学知识，保证上文化课的时间，打好基础。要让学生学工、学农、学军，批判资产阶级，参加三大革命运动。青少年正是长身体的时期，要注意他们的身体健康，课程和作业不应太重，生产劳动要安排适当，社会活动也不要搞得过多。

要加强中小学教师队伍的改造和建设。采取多种形式提高原有教师的政治思想和业务水平。教师任务过重的单位，应适当增加公办教师的指标和民办教师的数量。要选调优秀的工农兵担任教师。借调作其他工作的教师应调回。要清除中小学教师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对道德败坏、不宜留校的人，要坚决调出另作处理。

“除了国家办学以外，必须大力提倡群众集体办学”，大力普及教育，扫除文盲。争取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农村普及小学五年教育，有条件的地区，普及七年教育。要采取多种形式办学，把学校办到家门口，让“农民子女就近上学方便”。城市要进一步搞好厂矿、企业和街道办学。民办公助的学校和民办教师，国家补助应是主要的。

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经费要相应增加。今后，国家专拨一定数量的经费，以保证普及农村小学教育，各级计划、财政、教育部门应共同协商，提出分

配方案下发，不得挪用。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和经济困难地区，要特别注意加以帮助。

“学制要缩短”。中小学学制，暂不统一规定，各地可以继续按当地情况进行试验。

九、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是我国普及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一支重要力量，必须认真办好。

十、军队院校的教育革命，根据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结合军队院校的具体情况贯彻执行。

（三）

教育革命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件大事。大、中、小学学生占我国人口的五分之一左右，用毛泽东思想把他们培养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永不变色的百年大计。林副主席在党的“九大”政治报告中说：

“毛主席非常重视这方面的工作，亲自抓典型，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克服某些同志轻视思想文教战线的错误倾向，紧跟毛主席，做持久的艰苦细致的工作。”特别是当前教育革命的斗、批、改，许多问题要在实践过程中逐步解决。各级党委必须重视教育战线的工作。“省、地、县委三级第一书记要管教育，不管教育的现象是不能容许的。”要把教育革命列入党委议事日程，切实地抓好典型，总结经验，解决教育战线上出现的路线和政策问题。教育革命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各条战线，特别是有关部门都要经常关心和积极支持。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当前，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同志们坚定地相信，不管还要克服多少困难，毛主席“教育要革命”的号召一定会完全实现。大家信心百倍，鼓足干劲，决心不辜负毛主席的期望，忠诚党的教育事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一九七一年七月二十七日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原题为：中央批语）

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对《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的批语

1971.08.13；中发 [1971] 44 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中央批语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党的核心小组，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各院校党委，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党的领导小组、核心小组：

中央同意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现发给你们，望各级党委认真讨论执行。

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三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出版工作座谈会的报告”

1971年3月15日至7月22日，国务院召开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全国出版部门和工农兵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议原计划召开两周，因为面临许多复杂问题，延长4个多月才结束。

周恩来于4月12日和6月24日两次接见会议代表，他说：“你们管出版的，要印一些历史书。”“现在书店里中国和外国历史书都没有。不出历史、地理书籍，是个大缺点。”“不讲历史、割断历史怎么行呢？”“否定一切，不分为二，这是极左思潮，不是毛泽东思想。”“那些把书都烧了的，还不是受极左思潮的影响？”《鲁迅全集》封起来干什么？这不是滑稽得很吗！”“一面说青年没书读，一面又不给他们书读，就是不相信青年人能判断。无怪现在没有书读了，这完全是思想垄断，不是社会主义民主。”

座谈会提出了今后两三年内的出版计划，要求各地领导把出版工作列入议事日程，一年抓几次。目前，第一书记应抓一下出版工作。

会议提出：出版部门应当健全各级“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创造条件实行三分之一人员坚持工作，三分之一人员调查研究，三分之一人员下放劳动的“三三制”。

会议期间，毛泽东批示同意了出版口领导小组关于《整理出版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请示报告》。

会议报告提出了关于出版战线的两个估计：文化大革命前的 17 年，出版战线是“反革命专政”，领导权被“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篡夺了。出版队伍中的大多数人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报告要求编辑队伍要“掺沙子”，吸收工农兵参加。

8 月 13 日，中共中央转发了经毛泽东批示同意的国务院《关于出版工作座谈会的报告》。

一九七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在全国试行新广播体操的通知

《通知》说：这套新广播体操由国家体委编操小组编制，中央乐团配曲。全操共有 8 节，做一遍约需 5 分钟时间。新操编出后，在 140 多个单位的 9 万多人中试做和修改，征求了各地和各部门的意见。从 9 月 1 日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各地广播电台将予播送，北京电视台也将举办节目。

一九七二年五月一日，中共中央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

1972.05.01；中发[1972] 19 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目前，高等学校一九七二年春季招生工作正在进行。遵照毛主席关于“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的指示，自一九七零年招生试点以来，招生工作的主流是好的。各级领导对招生工作一般比较重视，注意发动群众，宣传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较好地完成了招生任务，促进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发展。

当前值得认真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各地招生工作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走后门”现象，有些地区和单位情况比较严重。据反映，有少数干部，利用职权，违反规定，采取私留名额，内定名单，指名选送，授意录取，甚至用请客送礼、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将自己、亲属和老上级的子女送进高等学校。有些招生主管部门和负责招生工作的干部，不按党的原则办事，讲私人交情，私送名额，或强令招生人员违章接收不够条件的人入学。这种“走后门”不正之风，严重干扰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破坏教育革命的成果，败坏党的优良作风，损害党群关

系和军民关系，对于这些“走后门”进学校的青年的学习和进步，也是不利的。为了反对特殊化，纠正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的不正之风，现通知如下：

（一）各级领导部门要加强对招生工作的领导，严格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在方法上要切实执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原则。选送学员的地区和单位，要把中央有关招生工作的方针、政策、办法和本地区、本单位的选送名额原原本本告诉群众，发动和依靠群众进行推荐选拔；审批机关要了解群众评议和推荐的情况；学校要认真进行复审，有关领导机关和选送单位要给以支持。

（二）各有关领导部门、选送学员的单位和招生的学校，要按照毛主席批示“同意”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对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规定，采用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办法，对招生工作认真进行一次检查。对检查出违反招生规定的问题，应及时向当地有关党、政、军领导机关反映。各级领导机关要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制止和纠正。今后，如再有干部滥用职权、违反招生规定“走后门”者，除对有关干部进行严肃处理外，也要把学生退回。

（三）对干部子女应和广大工农群众子女一样看待，都要按招生条件办事，即：具有二至三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年龄在二十岁左右，身体健康，一般是未婚的，具有初中以上的文化程度。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进一步做好从部队选调学员入地方高等学校培养工作的通知

自 1970 年以来，部队共选调了 9300 余名基层干部和战士进入地方高等学校学习。

这种做法至 1977 年停止。

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四日，新华社通讯员《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日益深入人心》

“五·七”道路育新人
社会主义企业的主人翁
北京来的好“摩雅”

贰、本节简论

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教育、卫生、文化、艺术、出版等领域里的革命，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很可惜，进入斗批改阶段不久，由于斗争任务转移，领导层的注意力也转移了。加之，有人利用批极左、搞整顿，刮起一阵阵的右倾翻案风。这些领域的革命未能深入开展下去。

这些探索的大方向究竟正确还是错误，需要经过长期的实践反复检验。

三十多年过去了，在这些领域里出现的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后果，广大工农兵群众深受其害，体会最深。身处社会中下层的、正直的有良心的广大知识分子，也逐渐形成了新的认识。

斗争正在进行中。

2009 年 6 月 29 日初稿

2011 年 12 月 29 日修改

第一章第九节 改革旧的规章制度

壹、本节概述

一九六九年六月九日，毛泽东对空军部队技术革新情况报告的批语

看了之后，很感兴趣。对每一具体技术改革说来，称为技术革新就可以了，不必再说技术革命。技术革命指历史上重大技术改革，例如用蒸汽机代替手工，后来又发明电力，现在又发明原子能之类。

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办事组公布总参谋部、总后勤部机关精简整编方案

1969年6月28日，中央军委办事组公布总参谋部、总后勤部机关的精简整编方案：

总参谋部原编15个部、局，除合并或精简的部外，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共中央调查部与总参谋部情报部合并，中央气象局与总参谋部气象局合并，国家测绘总局与总参谋部测绘局合并，这样，总参谋部共设13个部、厅、局。

总后勤部原编13个部、局，调整后为8个部，1个局，另设6个地区性的物资工厂管理局。

同年11月，又公布了总政治部机关的精简整编方案。

这次调整撤并了装备、动员、财务、军需等职能部门，变更了综合、计划、供应的管理体制。

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转军委办事组“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

决定组成全国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周恩来任组长。副组长有黄永胜、谢富治、吴法宪、阎仲川（副总参谋长）。

领导小组在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设一个精干的办事机构，根据小组的意图，负责对全国人民防空工作进行督促检查。

次日，经毛泽东批准。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转发财政部军管会“今年上半年财政收支情况简报”

中共中央转发财政部军管会《今年上半年财政收支情况简报》。《简报》指出，1969年计划财政收支各为570亿元，是根据工业总产值比1966年增长15%，工业生产成本比1966年降低4%的安排确定的。从上半年执行情况看，实际上都没有达到预定指标，财政收入仅完成年度计划的40·8%。估计全年可能少收几十亿元。

《简报》提出，必须抓紧增产节约，加强经济核算，严格财经纪律，增加财政收入，同时压缩财政开支。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五日，国务院、中央军委转发铁道部军管会、交通部军管会、邮电部军管会和解放军通讯兵部《关于邮电体制改革的意见》

《意见》说，电信、邮政从中央到基层都分开，属电信系统的事业、企业单位以及人员、设备统归军队领导。邮电部撤销后，电信部分成立一个电信总局，管理电信业务，归通讯兵部直接领导。邮政部分成立一个邮政总局，管理邮政业务，与铁道部、交通部合并。

省以下各级邮电部门撤销后，电信部分成立电信局，由省军区、军分区、县（市）人武部和各级革命委员会双重领导，以军事部门为主。邮政部分与交通部门合并，实行由省、市、自治区与交通部门的双重领导，以省、市、自治区为主。电信系统归军队领导后，其性质是军队领导下的事业、企业单位，实行半军事化管理。电信总局和省、市、自治区以下的电信、邮政基本建设计划、财政计划、劳动工资计划、物资供应计划等等，从1970年起分别纳入中央和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各项计划。

《意见》提出：交接工作应由上而下，由领导机关到事业、企业单位分批进行。全国电信、邮政分开的工作，于1969年12月1日前完成。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总参测绘局与国家测绘总局合并，国家测绘总局合并后撤销的通知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民航总局“关于进一步改革民航体制和制度的报告”

决定把国家民航总局划归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制。成为空军的组成部分，各项制度按空军执行，各级机构按军队组织序列进行调整，但对外名称不变，仍为国务院直属局。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四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总参军事气象局与中央气象局合并问题的通知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关于成立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的决定

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是直属中央军委负责组织、协调全国国防工业的规划、生产和科研的领导机构。由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邱会作任组长。同时撤销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简称“国防工办”）。

一九七〇年一月四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将农垦部直属橡胶垦区下放地方的通知

一九七〇年二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援外国人员的审查和政治思想工作的通知

一九七〇年三月四日，中共中央批发国务院“关于全国棉花生产会议情况的报告”

一九七〇年四月十三日，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军管会“关于下放工商税收管理权的报告”

报告指出：

一、扩大地方减税、免税的批准权。国营企业、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因生产、经营、价格发生较大变化和国营企业试制新产品，使整个企业发生亏损，按照国

家规定纳税确有困难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革委会批准，可以给予定期的减税、免税照顾，不再报财政部审批。

二、下放对农村人民公社征税的管理权。省、自治区、直辖市革委会可以在全国统一税法的基础上，确定工商统一税的征税范围，采取减税、免税措施，制定简便易行的收税办法。

三、对投机倒把罚款和对个体经济加成征税的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革委会结合具体情况掌握处理。

四、下放城市房地产税、屠宰税、车船使用牌照税、牲畜交易税和集市交易税的管理权。

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二日，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军代表“关于撤销华侨投资公司的报告”

华侨投资公司是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成立的。18年来，在设有投资公司的12个省、市、自治区，共吸收华侨投资5281万美元，支援了祖国经济建设。

一九七〇年六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同意国务院“关于精简合并各部、委、建立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报告”

6月7日，国务院提出《关于国务院各部门建立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报告》。6月22日，中共中央同意了这个报告。

中央批语指出：国务院各部、委革命委员会通过党的核心小组加强对各部、委的一元化领导，认真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重大问题必须经过集体讨论决定。在落实国家计划的工作中，要正确处理中央各部门和地方的关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群众的首创精神。各部、委所属各企业、事业单位，除极少数一时不宜下放外，一般都应下放。下放工作在今年内，应逐步地、分期分批地进行完毕。不要什么事情都统得死死的，要坚决反对“条条专政”。

《报告》提出：

一、将各部、委、直属机构由原来的90个精简、合并为27个。

二、各部、委设立必要的层次少、人员精的办事机构。暂定编制为原有的 18%。

一九七〇年六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转发“冶金部全国重点钢铁企业座谈会纪要”

会议讨论制定 1970 年和“四五”期间的计划任务。确定：1970 年全国产钢 1700 万吨，力争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到 1975 年，产钢 4000 万吨，生产能力达到 5000 万吨，基本建成内地的钢铁基地，并在各经济区建立起比较完整的、不同水平和各有特点的钢铁工业体系。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九日，中共中央转发山东关于全省农村工作会谈的报告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毛泽东关于同意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批语
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藏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指示》。

6 月 11 日，中共西藏自治区革委会核心小组向中共中央呈报《关于实现西藏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请示报告》，提出要在 1971 年实现全自治区人民公社化，同时结合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牧区补划阶级成份，在农区调整阶级政策。

中共中央《指示》认为，西藏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已经出现，要求西藏的各级党组织依靠贫下中农牧，联合中农牧，消灭农奴主、牧主和富农富牧阶级的剥削制度，在两三年内基本实现人民公社化。

《指示》原则同意《请示报告》所提出的西藏地区在完成民主改革的基础上，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人民公社化，并对若干具体问题作出政策规定。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的通知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批准国务院关于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报告

毛主席批示：照发。

国务院关于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报告(草稿)，由各省参加会议的代表带回各地传达讨论和贯彻执行后，证明它能起推动“抓革命，促生产”的作用，并解决了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

中央现正式批准这个报告，望各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参照执行。同时，可根据这一报告，联系到第四个五年农业发展规划的设想，在今年十二月中旬提出一九七一年各省、市、自治区的农业发展计划。

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六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调整民航收费标准的决定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批准国务院关于全国棉花、油料、糖料生产会议的报告

一九七〇年，全国棉花总产量四千六百多万担，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二。花生、油菜籽、芝麻七千万担，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八。糖料三亿一千六百万担，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六。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关于国防工业管理体制的报告》

《报告》决定：对国防工业的管理，实行中央和地方双重领导，国防工厂的管理体制只下到省一级，第四、五机部的工厂全部下放，第三、六机部的工厂部分下放，由大军区国防工业领导小组领导。

一九七一年七月八日，国务院转发卫生部、商业部、燃化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

《报告》提出，1969年、1970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高达26‰左右。为了切实控制人口的盲目增长，根据周恩来的建议，要求在“四·五”期间人口

自然增长率要逐年降低，争取到 1975 年，一般城市降到 10%左右，农村降到 15%以下。原来城乡综合增长率低的不应回升。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四日，国务院关于内迁职工家属安置问题的有关规定

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一日，国务院批准全面调整银行利率

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批复同意国务院“关于 1971 年物价调整方案”

《调整方案》说，为了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决定适当提高部分农副产品的收购价，降低部分支农产品、机械产品的出厂价和销售价。

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实行粮食征购任务一定五年的通知

从 1965 年开始，连续 6 年实行的粮食征购一定三年的政策，对促进农业生产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

《通知》说，从 1971 年起，粮食征购实行一定五年的政策。各省、市、自治区在这个期间内，对有的社队由于国家投资兴修水利后增产幅度较大，或发现少数社队畸轻畸重的，可经过协商作适当调整。

《通知》还对 1971 年至 1975 年粮食征购基数作了调整。由现行的 726 亿斤调整到 765.5 亿斤，增加 39.5 亿斤。各省、市、自治区向下分配任务时，可以在中央确定的征购基数基础上，增加 5%左右的机动数，用以调剂受灾减免，保证完成国家计划。省以下各级不得层层加码。为了保证国家建设和增加储备的需要，在丰收的地区，可以通过协商，向社队适当超购一部分粮食。超购的粮食，继续实行加价奖励的办法，超购加价幅度不得高于统购牌价的 30%。

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关于新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划分阶级成分问题的指示

原则同意两个省、区在没有划过阶级成份或过去虽然划过但没有划清的少数民族地区，参照西藏社会主义改造中执行的原则和政策划分阶级成份。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国务院批转商业部、外贸部、农林部关于发展狩猎生产的报告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国务院关于调整部分工人和工作人员工资的通知
《通知》指出：这次调整工资，主要是考虑 1958 年参加工作的二级工已经工作多年，多数已成为生产骨干，有两三个孩子，每月工资在 40 元左右，生活确有困难。因此，有必要对他们的工资和情况类似人员的工资进行一次调整。

这次调资的范围是，1957 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三级工，1960 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二级工，1966 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一级工和低于一级工的工人，以及与上述工人工作年限相同，工资等级相似的职工。矿山井下主要生产工人的调整范围，可以分别放宽一级。

调整范围内的工人和工作人员，一般都调高一级。对 1957 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二级工、1960 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一级工和低于一级工的工人，可以调高两级。

在这次调整工资中，调高一级的工资级差在 5 元以上的按现行工资标准执行，级差不够 5 元的增加到 5 元，并对这次调级以后的同一级人员，也按调高一级人员的工资额发给工资。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国务院关于改革临时工、轮换工制度的通知
全国共有临时工、轮换工 900 多万人，其中从事常年性生产的约 650 万人，从事临时性、季节性生产的约 250 万人。

《通知》规定，常年性的生产、工作岗位，应该使用固定工，不得再招用临时工。

现在这种岗位上使用的临时工，凡是生产、工作确实需要，本人政治历史清楚，表现较好，年龄和健康状况又适合于继续工作的，经群众评议，领导批准，可以改为固定工。改为固定工后，工资一般暂不变动，少数人工资过高，群众意

见大的，可以适当调整；工资偏低的，按照 1971 年 11 月 30 日国务院发出的调资通知中有关规定调整。上述临时工改为固定工，不包括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的农业临时工。

临时性、季节性的生产、工作岗位，仍须使用临时工。这些临时工在企业工作期间的政治待遇、粮食定量、劳保用品应当和同工种的固定工相同。因工死亡、致残的应按固定工的劳动保险待遇执行。

对于矿山井下的生产工作岗位，从保护工人身体健康出发，可以继续试用轮换工，并应逐步改进。

县办企业的临时工改为固定工，要采取慎重态度，从严掌握，并须经省、市、自治区审查批准。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日，国务院关于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问题的报告

经过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努力，我国钢铁、煤炭、石油等原材料工业大幅度增长，地方小钢铁、小煤矿、小水泥、小化肥、小水电、小机械等“五小”工业得到很快的发展。各行各业加强了对农业的支援。一九七〇年和一九六六年相比，农机产品增加三百多种；耕作机械、排灌机械、加工机械、运输机械等机械化半机械化农机具的产量成倍增长。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县，有了农机修造厂。

十年的奋斗目标，是要在一九八〇年使我国农、林、牧、副、渔的主要作业机械化水平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全国农用拖拉机拥有量达到八十万台左右，手扶拖拉机达到一百五十万台左右。排灌动力达到六千万马力左右。平均每亩施化肥八十市斤左右。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宏伟目标。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
毛主席批示：照发

今年的农业生产，在战胜了旱、涝、风、虫等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又夺得了第十个丰收年。目前，农村的革命和生产形势大好。

一、正确处理集体积累和社员分配的关系。人民公社应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增加积累。但也不要一下子积累过多，“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

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生产发展较快、收入水平较高的社队，经过社员讨论同意，可以适当地多留一些公共积累。

公社、大队一般地不从生产队提取公共积累，如果举办企业、购买农业机械等，在不影响生产队扩大再生产的前提下，经过社员大会讨论同意，也可以从生产队适当提取一部分公共积累。

公积金应该用于扩大再生产，不准用于盖办公室、礼堂、招待所和请客送礼等非生产性的开支。

二、认真搞好粮食分配。中央关于继续实行粮食征购任务一定五年的通知，必须认真贯彻落实。既要保证及时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又要同时安排好社员生活，“绝对不可以购过头粮”。

生产队要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和可能，留足种子和饲料粮。“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集体的储备粮主要用于备战、备荒，不得轻易动用。必须动用时，要由社员大会讨论决定。

口粮的分配办法，一般可采取基本口粮和按劳分工分配粮食相结合的办法，也可以实行大多数社员拥护的其它适当办法。不论实行那种办法，都应做到既有利于调动最大多数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又要确实保证烈属、军属、职工家属和困难户能够吃到一般标准的口粮。社员口粮应当分发到户，由社员自己管理。要教育社员勤俭持家，计划用粮。

要合理安排经济作物集中产区的粮食征购任务或统销指标，坚决保证这些地区的社员口粮不低于邻近产粮区的标准。要合理安排林区、牧区、渔区社员的口粮。

三、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搞好劳动计酬，是按劳分配的依据。在社员劳动计酬上，要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不断提高社员为革命种田的觉悟，不断同资本主义倾向作斗争。当前要注意克服平均主义，应该按照社员的劳动质量和数量，付给合理报酬。

学习大寨劳动管理的办法，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同群众商量，不可硬搬照套。要发动群众认真总结当地好的典型经验，改掉那些限制群众积极性的、繁琐的、不合理的東西，坚持那些为多数群众所欢迎的、简便易行的办法，并不断加以改进和提高。

必须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轻视妇女的封建思想，必须批判。有些地方，“四类分子”在家的男劳力多，他们利用干部、群众的旧思想，煽动搞男女同工不同酬，剥削贫下中农，应特别引起注意，要及时揭发，坚决斗争。

一九七二年一月三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国务院各部门“五·七”干校财务管理 and 经济核算试行办法》

一九七二年一月三十一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复员干部安排工作后工资待遇问题的通知

一九七二年四月，全国清产核资领导小组制定《全国清产核资实施办法（草案）》

一九七二年四月十八日，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恢复建设银行的报告

一九七二年四月十八日，中央军委关于办好教导队，加速轮训部队基层干部的指示

一九七二年五月三十日，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国家建委、财政部关于加强基本建设管理的几项意见

一九七二年六月五日，国务院《关于加强工资基金管理的通知》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日，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农村部联合调查组报告的通知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日，中共中央批转宁夏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的通知

通知中指出，近几年来，在某些同志中间，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对党的民族政策的观念十分单薄，有的甚至发生了严重违反党的民族政策的情况。因此应当对执行民族政策的情况进行一次检查。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二日，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关于增加棉花进口的报告”报告指出，1969年以来，棉花产量大幅度下降，由1968年的4700万担下降到1972年的3900万担。因此每年不得不动用国家库存棉花，使库存纺棉由1968年的4864万担减少到1972年的3213万担。1972年计划生产棉纱1000万件，由于棉花原料供应不足，影响了棉花生产。到年底，国家棉布库存量将比年初减少15亿米。另一方面，国际市场棉花价格下降，对进口有利。因此，报告建议1973年从国外进口700万担棉花。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毛主席批示：照办。

毛主席多次教导我们“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指出，当前国内外形势太好，各级领导同志要谦虚谨慎，不要因为胜利就忘乎所以。

毛主席讲了《明史》《朱升传》的历史故事。明朝建国以前，朱元璋召见一位叫朱升的知识分子，问他在当时形势下应当怎么办。朱升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采纳了他的意见，取得了胜利。根据我们现在所处的国内外大好形势和我们所坚守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立场，毛主席说：我们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毛主席的这一指示，使“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更加具体化了。中央相信，全党同志一定能够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争取更大的胜利。

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

今年粮食产量可达四千八百一十二斤，比去年实报五千零三亿斤，减产一百九十亿斤。购销相抵之后，将出现一个一百三十六亿斤的“窟窿”，除进口三十亿斤外，需要挖库存一百零六亿斤。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一方面是今年农业生产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减产；另一方面是近两年来我们对粮食工作过问

得少了，放松了，在连续十年丰收的大好形势下，思想上麻痹了，忘记了主席必须把粮食抓紧的教导。去年是粮食产量最高的一年，本应当做到收支平衡，略有节余，增加几十亿斤的库存。可是相反，却挖了十四亿斤库存。当时，我们对这一情况有所觉察，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今年问题就更突出了。

粮食上发生的问题，也是国民经济建设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的反映。周总理在今年初就指出，职工人数突破了五千万人，工资支出突破了三百亿元，粮食销量突破了八百亿斤，这“三个突破”，对国民经济各个方面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不注意解决，就会犯错误。对此，我们领会不深，致使“窟窿”越来越大。造成“三个突破”的主要原因，是基本建设战线过长，职工人数增加过多，仅一九七〇、一九七一两年，就增加职工九百八十三万人，超过计划五百零九万人。今年劳动计划是一百万人，但上半年就被突破了。这种情况，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加以纠正，今年底职工人数可能突破五千五百万人，工资支出将达到三百三十七亿元，粮食销量也将突破九百亿斤。

一九七三年，陈永贵在农林部和北京市委举办的报告会上的报告摘要

一九七三年二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批准国务院发出关于口岸工作的情况和改进意见

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日，国务院批转一九七三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纪要

各地革命委员会要加强对体育工作的领导，抓好体育战线的批林整风，认真搞好斗、批、改。要遵照毛主席关于“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教导，从儿童抓起，积极发展群众体育运动，同时加强优秀运动队的建设，改变目前运动员队伍青黄不接的状况，迅速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使体育运动更好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对国家计委《坚持统一计划，整顿财经纪律》的指示

十条的主要内容，即：

(1) 坚持统一计划，搞好综合平衡，主要是中央和省、市、区两级的平衡。反对各行其是。

(2) 不许乱上基本建设项目，不许随意扩大建设规模和增加建设内容。

(3) 职工总数、工资总额以及物价的控制权属于中央，任何地区、部门和个人无权擅自增加和改变。企业、事业单位的劳动力都要服从中央和省市区的统一调度。

(4) 严格执行物资分配计划和订货合同，保证物资调得动，不准随意中断协作关系。申请物资，不准弄虚作假，虚报冒领。

(5) 加强资金管理，严禁拖欠、挪用税收和利润，不准用银行贷款和企业流动资金搞基本建设。

(6) 中央下放的大中型企业，由省、市、区或少数省属市管理，不能再层层下放。

(7) 按照“鞍钢宪法”的原则，整顿企业。

(8) 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9) 加强纪律性，纠正不正之风。对于违反纪律的行为，要给予批评教育。违法乱纪的，要按照党纪国法给予处分和制裁。

(10) 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一元化领导，加强各级经济领导机构，经济工作要越做越细。

总理说：

六九年以后，经济管理瞎指挥来了。南昌把飞机厂最好的工人下放了。景德镇陶瓷厂给炸了。林彪一伙直接破坏到“九·一三”，影响到七三年。恶果暴露出来了。一定要批透，把破坏性挡住。九大以后，林彪一伙破坏计划的材料，搞他一本，大家批判嘛。

一九七三年三月六日，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调整测绘、气象、邮电部门体制问题的请示”

请示说，自 1969 年底，国家测绘总局和中央气象局、电信总局、邮电总局等部门统由军事部门领导之后，对开展业务工作和对外交往带来许多不便利。邮

电、电信分开，增加了机构和人员，工作也不便利。为此，各地都要求改变这种体制。

建议：将测绘、气象部门分开，国务院和总参分别设立测绘气象机构；邮电部分从交通部划出来，电信与邮政合并，恢复邮电部。地方各级测绘、气象、邮电体制，也做相应调整。

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三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调整测绘部门体制的通知

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三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调整气象部门体制的通知

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三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调整邮电部门体制的通知

一九七三年五月三十日，国务院转发外交部关于加强地方旅游机构的请示报告

一九七三年八月十九日，李先念华国锋余秋里在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日，中共中央批准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成立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的通知”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制止年终突击花钱的通知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七日，中央军委转发“关于全军恢复和增建 41 所院校的报告”

贰、本节简论

严格地说，作为斗批改阶段的改革规章制度的工作，还没有真正起步。

2009 年 7 月 6 日初稿

2011 年 12 月 30 日修改

第二章 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

第一节 一九七〇年的新形势新任务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〇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

我们要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群众运动，同斗、批、改各项工作结合起来。要紧紧抓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任务落实到各个基层。要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肃清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要在思想文化领域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清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在政治领域中按照党的政策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加强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的专政；在经济领域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有步骤地打击资产阶级的腐蚀和破坏。要把教育、科研、文艺、新闻、卫生等方面的革命坚持下去，深入下去，取得新的成果和新的经验。

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基础上，要抓紧整党建党。

随着斗、批、改的深入发展，一个工农业生产的新高潮正在出现。

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全世界人民一定要百倍提高革命警惕！全中国人民一定要百倍提高革命警惕！我们要从精神上、物质上作好充分准备。

一九七〇年三月五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报告

毛主席、中央：

北大宣传队“发动群众总结经验，团结起来落实政策”、“关于清理和改造阶级敌人的情况报告”、“整党建党的情况报告”都很好。这是八三四一支左部队进入北大后，对该校斗批改三个阶段的经验总结。这些经验，对北京市的斗批改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现送上，请阅示。

一九七〇年三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批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送来的北大宣传队关于斗、批、改经验总结的三个报告

毛主席批示：照发。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中央和政府各部门的军管会或军代表：

现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送来的北大宣传队关于斗、批、改经验总结的三个报告发给你们。这几个报告写的都很好。请你们转发至中央、省、市、自治区管理的直属厂矿企业、事业革委会负责同志和驻大专院校军宣队、工宣队负责人。要他们仔细地阅读。要求他们联系本地区、本单位（特别是那些老大难单位）的实际情况，好好想一想：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实现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等一系列最新指示，是不是认真地、坚决地贯彻执行了；今后应当怎样认真搞好斗、批、改，更好地进一步全面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认真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缺点，争取更大的胜利。

一九七〇年四月一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沿着“九大”指引的航向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

在“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运动继续有步履地发展。毛主席提出的斗、批、改各个阶级的任务和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正

在一个一个地区、一个一个单位地落实。革命大批判在各个领域向纵深发展。清理阶级队伍的斗争，分明了阶级阵线，打击了一小撮阶级敌人。伟大的整党建党工作，使党组织更加纯洁、更加巩固、更加朝气蓬勃。数百万干部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同工农兵结合，深刻地改变着社会面貌。具有无限生命力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在我国辽阔的土地上到处涌现。在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伟大方针指引下，我国工农业生产欣欣向荣，一个国民经济的新高涨正在到来。

联系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好好想一想：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实现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等一系列最新指示，是不是认真地、坚决地、不折不扣地照办了；今后应当怎样认真搞好斗、批、改，更好地进一步全面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完成“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认真总结经验，发扬成绩，找出差距，制定措施，争取更大的胜利。

一九七〇年四月三日，毛泽东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送审稿的批语

此文写得较好，已看过，另一篇待看。用这一篇似乎就够了，可用两报一刊的名义。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東西。不要写这类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有用的话，不至于引起反感的话，保留了几段，并未全删。以上请酌。

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纪念伟大列宁诞生一百周年》

一、列宁主义的旗帜是不可战胜的

二、无产阶级专政是列宁主义的根本问题

三、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的反革命政变

四、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

五、所谓“勃列日涅夫主义”是地地道道的霸权主义

六、苏修大帝国的迷梦

七、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为打倒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而斗争

在纪念伟大列宁诞生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高兴地看到，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正在不断地取得胜利。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力量日益成长壮大。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蓬勃发展。所有受美帝和苏修侵略、控制、干涉、欺负的国家和人民，正在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一个反对美帝和苏修的历史新时期已经开始。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丧钟敲响了。

一九七〇年五月一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勇敢、勤劳、智慧的伟大人民——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

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实现了毛主席提出的“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伟大号召。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东方红》乐曲，传遍全球，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无不为之欢欣鼓舞。

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一丰项成果，是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伟大智慧的又一光辉结晶。

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毛泽东《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正出现一个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新高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及其追随者不断地发动侵略战争，各国人民不断地用革命战争打败侵略者。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美国侵略者在越南、老挝打不赢，阴谋策动朗诺—施里玛达集团的反动政变，悍然出兵柬埔寨，恢复轰炸越南北方，激起了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愤怒反抗。我热烈支持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斗争精神，热烈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的联合声明，热烈支持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领导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成立。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加强团结，互相支援，坚持持久的人民战争，一定能够排除万难，取得彻底胜利。

美帝国主义屠杀外国人，也屠杀本国的白人和黑人。尼克松的法西斯暴行，点燃了美国革命群众运动的熊熊烈火。中国人民坚决支持美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我相信，英勇战斗的美国人民终将得到胜利，而美国的法西斯统治必然失败。

尼克松政府内外交困，国内一片混乱，在世界上非常孤立。抗议美国侵略柬埔寨的群众运动席卷全球。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成立不到十天，就得到近二十个国家的承认。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形势越来越好。东南亚各国人民的革命武装斗争，朝鲜、日本和亚洲各国人民反对美日反动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美以侵略者的斗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北美、欧洲、大洋洲人民的革命斗争，都在蓬勃发展。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

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怕美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各国人民，一有风吹草动，它就惊慌失措。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改造世界观——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八周年》

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转发武汉军区党委抓点情况的报告

中共武汉军区委员会一九七〇年五月十四日给毛泽东、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中央军委报告。

报告说，遵照毛主席“一定要抓好典型”的教导，我们从去年六月开始抓了武重、武锅、武船、武钢机总厂、国棉一厂、二汽、武大等六厂一校。除二汽外，这几个单位都是武汉地区有名的“老大难”单位。抓点前，其中五个工厂斗、批、改搞不下去，生产处于瘫痪状态。军宣队进驻各点后，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坚持政治建厂、建校的道路，宣传、落实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和党中央各项号召，团结、教育了广大革命群众，孤立、打击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群众觉悟空前提高，精神面貌发生了极大变化，改变了这些单位过去“老大难”的面貌。我们的主要做法是：一、常委亲自抓；二、学习、落实北京六厂二校经验；三、总结经验，以点带面；四、建设军宣队。

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六日，周恩来送审中央转发武汉军区党委经验指示稿，指示稿要求各省、市、区党的核心小组和各大军区、省军区党委在阅读武汉军区党委的报告后，把各自的试点经验也写一份总结报告给中央。如未试点，可以参照北京六厂二校和湖北六厂一校的经验，进行试点和点面结合，以利推广。

毛泽东批示：照发。

一九七〇年五月下旬，吴法宪传达毛主席林付主席指示谈当前形势

国内毛主席对三件事情很赞赏。

一个是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毛主席说：“这个会议开得好，廿年来没开过这么好的会。”“这话过去我都讲过，没有听，现在好了，这次会开得好。”

二件是中央发的三个文件：毛主席说：“一打三反搞的好！要注意政策，防止扩大化，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要注意政策，小的只要交待了就行了，能退赔的就赔，退赔实在有困难的可以减免。”

第三件是战备：毛主席说：“半年来，战备搞得很好，不但军民要搞好，还要把民防搞好，要把地下道挖通，要储备粮食药品。”

一九七〇年六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同苏丹政府友好代表团团长马哈古卜谈话纪要（节录）

马哈古卜说，在英国还没有完全从苏丹撤走前，美国又进来了。但是由于人民的团结和斗争，英国的星辰已经落下去了，美国的星辰也要落下去。

毛说，这个世界上怕英国人、怕美国人的很多，这几年慢慢地都不大怕了，并敢于说你们刚才所说的那些话。你们苏丹人民了不起啊！

毛又说，对美国人民和美国的统治者是要分开来看待的。我对美国人民是寄予希望的，就是美国的工人以及其他穷苦的人。他们总有一天要站在你们和我们这个战线的。美国独立时，只有三百多万人口。那时英国有近两千万人口，是全盛时代，可是打了败仗。打了八年啊。还不就是一些比你们现在还要差的武器。你们苏丹有一千四百多万人口。

马哈古卜说，人民已经起来，毛主席的教导在全世界已经传播开了。人们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理解了毛主席的话，懂得真理应当属于自己，所以人民一定会起来。

毛说，中国的经验可以作参考，要结合各国自己的经验。我们也是找外国的经验，结合中国的经验，譬如巴黎公社的经验，十月革命的经验，等等。

毛说，要发展自己的工业和农业。不要依靠外国。可以进口外国技术，利用外国的技术人员帮助你们训练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但是要自己搞。如果没有这个决心，帝国主义还是要整你们的。

马哈古卜感谢中国向苏丹提供友好援助，特别是在谈判中贯穿的友好精神。

毛说，物质援助，要到了手，见了效，那才算数。不到手，工厂没有建立起来，那不能算数。你们自己的工程技术人员、科学家没有培养出来，中国人不撤走，也还不能算数。那末，什么叫帝国主义呢？它就是不帮助人家建设的，它赖着不肯走，那没有办法，只好革命了。

毛说，非洲可沸腾起来了，闹起来了，大闹起来了！半个多世纪了，五十多年，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又培养了反对它的人，另外培养一批走狗拥护它自己。

毛说，美帝国主义、世界人民不喜欢它，美国人民也不喜欢它。这个美帝国主义专门团结那些各国人民认为是不好的人。它喜欢那类人作朋友，我们就喜欢我们这类人。

在讲到帝国主义对非洲民族主义国家施展阴谋活动时，

毛说，帝国主义是要对非洲各国人民的领袖和著名政治家进行暗害阴谋活动的，要提高警惕。

一九七〇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共产党员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九周年》

共产党员必须做到的这五条，归结起来，一个就是忠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个就是相信和依靠群众；一个

就是正确对待自己。要解决这三个问题，最重要的，是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努力争取从思想上完全入党。

一九七〇年八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提高警惕 保卫祖国——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四十三周年》

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要遵照毛主席关于“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伟大教导，保持清醒的头脑，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做好防御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侵略、对付突然袭击的一切准备。

一九七〇年九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农业学大寨》

学大寨，就是要学习大寨大队一贯坚持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一句话，就是要象大寨大队党支部那样，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教育人。这是大寨经验最根本的一条。至于经营管理、生产技术方面的一些具体办法，那是第二位的東西，一定要按照各地的实际情况办事。

把大寨经验迅速推开，必须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为什么有的社、队学大寨学得好？就是因为这些地方彻底批判了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以及形“左”实右的一套黑货，坚决反对了资本主义倾向，有力地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深入进行了清理阶级队伍和整党，打击了一小撮阶级敌人和混入党内的坏人，保证了社、队领导权真正掌握在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人手中。

一九七〇年十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继续革命，乘胜前进——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一周年》

在国内外大好形势下，毛主席亲自主持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总结了党的“九大”以来取得的成就，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各项任务，提出了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建议。这次会议的公报和各项决定，受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正在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决心以实际行动，响应九届二中全会的号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继续完成党的“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

各级党组织、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千头万绪，必须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要认真地活学活用毛主席的哲学著作。要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提高对于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及各项方针政策的自觉性。

我们要继续“认真搞好斗、批、改”。要把“一打三反”运动抓紧，继续有力地打击一小撮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分子。

我们要继续全面地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

我们要认真地完成整党建党任务，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加强党性教育。

一九七〇年十月一日，林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一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六日，中共中央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

1970.11.06；中发〔1970〕60号

一、为了党在目前进行的组织宣传工作，实施统一管理，中央决定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设立中央组织宣传组。

二、中央组织宣传组设组长一人，由康生同志担任，设组员若干人，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同志担任。

三、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新华社总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中央编译局的工作，以及中央划归该组管辖单位的工作。

四、工、青、妇中央一级机构和它们的五·七干校，均划归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

五、中央组织宣传组可设短小精干的联络办公室。

六、中央旧中宣部、政治研究室均取消，归中央办公厅负责管理它们的五·七干校和安置工作。

（此件发至省、军级）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革”十年资料选编》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三日，毛泽东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的一段谈话

我们这几年一直总在一千万吨到一千八百万吨钢之间往来徘徊，徘徊了十年左右，还是上不去。通过这场文化大革命，许多人觉悟了，今后十年有可能上去。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

斯：我经常想给你写信，但我真正写信打扰你还只有这一次。

毛：怎么是打扰呢？上次，一九六五年，我就叫你找我嘛。你早找到我，骂人，我就早让你来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看全面内战，all-round civil war，我也学了这句话了。到处打，分两派，每一个工厂分两派，每一个学校分两派，每一个省分两派，每一个县分两派，每一个部也是这样，外交部就是两派。你不搞这

个东西也不行，一是有反革命，二是有走资派。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

斯：是不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时候？

毛：就是那个时期。一九六七年七月 July 和八月 August 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这一来就好了，他就暴露了，不然谁知道啊？！多数还是好的，有少数人是坏人。这个敌人叫“五·一六”。

斯：有一个问题我还不清楚，即主席对我讲这些，是供公开发表用，还是作为介绍背景材料，还是朋友之间的交谈，还是三者兼而有之。

毛：不供发表。就是作为学者，研究者，研究社会情况，研究将来，研究历史嘛。我看你发表跟周恩来总理的谈话比较好，同我的不要发表。意大利杂志上的这一篇我看了，我是看从外国文翻译成中文的。

斯：你看写得可以不可以？

毛：可以嘛。你的那些什么错误有什么要紧？比如，说我是个人崇拜。你们美国人才是个人崇拜多呢！你们的国都就叫作华盛顿。你们的华盛顿所在的那个地方就叫作哥伦比亚区。

斯：每个州里面还起码都有一个名为华盛顿的市镇。

毛：可讨厌了！

科学上的发明我赞成，比如，达尔文、康德，甚至还有你们美国的科学家，主要是那个研究原始社会的摩根，他的书马克思、恩格斯都非常欢迎。从此才知道有原始社会。

总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你的文章、你的书写出来没有人读你就高兴啦？总要有点个人崇拜，你也有嘛。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

我是不喜欢民主党的，我比较喜欢共和党。我欢迎尼克松上台。为什么呢？他的欺骗性也有，但比较地少一点，你信不信？他跟你来硬的多，来软的也有。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着？但是你美国是没有秘密的，一个总统出国是不可能秘密的。他要到中国来，一定会大吹大擂，就会说其目的就是要拉中国整苏联，所以他现在还不敢这样做。整苏联，现在对美国不利；整中国，对于美国也不利。

你说，我的政策正确，五年之前就决定不出兵，所以尼克松不打中国。我说不是。我们在朝鲜出了一百万兵，名曰志愿军。麦克阿瑟打定主意要轰炸满洲，就是东北，结果杜鲁门就把他撤了。这个麦克阿瑟后头又变成一个和平主义者，你看怪不怪。所以世界上的人就是这么变来变去的。也有不变的，比如我们两个就不变。

我看你这次来访问比较前几次要深。你接触了工厂、农村、学校，这就是研究社会。

斯：现在中国的农业情况很好。

毛：中国的农业还是靠两只手，靠锄头和牛耕种。

斯：这次来，我去看了一些我十年前参观过的公社。这些公社都取得了很大进步。

毛：现在有些进步了，但还很落后，识字的人还不多，女人节育的还不多。

斯：还是很不错，同十年前或五年前相比较。

毛：说有所进步，我赞成：“很大的”，不能讲。要谨慎。

斯：但是现在没有人反对节育了。

毛：你这个人受人欺骗哟！农村里的女人，头一个生了是个女孩，就想个男孩子。第二个生了，又是女孩，又想要男孩子。第三个生了，还是女孩，还想要男孩子。……一共生了九个，都是女孩子，年龄也四十五岁了，只好算了。

斯：是啊，但是现在反对节育的人不多了，年轻人不反对了。

毛：重男轻女。这个风俗要改。我看你们美国可能也是重男轻女，要有一个时间才能改变。

斯：现在美国有一个妇女解放运动，规模很大，她们要求男女完全平等。

毛：你要完全平等，现在不可能。

今天是不分中国人、美国人。我是寄希望于这两国的人民的，寄大的希望于美国人民。第一是亚非拉 [luo，左“口”右“罗”]，第二是欧洲、美洲和大洋洲。

单是美国这个国家就有两亿人口，如果苏联不行，我寄希望于美国人民。美国如果能出现一个领导的党来进行革命，我高兴。美国的产业高于世界各个国家，文化普及。

现在我们的一个政策是不让美国人到中国来，这是不是正确？外交部要研究一下。左、中、右都让来。为什么右派要让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在现时要跟尼克松解决。

他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有发表，守秘密啊！他对于波兰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来当面谈。所以，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做旅行者来谈也行，当做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我看我不会跟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我们也要作自我批评，就是讲我们的错误、缺点了，比如，我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别的我们不作自我批评。

你说中国有很大的进步，我说不然，有所进步。美国革命有进步，我高兴。我对中国的进步不满意，历来不满意。当然，不是说没有进步。三十五年前同现在比较，总进步一点吧，三十五年啊！

那时落后得很，只有八千军队。那时候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都还没有汇合。汇合后招兵买马，在陕甘才闹了两万五千人。我说是走了两万五千里路，剩下两万五千人。但是比长征前的三十万人、几个根据地要强。政策改变了，王明路线被批判了。

斯：有一两件事想跟你探讨一下。第一是尼克松来华的问题，是否可以作这样的理解：目前他来是不现实的，但尼克松来华被认为是理想的。

第二是关于美国人访华的问题，我能作为这个问题中的一个例外，感到格外高兴。

毛：但是你代表不了美国，你不是垄断资本家。

斯：当然，我也刚要这么说。

毛：尼克松要派代表来中国谈判，那是他自己提议的，有文件证明，说愿意在北京或者华盛顿当面谈，不要让我们外交部知道，也不要通过美国国务院。神秘得很，又是提出不要公开，又是说这种消息非常机密。他选举是哪一年？

斯：一九七二年。

毛：一九七二年美国要大选，我看，这年的上半年尼克松可能派人来，他自己不来。要来谈是那个时候。他对那个台湾舍不得，蒋介石还没有死。台湾关他什么事？台湾是杜鲁门、艾奇逊搞成这样的，然后又是一个总统，那个里面他也有一份就是了。然后又是肯尼迪。尼克松当过副总统，他那时跑过台湾。他说台湾有一千多万人。我说亚洲有十二亿人，非洲有三亿人，都在那里造反。

这个世界你看怎么样？

斯：我同意主席说的，是一个控制的问题，一个美国要保持权利的问题。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的人口加起来有十五亿，再加上印尼、日本等，亚洲的人口恐怕超过了世界人口的半数了。日本正在迅速地成为一个工业大国，它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三个工业大国了。拥有如此众多人口的中国，如果在生产能力方面能够赶上日本，那末中国同日本加起来，其生产能力会远远地超过美国和欧洲。

毛：这个要看政策。你们美国的华盛顿一百九十多年前革命的时候，只有三百万人口，但能够打败拥有近三千万人口的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大英帝国。只有几根烂枪，几个游击队，几个民团。华盛顿是个大地主。他生了气了，打游击。这个英国人找不到美国人，而美国人在这个墙角里，那个墙角里，噏！噏！噏！从一七七五年起，打了一年以后，到一七七六年才开了一个十三个州的会议，才正式选举华盛顿为总司令。兵也是稀稀拉拉的，没有多少，财政困难得很，发票子，但是打败了英国人。

你看我们呢？我们，你那时是看到的了。南方的根据地都丢了嘛，只有三万人不到，一块一百五十万人口的地方。噢，还不到呢，因为那时候延安还没有占领呢。蒋介石可厉害了。以后马歇尔帮助他，就是杜鲁门时代。

你看中国人那个时候，稀稀拉拉，只有两万多兵，保安为根据地。这次你又去看了，那时候只有二百户人家。谁想到我们能够占领大陆啊？

斯：你想到了。

毛：想是想啊，但能不能占领还不知道啊。要到占领的那一天才算数嘛。后头日本人又来了。所以我们说尼克松好就是这个道理。那些日本人实在好，中国革命没有日本人帮忙是不行的。这个话我跟一个日本人讲过，此人是资本家，叫作南乡三郎。他总是说：“对不起，侵略你们了。”我说：不，你们帮了大忙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日本天皇。你们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全都起来跟你们作斗争，我们搞了一个百万军队，占领了一亿人口的地方，这不都是你们帮的忙吗？

你们美国有个记者叫卡诺，过去在香港，现在在苏联，他引了这段话，他说美国人很蠢，煽动全世界人民觉悟。

斯：我过去报道过这样一句话，许多人加以引用。

毛：就是要宣传这个。没有蒋介石，日本人，美国人帮助蒋介石，我们就不能胜利。

斯：前几天我见到西哈努克时，西哈努克也曾对我说：尼克松是毛泽东的一位好的代理人。

毛：我喜欢这种人，喜欢世界上最反动的人。我不喜欢什么社会民主党，什么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有它欺骗的一面，西德现在的政府也有它的欺骗性。

斯：尼克松在南亚陷得越深，就越是发动人民起来反对他。

毛：好！尼克松好！我能跟他谈得来，不会吵架。

斯：我不认识尼克松，但如果我见到他的话，是否可以说……

毛：你只说，是好人啊！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这个勃列日涅夫不好，勃兰特也不算怎么好。

斯：我记得你说过：“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

毛：就是啊。什么叫民族啊？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上层、剥削阶级、少数，这一部分人可以讲话，组织政府，但是不能打仗、耕田、在工厂做工。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没有这些人就不能组成民族。

斯：我想向你简单地介绍我的经历，作为背景材料，可能你会感兴趣。……

我的经历在我的这一代人中间可以说是典型的，即一边读书，一边工作。

毛：但是你的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不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我长期也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开头相信孔夫子，后头相信康德的唯心论。什么马克思，根本不知道。我相信华盛顿，相信拿破仑。后头还是蒋介石帮了忙，一九二七年他杀人了。当然，还在一九二一年就搞了七十个知识分子，组织了共产党。共产党组成的时候只有十二个代表，七十个人选举了十二个人当代表。这十二个人中间，牺牲了几个，死掉的几个，不干的几个，反革命的几个，现在只剩下两个，董必武一个，毛泽东一个。

斯：我认为，你强调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很重要的。

毛：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啊，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统治。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开刀。抛掉的就是百分之一、二、三，就让他们在那里，年纪老了，不能干事了，养起来了。其他的都保存，但要跟劳动相结合，逐步逐步来，不要忙，不要强迫，不要强加于人。

那个讲堂上讲课的方法我不赞成。你先生写了讲义，发给学生看嘛。然后，不懂的再去课堂上问先生。学生往往是调皮得很。如果学生出一百个题目，先生能答出五十个就很不错了。剩下那五十个题目怎么办呢？就说：我不懂，跟你们一样。然后大家研究，你们研究，我也研究。然后就说：“下课！”你看，多好啊！我讲课就是这样，不许记笔记。如果想睡觉就打瞌睡，想跑就退席。这个打瞌睡实在好。与其正正经经坐在那里，又听不进去，不如保养精神。

毛：你这个记者才不怎么样呢！何必当个记者呢？写个什么书，出个什么名呢？你那本《西行漫记》是出名的。还有一本什么人写的书可以和你那个《西行漫记》相比的，是一个海员写的，他那时候在广洲上了岸，看到了日本人的侵略。他可能没有到解放区去，叫作什么 Belden（贝尔登）。

斯：噢，对了，我知道那个人，他现在还在。

毛：那个拉提摩尔怎么样了？

斯：他现在也还在，他原来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工作，在麦卡锡时期及以后的时期受到了迫害，现在住在英国。

斯：前两年我到远东来，见到一些学者，中国问题专家，总是问他们中间是否有任何人曾经写过关于《海瑞罢官》一文的分析文章，并指出过该文的双重含义。我没有发现其中有任何一个人当时曾经看出这篇文章有什么意义。因此他们就没有能够预见到要进行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们也没有能够理解它。

毛：就是关于《海瑞罢官》那篇文章击中了我们的敌人的要害。那个时候在北京组织不出文章，说吴晗是个历史学家，碰不得！找了第一个人，不敢写；找了第二个人，也不敢写；又找了第三个人，也是不敢写。后头在上海组织了一个班子，

写作班子，以姚文元为首。文章出来了，北京不登。我那时候在上海，我说：出小册子，看他们怎么办！北京只有一家登了——《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不登。后头全国各地、各省、市都转载了，只有一个省没有登，就是我那个省——湖南。

斯：当时湖南报纸未登，是不是因为刘少奇阻挠？

毛：那还不是。湖南省委的宣传部长右得很。什么宣传部、组织部、省委，统统打烂了。但是不能只看一样事就作结论，湖南省的人物也出来几个了。第一个是湖南省委现在的第一书记华国锋，是老人；第二个是现在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第一把手李瑞山，原来也是湖南省的一个书记；第三个是甘肃省的第二把手胡继宗。

斯：你看中美会不会建交？

毛：中美两国总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我们又没有占领你们那个长岛。

斯：我有一个问题想提出来，即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

毛：那就早 [luo，左“口”右“罗”]，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在那以前，他出的书黑《修养》不触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

斯：是新版吗？

毛：老版。说不要夺取政权，共产党不要夺取政权的。当个共产党不夺取政权干啥啊？！

斯：那末，你是不是在那时感到必须进行一场革命的？

毛：嗯。一九六五年十月就批判《海瑞罢官》。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决定搞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年八月召开了十一中全会，十六条搞出来了。

斯：刘少奇是不是也反对十六条？

毛：他模模糊糊。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出了那张大字报了，他就不得了了。他实际上是坚决反对。

斯：就是《炮打司令部》那张大字报吗？

毛：就是那张。

斯：他也知道他是司令部了。

毛：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 Teacher，Great Leader，Great Supreme Commander，Great 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 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斯：过去是不是有必要这样搞啊？

毛：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

斯：我有时不知道那些搞得很过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

毛：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你们大家要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

斯：听说进城前夕开的一次中央全会上，曾经通过一项决议，禁止用党的领导人名字命名城市、街道、山村等。

毛：这个现在都没有，没有什么用人名来命名的街道、城市、地方，但是他搞另外一种形式，就是标语、画像、石膏像。就是这几年搞的，红卫兵一闹、一冲，他不搞不行，你不搞啊？说你反毛，anti-Mao！你们的尼克松总统不是喜欢 Law and order（法律和秩序）吗？他是喜欢那个 Law（法律），是喜欢那个 order（秩序）

的。我们现在的宪法要有罢工这一条，“四大”的自由之外，还要加上罢工，这样可以整官僚主义，整官僚主义要用这一条。

斯：是不是新的宪法里要写上罢工？

毛：新宪法要写上。

所以我说中国很落后。两个东西，又很先进，又很落后，一个先进，一个落后，在进行斗争。

斯：对于人们所说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须由一位个人把国家的力量人格化。在这个时期，在文化革命中间，必须由毛泽东和他的教导来作为这一切的标志，直至斗争的终止。

毛：这是为了反对刘少奇。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后来是为了反对刘少奇。他们树立蒋介石。我们这边也总要树立一个人啊。树立陈独秀，不行；树立瞿秋白，不行；树立李立三，不行；树立王明，也不行。那怎么办啊？总要树立一个人来打倒王明嘛。王明不打倒，中国革命不能胜利啊。多灾多难啊，我们这个党。

斯：你觉得党现在怎么样？

毛：不怎么样。

斯：是不是好一点了？

毛：好一点，你说好一点我赞成。你说中国怎么怎么好，我不赞成。两个东西在斗，一个进步的，一个落后的。

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口里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人家说，你为什么踢我啊？他又说，我没有踢啊，你看，我的脚不是在这里吗？讲假话。后头就发展到打仗了，开始用长矛，后头用步枪、迫击炮。所以那个时候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的，是真的，武斗。

第二条我很不高兴的，就是捉了俘虏虐待。红军、人民解放军不是这样的，他们优待俘虏。不打，不骂，不搜腰包，发路费回家，不枪毙，军官都不枪毙，将军那样大的军官都没有枪毙嘛。解除武装了嘛，不论是士兵还是军官，是大军官还是小军官，解除了武装嘛，你为什么还要虐待啊？我们历来就立了这个规矩的。所以许多的兵士在我们的感化下，一个星期就过来了，一个星期就参加我们的队伍打仗了。

毛：你回美国去，我希望你作点社会调查研究。对于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资本家、各个阶层作调查，看他们的生活，看他们的情绪。去调查一个工厂，我是说中等工厂，千把人的，用一个星期够了吧？

斯：够了。

毛：如果调查两个工厂也只有两个星期。调查一个农场，一个星期也够了吧？

斯：够了。

毛：调查两个农场也是两个星期。加起来四个星期，也只有一个月嘛。再调查两个学校，一所中学，一所大学，半个月时间。

调查一次也不一定能够真正认识的。第一，别人不一定讲真话。第二，自己对于了解来的情况不一定能够理解得好。这是我几十年搞调查研究的经验。当个知识分子，跟工人、农民谈话很不容易。谁跟你谈啊？他们怕你调查他们的秘密。跟工人、农民交朋友很不容易。你们这些人跟知识分子、小官僚、小资产阶级交朋友比较容易，跟工人、农民交朋友不容易。不信，你试试看嘛。如果你有决心，你就试试看嘛！

毛：你到处跑跑嘛，在美国、欧洲、中国之间到处跑跑。以后你一年三分之一的时间住在美国，三分之一的时间住在欧洲，三分之一时间住在中国，到处都住住，四海为家嘛。

斯：不过我还得要工作呢。

毛：我看研究美国，研究中国，研究欧洲就是工作。

斯：我会努力的，但是结果如何还难说。

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对美国有很大的影响。今天的美国处在更大的动荡之中，主要是因为越南战争引起了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因为今天的青年人受到了比他们的一上辈更为良好的教育，国家的科学也在发展，而行政机构所执行的政策和他们的言谈之间的差距日益被人们所认识，以至于大多数公众对他们所认定的行政机构失去了信任。

毛：就是不讲真话。一个人不讲真话建立不起信任。谁信任你啊？朋友之间也是这样。比如我们三十五年前第一次见面到现在，总没有变嘛，还是没有变嘛，总是以朋友相待嘛。官僚主义是有一点，但是我自己作自我批评嘛。

斯：你们跟俄国的问题打算解决吗？

毛：俄国的问题总也要解决嘛。世界上各国的问题都总是要解决的呀！

斯：那是。

毛：总要双方都愿意才行，只一方愿意不行。

斯：俄国到底要干什么？

毛：不大懂，也搞不清。

斯：俄国是不是怕中国？

毛：中国有啥好怕？！中国的原子弹只有这么大（毛伸出小手指比划），俄国的原子弹有这么大（毛伸出大拇指比划），美国的原子弹有这么大（毛伸出另一只手的大拇指来比划），它们两个加起来有这么大（毛把两个大拇指并在一起），你看。

斯：如果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怕不怕呢？

毛：听说是有点怕。一个人的房子里有几个老鼠，也有点怕，怕老鼠吃掉他的糖果。几个老鼠在房子里钻来钻去，他就睡不着觉，闹得不安宁。有些惊慌失措，比如中国挖防空洞，他们也害怕。这有什么好怕的呢？挖防空洞是防你来嘛，我钻洞嘛，又不打出去。中国批评他们的修正主义，他们也怕。那末是谁先批评我们的呢？这场战争是谁开始打第一枪的呢？他叫我们教条主义，我们叫他修正主义。我们不怕他叫我们教条主义。我们把他批评我们教条主义的文章在我们的报上发表。他们就不敢发表我们批评他的文章，他们就怕。你说我是教条主义，你总有一个理由嘛。教条主义就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嘛，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就要批倒。可是他不。他后头又请古巴代表团来讲和，说是要求停止公开论战。又请罗马尼亚来讲和，要我们停止公开争论。我说不行，要争论一万年。后头柯西金到北京，我见了。我说，你说我们是教条主义，好。但是这个发明者赫鲁晓夫为什么要把他搞掉，要把他整掉呢？你决议上写了的，说他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赫鲁晓夫同志”。为什么这样一个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你们又不要了呢？我想不通。你们不要，我们请他来行不行？请他到北京大学当教授，教那个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又不给。我又说，但是你是总理，你是苏联国家的总理，我们的争论是要进行一万年的，因为看你的面子，我让步。一让一大步，不减少犹可，一减少就是一千年，一让就是一千年啊！他对我说那次谈话的结果不错。

这些俄国人他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许多国家的人，他以为只要他一句话，人家就都会听。谁知道，也有不听的，其中一个就是鄙人。

斯：为了澄清我自己的思想，我想简单地谈谈我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想法。……

毛：你说的那个城乡人民冲突的问题不严重。基本上是修正主义跟反修正主义的问题。要搞修正主义就要跟苏联妥协。

至于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那是当然要发展的，现在还在发展。

中国是贫农多，占百分之六七十，还要加上中农，要团结中农。至于富裕中农，他们每日、每时、每刻都在产生资本主义。这是列宁说的话，不是我们创造的。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农民这么多啊。工人阶级人数不那么多，工人阶级也年轻。工人阶级好也在这里。在你们那些国家，搞革命也比较困难，垄断资本厉害得很，它的宣传机器那么多。中国不同，比如宗教，真正信教的很少。几亿人口里面只有八九十万基督教徒，二三百多万天主教徒，另外有近一千万的回教徒，穆斯林。其他的就信龙王，有病就信，无病就不信，没有小孩子就信，有了小孩子就不信了。

斯：关于文化革命的问题，今天你是不是回答完了呢？

毛：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回答了一部分。你明年再来吧。你如果愿意的话，欢迎你再来。

斯：粮食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毛：过去叫南粮北调，现在各省市逐步在解决。

再一个就是北煤南运，说是湖北、湖南、广东、福建、浙江，还有江苏的南部没有煤炭，所以要从北边运来。现在都有了。就是两个积极性，中央的积极性和地方的积极性，就是要有这两个积极性！让他自己去搞，中央不要包办，你自己去找嘛！结果到处去找，每个公社去找，每个县去找，每个省去找，七找八找都找出来了，找出煤和石油了。所以统统抓在我手里不行啊，我管不了那么多啊！要学你们美国的办法，分到五十个州去。

斯：我这次来，注意到有很大的变化。

毛：就是这个两个积极性，中央一个积极性，地方一个积极性！讲了十几年了，就是不听，有什么办法？现在听了。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要走弯路，就是 S 形。

斯：有时候还要走 O 型，然后再设法冲破这个圈，重新开始。

毛：总而言之，我跟你反复讲的一句话就是，三十五年前到现在，我们两个人的基本关系没有变。我对你不讲假话，我看你对我也是不讲假话的。

贰、本节简论

一九七〇年，在“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运动继续有步履地发展。毛主席提出的斗、批、改各个阶段的任务和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正在一个一个地区、一个一个单位地落实。革命大批判在各个领域向纵深发展：

清理阶级队伍的斗争，分明了阶级阵线，打击了一小撮阶级敌人。

整党建党工作，使党组织更加纯洁、更加巩固、更加朝气蓬勃。

数百万干部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同工农兵结合，深刻地改变着社会面貌。

在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指引下，我国工农业生产欣欣向荣，一个国民经济的新高涨正在到来。

在这个基础上，这年的上半年，毛泽东提出召开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积极着手筹备修改宪法、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筹备选举国家机构领导人等等。

在筹备四届人大的过程中，党的领导层中正在逐渐形成的林彪集团，企图夺取更大的权力，进行着各种活动。一个是关于设国家主席问题，他们打着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的幌子，把支持毛泽东提出的不设国家主席、他不当国家主席的人打成反对毛泽东、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泽东路线的反革命分子。另一个是关于称毛泽东是天才问题，他们打着坚持称毛泽东是天才的幌子，把支持毛泽东提出的删去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的人，打成反对毛泽东、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泽东路线的反革命分子。

一九七〇年八月十三日，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宪法。张春桥提出在宪法序言部分，把“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删去，吴法宪当场尖锐地反驳说：“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丰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发动突然袭击，企图打倒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领导人。毛泽东发现并粉碎了这个阴谋。

一九七〇年第四季度，在继续完成既定的各项工作的基础上，毛泽东在周恩来的协助下，突出地抓住批陈整风，教育干部。并着手考虑解决中美关系问题。

一九七〇年九月九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陈伯达专案组。

一九七〇年九月九日、十二日，周恩来、康生在人民大会堂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

一九七〇年九月十五日，毛泽东的专列抵达武昌。与刘丰谈话。汪东兴把第二次书面检查呈送给毛泽东。

一九七〇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找汪东兴去谈话。

一九七〇年九月十九日，毛泽东路过石家庄，与李雪峰谈话。

一九七〇年九月二十九日，吴法宪第一次写出了书面检讨。

一九七〇年十月十二日，叶群向毛主席交出了第一次书面检讨。

一九七〇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对吴法宪的检讨作了批示：

一九七〇年十月十五日，毛主席看了叶群的检讨，并作了批示：

一九七〇年十月十九日，毛主席对贵州省关于“三支两军”问题的报告作了批示，提出要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六日，中共中央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六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三十八军检举陈伯达反党罪行报告上的批语

2009年7月13日初稿

2011年12月31日修改

第二章第二节 林彪集团逐渐形成

壹、本节概述

一九六七年四月，林彪、叶群把林立果送到空军。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北京部队文艺演出发生“五·一三”事件

空政文工团的演员刘素媛，有机会同毛主席说话，她把为庆祝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25 周年，在京的部队各文工团想**联合**演出的事对毛主席说了。毛对刘说：“你可以找叶群谈谈。”并叫秘书徐业夫给“林办”打招呼，把此事告诉叶群。

叶群报告了林彪，林认为这是一次打击军内造反派的好机会。他反复掂量：主席要军队还是要造反派？他认为：主席要军队，但对打击造反派也不会太高兴。

叶群马上约见刘素媛等人。刘素媛说起她们想搞庆祝《讲话》发表 25 周年的文艺演出，并表示要**联合**各派共同演出。叶群明确表示**不要联合军队内搞造反夺权打砸抢的造反派**，可以联合北京军区、海军、二炮等其它军兵种文工团的革命派组织共同演出。叶群说：“林彪同志和你们的观点是一致的，不要怕当‘老保’，只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就应该大胆地保，要做革命的‘保皇派’嘛！”叶群还说：“军队和地方不同，地方冲击的是刘邓司令部，军队冲击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即使有坏人也不许乱冲击。”

叶群的话等于林彪对军队的大局亮相了。

吴法宪、李作鹏和其他驻京机关的领导得知这次演出得到了林彪的支持，非常振奋。空军、海军、北京军区和各兵种的主要负责人(当时称“三军党委”)除了炮兵外均表示支持，并成立了“三军联合演出委员会”。

造反派得知这一消息，认为这是“老保翻天”，他们联络清华“井冈山”等地方造反派发表声明：如果对方胆敢单方面搞演出，就要冲击演出会场，砸烂会场。

萧华分别给两派群众组织做工作。避免激化矛盾。

演出的时间是 5 月 13 日晚上，地点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海军党委事先开了会，决心一定要打赢这一仗，李作鹏、萧劲光、张秀川还到了现场，空军的余立金也到了现场，卫戍区的傅崇碧带部队也到了现场。造反派则请来了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等地方造反派。

演出开始不久，造反派冲击会场，等到冲进会场有上千人时，李作鹏下命令实行反击，把造反派分割开来。造反派又叫来了千余人，都被击退了。双方受伤有几十人，整个武斗经过了几小时才结束。

周总理、陈伯达、萧华、张秀川都在人民大会堂，他们都同意两派联合演出，给两派头头做工作。

5 月 16 日，杨成武、叶群、吴法宪等人深入海、空军总医院、304 医院慰问被造反派打伤的伤员，赠送毛主席像章，毛主席语录，等于公开表明了打击、压制造反派态度。

6 月 9 日晚，林彪、周恩来、中央碰头会议成员、驻京三军负责人再次观看了一派的演出。

从“五一三事件”之后，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内，除军事博物馆的造反派和后勤学院造反派“星火燎原”之外，各军事机关的造反派受到了严重的打击，纷纷瓦解。部队的造反派除了少数骨干分子转入地下活动以外，公开的活动基本上不存在了。

从此形成了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与林彪、叶群之间的特殊关系。

1970 年 5 月 13 日，叶群建议黄吴李邱同到居庸关长城走一走。

叶群说：“你们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五一三’，两年前如果军队内部反党乱军的打砸抢分子不压下去，军队也会像地方一样乱的不可收拾。现在好了，军队稳住了，才能保住全国的局势。”

李作鹏接着叶群的话说：“三年前的今天，要不是叶主任支持我们，军队反党乱军的打砸抢分子得了逞，军队还不知道会乱成什么样子！？”

叶群就说：“这要感谢毛主席，是主席叫我支持你们的。我们要共同高呼毛主席万岁！”

一九六七年七月，经吴法宪批准，在党办成立了以林立果为组长的“空军党委调查研究小组”，组员有王飞、周宇驰、刘沛丰等人。

这个“调研小组”就是小“联合舰队”的前身。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林彪让叶群去向毛主席报告杨成武的问题。毛主席对杨的事，格外地重视，亲自召开了四次会，反复详细地听汇报，主席感到不拿掉杨成武是不成的了，甚至要影响到和林彪的关系。

毛主席、林彪、周总理、陈伯达、康生等共同决定：对杨成武的问题，事情要说清楚，结论不要做，暂时停止工作。

林彪说：“杨成武下台，是不得已的事。”

事实上是，林彪为了不让“上海帮”涉足军队，决心放弃杨。

林彪之所以“弃杨留吴”是他认为杨不能再留了，这是不准江青插手军队完全必要的做法。林彪认为：，杨成武对他耍了两面派——既归依自己，又讨好江青（不便直接说毛泽东），竟敢以江青来压自己！他是坚决不许军队有江青的代理人的！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黄永胜被任命为总参谋长。

军委办事组以黄永胜为组长，吴法宪为副组长，李作鹏、邱会作等为组员。

这几个人都要通过叶群才能向林彪请求汇报工作。

由此，开始形成了林彪集团。也是林彪所谓的“大舰队”。

同一天，温玉成被任命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不久，也参加了中央文革碰头会。在办事组会议上，温常唱反调，引起黄、吴、李、邱等人不满。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五日，林彪同黄永胜的谈话(吴法宪、邱会作在座)

林彪说：“去年，全军文革垮了，江青几次提议要恢复全军文革，我都没有表态。要恢复全军文革，就会有人插手军队的文化革命，并在军队内部找他们的代理人。中央军委常委的工作一时也难以恢复起来，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谁来管事。叶帅管事，军队喜欢，他们(指中央文革)不喜欢；徐帅管事，他们喜欢，军队不喜欢。只好用办事组来管大事，这是最靠得住的办法。”

一九六八年三月以后，汪东兴多次把有关毛泽东的小道消息送给林彪。

汪东兴还常到三座门找军委办事组的黄、吴、李、邱，有时把他们请到自己的家中密谈。有一次，林立果也去了。

汪东兴说：如果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批判车尔尼雪夫斯基，你们不要表态，因为毛主席没有表态。

林立果说：苏联的司机有什么批头！？

众人大笑。

汪东兴说：张春桥最不是东西，又滑胆子又小，他以为巴结了江青就能接近毛主席。其实，上海一月风暴是毛主席、总理、伯达他们指挥的。张春桥想在上海搞卫星中心，毛主席没有同意。

汪东兴还说：稳定全国的形势就靠军队了。你们几位老总责任在肩啊！九大以后，不怎么提中央文革了。这个江青、张春桥就是念念不忘中央文革，如果张春桥能靠边站，江青也很难有什么搞头！

一九六八年七月，吴法宪、王飞伙同周宇驰，违抗中央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四大”单位暂不发展党员的决定，不履行正式手续，非法把林立果拉入党内。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林彪提出反江青宗派主义

八届十二中全会正在进行的时候，有一次军委办事组在京西宾馆会议楼第三会议室开会，黄永胜、吴法宪先到了，并兴高采烈地说：“……他们不止是一个宗派，是一个帮会，是上海帮。”邱会作、李作鹏看到黄、吴正在说话，两人就向外走。黄即说：“你们两个坐下，不要走。今天可以同你们谈点你们听不到的话。黄永胜接着说：“林总提出了反江青宗派主义。这个问题今后会向你们说清楚的。”

从十二中全会之后，林彪对江青的态度就逐渐变了。林彪同黄永胜、吴法宪说：“我们过去对江青的态度完全是为了党的利益(指江青和主席的特殊关系)，现在看来完全没有这种必要。因为毛主席对待江青就是公事公办的。”“他们几个人(康

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是一个宗派。在适当的时候，提出反宗派主义是很必要的。”

黄、吴、李、邱插话说：“他们几个是上海帮。”

从此之后，军委办事组的人在背后根本不叫他们的名字了，都叫上海帮。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总政恢复办公，李德生任总政主任。

李的任命，是林彪向主席报告得到同意的，目的是为了挡住江青要将张春桥放在总政主任这个位置的企图。林彪说：“李现在同江青还没有更密切的关系，在同他们的斗争中，他至少可以保持中立。将来如果有变化，可以立即搬下来。”

一九六九年初，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过程中，林彪、陈伯达的政治思想立场逐渐表面化。

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主席指定林彪在九大上作政治报告，并指定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协助林彪写出报告稿。

一九六九年二月下旬，林彪召集陈、张、姚三人商量起草报告的事，决定由陈伯达先动笔起草。

林彪与陈伯达就报告稿的标题《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及提纲，进行了讨论。

陈伯达甩掉了张春桥、姚文元，一个人单独起草。

陈伯达在写完第一部分后，把稿子送毛主席审阅，毛主席没有回复。

陈伯达不愿意同张春桥、姚文元合作。但他自己又迟迟拿不出政治报告的全稿，拿出来讨论的只有几部分。

对初稿的第一部分的讨论是由周总理主持的。他以陈伯达延误了时间，并且只拿出第一部分为理由，否定了陈伯达的稿子。

江青说：“中央文革向来是集体领导，为什么起草报告就连屁都不放一个。我认为你陈伯达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江青还说：“稿上子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你搞的是唯生产力论，你是以修正主义的观点起草报告的。”

张春桥、姚文元看后批评说：陈伯达是在鼓吹“唯生产力论”。

毛主席对陈伯达起草的初稿有过批示，陈伯达没有告诉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江青批评陈伯达“封锁毛主席的声音”。

毛主席叫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另外起草政治报告。毛主席把他们几个都找来，讲了有关政治报告的基本思路和框架。还大致讲了讲每段要写些什么。根据毛主席讲的这些，张春桥、姚文元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很快便拿出了初稿。

康生在张春桥、姚文元起草初稿的过程中生病，没有参加讨论，当张春桥和姚文元把初稿拿出来后，康生给林彪打电话说：“我最近生了病，没有直接参加政治报告的起草。春桥、文元写的稿子，我看了一遍。我觉得，作为接班人向‘九大’作的政治报告，这个稿子的份量是不够的。但是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他们就能拿出有一定水平的初稿来，还是不易的。我看它可以作为进一步讨论修改的基础，因为它的基本思路是能站住脚的。”

这个时候，陈伯达赶写的政治报告草稿也拿出了全稿。两个稿子排字清样送给了毛主席和林彪。毛主席认为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稿子大体可用。但要作较大的修改。并对如何修改提出了许多具体意见。而陈伯达起草的那个稿子便被搁置一旁了。

在毛主席主持的讨论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的稿子的会上，陈伯达说：“还是应当搞好生产，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光搞运动，就像伯恩斯坦说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

毛主席当即指出：“‘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又何必这样急呢！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你就要报复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马列主义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你陈伯达的本质也是不会改变的！在延安时期，你脚踏两只船，原来说愿意给我当秘书，后来又说愿意给张闻天当秘书。一九五〇年，你同我到莫斯科，也是脚踏两只船，你没有报告，也没有经过我的批准，就去见苏联领导。是不是看我这条船快要沉了，就赶紧去大抓一把？”

当天晚上，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在中央碰头会上批评了陈伯达。

吴法宪说：“后来在这个九大政治报告起草过程中，林彪始终没有参与一点意见，几次讨论，他都是一言不发，送到他那里去的稿子，他也是一字未改，甚至连标点符号也没有动过一个。报告正式发表以前，张春桥曾经想请林彪签个字，但被林彪拒绝了，张春桥不得已，只好从《〈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里描了一个的签字才算完事。林彪对文革的态度是越来越消极。”

在报告起草的过程中，林彪对这两个稿子都没有看，只是叫秘书念了毛主席修改的一些段落和加写的内容。

关于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问题，从撰稿人到《政治报告》的内容，毛主席和林彪都有很大分歧，林彪的意见没有被采纳。林彪对张春桥他们起草的《政治报告》，无论在起草过程中，还是在大会上宣读的时候，都没有增加或减少一个字。林彪原来打算提议，把《政治报告》印发大会，他在讲话时对《政治报告》说几句相关的话就行了，黄、吴、李建议一定不能这样做，林彪同意了他们的意见。

在大会上，林彪与其说是作报告，还不如说是读报告，完全是照稿子念的。因为，他事先根本没有看过《政治报告》的内容，所以念起来不流利，精神不振，完全是应付差事。回来后，林彪说我就是念得磕磕巴巴的。

一九六九年二月十六日，林彪亲自写信给周宇驰、刘沛丰，要他们“让老虎多单独行动”，“以便锻炼他”的“独立工作能力”。

周宇驰刘沛丰同志：

这两年老虎在你们帮助下能力上已有进步今后你们可让老虎多单独行动以便锻炼他的独立工作能力此致敬礼并感谢你们过去对他的帮助

林彪

二月十六日

“老虎”，是林立果的小名。周宇驰，空军党委办公室原副主任。刘沛丰，空军党委办公室原处长。

一九六九年四月，李必达事件

李必达事件是发生在九届一中全会将要举行的时候，但事件起始在九大的准备过程中。

李必达是黄永胜从广州军区带到北京来的秘书之一，李是个大学生，文化革命前参军到 41 军，各方面表现都不错。他所在的团领导是黄永胜的老秘书，经推荐调到军区不久就当黄永胜的秘书。李必达初到黄办任秘书，干得不错，黄永胜夫妇都很满意。项辉方对李必达也很关爱，曾几次亲自出马为他找对象。

李必达家境贫寒，甚至家里因贫寒把他卖掉。

文革开始，老干部受冲击，黄永胜看不惯，1967 年初在京西宾馆开会，黄永胜当着江青的面说：“江青同志要听毛主席的话！”还在背后骂她“武则天”，“慈禧”，“恶霸”，“对老干部草菅人命”等等。

李必达听黄永胜骂江青，感到吃惊，他就有意识地监听黄永胜与叶群等人的电话，他认为黄永胜的这些话出去是要杀头的。

李必达告黄永胜骂江青的信，写了两三封。

李必达在信中说：“.....黄永胜、吴法宪、叶群等人经常恶毒地攻击江青同志，他们是一个反对敬爱的江青同志的反革命集团！”

其中有一封信是通过温玉成转的。李必达从北京针织总厂跑到温玉成那里向温玉成做了汇报，并把信交给了温。温玉成把李必达的这封信转到了叶群手上。

大概是 4 月 25、26 日，凌晨 3 时多，黄永胜有事找李必达，派人到针织总厂没找到，说两天没来了；又到京西宾馆找，发现了李必达的房子里，在未烧尽的纸灰里有一张烧残的纸片，上面写着：“敬爱的江青同志，我是黄永胜的秘书.....”。黄大吃一惊，马上派了几路人马找李必达，终于在住京西宾馆的总后九大代表王瑞华(李的未婚妻)的房间内找到了。但李究竟写了什么具体东西，送到哪里去了，拒不交代。。

黄永胜给江青发一个电话记录稿过去，内容是：“10 时整，黄总长要向江青同志汇报一些情况。”

10 点多一点，江青向黄永胜直接来了一个电话。她说：“你要来抄我的家吗？”只说了一句，电话就挂了。

4 月 28 日，九届一中全会刚结束，黄永胜派人把李必达抓起来，用飞机送到广州军区关押。

据李必达的未婚妻王瑞华说：李必达直接向江青写了材料，内容都是黄总长、吴副总长、叶主任骂江青的一些具体记录。材料有 20 多页，材料写好后，李亲自送走的。她不知道材料是否有存底。

“五一”节后的一个晚上，约 9 点多钟，邱会作向周总理汇报了李必达的事。总理听了之后说：1、江青曾给我来了一个电话，她说“我可能要遭到暗害！”只说了这一句，她就把电话放下了。我当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我想到了是同你们(指军委办事组)有什么争论：2、对李必达暂可以这样处理，我知道就行了，现在还不必写报告。

九届一中全会之后，一次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政治局开会之前，江青怒气冲冲、自言自语地说：“有些人天天骂我，打电话都在骂我，他们对我恨之入骨。现在“九大”开过了，我看会骂的更厉害的！”她说了一顿之后，就从自己的皮包里拿出一封信，摆在总理面前的茶几上，并说：“信的内容，现在不能看。”

总理拿着大、小信封看了一下，仍然放在桌子上，一句话也没有说，也没有看江青一眼，继续看文件。

江青回到自己座位上又说：“大家都去看一看吧，以便我不得好死以后，也多一个见证人嘛。”

黄、吴、叶、李、邱和大家，都去看了一下，在小的信封上横写的字是：“送钓鱼台十一楼交江青同志亲收。下面写的是黄永胜同志处。江青用了一个比较大的信封并写上：即送主席亲阅。江青”(这是竖写的)。毛主席用铅笔在“主席”二字上划了一个圈，一个箭头划向江青的名字，并在江青二字的上面写了一个“退”字。

在政治局会议结束后，黄永胜留下吴、叶、邱一起向总理谈了李必达的问题。总理说：“事情的发生与处理我都知道了。你们有意见，我也是知道的，但随便议论是不好的。今后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

李必达在飞机上，他在《毛主席语录》的扉页上写了“谁拾到语录本，请交中央文革转江青同志救我”几个字，故意把《语录》丢在飞机上，希望乘务人员收到后会交给江青。乘务人员在打扫卫生时拾到，交给了吴法宪转到军委办事组。

邱会作要 301 医院把王瑞华送到军医大学学习去了。他认为，这样既离开了北京，又没有伤害王本人。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林彪等人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形成包括林彪、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 李作鹏 邱会作、汪东兴等人在内的特殊政治集团。

在酝酿和选举中央委员会的过程，始终充满了斗争。

选举前，关于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候选名单中，军队方面所占的比例较高。康生、江青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们主张要多安排一些地方上的造反派头头。他们的意见被否定了。

吴法宪说：“在选举之前，一次叶群在同我们闲谈时说：‘林总讲，现在江青太张狂了。张春桥、姚文元过去都是榜上无名的小卒，现在的威望都这样高，看来当选中央委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使他们的选票少几张，以杀杀他们的锐气。

陈伯达接着说：张春桥在上海不过是个小鳖三。

黄永胜也说：张春桥看不起我们，一次在机场公开说我们是大佬粗，我当场回敬了他一句，说你在晋察冀不过是个小记者。

在这以后，我们按照叶群传达的意思作了安排和布置，指定军队有的人在选举时不投江青等人的票。”

四月二十三日下午正式选举，选举结果，江青只得了 1502 票（参加投票代表 1510 人），江青的选票不仅落后于叶群、也落后于黄永胜、吴法宪、李鹏、邱会作。

九大一共选出中央委员 170 人，候补中央委员 109 人，其中军队干部约占百分之五十以上。

由毛主席指定周恩来、康生、黄永胜三人到各代表团征求常委人选的意见。

康生提出：黄永胜可进常委。

毛主席说：“我没有意见，你们去安排。但是江青不能当常委。”

在一次毛主席主持的讨论常委人选的会上，他说：“陈伯达不能当常委，他和我合不合拍，至于黄永胜当不当常委，由大家讨论。”

林彪、周恩来和其他多数人的意见：黄永胜不当常委，陈伯达仍然当常委，毛主席同意了大家的意见。

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七日，江青召集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等人谈话。

黄、吴回去后，立即报告林彪。林彪要他们立即向毛泽东报告。

吴法宪还把这件事告诉了周恩来。

他们对这件事报告毛、周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效果感到不满。

一九六九年五月，吴法宪等人听到一个新华社记者说：江青等人让他伪造了一张毛泽东与江青合影的照片，在报纸上公开发表。

黄永胜与叶群还把他们搞到的所谓伪造照片的原件，交给吴法宪，要他复印三份，由他们三人分别保存，作为证据。

一九六九年下半年，副总参谋长温玉成被林彪调往成都

温玉成到北京后不久，就以副总参谋长的资格在北京市“支左”。

在军委办事组中，温玉成常常在一些问题上与黄吴叶李邱意见相左。因此，林彪等人就认为温走上了通向江青之路，他手里拿着两张通向江青的“通行证”，一张是支持造反派，一张向中央反映情况——所谓打小报告。前一张通行证起的作用不很大，因为北京的造反派早就是在中央文革直接指挥之下的。

后一张起到特别好的作用，他向江青打小报告特别多。例如：

报告叶剑英、聂荣臻等人对中央文革和对造反派不满的问题；

报告叶剑英汽车上装有特别电话，并有侦听作用问题；

报告聂荣臻在西山大兴土木扩建自己的宿舍问题；

报告邱会作支持清华“四一四”派反对中央文革等等

不久,温玉成成为中央碰头会议成员。

为了割断温玉成和江青的联系，林彪把温玉成调往成都，连他的家人也要带走，不能在北京住。

一九六九年下半年，王飞把“调研小组”列为空军党办的一个小单位，“定编”六个人。后经王飞等人精心挑选、“考验”，又拉进一些人，使这个组织进一步扩大。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吴法宪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

第二天，吴法宪把林立果、王飞、周宇驰召集在一起，祝贺林立果“荣升”。

吴法宪对他们说：“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

王飞、周宇驰又先后把吴法宪的上述指示在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上和机关里作了传达。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军委办事组以“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为由，擅自发布了“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

“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的内容：一是抓紧反坦克武器的生产；二是组织战时指挥部，进入临战状态；三是各级领导加强战备值班；四是严密注视中苏边境的形势及时掌握情况，随时报告。

10月18日，黄永胜等人将此令迅速下达全军，使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10月19日，林彪采用电话记录方式，以急件传阅报告毛主席。先送交周恩来总理阅。周总理阅后批示：请主席阅。

汪东兴拿此急件送到主席住处，给主席看。

毛主席看后，对汪说：“烧掉。”汪以为主席是让他拿去烧了，还没等汪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接着，他又拿起传阅件的信封又要烧。汪赶紧对主席说：“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主席听汪这样说，这才作罢。

当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问汪：“主席看过林彪的紧急电话通知没有？”

汪对周总理说：“我送去给主席看了，主席看后给烧了。”

周总理惊诧他说：“烧了？”

汪回答：“主席看后不高兴，自己就烧了。我劝了以后才留下传阅件的信封。”

周总理听到这里没有说话。

林彪和黄永胜等人知道了此事，下令撤销了这个命令。

一九六九年十月（至一九七〇年五月以前），林立果与周宇驰、王飞等以原来的“调研小组”为基础，建立了小“联合舰队”。

“舰队”的头目是林立果，内部称他“司令”、“旗舰”。

成员有王飞、周宇弛、刘沛丰、于新野、刘世英、程洪珍、李伟信、吴达云（空司办公室一处原秘书）、陈伦和（空司办公室外事处原翻译）、王永奎（空司情报部原副处长）、许秀绪（空司雷达兵部原副处长）、王琢（空司汽车队原队长）等十几个人。

“舰队”内部建立了政治、技术、理论资料等几套班子，周宇弛是“总管”。

他们的誓言是：“一辈子都紧跟首长（指林彪）、林副部长（即林立果）”，“准备坐牢，流血牺牲”，要“独立自主，自成体系，发展独立的政治力量”。

叶群还为周宇弛、王飞等人规定了人名代号

贰、本节简论

一九五九年九月，八届九中全会以后，林彪担任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部长。

林彪与他周围的人形成一个特殊的政治集团，有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

第一关键点就是通过处理一九六七年五月北京部队演出发生的五一三事件，林彪与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形成了一种特殊政治关系。

第二个关节点就是一九六八年三月把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搞下台。

第三个关节点是把黄永胜引进军委办事组担任组长，这样就形成了包括黄、吴、叶、李、邱在内的“大联合舰队”。

第四个关节点就是通过九大，除了林彪由党章规定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外，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也都担任了政治局委员。

第五个关节点就是一九六八年以后陈伯达、汪东兴由于他们与江青等人的矛盾，以及看到林彪集团的势力日渐庞大，逐渐靠拢林彪集团。

林彪集团的形成，还有另一个方面，就是安排了自己的接班人：

一九六七年四月，林彪、叶群把林立果送到空军。

一九六七年七月，经吴法宪批准，在党办成立了以林立果为组长的“空军党委调查研究小组”，组员有王飞、周宇驰、刘沛丰等人。

一九六八年七月，吴法宪、王飞伙同周宇驰，违抗中央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四大”单位暂不发展党员的决定，不履行正式手续，非法把林立果拉入党内。

一九六九年二月十六日，林彪亲自写信给周宇驰、刘沛丰，要他们“让老虎多单独行动”，“以便锻炼他”的“独立工作能力”。

一九六九年下半年，王飞把“调研小组”列为空军党办的一个小单位，“定编”六个人。后经王飞等人精心挑选、“考验”，又拉进一些人，使这个组织进一步扩大。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吴法宪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

吴法宪说：“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

一九六九年十月（至一九七〇年五月以前），林立果与周宇驰、王飞等以原来的“调研小组”为基础，建立了小“联合舰队”。这个小“联合舰队”以后就成为林彪集团进行非法的阴谋活动的主要工具。

林彪集团内部的组织结构大致是：顶端是林彪；下面是叶群，由她负责抓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黄、吴、李、邱（大联合舰队）；另一方面是林立果、王飞、周宇驰、刘沛丰（小联合舰队）。这是核心。外围还有争取的同盟者如陈伯达、汪东兴。他们

林彪集团的形成，不单单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政治利益。他们还有自己的政治路线、斗争目标。

林彪集团的政治路线也是逐步形成、暴露出来的：

首先通过起草九大的政治报告就开始暴露出来。陈伯达说：运动不能再搞了，现在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抓生产了。不能尽搞运动，运动，像伯恩斯坦说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

其次，在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对林彪说：九大以后，无休止的运动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在继续发展。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长期处在这样一种状况是极不利的。共和国承受不起，好干部受不起劳累辛苦，坏干部受不起摧残折磨。人民也受不起长期的无政府状态。

再次，林立果搞的五七一工程中说：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

最后，王飞为林立果提出政变纲领是：老百姓饿死了，一块打江山的元帅、大将整死了，刘少奇整死了。提出“民富国强”是总路线，这是九大以前林彪提出来的，陈伯达在他起草的九大报告中的思想。停止文革。

林彪集团的斗争目标，通过参加一九六八年以后的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活动也逐渐清楚地暴露出来。他们把自己看成是“枪杆子”集团，而把原中央文革的成员看成是“笔杆子”集团。而他们认为最有可能与林彪争夺接班人位置的，就是这个“笔杆子”集团。他们所谓“枪杆子”集团与“笔杆子”集团的斗争，实质上是坚持文化大革命与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斗争。

2009年7月20日初稿

2012 年 3 月 6 日修改

第二章第三节 围绕修改宪法的斗争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〇年三月初，毛主席接到周总理的信和附来的一份宪法修改草案提要。信中谈到政治局常委提出宪法中原有国家主席一节，是不是还写上。（当时，毛主席正在武汉视察，住在武昌东湖宾馆梅岭一号）

一九七〇年三月七日，毛主席要汪东兴马上回北京传达他的意见：在宪法中不设国家主席一节，坚决表示他不再当国家主席。

一九七〇年三月八日，汪东兴回到北京，向周总理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

周总理说：“你向政治局的同志们传达一下吧。”

当晚，在周总理主持下，汪东兴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传达了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

会议讨论后，大家都同意毛主席的意见。

周总理说：“照毛主席的意见办，我们开始进行修改宪法的工作。”

这次政治局会议，林彪没有到会，叶群到了。会上，周总理还特地说了一句：就委托叶群向林彪转达毛主席的意见，报告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情况。

三月九日，中央政治局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开始了修改宪法的准备工作。

一九七〇年三月九日，住在苏州的林彪，让叶群对在北京的黄永胜、吴法宪说：“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

一九七〇年三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就修改宪法的指导思想和修改宪法中的一些原则性问题，写了《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送给毛主席。

毛主席阅批了这个请示，再次明确批了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

一九七〇年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的问题。

会上，大多数人同意毛主席 3 月 8 日提出的关于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

在此期间，林彪让他的秘书给毛主席的秘书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毛主席则让秘书回电话：“问候林彪同志好！”

一九七〇年四月十一日，夜间 11 点 30 分，林彪在苏州让他的秘书于运深给中央政治局值班的同志挂电话，传达他的三条意见：“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一九七〇年四月十二日，毛主席看到中央政治局关于林彪的意见的报告，立即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林彪对叶群说：“国家还得设主席，一个国家不能没有主席。”

陈伯达在政治研究室组织了一个班子，专门研究中央政治局的历次的宪法修改稿，搞了一个“宪法修改草案”。

一九七〇年四月下旬，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三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

毛主席借《三国演义》中的典故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一九七〇年五月中旬，吴法宪见到林彪时，问林对宪法修改有什么意见。

林说：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

林彪要吴法宪和李作鹏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要写上设国家主席。

（据吴法宪 1971 年 10 月 21 日交代）

一九七零年五月二日晚，林彪、叶群“接见”王飞、周宇驰、刘沛丰等人。

一九七零年五月三日晚，王飞、周宇驰召集会议，向林彪表“忠心”，

周宇驰：

我们要永远坚信林副主席、忠于林副主席，忠于林副主席也就是忠于毛主席。

要知道，林副主席也是一个天才，是一个历史上罕见的伟人，是一个可以和马、恩、列、斯并列的革命导师和领袖。

我们要一辈子永远同立果同志战斗在一起。立果同志也是一个天才，一个全才，我们没有那个人能够和他比得上。他对我们的关心爱护也是没人能比得上的。他在各方面都是把着手教我们，在政治上工作上直接领导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考虑过很久，觉得到提出来的时候了。就是一个单位，一个集体，总要有一个头。在我们这个战斗集体中，应该以立果同志为头，为核心。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认识，这样的觉悟。实际上，也只有他才能当得起这个头和核心。这是客观的需要，斗争的需要。这不是“多中心论”，而正是为了更好地维护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领导核心。

一九七零年五月十三日，黄、吴、叶、李、邱同游长城，赠诗题词，摄影留念。

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还向叶群写了一封信，再次表示他们要“永远牢记”叶群的“教育深恩”。

叶群同志：

今天是“五·一三”三周年，这是我们难忘的日子。

我们记忆犹新的是您——我们敬爱的叶群同志，对我们直接的指导帮助和支持，您日夜操劳一次又一次地给我们带来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英明指示，一次又一次地亲临斗争第一线，同三军广大革命群众并肩战斗。所以，当“五·一三”事件三周年的时候，永远牢记您对我们的教育深恩，请接受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

一九七〇年六月，王飞在司令部党委学习会上，一面胡吹林立果“学习、领会毛泽东思想很出色，很突出”，说什么“早想请他讲讲”，一面又吹嘘林立果“很谦虚”。

鲁珉、贺德全等人跟着帮腔，要求林立果“讲用”。在其他一些人也表示同意后，王飞就说：“既然大家要求立果同志讲，我就把部党委的意见向他转达。”

一九七〇年七月六日，吴法宪在常委办公会议提出“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

林彪说：“林立果不但要指挥空军的小联合舰队，全军的大联合舰队也要归他指挥。”

一九七〇年七月九日和十六日，王飞对吴法宪提出的“两个一切”，首先在空司令部党委学习会上作了“传达”，后又专门在空司办公室全体人员会上散布。

随后，他又策划召开空司机关党委常委扩大会议，让刘沛丰贩卖“两个一切”。王飞一伙胡说什么：“吴司令员的指示（指‘两个一切’）反映了空军广大指战员的心情和愿望”，“要坚决拥护立果同志对我们的领导”，这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等等，并很快把“两个一切”传到空司机关和直属部队。

一九七〇年七月十七日至七月二十二日，在中共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上，陈伯达，叶群一唱一和，对中央政治局起草的、他们在政治局会议上表示同意的宪法修改草案，提出非难。他们提出，要在宪法上写上“为过渡到共产主义而奋斗”，还说什么宪法修改草案没有写备战。

一九七〇年七月中旬，在中央修改宪法的起草委员会开会期间，毛主席得知仍有些坚持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时，第四次提出不同意设国家主席。他说：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

一九七〇年七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关于组织讨论修改宪法的通知

1970.07.20；中发〔1970〕53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为了进一步筹备“四届人大”的召开，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中央军委，接到本通知后，认真动员各厂矿、公社、军队、机关、学校、企业事业单位、街道组织的革命群众：一、广泛讨论修改宪法，提出修改意见；二、讨论和通过“四届人大”的候选代表。

（一）关于修改宪法问题

一、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一九五四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它巩固了我国人民革命的成果，实现了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它在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祖国的斗争中，起了伟大的历史作用。

二、毛主席在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三日宪法起草委员会上说过：这个宪法“是过渡时期的宪法，大概可以管十五年左右。”毛主席的英明预见已经实现了。特别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我国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适应这种情况，需要对一九五四年宪法进行修改，使它成为一部在新形势下体现毛泽东思想的社会主义新宪法。

三、毛主席关于国家学说的伟大理论和实践，是修改宪法的指导思想。我们要使修改宪法的过程成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过程。宪法是我国的根本法，修改宪

法是一件大事，各级领导必须十分重视，必须动员全国人民进行广泛讨论，集中革命群众的智慧，采取“领导机关的意见和广大群众的意见相结合的方法”，做好修改宪法工作。

四、在这次组织群众反复讨论修改宪法的工作中，需要掌握以下几个原则：

1、毛主席对于马列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

2、我们国家性质是工人阶级（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3、各族人民伟大领袖毛主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核心力量，毛主席是全国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林副主席是副统帅。

4、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原则基本上是两个：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我们的民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对反动阶级和反革命分子实行专政。

5、要总结历史经验，以我们自己的革命和建设经验为主，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创造的并为毛主席所肯定的好经验，如人民公社及其政社合一制度，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等等。同时，也要参考别国宪法中好的东西。

6、修改后的新宪法要力求简明扼要，通俗易懂，人人能记，便于运用。一九五四年宪法中，有些任务已经完成可以删去或者根据新的情况改写；有些条文可以删繁就简，精简合并，避免重复。

五、这次动员群众讨论修改宪法，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根据上述原则，动员基层革命群众对一九五四年宪法进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中央军委，要把群众提出的意见分类整理，分两次报送中央。第二阶段

将经过党中央批准的宪法修改草案，提到全国基层革命群众中讨论，修改意见仍分两次分类报送中央。

（二）关于通过“四届人大”代表问题

一、各省、市、自治区的“四届人大”候选代表名单均已经过民主协商提出。为再一次经过广泛的民主协商，应将各省、市、自治区“四届人大”全部候选代表名单（包括中央与地方商定的爱国人士特邀代表在内），分别提到本省、市、自治区的厂矿、公社、机关、学校、企业事业单位、街道组织的革命群众中讨论和通过。在讨论中，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应将本省、市、自治区的全部候选代表简历介绍给基层群众，群众有权通过协商调换他们认为不能作人大代表的人。

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亦应将各单位已协商了的“四届人大”候选代表和他们的简历，再一次分别提到军队所属基层单位中讨论和通过。在讨论中，群众有权提出不同意见，通过协商解决。

二、华侨候选代表提到其所在单位的革命群众中讨论和通过。

三、各省、市、自治区、军队和华侨的“四届人大”候选代表提到基层革命群众中讨论和通过后，应分别在全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的党委会中最后通过，作为“四届人大”正式代表。

（三）关于动员群众问题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接到中央通知后，应立即召开会议，分级进行动员传达。

在京的各总部，各军、兵种所属单位，由军委办事组统一传达，其他各部队由各大军区负责动员传达。

胜利地完成这一任务，关键在于领导。在整个工作过程中，各级领导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国家学说的伟大理

论，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发扬民主，切实做好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抓住重点，掌握典型。在动员范围广、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要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结合起来，防止流于形式，走过场。

（此件可印发至厂矿、公社、军队、机关、学校、企业事业单位、街道组织的基层单位，向革命群众宣读，但不许传抄、张贴、广播和登报）

一九七〇年七月

一九七〇年七月下旬，政治局会议在讨论起草纪念“八一”建军节社论时围绕稿子中“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提法引起了一场争论。

陈伯达主张恢复过去一贯的提法，即“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提法，张春桥则主张不改回去。

会上争论不休。

当时，毛主席住在杭州，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毛主席的眼睛患了白内障，视力模糊）。周总理就把会议争论情况写了封信请示毛主席。毛主席听了信后，要汪东兴代他划圈后退回去。汪东兴觉得难办。没有退回去，把信带在身边了。

毛主席、周总理在上海锦江饭店接见第一批外宾后，周总理、黄永胜都问汪东兴那个报告毛主席圈阅了没有，汪东兴说你们去问毛主席。

当时，毛主席正点燃一支香烟在抽，对着汪东兴说：“怎么搞的？”意思是说你怎么没有把信圈回去。

汪东兴说：“这样大的事，我不敢圈。两种意见，您到底赞成哪一种？”

毛主席说：“两种意见，我都不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

后来，毛主席还多次说过，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吗？缔造者也不只是我一个，还有许多人。

一九七〇年七月三十一日，经吴法宪等批准，在空直机关二级部副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林立果抛出了“讲用报告”。

林立果用了九个小时，宣读了“讲用报告”。

林立果话音一落，王飞马上站起来大肆吹捧“讲用报告”“观点很新，思想很深，境界很高，视野很广，对军队、国家的大事说得很透，抓得很准”，“解决了很多重大问题”，并再次兜售“两个一切”。

林彪听了林立果的“讲用报告”的录音，得意地说：“不仅思想象我的，语言也象我的”。

一九七〇年八月一日，王飞又组织空司干部听了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录音，还要求座谈、表态。

以后，这个录音又在空司多次播放。

王飞还组织一些人整理“讲用报告”录音稿，打印散发，

又伙同刘锦平、江腾蛟等人策划把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塞进空军“三代会”。

一九七〇年八月四日，吴法宪主持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决定在“三代会”上放“讲用报告”的录音。

录音一放，王飞就指使一帮亲信，狂热吹捧林立果的“讲用报告”“继承又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第二个《共产党宣言》”，“第四个里程碑”，“表现了他的天才”。

在王飞的指使下，“三代会”的空直代表团作了向林立果学习的“决议”；组织了四个所谓“在林立果身边工作过的人”，到各代表团巡回“讲用”，从政治、军事、科学技术、生活作风等方面，把林立果捧为“超天才”。

吴法宪说林立果是“伟大的天才、全才、全局之才”，“放了一颗政治卫星”。

周宇驰说，是“第二个《共产党宣言》”，“第四个里程碑”，林立果是“无师自通，不思而得”，是“第三代接班人”。

王辉球也大吹林立果是“天才”，说“讲用报告”是“对空军建设的指示”。

林立果也得意忘形，今天“接见”这个，明天与那个“合影”，恬不知耻地说什么“大家日夜想念我，我也想念大家”。

林立果、周宇驰还以对“讲用报告”的态度为标准划线排队。他们秘密布置把“三代会”上“表现好”的和“表现差”的干部列个名单，“记下一笔帐”。

刘世英专门组织一帮人四处探听，发现“感情深”“跟得紧”的就立即拉拢，又送东西，又请吃饭；对不赞成他们的做法，或吹捧不积极的，轻者扣上“路线觉悟低”、“政治不敏感”、“糊涂蛋”等帽子，重者列为“右派”、“反动势力”，进行迫害打击。

一九七〇年八月初，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说，林彪的意见还是坚持要设国家主席，你们应在宪法工作小组里提议写上这一章。

（据吴法宪交代）

一九七〇年八月十三日，召开中央修改宪法工作小组会议讨论修改宪法。

会议由康生主持，陈伯达、张春桥、吴法宪出席。

这次会议争论异常激烈。

首先是关于设国家主席问题。康生提出不设，吴法宪坚持主张设。争论不下。最后康生说：那就各自保留意见吧，以后提交政治局讨论。

其次是关于国家机构问题，吴法宪提出：国务院这一章应该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国务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康生、张春桥说：再写上重复，毛主席也不同意写。吴法宪认为他们的意见是对的，但他对张春桥说的话非常反感。

张春桥以毛泽东在一次接见外宾谈到“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是讽刺”为据，说：有人口口声声马列主义到处挂。到处堆砌毛泽东思想，并不是马列主义。有人口口声声说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连赫鲁晓夫都是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简直是一种讽刺。

吴法宪反驳说：张春桥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是指谁说的？你解释清楚。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发展和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谁提出来的？你这句话过分了吧！你这是在讽刺林副主席吧！你张春这里不写毛泽东思想，那里不写毛泽东思想，倒是你捍卫马列主义了！可是你的文章哪一篇不写毛泽东思想，你算不算堆砌。你说赫鲁晓夫何时发展了马列主义，你口口声声赫鲁晓夫，你指的是谁？你今天吹这样的风干什么，用意何在？中央政治局的人刮此风，刮到下面就会愈刮愈大，今后中央怎样解释。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你们不赞成，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三个副词你们也反对，你们不准称天才，你们想借口毛主席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我坚决反对你们这种谬论。

康生说：好，好，在国务院的前面加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就是了。

在会议中间，吴法宪又打电话给黄永胜，通报会议上的情况。黄即打电话报告了林彪、叶群。

小组会议散后，陈伯达邀吴法宪到他家里，陈伯达说吴今天的话讲得好，“敢于斗争”，并要吴把情况报告林彪。

吴法宪回到家里向当时在北戴河的叶群打了长途电话，报告了情况。过了一回叶群回电话说：林彪很高兴，说：吴胖子放炮放得好。

一九七〇年八月十三日晚和十四日下午，叶群分别打电话给陈伯达、黄永胜要他们准备关于天才方面和四个伟大方面的语录，准备在八月十四日晚政治局会议讨论宪法草案定稿时，支持吴法宪。

一九七〇年八月十四日，黄永胜给李作鹏打电话说：吴法宪现在很孤立，要李作鹏回来参加宪法小组工作会议，支持吴法宪。

一九七〇年八月十四日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宪法修改草案定稿。

这次会议由周恩来主持。

在这次会议上，张春桥没有继续坚持自己要删除三个副词的观点。宪法修改草案获得一致通过。

一九七〇年八月，中央决定黄永胜在北京看家。

黄永胜在政治局会议上几次提出，要上庐山参加会议，坚持不愿留在北京看家，并且违抗中央规定，擅自在军委办事组会上提出要邱会作、阎仲川留在北京看家。

总理对黄永胜进行了严肃批评，黄永胜才勉强同意留在北京（注：此事总理请示了毛主席，毛主席指示要黄永胜留在北京）。

黄还布置办事组秘书宋城把准备好的天才语录带上庐山。

林彪布置人给他起草关于宪法问题的讲话提纲；同时又布置林立果组织空军党委办公室的一些人，给他起草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

贰、本节简论

“九大”开过后，毛主席要着手解决政府工作、修改宪法等方面的问题，提出准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林彪认为这是争夺更多权力的好机会，在讨论修改宪法时，林彪就抓住“天才”问题和设国家主席问题大做文章。

修改宪法的工作一开始，毛泽东就提出：不设国家主席、他不当国家主席。

为什么毛泽东不主张设国家主席呢？这主要是从当时的实际形势来考虑。第一，如果设国家主席，很可能要由他来担任，但是，一，他早已辞去国家主席一职；二，重新担任国家主席一职又要增加许多外交礼仪活动；三，打倒了担任国家主席职务的刘少奇，又由他来担任国家主席一职，就给政治对手留下了可钻的空子。第二，如果设国家主席而他不承担国家主席职务，则必须由其他的人来担任，这样一来可能引发一场新的斗争；一，很可能推举林彪担任，但林彪并不是适合的人选，他的身体不行，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他都很少参加，那么繁重的国事活动和外交活动，他更难胜任；一九六八年以来，林彪的一些活动很不正常，他究竟要干什么，一时还捉摸不透。二，如果推举另外一位常委担任，就只能在康生与陈伯达之间选择，这必然会引起一场新的斗争。三、如果推举常委之外的元老人物来担任，则可能引发更加复杂的斗争。

为什么林彪在毛泽东提出不设国家主席、不担任国家主席之后，一反“紧跟”的常态，要一再坚持设国家主席、推选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呢？第一，他捉摸不定；毛泽东不愿担任国家主席究竟是真意，还是谦虚、礼让？但是，不管是那一种情况，要推选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总不会错。第二，如果毛泽东真的不愿当国家主席，那么，这个职位十有八九就是他的了。国家主席一职虽然不增加多少实权，但对于他的接班人的地位来说就更加稳固了。

在讨论修改宪法的过程中，一九七〇年八月十三日，中央政治局修改宪法小组的一次会议，是一次关键性的会议。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在讨论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二节“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康生提出不设国家主席。吴法宪坚持要在宪法上写上设国家主席一节。

应该说这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正常的。康生之所以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是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意见、中央政治局的有关决定；吴法宪坚持要在宪法上写上设国家主席一节，是根据林彪的意见，也是可以的。但问题是有人说不主张设国家主席，就是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这就离题太远，近乎“造谣”了。

在讨论国家机构时，张春桥提出删除“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一句话，因为在宪法的其他地方已经有了。而吴法宪认为不能删，这是是否坚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原则问题。

张春桥提出的是文字表述问题，而吴法宪则把它说成是取消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原则问题。这当然是两回事。

张春桥提出从条文中删除“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等语。吴法宪当场尖锐地提出反驳：“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丰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

其实，在“九大”政治报告和新党章初稿中，都曾写上了“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这三个副词，送给毛泽东审阅时，毛泽东都把它们划掉了。这个情况，

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知道，林彪、陈伯达、吴法宪等人也应该知道。双方争论时，陈伯达不在会场。

在会议中间，吴法宪又打电话给黄永胜，通报会议上的情况。黄即打电话报告了林彪、叶群。

小组会议散后，陈伯达邀吴法宪到他家里，陈伯达说吴法宪今天的话讲得好，“敢于斗争”，并要吴法宪把情况报告林彪。

吴法宪回到家里向当时在北戴河的叶群打了长途电话，报告了情况。过了一回叶群回电话说：林彪很高兴，说：吴胖子放炮放得好。他们认为，这一次抓住了张春桥的“尾巴”，可以狠狠地整他一下。

一九七〇年八月十三日晚和十四日下午，叶群分别打电话给陈伯达、黄永胜要他们准备关于天才方面和四个伟大方面的语录，准备在八月十四日晚政治局会议讨论宪法草案定稿时，支持吴法宪，批判张春桥，准备大干一场。一九七〇年八月十四日，黄永胜给李作鹏打电话说：吴法宪现在很孤立，要李作鹏回来参加宪法小组工作会议，支持吴法宪。可是，在一九七〇年八月十四日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修改宪法的会议上，张春桥没有继续坚持自己要删除的观点。宪法修改草案获得一致通过。这样一来，林彪一伙精心策划的一场战火没有烧起来。这次战火没有烧起来，并不等于矛盾解决了。而是为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搞突然袭击，留下了伏笔。

一九七〇年，林彪集团的另一项重要活动就是把林立果推上组织领导“大小舰队”的第一线。

一九七零年五月二日晚，林彪、叶群“接见”王飞、周宇驰、刘沛丰等人。一九七零年五月三日晚，王飞、周宇驰召集会议，向林彪表“忠心”。这是一次重要的接见，向王飞等人下达了关于林立果今后的地位和作用的旨意。

林彪说：“林立果不但要指挥空军的小联合舰队，全军的大联合舰队也要归他指挥。”

一九七〇年七月六日，吴法宪在常委办公会议提出“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一九七〇年七月九日和十六日，后王飞对吴法宪提出的“两个一切，首先在空司部党委学习会上作了传达，又专门在空司办公室全体人员会上散布。随后，他又策划召开空司机关党委常委扩大会议，让刘沛丰贩卖“两个一切”。王飞一伙胡说什么：“吴司令员的指示（指‘两个一切’）反映了空军广大指战员的心情和愿望”，“要坚决拥护立果同志对我们的领导”，这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等等，并很快把“两个一切”传到空司机关和直属部队。

林彪听了林立果的“讲用报告”的录音，得意地说：“不仅思想象我的，语言也象我的”。

一九七〇年七月三十一日，经吴法宪等批准，在空直机关二级部副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林立果抛出了“讲用报告”。林立果用了九个小时，宣读了“讲用报告”。林立果话音一落，王飞马上站起来大肆吹捧“讲用报告”“观点很新，思想很深，境界很高，视野很广，对军队、国家的大事说得很透，抓得很准”，“解决了很多重大问题”，并再次兜售“两个一切”。一九七〇年八月一日，王飞又组织空司干部听了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录音，还要求座谈、表态。以后，这个录音又在空司多次播放。王飞还组织一些人整理“讲用报告”录音稿，打印散发，又伙同刘锦平、江腾蛟等人策划把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塞进空军“三代会”。一九七〇年八月四日，吴法宪主持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决定在“三代会”上放“讲用报告”的录音。录音一放，王飞就指使一帮亲信，狂热吹捧林立果的“讲用报告”“继承又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第二个《共产党宣言》”，“第四个里程碑”，“表现了他的天才”。在王飞的指使下，“三代会”的空直代表团作了向林立果学习的“决议”；组织了四个所谓“在林立果身边工作过的人”，到各代表团巡回“讲用”，从政治、军事、科学技术、生活作风等方面，把林立果捧为“超天才”。吴法宪说林立果是“伟大的天才、全才、全局之才”，“放了一颗政治卫星”。周宇驰说，是“第二个《共产党宣言》”，“第四个里程碑”，林立果是“无师自通，不思而得”，是“第三代接班人”。王辉球也大吹林立果是“天才”，说“讲用报告”是“对空军建设的指示”。林立果也得意

忘形，今天“接见”这个，明天与那个“合影”，恬不知耻地说什么“大家日夜想念我，我也想念大家”。林立果、周宇驰还以对“讲用报告”的态度为标准划线排队。他们秘密布置把“三代会”上“表现好”的和“表现差”的干部列个名单，“记下一笔帐”。刘世英专门组织一帮人四处探听，发现“感情深”“跟得紧”的就立即拉拢，又送东西，又请吃饭；对不赞成他们的做法，或吹捧不积极的，轻者扣上“路线觉悟低”、“政治不敏感”、“糊涂蛋”等帽子，重者列为“右派”、“反动势力”，进行迫害打击。

有人说：策划五七一工程、谋害伟大领袖、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叛逃出国等等，这一切反革命阴谋活动，都是林立果背着林彪搞的。那么，请问：林立果在林彪集团中为什么会有如此高的地位和如此大的作用？为什么林立果能够指挥一切、调动一切？为什么林立果不仅能够指挥小舰队，而且能够指挥大舰队？林彪集团中的那些骄横无比的“老领导”、“中层骨干”为什么都那么死心塌地、俯首帖耳地听那么一个毛头小子调动指挥？因为这一切都是林彪事先安排好了的。

2009年7月27日初稿

2011年12月31日修改

第二章第四节 林彪搞突袭 毛泽东反潮流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〇年八月十八日下午 2 时，毛主席乘专列从杭州出发去江西庐山，参加党的九届二中全会，19 日到达九江市。在九江市下火车后，换乘汽车于当天下午上了庐山。

一九七〇年八月十九日、二十日、二十一日，毛主席在庐山看书和休息。

一九七〇年八月十九日，汪东兴对程世清讲：这次修改宪法要坚持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怎么当我们的国家主席呢？不设国家副主席，林彪同志往那里摆？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日，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叶群上了庐山。

叶群带着为林彪准备的讲话提纲。

下午，林彪与陈伯达谈了一个多小时，商量“如何对陆定一式的人物张春桥发动进攻”。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就即将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会议程等问题书面报毛泽东、林彪。

（一）全会议程原定为修改宪法、讨论国民经济计划和备战工作三项。

（二）修改宪法的综合简报（八月十日）和修改草案（八月十五日）已印发政治局各成员。

（三）国民经济计划纲要和计划会议综合报告，拟先在政治局讨论通过后再提交全会。

（四）由军委办事组起草的关于备战工作文件，拟先由林彪审定后，再提交政治局和全会讨论。

（五）全会到会二百五十三人，除召开大会外，拟分六个小组进行工作。

周恩来先后到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处谈话。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一日，汪东兴对江西省军区司令员文运道说了对程世清说过内容大致相同的话。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一日，叶群对为林彪起草讲话提纲的秘书谈话。

叶群说：首长一直坚持天才的提法，有人否认天才，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反对首长。在讨论修改宪法时，在天才问题上有争论，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否认天才，否定十一中全会公报，甚至连国家元首的提法也不同意。

叶群拿出语录卡片说：如果不讲天才，马列还算不算数？

叶群说：设国家主席还要坚持。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二日下午二时，在庐山三所毛主席的办公室，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毛主席、林彪、周总理、陈伯达、康生出席了会议。

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和确定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

九届二中全会原定有两项议程：一、讨论和修改将要在四届全国人大提出的新宪法草案；二、讨论国民经济的年度计划。

在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主席建议增加一项内容，即谈一谈当时的形势。毛主席说：“除了讨论修改宪法、计划问题外，还应该加个形势问题。据我所知，大家有兴趣的问题是形势问题。”

康生说：“修改宪法问题搞了很久，宪法委员会也开过第一次会了。全国人民正在讨论宪法修改草案。”

毛主席说：“宪法修改草案可以发给大家看。但是大家有兴趣的还是形势问题。”

林彪、周总理、陈伯达、康生都表示同意毛主席的建议，并提议由毛主席讲形势问题。

毛主席说：“我主持会议，由总理讲形势吧，修改宪法问题由康生讲。”

康生推辞说：“修改宪法问题也由总理一道讲吧。”

毛主席看了康生一眼，然后说：“那你们两个人去商量解决好了！”

关于设国家主席问题：

周恩来提出：如果设国家主席，今后接见外国使节等外交礼仪活动可由国家主席授权。

康生说：设国家主席，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我们在起草宪法草案时也这么希望，但又不敢违反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处在这一矛盾中，我们感到压力很大。

陈伯达说：如果这次毛主席再担任国家主席，将对全国人民是一个极大的振奋和鼓舞。

陈伯达讲后，林彪也附和。

毛泽东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

周总理接着谈计划问题。他说：“自今年开了计划会议后，收效较快。五个月以来，全国有一定的生产效率，地方上的积极性大了。”

毛主席说：“原来这个下放(指中央把管理经济、管理企业的部分权力及财权、物权、投资权下放给地方。原作者注)，讲是讲了。但是他们(指地方——原作者注)没有摸到下放的底，交代不那么清楚，这次计划会议解决了。”

周总理接着说：“各省、市、自治区不仅仅是农业有了生气，有了发展；而且现在看起来工业形势也好。今年的计划完成的情况和原来预计的差不多，虽然‘文革’的头两年有一点下降。”

毛主席说：“解放以后，统一了全国，出了个南粮北调、北煤南运的问题。解放以前，也存在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不知道。不晓得蒋介石统治的时候，煤要不要南运？粮呢，要不要北运？看来，要逐步地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南方找到很多煤矿，北方粮食也逐步自给了。”

周总理说：“人民生活确实是改善了。这种形势，主要是靠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毛泽东思想传播了，生产和经验也就传播了。”

康生接着说：“哪里的毛主席思想深入了，哪里的工作、生产一定就好了。规律完全是这样的。”

毛主席听了摇摇手，表示不赞成这种说法。毛主席说：“看我们是依靠谁的问题了。有的人依靠专家治厂。工业这方面，我看要依靠专家、科学家，甚至洋专家，除这之外，也还要依靠工人。”

林彪说：“主要是调动全国亿万人民的积极性。”

陈伯达说：“我到下边看了一下，形势很好。群众积极性很高，干劲也很大，连中学生都自办工厂。”

谈完经济问题，常委们又议论政治问题。

周总理提出说：“还有党代会的问题。”

康生说：“恐怕有些县、市。甚至有的省、市要开党代会。”

毛主席说：“党代会不仅要从下到上开。有的还要用从上到下的办法开。”

康生说：“这两个办法都可以用。”

周总理分析说：“等到明年九大召开两周年的时候。各省、市、自治区开成党代表大会。我看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毛主席问：“整党，各个地方不是早都开始了么？这个‘吐故’吐得怎么样呀？大概吐得不多吧？对蒋南翔这样的人留下来好。”

周总理回答说：“现在挂起来的较多。”

康生补充说：“我说‘挂故’多。”

毛主席说：“你们讲挂起来的多，我看吐得也不少了，还是要以教育为主。”

周总理说：“有的人长期挂起来呀？我认为还是下去劳动接触群众比较好。”

毛主席认为会议讨论得差不多了，就说：“今天把大会的议程定下来了。会就开到这里吧！”

毛主席在常委会提出：要把这次会议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不要开分裂的、失败的会。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二日晚八时，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出席九届二中全会的各大区召集人。

周总理、陈伯达、康生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九届二中全会议程的安排的讨论意见。

周总理在传达中，还介绍了当时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些情况。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二日晚，林彪对在全会上是否讲话仍犹豫不决。陈伯达再次造访。

陈伯达认为，九大以后，无休止的运动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在继续发展。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长期处在这样一种状况是极不利的。共和国承受不起，好干部受不起劳累辛苦，坏干部受不起摧残折磨。人民也受不起长期的无政府状态。造成这种局面，在主席那里起作用的主要江青和张春桥。江青不能碰，碰碰张春桥还是可以的。张春桥的问题不解决，对党的事业危害实在太太。

陈伯达认为，在罗瑞卿，杨、余、傅，贺龙的问题上，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意见都一致，如果林副主席提出张春桥的问题，毛主席肯定会支持。

林彪说：如果要讲，明天向主席报告一下。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下午，林彪上车去开会时，与叶群谈话。

林彪问叶群：这话今天讲还是不讲？

叶群说：要讲！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下午 3 时，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礼堂开幕。

开幕前，林彪单独向毛主席报告，他要在大会上讲一点意见。

常委们进入会场并在台上就座。毛主席主持开会。周总理宣布全会议程，林彪首先讲话。

林彪一开头说：“昨天下午，主席召集了常委会，对这次会议作了重要指示。这几个月来，主席对于宪法的问题和人代会的问题都是很关心的。宪法的修改、人代会的召开问题，都是主席提出的。我认为这很有必要，很合时宜。在国内、国外大好形势下开人代会和修改宪法，对于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反帝反修斗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有深远影响的。”

林彪在讲完开场白之后，逐渐转入正题。他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是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毛主席是我们党、政府、国家、军队的缔造者。……我们有今天的胜利，决定的因素就是毛主席。”

林彪还说：“这次我研究了宪法草案，表现出这样一个特点，就是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

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毛主席的这种领导可以说是我们胜利的各种因素中间的决定因素。……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我们的工作前进还是后退，是胜利还是失败，都取决于毛主席在中央的领导地位是巩固还是不巩固。”

他强调说：“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这次宪法里面规定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规定毛泽东思想是领导思想。我最感兴趣的、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

林彪讲完后已经 4 点半了。

毛主席对周总理、康生说：“你们讲吧！”

周总理说：“计划问题有本子，材料都有，我就不讲了。”

康生讲话：“宪法说明已印发给大家，不讲了。”林副主席的讲话，完全同意，完全拥护。在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有的意见都是一致的。如果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如果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当，那么国家主席这一章就不设了。

毛主席宣布散会。

散会时，大家陆续退场，吴法宪、叶群、李作鹏、汪东兴和邱会作不约而同地走在最后面，陈伯达在台上等着没走。此时，汪东兴就讲开了，他简单地介绍了一下会前林彪报告毛主席要求讲话的情况，及林彪报告后主席说不要点名的情况，这时，叶群忙提醒大家“会上发言不要点名啊，林总讲话里指的是陆定一式的人物，是不点名的点名。”叶群还讲：“林总说主席是伟大的天才，毛主席的革命实践太丰富了，主席比马克思、列宁还懂的多。我就是坚持天才的观点。”

邱会作和李作鹏担心的是陈伯达、吴法宪、叶群三人把林彪“推”上台的。如果真如此，是没有不坏事的。他们一同走在回去的路上，李问：“老邱怎么样呀？（指林总的讲话）”邱说：“不知道为什么？”李：“是呀！事先连个招呼也不打！”

晚饭后 8 时许，邱会作同北京黄永胜打了一个电话。邱拿起话筒就问：“山上的热闹，你知道吗？”

黄说：“刚才，吴胖子来过电话了，知道山上的大好事，不需要再说了，真高兴啊！晚上还多吃了一碗饭。”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晚上，周总理主持召开政治局委员和各大区召集人会议，讨论国民经济计划的有关文件，并安排会议各组分别讨论宪法和计划问题。

吴法宪在会上说林副主席的讲话很重要，提出要很好学习。

陈锡联第一个起来响应。接着，汪东兴、许世友、曾思玉、李作鹏、邱会作等等很多人表示同意。

汪东兴特别提出要重新听一下林彪讲话的录音。

周恩来说：“这个意见好。就按你们的意见办。我负责向毛主席报告。”“是否放两遍录音，大家反映一遍听不懂。为了便于讨论，明天上午在礼堂再放两遍录音，后天再讨论，这样一共是两天。”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晚上 12 点前后，陈伯达与吴法宪谈关于“天才”方面的问题。

邱会作和李作鹏示意吴法宪到叶群那里了解一下情况。吴回来后，对他们说：叶群讲，林总本来在开幕式上不准备讲长话，开会前，主席和林总交谈了很久，林总向主席反映一些问题，主要是我（吴）和张春桥吵架的事，主席说：“张春桥的后台是江青。”主席对林总说可以在会上讲一讲，但不要点名。

然后，吴法宪又说请“老夫子”（陈伯达）到他的住处来闲谈。不久，陈到了吴的住处。我们听陈、吴谈话，主要是陈谈的，一直谈到 24 日凌晨 3 时才散伙。

从陈伯达谈话的内容、口气来说，陈伯达对张春桥不仅是贬低，简直是到了鄙视的地步。可见他对张春桥的仇恨是很深的。

陈伯达说，张春桥是个无名小卒，没有什么本事，写文章也不行。自己不行，还好表现自己。如果他写了一篇什么东西，总怕别人不知道，到处瞎吹一通。张春桥写的东西都是上海请人搞的，在上海那个地方搞文字吃饭的人有的是。

陈伯达说，1967 年，上海‘一月风暴’都是北京直接指挥的，安亭事件发生后，是他派张春桥去处理的，连张春桥在上海的讲话都是他在北京写好，用电话传过去的。群众起来了，张春桥当时并不敢去，是他写了几条要张去宣布的，并由上海警备区派部队保护张春桥才去了。然后上海召开一个群众大会，张春桥也是不敢出去见群众的，又没有什么主张，还是他同张春桥同志直接打电话告诉他的办法（似乎也告诉了几条），结果大会开成了，夺权成功了。张春桥还吹什么他创造了‘上海革命’，这是贪天之功为己有。

陈还说：“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张春桥吹的那样好。是在毛主席同意的情况下，把张春桥的对立面镇压下去的。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是花了很大代价的。中央支持，又允许镇压，哪有搞不好之理！”

另外，陈伯达还谈了张春桥参加“九大”修改党章就到处吹嘘自己，我写的文章很多，我从来都不说。

此外，陈伯达还讲了张春桥的许多坏话。

陈伯达组织人拟写有关国家主席的宪法条文。

吴法宪要陈伯达搞一份马、恩、列论天才的语录。陈伯达用电话传给他，由他整理。他自己还搞了一份林彪论天才的语录。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四日早晨七时，叶群要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到她那里去，商量林彪讲话以后的事。

叶群说我先给你们讲讲首长的意见：

第一，首长的讲话是大是大非问题，要宣读语录，我们几个都要准备支持首长的讲话，坚持天才的观点。

第二，坚持在宪法上设国家主席。要用眼泪表示自己的无产阶级感情。

第三，发言中千万不要点张春桥、康生的名，更不可摸“十一楼”的屁股。

第四，不要扩大打击面，打击面宽了，毛主席那里通不过。

最后，叶群说：我们几个都在各小组会议上带头发言。

吴法宪接连找王秉璋、王维国、陈励耘等人谈话。

李作鹏、邱会作也分别联络人，进行了布置。

同时，吴法宪又打电话给当时留守北京的黄永胜。

黄永胜按照林彪的讲话口径，授意他的秘书宋城，替他起草讲话稿。黄讲了起草讲话稿的要点：（1）拥护林彪的讲话；（2）要指出有人反对在新宪法中写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有人说称天才是“讽刺”，这是反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的；（3）长期以来，我们党内有许多情况不正常，等等。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四日上午八时，除毛主席、林彪之外，参加九届二中全会的全体人员在庐山礼堂开大会，听林彪讲话的录音。

会议由汪东兴主持，周总理、陈伯达、康生都参加了。录音播放了两遍，十一时半才散会。

在播放录音的过程中，有人提议将林彪的讲话稿印发给大家，到会的人都鼓掌，表示支持。周总理要汪东兴去请示毛主席。

散会后，汪东兴报告毛主席了。

毛主席说：“他们都同意印发，我没有意见，你就印发吧！”

毛主席还嘱咐说：讲话稿要由林彪审定后发。

汪东兴将毛主席的指示立即用电话报告了周总理。

周总理说：“你抓紧办理，先印出清样，送常委审阅。”

汪东兴让王良恩去林彪处取讲话稿，没有拿来，25日又去拿，还是没有拿来。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四日中午，叶群和林立果又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商量下午小组讨论的事。

林立果说：爸爸说你吴司令立了大功。

叶群说：我向林彪同志说了，是你吴胖子先提出来的，大家都赞成，林彪同志听了后很高兴。

叶群要他们串连空军、海军、总后一些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在会上发言等等。

吴法宪把陈伯达搞的语录给叶群看，叶群说：很好，最好能给我一份。

汪东兴向吴要了拿去打印，并给吴几份。吴给了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刘贤权各一份。

（据汪东兴说：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四日上午散会时，陈伯达在礼堂门口塞给汪东兴一份材料，他对汪东兴说：“这份材料请打印5份。”汪东兴问：“你是要发给常委吗？”他说：“是。”汪东兴交代会议秘书处打印20份。一直没有发出。）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各组讨论林彪的讲话。

下午，邱会作参加西北组的小组会。开会前，吴法宪打来电话说：“姓汪的来电说，他已经发言了，叫我们快发言，也叫空军、海军、总后及其他军队同志发言。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今天发言表示你自己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明天发言就算随大流了，今天发言很重要。要尽快发言。”

邱说：“姓汪的都指挥到我们头上了。”

吴说：“人家也是好心嘛！《语录》你拿到了吧，这是汪主任亲自给我的，让军委办事组‘近水楼台先得月’，先睹为快了。”

邱说：“对对对，知道了。”

陈伯达、汪东兴、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分别在各组带头发言。他们在同一时间，引用同样的语录，按照事先商量好的统一口径，大肆煽动。

在东北组讨论中

周恩来出席这个组的讨论。他发言拥护林彪的讲话，肯定林彪的讲话对宪法、对计划、对战备有重要意义，同意天才的观点。他说：尽管毛主席叫我们不要总强调三个里程碑的观点，但客观上就是这样。

在华北组讨论中：

下午 3 点钟，陈伯达到华北组参加讨论。他到会场时，有一位同志正在发言。主持人打断了这位同志的发言，请陈伯达先讲。

陈伯达说：“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可以说是斗争的结果。……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话是一种讽刺。……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有的人说世界上根本没有天才，但是他认为他自己是天才。我们知道，恩格斯多次称马克思是伟大的天才，他的著作是天才的著作。列宁多次称赞马克思是天才。斯大林也称马克思、列宁是天才。我们也称过斯大林是天才。否认天才，是不是要把马克思、列宁全盘否定呢？更不用说要把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一笔勾销。我看这种否认天才的人无非是历史的蠢才。”

他在插话中还说：“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得跳起来了。”

陈伯达讲完后，陈毅接着发言：

陈毅说：我到石家庄后没有看到设不设国家主席的文件。据我所知，毛主席不愿当国家主席。如果他改变了初衷，愿意当国家主席，我赞成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讲到毛主席的天才，我谈谈自己一贯对毛主席的看法。从一九二七年认识毛主席起，我犯过错误，反对过毛主席。后来我发现毛主席经过在革命实践中的锻炼，领导中国革命确实有天才，因此我决心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天才这个解释，主要

是从实践中经过锻炼，锻炼了人的才能。这样解释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毛主席是天才，是经过几十年锻炼出来的天才。

这个问题不简单。我陈毅一听就知道有人反对毛主席了。在文化大革命四年之后发表这样的言论，是一种罪恶，不管他是公开的，还是背后讲的，说这种话的人是反革命，是帝修反的走狗。这种人应该开除党籍，交群众批判。他们是什么居心？用心何在？不能不引起我的义愤。

我犯过三次大错误，是犯错误的人。我愿意站在林副主席这一方面参加战斗，别以为我靠边站就不能保卫毛主席，不论在什么地方，就是有人在沓兑里反对毛主席，我陈毅也要把他揪出来。这次我可要坚决与他们斗，他们已把我打到阴沟里，我还是要与他们斗！

有人当场说：你还有资格讲话！

陈毅说：我怎么没有资格讲话？我没有保卫毛主席的资格了？

其他一些同志纷纷发言表态，都建议在新宪法中恢复设国家主席一节，赞成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当时汪东兴也参加华北组的讨论。他也在会上发了言：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

他说：有的人不仅不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连毛泽东思想都不要。

他说：我们党内还有这样的野心家，这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路线，是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我看，这种思想是最反动的。我们不容许这种思想在我们党内泛滥。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他说“中央办公厅机关和八三四一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愿望，是八三四一部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

河北省的四位劳动模范先后发了言：一致对宪法修改草案不设国家主席提出质疑，认为宪法起草委员会有问题，还点了康生的名。

华北组的会议结束，李雪峰、郑维山、汪东兴、解学恭、吴德等都没有走，

李雪峰问汪东兴：今天这事毛主席知道吗？

汪东兴说：知道。

陈毅问汪东兴：汪主任，汪主任，我是不是又犯了错误了？

汪东兴说：没你的事，老实呆着。

郑维山说：汪主任，事情有变化啊？

汪东兴说：你这个郑维山，再也不要糊里糊涂了，同志！你要知道，问题严重呢，我们林副主席真是了不起，要不是他发觉得早，又一次出来捍卫毛主席，问题可就严重了。

郑维山说：那么毛主席知道这件事吗？

汪东兴说：知道，不让点名。

萧劲光说：这是怎么一回事？

汪东兴说：你老糊涂，笔杆子压枪杆子，厉害着啦。

几名工人委员请示吴德，要表态。吴德说：这个态度你们怎么表？假如问题涉及中央的负责人，按照党的原则，应该先报告毛主席，毛主席就在庐山啊！

在华东组讨论中

二十四日晚，在华东组讨论中途，江青到会。

程世清说：宪法还是应设国家主席。一些人附和。

许世友说：还是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吧。

江青说：我觉得不设国家主席，可以减少国家机构的层次。关于这个问题，主席已经作过多次指示，你们也都听过传达，大家还是尊重主席的意见吧。

陈励耘说：不设国家主席，群众在感情上通不过。

江青说：群众要我们去做工作嘛。

程世清说：毛主席也应该听听群众的意见嘛。

江青说：我们要看得远一些。毛主席不但高瞻远瞩，而且深谋远虑……要知道，设了一个国家主席的位置，就会有人伸手的。主席都考虑到了。至于主席自己，他是坚决不当国家主席的。他说过，不要黄袍加身……宋太祖赵光胤在陈桥兵变时，部下给他披上黄袍，拥他当皇帝。毛主席不愿意别人拥护他当国家主席。

其他的人都不吭声了。

江青对许世友说：许师傅，你来帮帮我的忙。

许世友说：别的事我可以帮你的忙，这件事我思想还是不通。好了，好了，今天就讨论到这里。江青同志，欢迎你什么时候到南京去。

在中南组讨论中：

叶群在中南组发言说：“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的多、懂得的多。难道这些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

李作鹏在中南组发言说：“本来林副主席一贯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有伟大功绩的。党章也肯定了的，可是有人在宪法上反对提林副主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主席的风。这股风不能往下吹。有的人想往下吹。”

在西南组讨论中：

吴法宪在西南组发言说：

我认为，林副主席的报告是最重要的报告，对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领导，对毛主席发展马列主义，都作了最高度的概括。对我们教育最大。而且这个讲话是在重要的时刻讲的，讲话针对性很强。

开始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怎么写，有人就提出不要“突出”。在全国人民讨论后，有人还不同意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说是在序言中有了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就可以了。

“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对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下马列主义的说法，说‘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如果这样，就是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推翻了林副主席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肯定下来的，怎么能不写呢？……关于天才的说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有过这样的论述。毛主席对马克思和列宁也都有过这样的论述。林副主席关于毛主席是天才的论述，并不是一次，而是多次（接着，他念了毛主席、林彪以及马、恩、列、斯有关天才的语录）。大家听听这些语录，怎么能说没有天才呢？……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还有人反对学习老三篇。”

在小组会中间休息时，有很多人向吴法宪打听是谁反对天才论和学老三篇。吴法宪对张国华和梁兴初说：这个人张春桥。并要他们坚持设国家主席、坚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后来，李先念也问吴法宪谁反对天才论？吴法宪说是张春桥。李先念说：噢，是这个家伙！我还蒙在鼓里。

晚饭前，林彪叫吴法宪去他住的地方。

林彪对吴法宪说：毛主席讲了，什么人也不要点名，尤其不要点康生。康生是常委，一端出来，打击面太大，毛主席肯定不赞成。一定要记住，不点名。你也不要讲有人反对学老三篇。

吴法宪说：我在会上已经说了，我说了以后，曹轶欧很紧张，表示反对学老三篇是错误的。

林彪说：你回去和李、邱商量一下，不要点康生的名。

在西北组讨论中：

邱会作的发言主要是三个内容：一是，热烈拥护林副主席在全会上的讲话。二是，严厉谴责反毛主席的人。他指出，在九大之后的中央委员会内部还有人反毛主席，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我们要提高警惕。三是，宣读了陈伯达搞的马列论天才的《语录》。

他说“林副主席说过‘毛主席是天才，思想是全面继承，捍卫，……’这次说仍然坚持这样的观点。为什么在文化革命取得胜利，二中全会上还讲这个问题，一定有人反对这种说法，有人说天才，创造性发展……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为什么在这次会上林副主席又提出这个问题，我认为有人不同意，不然为什么又提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动摇的，不能有形形色色的谬论，不能利用主席的谦虚来反对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问题。”

康生说：完全同意邱会作的讲话，邱会作同志马列主义学得好！

会后，邱会作对周恩来说：“我的发言，还只是一个开头，我准备清算造反派对我的摧残！”总理说：“不要心血来潮，要考虑成熟再说。”

晚上，邱会作继续参加小组会。会议还没有开始之前，张秀川同邱说：陆定一式人物就是指张春桥吧？邱回答说：“独立思考！”张碰了他的钉子。小组会正式开始时，邱用纸烟盒子给张写了一个条子。大意是：“你指对人了，但不能点名，可以表示愤怒！”张看到他的条子后表示满意。

小组会的中间，邱在厕所里碰到曹里怀。邱问他发言没有？并鼓励他对林总的讲话要赶快表态。曹回答说：“这是大是大非问题，我一定会表示自己的态度！”

邱会作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从上述情况来看，我在小组会上是比较活跃的。造反派把我整得太惨了，我对他们的后台中央文革是不满的，这也是我能够活跃起来的思想基础。我是坚决反对造反派的，这点是众所周知的。

在小组讨论中，有少数人没有跟着起哄，如刘建勋、李德生、吴忠、吴德等，他们认为，情况不清楚，中央没有明确的指示。

老资格的中委，除了陈毅外，发言不是很激动，但也都表了态。

聂荣臻说：“古人说大奸似忠，反对毛主席的人就是属于这种人。革命的人是不会反对毛主席的，有时不慎重，说错了句把话的情况是有的。”

陈云说：“林副主席是号召我们起来战斗！这种战斗是一定要参加的。我身体不好，不能上前线，在后方做点服务工作是可以的，也是应当做的。”

李先念说：“我是戴了‘二月逆流’帽子的。我不翻案，但我一定听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挥，积极参加战斗。”

陈毅说：“谁反对毛主席就同他斗！我虽然身体患重病，也要手扶肚子站起来同他们斗争。九大之后，我是被打在阴沟里的，现在我必须爬出来，跟着林副主席一起战斗。”

邱会作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在 8 月 24 日那天的下午开始，庐山的战火确实是烧得很旺盛的，实际上是对中央文革实行了讨伐！在二中全会上，并不只是陈伯达、汪东兴、吴、叶、李和我等反对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这些中央文革的要员，而是极大多数中央委员共同思想和行动。大多数人对中央文革是痛恨的！今天有林总带头反对中央文革，极大多数人都感到由衷的高兴！中央文革在文化大革命中整人太多，他们是众矢之的，真有“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之势！尤其是汪东兴和陈伯达的表现，使毛主席不能接受。汪东兴是毛主席身边的人，是在毛主席身前身后办事的人；陈伯达是党内理论家，是“最能准确表达毛泽东思想”的人，他们都是毛的人。他们却站在林彪一边，带头发江青、张春桥的难，发中央文革的难，毛主席是不会答应的。

一九七零年八月二十四日晚，陈伯达到林彪处。

陈伯达问林彪关于林彪对讨论的一些意见。

林彪反问：你听谁说的？

陈伯达说：叶群。

林彪说：这事你知道就行了。

一九七零年八月二十四日晚，李作鹏给叶群的亲笔信

叶群同志

今天简报看了一下，是比较抽象的接触了问题，没有更多实质性问题。似可以发，请您再过目。至于我们两人发言的书面材料，可以整理，但在简报上不挂号为机动，你意如何？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四日晚上，汪东兴向周总理请示说陈伯达要打印的语录还没有发，怎么办。

周总理在电话中说：这个语录不能发，封存吧。

汪东兴将陈伯达提供的打印语录的原稿和尚未发出的 20 份语录封存了。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四日以后，部分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代表所在省、市、自治区联名写信给毛主席和林彪，表态支持拥护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五日上午，全会第六号简报(即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印出来了。全文如下：

华北组二十四日上、下午讨论了林副主席极其重要的讲话。伯达同志、东兴同志出席了下午的小组会，都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另有简报）。

刘锡昌、郑维山、郭玉峰、聂元梓、刘子厚、马福全、钱学森、邝任农、吴涛、吴忠、尤太忠、彭绍辉等十二位同志发了言。陈毅同志也发了言。

大家热烈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重要、非常好、语重心长的讲话。认为林副主席讲话，对这次九届二中全会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林副主席是我们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榜样，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高，用得好，在每个关键时刻，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最好、最正确，这种态度，代表了我们的心愿，代表了全党的心愿，代表了全军的心愿，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愿，代表了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心愿。使我们很感动，很激动，很触动，是个极大的督促，极大的鞭策，极大的教育。大家表示要坚决按照林副主席指出的这个方向前进，努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紧跟毛主席。刘子厚同志说，学习林副主席讲话，使自己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态度感到更亲。过去学习毛主席思想就是学得不好，就是有迷迷糊糊的思想，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前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今后自己要警惕，一定要努力学好毛泽东思想，改造好自己的世界观。

大家听了伯达同志、东兴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感到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别是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认为在经过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党内有这种反动思想的人，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

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为了反击这种反革命阴谋活动，钱学森同志首先建议在宪法上，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接着汪东兴同志进一步建议宪法要恢复国家主席一章，大家热烈鼓掌，衷心赞成这个建议。大家认为，不能让妄图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主席的阴谋得逞，不能把减少毛主席接待外宾的事务工作作为借口，实际上现在绝大多数外宾，毛主席都接见，几乎到中国的外宾是毛主席不见不走。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不是一样在接见外宾吗！

马福全同志说：我们河北省广大群众在讨论宪法时，一致认为只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才能领导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只有林副主席，才能百分之百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贫下中农、工人阶级。强烈要求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我代表河北省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要求宪法上写上。

林彪让秘书把这份简报讲给他听。林彪听后哈哈大笑，说“听了那么多简报，数这份有分量，讲到了实质问题。”

李作鹏拿着这号简报，对邱会作说，你看人家登出来了，你们西北组温度不够。

吴法宪马上找小组会议记录人员说，西南组的简报要参照这号简报改写，要把他的发言要点写进去，要把气氛写得足一些，并亲自规定要用那些词，如“篡党夺权的野心家、阴谋家”、“定时炸弹”、“罪该万死”、“全国共讨之，全党共诛之”，等等。

邱会作提出要把他的发言单独出简报。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五日上午，张春桥紧急约见江青。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五日上午，江青带张春桥、姚文元向毛泽东汇报小组的情况。

江青报告说：大会会务组今天出了华北组的简报。各组都有刘少奇的阴魂，他们要揪跟你造反的人，你一定要保呀！他们是冲着文化大革命来的呀！

毛泽东要江青回避，听取了张春桥、姚文元的报告。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五日上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到周恩来处谈话。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五日上午，汪东兴打电话给吴法宪，告诉他：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没有经过联系，突然闯到毛主席那里去了。

毛主席没有接见江青，对她说，你走。

江青走后，毛主席单独见了张姚两人。

两个人在那里抱着毛主席的大腿哭，把毛主席的裤子都弄湿了。他们说：现在各组都在揪人，连华东组也要揪人了，而且要追查后台。

主席对他们两个说了些什么，不知道。

这个情况已经告诉了叶群。叶群叫把这个情况告诉你。你要沉住气。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五日吃中午饭时，毛主席叫人通知汪东兴去。

毛主席问汪：“看到六号简报了吗？”

汪说：“刚看到。”

毛主席说：“他们(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已经过来了。他们说六号简报影响很大。”

毛主席接着严厉地说：“你汪主任了解我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还派你回北京向政治局传达过，你怎么又要我当国家主席呢？”

汪说：“我听陈伯达发言说，有人听到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就欢喜得跳起来，我很气愤。”

毛主席严肃地说：“那就让他们去高兴吧！”

汪说：“在群众讨论修改宪法时，大家都拥护你当国家主席。”

毛主席严厉地说：“不当国家主席，就不代表群众吗？你强调群众拥护，难道我不当，群众就不拥护了？我就不代表群众了吗？”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五日下午，林彪乘车去参加毛泽东召集的常委会。

叶群知道后急忙乘车追赶，车未停稳时叶群急忙下车，跌了一跤。

叶群对林彪说：如果会上有什么情况，除了要保吴、李、邱外，千万要保汪东兴。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五日下午 2 时，毛主席要汪马上通知政治局常委及政治局委员 3 时到牯岭毛主席办公处开会。

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来后，毛主席分别同他们谈了话。

毛泽东与康生谈话时说：不当这个主席了，不参加会议了，这个会议让林彪去开！

毛主席还与许世友谈了几句话。当时，毛主席在院子里，许世友来了，毛主席与他握手时说：“你看，我这个手凉不凉？”

许世友说：“凉。”

毛主席说：“你们让我多活几年多好啊！还让我当主席呀？”

毛主席与政治局常委商谈后，对来开会的政治局委员们严厉批评陈伯达等人在华北组的发言违背了九大方针。

毛泽东说：我们共事三十多年，你阴一套，阳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政治局在山下商议不设国家主席，大家没有发表不同意见。上了山你就变了卦，搞突然袭击，你是个道道地地的变色龙！我毛泽东是不当这个国家主席的。要当，你陈伯达当好了。你们去当！

关于国家主席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当国家主席就是要我早点死。如果再继续这样搞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闹；再不然，就辞去中央主席职务。

会议决定：分组讨论立即休会。

毛泽东宣布三条决定：停止讨论林彪讲话；收回华北组简报；责令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检讨。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五日下午、晚上，毛泽东召见了叶剑英及一些人吹风。

周恩来先后去江青、康生处谈话。

周恩来同前来的陈伯达、汪东兴谈话。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五日下午，华东组继续讨论。

许世友说：林副主席是我们的光辉榜样，这一次又给我们树立了捍卫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范例。我们就是要像林副主席那样和一切反对毛主席的野心家斗，和

一切违背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斗。那些家伙天天喊造反，他们造谁的反？党和国家都被你们搞乱了。

陈励耘说：现在有人反对林副主席，林副主席是毛主席亲自指定的接班人，反对林副主席就是反对毛主席。那些反对林副主席的是些什么狗东西！有些人还反对老干部，整我们军队干部。这些人应该站出来，把问题说清楚！

许世友说：老陈，你讲得对，我同意你的意见，你的意见代表了大多数军队干部的意见，叫他到江苏农村去劳改！

有人说：不把反对毛主席的人揪出来，决不收兵！

陈励耘对着坐在旁边的张春桥大声说：自己站出来嘛！

王维国说：坚决打倒一切野心家、阴谋家！把他们揪出来示众！

有人带着呼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打倒野心家！打倒阴谋家！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

郭沫若说：我是懵懂派，搞不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今天，才知道全会上出了大事！

马天水、杨得志、韩先楚先后向陈励耘打听：他指的究竟是谁？

许世友在江苏小组向毛泽东、林彪写信：几个犯错误的人不能留在中央工作，而应该下放基层锻炼。

许世友拿着信对韩先楚说：那个鳄鱼眼的气数到了，我再给他补一枪。

韩先楚说：我也给他补一枪。

杨得志也写了一封同样内容的信。

这三封信和南萍、熊应堂等人的信，都送到大会议务组，转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把三封信转给叶群并附一条子：到此为止，存你处。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五日下午，西南组开会，张国华去参加召集人会议，吴法宪念华北组简报，并按叶群的布置组织全组举手通过了设国家主席的建议。

四时，张国华回组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毛主席在下午两点召集中央常委和各大组组长会议，决定停止讨论和学习林副主席的讲话，同时也要停止批判。现在会议已经发展到要揪人的地步了，有人写信要把反对天才论的人揪出来下放，说这样的人不能在中央工作。这个空气太热了。要冷下来。因此，毛主席决定，休会两天，换换空气，关于设国家主席的事也不要提了，毛主席说他不当国家主席，

林彪同志也不当国家副主席。天才问题也不准再提了。这两天把会议的情况搞清楚，然后再开会。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五日下午，林彪开会回家，立即把叶群叫到房间。

不一会，叶群出来对工作人员说：首长开会回来了。主席说，张、姚烧一烧可以，但不要烧焦了。现在要降温了，压缩一下空气。我的书面发言不要整理了，快把草稿给我。

叶群还叫人把她在会议上的发言记录撕下来。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五日晚饭后，吴法宪到林彪处打听消息。

叶群说，林彪到毛主席那里开会去了。不要紧张，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情况。

不久，林彪回来了。

林彪说：毛主席的态度变了，不高兴了。他批评了陈伯达，说陈伯达在华北组跳出来，起哄要揪人。还说国家主席和天才论的事情都不要再提了。就是这个情况。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不要紧张。

吴法宪打电话给邱会作：你的发言简报发了没有？情况有变，不要发了。

吴法宪打电话给北京的黄永胜：黄永胜要吴法宪把他的书面发言烧掉。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五日晚，周总理主持召开各大组召集人的会议，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

当日，吴德将华北组几个工人委员的情况向周恩来汇报。

周恩来说：你为什么不在会上反驳？

吴德说：不了解情况，不好发言。

周恩来说：不是很好讲嘛：你们反对宪法起草委员会，主任是毛主席，副主任是林彪，这不是反对毛主席吗？

吴德同陈一夫商量以后，由陈一夫执笔给周恩来写信，反映聂元梓到处串联，揪所谓反对毛主席的人。会议有些不正常。请示总理以后的会议怎么开下去？

周恩来将信批转政治局传阅。

当晚，周恩来指示吴德组织委员中的工人同志开个会，批判聂元梓，解决她的串联问题。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六日早，周恩来致函康生。

称：为使林副主席讲话不发生任何副作用，我已阅过几次，由于个人精力有限，我再转请你校阅一次。请你起来后认真读两遍，有需要改动处，请用铅笔改，于午前退我亲改。此事纯属爱护副帅，忠于党，忠于领袖。以此共勉。暂勿告人为慰。

午前，康生将林彪讲话退给周恩来说：我看了两遍，只在第三页上改了一个标点，如果林副主席同意发表，我看可以发给到会的同志们学习。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六日，毛泽东继续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组组长开会。

毛泽东说：我是一方面军的，可是我身边没有一方面军的人；我是湖南的，我身边没有湖南人。

还说：“一句顶一万句”、“四个伟大”这些说法都不恰当。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六日，各组传达关于暂停开小组会的决定。

这时，叶群、李作鹏在中南组，吴法宪在西南组，邱会作在西北组，都开始收回有他们发言的记录稿，已经写成的简报稿子也不让送了。

叶群私自跑到简报组，撕毁了她在中南组发言的记录。

邱会作也要回记录，剪去了他发言的那部分内容。

迟上庐山的黄永胜，见形势不妙，也销毁了他事先准备的发言稿。这些情况由各小组反映上来后，报告了毛主席、周总理。

毛主席笑着说：“何必当初呢！当初那么积极，那么勇敢，争着发言。今天

又何必着急往回收呢！”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六日，勃列日涅夫偕同国防部长格列奇科率领的武装部队代表团，窜到中苏边界附近的阿拉木图，在那里发表蛊惑人心的讲话，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出动了火箭、炮兵、坦克和空降部队。

随后，勃列日涅夫又到接近我国的塔吉克、吉尔吉斯、土库曼、乌兹别克等中亚地区活动，一直呆到九月九日，我党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以后，他才离开中亚。

格列奇科还到后贝加尔、蒙古等地活动，视察中苏边境地区的武装部队，叫嚷边防军要“加强战斗准备”，对我施加压力。同时，继续发表反华文章，对我进行恶毒攻击，但却不点林彪的名，集中攻击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六日下午，周恩来、康生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谈话。主要是追查小组会发言的情况。

康生说：吴法宪造谣，汪东兴点火，陈伯达起哄，陈毅跳出来。

会后，周恩来到林彪处谈话。

晚上，周恩来到康生处谈话。

以后，周恩来又约全会六个小组组长开会。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六日以后，叶群几次打电话安抚吴法宪说：“你犯错误不要紧张，还有林彪、黄永胜在嘛！只要不牵涉到他们二人就好办，‘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七日，毛泽东继续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组组长开会。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七日上午，周恩来、康生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谈话。

康生说：你们要交待：这个军事俱乐部是怎样形成的？你们长时间串通一气，还有陈毅这个反革命分子……

吴法宪说：康老，你是中央常委，陈毅是中央委员，他什么时候成了反革命分子？你说话太随便了吧！说陈毅和我们串通一气，你康老有根据吗？他在华北组发言说了什么，我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成了我们军事俱乐部的人呢？再说，我们是

军委办事组，这都是公开的，没有什么军事俱乐部。八月十四日讨论宪法的会议你康老也是在场的嘛，这个争论你是当事人，怎么是我造谣呢？

周恩来说：康老的话说错了。

邱会作说：你康老在西北组讨论的时候，赞成我讲的话，还表扬我说我马列主义学得好。这个话你忘了吗？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七日上午，陈伯达打电话约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到他的住处，对他们说：

这次找你们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你们几个今后再不要同我往来了，不要相互打电话，也不要写信了。

毛主席批评了我，说我自以为懂得理论，鼓吹天才论，在华北组起哄。毛主席说我欺骗了你们，你们把我编的语录烧掉吧。另外，毛主席还点了汪东兴、陈毅、邝任农的名字，你们也要注意。

毛主席批评我们有一个军事俱乐部，并且要我到康生、江青那里去承认错误。结果康生、江青把我骂了个狗血淋头，骂了一个晚上还嫌不够。他们说我是叛徒，是叛变中央文革，出卖江青、康生、张春桥。说我投靠军委办事组，把林副主席绑在我陈伯达的战车上。勾结军队想杀害他们。说我可耻等等，什么话都说了。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七日上午，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从陈伯达的住处出来以后，又到了林彪那里。

林彪只说：毛主席是批评了陈伯达。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七日，汪东兴写好了第一份书面检查。检讨了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的做法、言论是“我没有听毛主席的话，我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也违反了政治局会议的意见，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动。我的内心极感沉痛。”并表示要“接受这次教训，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坚决听毛主席的话，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提高觉悟，坚决执行毛主席在‘九大’提出的方针——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毛主席看过汪东兴的书面检讨后说：这个检讨书可以发到全会上。

汪东兴的检讨书，经周总理批阅修改后印发了。

汪东兴在华北组讨论会上做了一次口头检查，内容和书面检讨的差不多。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七日下午，周恩来同林彪、陈伯达谈话，批评了陈伯达。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七日下午，江青会见叶群

江青起床后，对秘书杨银录说：叶群同志犯了错误，三番五次叫我向毛主席求情。她是副主席、副统帅的老婆，不去为她求情吧，怕林副主席不高兴；去吧，又怕主席怀疑我和她之间有什么关系，将来说不清、洗不净。这件事，实在使我为难，想来想去，还是硬着头皮见见她，听听她说些什么。说不定叶群今天下午就会来找我，她如果来了，你报告我，我再考虑见还是不见。

十分钟后，叶群就到了。

她对杨银录说：我请求江青同志见见我。你们秘书知道不少情况，不怕你见笑，我是请求江青同志批评帮助的。谢谢你，杨秘书。

大约半个小时后江青与叶群手挽手高兴地走出来。

叶群对江青说：江青同志今天见了我，使我很感动，您对我的帮助，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江青说：请你回去代问候林副主席。

叶群说：一定，一定，谢谢江青同志。也请江青同志保重身体，您的身体健康，是我们的幸福。

送走叶群后，江青立即到毛泽东那里报告情况。

毛泽东对江青说：关键时刻头脑要清醒，屁股别坐错了位置。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七日晚上，周恩来等参加部分政治局委员会议。

会后，周恩来去康生处约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谈话。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七日晚上，周恩来打电话告诉吴法宪：

主席说，吴法宪不回北京，同时要黄永胜立即上山，李德生回北京看家。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七日晚上，周恩来、康生到林彪那里汇报吴法宪等人的情况。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七日晚上 12 点以后，陈伯达来到吴法宪处问他讲没讲过“有人利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这句话。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八日早上，周恩来找吴法宪谈话。

周恩来说：你是办事组副组长，组长没有来，你们组里出了事情，你应该主动承担一点责任。还是写个检讨，把问题说清楚算了。这样做的目的，最主要的是替副统帅担责任。你明白，问题是副统帅的讲话引起来的，要保护副帅，不然的话又要攻到副帅的头上去了。

吴法宪说：我一定写这个检讨，但是怎么写，我觉得有点难。我想是不是检讨这样一条，说林副主席的讲话是我提出来要讨论的，这样做干扰了大会的方向。

周恩来说：好哇！你也应当替我担一点责任。不然的话，是我主持会议，好像是我提出来要讨论林副主席的。这事是你提出来的，然后大家同意的。

吴法宪说：我回去考虑一下，尽快写出一个检讨，先请总理审阅。

周恩来问：你们搞语录了吗？

吴法宪说：是我向陈伯达要的，他给我找了几条语录，我打印了几份，给了李作鹏、邱会作各一份。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八日，全会以大组为单位听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录音。

放了两遍，大家完全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和斗争的性质。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先后去林彪、康生处谈话。

之后，周恩来约政治局部分成员开会。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八日开始，林彪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召集陈伯达等六人，在他的住处开了三次会。每次会 9 时开始，11 时结束，每次会约两小时。

第一次会议开始时，林彪说：“毛主席要我同各位谈谈，做点思想工作，我们的会要开两三次，每次会的情况，请汪东兴向主席口头报告，我就不另写书面报告了。”

林彪当面批评了陈伯达：“你的书生气太重了，考虑的太多。主席批评我能不能再看张春桥两年，主席说得对。我们部队的干部要和地方干部搞好团结。就是这些嘛。”

对于让林主持这样的会，后来林彪说主席在“耍”他，他也只有应付差事。

到会的人都说了话，说的内容都是有关团结的问题。大家的话都说得很简单，都是属于表态的话，实质性的话一句也没有。这种会是纯粹做样子的。

第二天开会的时候，林彪有些调侃地说：“你们说说，是不是有组织，有预谋的？你们为什么在同一时间，讲了同样的话？”

三天的会，林彪没有多讲一句话。

叶群说林彪的态度是：“不改变自己的观点，不干扰毛主席对问题的处理。”

叶群还说：“林总说，吴法宪提出检讨，这是他的权利。如果他要问我（林），我就说检讨是因为有错误，你吴法宪没有错，你检讨什么？！”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八日晚上，吴法宪把要他作检讨的事报告了林彪。

林彪对吴法宪说：昨晚，是康生的意思，约周总理到我这里来了，说汇报你们几个的情况。康生说，这次庐山会议的主犯有三个：一是陈伯达，二是吴法宪，三是汪东兴。是吴法宪造谣，汪东兴点火，陈伯达起哄，还有陈毅跳出来。我对他说：我不同意这个意见，这个问题的根据不充分嘛！说吴法宪造谣，八月十四日的争论你也在场，怎么是造谣呢？吴法宪这个人我了解，从一军团到四野，跟了我几十年，从来没有听他造谣过。再说陈毅和吴法宪，汪东兴他们也没有联系。说到这里，周总理解释说，陈毅是跟着陈伯达来的，发言表示同意陈伯达的意见。我说，这个我就知道了。后来周总理看到气氛不好，就对康生说，我们走吧，副主席要睡觉了。这样他们才走了。

林彪说：“你不要作检讨，你没有错。讲话是我讲的，错了我负责。要检讨你检讨。你的检讨我也不看。用你的名义上送。我们这些人，行武出身，打仗懂一点，搞武的行，搞文的不行，搞文的搞不过他们。这次不该讲话。”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康生及全体政治局委员、各大组组长、各省市区第一书记参加。

由林彪主持。

会上，周恩来、康生传达了毛泽东几天来的一系列讲话，着重讲了团结问题。

周恩来说：在全会一开始的分组讨论中，陈伯达、吴法宪等人作了有代表性的错误发言把修改宪法的讨论引导到一个错误的方向去，以华北组最为突出。直到今天开会前，一直停止了小组会，我们这几天的工作就是要说服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作初步的检讨。

周恩来说：主席对犯错误的同志的态度一贯是，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要给犯错误的同志认识、改正错误的时间，对他们还要看，不能着急。全会还有两项议程，不能耽搁久了。大家要下决心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不折不扣地去做，一定要把这次会议开好。

康生说：陈伯达是假马克思主义，自称是理论家，实际是政治骗子，他搞分裂活动。这次庐山会议是他第一个跳出来，分裂党中央，搞宗派活动，参加军事俱乐部，欺骗工农干部，把吴、李、邱几个人也拉上了。

会上，陈伯达、吴法宪等作了检讨。

陈检讨的主要内容有：二十四日在华北组会上作了煽动性发言；不听毛主席的话，坚持要设国家主席；歪曲了林彪的讲话，引起大家思想混乱；乱讲天才问题等。

接着，由吴法宪作检讨。

接着，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发言。

会议一直开了四个小时。

一九七零年八月二十九日，陈伯达打电话给林彪，要林彪修补林彪的讲话录音。

陈伯达说：“林副主席讲话很好。表达了主席思想。不过，那里面有没有讲到主席多次强调这样的原话：‘是开一个团结的会议，还是分裂的会议，是开一个胜利的会议，还是失败的会议。’我记不清楚了。如果还没有讲到，最好想办法在录音里面加上去。不晓得这个意见对不对。”

林彪电话答复：“谢谢伯达同志的关心”。

一九七零年八月二十九日上午，周恩来通知李先念、李德生明天回北京担任中央值班。（原定是李先念、吴法宪）换纪登奎、黄永胜上山。

一九七零年八月二十九日晚上，林彪找吴法宪谈话。

林彪说：毛主席又和我谈了话，说对张春桥这个人还要看两年，如果不行，拿掉。到时候我交班给你。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周恩来召见刚到庐山的黄永胜。

谈话一开始主席就问：“到庐山来紧张吗？”

黄永胜：“我刚到，就来主席这里。”

毛泽东说：你一个组长不在，你的副组长和副总长，就在这里起哄。一方面军的干部不如四方面军的干部好，四方面军的干部比较谨慎。一方面军的人骄傲自大。

毛主席：“搞突然袭击，还那样厉害！张春桥手无寸铁，你们搞他干什么？”

黄永胜一听说的是张春桥，也直言回答道：“张春桥不得人心，我们确实有些意见。他特别倚重江青同志，我认为有些事是给主席脸上抹黑。政治局实际上是不团结的，张春桥起的作用不好。总理一直在努力工作，担子很重，很吃力。过去，没有向主席报告清楚，我应当负责！”

毛主席：“你当然要负责，你是一个头。张春桥拍江青的马屁有什么用？”

黄永胜说：“江青自以为有伟大领袖毛主席这张牌嘛！她总认为自己主牌多，又有大王，她总认为自己会赢。”

毛泽东：“大王出过了，小王就当家了。你是和我一起搞秋收起义、上井冈山的嘛！人不多喽。为什么连你都不向我报告江青的情况？”

黄永胜是个政治上挺成熟的人，究竟毛主席怎么看江青，他还没摸透，因此他没有顺着毛的思路往下说，黄说：“我们不想干扰主席。”

毛泽东：“你们能不能让我看张春桥三年？”

黄永胜：“我是在主席领导下参加秋收起义的。几十年来的枪林弹雨，艰苦岁月，我都是跟毛主席的，我都是拥护主席的。但中央文革的一些为人做事，我不能同意。造反派到处冲击，到处夺权，到处打、砸、抢，我不同意。造反派上面有人，问题最难办。”

毛泽东：“你也不赞成文化大革命？”

黄永胜：“我坚决拥护毛主席、林副主席！我不同意的是打、砸、抢。”张春桥不得人心，群众意见很大。

毛泽东说：什么群众！不就是文化大革命中受了委屈的人嘛，还有你们几员大将。文化大革命是我搞起来的，九大的路线是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你们为什么不团结起来批判刘少奇！？

毛主席说：“现在问题都解决了，不把问题带下山去。今后主要是学习、提高认识问题。大家都要执行九大路线，团结起来，把文化大革命搞彻底！”

黄永胜：“我听主席的话，在主席领导下，努力学习，努力工作，搞好团结！”

一九七〇年八月三十日凌晨四点，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终于等到黄永胜回到住处。

黄永胜对他们说了一些毛泽东接见他的谈话情况：

接着，叶群来了。他们一起商量如何检讨的问题，定了几条原则：

一是各自检讨，互不涉及；

二是山上山下没有联系，检讨不牵涉林彪、黄永胜；

三是不揭发陈伯达、汪东兴，以便保护他们。

一九七〇年八月三十日上午，吴法宪把自己的检讨送交周恩来。

周恩来说：这样就行了，主要是对林副主席的讲话在理解上有错误，这个提法好！

康生看后提出批评意见，吴法宪修改了两次，由周恩来、康生签名印发全会。

一九七〇年八月三十日，周恩来连续数次去毛泽、林彪、康生处谈话。

一九七〇年八月三十一日，毛主席写下《我的一点意见》一文。

毛主席在文中写道：

这个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

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

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

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一九七〇年八月三十一日，周恩来同黄永胜、林彪、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谈话。

一九七〇年八月三十一日下午三时，林彪在住处召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汪东兴开会。

林彪说：下午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指示，陈伯达在全党、全国的威信太高了，这次庐山会议要把他拿下来，要我和你们先打个招呼，和陈伯达划清界限。毛主席说，要我先找你们开个会议揭发、批判陈伯达。

陈伯达来了，大家都不发言。

陈伯达说：我犯了错误，连累了你们，不该给你们搞语录，搞语录是欺骗了你们。你们今后不要再同我往来了。

批不起来，会议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

一九七〇年八月三十一日，深夜到次日凌晨，周恩来同康生到毛泽东处，将《我的一点意见》稿取来，给张春桥看过并同张谈话。

一九七〇年九月一日，周恩来同康生到林彪处，将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稿交给林彪看，林表示同意。

周恩来即到毛泽东处对《我的一点意见》稿作个别文字修改，然后决定付印，并将印件交陈伯达阅。

一九七〇年九月一日，各小组开会批判陈伯达。

西南组上午开会，康生参加。会议没有批判陈伯达，实际是批判吴法宪。吴法宪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叶群，叶群报告了周总理。

西南组下午开会，周恩来参加。会议继续批判吴法宪。

周恩来说：你们这样批判就不对头了，我们讲要批判陈伯达，没有讲要批判吴法宪，语录是从陈伯达那里来的，还是要批判陈伯达。

一九七〇年九月一日晚，中央政治局和各大组召集人开会。

毛主席在会上指出：凡是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发言犯了错误的人，可以做自我批评、检查。

毛主席点了陈伯达的名字，要他做检查。

毛主席还要林彪召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这些人开会、听他们的检查。

会议批判了陈伯达。

姚文元说：毛泽东思想是无价之宝，可以战胜一切牛鬼蛇神，也可以战胜“权威人士”。我们要学习毛主席这一重要指示。

张春桥说：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是伟大的马列主义又一光辉文献。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打倒了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司令部。同样，毛主席发表的《我的一点意见》也一定战无不胜。我们要以批判天才论为中心，学习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

姚文元在会上说：不表态本身也是一种态度。

邱会作回应说：表了态，也不定是最好的态度。

会后，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一九七〇年九月二日，全会各小组结合学习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集中开展对陈伯达的批判。吴法宪等人也受到批判。

一九七〇年九月二日，林彪召集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开会。

林彪说：“今天，找你们开个会。你们在会上为什么要在同一个时间发言，为什么都引用了同样的语录。你们要坦白，要交代。”

林彪讲完后，到会的人都不发言。有的翻材料，有的喝水。过了一段时间。林彪又说：“嘿，为什么没有人发言？”

汪东兴发言说：华北组的讨论就是陈伯达放炮后搞乱的。

林彪听了，表情很尴尬。

其他一些人七嘴八舌地讲了一些。会议很快就散了。

一九七〇年九月二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会议。

一九七〇年九月二日，周恩来飞回北京。

深夜，约外交部、外贸部和外经部的领导成员开会。

周恩来在讲话中指出：《参考资料》是否有必要每天登一条毛主席语录？第一，看的人不多；第二，针对性很难办。经过研究，并请示了毛主席，从九月五日起，不要登语录了，《共运资料》也不登了。《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这本语录，未经中央批准，要清查一下。中央已三令五申，不经中央批准不得出版毛主席语录，为什么还乱编东西，怎么这样不谨慎？引用毛主席语录，一不定期是中央批准发表的。不能滥用毛主席的威望。有些话不是毛主席讲的，有的没有发表不能以讹传讹。

一九七〇年九月三日，周恩来飞返庐山，先后参加东北组、华北组和华东组小组讨论。

周恩来在发言中继续批判陈伯达，在提及《我的一点意见》时说：这是毛主席考虑了三天后，才写出来的；陈伯达在中央核心内部长期不合作，他的问题迟早要暴露的。

深夜，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开会。

一九七〇年九月四日，毛主席找林彪谈话。

这一次谈话时间较长，主要内容是怎样批判陈伯达。

毛泽东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下山前开一次生活会，问题不带下山。

一九七〇年九月四日，周恩来先后参加中南组和西南组小组讨论。

一九七〇年九月四日，中央常委召集各组组长会议。

会议决定再延长两天会期。陈伯达不再出席大会。

毛泽东提出：陈伯达如无政治历史问题，我的意见还保留中央委员；但要陈再进一步检查，我看有困难。

一九七〇年九月五日上午，毛主席找陈伯达谈话。

毛泽东说：这几年官做大了，不来了，也不写文章了。参加“军事俱乐部”。

陈伯达表示：我愿意检讨。

毛泽东说：很好。你可以同那几个与你共事的人谈谈。

一九七〇年九月五日，陈伯达到了江青处，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谈话。

江青说：你们名义上拥护林副主席，实际上是要推翻林副主席。

一九七〇年九月五日下午，毛主席和周总理及康生谈了如何结束会议等问题。

一九七〇年九月五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全会公报和国民经济计划等文件。

一九七〇年九月五日晚上，叶群提出林彪应该去看望江青。

林彪给了叶群一个嘴巴。

叶群哭着说：我非常对不起你和几位老总。我们都上了汪东兴的当。主席和江青的关系不是不好，而是很好，这次就是很好的证明。他宁愿不给你面子，也要给江青面子。因此，这次一定要去。去是给主席看的，说明你诚心。

林彪说：主席是把好心当成驴肝肺。

一九七〇年九月六日上午，全会召开全体会议

基本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

通过了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四届全国人大的建议；

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 1970 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

批准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

一九七〇年九月六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闭幕。

在闭幕会议上，毛主席对党的路线教育问题、高级干部的学习问题、党内外团结问题，发表了重要的意见。

毛主席说：“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呀，就照着吹呀，那么，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有些是红秀才哟。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十几本。增加对唯物论、辩证法的了解。……要读几本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一讲读哲学史，那可不得了呀，我今天的工作怎么办？其实是有时间的。你不读点，你就不晓得。这次就是因为上当，得到教训嘛，人家是哪一个版本，第几版都说了，一问呢？自己没有看过。”

毛主席说：“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

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

毛主席说：“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的同意，群众也不高兴。……所谓讲团结是什么呢？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提出团结的口号，总是好一些嘛，人多一点嘛。包括我们在座的有一些同志，历来历史上闹别扭的，现在还要闹。我说还可以允许。此种人不可少。你晓得，世界上有这种人，你有啥办法？一定要搞得那么干干净净。就舒服了，就睡得着觉了？我看也不一定。到那时候又是一分为二。党内党外都要团结大多数，事情才干得好。”

周总理、康生在闭幕会上也讲了话。

会上，中央还宣布了对陈伯达进行审查的决定。

一九七〇年九月六日，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发表

一九七〇年九月六日二十点，江青打电话到林办；林副主席累不累，我想去看他。

林彪回答：江青同志就不要来了，叶群马上去看你。

（据吴法宪回忆录记载：一九七〇年九月六日晚，林彪、叶群“为了缓和一下气氛”到江青处辞行。

江青请林彪注意保重身体。

林彪说：这次不回北京，直接去北戴河养养身体。）

一九七〇年九月六日晚，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要黄、吴、李、邱一道去看望江青。

吴法宪说：他们可能不愿意去。

叶群说：首长都去了，去做做样子嘛。

一九七〇年九月六日晚，叶群及黄吴李邱等人看望江青。

叶群打电话到江青处；杨秘书，请你报告江青同志，林彪同志问候江青同志，请江青同志保重身体。他叫我和黄永胜、吴、李、会作同志去看望江青同志，我们等你的电话，

江青说：请他们现在就来，你快去回电话。

不久，叶群等几个人就到了。

江青说：林副主席身体不大好，本来我要去看望林副主席的，可是林副主席说你们要来，我就没有去。恭敬不如从命。谢谢林副主席，也谢谢你们来看我。

叶群说：林副主席如果知道江青同志要去看他的话，会很高兴的。当然，是我们应当来看您，一来是同江青同志话别，再有一两天我们就要下山了；二来是听取并接受江青同志的批评帮助的。这次我们在会上上了陈伯达的当，犯了错误，林彪同志多次批评我们，说我们头脑简单发热，起了不好的作用，辜负了主席长期的教导，也对不起江青同志，我们一定要向江青同志好好学习，向江青同志道歉，也请江青同志原谅。

江青说：叶群同志，你这话就言过其实了，见外了，你们这次犯错误我心里也难过，也觉得不是个滋味。我们是一个战壕里并肩作战的战友。这件事是陈夫子搞的。本来陈夫子与小张、小姚有矛盾，他们是文人相轻，利用了我们，我们没有即时识破陈伯达的阴谋，上了他的当，接受教训就是了。我们过去是亲密战友，今后还是亲密战友。

叶群说：林彪同志讲，江青同志总是在关键的时候帮助我们，指出努力的方向，总是给我说好话、做工作，所以我约他们四位同志一起来向江青同志表示感谢。江青同志虚怀若谷，海纳百川，您不但没有责怪我们，而是热情地鼓励我们改正错误，继续为党工作。

叶群对同来的四个人说：你们要牢牢记住今天晚上江青同志对咱们的谆谆教导。

黄吴李邱同声说是。

江青说：你们不听毛主席的话，犯了错误。

吴法宪说：我这次犯了错误，对不起江青同志、对不起春桥同志。。

江青说：你们今后要吸取教训，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好，你们也许还要检讨，今后多多联系。

黄永胜阻止吴法宪再说话。

回去的路上，黄吴李邱一起大骂：戏子，戏子，真***窝囊！

黄永胜对吴法宪说：这个时候你还说什么，反正以后够我们受的，还不知道要检讨多少回。

李作鹏说：从此以后没有完，一直到打倒为止。

一九七〇年九月某日，林立果秘密地开出一辆汽车拉上王维国、陈励耘两人，在车上边走边谈，说：

这是一次未来斗争的总预演，演习，拉练，双方的阵容都亮了相，陈是斗争中的英雄，吴是狗熊，我方此次，上下好，中间脱节，三是没有一个好的参谋长。

这些老总们政治水平低，平时不学习，到时胸无成竹，没有一个通盘，指挥军事战役还可以，指挥政治战役不可以。说明了一点，今后的政治斗争不能靠他们领导，真正的领导权要掌握在我们手里。

“首长（指林彪）、主任（指叶群）对你们暴露受损失很心疼”，“看来这个斗争还长”。

一九七〇年九月七日，林彪、叶群下庐山了。

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去九江机场送他们。

一九七〇年九月七日，黄、吴、李、邱同乘一个飞机回北京。

他们在飞机上议论：

- ①黄永胜说：坚持山下山上没有联系，原来没有想到，这是突然出现的情况。
- ②强调八月十三日吴法宪电话报告引起来的问题。
- ③黄永胜不准备作什么检讨。李、邱是否作检讨要看情况发展。吴作检讨只讲自己不涉及别人，主动承担责任，李、邱也不抱怨。
- ④无论如何都不要涉及林彪、叶群、黄永胜，这是大前提。
- ⑤回京以后总理、康生同志和政治局找我们谈话时事先要统一口径。
- ⑥黄、李、邱都警告安慰吴法宪不要多说话，“言多必失”，要沉住气。

一九七〇年九月八日，各省、大军区的负责人离开庐山。

一九七〇年九月九日上午，周总理、康生、张春桥、江青等人离开庐山。

一九七〇年九月九日下午二时，毛主席接见了为全会服务的会务人员。照完像后，下了庐山。

一九七〇年九月十二日，中共中央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通知及附件

1970.09.12；中发〔1970〕56号

各省、市、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中央军委：

现将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基本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发给你们，请你们立即转发给各厂矿、公社、军队、机关、学校、企业事业单位、街道组织的基层领导机构，广泛地组织人民群众进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是一九五四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继续和发展。一九五四年宪法，在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建设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保卫祖国的斗争中，起了伟大的历史作用。在国内外大好的革命形势下，伟大领袖毛主席于一九七〇年三月提出了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并提出了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领导下，经过全党、全军、全国工农兵广大群众半年多的反复讨论提出来的，是党的领导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产物。中央政治局从三月开始进行修改宪法的准备。七月十二日，成立了以毛主席为主任、林副主席为副主任的中共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和起草委员会详细研究了全国工农兵和人民群众对一九五四年宪法的修改意见，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并于八月二十三日提交九届二中全会审查。九月六日，全会基本通过了这个宪法修改草案，并决定动员全国人民进行讨论和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是以毛主席的国家学说的伟大理论和实践为指导思想制定的。这个宪法修改草案，对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领导地位，对于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对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对于人民群众和人民军队的巨大作用，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它力求简明扼要，

通俗易懂，便于群众学习和运用。在全国人民讨论修改和四届人大通过之后，它将成为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夺取新胜利的战斗纲领。

讨论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做好这件工作关键在于领导。希望各级负责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结合学习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向群众宣讲宪法修改草案，发动群众积极提出修改意见。请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中央军委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于九月底报告中央。

贰、本节简论

一、关于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

关于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是在会前就定下的：（一）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问题；（二）国民经济发展计划问题；（三）战备工作问题。

在八月二十二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再次确认了以上三个议题。毛泽东提议增加一个形势问题。并说这是大家最感兴趣的。

会前定的三个议题，已经由有关方面作了充分准备，提出了相关的报告。

常委会决定：第一天的大会，由周恩来、康生讲话。

参加会议的人大多认为需要在会上来解决的问题不多，会议的进行会比较顺利、轻松。有的人甚至作好了在庐山游览、休息的安排。

二、关于林彪在全会上的讲话

其实，林彪在会前作了讲话的准备，并由秘书给他“拉条子”。

但是，在二十二日的常委会上，他明确表示不在大会上讲话。

常委会后，陈伯达专程到林彪处访谈，建议林彪应该在大会上讲话，把张春桥等人的问题提出来。林彪回答：如果讲话，要报告毛主席。

二十三日下午，林彪动身去参加会议前，仍在征求叶群的意见：今天的话讲不讲？

二十三日下午，常委们集合时，林彪突然提出他要在大会上讲话。

有两种说法：一种说，当五位常委集合在一起时，林彪提出他要讲话。毛主席说，那你先讲。一种说，周、康、陈在一个房间，毛泽东和林彪在另一个房间，林彪报告了他要讲话的内容，得到毛泽东的同意，只是要他不要点名。第二种说法是

林彪、叶群对人散布的。毛泽东后来说过；林彪的讲话内容事前不打招呼。看来，真实的情况是，林彪要在大会上讲话，肯定是报告了毛泽东；他要讲的主要内容是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也可能报告了毛泽东。但他的讲话主要是针对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则可以肯定，没有报告毛泽东。就连陈伯达后来也说，他愚蠢地相信了林彪的话。

说林彪二十三日在大会上的讲话是搞“突然袭击”，并不为过。从披露的事实来看，林彪的讲话虽然早有准备，但他自己也一直犹豫不决，二十二日常委商讨议程，他还表示不讲话，而到二十三日下午临开大会前，他才突然提出要讲话。

三、关于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在二十四、五日小组讨论中的活动

林彪讲话的内容，从现在保存的录音来看，主要是讲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作用。他既没有直接点出有人反对毛泽东的思想、路线和领袖地位，也没有公开提出要设国家主席、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更没有点任何人的名字。从这篇讲话本身，确实看不出林彪的用意何在。但是，联系修改宪法过程中的争论（康生提出不设国家主席，吴法宪反对；吴法宪提出在国家机构一章中加上一切工作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方针，张春桥反对并说称天才是讽刺），林彪讲话的针对性和用意还是很清楚的。

二十三日晚，在周恩来主持的会议上，吴法宪提出要认真学习林彪的讲话，汪东兴提出把林彪讲话的录音再放一遍。结果会议作出了学习两天的安排，并得到毛泽东的同意。这样一来，实际上改变了会议的议程。林彪夸吴法宪立了一功。

二十四日，叶群与陈伯达、汪东兴、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通气，传达林彪对小组讨论的意见。特别强调不能点康生的名、更不能碰“十一楼”（指江青）。但是要把矛头指向公开出来：有人反对设国家主席，有人反对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有人反对以毛泽东思想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有人反称毛泽东是天才，有人反对林副主席捍卫毛泽东思想（说称天才是讽刺）。

二十四日，在各组讨论中，几位大将按照林彪的部署活动。

在华北组、华东组，一些人明确地提出要把那些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揪出来”。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福建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分别写信给大会，要求把坏人（实指张春桥，后假称陈伯达）揪出来。

二十五日清晨，华北组的简报出来了。这份简报集中、鲜明地反映了二十四日华北组的讨论情况，极具代表性。林彪夸奖说：看了这么多简报，就数这份观点最鲜明。林彪的几位大将准备在各组乘胜前进。

二十五日清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了二十四日各组的讨论情况及华北组的简报。江青认为，这是有人反对文化大革命，企图打倒跟随毛泽东、支持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领导人。

四、关于毛泽东、周恩来、康生对事件进行调查

毛泽东听取了张春桥、姚文元的汇报以后，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中央全会上，突然有人企图攻击或打倒一位常委、三位政治局委员。

实际情况究竟如何，这需要进一步调查。但是，根据目前的形势，首先要把小组讨论停止下来，不使形势进一步恶化。

调查研究只能从现象入手，逐步深入到本质。

进攻一方有两层理论包装；其一是赞成设国家主席，拥护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说对方反对设国家主席，反对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其二是拥护称毛泽东是天才，拥护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针（说对方是反对称毛泽东是天才，反对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针）。

毛泽东的调查就首先从这里入手，并且从身边的人——汪东兴着手。

毛泽东质问汪东兴：你知道我多次说过；我不能再当国家主席，你为什么要在外面拥护我当国家主席？这样一来，就戳穿了汪东兴的伪装。汪东兴只好把陈伯达端出来，把责任都推到陈伯达身上。

陈伯达向来是以理论家的面貌出现的，他又在庐山会议上搞了一份马恩列斯称天才的语录。对陈伯达，毛泽东比较清楚。在文革小组工作中，陈伯达与其他人之间产生过一些矛盾。从起草九大政治报告开始，陈伯达的政治态度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可以推测出陈伯达在这次事件中起了重要作用。

另一个情况，在华北组讨论中，陈伯达、汪东兴发言以后，陈毅接着发言，矛头指向也很明显，火气也很大。这意味着什么？是二陈合流、甚至是二月逆流与八月逆流合拢？

在调查过程中，毛泽东、周恩来、康生等找这些人反复谈话、做工作。

汪东兴首先承认错误，表示愿意检讨。

吴法宪表示对林彪的讲话有“误解”，愿意检讨。

李作鹏、邱会作反对吴法宪作检讨。

叶群要吴、李、邱谈问题尽量往陈伯达身上推，不要涉及林彪、黄永胜。

陈伯达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以后，不得不违心地作检讨。

林彪不同意吴法宪作检讨。

五、关于毛泽东处理庐山事件的方针

经过几天调查，对情况有了初步了解，但由于事件发生突然，调查研究的时间很短，而全会正在进行中，不可能悬而不决。这时，只能把它作为一个政治思想问题来处理。

关于宪法中是否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既然是修正案，当然就允许不同的意见发表。赞成的、反对的意见都不能说错。绝大多数人出于真心，也有极少数人出于投机或保护自己，都拥护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但不能把不赞成设立国家主席的人说成是“反革命”。

关于称天才问题，涉及到哲学上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承认有天才，但又不可夸大天才。人的认识（知识和才能）从根本上说来源于人的实践。

陈伯达作为党内的理论权威，他并不是不懂得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常识，而是出于某种政治目的，搞语录、会上发言，鼓吹天才，用作一根棍子来打击别人。加之，他在党内的地位较高，由此影响、欺骗了許多人。根据他在召开九大以来政治态度的变化，他的这次行动决非偶然。

这次事件虽然是由林彪的讲话而起，但是，他在讲话中完全是作正面论述，并没有明确地针对某一部分人。

汪东兴及军委办事组的几个人，虽然在各组发言中，起到了带头作用，但是，搞意识形态斗争并非他们的强项，很可能是受了陈伯达的影响。

陈毅在陈伯达发言后表示积极支持，但是，并没有发现他们之间有串联活动。也可能是受了陈伯达的欺骗、影响。

因此，为了肃清错误思潮的影响，必须以陈伯达为重点批评对象，其他人员受教育，各自多作自我批评。问题不带上山。

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写下《我的一点意见》。

九月一日，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陈伯达。

九月二日至九月五日，各小组开会批判陈伯达。

九月四日，毛泽东提出对陈伯达的处理意见：一，要陈伯达再进一步检查，看来有困难；二，陈伯达以后不再出席大会；三，陈伯达如无历史问题，还保留中央委员。

九月六日，九届二中全会闭幕。

2009年8月2日初稿

2011 年 12 月 31 日修改

第三章 开展批陈整风

第一节 一九七一年的新形势新任务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一年二月十八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夺取农业新丰收》

农业生产连续九年丰收，去年粮食产量达到建国以来的最高水平。

我国农业生产的水平还是不高的，还可能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我们要不断努力，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农业进一步适应备战、备荒、为人民的需要。我们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努力搞好春耕生产，争取今年成为农业生产第十个连续丰收年。

要坚持现阶段人民公社一般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坚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要根据毛主席关于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指示，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要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即土、肥、水、种、密、保、管、工，搞好科学种田。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五日，毛泽东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送审稿的批语

看了一遍，觉得可用。

只在 18 页上去掉一个词，以便突出马列。17 页上已有了这个词，也就够了。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八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

- 一、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
- 二、革命人民掌握枪杆子的极端重要性
- 三、革命是千百万群众的事业
- 四、要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
- 五、现代修正主义是巴黎公社革命原则的叛徒

一九七一年五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

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新高潮继续向前发展。国际反美统一战线正在不断扩大。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辉煌胜利，大大地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北美、欧洲、大洋洲的革命群众运动，风起云涌，此呼彼应。朝鲜人民、日本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声势越来越大。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克服重重阻力，在反对美以侵略者的战斗中继续前进。许多长期受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欺负的中、小国家，纷纷挺起腰杆反抗两个超级大国的强权政治。在美国国内，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尼克松政府侵略政策、战争政策和种族歧视的斗争空前高涨。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矛盾重重，危机四伏，他们好象坐在火山口上，日子很不好过。

我们党在国内方面和国际方面担负的艰巨任务，迫切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努力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我们要遵照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等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开展批修整风。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继续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批判刘少奇一类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所贩卖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阶级斗争熄灭论，以增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我们要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七一年国民经济计划，继续完成党的“九大”

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我们要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的新胜利，迎接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五十周年，迎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

一九七一年五月一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革命化的必由之路 纪念毛主席发出《五·七指示》五周年》

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是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途径，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建设军队、建设国家、改造社会的宏伟纲领。

《五·七指示》总结了我军几十年建军经验，要求我军的革命化建设更要有发展。

《五·七指示》是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重要文献。

《五·七指示》为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指明了方向。

按照《五·七指示》，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第一位的东西是“学政治”，“批判资产阶级”。农副业生产要搞，有条件的地方，中小型工厂可以办，但都要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要把着眼点放在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上。当前，要根据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伟大教导，开展批修整风。这是一场继续揭露和批判王明、刘少奇一类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斗争，是一次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自我教育运动。我们要认真读马、列的书，认真读毛主席著作，深刻理解毛主席是怎样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要批判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要在学习和批判中提高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工业学大庆》

学大庆，就要象大庆那样，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两论起家，以毛主席的光辉哲学思想为指针，坚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自觉地改造世界观，解决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中的各种问题。

学大庆，就要象大庆那样，大受解放军，把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军委对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指示，当作对自己的指示，把古田会议决议和一九六〇年军委扩大会议决议的建军方向，当成自己的建设方向，实行政治建厂，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开展四好运动。

学大庆，就要象大庆那样，坚持集中领导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原则，坚持高度革命精神同严格科学态度相结合的原则，坚持技术革新和勤俭建国的原则，全面体现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多快好省的要求。

学大庆，就要象大庆那样，坚定地走毛主席《五·七指示》的道路，以工为主，兼学军事、政治、文化，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要从事农副业生产；在同大庆条件类似的地方，要建设“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社会主义新型工矿区。

一九七一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
《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五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全党的任务，就是遵循毛主席的教导，贯彻执行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路线，完成“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二中全会确定的各项战斗任务。当前，特别需要在全党开展批修整风，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和总结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这是党的事业继续取得伟大胜利的根本保证。

坚持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

在毛主席所总结的我党的历史经验中，那一些是今天应当特别引起全党注意和学习的呢？

- （一）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
- （二）必须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
- （三）必须力戒骄傲。

- (四) 要两点论，不要一点论。
- (五) 必须坚持群众路线。
- (六) 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
- (七) 必须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
- (八) 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毛泽东关于对外宣传工作的批示
(一九六七年三月至一九七一年三月)

(一)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毛主席对澳共推荐来中国的大卫·库普反映西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题为《让我们“治病救人”》的一张大字报的批示：“这个外国人很能看出问题，分析得很不错。总理阅后，送文革小组一阅。”

大卫·库普在这张大字报里分析了西安当时出现的两派对立，由群众大会开除党员党籍，打、砸、抢、游街等一系列情况，认为这是“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并受坏分子的操纵。他提出，“要把那些存心要把我们引上背离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人清除出去，然后我们才能搞造反派、革命干部和解放军的三结合。”

(二)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四日，毛主席在《桑穆加塔桑就发表主席内部谈话问题的一封信》上批示：“康生同志：这类事，不要去责备发表的同志。”“一般谈话，公布也不要紧。”

桑穆加桑在这封信中说“现在，有人告诉我，（同主席）谈话的内容未经同意不得公布。”

(三)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对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外宾简报《安斋等人认为日本不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的批示：“康生同志：这个问题值得注意：我认为安斋的意见是正确的。你的看法如何，望告。”

(四)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姚文元同志转达了毛主席对安斋等同志关于日本革命道路问题的意见的批示。

姚文元同志说：首先我向同志们（安斋库治等同志）转告一个消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要我向安斋库治等同志问候；毛主席看到了日本同志对日本要不要走乡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的意见，其中提到了对一九三八年毛主席《战争和战略问题》的一段论述是否有效的问题。毛主席对此有一个批示。我在这里把毛主席批示的

原文念一下。毛主席说：“我认为安斋等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我在一九三八年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的论述，仍然有效。”这就是指的毛主席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所写的那篇著名文章《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所论述的问题。这篇文章的第一节第一段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毛主席在第一节第二段中完整地、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总结了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武装起义的经验。在那一段的最后有这样的话：“到了起义和战争的时候，又是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村，而不是与此相反。”毛主席所说的：“我在一九三八年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的论述，仍然有效。”就是指这篇文章中的整个这一段话。

（五）一九六八年三月七日，毛主席在一个拟在援外飞机喷刷毛主席语录的请示报告上批示：“不要那样做，做了效果不好。国家不同，做法也不能一样。。”

（六）一九六八年三月十日，毛主席对关于开好一九六八年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的通知，作了重要批改，在“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把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当做首要任务”之后，增加了“但应注意，不要强加于人”一句。

（七）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二日，毛主席删去了我援外某工程移交问题的请示报告中的一段话：“举行移交仪式时，应大力宣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说明我援x修建xxxx工程的成绩，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国际主义教导的结果，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并批示“这些是强加于人的，不要这样做。”

（八）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七日，毛主席在关于答复新共威尔科克斯同志对我对外宣传工作的批评的请示报告上批示：“此事我已说了多次，对外（对内也如此）宣传应当坚决地有步骤地予以改革。”

（九）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对中共中央联络部起草的致缅甸共产党武装斗争二十周年的贺电，作了重要修改和批示。毛主席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缅甸情况相结合的伟大胜利”，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也具有伟大的意义”，改为“对于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在某一方面也将具有一定的意义。”

（十）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毛主席在发表缅共武装斗争二十周年的声明的请示报告（涉及在我报刊上发表兄弟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上批示：“一般地说，一切外国党（马、列主义）的内政，我们不应干涉。他们怎样宣传，是他们的事。我们应注意自己的宣传，不应吹得太多，不应说得不适当，使人看起来好像有强加于人的印象。”

（十一）一九六八年四月六日，毛主席在中央联络部、总参谋部起草的关于帮助外国人员进行训练的文件中，将“主要是宣传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句中的“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二十一字删掉，并批示：“这些空话，以后不要再用。”

（十二）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毛主席批评了在一个文件中用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这种提法。毛主席再一次指出：“这种话不应由中国人口中说出，这就是所谓‘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

（十三）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九日，毛主席对外交部关于加强宣传主席思想和支持西欧、北美革命群众斗争的建议，作了重要批示：“第一，要注意不要强加于人；第二，不要宣传外国的人民运动是由中国影响的，这样的宣传易为反动派所利用，而不利于人民运动。”

（十四）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二日，一个接待外宾的计划中，曾经规定过群众在同外宾接触时可“自发地分别地赠送毛主席像章”。毛主席批示：“不要”。

（十五）一九六八年七、八月间，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起草的关于处理某兄弟党要求发表它的一篇文章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删去几个字”，报告中两处提到希望该党“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解决党内分歧，毛主席都把“毛泽东思想”这几个字删去了。

（十六）一九六八年八月，毛主席在军委办事组《关于更改援外军事专家名称》的报告和电报稿上的批示：“名称问题关系不大，可从缓议。”“资产阶级传下来东西很多，例如共和国、工程师等等不胜枚举，不能都改”。“此件缓发。”

（十七）一九六八年九月，毛主席在《人民日报》社论初稿《世界革命人民胜利的航向》上的批示：“把离开主题的一些空话删掉。不要向外国人自吹自擂。”社论的有关段落如下（毛主席删掉的地方，下边划了短线（〔〕）：增加的地方，在下边打了加重号）：

一九六二年九月十八日，毛泽东主席给日本工人朋友赠了亲笔题词：“只要认真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日本革命的胜利就是毫无疑问的。”今天是这一光辉题词的六周年纪念，本报在头版位置上发表了毛主席题词的手迹。毛主席的这个题词，不仅对于日本人民的革命事业，而且对于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具有极其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世界无产阶级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当代的新发展。〕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一旦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能够产生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力量，去推动革命事业的胜利发展。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各国人民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最根本的保证。

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反复地教导我们：“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同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实践相结合，就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

毛泽东同志把理论和实践相联系这件事，生动地比作为“有的放矢”。毛泽东同志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解决了中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及在无产阶级专政底下继续进行革命的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问题，从而把中国革命从胜利引向胜利。〔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伟大的典范。〕

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条原则适用于中国革命，也适用于日本和一切国家的革命。这就是说，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一方面必须坚

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时，必须从实际生活出发，密切联系群众，不断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独立地制定和实行符合本国情况的政策和策略。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借口什么“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那是十足的机会主义，即现代修正主义！

日共宫本修正主义叛徒集团借口日本“国内外条件”不同，标榜什么“独立自主”，其实都是鬼话。他们在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他们所起劲地攻击和反对的，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竭力歪曲和阉割马克思列宁主义，[疯狂攻击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他们]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武装夺取政权，鼓吹所谓“和平革命”，推行所谓“议会道路”。实际上就是不要革命，背叛革命，反对革命。他们是一伙地地道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可耻叛徒，是日本革命事业的可耻叛徒。

今天，日本人民的革命斗争正在蓬勃兴起。[毛泽东思想在日本得到日益广泛的传播。]日本人民的革命觉悟不断提高，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左派队伍正在日益成长壮大。日本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人民，大造宫本修正主义集团的反，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他们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日本垄断资产阶级、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强大武器。日本革命的形势越来越好。日本无产阶级革命派认识到，摆在自己面前的一个光荣而严肃的任务，就是要进一步认真地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具体运用到日本人民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去，从日本的具体情况出发，解决日本革命的一系列战略和策略问题，把日本革命不断地推向前进。日本革命取得胜利的过程，必然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日本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紧密地相结合的过程。

我们坚信，一个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日本真正的革命党，一定会在革命斗争的烈火中诞生。它将领导日本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经过长期曲折的斗争，战胜一切艰难险阻，赢得革命的最后胜利。

我们的时代，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各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新时代。毛泽东思想正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世界各地广泛地传播。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人民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在伟大的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世界各国人民必将朝着胜利的航向，继续奋勇前进！

（十八）一九六八年九月，毛主席对中央文革起草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标语口号（送审稿）》的批示：“去掉第 11 条，不应用自己名义发出的口号称赞自己。”送审稿的第 11 条是：“向立下丰功伟绩的中央文革致敬！”

（十九）一九六八年九月，外交部《关于巴基斯坦政府友好代表团来访接待计划的请示》原文中有“通过安排参观访问，突出宣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以及工农业生产的大好形势。”毛主席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一句删掉了，并批示：“对这些不应如此做”。

原文附的《欢迎（送）巴基斯坦政府友好代表团的标语口号》十九条，毛主席批注：“去掉三条”（即：17、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18、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19、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二十）一九六九年一月，毛主席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走投无路的自供状——评尼克松的“就职演说”和苏修叛徒集团的无耻捧场》上指示：“照发。尼克松的演说也应见报。”

（二十一）一九六九年五月，毛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五月二十四日声明稿上批示：“可用。略有修改。”

毛主席在声明稿的“中国政府建议，双方通过外交途径商定举行中苏边界谈判的日期。”一句中的“日期”之后加了“和地点”三字。并在“如果苏联政府认为中国政府的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态度是软弱可欺，可以用核讹诈政策吓倒中国人民，用战争实现对中国的领土要求，那就完全打错了算盘。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七亿中国人民，不是好惹的。”一段中的“不是好惹的”改为“是不好欺负的”，还加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一句。

（二十二）一九六九年六月，毛主席对《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中国共产党万岁——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四十八周年》，批示：“可发”。

毛主席在社论的第二段“二十年来，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伟大胜利，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一句中的“繁荣昌盛”前边加了“有了初步”四个字，将“强国”改为“国家”。毛主席并批示：“请注意：以后不要这种不合实际情况的自己吹擂。”

（二十三）某拉丁美洲共产党总书记等人，从一九六九年三月至十二月间，先后给我党中央和林彪同志四次来信，承认过去追随苏修反华是错误的，要求同我“恢复两党关系”。一九七〇年一月十二日，毛主席在中联部抄印来信的文件上批示：“林彪同志：这些信看来似无恶意。他们被人抛弃，想寻出路。请转康生同志考虑是否可以同他们联系。”

（二十四）一九六九年九月，毛主席对外交部《关于给日中友协（正统）各地组织庆祝我国庆集会发感谢支持电》中的“二十年来。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特别是在三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取得的伟大胜利，使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句中的“使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为“使我们国家的面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二十五）一九七〇年六月三日，中国红十字会《关于救济秘鲁地震的请示》，拟以该会名义慰问并捐给秘鲁红十字会现款人民币五万元。

一九七〇年六月七日，毛主席口头指示，给秘鲁救济五万元人民币太少。给罗马尼亚救济了一百万元，秘鲁比罗马尼亚死人多，可否给秘鲁救济一百万或一百五十万元人民币？请总理酌定。

（二十六）一九七〇年六月，外交部在“关于我救济匈牙利遭水灾地区居民的请示”中，建议我红十字会捐现款十五万元人民币。毛主席批示：“似太少，可赠五十万元，等于赠罗之一半。”

（二十七）一九七〇年九月，毛主席在中联部起草的我党中央致朝鲜劳动党成立二十五周年贺电稿上，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和中国人民”里的“毛泽东思想”五个字圈去。

（二十八）一九七〇年十月，毛主席在外交部起草的给日本社会党成田知己的复信稿上，作了修改，原复信稿中说，“社会党朋友更应继承和发扬浅沼精神，为

反对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伙伴、走狗、帮凶而进行斗争。如先生同意这一意见，我们欢迎日本社会党代表团于十月中旬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毛主席将“社会党朋友更应继承和发扬”中的“更应”两字圈掉了，将“如先生同意这一意见，我们欢迎……”改为“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欢迎……。”

(二十九)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外交部在《关于对越南南方五省受灾的慰问和赠款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建议以中国红十字会名义向越南南方解放红十字会捐赠价值二百万人民币的物资。毛主席批示：“宜增至五百万。”

(三十)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六日，毛主席在中联部《关于邀请“荷兰共产主义统一运动(马列)”派代表团访华的请示》上批示：“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只要求他们承认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该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我已说了多遍了。至于他们除马、列主义外，还杂有一些别的不良思想，他们自己会觉悟，我们不必当作严重问题和外国同志交谈。只要看我们党的历史经过多少错误路线的教育才逐步走上正轨，并且至今还有问题，即对内对外都有大国沙文主义，必须加以克服，就可知道了。”

(三十一) 一九七一年二月，旅游局在《关于一九七一年接待外国人来华旅行的请示报告》中说，一九七一年拟接收外国人来华旅行八百至一千人，对象以左派和对我友好的工农、学生、教职员为主，上层友好人士有计划、有选择地少量接收。毛主席批示：“人数可略增加，右派也可来一点。”

(三十二) 一九七一年二月，外交部办公厅编印的《外交活动简报》第二十九期《古巴驻华临时代办加西亚访问外地的几点反映》的第四条中称，加西亚在井冈山参观时，对讲解员不提南昌起义和朱德同志上井冈山这两段历史提出意见说：这两段历史应该提，不提中国人容易理解，外国人就不容易理解。提这两段历史事实不仅不会损害毛主席的伟大形象，相反人们会通过当时的各种错误路线的了解，更加体会到毛主席路线的正确。对此，毛主席批示：“第(四)条提得对，应对南昌起义和两军会合作正确解说。”

(三十三)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五日，周总理给毛主席的报告中说，我乒乓球队拟仍前往日本名古屋参加三十一届国际乒乓球比赛。到日本后支持柬民族团结政府不承认朗诺集团的球队为合法，并主张驱逐，对南越卖国集团派的球队，亦采取同一态度，对以色列也询问阿联、叙利亚的态度。如不成，就避开与他们比赛。

我球队如去，当作好各种警戒准备。毛主席批示：“照办，我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翻印者未注明

一九七一年八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纪念八一建军节》

人民解放军之所以是战无不胜的，是因为它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当前，全国人民在党的“九大”团结、胜利的路线指引下，掀起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我们要更加刻苦地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批修整风，学习党的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搞好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要发扬继续革命的精神，把各条战线的斗、批、改深入进行下去，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全国军民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拥政爱民，拥军爱民，增强军政、军民团结，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领导下，坚决实现党的“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二中全会所确定的各项战斗任务，争取更大的胜利！

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我们党在朝气蓬勃地前进》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亲切关怀下，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除台湾省外）相继隆重地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省委、市委和自治区党委。这对于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更好地继续完成党的“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二中全会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保证。这是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建党路线的伟大胜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党历史上一次最广泛、最深刻的整党运动。

一九六七年，最初几个省一级的革命委员会建立了。这时，党组织的整顿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时，毛主席把整党列为整个斗、批、改伟大战略部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九大”团结、胜利路线指引下，各地认真学习新党章，整党建党运动全面展开。

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主席提出“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等一系列指示。

这次整党运动，是一次极为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广大党员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建党思想，到群众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去，经风雨，见世面，提高了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一小撮证据确凿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蜕化变质分子、阶级异己分子，被消除出党。广大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中涌现出来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参加了党的行列。各级党的领导班子，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既有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又有中年和青年一代的优秀党员，还有来自工农和基层干部中的新生力量。我们的党提高了质量，扩大了队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纯洁，更加坚强，更加富有战斗力。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总结加强党的领导的经验》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指示，全党逐步深入开展批修整风运动，收到显著效果，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进一步揭发和批判了刘少奇一类骗子。各级新党委普遍建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批、改正在深入发展。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沿着党的“九大”团结、胜利路线，不断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加强党的领导，主要应当注意那些问题呢？

要增强党的观念。每个党员，每个革命者，在复杂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都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各级党委成员，尤

其要增强党的观念，要把自己置于党委之内，而不能摆在党委之外，更不能摆在党委之上。

要继续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总是变换各种手法，妄图用机会主义的路线和政策代替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和政策，用资产阶级纲领代替党的无产阶级纲领，从而用资产阶级性质篡改党的无产阶级性质，达到取消党的领导，破坏中国革命的罪恶目的。

要增强党的团结。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在组织上必然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分裂主义。这个历史的教训不少。

要光明正大。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要搞分裂活动，就一定要搞阴谋诡计。我党历史上那些坚持机会主义路线、玩弄阴谋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阴谋家，里通外国分子，最终都逃脱不了身败名裂，自取灭亡的下场。

要加强纪律性。

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为什么有的人在两条路线斗争中上当受骗呢？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认真看书学习，分不清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路线，什么是机会主义路线。这个教训极其深刻。

贰、本节简论

一、一九七一年上半年，根据形势的发展，中央着重抓了批陈整风。

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扩大传达反党分子陈伯达问题的通知。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毛泽东关于批陈整风的指示。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至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召开华北会议开展批陈整风。

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九日，毛泽东关于批陈整风运动重点在批陈的批语。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转发周恩来在华北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林立果召集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研究制定五七一政变计划。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五日至二十九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央召开了批陈整风汇报会。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三日晚，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等召开会议，讨论了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的形势，讨论了“根据斗争形势，准备加快、提前”实行“571”。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把批陈整风运动推向纵深发展的通知》。

二、一九七一年下半年，林彪集团加紧实行反革命阴谋政变，毛泽东巡视南方几省。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日，毛泽东通过与熊向晖的谈话了解军委二级部长都没有传达中央汇报会议精神，说：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有后台。

一九七一年八月，林立果、周宇驰窜到北戴河，并乘坐直升飞机往返于北京、北戴河之间，传送情报，受领林彪的反革命旨意，密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

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五日至九月十二日，毛泽东巡视南方几省。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

一九七一年第四季度，在全国开展批林整风。

三、一九七一年的另一重要方面是与美国进行秘密接触，开展乒乓外交，基辛格秘密访华，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一九七一年一月五日，尼克松总统的回答口信：美国认为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是有益的。美国建议在第三国开一预备会议，作出各种安排。

一九七一年四月六日，毛泽东在世乒赛闭幕前夕作出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四日，美国宣布结束已存在二十年的对我们两国间贸易的禁令。尼克松还下令采取一系列新的步骤，放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货币和航运管制。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四日，周恩来会见应邀来我国访问的加拿大、哥伦比亚、英格兰、尼日利亚和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全体成员。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一日，周恩来给尼克松回了一个口信，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进行直接晤谈。

一九七一年五月十七日，尼克松口信表示：他准备访问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位领导人进行直接交谈。提议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来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议，基辛格准备在六月十五日以后到中国来。

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九日，周恩来总理给尼克松总统的口信

周恩来总理建议，基辛格博士最好将来华时间定在六月十五日至二十日之间，地点可在北京。

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至十一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从伊斯兰堡秘密启程，飞往北京。周恩来、叶剑英等同他举行了六次会谈，着重讨论台湾问题。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六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公告宣布，获悉尼克松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我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 1972 年 5 月以前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基辛格第二次访华，为尼克松总统访华作具体安排。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晚，在纽约举行的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驱逐台湾蒋介石集团代表问题的提案进行表决。该提案以七十六票赞成、三十五票反对、十一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中旬，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次出现在联合国裁军问题的大会上。各国代表不顾原定议题，纷纷登台发表一篇篇热情洋溢的贺词，欢迎中国代表团的到来。

2009 年 8 月 17 日初稿

2012 年 1 月 1 日修改

第三章第二节 几员大将的检讨 吴法宪叶群的检讨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〇年九月九日，下庐山后，毛主席的专列先到长沙，毛主席与华国锋在车上谈了话。

专列停在支线休息，于 15 日到武昌。

在去武昌的路上，毛主席问汪东兴：“你在想什么？”

汪东兴说：“我在想自己在庐山会议上的问题。”

毛主席说：“这好嘛！”

汪东兴说：“在山上开会，忙于会务，没有时间想自己的问题。现在有空闲时间了，可以好好地理理自己的思想了。”

毛主席说：“这样好，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你的心是好心。”

一九七〇年九月九日，周恩来、康生在人民大会堂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

吴法宪说了八月十四日以来的情况，并说：我在庐山会议上作了三次检讨，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继续检讨。我在庐山说的话有错误，错了就检讨，但是我们没有什么非组织活动。

康生说：你们事先就有活动，庐山下有活动，庐山上有活动，下了庐山还有活动。

周恩来说：你在八月十四日晚上的活动我就不清楚。

吴法宪说：那天晚上我是第一个给你打电话的，当时我在陈伯达家里，我把情况都向你汇报了，你也表示同意我的意见，还说毛主席从来没有说过赫鲁晓夫发展马列主义的话，而且你也表示赞成设国家主席，赞成国务院的指导思想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

康生说：吴法宪，你说毛主席伟大谦虚，这句话不对。毛主席不是谦谦君子，毛主席有的地方要求很严格。

李作鹏说：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我在青岛接到黄总长打来的电话，说宪法修改小组发生了争论，要我回来支持吴法宪，我回来以后就没有争论了。

邱会作说：听吴法宪说有争论，但具体情况不清楚，

黄永胜说：这件事我是十四日晚上听吴法宪打电话说的，当然我们的观点是一样的。之后，我又打电话通知了李作鹏，我没有搞什么活动。

谈话进行了四个小时，黄吴李邱四人的口径一致。

一九七〇年九月十二日晚，周恩来、康生在人民大会堂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

周恩来说：上次我和康老找你们的情况向毛主席汇报了，毛主席批评了你们，说你们军委办事组搞宗派，你们一统天下。你们要好好想一想，要交待你们之间的活动。在庐山会议前有什么活动，会上有什么活动，会下有什么活动。

四人都不吭声。

周恩来说：永胜同志，请你先谈。

黄永胜说：经过回忆，我知道的情况很少。庐山会议前我没有参加宪法的修改，我只是听到吴法宪说会议上有争论。关于设国家主席的事，我同法宪同志的意见是一样的。上庐山前，我准备的发言材料只是军事工作报告，别的工作我没有参与。庐山会议的情况，我上山以后听叶群告诉了我一些，吴、李、邱在庐山上的情况我不清楚。不过他们在庐山上的事情我要负责任。

康生说：你负什么责任？

黄永胜说：我是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从组织上说我有责任。

康生说：我就不相信你没有参加！

黄永胜说：那就请你们追查嘛！

吴法宪说：上次谈话，我已经把庐山会议上的情况实事求是、原原本本地都说了，我当时就向你总理、黄总长、叶主任都汇报了，这个你清楚，这都是公开的，不是什么秘密活动。

周恩来说：你们不要激动，我只是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你们都是政治局委员，毛主席的话我不能不向你们传达，你们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实事求是嘛！

李作鹏说：在庐山会议上，我在中南组我没怎么发言，叶群也没有说什么，我们在中南组没有放什么毒，也没有起哄。

邱会作说：我同你康老在一个组里，你知道我讲了什么，我赞成设国家主席，拥

护天才论，还念了语录，你当时还说；邱会作同志善于学习，并且号召西北组的同志向我学习，怎么过了几天你就反了过来，说我邱会作怎么不对，你怎么这样两个态度！

康生说：你念的语录很好，你说的错话我没有同意吧！

周恩来说：你们现在都是政治局委员，现在没有向你们提出什么意见，有什么问题可以再讲。毛主席的意思还是保护你们的，你们要接受教训，今后要注意团结合作，搞好办事组的工作。

一九七〇年九月十五日，毛泽东的专列抵达武昌。与刘丰谈话。

一九七〇年九月十五日，汪东兴把第二次书面检查呈送给毛主席。

主要内容如下：

主席：

我这次犯了严重的错误，除了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的两次检查和一次书面检讨外，最近经主席多次谈话，对我进行严格的批评和亲切的教育。每次谈话对我启发很大，教育很深，我越想越难受，总觉得对不起主席，对不起党中央，对不起受误会的同志，我真是辜负了主席的信任和教育的。干扰了主席的战略部署，这是有罪的，我应牢记这次教训，努力改正错误。

我完全拥护主席《我的一点意见》的英明指示。在这指示以前，我没有识破陈伯达。他的手段特别阴险、恶毒，利用九届二中全会搞突然袭击，造谣和诡辩，欺骗不少同志。他打着论天才的旗号，其实要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要夺毛主席的权，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次把陈伯达揪出来，使党更加团结，更加纯洁，更加巩固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我在九届二中全会中前三天被陈伯达利用欺骗有三件事：

(一)在华北组他突然的又是有计划的发言，利用我的无能，而心情非常激动，又不加分析，更不顾自己的身份，就起来发言，结果当了陈伯达坏人的炮手。

(二)我怀疑陈伯达事先看过修改过华北组的简报，他利用简报来扩大到各组煽动欺骗人。我建议中央派人追查陈伯达，事先是否看过修改过这期简报，这期简报发出最早最快，而且简报内容中他的很少，我的很多。我看有阴谋，有鬼。

(三)陈伯达利用听林副主席录音报告时，把论天才的语录交我打印五份(当时我交代打印二十份，准备政治局同志要时免得再打印)。现在看来是陈伯达的阴谋诡计，可能是要我发言时引用，结果未得逞。

由于我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存在着个人主义，骄傲自满思想，有主观片面性，遇事易激动，缺乏冷静的考虑分析问题，再加上文化理论水平低，路线斗争觉悟不高，警惕坏人破坏中央团结不够，平常学用毛泽东思想不好。因此，遇到陈伯达这样的阴谋家、野心家，我不仅没有识破，反而受他蒙蔽利用了。

这次我所犯错误是严重的，是路线的错误，对我触动很大，教育很深，我应很好的接受这次教训。今后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特别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通过学习提高认识，提高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在实际工作中，努力锻炼自己，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切实改造世界观。上述认识是否妥当，请指示。

敬礼！

汪东兴

年 9 月 15 日

毛主席看过汪东兴的第二次书面检查后，在汪东兴写给他的信上面用铅笔作了批示：“此件请汪东兴同志面交林、周、康及其他有关同志一阅，进行教育，详由东兴面谈。”

在第一页信纸的左右空白处又写道：“陈案另是一个问题，应弄清楚。”

一九七〇年九月十六日，上午 10 点半，毛泽东让吴旭君通知汪东兴去谈话。

这次谈话一直谈到了 11 点 50 分。

毛主席说：“你写的信我看过了，信中对问题的认识很好，接受教训。我看有些同志还不通，上了当，还不通？现在不通，慢慢总要通嘛！有些同志自己不懂马列主义，自己都没有看过马列主义这一方面的书，发言时又要引用。我看还是要进行教育，还是要 250 多人中指定读点马列主义的书，30 多本太多，可在 30 本书内选些章节出来。此事请总理、康老办。我还可以多选一些。不读马列主义怎么行呢？不行的。结果就被陈伯达摆弄了。”

在谈到军委办事组时，毛主席说：“我们军委办事组内有几位同志也上当了。发

言时，一个口径，用一样的语录，连林彪也受他们的骗。据说他要写信给我，叶群和他们不让写。我劝林应好好地想一想，表一个态嘛！今天未想通，待想通后表态也可以。”

在谈到陈伯达的问题时，毛主席说：“我们的任务是对付帝、修、反。而陈伯达不管帝、修、反。我写了一份七百字的意见，给陈看时，他马上说他与苏修无关系。我又不是问他这事，他急着声明这个问题。”

在谈到九届二中全会的六号简报时，毛主席说：“六号简报要抓紧核实，你怀疑陈伯达看过、改过，应找会议主持同志，还有王良恩同志和记录印发的人。为什么不经你看过，发出最早最快？由总理、康生和你一起查实为好。要他们不要再上陈伯达的当了，有错误就改正。”

毛泽东问：“你说他们在各组一起动作，煽动，他们几个，还有黄永胜报名要发言，都用了语录，但他们的简报未发，一说不行了，记录就收回，这当中好像是有点名堂，你清不清楚？”

汪东兴说：“我不清楚。”

毛主席接着说：“你跟我出来了，他们在北京是否在陈伯达处商量过？”

汪东兴说：“不清楚。”

毛主席说：“谁知陈伯达住在何处有何活动？谁能知道？陈伯达案另办。与你们好人犯错误不同。”“我在简报上看到，皮定均同志在发言中说，怀疑他们都在 24 日下午发言，是统一部署的。”

毛主席要汪东兴找曾思玉单独谈一下，征求一下他有什么看法。

毛主席还说：“你先回去，让总理和康生召集会议，把你给我的信给他们看，传达我对你的信的批示及我今天谈话的内容，争取犯错误的人早点觉悟。”“你这封信可以启发他们，让他们也可以写或找我来谈。”

一九七〇年九月十六日下午，汪东兴去找武汉军区司令员的曾思玉聊了两个小时。

谈起庐山会议，曾思玉说：“当时我是一盆浆糊，弄不清楚。”

汪东兴问：“现在你还是一盆浆糊？”

曾说：“开始我脑子是一盆浆糊，毛主席发表《我的一点意见》后，通过学习，

慢慢地了解了。”

汪说：“庐山会议上我也犯了错误。”

曾说：“中南组也是紧张的，说有人要推翻毛主席，打倒毛主席，有人要夺毛主席的权。叶群发言就是这样讲的，她还说毛主席是天才没有错。”

汪说：“毛主席的天才是从实际中学的，是靠看书学习，天才不完全是先天的，天才主要是后天的。我们过去认识不清，现在才有所认识。”

曾思玉说：“那几个副词，我也是同意的。毛主席在‘九大’报告中把它去掉了，我未听进去，总觉得这是毛主席的谦虚。”

一九七〇年九月十几日，毛泽东路过石家庄，与李雪峰谈话。

一九七〇年九月二十九日，林彪找吴法宪谈话

林彪说：我对毛主席说，我选吴法宪当空军司令，是因为吴法宪是刘亚楼的徒弟，吴法宪的作风是向刘亚楼学的，和刘亚楼一样，拚命干，所以我选他当空军司令。毛主席向我问起曹里怀，我说曹里怀这个人我了解，从延安到东北我都了解他，工作稀稀拉拉，没有干劲。办事不认真。我认为空军的工作刘亚楼、吴法宪、王璋，他们是搞得不错的，所以我把空军立作标兵。

林彪说：过去庐山会议我不赞成你作检讨，但是我现在赞成你到毛主席那里去说一下，作点自我批评，主要是把当时和张春桥发生争论的情况再向毛主席谈一谈。今后空军的情况，要直接向毛主席汇报、请示，不要只是向我说，应该让毛主席了解你的工作。你不来，我是不会怪你的。

一九七〇年九月二十九日，吴法宪第一次写出了书面检讨。

在这份检讨中，吴法宪承认“犯了严重的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主席亲自主持的二中全会”，并带着“最沉痛的心情向主席检讨认错”。“上了大坏蛋陈伯达的当”，是自己“政治上极端幼稚”的表现。

一九七〇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与叶群谈话。

一九七〇年十月六日或七日下午，林彪找吴法宪去谈话。

据吴法宪交待，主要内容如下：①要我去向毛主席承认错误作所谓检讨，（这是第一次叫我作检讨），要说明庐山犯错误是出于突然的，在山下事先没有任何准备和联系，就是我八月十三日反映的情况没有核实，林彪听了之后有气，所以在庐山就讲了话。我当时领会他这段话的意思无论如何不要牵涉到林彪、叶群、黄永胜，要说明山下山上无联系，会前无准备，来欺骗毛主席。②错误要往陈伯达身上推，强调上当受骗。③这次庐山犯错误第一是陈伯达，其次是你，如果因为你这次犯错误把你撤下来，暂时靠边站，也不能乱说乱道，以后会有机会替你说话，不要因为你一个人犯错误就倒一大片。

一九七〇年十月十二日，叶群向毛主席交出了第一次书面检讨。

承认“我犯了严重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中央和到会同志，……心情是沉重的”。说毛主席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她的谆谆教导，使她受到极大的启发和教育。并说她是上了陈伯达的当，自己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言的“动机是出于对主席和主席思想的热爱，但效果是很不好的”。

一九七〇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对吴法宪的检讨作了批示：

“此件已阅。我愿意看见其他宣讲员的意见。”

吴法宪在检讨书中讲到他在庄严的二中全会上，在关系全局性的原则问题上，事先没有请示政治局的同志，更未向主席、林副主席请示报告。

毛泽东在这段文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又在旁边写道：“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

吴的检讨书中讲他自己的发言“不从全局考虑，不顾影响，不考虑后果，这是极不严肃、极不慎重的不负责任的态度”。

毛泽东在这段话的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着：“这些话似乎不真实。”

吴法宪谈到陈伯达是“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反党分子”。

毛泽东在这句话的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陈伯达“是个可疑分子。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揭发过，又同个别同志打过招呼。”

吴法宪交代 8 月 23 日晚 12 点前后，陈伯达来找他和李作鹏、邱会作，谈到过关于“天才”方面的问题。

毛泽东在这段话下边也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办事组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林彪同志的报告，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

吴的检讨书写到“他(指陈伯达——作者注)还说，主席也批评了你们，我们问他主席批评了什么，他不肯说。……说话神态异常，说时支支吾吾”。

毛泽东在旁边批示：“无非是想再骗你们一次，企图挽救他自己。”

吴法宪的检讨书中揭发 8 月 27 日晚上 12 点以后，陈伯达来问他讲没讲过“有人利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这句话，毛主席在“伟大谦虚”。毛泽东在这四个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

吴法宪提到陈伯达 8 月 27 日晚上核对上面那句话时，看到陈的发言稿上有“中央委员会也有斗争”一句话，吴法宪认为这是“造谣”。

毛泽东在“中央委员会也有斗争”这九个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这句话并没有错，中央委员会有严重的斗争，有斗争是正常生活。”

吴的检讨书中写道“……他只参加过两次会，也没有提出什么意见，怎么能这样做，并且告诉秘书不要答复他”

毛泽东在这句话旁边批道：“这样对。”

吴法宪把毛泽东对他的检讨的批示给军委办事组其他人看，黄永胜若无其事；李作鹏说：我说没有完吧，果然如此！

吴法宪和黄永胜把这个批示给叶群看，由叶群亲自布置要军委办事组的秘书宋诚替她写了一个检讨送上去。

一九七〇年十月十五日，毛主席看了叶群的检讨，并作了批示：

“此件已阅。”并在装检讨书的信封上批示：“林、周、康及其他有关同志阅后退中办存。”

叶群在检讨书中说，她“这次犯的错误的严重的是路线性的”。

毛泽东在“路线性”三个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了一句：“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叶群在检讨书中谈到她在北戴河时，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反映情况的电话。而她没有注意核实情况。

毛泽东在旁边写道：“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

叶群在检讨书中引用毛主席讲过的话“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毛主席在这句话下边划了一道杠，并在旁边批道：“这是马克思的话，我不过复述一遍而已。”

叶群在讲到林彪要写信给毛主席，她出来劝阻，结果帮了倒忙时，引了毛主席过去讲过的话“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

毛泽东在这句话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了这样一段话：“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倾向。‘九大’胜利了，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请同志们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的呢？”

叶群在检讨书中写道，九届二中全会上她接到军委办事组寄给她一份论天才的语录。毛主席在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

叶群说自己“不加分析地”部分引用了论天才的语录，这就间接地上了陈伯达的当。

毛泽东在“不加分析地”五个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直接地利用材料，所以不必加以分析。材料是一种，无论谁搞的都是一样，难道别人搞的就不算上当吗？”

叶群还说她对陈伯达的反动本质认识不足，警惕不够，因而过去对他的斗争不够有力。

毛泽东在旁边写道：“斗争过吗？在思想上政治上听他的话，怎么会去同他斗争？”

叶群在检讨书中还对陈伯达提出了一些疑问。

毛泽东在旁边写道：“不上当是不会转过来的，所以上当是好事。陈伯达是一个

十分可疑的人。”

叶群表示要按毛主席的教导认真读几本马、恩、列、斯著作，联系实际，改造世界观。

毛泽东在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这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共产党人不读一点马列怎么行呢？我指的主要是担负高级职务的人。”

在叶群的检讨书末尾，毛主席写道：“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

一九七〇年十月，毛主席对贵州省关于“三支两军”问题的报告作了批示，提出要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

一九七〇年十月下旬，毛泽东病情越来越重，由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转成肺炎。

一九七〇年十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向全党发出认真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的号召。

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一定要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呢？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根本问题，仍然是政权问题。政权的性质，取决于掌权的人执行什么样的路线。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归根结底，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

有的同志认为，自己虽然没有读过哲学，有些事是做得对的，实际上合乎辩证唯物论，没有特别学习哲学的必要。这种看法是片面的。

有的同志认为，哲学是深奥难懂的，一般人学不了。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哲学著作的大量事实，已经证明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六日，中共中央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

毛主席、林副主席已批阅

伟大领袖毛主席历来重视党的高级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问题。早在六届六中

全会上，毛主席就指出：“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最近，毛主席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又一次指示：党的高级干部，不管工作多忙，都要挤时间，读一些马、列的书，区别真假马、列主义。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号召全党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全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

当前，毛主席的指示，九届二中全会的号召，正在变为广大干部的实际行动。为了使高级干部的学习搞得更好一些，特通知如下：

（一）要进一步提高党的高级干部学习的自觉性。这里讲的高级干部，主要是指中央委员、中央各部委领导人员、地方省、市、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和军队军党委常委以上的同志。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号召下，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全国革命和生产形势大好。党的各级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担负着比过去更加重大的责任，如何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理论水平，自觉地改造世界观，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问题。只有读一些马、恩、列、斯的基本著作，才能识别真假马列主义，加深对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认识，自觉地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

（二）读什么书？马、恩、列、斯的基本著作，一九六四年中央曾经选定三十本书，作为高级干部的学习书目。最近，毛主席指示，“第一次宜少，大本书宜选读（如反杜林）。”建议各单位第一次读以下六本马、恩、列、斯著作和五本毛主席著作：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 二、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 三、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选读）
- 四、恩格斯：反杜林论（选读）
- 五、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选读）
- 六、列宁：国家与革命（选读）

毛主席五本著作：

一、实践论

二、矛盾论

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四、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五、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

（三）在学习中，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以自学为主，和集体讨论相结合。学习时间，首先靠自己挤，坚持天天读，可以规定共同的学习日，每周不少于两次。可以成立学习领导小组或者学习委员会，负责学习的规划、检查、总结和交流经验。各单位接到本通知后，应进行讨论，并将落实的情况报告中央。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翻印者未注明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六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

组长为康生，组员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

贰、本节简论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全国开展批修整风运动，毛主席提出在全党、全军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特别是要求党的高级干部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同时，毛主席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和“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原则，要求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和认识。

毛泽东主要抓了两件事；第一，继续查清事件的来龙去脉，搞清真相。第二，督促教育有关同志认识错误。

关于汪东兴，最先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承认错误并作了初步检查。下山以后，表示正在继续考虑问题，愿意作进一步检查。但是，汪东兴九月十五日的书面检查，虽然表面看来是揭露了陈伯达的几件阴谋活动，其实并没有说出多少他参与其中的幕后活动及真实意图。毛泽东认为，他和其他几个大将一样，与陈伯达不同，属于好心犯错误。充分肯定他愿意检查错误和揭露陈伯达的态度，并且希望通过他来带动其他犯有同样错误的人。有人说；汪东兴因为是身边的人，毛泽东就特

意袒护。有的人甚至说汪东兴是毛泽东安插到林彪集团内的一个奸细暗探。这完全是顾事实的瞎说。历史证明，汪东兴在九大前后，与林彪、陈伯达的政治立场非常接近，拼命向林彪集团靠拢，九届二中全会上，他积极主动地参与林彪集团的“倒张”（其实是要打倒康、江、张、姚，也可以说是“上海帮”）活动。这次阴谋活动失败了。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逝世后，他又迫不及待地参与组成以华国锋为首的新贵集团，与元老派中右派集团相勾结，发动十月政变，逮捕文革中的四位杰出左派领导人。这一次他成功了。

关于吴法宪，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作过一次检查，一九七〇年九月二十九日，吴法宪第一次写出了书面检讨。他的态度比其他几位大将好，其实，这种好也是表面上的，他并没有交待任何林彪集团内部的真实活动。即使如此，林彪集团已经把他划入另类。时刻防止警惕他牵扯出其他几个人。

关于叶群，她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幕后协调指挥，小组冲锋陷阵；后期她观测风向，按兵不动。下山后，由于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与她谈话，她在一九七〇年十月十二日，交出了第一次书面检讨。很明显，她这样做是为了丢卒保车。关于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他们三人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活动，与吴法宪、叶群是一样的，但是他们拒绝承认任何错误，也不作检查。

关于林彪，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担任“倒张”事件的后台和总指挥，并且由他亲自发出了冲锋的信号。毛泽东为了保护林彪，把他与整个事件的活动分开。但是，在揭发问题的过程中，许多事情都涉及到林彪身上。因此，九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与汪东兴谈话中指出：连林彪也受他们的骗。据说他要写信给我，叶群和他们不让写。我劝林应好好地想一想，表一个态嘛！今天未想通，待想通后表态也可以。”

一九七〇年九月二十九日，林彪找吴法宪谈话：过去庐山会议我不赞成你作检讨，但是我现在赞成你到毛主席那里去说一下，作点自我批评，主要是把当时和张春桥发生争论的情况再向毛主席谈一谈。

一九七〇年十月六日或七日下午，林彪找吴法宪去谈话。据吴法宪交待，主要内容如下：①要我去向毛主席承认错误作所谓检讨，（这是第一次叫我作检讨），要说明庐山犯错误是出于突然的，在山下事先没有任何准备和联系，就是我八月十三日反映的情况没有核实，林彪听了之后有气，所以在庐山就讲了话。我当时领

会他这段话的意思无论如何不要牵涉到林彪、叶群、黄永胜，要说明山下山上无联系，会前无准备，来欺骗毛主席。②错误要往陈伯达身上推，强调上当受骗。③这次庐山犯错误第一是陈伯达，其次是你，如果因为你这次犯错误把你撤下来，暂时靠边站，也不能乱说乱道，以后会有机会替你说话，不要因为你一个人犯错误就倒一大片。

这说明，林彪拒绝了毛泽东的要求。

2009 年 8 月 10 日初稿

2012 年 1 月 1 日修改

第三章第三节 陈伯达反党问题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〇年九月九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陈伯达专案组，由康生、李德生、周恩来负责。具体工作由中央办公厅有关负责人处理。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

1970.11.16；中发〔1970〕62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一）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立即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粉碎了陈伯达的反党阴谋，拨正了全会的航向。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全会揭露了陈伯达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严重罪行，揭露了他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的面目。这是我们党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二）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在一部分党的高级干部中口头传达过陈伯达反党的问题。为了教育干部，让较多的同志了解这个问题，中央决定将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一文印发给你们，请你们立即向党的地区级核心小组成员、部队师级党委委员和同级党员负责干部以及中央各专案组人员宣读和传达。传达内容主要以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为准。

（三）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文献，对于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组织建设，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在这个文件中，毛主席揭露了陈伯达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驳斥了他的谣言和诡辩，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号召全党同志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同陈伯达划清界限，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各单位要组织听传达的同志认真学习和讨论毛主席的这个重要文件，结合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和党中央一九七〇年59号学习通知所规定的著作，自觉地改造世界观，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和识别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能力，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四）各单位应由主要负责同志，亲自传达陈伯达反党的问题。

陈伯达历史复杂，是一个可疑分子。中央正在审查他的问题。各单位在传达时，要号召了解他的情况和问题的同志，进行检举和揭发，并请你们将揭发材料妥送中央。

（五）对陈伯达的问题，外间有一些猜测，敌人也在探听消息。传达时请你们注意保密。有关文件不准翻印、抄传、听传达的同志不准记录、不准传播。

各地传达情况和反映，望及时报告中央。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三十八军检举陈伯达反党罪行报告上的批语林、周、康及中央、军委各同志：

此件请你们讨论一次，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托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北京军区对陈伯达问题没有集中开过会，只在各省各军传达，因此没有很好打通思想，全军更好团结起来。以上建议，是否可行，请酌定。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转发三十八军党委“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

1970. 12. 16；中发 [1970] 76 号

1970 年 12 月 10 日，中共陆军第三十八军委员会写了《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送军委办事组并报中共中央。

报告说：“陈伯达千方百计地突出自己，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陈伯达不择手段地插手军队，搞宗派活动，妄图乱军、夺权。”“陈伯达在处理保定问题中，大搞分裂，挑动武斗，镇压群众，破坏大联合、三结合。”

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转发“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

1971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材料分为4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陈伯达的反动历史”。主要内容有：“家庭出身和入党前的个人历史”，“和国民党军阀张贞的关系”，“被捕叛变”，“失掉党的关系问题”，“托派问题”，“在天津工作时的错误和叛徒、特务、工贼刘少奇为陈翻案的问题”，“写反共文章”，“里通外国嫌疑”。

第二部分为“投靠和追随王明、刘少奇，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主要内容有：“追随王明，鼓吹‘国防文学’和‘国防哲学’”，“一贯投靠和追随刘少奇，是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秀才和头面人物”。

第三部分为“对抗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党乱军，阴谋篡权”。主要内容有：“大派工作组，又把自己装扮成反工作组的英雄”，“陈伯达是萧华、杨、余、傅、王、关、戚、‘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黑后台”，“陈伯达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进行的几次突出的反党阴谋活动”，“陈伯达借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机会，炮制了一个继承刘贼唯生产力论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反无产阶级专政的，分裂党的黑纲领”，“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的阴谋活动”。

第四部分为“投靠王明、刘少奇，招降纳叛，搞独立王国”。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关于扩大传达反党分子陈伯达问题的通知
1971年2月19日，周恩来就结束全国计划会议一事致信毛泽东，汇报近日工作安排，毛在信上批示：“都同意。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前期，批陈不痛不痒，如李、郑主持时期那样。”根据毛泽东批示精神，周恩来于2月20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关于扩大传达反党分子陈伯达问题的通知》。2月21日，《通知》下发。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关于批陈整风的指示

1971.02.23; 中发[1971]18号

照发

毛泽东

各大军区党委常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或党的核心小组，中央机关、中央军委、国务院主要负责同志：

在二月十九日中央政治局邀集各地来京参加国家计划会议的各大军区党委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或党的核心小组主要负责同志到会的会议上，首先宣读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会议的指示：

“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前期，批陈不痛不痒，如李、郑主持时期那样。”

宣读后，到会的各地主要负责同志表示了坚决拥护，认真执行毛主席的英明指示。为使各地和中央各领导单位在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能对毛主席的极其重要的指示有深刻的理解，并联系到庐山会议上反党分子陈伯达的阴谋活动和两条路线斗争的严重性，特将毛主席的指示全文，印发给你们，请认真学习和执行。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翻印者未注明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把批陈整风运动推向纵深发展的通知》。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日，中共中央关于批发《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的通知及附件材料

1972.07.02；中发 [1972] 25 号

毛主席批示：照发。

中共中央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

现将中央专案组《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和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证，发给你们，请你们按照中发 [1972] 3 号文件的精神，组织传达、阅读和讨论。

陈伯达到延安以后直至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的反革命罪行，还在继续审查中。有关陈伯达罪行的揭发材料，望各地继续报送中央。

中共中央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日

一九七二年七月一日，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发动的反革命政变，首先揭露了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陈伯达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批判了陈伯达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驳斥了他的谣言和诡辩，揭露了他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的面目。一九七〇年九月六日，在九届二中全会闭幕的会议上，党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经过全党批陈整风运动的揭发和批判，经过陈伯达专案组的深入调查，取得了陈伯达反革命罪行的大量物证、人证、旁证。一九七一年三月，毛主席指出：“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一九三一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刘少奇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所以他反党乱军，挑动武斗，挑动军委办事组干部及华北、军区干部，都是由此而来。”

一、陈伯达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

陈伯达出身于“四代书香”门第的破落封建官僚家庭。他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期间，他一贯站在国民党右派立场，进行反共反革命的罪恶活动。

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陈伯达在受漳厦护军使臧致平、当地警察厅长杨遂等操纵的厦门通俗教育社担任编辑工作。一九二五年春，在厦门，陈伯达经国民党右派黄振家介绍，参加国民党。同年，与黄振家、梁龙光等组织国民党反共团体“孙文主义学会”。

一九二五年九月，陈伯达在《洪水》杂志第一卷上发表《努力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工作》的反共文章，辱骂共产党“是走入迷路的糊涂虫”，“盲目胡言，自送死地”。他叫嚣要把这种“妖怪”“一扫而空”，就是要消灭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六年三月，陈伯达策划和指点国民党右派，对中共广东党、团区委派到厦门招收农民讲习所学员并帮助当地党、团发展组织的特派员，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围攻，质问我党特派员“来厦门有何任务、企图和阴谋”，诬蔑“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已失败”，诬蔑中国共产党是“卢布党”。

一九二六年夏秋之交，在广州中山大学，陈伯达和黄振家等“孙文主义学会”派反共分子，拥护国民党极右派邹鲁等召集的“西山会议”，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反对国共合作，叫嚷“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肆意毁骂“共产党居心不测”，“苏俄包藏祸心”，反对和破坏共产党组织的进步学生团体，辱骂共产党员“都是领苏联津贴的‘卢布客’”，“可鄙”。一九二六年秋至一九二七年四月，陈伯达先任国民党汕头市党部秘书，接着投靠国民党军阀张贞，任少校秘书，并兼任何应钦办的东路军军官学校政治教官。他为张贞起草反动文告，进行反共宣传，从事反共活动。

二、陈伯达一九二九年在莫斯科参加托派组织，回国后继续进行托派反共活动

一九二七年陈伯达混入党内不久，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一九二八年，他同万志凌等人一起，从事托派反共活动。陈伯达读了万志凌传给他的攻击斯大林和联共党的托派文件，听了万志凌散布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托派理论和诽谤斯大林、吹捧托洛茨基的反革命言论，他都完全同意。一九二九年四、五月间，经中山大学托派领导机构五人小组成员万志凌介绍，陈伯达参加了托派组织，接受万志凌的领导。陈伯达利用同乡、同学的关系，秘密组织阅读托派文件和托派书籍，暗中操纵程小孩（即程先奇）、郑洪涛等人进行托派反共活动，为托派组织筹集活动经费。莫斯科中山大学联共（布）清党时，万志凌等一些托派分子被苏维埃政府逮捕。陈伯达攻击说：“这简直是恐怖政策”，“斯大林是独裁专制”。他暗中活动，告诉其他托派分子注意隐蔽，“不要往前冲了”。托派分子万志凌等被判处流放时，陈伯达唆使一些人反对流放，要求将万志凌等人送回国内。万志凌流放临行前，陈伯达还特意送他五十个卢布，表示对托派的忠诚。

一九三〇年陈伯达回国后，继续进行托派反共活动。一九三三年，他参与了托派头目张慕陶分裂中共抗日同盟军前敌委员会的阴谋活动。一九三四年，陈伯达同托派头目杜畏之狼狈为奸，为张慕陶托派反共活动出谋划策。杜畏之主张，张慕

陶等人既然政治路线与中国共产党不同，就应另外成立一个党。陈伯达则主张：“路线虽有分歧，但这伙人不应脱离共产党，只应成为党内一派，以自己的主张影响党，在党内夺取领导权。”

关于中国革命的策略问题，陈伯达同杜畏之的意见一致，都是只要城市，不要农村，只要工人，不要农民，对农村武装斗争不抱什么希望。这是中国托派在三十年代的基本主张。陈伯达一九三四年向党组织提出的《怎样组织与怎样斗争》的意见书中，还企图用这种观点来改造党，妄图否定中国革命要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他在意见书中说：“苏区各地革命的深入，与白区革命运动的开展是目前中国苏维埃红军胜利的保障，然而这还不是绝对的保障，绝对保障还是要依赖于几个中心城市以至于全国的革命胜利”。

对于中国社会史的看法，陈伯达完全同意苏联托派头子拉狄克和中国托陈取消派陈独秀等人关于中国历史上没有奴隶社会阶段的观点。一九三五年五月，他在《殷周社会略考》一文中说，“无论是从地下的发掘，或古代遗下最可靠的文书，我们还没有发现出中国曾由氏族社会转化为奴隶社会之历史的存在。”中国是“空白奴隶社会的阶段，而径由氏族社会转化为封建社会的”。从三十年代中期到四十年代中期，陈伯达发表了许多文章，大肆宣扬这种托派思想，否认马克思揭示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

三、陈伯达一九三一年在天津被捕叛变，成了特务

一九三一年四月八日，陈伯达在天津英租界集贤里被捕。在敌人审讯时，陈伯达供认了组织关系，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在省里搞宣传工作”；供出了“集贤里是共产党河北省委机关”，同案人“全是共产党员，有的担任组织工作，有的搞通讯工作，有的担任缮写、印刷或者帮助别人搞工作”；供出了许兰芝、陈源道、刘一鸥、史连甲等人的组织身份和组织活动；供出了曾在莫斯科学习过的同案人的真实姓名。敌人在复审其他人时，证明陈伯达的供词属实。

一九三一年九月，陈伯达转押北平草岚子监狱。在狱中，他向敌人写反共呈文，说他并不赞成共产主义，认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他在狱中写信给国民党军阀张贞的叔父张达卿，向张贞求救。张贞出款两千元，由王雨亭、陈文总出面到北平活动，经郅中复的父亲郅斌山（东北军少将）的关系，陈伯达写了“改

过书”，办了自首手续，于一九三二年二月出狱。陈伯达出卖组织，出卖同志，是一个可耻的叛徒。

陈伯达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他出狱后，继续与国民党军阀张贞、美蒋特务陈文总、河北省国民党党部特务室主任林光耀等保持联系，从事反共活动。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正当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入华北的时候，陈伯达抛出《论谭嗣同》一书，鼓吹帝国主义“侵略有功”的反动理论，鼓吹甲午战争后“联日”“是具有相当进步的意义的”，赤裸裸地宣扬卖国主义。

一九三四年，陈伯达鼓吹合法主义，取消革命斗争，强调华北并未沦亡，反对党提出的武装抗日的主张。

一九三六年九月，陈伯达发表《文学界两个口号问题应该休战》的反共文章，站在王明、刘少奇一边，支持周扬等“四条汉子”炮制的“国防文学”的反动口号，反对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陈伯达在文中说：“我认为‘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是不可驳倒的。就是那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的人，也不能否认这口号的正确性。‘国防文学’——这是联合战线的口号。”他还攻击“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不是联合阵线的口号”。同时，陈伯达同章乃器等人一起，推行王明投降主义路线，在《读书生活》第四卷第九期搞了一个“国防总动员特辑”。在这个特辑中，他抛出《哲学的国防动员》的文章，提出了反共卖国，同大资产阶级搞“合二而一”的“国防哲学”，并提出了所谓“新启蒙运动的建议”。自一九三六年九月至一九三七年夏，陈伯达连续发表了十篇文章，从资产阶级的“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出发，为“新启蒙运动”提出一套适应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需要的政治纲领，企图把当时的一切文化运动纳入国民党反动派的轨道。

一九三八年六月，陈伯达抛出了《三民主义概论》这个反共纲领。在这本黑书中，他抹杀“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同旧三民主义的原则区别，抹杀共产主义同三民主义的原则区别，狂热地宣扬蒋介石那一套反动的三民主义，吹捧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他宣扬三民主义不仅要把中国从帝国主义的和中古制度的奴役之下解放出来，而且将来更要转变到社会主义去。他这本黑书的要害，就是妄图用三民主义来对抗和代替共产主义，溶化和取消共产党。在这本黑书中，陈伯达明目张胆地篡改和捏造历史，对叛变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和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举行了十年“剿共”战争，血腥屠杀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独夫民贼蒋介石和大汉奸汪精卫，奴颜婢膝地、恬不知耻地极尽歌颂吹捧的能事。他摘引了蒋介石、汪精卫的言论之后，接着吹捧说：“正是因为当时主要的国民党领袖，是这样不为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诡计所动摇，这样坚决地继续中山先生和仲恺先生的精神和政策，结果才把陷于‘四面楚歌之中’的革命广州挽救过来，终于能够排除万难，克服大敌，转危为安，使革命势力得以继续发展和扩大。如果不是这样，那末，真要如古人所说的‘汉之为汉，未可知也’了。”他在书中鼓吹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投降主义路线，妄图取消边区，统一于国民党反动政府。

一九三八年，陈伯达把这本黑书托王明带到重庆出版，向国民党献媚。一九四六年，陈伯达配合刘少奇“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在这本黑书中，特别加进鼓吹“和平过渡”的反动内容，再版抛出。

四、陈伯达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同苏方人员秘密来往，进行阴谋活动

一九四九年未至一九五〇年初，毛主席访问苏联，陈伯达随行。当时，中苏会谈一度遇到苏方制造的困难和障碍。在这样的关键时刻，陈伯达竟然采取“老鼠搬家”的罪恶行动，背着毛主席，同苏方秘密来往。他接受苏方的邀请，同苏方人员密谈。他出席观看丑化和污蔑中国革命的芭蕾舞剧《红罂粟花》，并同该剧的编导座谈。他背着毛主席、党中央，私自答应苏方的要求，让历史上犯过严重政治错误并同苏联特务机关有密切关系的陈昌浩回国。他为了向苏方表明他反对毛主席在中苏会谈中坚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立场，竟然同毛主席住在一起，而搬到驻苏使馆去住。他在莫斯科会谈期间，行踪诡秘，同苏方搞了一些不可告人的勾当。回国后，陈伯达继续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同苏方人员罗申、尤金、费德林等人秘密来往。对苏方人员尤金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陈伯达不仅没有任何抵制，而且充当了他们反毛泽东思想的应声虫。

五、陈伯达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一贯坚持修正主义，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四次路线斗争中，陈伯达都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头子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勾结在一起，反对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解放初期，陈伯达参与了高饶反党联盟分裂党，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积极帮助高岗修改《荣誉是属于谁的？》一文，为高岗捞取政治资本。他给高岗通风报信。高岗为篡党夺权准备的材料，给陈伯达看过，得到陈伯达的支持。

一九五九年第一次庐山会议，陈伯达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参与了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彭德怀抛出向党进攻的信件。当天晚上，陈伯达当众向彭德怀说：“彭老总，你的信写得很好，我们都支持你。”他同彭德怀紧密配合，恶毒攻击党的总路线，疯狂反对大跃进、人民公社，支持彭德怀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罪恶活动。

陈伯达长期为刘少奇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出谋划策。他同刘少奇一道，鼓吹发展资本主义，“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反对和破坏农业合作化。他反对和破坏毛主席领导的思想文化领域中反对资产阶级的历次大斗争。他伙同刘少奇炮制了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谬论，背着毛主席，把这个修正主义的黑货塞进了“八大”决议，妄图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路线强加给全党。在大跃进的高潮中，他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反对毛主席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在现阶段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正确论断，否定价值法则、商品生产和货币作用。接着，他又从极右的方面反对党的总路线。一九六一年第二次庐山会议期间，他背着毛主席、党中央，私自下山，大肆搜集反对总路线的黑“材料”，炮制和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他到处叫嚷要发展个体经济，搞单干，妄图从组织上瓦解人民公社。他又大肆鼓吹“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妄图瓦解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在一九六二年党的七千人干部大会期间，他参与起草刘少奇的黑报告，竭力夸大三年自然灾害和苏修叛徒集团反华造成的暂时的经济困难，猖狂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同刘少奇一道，公开提出和推行“三自一包”的修正主义路线。他积极帮助刘少奇整理和修改黑《修养》，并在《红旗》杂志上重新发表。在四清运动中，他是刘少奇推行形“左”实右的路线、贩卖反革命“桃园经验”的主要帮凶。他公然提出要刘少奇管“四清”和农业，反对毛主席对我党统一集中的领导，帮助刘少奇篡党夺权。

早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前，陈伯达就投靠林彪，同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勾结在一起，采取种种恶劣手段，拉山头，搞宗派，结成以林彪为头子的

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林彪、陈伯达一伙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文革，长期进行地下秘密活动，大搞阴谋诡计，妄图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他们利用窃取的权力，提出许多形“左”实右的反动口号，挑动干部，欺骗群众，煽动极“左”思潮，挑拨离间，制造分裂，疯狂反对党中央，反对人民解放军，破坏革命委员会，破坏我国的对外关系。林彪、陈伯达是反党乱军，挑动武斗的罪魁祸首，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黑后台，是国内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和帝、修、反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许多鬼事情的根子就在这里。

林彪反党集团经过长期的密谋策划，在一九七〇年八月的庐山会议上向党进行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进攻，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他们突然袭击，煽风点火，破坏九届二中全会原定议事日程，背叛“九大”路线，妄图分裂我党我军，向毛主席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陈伯达为林彪发动反革命政变，实现两条反党纲领，私拟了“设国家主席”的宪法条文，炮制了“称天才”的材料，修改了林彪八月二十三日的反党讲话，制造和散布了五大谎言。大量事实证明，陈伯达是这次反革命政变的主犯之一。

陈伯达是一个反革命两面派的政治骗子。长期以来，他竭力伪装自己，采取造谣和诡辩的手法，欺骗党，欺骗群众。现在，经过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揭发，专案组的调查，证实陈伯达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

陈伯达到延安以后直至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的反革命罪行，还在继续审查中。现将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证附上，请中央审查。

中央专案组

一九七二年七月一日

贰、本节简论

关于陈伯达的问题，是由一九七〇年八月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发生的“倒张事件”引起的。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对陈伯达进行了初步的揭发和批判。

一九七〇年九月九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陈伯达专案组，对陈伯达进行全面审查。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

在这个指示中，对陈伯达在九届二中全会上问题定性为“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

这个定性应该说是准确的。不报告中央主要负责同志，未经中央批准，就在全会上煽动一些人，要揪出一个中央政治局常委、三个政治局委员，这难道不是分裂党的阴谋活动吗？

至于在这个阴谋活动中，陈伯达是不是主谋，其他涉案人都是上当受骗？这在当时整个案件正在审查中，只能作出这样的初步结论。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就说过：过去认为是林陈反党集团，现在看来就是林彪反党集团。

通过审查陈伯达的历史，给陈伯达戴了五顶帽子：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

陈伯达为自己作了辩解。但是，根据他的辩解，他自己也不能不承认：

一九二六年，他与国民党右派分子搞在一起，参与了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的活动，修改过这个学会的章程。但是，他说他没有正式参加这个组织。根据这个时期他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表现，说他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并不为过。

一九二八年陈伯达在苏联学习期间，与托派分子搞在一起，托派组织领导人介绍他加入托派组织，他说他没有参加，学校审查对他的结论是“学院派”。根据这个时期他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表现，说他是一个托派也不为过。

一九三一年四月，陈伯达被捕，他承认：由于叛徒许芝兰指证，他供出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等等。一九三二年九月，由于他托人，国民党军阀张贞出钱、国民党特务陈文聪活动，他被保释出狱。他承认：在出狱时，填了悔过书——误入歧途云云。但是他说，他认为自己曾经翻过案，这时填悔过书，不是悔加入共产党之过，只是悔加入共济会之过。这种说法当然只是自欺欺人之谈。根据他的表现，他至少是一个自首分子。

一九三二年九月，陈伯达出狱以后，与国民党特务陈文聪等人搞在一起。他究竟搞了那些不可告人的特务活动？是否参加特务组织？审查报告没有提出更多的证据，他本人也没有作更多的辩解。

至于修正主义分子这顶帽子，主要是指陈伯达在建国以后的错误，大家都比较清楚，就用不着更多讨论了。

2009 年 8 月 24 日初稿

2012 年 3 月 8 日修改

第三章第四节 召开华北会议

壹、 本节概述

一九七〇年九月七日晚上，黄永胜给郑维山亲自打了电话说：“传达陈伯达问题时，除了陈伯达的名字可以讲外，其他人不要涉及”。

一九七〇年九月八日，郑维山召集驻北京附近几个单位的军常委以上的同志，传达九届二中全会精神，

郑维山说“要从这次会议开始，养成一个好的保密的风气”。还说：“谁泄露出去，是党员的开除党籍，是中央委员的要考虑他的委员”。

郑维山在传达时，大讲林彪的讲话，而在讲到陈伯达的问题时，只讲陈伯达在某小组跳出来，制造谣言。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八日，北京军区党委决定召开全委会，揭发陈伯达的罪行。

郑维山说，“工作这么忙，还开会吗？”

在其他常委同志们的坚持下，他才勉强同意开会，

在会上，郑维山说“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没有揭发的，表个态就行了，可以单独表，也可以集体表”，“要防止有人利用揭发陈伯达的问题来破坏华北的大好形势”。

在这次全委会上，三十八军的领导同志，对陈伯达的反革命罪行，进行了严肃的揭发批判，并提出了要“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三十八军的重要检举揭发材料，郑维山不让专题上报。

会后，起草了一个报告，郑在审查这个报告时，特意删掉陈伯达提出的“华北搞经济协作，要轮流坐庄，北京军区作后盾”等话。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三日，毛泽东对黄永胜说：庐山会议发难，你黄永胜是头，你们办事组一统天下，我要打破你们的一统天下，我现在要谢富治、纪登奎参加你们办事组。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北京卫戍区关于部队战备野营拉练总结报告上的批语

林彪同志：

此件可阅，我看很好。请你和黄永胜同志商量一下，全军是否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训练一次，每个军可分两批（或不分批），每批两个月，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三支、两军者不在内。但大、中、小学（高年级）学生是否利用寒假也可以实行野营训练一个月。工厂是否可以抽少数工人（例如四分之一，但生产不能减少）进行野营练习。请与中央各同志一商。

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关于全国野营拉练的通知

1970年11月24日，毛泽东作出提倡野营拉练的批示。他在北京卫戍区《关于部队进行千里野营拉练的总结报告》上批道：“林彪同志：此件可阅，我看很好。请你和黄永胜同志商量一下，全军是否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训练一次，每个军可分两批（或不分批），每批两个月，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三支、两军者不在内，但大、中、小学（高年级）学生是否利用寒假也可以实行野营训练一个月，工厂是否可以抽少数工人（例如四分之一，但生产不能减少）进行野营练习。请与中央各同志一商。在报告的最后一页，毛泽东批示：“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

12月6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通知》，要求全军迅速掀起冬季长途野营训练的热潮，从12月到次年3月，普遍拉练两个月。按照这一部署，拉练的第一阶段侧重进行阶级教育、光荣传统教育和演练行军宿营、侦察警戒、生活管理、做群众工作等；第二阶段可搞一些急行军、夜行军，侧重练指挥、练通信联络、练战斗技术、练诸兵种的协同动作和后勤保障。《通知》要求担任机动作战任务、守备任务、施工基建和生产任务的部队及海、空军地面部队，军队院校和大军区以上机关都要根据各自情况组织拉练。此后至1971年9月，解放军540个师以上机关，43所院校，90%以上的野战部队都进行了野营训练。通过训练，练思想，练作风，练指挥，练战术技术，练走练打，全面锻炼了部队；同时开展拥政爱民活动，密切了军民关系。野营训练也暴露出军队受“文化大革命”影响不搞军事

训练而造成的许多问题。

12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大、中城市（包括省、地直属市）学校的野营拉练，可在寒假或暑假期间分期分批进行，大学每批一个月，中学和小学五、六年级学生，每批20天到30天。”此后的三四年内，全国大、中城市的学校都按照这一指示，师生每年分期分批进行野营训练一二次。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三十八军检举陈伯达反党罪行报告上的批语林、周、康及中央、军委各同志：

此件请你们讨论一次，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托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北京军区对陈伯达问题没有集中开过会，只在各省各军传达，因此没有很好打通思想，全军更好团结起来。以上建议，是否可行，请酌定。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时说：“什么‘四个伟大’（指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作者注），讨厌！”

斯诺说：“我有时不知那些搞得很过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

毛主席说：“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的，‘你们大家要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

“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几次表示过对“四个伟大”提法的态度：

1967年2月3日会见卡博、巴卢库时，就说过：“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不高兴。”；

1968年元旦前夕，要发表一篇元旦社论。社论的草稿上提了“四个伟大”，毛泽东让人拿着社论的清样去钓鱼台找陈伯达和姚文元删掉。有人问毛主席，“四个伟大”您就不留一个？主席想了想说，那就留下一个吧！又问留下哪一个。毛主席说，我是当教员的，就留下那个导师吧。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和讨论了毛泽东对三十八军报告

的批示。

华北到会的有郑维山（北京军区司令员）、李雪峰（北京军区政委、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等九人，北京卫戍区到会的有吴德、吴忠等三人。

大家一致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先开北京军区党委常委会，后开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

然而，军委办事组认为：庐山会议之后，主席看到 38 军对批判陈伯达和搞掉北京军区都有很大作用，于是，秘密把 38 军的领导叫到北京，由江青亲自组织 38 军写报告，江青说这是主席的指示，所以 38 军的人特别卖力气。报告写好以后，毛主席又以 38 军主动写报告的形式，对报告做了批示，作为石头向军委办事组打了过来。毛主席和江青的这些做法，我们看在眼里，对主席的做法感到震惊，疑惑。但那时根本不敢想主席的不是，而是对江青、张春桥之流更加痛恨。

周总理向军委办事组传达了毛主席要“全军学习 38 军”的指示。总理说：“毛主席要我向各位说一下，军委办事组和全军都要好好学习 38 军的报告，办事组要首先学好，在全军做模范。毛主席说，军委办事组的几位不砸烂枷锁就不能解放自己。军委办事组的人，同陈伯达是不一样的，他们是认识问题。”

主席说的“枷锁”是什么？就是林彪。

军委办事组的人认为。38 军的报告就其立场观点来，是代表造反派的，是不能支持的。学习 38 军的报告又不能支持他们的派性情绪，但陈伯达也要狠批，这是一个矛盾。

军委办事组在学习 38 军报告的问题上，提出了两个学习重点：消除派性和批判政治骗子，对这个问题军委办事组的几个人同李德生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李德生说：“批判陈伯达的派性应当是学习重点，陈伯达是支一派，压一派的典型。”意即陈伯达压制了造反派。

邱会作说：“我是坚决反对李的观点的。按照主席的指示，陈伯达主要是政治骗子问题。你不要把造反派的观点带到军委办事组来。”

李德生说：“难道你就是革命派的后台了？”

邱会作说：“对不起！不仅我是革命派的后台，军队的高级干部中，除了极个别的人之外，都是革命派，这点难道你还不清楚吗？”

黄永胜看到他们的争论很激烈，就说：“军队是决不允许造反派存在的，这一点不能含糊。批判的内容还是对准陈伯达和‘上当受骗’的问题。如果超出这个界线就要把叶群也拉到里面来的，要漏底。这样就引起问题的复杂化。”

李作鹏说：“底是要漏的。不漏底别人总以为我们有见不得人的事，就是在坐的两位(指李德生、刘贤权)也不会相信我们是清白无辜吧？”

邱会作说：“我同意老李的意见。我还主张应当‘翻箱倒柜’让大家看个清楚。比如说，我是反对造反派的，反对某些人(指江青、张春桥)支持造反派整我的。这就是我的主要的底。至于在庐山叶群说的那些话，也要漏底，否则别人真会怀疑我们搞了‘炸平庐山’的什么事。现在，大家都还活着，这个底必须漏，而且要漏的连一点渣子也不留。”

黄永胜说：“请李德生、刘贤权也向我们提些意见，揭发更好。”

他们两个人都摇头说：“没有什么意见。”

李德生还补了一句：“你们的职务、水平都比我高，我是相信你们的。”

李作鹏说：“你们不要搞台上握手，台下踢脚。”

黄永胜最后说了两句话：“要有自我批评，要说自己的问题。”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九日，周恩来将 18 日开会所议给毛泽东、林彪写了请示报告。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九日，毛主席在周恩来同志关于开好华北会议的请示报告上批示：

“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

建议李德生、纪登奎二同志参加会议。

永胜、作鹏应同德生、登奎一道参加华北会议。

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

黄永胜、李作鹏在接见三十八军领导人时说：“不要只攻北京军区为什么陈伯达成了你的太上皇，那样就把事情搞复杂了。”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共中央转发周恩来同志“关于开好华北会议的请示报告”

1970.12.19；中发〔1970〕77号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汪东兴去参加华北会议前，请示毛主席：

“我要不要发言？”

毛主席说：“你现在是明白人了，为什么不发言？”

汪东兴说：“我先写一个东西给您看一看，不要又搞错了。”

毛主席说：“不用写了。根据我与你几次谈话的情况，我看你的思想已经通了。你讲吧，讲错了，回来我们再商量，再批判嘛！”

说到这里，毛主席哈哈大笑起来。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华北会议召开。

中央政治局委员都参加了会议。

揭发批判陈伯达。

涉及到李雪峰、郑维山。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姚文元同志给主席的报告

主席：

上海准备一月上旬(大约一月三日或四日)在“一月革命”四周年时开党代会，已有同志来京汇报。春桥同志和其他同志都要我回去一下。我想在三十一日或明年一月一日回去半个月左右，已向政治局报告过。这两天准备把几件紧迫的事办掉(如“红旗”付印等)。您是否同意，请批示。

这次回去，仍想抓一下大批判问题。自己最近除学习中央指定的经典著作外，还很粗浅地读了一点历史和自然科学，想逐步改进自己知识贫乏的状况。把《史记》同《汉书》、《后汉书》相比较，觉得前者在观点及文字上均高出后者不少。赫胥黎为达尔文主义奋斗的《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比严译《天演论》好看多了，由于倾注全力证明人的老祖宗是猿，曾引起神学家们的狂叫怒骂。他用的方法是解剖学的比较方法，一当进入人类历史领域，就显得论据不足

了。他不能达到历史唯物主义，不了解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自觉的能动性以及这种能动性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对于“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这个问题，他只回答了一半。此书在普及达尔文学说上有特殊的功劳。一种新的进步的学说要普及，不经过这种剧烈的批判，大约是不可能的。翻看了一点《五灯会元》，才知道宗教的唯心主义的虚妄是怎样用诡辩和折衷主义来装点门面的，这从反面教育自己辩证法的重要。另外还读了一些孙中山的东西。也看了一些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东西。逐步形成这样一个概念：从刘少奇的黑《修养》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一直到他在“八大”的报告和决议，有一条同主席无产阶级世界观相对抗的黑线贯串着，即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这可能是刘少奇反动世界观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的许多文章、“报告”中，都有抽象的即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提法和论点。这是同国民党反动观点一致的。从这里，可以直接引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以及极“左”、形“左”实右的路线，可以直接引出复辟资本主义、为地富反坏右等剥削阶级服务的修正主义理论，同主席历来倡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的根本观点相对抗；在认识论上，则必然同时既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又反对进行社会的调查研究和革命实践，同毛泽东思想关于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这个根本观点相对抗。从国际上看，苏修叛徒们的复辟资本主义的理论也是建立在所谓“人道主义”“人性论”之上的。批刘的文章，在这个问题上仍未批透。想认真搞一点材料及文章。此外，关于陈伯达，也要整理一些此人反动世界观的文字材料，揭发材料中这一部分很少。还想整理一点思想史的材料，以执行主席《我的一点意见》中“继续研究”的任务。别的事可能办不多了。可否，请予指示。致

无产阶级的革命敬礼！

姚文元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晨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对姚文元关于最近学习情况等问题报告的批语

都同意。你的学习进程较好较快，坚持数年，必有好处。我的意见二百七十四中央委员，及一千以上的高、中级在职干部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

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请找一本给我。《天演论》前半是唯物的，后半是唯心的。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三十日，林彪对姚文元关于最近学习情况等问题报告的批示完全同意主席对文元同志报告的批示。全体中央委员和高中级干部认真照主席的指示学习，对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极为重要。

林彪

十二月三十日

一九七一年一月五日，济南军区政治部关于学习贯彻毛主席“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

军委、总政治部：

经过学习贯彻伟大统帅毛主席“军队要谨慎”的指示，林副主席“现在更要特别注意谦虚谨慎”的指示和中央首长关于克服骄傲自满情绪的讲话以及解放军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社论，许多同志说：“我们再也不能麻木不仁了”。各单位通过举办干部学习班、召开各种会议、四好总评等活动，反复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军区“三代会”又进一步作了贯彻，并结合学习沈阳军区党委《关于克服骄傲自满问题的报告》。通过大谈在战争年代骄傲掉人头，文化大革命中骄傲吃苦头的教训，把骄傲自满上升到路线上来认识，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看待自己，在灵魂深处挖骄傲自满的根子，深深地感到：“毛主席的指示无比英明正确，是对我军的最大关怀，最大爱护”。“革命路上不反骄，早晚都要摔大跤”。

我们在贯彻毛主席指示中，主要抓了以下问题：

一是破“一贯正确论”，立一分为二的世界观。如有的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比较好地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或历史上有战功，工作有成绩，就自以为“一贯正确”，看自己“一朵花”，看别人“豆腐渣”，针对这些问题，许多单位学习了毛主席关于“一分为二”的教导，批判“一贯正确”的形而上学思想，摆自己的成长史。有的说：在战争年代虽然打过仗，流过血，但也不是每一仗都符合毛主席的要求。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虽然没有受过处分，但对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和他在军内的代理人彭德怀、罗瑞卿篡夺党、政、军大权的阴谋看得

不清、或跟着办了错事。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做出了一些成绩，但对毛主席在各个阶段的伟大战略部署，并非都是自觉地紧跟、坚决照办的。通过这一回忆，使自以为“一贯正确”的同志深受教育。认识到：“一贯正确”的本身已经是不正确了，它从根本上违背了毛主席的唯物辩证法。把自己打扮成“一贯正确”，目的是为了争功。表现是个“骄”字，实质是个“官”字，根子是个“私”字。二十六军党委先后两次集中团以上干部学一分为二，查骄傲自满，破“一贯正确”，决心把骄傲自满搞得臭臭的，让毛主席革命路线在头脑中树得牢牢的。

二是破“领导高明论”，立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念。针对有的同志总觉得自己“比群众高明”，好摆官架子。动辄批评训斥，大小事都要他说了算的问题。用毛主席“既当‘官’，又当老百姓”，“决不许可摆架子”的指示武装干部的头脑，引导大家从谈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入手，看官气十足的危害。有的单位例举了有的老干部不注意思想改造，“眼睛长在头顶上，尾巴翘在天上”，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变成了走资派的事例，说：有了官气，就会发展骄气，丢掉革命朝气；就会由革命的动力转化为革命的阻力，由依靠群众转化为脱离群众，由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转化为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迟早总会被淘汰”。

三是破骄傲有“资本论”，立为人民要立新功的思想。有的同志总认为自己“战争年代经过‘火线’锻炼，文化大革命经过‘路线’考验，就凭这些资本，也可以再过半辈子”。因此，学习不刻苦，作风不深入，工作无创造，靠吃“老本”过日子。在贯彻毛主席的指示中较普遍地抓住这个问题不放，学习毛主席关于“老干部过去有功劳，但是不能靠吃老本，……要立新功，立新劳”的教导，进行小整风，展开思想交锋，在灵魂深处搞斗、批、改，自觉的放下“战功”与“新功”的两个包袱。二〇三师副师长杨育才，在抗美援朝的战斗中，荣获战斗英雄称号。曾产生过有“资本”的念头。学习中，他深有体会的说：成绩、进步、荣誉，只能说明过去，不能代替将来。职务提升了，不见得思想觉悟就提高了；资格老了，不是革命到头了；荣誉多了，不是为人民服务到顶了。要不断地改造世界观，在紧跟毛主席进行新的万里长征中，为人民立新功。许多同志批判了“船到码头车到站”的半截子革命思想，决心在有限的年龄里，用无限的精力（毛主席批注：改为充沛的精力较好，因为人的精力并不是无限的）加倍为人民立新功。

目前，在贯彻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克服骄傲自满问题上，发展还很不平衡，取得的效果也不一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求各级党委，把克服骄傲自满情绪，作为搞好领导班子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在学习元旦社论中，集中一段时间，组织领导干部反复学习毛主席、林副主席有关论述，发动群众，开门整风。同时，通过新年、春节和野营拉练的机会，在全区部队进行一次以反对骄傲自满、虚心向地方学习为主要内容的拥政爱民教育。对三支两军人员普遍进行一次整训，反骄破满。“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努力完成“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

以上报告，不当之处请指示。

济南军区政治部

一九七一年一月五日

一九七一年一月六日，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贯彻毛主席对姚文元同志报告的批示的通知

1971.01.06；中发[1971]2号

毛主席批示：照发。

中共中央通知

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或党的核心小组，各大军区、省军区党委，各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党委，党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

伟大导师毛主席对姚文元同志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报告的批示，极为重要，是我党思想建设的最根本问题。现将主席、林副主席批示和姚文元同志报告印发给你们，望全体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全国高、中级在职干部认真照主席的指示学习，以期不负主席的要求和希望。

中共中央

一九七一年一月六日

发至县、团级。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发出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原题为：中共中央通知）

一九七一年一月八日，毛泽东关于转发济南军区政治部学习贯彻毛泽东“军队要谨慎”指示情况报告的批语

林、周、康三同志：

此件很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了问题。请你们看一下，是否可以转发全军。如同意，请总理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宣读、讨论、通过，并加上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军委总政治部的几句指示，即可发出。除军外，中央机关和地方党、政机关也要发出。我军和地方多年没有从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

一九七一年一月八日，林彪批示

完全同意，希望按主席批示认真落实。

林彪

八日

一九七一年一月九日，中央军委召开一百四十三人参加的座谈会。

关于军委座谈，是否要急于召开以及怎么开的问题上，在军委办事组内部都有不同意见的争论。

邱会作认为：

庐山的问题，是不能简单了事的。这是由下列三个问题决定的。

庐山会议斗争的实质，是军队反江青一伙的斗争，由于林总不点名的批了张春桥，问题就不一般了。对庐山问题的处理，关键是毛主席对林总的态度。在当时的条件下，也就是毛主席怎样说一句话的问题，林总的政治生命就在毛主席手里提着的，这是不能不考虑到的。

毛主席在陈伯达身上开刀，是没有办法的最好办法。这样可以一举两得：保护林彪；满足江青一伙的需要。还有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杀鸡给猴看”。如果江青一伙再搞点风浪，我们几个人就可能同陈伯达同罪论处了，至少吴法宪可能是这样的，对这一点，我的估计总是比较坏的。

对主席解决庐山问题的打算，黄、吴、李、邱是非常关心的，因为这是关系

到我们的政治命运的问题。但我们经常在一起谈论的是，如问题升级到涉及林总，就是党内的大局问题，也涉及到九大路线问题。1959 年庐山会议反彭德怀的结局，可不可能出现？

我对庐山问题的前途是两点论，既要看到当前好的一面，又要看到可能向坏的方向变化。(一)庐山的问题，可能随批陈整风结束而结束，我想这是主要的可能性；(二)在江青一伙兴风作浪之下，对我们这些人，即使不是全部，也可能对某些人，做出不利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结论。李雪峰不是庐山问题主要当事人，现在不是也下台了，但他与林彪没有什么关系。

我是坚决反对仓促开会的，我曾对黄永胜直言不讳地说：“军委座谈会要开失败了，就会出现严重的后果，我们会错上加错，他们(江青一伙)会喜上加喜，这一错一喜加在一块，就有埋葬我们的可能。”我认为如果随便召开一次影响全军的高干会，就有一招不慎，全盘皆输的危险。对庐山会议的问题，主席那里没有相对明朗的态度之前，召开全军高干会是不适当的。现在继续抓紧全军的批陈整风比什么都好。要是军委办事组能够在全军批陈整风学习的基础上，加上军委办事组向毛主席写出一个有份量的检讨，大家都有做“汪东兴”(解脱)的可能。

我们几个人(黄、吴、李、邱)都是庐山问题的当事人，毛主席现在究竟信任我们，还是不信任？这是我们自己不能回答的问题。不被信任的人，去主持全军高干会能行吗？说话能有人听吗？

黄、吴基本上不同意邱会作的观点。他们说：“你对有利的因素看得太少了，对可能发生变化的问题估计得太多了。这样也未必能正确处理问题。”

由于军委办事组多数人都同意召开军委座谈会，开会的问题就定下来了。

这个座谈会有总参、总政、总后，各大军区司令、政委及各军种、兵种负责人参加。

军委座谈会开幕的前一天，军委办事组召集各组负责人讨论黄永胜在开幕会上讲什么话的问题，又是一场争论。

邱会作说：“黄总长明天说什么好办，关键是会议怎么开，我看这是大问题。我主张，在庐山会议犯了错误的人，要首先做检讨，我的理由如下：

一、军委座谈会，提出了批陈整风的方针。我们批评陈伯达就是包含进行自我批评，我们没有自我批评就不算批判陈伯达。其实，我们和陈伯达什么‘关系’

也没有，我们和陈伯达只是非议过江青、张春桥这些人，犯过自由主义，为此江青不满，毛主席也不满。现在是毛主席把我们算成陈伯达‘一伙’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自我批评才能同陈伯达划清界线，真正做到自己‘解放’自己。

二、会议对我们的批评能否搞起来，在很大程度上就看我们的自我批评了。只要我们有自我批评，到会的人自然就会对我们进行批评了。只要出现了这种局面，批判陈伯达就是成功的。

三、以我的看法，这次军委座谈会开的成功或失败，唯一的标准就是我们要以陈伯达为对象，有自我批评，从而引起到会的人对我们几个人的批评。对我们进行批评甚至过火的批评，会议就成功了。反之，如果到会的人对我们没有批评，会议就失败了。”

邱会作的意见讲了后，大家提不出反对的意见，但也没有什么热劲。

有人说：“庐山的问题，大家看得见的，是没有什么好说的。”

对这种提法，有的人根本不同意，他们说：“什么看得见看不见？对军委办事组采取怀疑态度，是毫无根据的。”

在会上不少人给军委办事组评功摆好，就是有点批判，在批评的话之后，又补充一些好话。比如冼恒汉在会上说：“军委办事组威信高，军委办事组犯了错误，但我们对军委办事组还是完全信任的。”

黄永胜对邱会作的意见，则用另一种说法以表示他不同意。他说：“我们几个人做检讨是大局，需要请示报告。”黄还说：“自我批评只能说自己，不能涉及别人。”

黄永胜代表总参作军事工作报告，李德生代表总政作政治工作报告。

会议简报上说：军委办事组对毛主席“跟得最紧”，“突出政治，狠抓根本”，“谦虚谨慎”，“办事认真”等等。

吴法宪说：这个话反映上去不好，让毛主席看到对我们不利。

有的人不同意吴的意见，这些简报都送上去了。

这个座谈会于二月中旬散会。它从一开始就列席了华北会议，但它本身从来没有开展批陈整风。

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军委总政治部关于贯彻执行毛主

席一月八日重要批示的通知

1971.01.11；中发〔1971〕3号

毛主席批示：照发。

关于贯彻执行毛主席一月八日重要批示的通知

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济南军区政治部《关于学习贯彻毛主席“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作了极为重要的批示，并指出济南军区政治部的报告“此件很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了问题”。这一批示对于加强我党、我军思想、作风建设，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具有极其重大的作用。多年来，军队和地方以及中央机关没有从反对居功骄傲这一方面进行整风。有些干部存在着居功自持，骄傲自满，军阀主义，自以为是，一言堂，讲假话，不走正道等歪风邪气，对内对外的大国沙文主义，这对于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妨碍极大。

我们军队、地方和中央机关，都要以毛主席的批示为纲，利用当前极好时机，开展一场反对骄傲自满，提倡谦虚谨慎的自我教育运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读几本书，密切联系实际，开门整风，学习济南军区报告的三破三立，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弄通思想，提高觉悟，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现将毛主席、林副主席批示和济南军区政治部的报告转发给你们，望认真学习。希望你们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批示中，适时地向中央写出这样的报告。

中共中央

中央军委

军委总政治部

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一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在华北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一、会议情况

这次华北会议是遵照毛主席、林副主席两次极为重要批示，从去年十二月二十二

日开始召开的。参加会议的共四百四十九位同志。遵照毛主席指示，一月九日起，中央军委座谈会的一百四十三位同志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学习了毛主席、林副主席最近批示的七个重要文件，听了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发言，进一步揭发批判了反党分子陈伯达的叛变罪行，揭发批判了李雪峰、郑维山等同志的严重错误。

二、对会议的估价

(一)会议通过对陈伯达的揭发批判，更加认清了他的反党罪行，进一步同他划清了界限。

根据现在揭发和调查的可靠材料，证明：

1、陈伯达的反动历史。

陈伯达出身于所谓“四代书香”门第的破落封建官僚家庭。他先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充当过国民党军阀张贞的少校秘书，后钻入共产党，留学苏联，有托派重大嫌疑。他回国不久，即被捕叛变，后为刘少奇恢复他党的关系，一直埋藏在党内三十四年。

2、陈伯达追随王明、刘少奇，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他回国叛变后，宣传叛徒哲学，鼓吹“国防文学”和“国防哲学”，为王明的投降主义路线大造舆论。他反对毛主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理论和实践。他同刘少奇一道，在我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实现后，提出了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谬论。在毛主席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指引下，亿万群众掀起大跃进高潮时，他形“左”实右地否定价值法则，否定货币作用，主张农村人民公社实行所谓全民所有，为大刮“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制造了反马列主义的“理论”根据。他支持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他第一次庐山会议参与了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第二次庐山会议私自下山，不知干什么去了。

他积极帮助刘少奇整理和修改黑修养，在《红旗》重新发表。他竭力吹捧“桃园经验”，并提出要刘少奇管四清和农业，帮助刘少奇篡夺权力。

3、陈伯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党乱军，阴谋篡权。

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大派工作组，忠实执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他在中央文革名为组长，实则反对中央文革，背着中央文革搞坏事。他打着红旗反红旗，中央文革碰头会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各种措施，他常常或明或暗地进行破坏和反对。他是肖华、杨、余、傅、王、关、戚、“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黑后台，是反党乱军的罪魁祸首。他是支一派，压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支持武斗的指挥者。

他一贯反对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在一系列重大政策问题上同毛主席唱反调。他一贯反对林副主席的重要指示。他主编的《红旗》不登姚文元同志主稿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他奉彭真之命，私编《毛主席语录》，与林副主席主编的《毛主席语录》唱对台戏。他借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疯狂反对毛泽东思想，而对毛主席和中央肯定的“九大”政治报告草稿又诬蔑为伯恩斯坦主义的文件。他在编辑毛选《五卷试选》期间，对毛主席的文章肆意篡改。后来，又对康生同志奉林副主席(毛选编委主任)之命主编《毛选五卷》送审本进行怠工破坏，并组织了一个地下黑班子，私自整理毛主席的著作，与毛选编委会相对抗。

他背着中央搞了一个秘密班子，专门研究中央政治局历次的宪法修改稿，伺机向党进攻。他反对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指示，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最后，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搞突然袭击，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

4、陈伯达投靠王明、刘少奇，招降纳叛，搞独立王国。

他在组织上初期投靠过王明，后来长时期投靠刘少奇。他在延安要求离开张闻天到毛主席那里工作，又害怕得罪张，主席批评他是“脚踏两只船”。他随毛主席访苏，违背毛主席的嘱咐，私自离开代表团，进行个人活动。他对彭德怀、高岗、彭真、罗瑞卿、陆定一、陶铸、胡乔木、周扬、杨献珍等反党分子都很亲。他包庇大批坏人，招降纳叛。

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成了北京军区和华北地区的太上皇。他把自己领导的部门搞成独立王国，任何中央同志都不容过问。

(二)会议通过对李雪峰、郑维山等同志的揭发批判，对于毛主席提出的“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为何林副主席“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为何北京军区和河北省两次传达都是那样不集中开会，草率了事等问题，有了深刻的认识，从思想上初步肃清陈伯达的流毒。

会议开展了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开得很严肃，大家对李雪峰、郑维山等同志的揭发批判，基本上坚持摆事实，讲道理，既很尖锐，也很中肯。

(三)会议贯彻“批陈整风”的精神，使大家受到了一次生动、深刻的路线教育，提高了觉悟，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更好地团结起来了。我们相信，这次会议将对全党全军起重大作用。

三、李雪峰、郑维山同志的错误和中央的决定

(一)李雪峰、郑维山同志紧跟反党分子陈伯达，反对党的“九大”路线，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严重错误。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伯达在华北各地乱跑乱说，到处联络人，进行反党的舆论和组织准备。李雪峰、郑维山背着中央，同陈伯达勾结在一起，把他捧为太上皇，扩大他的影响。

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搞突然袭击，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李雪峰积极配合，郑维山表态支持。李雪峰有布置地抢先出简报，大造反党舆论，发出了向党进攻的檄文。李还煽动几位工农同志发言，指名攻击中央领导，同志，事后又推卸责任，嫁祸于人。陈伯达被揭发后，李还背着中央，为陈伯达打掩护。

九届二中全会后，李雪峰、郑维山违背中央指示，对陈伯达的反党问题不认真开会传达，不讨论，不揭发，不批判，仍然站在陈伯达一边。毛主席路过石家庄当面对李雪峰作了重要指示，李还是执迷不悟，存心抗拒，既不揭发陈伯达，也不交代自己的错误，更未向党的核心小组传达。

李雪峰、郑维山紧跟陈伯达在庐山搞反党活动，决不是偶然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就追随刘少奇、陈伯达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天津支持坏人(江枫、胡昭衡、王亢之、方纪、李树夫等)夺权，在保定地区先取缔“八一红卫兵”，捉了几百人，后撕毁大联合协议，支一军压一军，支一派压一派，搞明抢暗发枪支，使武斗升级，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严重损失，干扰和破坏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二)李雪峰、郑维山一贯地闹宗派、拉山头，搞独立王国，在组织上犯了严重错误。

李雪峰、郑维山追随陈伯达、杨成武，打击和陷害三十八军。李雪峰对中央不满，在刘少奇倒后，只听陈伯达的话，他在河北省把革委会的权力集中在他一个人手

里，排斥对自己有意见的人，甚至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同志。在杨成武被揭发批判之后，郑维山坚持错误，继续搞山头主义，排挤外来部队，任人唯亲。他还在北京军区大搞以他为首的反动的多中心论，以是否拥护他为标准划线、排队。他们都打击反对过自己的人，破坏了军队之间、军政之间、军民之间和上下之间的团结。

(三)李雪峰和郑维山，一个是家长制的“一言堂”，一个是军阀主义，作风严重不正，这是封建资产阶级思想的集中表现。

李雪峰把个人凌驾于党委之上，做官当老爷，唯我独尊，一个人说了算，动辄骂人训人。

郑维山飞扬跋扈，称王称霸，竟然下令开枪镇压群众，伸手向中央要开枪权、扫荡权。他对同级以家长自居，对下级蛮横霸道。

他们经常说假话，欺上瞒下。他们同陈伯达、杨成武串通一气，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编造假情况，诬告三十八军在保定支持保守组织。李雪峰、郑维山追随陈伯达点名摧垮保定的一派群众组织，却又向中央说“促进了两派的革命大联合”。

(四)李雪峰、郑维山的错误是有历史性的。

郑维山过去紧跟杨成武搞山头主义、独立王国，这次又紧跟反党分子陈伯达，站在错误路线一边。李雪峰过去紧跟刘、邓，同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坏人混在一起，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他紧跟刘、邓、陶。主席挽救了他。他不但不改，这次又跟着陈伯达跑了。他和陈伯达在思想上有共同性，有个人野心。李雪峰还在庐山会议上搞了准备翻案、算账的材料，这次会议上又派人回去销赃灭证，在背后捣鬼。他对有的同志的揭发批判很反感，甚至反咬一口。这种态度如不转变过来，那是很危险的。

(五)根据会议中李雪峰、郑维山的检查和大家的揭发批判以及表现出来的情绪，中央认为李、郑两同志继续留在北京军区和河北省担任原来的领导工作是有困难的，因此，中央决定：将李、郑两同志调离原职，继续进行检查学习，接受群众教育，待有成效后，再由中央另行分配工作。

我们希望李雪峰、郑维山同志与陈伯达彻底决裂，划清界限，向党交心，改正错误，真正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六)中央决定：李德生同志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同志任第一政委，纪登奎同志任第二政委；谢富治同志任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李德生同志任第二书记，纪登奎同志任第三书记。刘子厚同志任河北省革委会主任，郑三生同志任第一副主任兼河北省军区第一政委，曾美同志任第二政委；刘子厚同志任河北省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郑三生同志任第一副组长。尤太忠同志任内蒙前指司令员。

四、今后意见

这次华北会议结束后，在北京军区师以上的党委，在华北各省、市、地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要按照中央既定的部署，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进一步开展“批陈整风”，彻底肃清陈伯达的流毒，纠正李雪峰、郑维山同志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的影响。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我们提出以下意见和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要认真学习毛主席最近批示的七个重要文件和九届二中全会公报，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马列著作，掌握思想武器，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提高路线觉悟。

(二)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党的“九大”团结、胜利路线的指引下，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的重要指示，通过“批陈整风”，进一步加强全党全军的团结，加强军政、军民之间的团结，加强全体革命人民的团结。

(三)要通过“批陈整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好形势。华北地区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目前的形势也是很好的。北京军区各部队的广大指战员，紧跟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三支两军工作中是做出了贡献的。华北地区过去的许多重大问题，是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直接领导下解决的，不能否定党中央决定的问题。我们要进一步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其中包括正确对待群众组织的政策，进一步巩固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认真搞好斗、批、改。如果有人借“批陈整风”的机会重拉队伍，另立山头，破坏当前的革命大好形势，那是不允许的。

(四)要认真落实毛主席关于正确对待犯错误干部的政策。对于犯有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他们愿意改正，我们都要采取严肃、积极、热情的态度，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北京军区、河北省革委会和天津市革委会有些干部，过去受了陈伯达假马克思主义的欺骗和蒙蔽，跟着李雪峰，

郑维山说过错话，做过错事，只要他们能够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决裂，同李雪峰、郑维山同志的严重错误划清界限，应该仍然信任他们。

在这次斗争中坚持了正确路线的同志，要认真学习 and 贯彻执行中央[1971]3号文件，要谦虚谨慎，不要翘尾巴。

(五)各级党的组织要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原则，维护党的一元化的集体领导，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

(六)要坚决纠正某些干部居功自恃，骄傲自满，搞军阀主义、一言堂，讲假话，不走正道走邪道，搞对内的大国沙文主义等歪风邪气，使某些作风不正之处转入正规化，保持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作风。

贰、本节简论

华北会议于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召开，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四日结束。周恩来在华北会议上的作子总结讲话。

这次会议主要是为了揭发陈伯达在华北地区的活动。从周恩来的总结来看，这方面的新内容并不太多。

这次会议也是为了查清华北地区领导人李雪峰、郑维山与陈伯达之间的关系。从周恩来的总结来看，这方面的新内容也不太多。在政治倾向上，李雪峰、郑维山与陈伯达是非常接近的；在组织原则上，李雪峰、郑维山并没有明显的违反。

这次会议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清查庐山事件打开一个缺口。由于这次会议清查的几个主要对象——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都不是事件的核心人物，因此，对林彪集团的震动不大。

2009年8月31日初稿

2012年3月8日修改

第三章第五节 召开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一年二月初，在政治局会议上总理说：“下边一些地区和部队领导人的骄傲自满和对一派群众的歧视可能还有所滋长，这要不断提醒他们；而其他地方，特别是内蒙、山西、河北、天津的反复会大些，已要北京军区注意这一情况。”

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九日，毛泽东关于批陈整风运动重点在批陈的批语都同意。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前期，批陈不痛不痒，如李、郑主持时期那样。

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九日晚，军委办事组讨论毛主席批评他们根本不批陈的指示，黄永胜念了唐朝诗人章碣的诗：“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军委办事组根据毛主席批评军委座谈会不批陈的指示，紧急召开在京的各单位负责人开会，传达毛泽东的指示，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大会上作了检讨。

陈士渠说：庐山会议你黄永胜也在其中。

一九七一年二月间，中央政治局主持召开“拍板定案”的小型全国计划会议，在人大大会堂举行。会议由周总理主持。

总理在会上说：“在庐山会议时，林副主席指示，每年的全国经济计划会议在结束前，要各省市自治区第一把手到会共同对国民经济计划‘拍板定案’。今天的会议，就是照林副主席的指示办的。这是今晚第一个内容。今晚的会议，同时还要传达毛主席对批判陈伯达问题的指示，这是今晚会议的第二个内容。毛主席对军委办事组有批评的批示。我看现在请黄永胜同志先发言。”

黄永胜事先有准备，他代表军委办事组首先发言。他的发言是经过军委办事组讨论的。由于黄、吴、李、邱，尤其是黄对毛主席的批评，是口服心不服的。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要写好一个发言的稿子是有困难的。

在黄永胜发言之后，

张春桥发言说：“我今天上午去看了康老。当他知道了毛主席对军委办事组的批评后，表示非常关心。他要我为他带三句话到今晚会议上来。这三句话是：军委办事组不批判陈伯达，可以理解不可以原谅；陈伯达同军队究竟是什么关系一定要搞清楚；对军队往何处去不能等闲视之。”

张春桥接着说：“我认为军委办事组不批判陈伯达，不是一个认识问题，而是一个立场问题。为什么对陈伯达连批判一下都不行呢？毛主席对你的批评，我看就是向你们提出了希望。你们同陈伯达不一样，我是同意的。但希望你们自己不要硬往陈伯达那里钻。你们究竟是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要陈伯达那个政治骗子？这是你们必须抉择的问题。”

于会咏、刘庆棠、浩亮三人，由浩亮代表他们联合发言：“一、军队少数人把陈伯达当成国宝，不批评，我们表示愤怒；二、军队少数人，同陈伯达究竟是什么关系？你们在庐山搞的什么名堂？应当无保留地交代清楚；三、军队是保卫毛主席的，还是保卫陈伯达的？对这个问题，军队几个掌握大权的人一定要表明态度，否则我们是睡不着觉的。”

接着，列席会议的毛远新发言，他说：“军队几个人为什么不批判陈伯达，可能是不伤同类吧！现在来看庐山的问题就更清楚不过了。庐山没有被炸平，是陈伯达动手太早了，你们内部也协调不好。庐山问题的实质是未遂的政变。……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我们把刘、邓司令部打垮了。那么，出现另外一个司令部怎么办？我们的回答是：像对待刘、邓司令部一样的老办法！我劝你们不要令利智昏，毛主席的威望是高于一切的。”

再下来是列席会议的马天水的发言。

黄永胜即席做了很简短的发言。黄说：“今天的会议活像造反派的斗争会，连说话的语言都是造反派惯用的，就差戴高帽子，挂牌子了。现在，我要问的倒是：毛主席说的话算数还是你们说的算数？我是坚定不移的拥护毛主席的，有错误我

们会诚恳向毛主席检讨。所以任何人企图打着毛主席的牌子来吓唬人，对我都是无效的。”

最后，周总理说了几句话，他说：“毛主席原定对庐山会议问题处理的方针、政策都没有变，也不能有任何改变。我们的一切提法都要以毛主席的话，即最高指示为准。”

一九七一年二月间，军委办事组整风会议。

在会上以自我批评为主，也有批评。大家对吴法宪提了不少意见。对黄永胜主要批评他“对庐山问题，以局外人处之，领导和处理问题，很不得力。”对邱会作和李作鹏也有若干批评。

李德生说：对庐山的问题没有信心不对；对原中央文革的领导人，有不尊重的态度是不应该的。

黄永胜根据大家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主要讲了如下三个问题。

第一、我们同陈伯达的关系问题。陈伯达是什么问题，有待中央对他的结论，可以肯定我们同陈伯达没有反党、反毛主席的关系，但我们同陈伯达又有一些关系，即对一些人犯自由主义的关系。至于说我们同陈伯达的政治瓜葛，最主要的是拥护天才论，陈伯达是党内的理论家，我们对他有一定的迷信。

第二、我们同陈伯达不是怕不怕受牵连的问题，而是早就牵连进去了。虽然我们的交往并不多，但我们相互之间也有互相支持的地方。例如在庐山会议开始的当天晚上，陈、吴、李、邱一起就在吴的房子里，长时期谈论过张春桥的问题、中央文革的问题和上海的文化革命问题。开幕式散会后，叶群谈的“陆定一式人物”的问题，陈伯达也是在一起的。这些都是事实，我们是不能否认的。

第三，我们怎样同陈伯达划清界线的问题。我们同陈伯达划清界线的唯一方法，就是揭发陈伯达的问题和进行自我检讨。这两者是统一的。只有彻底的揭发，深刻的自我批评，界线才能划得清楚。

一九七一年二月间，周总理同军委办事组(包括李、刘)谈话。

总理首先说：“我看到永胜同志发言的记录稿，这是一篇很好的讲话。在这个记录稿的基础上，可以写一篇较好的检讨报告。你们应立即向毛主席写个报告。”

总理说：“毛主席对你们仍然是很关心的。我刚才就是从主席那里来。主席交代我说，军委办事组几个人的精神状态比较好了，这就很好。你告诉他们，要犯得起错误，要做得起检讨。有了这两条，你们还有什么顾虑？”

总理说：“你们的问题，当然不仅同陈伯达有关，同政治局其他人（指汪东兴）也有关。这就是问题的复杂性和处理的难度。”

总理接着说：“大家对自己的问题要心中有数，有信心。自我批评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毛主席最恨结伙整人。对你们整人是如此，别人整你们也是如此。不过现在关键的问题就是你们要有自我批评，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要没有这条，主席的心是放不下的。你们应当看到，主席对你们抓得很紧，你们应当从正确的方面来理解主席的精神。”

江青说：“毛主席的话，我早就向你们传达过，你们同陈伯达的关系，没有什么包袱可背的，放下包袱才能写好。毛主席了解你们。”她还说：“写检讨主要是注意思想性，那些罗罗嗦嗦的事，多一件少一件关系都不大。”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黄永胜召集吴、李、邱开了数次会议，从谈思想开始，到要自我批评和互相帮助都说到了。黄永胜说了不少话，但中心是说：“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和统一口径”三个统一。对三个统一的前两个，大家没有多少意见，对统一口径意见就不一致了。黄、吴、李、邱几个人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是庐山会议以来办事组第一次这样激烈的争论。

李作鹏说：“统一口径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黄永胜说：“只说自己，不涉及别人。”

李作鹏说：“不涉及别人，我同老邱就不需要写报告。我们的事是从你们正、副组长那里来的。”

吴法宪说：“过去，我同你说的事，也没有听你说过什么不同意的话。”

李作鹏说：“要是你都同我们说，也许不会有今天的事。宪法小组争论的问题，我在场你也没有同我说过一句话，就向各方报告了。难道你做得对吗？”

黄永胜说：“我说的不涉及别人的意思，你们会理解的。除了林总这个大局之外，其余的人无论怎么说都可以。”

邱会作说：“我同意黄总长的意见，我们一定要顾全林总这个大局。除此之外，自己负责。因为这是个人的检讨，个人可以尽情写自己要写的事。”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日，军委办事组向中央写了一个检讨报告。

同日，毛主席在这个检讨报告上批示：

“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

“为什么老是认识不足？三十八军的精神面貌与你们大不相同。原因何在？应当研究。”

“吴法宪、叶群过去写的检讨不够，要重新写一个。”

“要召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各大军区、军兵种负责人、中央、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参加，由黄、吴、叶、李、邱作检讨，让他们下台过关。并将此情况告诉林彪同志。”

与此同时，毛主席又强调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认真学好马列著作。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日下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康生、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开会。

毛泽东说：

第一是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的检讨，我看了，批了很好，可以过关了。

第二是吴法宪、叶群的检讨虽然写过多次，现在看来不够了，要再补写一个。

第三是吴法宪多次要求见我，我没有见，要见今天一起见。

第四周恩来带你们几个到北戴河，去向林彪同志汇报。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帮助军委办事组成员变被动为主动。

江青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对黄永胜等人的批评。

周恩来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说：在政治上犯路线方向错误，认识和觉悟总是要有一个过程的，甚至是痛苦的过程。

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及其他政治局委员作了检讨。

会上还通过了中央转发毛泽东十九日关于批陈整风指示的补充通知。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转发周恩来在华北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1971.02.25；中发[1971]6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发至县、团级。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发出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五日，毛主席对《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一文批示：

“看了一遍，觉得可用。只在十八页上去掉一个词，以便突出马列。十七页上已有了这个词，也就够了。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

一九七一年三月中、下旬，黄永胜、李作鹏和邱会作都分别向毛主席写了检讨报告。

邱会作的报告主要写了两个问题。一是和陈伯达的关系问题。我同陈伯达根本没有历史和工作关系，1967年夏天才同他面对面第一次谈话。我为什么能同他搞在一起呢？最主要是迷信他是“大理论家”，还有就是对张春桥不满有共同犯自由主义的关系，陈伯达是大骗子，他骗了我这样的人，我又把他搞的语录在小组上宣读，我既是上当者，又是受害者，还是害人者；二是和张春桥的关系问题。我同张春桥虽然没有争吵过，但不来往，不接近。陈伯达就把我当作他反对张春桥的同盟军了。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通过江青转告周恩来：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先商量一下，给黄永胜等人创造一次机会，让他们在一定范围内作检讨不要再失去机会了。

下午，周、康、江商定再召开一次中央批陈整风会议。并报告毛泽东。

毛泽东提出：此事应向林彪汇报。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黄永胜 3 月 21 日的书面检讨上作了如下批示：

“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三同志的检讨都看了，我认为写得都好。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的问题。只在黄的第二页上有一个注语，请各同志注意。”

黄永胜书面检讨的第二页上有段话“过去我对反党分子陈伯达这个人有迷信，被他所谓‘天才理论家’、文化大革命‘有功’、‘小小老百姓’等假象所迷惑。”

毛主席对这段话批注：“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一九三一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所以他反党乱军，挑动武斗，挑动军委办事组干部及华北、军区干部，都是由此而来。”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四日下午，毛泽东约周恩来谈黄永胜、李作胸、邱会作检讨问题。

周恩来约军委办事组成员开会，商量按毛泽东意见修改黄永胜等三人检讨问题。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周恩来派专人将黄、李、邱三人检讨送至北戴河林彪处，并准备赴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召开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事。

一九七一年三月三十日，毛主席对刘子厚在河北省“批陈整风”会议上的检查作了批示，指出：

“上了陈伯达贼船，年深日久，虽有庐山以来半年的时间，经过各种批判会议，到 3 月 19 日才讲出几句真话，真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庐山会议上的那种猖狂进攻的勇气，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毛主席还在刘的检查的最后一页批示：“这还只是申明。下文如何，要看行动。”

1971 年三月二十四日下午 3 时，毛主席在中南海住处和周总理、康生接见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

毛主席是在他的卧室接见他们六个人的，主席坐在沙发上，向进去的人微笑招手。进去的人都先向主席敬礼、握手，然后在两旁坐下。

毛主席说：“早就要请你们几位来谈谈，今天才实现。中国人有句话叫做：礼多人不怪，有礼不怕迟。”毛主席总是带着笑容说话的。正在谈话时，毛主席忽然想到：“为什么不叫汪东兴来呀？”一回儿，汪东兴来到了。

毛主席说：“中央准备召开一次会议。主要内容是讲批陈整风问题，你们之中的一些同志也发言做点自我批评，名义上讨论陈伯达的问题，实际上给你们做点自我批评创造条件。这样做好不好？”

黄永胜说：“我们完全拥护主席的决定。我们犯了错误，应该进行自我批评。”

毛主席说：“进行自我批评，我不反对。我反对的是对犯有错误的人采取不公平的办法，结伙整人，硬要把别人一棍子打死，我是坚决反对的。”

周总理说：“我们要发扬延安整风精神，用自我批评和批评的武器来解决问题。”

毛主席说：“延安整风精神很好，但现在是否还有效，就值得考虑了。”

周总理说：“这是毛主席创造的马列主义的精华，是永远有效的。”

毛主席说：“我们党快 50 年的历史了，但对待犯错误的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在我们的队伍内，作为犯错误的来源，无非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贪生怕死，贪污公款等，为个人利益犯错误；另一个是思想问题，为革命犯错误。除了为个人打算的错误以外，所有犯错误的人都是为革命而犯错误的。每个人犯的错误都有当时的具体环境，有对立面，只一面是不会犯错误的。

“我是赞成不怕犯错误的。一个人要工作就要不怕犯错误，怕这怕那还做什么工作？当年，我们上井冈山，黄永胜也是跟着上去的一个，就没有事先考虑错误与正确的问题，是逼上山的。如果事先去考虑会犯错误，还能上井冈山？”

“我是赞成犯得起错误的。每个人的经验都有正反两方面的。只有一面，不能成为经验。反面的经验，常常比正面的经验用处还大。当然，我也不是说，犯错误越多越好。但犯一点错，又能认识错误，也没有什么不好。其实改正错误，就是对客观事物的正确认识。

“刚才你们说，延安整风经验很好。但是，对犯错误的人没有正确看法，不是热心去团结他们，整风经验就没有什么用处。大家知道，我们讲的整风经验，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正确总结经验和与人为善。如果离开

了这样一个目的而不是总结经验和帮助犯错误的人认识、改正错误，还有什么整风精神？

“延安整风并非一帆风顺，是经过严肃斗争的。首先是领导人不能整人，其次是动员全党不能整人。我们没有整王明，是做了艰苦工作的。比如，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这场生动的党内斗争，今天在坐的多数人都在场吧。（周恩来插话：除了两三个人外，其余都参加了七大）对庐山几个犯错误的人，也是一样的。我们不要他们很简单，要他们退出中央委员会，退出政治局也不难，但这就不是党的政策了。党的政策的核心问题，是人民的利益问题。不要他们几个人，是违背人民利益的。”

“我们将要开的会，要开成像延安整风会议一样。只准做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准搞别的什么名堂。总之，是要实事求是，不准搞歪门邪道的东西。共产党应当是光明磊落的。”

周总理说：“主席今天的指示，也就是我们政治局领导开会的基本思想。谁要是离开主席的指示，去另搞别的什么东西，他就是我们的对立面了。”

康生说：“任何人想背离毛主席的指示，都是没有出路的。”

接着，毛主席手持报告，对着邱会作说：“这个报告（指邱的检讨报告）是你自己写的吗？”

“是我自己写的。”邱立即回答。

周总理接着说：“是他自己写的，他是可以写一些东西的。这次他的检讨报告就概括为三个问题，概括得很好。把陈伯达视为大骗子，自己是小骗子；自己是受骗者，又是害人者。文字不长但把问题比较生动地说清楚了。”

毛主席说：“是呀，此人的文化是背识字牌背出来的。他还很年青的时候，在长征的路上我们就熟悉了。”

周总理说：“我是在瑞金就同他熟悉的。在长征的路上，他是我们的青年小科长。”

毛主席说：“啊，不简单，报告写得不错，你的字也写得不错嘛。我死后你可以来这里当中央委员会主席！”

邱会作立即站起来大喊一声：“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大家也发出了笑声，全场的气氛很活跃。

毛主席说：“我提议，恩来同志带你们几个人(黄、吴、李、邱、纪、李、汪)到北戴河去一趟，去同林彪同志商量一下开会的问题。林彪同志这个人，想问题常常比我们想得都深刻，对开会的问题，先征求他的意见再做决定，是很必要的。”

毛主席的话音一落，汪东兴就说：“我就不去了吧？”

毛主席说：“你不是也沾了边吗？好，不去也可以。但自我批评还是有好处的。”

一九七一年三月三十、三十一日，周恩来偕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到北戴河向林彪汇报。

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和决定。

黄永胜汇报了战备工作情况。

李德生汇报了华北会议情况。

纪登奎汇报了国务院的工作情况。

周恩来谈了外交工作情况。

汇报完以后，林彪表示：完全拥护毛主席关于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意见。同意毛主席对黄、李、邱的批示。对三人检讨很高兴。并要求吴法宪、叶群重写一次局面检讨。他们是无心插柳柳成荫。还说绝没有想到陈伯达的问题那样严重，这次把陈揪出来，是很大的胜利。完全同意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把批陈引向深入。

林彪还为其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作了辩解和自我批评。

一九七一年四月三日，周恩来约江青、姚文元、汪东兴、纪登奎、李德生等人开会，讨论中央关于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通知事。

会后，为中共中央起草开会通知，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毛泽东批准后于五日发出。

一九七一年四月七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决定纪登奎、张才千参加军委办事组，为该组组员。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一日，毛泽东关于黄、吴、叶、李、邱的自我批评的批语
恩来同志：

吴法宪、叶群二同志重写过的自我批评，我已看过，可以了。请连同黄、李、邱三同志的自我批评，向政治局会议报告，作适当处理。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五日至二十九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央召开了批陈整风汇报会。

参加会的有中央、地方和部队的负责人共 99 人。其中包括陈毅、徐向前、聂荣臻、邓颖超超等人。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五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周恩来在讲话中回顾了自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开展批陈整风的过程，说明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人几次失掉自我教育的机会，在毛泽东一再督促下，才作出检讨。

会上，黄永胜、吴法宪作了检讨发言。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五日至十九日，批陈整风会议分几个大组进行讨论。

周恩来参加了东北组讨论。

到了会议中间，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编在东北组的王辉球和王秉璋揭发出吴法宪在庐山会议上同他们串联，要他们拥护林彪的讲话，并要他们攻击张春桥、姚文元。

这一下子，东北组哄起来了。陈锡联当即给吴打电话说：“这个情况，我已经向周恩来汇报了。”

吴跟他说：“当时我在庐山会议上同他们讲过。这不要紧，只要实事求是，让他们讲就是了，没有问题。”

紧接着，周恩来打来电话问吴，庐山上是否有这回事。吴说：“有这回事。我要他们拥护林副主席的讲话，要他们批评张春桥。不过，后来我又要他们不要讲了。”

周恩来说：“揭发出这样的事情，你不要紧张，还是和原来一样，没有什么变化。我要王辉球、王秉璋他们去向你说明情况。”吴说：“不用了”。

这个情况，黄永胜在当天晚上告诉了叶群，叶群又报告了林彪。不久，叶群给吴打来电话，要吴准备飞机，说林彪要回北京。林彪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回北京，一是让叶群参加会议，因为这个会也有她的检讨，不参加不好。二是林彪亲自回来坐镇，准备在必要的时候直接出面同江青、康生、张春桥对抗。

周恩来不愿意扩大事态，于是把王辉球、王秉璋揭发吴搞串联的这个事情压下去，没有再继续追查这件事。他为此还专门给吴打电话说：“这个情况，不再追究，发言只限于你们的检讨。”

第二天中午，林彪、叶群回到了北京。叶群直接来参加了会议，林彪一直在家里。由于事情已经被周恩来压了下去，看看没有什么情况，他也就一直没有到会。中央的意思，想让林彪在会议结束时讲几句话，作个检讨，因为整个庐山会议的事情都是由林彪讲话引起的。可林彪坚持不讲话，一直到会议结束都没有在会上露面。周恩来曾向吴说：“林副主席要是以讲话的形式检讨几句就好了。”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八日，汪东兴在批陈整风汇报会的华北组小组会议上又作了第三次检查。内容如下：

我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全会期间和全会以后，经过主席多次谈话，对我进行了严格的批评和亲切的教育，每次谈话对我的启发都很大，教育都很深。回京以后，又带着自己的问题，进一步学习了主席的光辉文献《我的一点意见》，学习了马、列和主席的几本著作。遵照主席“在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的指示，我同中央办公厅和警卫局、警卫团的同志们一起揭发批判了反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罪行。同时，也在会上检讨了自己的错误。由于主席的教育，政治局同志的帮助，使我进一步认清了陈伯达的反革命本质，进一步认识了自己错误的严重性，进一步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毛主席亲自领导和主持下，会议开得很顺利，气氛很好。但是，会议刚开了一天，陈伯达在他的反革命野心的驱使下，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以伪装的面目出现，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打着红旗反红旗，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妄图实现他反党夺权的罪恶目的。主席很快识破了陈伯达的反革命面目，适时地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这篇光辉文献，粉碎了陈伯达的反党阴谋，拨正了全会的航向。

在这次全会上，把陈伯达这个大坏蛋揪了出来，教育了全党。切结了同志，避免了分裂，消除了隐患。这是伟大导师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是我们党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主席《我的一点意见》，一针见血地击中了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陈伯达的要害，从理论上彻底揭穿了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揭穿了陈伯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反动本质，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对于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组织建设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我坚决拥护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和主席一系列的重要批示，坚决拥护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一切决定，坚决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在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没有发表以前，我没有识破他是一个大坏蛋，上了他的当。受了他的骗。当了他的炮手，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深感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党中央，对不起受误会的同志。辜负了毛主席对我的信任和教育，没有听毛主席的话，干扰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我内心极感沉痛。我的错误是：

(一)在华北组听了反革命分子陈伯达的煽动性发言，我没有考虑分析，没有调查核实材料，更不顾自己的身份，以极不慎重的态度，心情非常激动地说了一些不应该说的话，把不应该上纲上线的问题上了纲、上了线，使会议气氛紧张，不利团结，影响会议顺利地进行，当了反革命分子陈伯达的炮手。

(二)我听到反革命分子陈伯达煽动说，有人不要毛泽东思想，有人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高兴得手舞足蹈，我没有识破他的阴谋，凭着自己朴素的阶级感情。一听说有人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我就火冒三丈，被他煽动起来了，错误地提议在新宪法中恢复设国家主席一章。主席不当国家主席的问题，这是主席的意见，我是知道的。早在一九七〇年三月八日，主席要我从外地回京向政治局

的同志转达了主席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会议上，大家都拥护主席的意见。可是当我听到反革命分子陈伯达的煽动性的发言，就把主席的指示忘得一干二净。在这关键时刻，我没有冷静思考。没有坚持原则，没有考虑到主席日日夜夜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操劳。我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听毛主席的话，违反了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这是十分错误的，也是十分危险的。

(三)反革命分子陈伯达利用“第六号简报”来煽动、欺骗参加全会的同志，妄图分裂党，破坏“九大”“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路线。这期简报发出最早、最快，简报内容中陈伯达的很少。我的很多，事先又不给我看，这是一个阴谋，我上了当。被他利用了。

(四)反革命分子陈伯达利用听录音报告的机会，把关于论“天才”的语录交给我打印五份(当时我交代打印二十份，准备政治局同志要时，免得再打印)。这个语录打印后，放在我那里，没有使用，在陈伯达阴谋诡计被识破后这个语录已封存。现在看来，可能是要我发言时引用，结果未得逞。

我犯错误的主要原因：

(1)对反革命分子陈伯达的恶意造谣，没有调查核实，没有分析判断。对在哲学上的欺骗和诡辩，自己不懂，也没有向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请教，主席教导：“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方法来”而我违反了主席的这个教导，结果情况不明，决心很大，方法不对。犯了严重的主观主义的错误。思想上陷入极大的盲目性。主观主义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一种表现，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反映。毛主席指示：“这和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我过去对主观主义的危害性认识很不够，今后必须下决心“打倒主观主义”。

(2)过去没有“认真看书学习”，对马、列和毛主席的书读得很少，而且有些没有读懂。因此，思想和理论水平很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不高，警惕坏人破坏中央的团结不够，特别是遇到像陈伯达这样手段很阴险、很毒辣的阴谋家、野心家，我不仅没有识破他，反而受了他的蒙蔽，被他利用了。

(3)存在着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世界观没有改造好。

今后，我要很好地接受教训，带着问题认真地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克服骄傲自满，争取较快地改正错误。真正做到在大风大浪中不迷失方向。能识别真假马列主义。坚决紧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在毛泽东思想和“九大”路线的指引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汪东兴

1971年4月18日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九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各组召集人会议，根据毛泽东意见，决定延长讨论时间。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九日，林彪从北戴河回到北京。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日，周恩来致信林彪，送去有关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材料及毛泽东的批示。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二日，周恩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进展情况会议商定从二十四日起，各组进入批陈整风、自我教育的经验交流阶段，并决定由周恩来、江青、张春桥、黄永胜、姚文元、纪登奎六人起草会议结束时的讲话大纲。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李德生报告上的批语

这样就好。事关大局，出以公心，不应当避嫌。我历来认为，同志之间有隔阂，有问题，应当耐心商量，多做谈心工作，不宜急躁，也不应久拖不决。工作不顺利，有中央帮助，总会解决。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周恩来参加华东、华北、中南、西南、西北和东北六个组的讨论。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将批陈整风汇报会会议情况报告送呈毛泽东、林彪。会议希望主席、林副主席能见大家一次，如能给大家讲几句话更好。不过大家又说，不能因此要求，干扰主席、林副主席出席五一纪念在天安门观看焰火。毛泽东批示：我这几天不出门。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关于把批陈整风运动推向纵深发展的通知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出席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全体大会。受中央政治局委托，在会上作总结讲话，共四个部分：

（一）会议的过程和评价；

（二）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陈伯达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

（三）军委办事组五位同志所犯的 error，是方向路线错误；

（四）今后办法。说：在庐山会议及其前后，军委办事组五位同志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但错误的性质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同反共分子陈伯达问题的性质根本不同。他们之所以犯这样严重的错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不听毛主席的话，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错误的政治路线，必然带来错误的组织路线，带来不正之风，最终站到反九大的陈伯达分裂路线上。经过会上同志们的善意批评和帮助，并有个别揭发，五位同志对所犯错误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表示愿意通过实践和学习，改造自己。讲话强调：对犯错误的同志，只要真正愿意改正，我们就要采取欢迎帮助的态度。我们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会上，还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把批陈整风运动推向纵深发展的通知》。

一九七一年五月一日，中央领导人出席首都人民欢庆五一劳动节焰火晚会。

在天安门上，周恩来向毛泽东引见病后初愈的陈毅。

林彪在到场数分钟后不辞而别。

一九七一年五月十日，中共中央转发陈锡联同志在沈阳军区党委扩大会议和辽宁省县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一、在同反党分子陈伯达的斗争中，我们应该吸取的教训

- 1、要认清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 2、要深刻认识路线问题的重要，提高执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 3、要坚决纠正不正之风，使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
- 4、要坚持斗私批修，克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 5、要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党的一元化领导，增强党的团结。
- 6、要认真看书学习，提高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

二、关于继续深入开展批陈整风运动的问题

- 1、我们军队的同志，要特别注意反复学习、深刻领会毛主席关于“军队要谨慎”的重要指示，认真搞好整风。
- 2、我们辽宁省的同志，要深刻领会毛主席对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所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把批陈整风搞好。

一九七一年五月十二日，中共中央转发周兴同志的发言

- (一) 关于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的一些情况
- (二) 关于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
- (三) 关于陈伯达的反革命罪行
- (四) 关于学习问题

一九七一年六月十五日，林彪又去了北戴河。

贰、本节简论

华北会议以后，毛泽东对军委座谈会提出批评。

黄、吴、李、邱勉强作了一个检讨。

毛泽东仍然表示欢迎，并提出为他们创造一个机会，让他们公开作出检讨，结束这一桩公案。并以此推动林彪公开作出表态。

为此，政治局决定召开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并决定派周恩来等人去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实际上是要林彪参加会议。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五日，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开幕，黄永胜、吴法宪作了检讨发言。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八日，汪东兴在批陈整风汇报会的华北组小组会议上作了第三次检查。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九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各组召集人会议，根据毛泽东意见，决定延长讨论时间。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九日，林彪从北戴河回到北京。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日，周恩来致信林彪，送去有关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材料及毛泽东的批示。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将批陈整风汇报会会议情况报告送呈毛泽东、林彪。会议希望主席、林副主席能见大家一次，如能给大家讲几句话更好。不过大家又说，不能因此要求，干扰主席、林副主席出席五一纪念在天安门观看焰火。毛泽东批示：我这几天不出门。

林彪则不作任何表示。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在会上作总结讲话
强调指出：

在庐山会议及其前后，军委办事组五位同志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

但错误的性质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同反共分子陈伯达问题的性质根本不同。

五位同志对所犯错误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表示愿意通过实践和学习，改造自己。

对犯错误的同志，只要真正愿意改正，我们就要采取欢迎帮助的态度。

从这个讲话可以看出，中央打算对九届二中全会上发生的突然袭击事件，就此划上一个句号。

一九七一年五月一日，中央领导人出席首都人民欢庆五一劳动节焰火晚会。

林彪在到场数分钟后离去

一九七一年六月十五日，林彪又去了北戴河。
看来，林彪并没有就此善罢甘休。

2009 年 9 月 7 日初稿

2012 年 3 月 8 日修改

第四章 林彪集团的反革命政变政活动

第一节 制定反革命计划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〇年八月，在空军系统“三代会”上，刘锦平作为会议秘书长，与吴法宪等人密谋策划，反复播放林立果“讲用报告”的录音，并发表讲话，吹捧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是“向全空军放了一颗政治卫星”，“是对空军的重要指示”，“反映了我们时代的光辉”，“体现了他的天才和超群的智慧”，林立果“高瞻远瞩”，“思想很成熟”，“成就惊人”，等等。鼓动各个代表团讨论表态，开展向林立果学习的活动，掀起了吹捧林立果的狂热。

与此同时，刘锦平指使张国民、董崎等人，在民航驻京单位多次播放林立果“讲用报告”的录音，把空军几个卖力吹捧林立果的人拉到民航大吹特吹林立果的“天才”“事迹”，策动总局指挥部、政治部、后勤部机关党委分别作出向林立果学习的决定，提出“认识（林立果的）天才，拥护天才，学习天才，保卫天才”，要求大家“恭恭敬敬地向立果同志学习，老实地听从立果同志的指挥”。刘锦平、米家农等还要机关、部队抄写和印发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提出“要带着感情抄，抄出感情来”。

一九七〇年九月二日，刘锦平和张国民等人，召开“党委联席会”。

会上，刘锦平吹捧林立果“是个伟大的天才”，说什么“林立果这个天才的成长是符合领袖发展事实的”，“发现林立果这样好的接班人，是我们党兴旺的标志”，“是推动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进程的伟大力量”，他的“讲用报告”“阐明了当代世界上的重大问题，是理论和实践完全统一”等等。要求在民航掀起“学习，研究、运用”林立果的报告的“高潮”，并要求向总局政治部写出学习情况的报告。

这次会议之后，他们大肆油印了会议的发言，把吹捧林立果的风刮到了全民航。他们广泛散发林立果的报告，并规定为“路线教育”的“必读文件”和政治学习的重要内容。他们说林立果是“我们党和国家天才的第三代接班人”，他那个所

谓“讲用报告”是“第四个里程碑”。米家农等人还把林立果在广州管理局用过的杯子、椅子等物都标明“×年×月林副部长用过”的字样保存起来，准备“将来”作为“历史文物”送进博物馆。他们还说林立果“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天才的领袖”，“对林副部长的评价再高也不过份”，“等林副部长当了主席，才够我们吹哩！”

一九七〇年九月十五日，林立果、周宇驰一伙窜驻广州白云机场宾馆后，刘锦平立即派程兆贤将亲笔信送给林立果，又给米家农、王斌打电话，要米、王“亲自负责”，为林立果“开展工作提供方便”，要“当成政治任务”，要向林立果“请示报告工作”，私自将广州管理局的领导权交给了林立果。林立果对米家农等人说：“广州管理局是我的家”，“要把我们管理局和各省（区）局建设成路线斗争的坚强堡垒和坚强根据地”。

一九七〇年九月至一九七一年九月，管理局党委常委会开会四十六次，其中有三十四次是研究贯彻林立果的指示。林立果、米家农一伙还把各省（区）局、飞行大队的主要领导干部召到广州，由林立果多次“接见”，给他们封官许愿，灌输反革命思想。米家农、王斌带着他们逐个向林立果表态：“永远听从林副部长指挥和调动”，“为捍卫林副部长站岗、放哨”，“打头阵”，“不会当叛徒”，“紧跟副部长干革命干到底”。林立果、刘锦平、王维国、江腾蛟、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李伟信、王飞、关光烈、陈玺等人经常出没于广州，奔走于河南、湖北、湖南、广西等地。他们“要人有人，要物有物”，免费乘坐飞机，为所欲为，并自称河南省局是“解放区”，湖北省局是“春来茶馆”，广州管理局是“红色根据地”。

林立果前后四次窜入广州，在白云机场宾馆共住了一百二十一天。林立果一伙一到广州，米家农按刘锦平的旨意立即封闭机场的宾馆，指派“对副部长感情最深的人”白天黑夜地站岗放哨，专门侍候。在其黑据点里，藏有大量黑书、黑文件，以及武器、弹药和各种特务工具。林立果一伙神出鬼没，召开黑会，策划反革命阴谋。刘锦平、米家农等大肆挥霍国家钱财，极力为林立果一伙的反革命活动提供经费和物资，米、王提出：“林立果想吃什么买什么，什么有营养吃什么”。

林立果一人的伙食费平均每天三、四十元。广州市的鲍鱼罐头没有了，米家农、王斌就要机组到北京买，并打电话或派人到外地买鸡、鸽子、鲜虾，以及沙田柚子、衡阳蜜桔、河南西瓜、成都水蜜桃等等。刘锦平、米家农等人为林立果买了一辆伏尔加小汽车，还改装了一辆小救护车，安上收发报机，专供林立果搞特务活动用。在白云山新建了一幢专供林立果搞特务活动和吃喝玩乐的秘密据点；又从广州市把过去陶铸在白云山上的别墅要来，加以扩建，准备供林彪、林立果一伙使用。林立果一伙在广州搞反革命活动期间，挥霍的国家经费仅广州管理局有据可查的就达二十八万七千多元。

林立果对刘锦平一伙说：“民航要在白云机场放一个伊尔十八飞行中队”，“在白云山打洞库，藏几架大飞机”，“中央一旦有事就方便了”。刘锦平心领神会，亲自到白云山察看了地形，收集了挖洞库的有关资料送给林立果，并提出要在一九七一年内完成广州大型机中队的组建。

一九七〇年十月，叶群对吴法宪说：“立果这孩子要想在空军干下去，就得好好学习点业务，从技术上去发展，这次他在庐山上看到一些情况，就再也不愿意从事政治了。他愿意到广空的飞行部队去蹲点，搞一点调查研究，研究一下飞行部分的训练和有关安全的问题。”

吴法宪问：为什么在到广州去？广州那么远，不好照顾怎么办？

叶群说：是他自己要去的。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至一九七一年春，刘锦平纠合张国民等在总局机关和广州、上海、北京管理局的领导层中发展“骨干成员”。林彪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出笼和所谓“三国四方”会议召开之后，林立果、江腾蛟先后和刘锦平进行了密谈。刘锦平一伙便加紧发展“左派队伍”，计划对每个飞行大队、省（区）局、重要航站的两个一把手，起码拉过去一个，起“种子”作用。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一日和一九七一年一月廿一日，刘锦平两次召开民航部分管理局领导干部参加的所谓“路线教育座谈会”。刘锦平亲自抓点，精心炮制了“试

点方案”、“试点经验”和“讲话提纲”，送林立果、周宇驰审定后，作为基层“路线教育”的“样板”和“教材”。

刘锦平一伙打着“路线教育”的幌子，歪曲党的历史，大肆吹捧林彪“一贯正确”，“一贯高举”，“一贯紧跟”，散布“林副主席和毛主席是分不开的”，“若没有林副主席的捍卫，也就没有中国的历史”，“也就没有我们的一切”。还胡说什么：“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归根到底是跟谁走，听谁的话，拥护谁作领袖的问题”，“任何时候都要保证跟林副主席走”，等等。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华北会议召开。

一九七一年初，在空军党委四届四次全会期间，吴法宪、王飞扣压空司航行局和北京军区空军揭发陈伯达利用专机在华北地区进行反革命活动罪行的材料。

一九七一年春节，王飞专门把周宇驰、刘世英等人及其家属找到家里吃熊掌。王飞说：“要不是林副主席一家，我们（指几个男的）这几个人早就被打成反革命了，你们（指几个女的）这些人也都成了反革命家属了。”

周宇驰也说：“我们要感谢林副主席一家。”

共同表达要继续为林家卖命的反革命“决心”。

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在华北会议上作总结讲话

一九七一年二月八日，周宇驰在小“联合舰队”布置收集情报。

舰队会议。

周（宇驰）：

一、讲报情况、掌握情况的问题：

1. 情报的重要性
2. 重要情况与非重要情报上边与下边比，上边重要
3. 死情况与和（活）情况，要活情况重要
4. 等情况与主动搜集情况不满足于等情况，应主动挖掘新情况

5. 每个人每个时期都连续不断地掌握一两个问题

二、报情况：

简明、扼要，一语道破

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二日，林彪携叶群、林立果到苏州。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日，林立果从苏州去上海。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林立果又从上海到杭州。

在杭州，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与陈励耘进行了十多次密谈，研究反革命政变计划。

一九七一年三月初，林彪对林立果说：“南唐李后主有两句诗：‘几曾识干戈’，‘垂泪对宫娥’他就是因为不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所以才亡了国。这是前车之鉴，我们不能束手待毙。”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八日，林立果和于新野从杭州到上海。

当天晚上，林立果在他卧室里对于新野和李伟信说：“根据目前形势，要设想一个政变计划。”他要立即把周宇驰从北京叫来商量，同时叫于新野暂不回北京，主要处理这件事。林立果接着说：“刚才已经把我们在杭州研究的情况，给‘子爵号’说了一下，她说在上海要隐蔽、安全。”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九日，林立果在上海约见江腾蛟。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日，林立果召集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研究制定政变计划。林立果说：“这件事与首长（指林彪）谈过，首长叫先搞个计划。”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开始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三人商量，后来叫李伟信也去了。

林立果说：“目前从各地区实力来看，首长(指林彪)讲话，还是有一定作用，这件事与首长(林彪)谈过，首长(林彪)叫先搞个计划。”

这次主要谈了这样几个问题：

(一)研究了形势。

主要谈了三方面：

(1)在全国范围内，“首长”的权力势力，目前是占绝对优势，是一边倒的，是最好的时机，但是可能逐渐削弱。

(2)张春桥(他们指所谓文人力量)正在发展。因为九大以后，全国局势基本稳定，在和平时期，文人方面工作和力量，势必要发展。

(3)从事物发展规律来说，好到一定程度，就要向相反方面转化，交叉发展规律，林立果说：“主席一贯是这样，一会儿用这边力量，一会儿用那边力量，用这样的办法玩弄平衡。目前的发展趋势是用张春桥。”

(二)研究了林彪的接班问题，说有三种情况：

1. “首长”和平过渡地接班。周宇驰说，五、六年就差不多了，甚至可能更短。林立果说，五、六年还接不了班，即使五、六年，其中变化就很大，很难说“首长”的地位还一定能保得住。当然和平过渡的办法最好。

2. “首长”被人抢班(被赶下台)。周宇驰认为一下不可能，最起码三年以后。林立果认为，很难说，主席威信高，他要叫谁倒还不是一句话。于新野说：那“首长”是主席自己树起来的。林立果说：刘少奇不也是他立的。接着谈了上海文汇报三月十六日发表的文章。林立果认为，这篇文章是有来头的。既然有来头，就应该看成是信号，是舆论准备。

3. “首长”提前抢班，可有两个办法：

(1)把张春桥等这一伙搞掉，保持“首长”地位不变，再和平过渡(认为张春桥要代替林彪的可能最大)。

(2)直接陷害毛主席，但是他们又考虑主席影响、威信这样大，以后政治上不好收拾，尽可能不这样干。周宇驰说，当然一定这样做也可以想办法，如：把主席软禁起来谈判；也可以把主席害了，再嫁祸于人，把汪东兴、张春桥叫去，把他们搞掉，就说他们与王、关、戚有关系，谋害主席，或者搞几个犯人替死。到那

这个时候，反正“首长”掌权，事后处理，“首长”是可以出来说话的。但是这样干，“首长”在政治上要付出很大代价。

(三)研究了办法：

争取和平过渡，但是作好武装起义准备。目前先做两件事，(1)写个计划；(2)让空四军组建一教导队。

计划：一开始研究代号，想了很久，最后林立果自己定，就叫“571”工程计划，即武装起义的谐音。计划目的和内容，林立果说，让上海小组带着教导队先把张、姚干掉，可由王维国请张、姚来，或叫警卫处处长李松亭带领去张春桥家(林立果问李伟信，张家是否是你们警卫处管，李伟信说不知道。林立果叫李伟信打听一下，李伟信问警卫处处长李松亭，李说张家是我们管，我们派人警卫和送日常用品，李伟信将情况告诉了林立果。

林立果又说，干掉张、姚后，让王维国、陈励耘，必要时抽南京空军一部分力量，控制上海局势，然后串连全国力量，发表支持声明，逼中央表态支持。假如许世友出兵干涉，由王维国他们保卫上海，形成对峙的局面，再和平谈判。最坏的打算，是上山打游击，先往浙江方向。

林立果还说，这些问题，这次去杭州与陈励耘商量了一下。我看这个计划，就按在杭州商量的框框，由于新野写。

教导队：以培养基层干部为名，建立教导队。要精干、保密。一百人左右，住在上海新华一村。教导队的干部很重要，要选好。光靠教导队还不行，上海小组要去抓。小组里以龚善显、蒋国璋为主，小组每一至二人还要抓空四军所属的一个部队，每个人在他抓的那个部队，都要挂个职务。另外要给教导队多配些汽车和炮，增加机动能力。可以叫王维国自己造炮。军事上要多学几手，政治上培养对“首长”(林彪)、“副部长”(林立果)的感情。

林立果还说，“571”计划和教导队的事，目前只限“舰队”、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知道，有些情况可以告诉上海小组。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写出了反革命政变纲领。

他们认为：“和国外‘571工程’相比，我们的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和十月革命相比，我们比当时苏维埃力量也不算小。地理回

旋余地大。空军机动能力强。比较起来，空军搞‘571’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两种可能性：夺取全国政权，割据局面。”

一九七一年三月，于新野（空军党委办公室原副处长）搜集和摘录的关于政变和谋杀事例的草稿，共二十八例，一百二十六页。

抄正本已送林彪、叶群。

（这个草稿本是从周宇驰、于新野等外逃乘坐的直升飞机上缴获的。）

政变事例部份标题

△ 拿破仑的两次成功的政变

△ 林肯被一演员暗杀

“雾月十八日政变” 纳赛尔由住室上车时遭卫士枪击

△ 戊戌变法与八月政变

△ 本·贝拉险遭“舞蹈演员”暗杀

△ 奥国皇储被刺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导火线。

△ 哈桑在外出途中被人用冲锋枪袭击。

△ 罗马古国的英雄恺撒被刺死

一九七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林立果在上海召集江腾蛟、陈励云、王维国、周建平等人开会。

江腾蛟 [南京军区空军前政委]、王维国 [上海军区空军政委]、陈励耘 [七三五〇部队政治委员]、周建平 [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

林立果说：（庐山会议）这是一次未来斗争的总预演，双方阵营都亮了相。陈伯达是斗争中的英雄，吴法宪是狗熊。我方此次，上下好，中间脱节，三是没有一个好的参谋长，。这些老总，政治水平低，平时不学习，到时胸无成竹，没有一个通盘，指挥军事战役可以，指挥政治战役不可以。说明这一点，今后的政治斗争不能靠他们领导，真正的领导权要掌握在我们手里。

陈励云说：我压力很大，日子不好过。

林立果说：现在军队的日子都不过，黄总长他们日子也不过。

陈励云说：我无非讲了张春几句，现在跑不掉了。

林立果说：现在的斗争是争夺接班人的斗争。

陈励云说：现在主席还健在，江青、张春桥想这样搞也不敢。

林立果说：将来百年之后，就是江青、张春桥这些人来接班。

江腾蛟说：就是夺权也轮不到他们，还有林副主席呢。

林立果说：夺权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武装形式一种是和平形式。我们是采取和平形式。第一当前的主要工作是抓好部队；第二各个地方的情况不同，可以允许有不同的做法；第三团结。大家扯到这里了，周副司令就负责南京左派吧。王政委负责上海，陈政委就负责杭州吧，你们老政委在这儿，他来拉总协调，你们有什么事情可以多找老政委商量。

江腾蛟说：我只能当当参谋。

在林彪一伙的操纵下，建立了以林立果为头子的反革命别动队“联合舰队”，在上海、广州等地建立了“分舰队”和所谓“左派组织”。

林彪说：“林立果不但要指挥空军的小联合舰队，全军的大联合舰队也要归他指挥”。

林立果在会上宣布：上海由王维国负责，杭州由陈励耘负责，南京由周建平负责，三个地方的协调和拉总由江腾蛟负责。

这个黑会从晚上十点多钟一直开到次日晨六点多，整整开了一夜。林立果临走时对王、陈、周等招手说：“再见，祝胜利会师！”。

（对这次会议，程洪珍在日记上作了记载。江指江腾蛟，王指王维国，陈指陈励耘，周指周建平。）

会谈是成功的，达到预期效果。

团结的气氛比较好，介决了对当前东南形势的看法、认识。

(1) 主要矛盾在上海、在张、姚，统一了认识，

(2) 加速我们的准备

(3) 组织上明确了：

三点，每点的头都

上海——王

杭州——陈

南京——周

互相配合，江进行定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没授于指挥权

一九七一年三月，米家农在林立果的指使下，在广州组织‘战斗小分队’，要队员向林彪、林立果宣誓效忠，并制定了联络密语、暗号。

这个组织成立后，曾强迫队员集体向林彪、林立果多次宣誓效忠。规定的誓词说：“永远忠于林副主席”，“一切听从副部长的调动，一切听从副部长的指挥，我们要做副部长的宣传员、保卫员、通讯员、战斗员”，“我们要成为宣传副部长的先锋，捍卫副部长的尖刀，紧跟副部长的闯将”。

这个“战斗小分队”有自己的“队歌”，有多种联络密语和暗号。还规定了纪律：不准探亲，不准亲友来队，不准单独活动，不准恋爱结婚，不准单独谈话，谈话者必须三人以上，不准随便打电话，通信要经过审查，不准泄露“林副部长”的秘密活动，等等，违者要受到批判或处分。

一九七一年四月九日，上海教导队正式成立。

贰、本节简论

一、五七一工程的由来

林彪集团要搞武装政变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

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发动突然袭击，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但林彪并不承认错误。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泽东领导全党开展批陈整风运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思想路线教育。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至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四召开了华北会议，一九七一年四月召开了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

这两次会议，特别是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为林彪集团提供了承认错误的机会。但是，林彪拒绝出席会议，黄、吴、叶、李、邱虽然作了检讨，也只是为了蒙混过关。

有人说：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彪躲起来了、冻起来了，只是被动挨打，没有任何活动。这是在继续为林彪集团放烟幕弹，骗人而已。

实际情况是：

一九七〇年九月，林立果就开始以广州的空军、民航为据点，进行活动。

一九七〇年十月，叶群对吴法宪说：“立果这孩子要想在空军干下去，就得好好学习点业务，从技术上去发展，这次他在庐山上看到一些情况，就再也不愿意从事政治了。他愿意到广空的飞行部队去蹲点，搞一点调查研究，研究一下飞行部分的训练和有关安全的问题。”

这说明，林彪集团打算改变战术，从上层打破缺口改变为从下层打破缺口；从以空军司令部为据点改变为以广州或上海为据点。

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华北会议结束以后，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二日，林彪携叶群、林立果到苏州。在这里，他们开始酝酿一个打破危局的计划。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日，林立果从苏州去上海。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林立果又从上海到杭州。在杭州，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与陈励耘进行了十多次密谈，研究武装政变的可能性。

一九七一年三月初，林立果回到苏州，向林彪汇报了他在上海、杭州活动的情况。林彪肯定了武装政变的重要性，他对林立果说：“南唐李后主有两句诗：‘几曾识干戈’，‘垂泪对宫娥’他就是因为不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所以才亡了国。这是前车之鉴，我们不能束手待毙。”（摘自《周恩来年谱》下卷第 440 页）

有人认为：林彪的上述讲话还不足证明他知道林立果以后搞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没有直接的证据说明他看过这份纪要。

的确，现有的材料都是间接的：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八日，晚上，林立果在上海他卧室里对于新野和李伟信说：“根据目前形势，要设想一个政变计划。”“刚才已经把我们在杭州研究的情况，给‘子爵号’说了一下，她说在上海要隐蔽、安全。”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日，林立果召集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研究制定政变计划。林立果说：“这件事与首长（指林彪）谈过，首长叫先搞个计划。”

一九七一年七、八月，于新野在广州时对李伟信说：批陈整风汇报会时，林立果当时比较紧张，对会议估计三种可能：（1）一般谈一下，（2）整到军委办事组，（3）整到“首长”（林彪）。后来估计（1）、（2）可能大。在批陈整风汇报

会上，黄、吴、邱、李、叶都检讨了，而且是主席批准要他们检讨，“主任”（叶群）非常紧张，当时要搞“571”，并和黄永胜也商量了，黄永胜他们也同意。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于新野对李伟信说：林立果把计划及一本于新野最近摘录的关于武装起义的事例，都还留在北戴河“首长”（林彪）“主任”（叶群）那里。

现在的人可以声称他们对这些材料有怀疑、不相信。可是，当时的参与者确实是没有怀疑、非常相信的。否则，他们怎么可能跟随一个初出茅庐的林立果去干这种有杀头危险的勾当呢？

二、五七一工程的制定

根据《周恩来年谱》记载：一九七一年三月十八日——二十四日，林立果等在上海秘密制定反革命政变计划《“五七一工程”纪要》。随后，林立果又在上海召开秘密会议，进一步策划实施《纪要》的各种方案并确定了政变的指挥班子和具体分工。

根据林彪三月初关于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我们不能束手待毙的指示，一九七一年三月中旬，林立果又跑到杭州，与陈励耘密谋。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八日，林立果和于新野从杭州到上海。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九日，林立果在上海约见江腾蛟。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日，林立果召集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研究制定政变计划。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一日，林立果召集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继续研究制定政变计划。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写出了反革命政变纲领。

一九七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林立果在上海召集江腾蛟、陈励云、王维国、周建平等人开会。

一九七一年四月九日，上海教导队正式成立。

1，当时，林立果确实制定过这样一个“武装起义”的计划吗？

当时参与讨论、起草这个计划的人，一共是四个：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九一三以后，唯一留下来的活口，只有李伟信。计划起草的过程情况都是由他提供的。

他提供的这些情况可信吗？好在后来查获了一个记载了《“五七一工程”纪要》内容的笔记本。李伟信提供的计划内容与《纪要》的内容基本一致。

2，九一三事件后查获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是真的吗？

记载有《“五七一工程”纪要》的笔记本是由空军学院的一位老工人在九一三事件不久交出来的，如果说是造假的话，恐怕也没有这么快。

见过这个《纪要》的人不多，李伟信虽然参加过这个计划的讨论，他也没有看见过这个纪要。但是，从《“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内容来看，它与林彪集团实施的反革命阴谋活动是一致的。而参与实施反革命阴谋活动的人是很多的，从他们的供词来看，完全可以证实这个《“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存在。

3，林立果召开过一个所谓三国四方会议吗？

一九七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林立果在上海召集江腾蛟、陈励云、王维国、周建平等人在一起谈话。

对这次谈话的内容，程洪珍在日记上作了记载。参加谈话的人的供词与记载大体一致。

分歧在于：林立果等人把这次谈话叫做会议，甚至叫做“三国四方会议”。这是因为参加会议的四个人中，王维国代表上海，周建平代表南京，陈励耘代表杭州，而江腾蛟不代表任何地方部队，只负责协调三地的行动。而参加这次谈话的其他人，则不承认是参加会议，只是参加了一次谈话。

三、五七一工程的内容

五七一工程的内容包括九个方面：（一）可能性；（二）必要性；（三）基本条件；（四）时机；（五）力量；（六）口号和纲领；（七）实施要点；（八）政策和策略；（九）保密和纪律。

从这九个方面的内容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林彪集团的极右的政治立场、政治纲领、政治路线。

从理论基础、指导思想来看；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说什么“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从社会制度来看；他们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说什么“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公开提出：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代替 B52 的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即社会封建主义。

从国家制度来看：他们攻击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说什么“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

从党的性质来看：他们攻击中国共产党是什么“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

从党的领袖来看：他们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什么“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他们公开提出：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

从文化大革命来看：他们攻击什么“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

从社会生活来看：他们攻击什么“农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

从当前的形势来看，他们认为：共产党的领导正面临着巨大危机，“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众叛亲离：（1）一场政治危机正在酝酿，（2）夺权正在进行。（3）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4）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逐渐地和平演变式的政变。（5）这种政变形式是他们惯用手法（6）他们“故伎重演”。（7）政变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8）因此，我们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反之，如果我们不用“五七一”工程阻止和平演变，一旦他们得逞，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中国革命不知要推迟多少年。（9）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而林彪集团则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夺权好时机，“我方力量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在全国，只有我们这支力量正在崛起，蒸蒸日上，朝气蓬勃。革命的领导权落在谁的头上，未来政权就落在谁的头上，在中国未来这场政治革命中，我

们“舰队”采取什么态度？取得了革命领导权就取得了未来的政权。革命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们舰队头上。

从对外关系来看：他们攻击我党在国际上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说什么“中苏对立。整苏联。我们行动会得到苏联支持。”

从政治路线来看，他们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国富民穷”，而 they 要搞的政治路线是“民富国强”。他们公开提出“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

总之，林彪集团的政治纲领、政治路线，就是污蔑、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封建主义，然后打着反对封建主义的幌子，搞资本主义——民富国强。

2009 年 9 月 14 日初稿

2012 年 4 月 4 日修改

第四章第二节 实施反革命政变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一年四月，林立果指使王维国，在上海成立了为反革命武装政变服务的‘教导队’，进行捕俘、格斗、使用各种轻型武器、驾驶车辆等特种训练。”这个教导队规定在政治上，要培养对林彪、林立果的“感情”，欺骗和蒙蔽战士要“自觉”做到在林立果的指挥下，“誓死捍卫”林彪和林立果，“狂风恶浪不动摇，海枯石烂不变心”。在军事上，进行“步兵动作、打靶、刺杀、捕俘、格斗”等训练，并配备了最好的武器。一九七一年四月五日，刘锦平“接见”来京搞地下串连的空四军、空五军×××、×××时，对上海市委和南京军区的主要领导同志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诬蔑上海市委“压空四军”，谩骂南京军区“在空军头上拉屎拉尿”，煽动“四、五军要沉住气，不要怕”，“骨头压断也要顶住”，“这个账总有一天会清算的”，“你们将来也会和三十八军一样揪出陈伯达式的人物，甚至比陈伯达还重要的人物”。刘的谈话被连夜整理成记录稿，在所谓“左派骨干”中广为传播。一九七一年四月，江腾蛟在上海密谋开完“三国四方会议”回到北京后，与刘锦平进行了密谈，刘锦平等入便到处造谣惑众，煽动说：现在是“四方面军的压一方面军的”，“笔杆子压枪杆子”，“要警惕秀才造反”。刘锦平亲自向十四航校谢立岑（原政委）等人说：“党内将有一场大的斗争，思想上要有一个准备”，“我们是拿枪杆子的，要以枪杆子来保卫林副主席”等等。一九七一年四月，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林彪、林立果一伙十分恐慌，他们千方百计刺探和窃取会议的情况。林立果对会议作了三种估计：“（1）一般谈一下，（2）整到军委办事组，（3）整到首长（指林彪）。”一九七一年三、四月份，民航总局党委召开五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刘锦平对张国民、董崎、赵庆生、陈庆军、程兆贤等人说：“这次省局、大队以上的主要领导干部都来了，要抓住这个机会进行工作”，“重点应放在北京、广州、上海三个管理局。重点做好飞行部队的工作，掌握几个机组，在关键的时候，能为无产阶级司令部服务，能过得硬。一总队的工作要好好地做”。根据这个黑旨意，他们一伙有组织有计划地向部分团以上干部进行了所谓的“路线交底”，并在五、六月份举办的“批陈整风”学习班上也进行了同样的活动，使大部分管理局和一些省（区）局、航校、飞

行大队的领导干部中都有了他们的“骨干”，并由他们回各单位继续发展。刘锦平一伙发展“左派队伍”的主要手段之一是通过个别谈话，制造谣言，欺骗同志，进行所谓“路线交底”。他们首先散布“当前路线斗争复杂”，“任何事情都有两条路线斗争，任何单位都有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代表”，“要提高路线斗争觉悟，不要走错门，跟错人”等等，以此制造思想混乱。然后向谈话对象不同程度地交所谓民航、空军和全党两条路线斗争的“底”，把林彪、林立果、刘锦平等人分别打扮成全党、空军和民航的“正确路线代表”，欺骗一些人跟着他们走。另一个主要手段是用提职提级、请客送礼、介绍对象等方法网罗党羽，收买干部，培植亲信。刘锦平把紧跟他的一批老同事、老部下拉进民航，安插在重要岗位上。还从空军选来一些“路线斗争骨干”。刘锦平对紧跟他的人十分器重，如刘的前两任秘书赵庆生、陈庆军，家庭和社会关系很复杂，作事阴险，是刘的“老紧跟”，刘锦平便视为心腹，对他们的职务一提再提，还准备把赵庆生提为总局指挥部副参谋长。有的“左派骨干”原来是一般干部，只因对林彪、刘锦平跟得紧，都被破格提拔到总局机关处、局领导岗位。反之，对不跟他们一伙走的，则进行排挤打击，叫嚷要“咬紧牙关，三年换完”。通过以上种种手段，刘锦平一伙很快在民航建立了一个为林彪反革命政变服务的“左派队伍”。刘锦平派人把民航团以上干部中的“左派骨干”名单送给林立果，林立果看了得意地说：“民航的‘左派’骨干力量按比例比空军还要强，今后要考虑支援空军一些！”一九七一年四月，王维国派亲信到北京要轻武器。这个人郑兴和说：“斗争形势愈来愈复杂，这方面（指武器装备）又是我们的薄弱环节，所以要做这方面的准备。”四月十二日，在王飞的指使下，郑兴和从已经批准发给兰空和昆指等单位的轻武器计划中，扣下一千支发给了空四军。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三日晚，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等召开会议，讨论了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的形势，讨论了“根据斗争形势，准备加快、提前”实行“571”林立果在死党内部宣布，将这次行动的具体指挥权交给王维国，到时候“四、五军的部队向上海靠拢，接管上海市”，林彪“就宣布接班，全国实行军事管制”。“如不能到北京就准备去广州，以西南山区为依托，以广州为根据地，进行北伐，重新打出一个统一的局面，最少打出个长江为界来”。周、刘、于（注：指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形势：◎会议

15 日夜开（注：指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周讲了目的（注：指周总理四月十五日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批陈整风，达到团结胜利编组和庐山一样。——算旧帐姿态。黄、吴、李、邱、叶会前写了书面检讨。△上海王洪文、徐景贤冲锋陷阵除攻打军委办事组外，把王维国、陈励耘点名了。◎根据斗争形势，准备加快、提前。保密。——微冲图纸（注：指微型冲锋枪的图纸）——枪不搞仪式防止出内奸、叛徒。一九七一年四月底，经刘锦平安排，刘沛丰、于新野在北京与成都管理局原政委郑剑和十四航校的原政委谢立岑等人见面，策划了林立果到西南建立反革命据点的准备工作。刘锦平、张国民也亲自找谢立岑等人布置，要他们储备粮食、油、盐、干菜，准备应付“路线斗争最复杂最困难”“甚至打内战”的局面。指使他们“一是作舆论准备”，“二是力量准备”，“部队要掌握在你们手里”，“一旦路线斗争激化，打起仗来就可以调动”。根据刘锦平、张国民的黑指示，谢立岑等人进行了具体策划，制定了所谓“防暴乱”的三套行动预案，组织了六次所谓“值班分队演习”。五月中旬，于新野、刘沛丰到成都管理局、十四航校进行反革命游说。七、八月份，刘锦平到西南地区进行反革命游说时，对空军成都指挥所原政委丁钊说：“打起仗来首长（指林彪）要到这里来”。刘到十四航校检查了他们的准备情况，再次对谢立岑说：“尽可能储备些余粮”，“分裂时准备上山打游击。”刘到成都管理局为林立果在西南建立反革命黑据点选定了地点，策划了成都管理局领导班子的改组方案。一九七一年五月份起，周宇驰开始秘密学习驾驶直升飞机。七月，周宇驰以练习直升飞机的飞行作掩护，先后飞到南昌、庐山、广州、郑州等地，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八月至九月初，周宇驰从北京多次飞往北戴河，给林彪、叶群递送情报，密谋发动政变。在北戴河据点，秘密建立了一个直升飞机机场。他们还私调和仿造水陆两用汽车，在北戴河海面进行驾驶训练。一九七一年五月中旬，刘锦平到洛阳××军找该军的军、师干部谈了话。在同关光烈等人密谈时说：“有人反对林副主席”，“中央发下黄、吴、叶、李、邱的检讨材料，不要急于表态，要看一看。”刘还了解了该军实力情况，索取了该军的干部名单。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一日，林立果“接见”广州管理局原“宣传队”，即“战斗小分队”。广州管理局原“宣传队”，即“战斗小分队”，是在林立果、周宇驰这种反动思想指导下，通过刘锦平、米家农秘

密建立的一个反革命特务组织。这个“战斗小分队”，在林立果的直接控制下，对其成员进行法西斯奴化教育和各种特务训练。刘锦平、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等人都亲自对“战斗小分队”训过话，说“小分队要出干部，培养种子”，“一批一批地培养，一批一批地出去”。他们强迫队员白天黑夜“读、抄、背、讲”林立果的黑报告，说什么“要加深对林副部长的感情”，“感情是根本，……有了对林副部长的感情，一切都有了”。为了培养“感情”，米家农的老婆吕国贤（“小分队”指导员）故意不开电扇，亲自给林立果扇扇子，被树立为“对副部长感情最深”的“学习榜样”。林立果同吕国贤握了手，她竟恬不知耻地大叫她的手是“幸福的手”，逢人便握手，说是“分享幸福”。他们还多次强迫队员集体向林彪、林立果宣誓效忠，要队员“永远忠于林副主席”，“一切服从林副部长，一切为着林副部长，一切想着林副部长，一切紧跟林副部长”，“做林副部长的宣传员、保卫员、通信员、战斗员”，“成为宣传副部长的先锋，捍卫副部长的尖刀，紧跟副部长的闯将”。这个“战斗小分队”有自己的反动“队歌”，有多种联络密语和暗号。他们给队员规定了十分森严的法西斯纪律：不准探亲，不准亲友来队，不准单独活动，不准恋爱结婚，不准单独谈话，不准随便打电话，不准泄露“林副部长”的秘密活动，等等，甚至女队员剪头发也要经过吕国贤批准，违者要受到批判或处分。刘锦平、米家农搞的“党（团）员标准”是：承认林立果是“天才”，“是党的优秀接班人”；“对林副部长有深厚的感情”；“紧跟林副部长”。胡说这些东西“是入党（团）志愿书的新内容”。他们对“战斗小分队”发展的第一批党（团）员说：“是副部长给了你们第二次政治生命”，要求他们“做副部长的好党员、好团员”。并说什么“在我们‘战斗小分队’里入党入团，意义深远，……副部长当了领袖，……我们小分队里还会出中央委员哩！”“战斗小分队”打着排演样板戏的幌子，把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的报幕词全部篡改成他们的反革命语言，如第一场“常青指路，奔向红区”被改为：“副部长指引着奔向路线斗争的战场”，等等。他们公开说：“我们不是为了演戏而演戏，而是用演戏来掩盖我们的政治斗争”。在林立果、刘锦平的指使下，这个“战斗小分队”由吕国贤带着，于一九七一年八、九月份窜到南阳、郑州、洛阳、武汉、沙市等地，进行所谓“传思想、传感情、传革命精神”的反革命串连活动，配

合林彪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大造反革命舆论。林彪、林立果自取灭亡后，米家农一伙还组织队员排演了最后一场剧，宣读了林立果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一日“接见”“战斗小分队”时的黑指示，高呼“打倒路线斗争中的敌人”等反动口号，并在队员笔记本上作反动题词：“不当叛徒”，“宁死不屈”，妄图要队员做林彪、林立果的殉葬品。一九七一年五月下旬，刘锦平到武汉与王维国密谈，然后到广州和林立果密谈，并亲自将××军的干部名单交给林立果。林立果对刘锦平说，民航“搞得不错，广州搞得更好，超过了四军、五军，要向民航学习。”一九七一年六月，刘锦平在上海、杭州召见了空四军、空五军和民航上海管理局部分团以上“左派骨干”，并作了“讲话”说：几十年来的路线斗争，都是“解决中央常委中的问题”，“批陈没结束，新的斗争苗头已经看的很明显，矛头对着林副主席”，“当前的斗争就是保卫接班人的斗争”，“是承认林副主席，还是另外选一个什么人”，“要警惕、防止另外的人抢班”，“思想上、组织上要做准备，迎接新的斗争”。批陈没结束，新的斗争苗头已经看到很明显，有那么几个人做文章，矛头对着林副主席，一时很嚣张。新的条件下，X（注：指两条路线斗争）越来越成为阶级斗争的新形势，X（注：指两条路线斗争）越来越敏感、明显、复杂，焦点就是接毛主席的班。是承认林副主席，还是另外选一个什么人。历史证明，没有那一个能与林副主席相比，不能有另外的接班人，要警惕，防止另外的人抢班。写上了是一回事，是否所有人都承认，能否实现，并不是完全没有问题，可能要斗争，并可能产生严重的斗争，思想上、组织上要做准备，迎接新的斗争。当前的斗争就是保卫接班人的斗争。一九七一年六月，刘锦平在上海鼓动周赤萍再版吹捧林彪是部队的“统帅”、“非凡的天才”、“一贯正确的英明的领导者”的黑书《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同志》。该书出笼三百万册，刘锦平买了五万册，发给民航人手一册。并给空军其他单位订购了近二十万册。一九七一年六月，总理在首都机场欢送外宾时，又对民航的宣传服务工作，特别是对广州管理局的宣传服务工作作了指示和批评。刘锦平非常不满，当他听了总理指示的传达后，很不耐烦地说：“哎一呀！不要乱传，不要乱传！”当听到总理对首都机场候机室布置问题的指示时，刘锦平竟说：“怎么样布置，让总理的秘书来说一说嘛！”空军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时，刘锦平打电话“请示”周宇驰后，装“病”不参

加会议，拒不写检讨，却派人到首都机场非法调查总理对民航的批评。七月六日，林立果在广州对米家农说：“他们对你们的批评，我第二天就知道了，听了以后很气愤，……你们要坚定，不动摇”，“广州管理局的成绩，任何人是抹杀不了的。”米家农向林立果表示：“有副部长的亲切关怀和直接指挥，我们一定能经得起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严峻考验”，“一定能把这块阵地巩固住，建设好。”刘锦平还派董崎赴广州向林立果汇报情况，请示对策。林立果一面指使他们不要硬顶，要“顺流而下”；一面叫嚷对外宣传“不能降到资产阶级水平”，恶毒地攻击说：“现在真有点怕外国人了，外国人说话比打雷还响”，“宣传不如不宣传，不宣传不如反宣传”等等。董崎有恃无恐，猖狂叫嚣：“要是候机室唱唱跳跳就是强加于人，那让外宾到剧院看样板戏不也是强加于人吗？”刘锦平等人还派了三个工作组到上海、广州、成都收集反证材料，大耍两面派，写假“检讨”，顽固对抗党中央、国务院。一九七一年六月十五日，林彪又住到了北戴河。一九七一年七月一日，中央两报一刊《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一文发表后，刘锦平及其一伙攻击这篇文章“没有突出林副主席的丰功伟绩”，说什么“他们不宣传，我们宣传”。刘锦平指定董崎牵头，组织了一个黑班子，并亲自定题目、出观点，炮制出一本五万多字的所谓“两条路线教育材料”。这个材料歪曲党的历史，以大量篇幅为林彪歌功颂德，树碑立传，其中提到林彪有八十二处，引用林彪的话二十一段，专门吹捧林彪的文字有十六大段，吹捧林彪是南昌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的“光荣代表”，是什么“光辉的榜样”、“最高的典范”。黑材料写成后，刘锦平还嫌对林彪从建国到一九六〇年前这段时间的“功绩”吹捧的不够，指使董崎“再好好地找一找，把这一段再充实一下。”一九七一年七月，经林立果、周宇驰一伙策划，在空九师召开了所谓“安全现场会”，有四个军区空军和五个军、十四个师、三个独立团，共一百四十三人参加。会议前夕，林立果与顾同舟进行了密谋。林立果说：这次会议“主要是争版权，要防止别人摘桃子”。并对死党和亲信说：“你们都去，要上主席台，亮亮相，告诉他们，你们都是我林副部长身边的人”，“这次打个大胜仗，你们都是有功之巨”。会议期间，林立果在白云山黑据点遥控指挥，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等在现场策划。会议文件和讲话材料都经过周宇驰、于新野、刘沛丰等修改定稿。他们规定会议要“敞开思想

谈认识，满腔热情抒感情”，说什么“抓安全要感情第一”，继续吹捧“讲用报告”和“两个一切”，狂热地吹捧林立果。在会议过程中，他们还逐个摸底排队，搞“路线交底”，进行拉拢。整个会议搞的乌烟瘴气。会后，林立果又“接见”一些人，说他们“路线觉悟高”，要“多保重身体”，“将来要从大家这里出干部。”经过这次会议，再次刮起了吹捧林立果的反革命妖风。胡说什么林立果搞的这个“典型”，是“空军的大寨，空军的大庆，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建设军队的样板”，“对空军建设又一重大贡献”，“放了第二颗政治卫星”。吹捧林立果是“群众的最好领袖”，是“非常优秀、非常成熟的接班人”，表示“认准了，跟定了”。林彪死党叫嚣“不怕风紧浪急”，“就是戴着钢盔也要跟林副部长干到底！”接着，他们又搞纪念“讲用报告”一周年，大量印发“讲用报告”，召开纪念会、“感情讲用会”，大搞表“决心”，献“忠心”，使这股反革命妖风越刮越烈。林立果、周宇驰把这一系列反革命活动称之为“夏季攻势”。一九七一年七月，所谓“空九师经验”出笼后，刘锦平等入极力推销，并指使铅印了三千多册。与此同时有组织地搞林立果黑报告出笼“一周年纪念”活动，再次掀起吹捧林立果的热潮。一九七一年七月，王飞亲自组织翻印周赤萍的《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同志》黑书一万多册，广为散发，并规定作为党课教育内容。一九七一年七月，王飞在鲁山、当阳、郑州、成都期间，分别同刘锦平、周宇驰、解长林等秘密串连，搞阴谋活动。一九七一年七月，林立果在广州对董崎说：“刘政委这次出去，任务完成得很好，工作很有成绩”。一九七一年七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传达后，林立果、刘锦平一伙感到形势对他们不利，于是采取“以退为进”的方针。根据林立果提出的“左派内部要整风”，“要当战斗队，不要当仪仗队”等七条黑指示和所谓“立场要坚定，思想要解放，行动要谨慎”的行动纲领，刘锦平亲自布置，对“左派队伍”进行整顿，要求他们“要顺流而下，不要逆流而上”，“现在要装孙子，将来当爷爷”。并提出“要防止出叛徒”，“谁泄露了情况就牺牲谁”。鼓吹“准备干一番大事业，准备应付突然事变，准备随时被捕坐牢”的反革命思想。刘锦平还声嘶力竭地叫喊：“就是杀头也要跟着林立果干”。一九七一年八月，刘锦平在首都机场看到一张合影照片，认为林彪的位置不够突出，便大发雷霆地说：“该突出的不突出”，妄图在候机室专门增挂一张林彪的单人

画像，与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并列。刘锦平一伙还请人在广州白云机场候机室《全国人民热爱毛主席》的大幅油画中，特意添上林彪的像。一九七一年七、八月间，刘锦平在成都指使他的亲信向所谓“左派骨干”传播林立果、周宇驰制造的反动谬论。胡说什么“无产阶级内部的斗争比资产阶级内部的斗争还要残酷”。他们要所谓“左派”队伍“特别注意九、十两个月。九月开三中全会，十月开四届人大，主要是权力再分配问题”，“会上……要有一场激烈的斗争”，“林副主席通过选举的办法就把政权掌握起来了”，“就当主席了。新的领导班子登上天安门，又是新的祖国山河一片红，是震动世界的大事。”如果不成，“黄、李、邱就发动军事政变，号召军队起来保卫接班人。”在上海管理局，刘锦平通过王维国选调人员组建了一个“保卫队”，配发了枪枝，只受刘的亲信张海山^⑧调动，上海市委负责同志出入虹桥机场的行动，他们都一一记在小本上。在广州管理局，除指挥“战斗小分队”进行特务活动外，还要乘务员做“交通员、通信员、联络员”；要候机室服务员“察颜观色，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仅一九七一年一月至九月，他们就指使某些人为林彪黑司令部传递秘密信件、材料四十多件。在总局机关，刘锦平指使其秘书和“左派骨干”学照相，学开汽车、摩托车，刘与林彪一伙的联系，都由程兆贤驾车联络；同时指使其亲信在首都机场的专机活动中，窥探中央首长的情况，偷听总理的谈话。一九七一年八、九月份，“战斗小分队”由吕国贤带着窜到南阳、郑州、洛阳、武汉、沙市等地，进行所谓“传思想、传感情、传革命精神”的反革命串连活动。一九七一年九月后，米家农一伙还组织队员排演了最后一场剧，宣读了林立果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一日“接见”“战斗小分队”时的黑指示，高呼“打倒路线斗争中的敌人”等反动口号，并在队员笔记本上作反动题词：“不当叛徒”，“宁死不屈”。一九七一年八月，林立果、周宇驰窜到北戴河，并乘坐直升飞机往返于北京、北戴河之间，传送情报，受领林彪的反革命旨意，密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林立果对其同伙说：“十月要召开四届人大，在此之前要召开三中全会，开会就有斗争，斗争的问题还是个权力重新分配的问题”，“我们只能上，不能让”，“不能等着让他们杀我们的脑袋，要先下手为强！”他们叫嚣：“现在就是要考虑选一个适当的机会，甚至采取一种非常手段，给林彪制造一个上台的条件。”一九七一年八月，王飞窜到天津、唐山，

了解空军部队的兵力部署和作战能力等情况，并要某部提前改装兵器。王飞对某团说：“你们这个团，是林副主席警卫二团的两个连组建起来的，你们要听林副主席的话。”在另一个部队，王飞索取了保卫首都的防空作战预案、应急行动预案、各种战术技术演练等重要资料。一九七一年八月，王飞又亲自炮制了一份要林立果当空司办公室主任的报告。他甚至在空军司令部党委会上，公然提出要林立果当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还向在空政干部部的亲信何汝珍布置：把林立果作为提升空司副参谋长的第一个对象。一九七一年八月五日，叶群回北京检查乳腺癌，找了不少人谈话。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六日，小“联合舰队”开了一次“整风”会议。成绩很大。要看到不足，与形势不适应的东西由明争转入暗斗相持、相对和平友好，酝酿新“战争”不要麻痹，要有思想准备。由对外斗争转为巩固阵地“战争”的突然性很强，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也一样。思想、组织、行动上加强“战备”过双重组织生活学习问题，搞政治的要学一点技术，搞技术的也要学政治不能搞私心杂念，不能搞个人主义。要有共产主义思想、精神、风格，“舰队”是战无不胜的，但“舰队”成员是不是能一直跟着前进。不能吃老本，不断立新功。要有“欠帐感”。要很严肃、很朴实、（这次黑会的记录，是于新野手记的，是从周宇驰、于新野等外逃乘坐的直升飞机上缴获的。）一九七一年九月初，王飞在遵化详细观察了某师驻地周围的地形，了解了雷达探测性能，远程情报的保证情况，夜间低空作战的能力，及所用机种、活动范围和飞行员对战区的熟悉程度，等等。一九七一年九月二日，毛主席在南昌接见了军队和地方负责同志，民航江西省局原政委王起元立即秘密函告上海管理局原政委辛国良，辛又马上报告了刘锦平一伙。一九七一年九月二日，林立果从北戴河飞回北京。一九七一年九月四日，林立果从北京回北戴河。一九七一年九月五日，广州部队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听到毛主席在长沙谈话内容的传达后，立即密报给林立果。一九七一年九月六日早，周宇驰打电话向林立果报告顾同舟传来的电话记录。十五点，周宇驰驾直升机和于新野带着十五页的电话记录，飞到北戴河。一九七一年九月六日，武汉部队政委刘丰不顾毛主席的叮嘱，把毛主席在武汉谈话的内容告诉了陪外宾到武汉访问的李作鹏，李作鹏当天回到北京即告诉了黄永胜。当晚，黄永胜又将毛主席谈话的内容密报给在北戴河的林彪和叶群。一九七一年九月六日，林立果给林豆豆打电

话要她到北戴河来。一九七一年九月六日下午，王飞按照林立果的密令，匆忙从遵化赶回北京，策划组织反革命武装政变。一九七一年九月七日上午九点多，叶群通知毛家湾的秘书把几本书随送林豆豆的飞机捎带了。一九七一年九月七日上午十点，林豆豆乘飞机场从北京去北戴河。林豆豆到北戴河以后立即见到了林立果。林豆豆问：为什么叫我来？林立果说：自从庐山会议后，一组就揪住主任不放，几次检讨通不过，现在趁首长在北戴河休养，跑到南方打招呼，最终目的要打倒首长，首长身体差，又不肯服软，刘少奇、彭德怀的例子摆在那里，如其等死，不如拼一下。谈话因林彪要见林豆豆而终止。一九七一年九月七日上午十一点多，林彪见林豆豆。一九七一年九月七日午饭后，林豆豆和林立果继续谈话。林立果说：九月五日，黄永胜将主席南巡的讲话告诉了主任，主任要跑，想跑到苏联去。林立果不同意，提出三个方案：上策是谋杀毛泽东；中策是到南方另立中央；下策是逃到苏联去。林豆豆说：我三条都反对。我认为那儿也不要，就待在北戴河最安全。林立果说：你装作不知道，主任不让告诉你。一九七一年九月七日晚，林豆豆对刘吉纯说：主任、老虎在外面做了坏事，被上面知道了，怕整他们，在北京待不住了，要劫持首长到外地去，你知不知道？刘吉纯说：我不知道。怎么办？是不是要向上面报告？林豆豆说：暂时不要。一九七一年九月七日晚十点，叶群问倪煜蒙古共和国及中苏边境的情况。一九七一年九月七日，陈庆军等人去上海、杭州、南昌将探听到毛主席的情况当面报告了于新野、李伟信、王维国等人。于新野对陈庆军说：“象这样一类事情，你们以后要及时向上反映。”一九七一年九月七日，林彪指示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的命令。当时毛主席在杭州停留，陈励耘掌握着抗州的警备大权，直接指挥毛主席住所的警卫工作。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九点，周宇驰打电话给空军航行局局长尚登峨，要一份从北京到伊尔库茨克的地图。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十九点，林豆豆要求与林立果单独谈话。林豆豆说：形势真的那么糟？首长态度怎么样？他知道吗？林立果说：首长还不知道，事情没有考虑成熟前，不能跟他说。林豆豆说：你可不能帮着主任骗首长，不经首长点头，谁也不能轻举妄动，你不要相信主任的话，惹出事来你也跑不掉，首长不会原谅你！林立果说：依着你那就坐着等死啊！我咽不下这口气，一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想整谁就整谁，别人不敢反，我就反！你就眼

睁睁看着首长挨整？！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叶群对李文普说：老虎要回北京看牙，这件事不要对首长说。林立果到北京后，打电话报平安，李文普报告了林彪和叶群，林彪点点说好。（这说明林立果去北京林彪是知道的，叶群那样说是欺骗李文普。那么，林立果说他与叶群的策划林彪不知道，是不是也是欺骗林豆豆呢？）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叶群打电话给江青：林彪同志问候江青同志，请江青同志保重。林彪同志送去几个西瓜，请江青同志尝一尝。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上午，于新野从北京飞到上海，在机场对李伟信说：现在形势很紧张，我到上海给王维国打了个招呼。下午于新野从上海到杭州，在医院见到陈励云，追问毛泽东在杭州到底说了些什么。于新野还同陈励耘密商商用飞机（一九七零年冬改装的伊尔—10 飞机。改装后的这架飞机，可以超低空飞行，具有很强的摧毁力。机身下面挂的是炸弹，机翼下面是火箭发射架）谋害毛主席的计划，于新野并说，准备于九月十日从北京派驾驶员去。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中午，周宇驰同王飞密谈了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阴谋计划。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下午，周宇驰到江腾蛟家。周宇驰拿出顾同舟传来的毛泽东的谈话记录给江看。江问：可靠吗？周说：还有更厉害的没有传达呢！看起来他们要动手了。如果他们这些人上台，我们就完了。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如先下手为强。要不，很快要开九届三中全会，开四届人大，首长就要被架空，说不定被搞垮台。就算首长能过关，黄吴李邱被搞下去了，我们再组织力量就困难多了。现在一组（毛泽东）正在杭州，很快就到上海，回北京过国庆。现在情况紧急，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一组在杭州已经住了几天，机不可失。今后很难遇到这样的机会，一组 9 月 25 日前不会回来，经过上海时就可以动手。我们不动手，将来别人上了台，我们这些人都完蛋，首先杀你江腾蛟。江腾蛟说：你要助手就叫王维国干吧。周宇驰说：王维国不行，太粗糙。江腾蛟说：那好，那好，那只有我去。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晚，林立果从北戴河回到北京。江腾蛟、周宇驰、李伟信等人在西郊机场迎接。林立果使出林彪的手令给江腾蛟看。随即转到空军学院秘密据点。林立果说：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朝，现在是我们的时候了。本来想多抓点部队，但已经来不及了。我们要全力以赴，一个顶几个或十几个用，要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现在他们正在做黄永胜的工作，攻下了黄永胜，就要搞首长。政治局开会，如果要摊牌，黄李邱首先会开枪，了

他们。我们总的代号叫五七一工程，准备在国庆节前解决问题。江腾蛟是前敌总指挥，王飞和刘世英、鲁珉、贺德全把空军的工作抓起来，刘沛丰、程洪珍负责联络，李伟信负责生活。现在就是靠少壮派起家，搞成了论功行赏，王飞是空军司令，刘世英可以当副司令，李伟信当外贸部长，其他人都要重用。有叛变的，了他，他好的，成败在此一举。程洪珍说：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林立果说：败了也不是寇，搞成了一切都好，失败了就打游击，坚决干到底！现在形势很紧张，直接对着首长，火药味已经很浓了，我们要誓死捍卫。所以要搞五七一，现在首长委托我来处理这件事，林立果对江腾蛟说：现在请你当东南总指挥，北任很重，老政委呀，一定要搞好。江腾蛟表示：一定坚决按首长手你的指示办！林立果拿出林彪的手令给刘世英、刘沛丰、程洪珍、李伟信看，江腾蛟又看了一遍。看后，林立果要李伟信保存。林立果提出三条办法；第一条是用火焰喷射器、40 火箭筒打专列。第二条是用 100 高射炮平射。第三条是要王维国趁接见时带上手枪在车上动手。江腾蛟说：我听得直出冷汗，这三条都不行。第一，空军没有火焰喷射器，就是有，我们也不会用。第二，谁敢下令打毛主席的专列？要教导队去打火车，他们也不一定干。第三，王维国愿意不愿意？就是愿意，枪要是带不上车怎么办？周宇驰提出：杭州到上海有几座铁路桥？江腾蛟说：有几座，但都是由陆军把守。林立果说：陈励云有胆量，在嘉兴车站动手最好。李伟信说：在杭州干好，让陈励云干。周宇驰提出：由江政委带羊于新野去说服陈励云。江腾蛟说：还是让于新野一个人去吧。周宇驰又提出：上海机场附近不是有一个油库吗？轰炸油库可以造成混乱，趁机进攻专列。江腾蛟又提出很多困难。一九七一年九月九日早晨，在空军学院据点，周宇驰要程洪珍把办公室墙上挂的北京市地图（地图有墙的三分之一那么大）有钓鱼台的地方描下来，上午交给他。程描好后，下午四、五点钟交给了周宇驰。周宇驰用铅笔标了方位，然后又说程描得不行，要程到办公室取原来的地图。一九七一年九月九日晨七点左右，在西郊机场据点，周宇驰对程洪珍说：“国防科委和空司科研部研制了一种关于化学武器或炸药的东西，有个文件。你告诉刘世英，叫他向科研部要来。或者你向孙水森（王飞的秘书）要，要来后交给我。”上午程洪珍向孙水森讲了周宇驰说的话，孙水森把这个文件交给了程洪珍。下午四、五点钟，程洪珍交给了周宇驰。一九七一年九月九日，周

宇驰在电话里告诉程洪珍到火车站接关光烈（关光烈，是驻河南某师原政委。关光烈来京，是参与林彪反革命政变活动的），住在四号门（反帝路招待所）。后来又来电话，说由他亲自去接。一九七一年九月九日上午，王飞同鲁珉密谈了谋害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同志的阴谋。一九七一年九月九日，于新野在上海当着王维国的面说：“我们这次用飞机轰炸，除飞机上有的武器外，还要再加配高射机关枪，这个机关枪可以扫射火车上跑下来的人。”王维国又提出，如果毛主席到上海下车住在顾家花园怎么办？于新野说，他看了地形，如果毛主席住在顾家花园，可以把王维国的“教导队”带上去，在毛主席住地附近埋伏好，用机枪把前后路堵死，先把警卫部队消灭，再冲进去就可以解决问题了。王维国还向于新野表态说：“首长（指林彪）的命令，我一定执行。”于新野、王维国都认为，在上海动手，地形比杭州要好，对他们更有利。一九七一年九月九日，林立果、江腾蛟、周宇驰等人围绕炸铁路桥、炸油库两种办法继续产商量，终究达不成一致意见。一九七一年九月九日下午，于新野从上海坐飞机回北京前，王维国同他一起又看过一次地形，他们决定就在上海谋害毛主席。于新野飞回北京，就到西郊机场向林立果作了汇报。一九七一年九月九日下午，空司航行局按照周宇驰的布置，给周送苏联伊尔库次克机场和恰克图导航资料等材料时，王飞说：“要满足他（周宇驰）的需要。”一九七一年九月九日晚七、八点钟，吴法宪给胡萍打电话说：“叶主任（叶群）来电话说，他们准备动，要用飞机，你把他们要用的飞机都准备一下，要用的三叉飞机一定好好检查，另外大飞机也都作些准备，随时可以用。”一九七一年九月九日晚上，林立果、周宇驰、王飞等，在空军学院黑据点秘谋。林立果给王飞传达了林彪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手令，王飞立即表示：“坚决保卫林副主席！”“林副主席叫干，就一定干！”林立果、周宇驰向王飞简要介绍了五七一工程及林立果提出的三条行动方案。林立果说：“现在情况紧张”，“火药味已经很浓了”，“要坚决把反对林副主席的人除掉。有一坨在南方，有一坨在北京，要同时干掉，南边由江腾蛟负责，北京由王飞和周宇驰负责”，“现在决定武装起义”，“从现在起王飞就是空军司令”。王飞说：打钓鱼台有些困难。林立果说：在南线先把一组抓起来。王飞说：这不行，还是先礼后兵好。是不是采取开会的办法，开会谈判几条：第一条，老百姓饿死了，一块打江山的元帅、大将整死

了，刘少奇整死了。文革中空军支持抓联动，五一六本来抓走资派，又说五一六是反革命分子。让他们承认，口头承认也好。第二条，九届二全会要谈。双方都让步，林彪没法征求意见了。三个副词，毛泽东坚决反对，干脆撤掉不提。毛泽东把《我的一点意见》去掉。“反革命简报”收回去。口头答应也好，这就没有什么公开矛盾了。第三条，提出“民富国强”是的总路线，这九大以前林彪提出来的，陈伯达在他起草的九大报告中的思想。停止文革。周宇驰还是坚持炸铁路桥。二十二点，林立果打了一个电话给叶群。林立果问王飞：你有什么好办法没有？王飞说：除了开会我没有好办法。林立果说：我就不信搞不成。接着继续研究如何攻打钓鱼台，林立果、周宇驰提方案，王飞摆困难。一直说到九月十日凌晨一点多。一九七一年九月十日，林彪给黄永胜的一封亲笔信由刘沛丰从北戴河带回北京的。原文如下：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敬礼 林彪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日上午，王飞秘密通知正在青岛“疗养”的王洪智（空十三师原师长），赶紧回去抓部队，并让十三师次日安排飞机接王回部队。一九七一年九月十日下午，林立果、周宇驰、王飞三人继续密谋。林立果将叶群写的“带交黄总长亲收”的一大信袋东西叫王飞转送给黄永胜。王飞认为：虽然这事很重要，面对这些无法解决的难题，毛泽东的动身又搞不清，搞不好是身家性命的事情。周宇驰这时也说：看来，还要从正反两方面考虑考虑，空间搞不搞？林立果说：现在不搞，还能收得住吗？！王飞说：没问题，收得住！林立果说：那就先不搞吧！我给北戴河打个电话，反正搞不搞还得我这个前线司令来确定。这次就算一次思想拉练吧。不过得绝对保密。一九七一年九月十日，王飞把把“带交黄总长亲收”的大信袋送给了黄永胜。向黄说明是“晋草”（叶群代号）和林立果两人送的，黄说，“噢，是叶主任送的。”王飞向黄转达了叶群、林立果向黄问候的话。还向黄转达了周宇驰告诉的他得到的关于毛主席同某地负责同志的谈话内容的情报。黄表示对叶群、林立果感谢。一九七一年九月十日，黄永胜同叶群通电话5次。其中有两次通话时间竟分别达90分钟和135分钟。一九七一年九月十日，林立果调关光烈来京。当晚，林立果、周宇驰与关光烈在反帝路招待所据点密谈。林立果要李伟信打电话给江腾蛟：先不要展开部署，否则就没有收的余地了。一九七一年九月十日晚十一时以后，叶群给胡萍打电话说：

“那位小将（指林立果）都给你谈了吧，谈的好吧？”胡萍说：“谈的很好。”叶说：“要你准备飞机是不是还有难处？”叶接着又说：“这件事我和胖司令（吴法宪）都说好了，用不着想的太多。”叶还说：“再说立果和胖司令也都作了安排的，你要抓紧准备。”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凌晨一点，林立果从北京给叶群打电话；要撤火。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上午，叶群打电话给林立果：打鞭子。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周宇驰对李伟信说：要更改三个人的代号，以后李叫‘金钟’，刘沛丰原叫‘槓子’，现改‘崔子’，王飞原叫‘阿飞’，现改‘黄翔’。而且要李把这三个人更改的代号，告诉‘舰队’的其他成员。其他‘舰队’成员也都有代号。刘沛丰说过，这些代号都报给了林彪、叶群。这些代号是武装政变时联络用的。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上午十一点多，周宇驰打电话给王飞说：情况有变化，前天晚上我们研究的不行，通不过，叶主任来电话发火了。林立果也给王飞打电话说：主任给我们抽鞭子，现在势在必行，不能动摇了。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十一点多，叶群对毛家湾的秘书说：把全军副军以上干部花名册和部队部署登记表送来，首长过几天要到大连，准备研究一下战备问题。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中午，叶群亲自打电话给王飞：叶群说：听说你有很大顾虑，总想抽梯子。怕什么！就是死也是烈士嘛，我们是为革命利益，形势逼人，不得不这样搞。王飞说：不是怕，搞不好把你们也连累了。叶群说：江腾蛟那里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他到了我们的根据地了。林副主席决心已定，要坚决搞，不能坐失良机。身家性命全都托给你们了。赶快研究一下，十八点给我个回话。叶群还要王飞“帮助给照管孩子（指林立果）”，并许诺王飞“将来是‘常’字号的”。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下午，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王飞找关光烈在西郊机场秘密据点开黑会，研究攻打钓鱼台的方案。林立果对关说：“把你找来，是调你的部队解决钓鱼台问题。”拿出预先绘制的钓鱼台地图给关看。并具体询问了关光烈所属部队有几个团？多少火焰喷射器、火箭筒？部队能否调出来？多长时间可以调出来？等等。他们还策划过“用空司警卫营冲”，“用飞机轰炸”，“调一个坦克团”等手段攻打钓鱼台。他们还规定了通信联络的密语和方法。在讨论中，江腾蛟、王飞强调困难多。林立果说：还是要搞，主任抽鞭子了。老实说，主任一抽鞭子就坏事。她搞拉拉扯扯可以，办正事不行。庐山会议坏了事，固然吴胖子是个草包，没

有用，要不是她瞎指挥，庐山上那么多大将，还有陈伯达，还不会输得那么惨，搞得首长很被动，简直把首长气坏了。这回好了，她在那里干着急，整天睡不着觉，又哭又闹，又要上吊，还在电话里唠叨，一讲没个完。江腾蛟说：干这种事光抽鞭子不行。王飞说：不是我们不干，我是说，干这种事要慎重，干不成，不光我们完蛋，统统完蛋。林立果说：这次不一样，“林副主席的决心已定，南线先搞，北线接着搞”。首长下了决心，首长的决心不会有错。现在决心已定，就是研究如何执行的问题了。这几天接连研究了几次，一直定不下来，我看问题的关键是没有决断的勇气。这次要下孤注一掷的死决心，不能再拖下去。还是两边都要搞，南线先搞，北京接着搞，双管齐下。林立果、江腾蛟、王飞、关光烈、于新野还到钓鱼台周围看了地形。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下午六点，林立果要王飞给叶群打电话，汇报他们研究的情况。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晚八点半钟，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江腾蛟与鲁珉等人在西郊机场秘密据点开会，再次具体策划方案。林立果看到鲁珉就说：现在要进攻啦，付统帅有命令，拿出来给他们看看，周宇驰就拿来一张硬白纸，林立果递给了鲁珉，鲁珉看到是用红铅笔写的：盼照立果宇驰同志的命令办 林彪 月 日。林立果说：现在情况很紧张，马上要召开三中全会，会一开林副主席就不占优势了，副统帅下了命令，要主动进攻，江腾蛟你这个歼一七在上海打头阵，争取在上海搞掉（指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不成就看鲁部长的第二次攻击了，有的是炸药，在铁路上一放，就是第二个皇姑屯事件，再不成就让陈励耘派依尔—10 轰炸。林立果对鲁珉说，你到上海去是他（指江腾蛟）点的将。我们决定派你到上海去，先和王维国政委研究一下，你就到□□去组织指挥炸铁路。把火车炸坏了以后，就带着部队冲上去动手。鲁珉说，用轰炸机炸更厉害。会上，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等人脱掉上衣，提着手枪，杀气腾腾。林立果说：“江腾蛟在上海打头阵，不成就看鲁部长（指鲁珉）在硕放第二次攻击。”还说：“事情成功之后，你们就是国家栋梁，有功之臣。”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二十二点，林立果一伙得知毛泽东已经离开上海。林立果流着泪说：全完了，没完成首长交给的重托，首长把生命交给了我，我拿什么去见首长？周宇驰说：难过也没有用。还有一个办法，到国庆那天，首长诤病不去，老子他妈的驾直升飞机去撞天安门。我不得好死，他也别想活着。还得去一个人伪装，帮我撒传单。你

们谁能跟我一块去？于新野、李伟信、刘沛丰都表示愿意去。林立果说：我不允许这样做。其他人也认为这样做不现实。于新野说：只怕等不到十一啦。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林彪对李文普说：收拾一下东西，准备去大连。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上午，刘沛丰把林彪的亲笔信拿回去。一九七一年九月六日到十二日，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通过军委电话总机接转的电话有 51 次（不包括自动电话）。其中叶群在北戴河用保密机与黄永胜通话 16 次，与吴法宪通话 5 次，与邱会作通话 10 次，共 31 次 948 分钟。他们通话在五十分钟以上的有 8 次。一九七一年九月七、八、九、十二日四天，叶、黄通话前后，黄又与李作鹏通话 7 次。九月九日半夜，在叶群与邱会作的老婆胡敏通话时，黄永胜、吴法宪同时争着要与叶群通话，在叶与胡说完之后，黄永胜与叶群通话 90 分钟，吴法宪几次催促要与叶群通话。九月十日，黄给叶打电话 3 次，叶给黄打电话 2 次，在这五次电话中，一次长达 90 分钟，一次长达 135 分钟。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中午 13 点 10 分，专列抵达丰台站停车。毛主席与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和我谈了话，一直讲到下午 3 点多钟才结束。过去，毛主席从来没有白天到北京站下车的，这次是个例外。15 点 36 分，专列由丰台站开出，16 点 5 分到北京站。毛主席下火车后坐汽车回到了中南海。从杭州动身到这时，毛主席已经 3 天没有休息好。回来后，汪东兴打电话给周总理。周总理还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感到诧异。他问：“你们怎么不声不响地就回来了，连我都不知道。路上怎么没有停？原来的计划不是这样的呀。”汪回答周总理说：“计划改了。电话上不好细说，以后当面汇报。”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下午，李德生和陈先瑞等等北京军区领导紧急研究调动部队进驻南口，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叶群首先得到毛泽东已经回到北京的消息。她马上通知林立果。两个小时后，林立果飞往北戴河。行前，他要求周宇驰实施第二个方案，立即研究南逃广、另立中央的行动计划和人员名单。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下午，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在西郊机场秘密据点研究南逃计划。当时，空军已经被他们控制。他们安排了 5 架飞机飞往广州：一架是 256 号三叉戟，林彪的专机；另外再安排一架三叉戟给黄永胜等乘坐；第三架是伊尔—18；第四架是安—12 运输机，可以装汽车；第五架是安—24，也可以装防弹车。他们说，还要为林彪再准备一架伊尔—18。林立果在电话中把这些安排都报告了

林彪。林彪说：“立即转移。”随后，林立果给王飞传达说：“你这样安排对。林副主席决定立即去广州。”林立果要求通知广州部队空军参谋长顾同舟，要他安排好车辆和房子。周宇驰还对李伟信说，马上打电话给上海的王维国，通知他9月13日早上有一架伊尔—18飞机在上海着陆，把警卫团二中队换下来，让王维国的空四军“教导队”和上海的“联合舰队”成员做好准备，搭乘这架飞机去广州。周宇驰还要求于新野给空军军务部打电话，通知马上准备好30支手枪，2支冲锋枪，多准备一些子弹。这些任务完成后，于新野立即去空军大院协助江腾蛟、王飞组织人员转移。周宇驰这时挥着胳膊对江腾蛟和王飞说：“他妈的，成败在此一搏！”接着周宇驰又找江腾蛟、王飞进行密谋。周宇驰说：“情况紧张，林副主席决定立即转移，到广州后召开军事会议，宣布把中央和军委都搬到广州，另立中央。”还说：“到那时，广州电台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两个中央，两个司令部，只有通过全面内战或谈判来解决矛盾”。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下午四时以后，周宇驰和胡萍安排十三日飞机。周说：“主席最近找了很多军区的负责同志谈了话，首长（林彪）看这形势很不好，就决定十三日离开北戴河去广州。三叉飞机256号今天送林立果回山海关，首长走时就用这架飞机。准备一架依尔—18，十三日七时起飞，我们俩坐上去山海关，然后和首长坐256号飞机一起飞广州。依尔—18拉上部队到上海落个地，再飞去广州。再准备一架多坐三叉飞机，拉上黄、吴、李、邱和机关的人，十三日八时直飞广州。由王副参谋长（王飞）指挥。还调一架安—24。一架安—12飞机运上两架直升机，都飞去广州。吴法宪还交代把大飞机也都准备好，随后调去广州。”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十七时，叶群在林彪面前为林豆豆和张清林订婚。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下午六时，林立果在北戴河打电话向王飞交待新的情况和任务。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晚，王飞随即秘密同于新野召集鲁珉、贺德全、刘世英、朱铁铮、郑兴和共七人开会，策划随林彪、黄、吴、叶、李、邱南逃广州的行动计划。王飞说：“林立果已经回北戴河了，要立即组织一批可靠人员，护送黄、吴、李、邱于十三日由西郊乘飞机去广州，另立中央，与苏联搞联合”。王飞在会上宣布江腾蛟为“总指挥”，鲁珉、贺德全为“副总指挥”。“七人黑会”拟定了南逃的人员名单，密谋了出发时间、车辆安排、人员分工以及到机场后进行动员、配发枪枝等事项。王飞布置郑兴和从空司警

卫营取走五九式手枪三十支，冲锋枪两支，子弹二千三百六十发。王飞还叮嘱他的亲信，明天走的事“不要告诉别人，告诉别人是要杀头的。”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二十二点，汪东兴告诉邬成吉：中南海进入一等战备。

贰、本节简论

有人说：庐山会议后，毛泽东非常活跃，而林彪却没有任何活动，坐在北戴河的黑屋子里等死。有人说：九一三事件前，林立果的活动很多，林彪的活动依然没有，林彪知道林立果的那么三个方案吗？没有证据。倒有证据表明，9月12日林彪提出要见尼克松。有人说：过去包括两案审理，都只认定只有一张林彪手令。而作者在探访中最先发现林彪的手令有横竖两张，那么林彪的手令是林彪写的吗？作者分析了林彪手令的语气、笔迹，认定大有模仿的嫌疑。有人说：据两案审理；没有发现黄吴李邱与两有联系，林立果搞两谋为什么不依靠黄吴李邱？总之，有那么一些人，在铁证如山面前，他们仍然要为林彪集团翻案，说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一是与林彪没有关系，二是与黄吴李邱没有关系。但事实如何呢？一九七一年三月，林立果制定反革命五七一工程计划以后，如何实施？这不是由林彪集团单方面的主观愿望决定的。第一关节点是一九七一年四月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林彪集团认为，这次会议最坏的可能性是把林彪端出来。因而他们就加快了实施反革命阴谋计划的步伐。第二个关节点是一九七一年八月中央决定在国庆节前后，召开中共中央九届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林彪集团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八月五日至九日派叶群回到北京，与黄吴李邱商量对策。第三个关节点是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五日毛泽东开始巡视南方几省。一九七一年九月五日，林彪集团得到了毛泽东在南方谈话的确切情报，认为毛泽东在谈话中已经把矛头公开对着林彪，是要搞掉林彪的政治信号。而且，毛泽东正好处在他们的势力范围中，是实行反革命阴谋的最好时机。一九七一年九月七日，林彪、叶群召林豆豆从北京到北戴河。林立果向林豆豆交底：提出三个方案：上策是谋杀毛泽东；中策是到南方另立中央；下策是逃到苏联去。这预示着他们要开始行动。一九七一年九月七日，林彪指示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的命令。当时毛主席在杭州停留，陈励耘掌握着抗州的警备大权，直接指挥毛主席住所的警卫工作。

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晚，林立果从北戴河回到北京。具体谋划南北两线同时进行暗杀国家领导人的活动。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凌晨一点，林立果从北京给叶群打电话；要撤火。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上午，叶群打电话给林立果：打鞭子。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二十二点，林立果一伙得知毛泽东已经离开上海。林立果流着泪说：全完了，没完成首长交给的重托，首长把生命交给了我，我拿什么去见首长？第四个关节点是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下午毛泽东回到北京。林彪集团在南方谋害毛主席的阴谋破产。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叶群首先得到毛泽东已经回到北京的消息。她马上通知林立果。两个小时，林立果飞往北戴河。行前，他要求周宇驰实施第二个方案，立即研究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行动计划和人员名单。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林彪对李文普说：收拾一下东西，准备去大连。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十七时，叶群在林彪面前为林豆豆和张清林订婚。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十八时，林立果离开北京飞北戴河。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二十二点，汪东兴告诉邬成吉：中南海进入一等战备。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二十三时半，林立果从北戴河给周宇驰打电话，命令停止“南下”，要“北上”。林彪要搞阴谋，他的活动空间本来就不大，而且他一贯的行事风格，就是通过叶群与黄吴李邱等人联系。他既不亲自读文件，更不亲自亲处理文件。现在却有人一定要别人拿出林彪亲自批示的文件作为证据。即便有这样的证据如林彪的手令，又有什么用呢？他们又会说这是别人模仿的。看来只有林彪的讲话录音才能作为证据了。搞阴谋活动的人把自己在小范围内的讲话用录音保存下来，世界上有这样的人或这样的事吗？何况，即便是录音也可以造假呢？从一九七一年四月到九月十二日，林彪、叶群、林立果干了那么多事，怎么能说林彪是在那里“等死”呢？说这些事都是林立果干的，叶群可是亲自出马了的，有人证。说这些事都是叶群、林立果背着林彪干的。而九月十一日叶群、林立果都对他们的亲信说过：这次是首长下了决心。如果这又是他们伪造的，那也只能说明：林彪早已成了一具行尸走肉。可是，林彪出逃的过程告诉人们，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

2009年9月23日初稿 2012年4月3日修改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第五章第一节

第五章 毛泽东外地巡视

第五章第一节 毛泽东巡视武昌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日，毛泽东通过与熊向晖的谈话了解到军委二级部长都没有传达中央汇报会议精神。

毛泽东说：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有后台。

一九七一年八月，林立果、周宇驰窜到北戴河，并乘坐直升飞机往返于北京、北戴河之间，传送情报，受领林彪的反革命旨意，密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

一九七一年八月，谢静宜的丈夫苏某在空军机要局工作，通过谢静宜传来消息：林立果在空军成立了秘密组织，在作武装夺权的准备。

一九七一年八月六日，中共中央关于黑龙江问题的决定

1971年8月6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潘复生的黑龙江省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职务。任命汪家道为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刘光涛为第一副主任，傅奎清、张林池为副主任。

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五日至九月十二日，毛泽东巡视南方几省。

一九七一年年 八月十五日，毛主席乘专列从北京出发。

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六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张春桥、纪登奎、黄永胜到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宣传、常务、生产、军事等情况。

汇报结束后，周恩来说；毛主席提议，国庆前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补选几名中央委员，还有常委。然后召开四届人大。现在各项准备工作正在逐步就绪。

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六日，在武昌车站，毛主席找了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和汪东兴谈话。

八月十七日，毛主席又找了河南省委负责人刘建勋、王新，还有刘丰和汪东兴继续谈话。

谈话开始时，毛主席先亲切地问刘丰有关湖北、河南的情况。

刘丰汇报说，湖北、河南的情况不错，人心比较稳定。毛主席听后感到实际情况不完全是这样。

毛主席严肃地说：笼统地这样说也可以。要细想起来，这样说是应付差事。在你们这里，有些地方还在动，有些地方没有动。有些地方的意见是不少的。

毛主席的话锋一转，说：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主席接着说：中国也怪，中国的党没有分裂。已经经过五十年没有分裂过。苏联的党分裂过，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中国没有。有人要分裂我们的党是困难的。

接着，毛主席回顾了党的历史和党内路线斗争。他说：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曾经多次要分裂党。都没有得逞。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81个人搞了个“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这个组织没搞多久，垮台了。以后变为托派了。其中有个叫刘仁静的，这个人比我年龄小，现在住在北京，他从莫斯科跑到土耳其去见了托洛茨基。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分裂党。也没有得逞。他还在武汉当教授吗？他是浏阳人，我的老乡。他用的名字很多，也叫罗敖阶。瞿秋白、李立三不算分裂党，是犯了路线错误。

毛主席在这次谈话中还提到井冈山时期的一些事情。

1929年 6月 22日在福建龙岩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10月初在福建上杭召开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当时毛主席被迫离开了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陈毅在红四军“七大”会议上当选为前委书记。8月，陈毅去上海，向

中共中央作汇报工作。8月 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临时会议，专门听取了陈毅有关红四军情况的报告。周恩来当时任中共个央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央组织部长和军事部长，他听了汇报后对陈毅说：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毛泽东呢？应该拥护他，他在根据地搞的是对的。

陈毅根据周恩来多次谈话的精神，代中央起草了一封指示信，信是经周恩来审阅同意后发出的。信中肯定了毛主席的一系列正确主张，明确指示“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陈毅回根据地传达了中央的意见，带回来了那封信。同年12月28日，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古田又召开了第九次党代会。会议开了三天，重点是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最后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这样，便扭转了毛泽东遭排挤的局面。毛主席说：陈毅当时到了上海，本来是告状的，但周恩来做了好事，批评陈毅不对，犯了极端民主化的错误，还是要我“复辟”。中央要我“复辟”，我就“复辟”了。

毛主席接着说：然后是纠正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然后是王明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在会上发表《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他是公开论战。在莫斯科是搞宗派。

毛主席又说：六届五中全会，是在江西瑞金开的，他们都到了中央苏区了。我是政治局委员，不让我参加会，让我当苏维埃主席，不让我在军队工作，让我去做群众工作。

毛主席说：国民党军队向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这次反“围剿”是周总理指挥的。

毛主席接着说：遵义会议是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王明错误的路线。

王明夺权四年之久。上海的中央移到中央苏区去了，陆续跑过去了。先是周恩来，然后是博古、张闻天、王稼祥他们去的。到中央苏区，李维汉去得早。

他那时是组织局长。然后是长征的路上，一、四方面军在四川西北部的懋功会合以后，张国焘搞政变，成立伪中央。

毛主席继续说：全国胜利以后，高、饶就想夺权，搞反党联盟，没有夺成。

讲了党的历史。毛主席又把话题转到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他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能是心里有鬼。

在座的同志，都检讨自己犯了错误。

毛主席接着说：你们就是太急了，问题不在你们。你们是属于上当受骗的，问题在北京。就是那些大将，包括黄水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他们都跟着起哄。犯了错误，进行了检查，允许改正错误，还是可以工作。这次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这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大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毛主席说：什么“天才的”，我不是天才，读六年孔夫子，读七年资本家的洋学堂，我到二十五岁那一年，正是一九一八年开始读马列主义。

毛主席在谈到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错误的人的时候说：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改了没有？没有改。

毛主席说：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也可能救不过来。有了错误就要改，如汪东兴同志，分别几次在七千多人的面前。讲他自己的错误，他接触最广的就是中央办公厅、中央警卫团，七千多人的单位，这怕什么呢？他不怕。

毛主席接着说：胜利以后，朝鲜战争时，我管了一下军队，以后就没有管了。朝鲜战争后，军委的事。主要是彭德怀同志管。我征求总理的意见。我说还是他好，他在长征中是靠在我们这边的，抗美援朝，人家打了胜仗，不叫人家管这个事行吗？管点事有什么要紧呀！

毛主席接着又说：以后就是林彪管了，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

毛主席对刘丰说：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开九十九人的会（指1971年4月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地方和部队的负责人共九十九人。一作者注）不行，要开军长、政委，地方上相当军一级以上干部的会议，把问题讲清楚。听说连总参二部部长这一级的人都还不知道（指九届二中全会林彪一伙人的问题。），这怎么能行呢？你们军区、省军区常委要研究一下。暂时不忙，待提中央讨论后定。

毛主席还说：不要把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秘书。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还有黄永胜那里是不是？

当时有人回答毛主席说：黄永胜那里早就不是了。后来了解这个回答的情况是假的，实际上黄永胜的老婆项辉芳当时还在当黄永胜办公室的主任。

毛主席强调说：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只有两个文件，当时因为身体不好，我口述，别人（江青）记录的，最后还是经过我自己修改印发的。其中一个就是《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现收入《毛泽东选集》第4卷。）。

毛主席讲完了庐山会议各方面问题后，继续说：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脚。批了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批发三十八军的报告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军委办事组准备叫李先念、纪登奎参加，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脚。

毛主席说：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历史上还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呢！这不符合实际。

毛主席接着说：关于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我说我们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人了。要培养六十岁以下的、三十岁以上的人。

最后。毛主席说：今天就这样吧。你们四位，明天、后天讨论一下。

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批发“广州军区三支两军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纪要”

毛泽东批准并在中央批语上增加了“认真研究”四个字，要求引起重视。

7月15日至31日，广州军区召开的三支两军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

《纪要》指出：军区现有2万多名干部战士参加三支两军工作，其中担任省（区）、

县和相当县以上革命委员会工作的有3744人，有78%的县以上党委书记和革命委员会主任是军队干部。

《纪要》指出：军队三支两军人员对地方党委组织也应当尊重和支持。为了保证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的领导，维护地方党委的威信，《纪要》规定：凡参加地方党组织生活的三支两军人员，必须接受地方党委（支部）的统一领导；在地方各级党委中担任领导职务的，特别是担任一、二把手的军队干部，必须正确理解党的一元化方针，对三支两军人员实行军队和地方共同管理，以地方为主的办法。

《纪要》反映：三支两军人员中存在骄傲跋扈、好大喜功、任人唯亲、打击报复、滥用职权、违法乱纪等错误的思想作风；有些人存在着特权思想，不尊重、不支持已经成立的地方党委。这些现象必须加以改正。

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五日晚，毛主席在武昌同华国锋同志谈话。

谈话开始时，毛主席问华国锋：你来了。你们现在忙什么？

华回答说：我刚到国务院，着手了解工农业生产的情况。我向毛主席作个汇报。

毛主席说：我看你是满脑子的农业，我是满脑子的路线斗争。当然你讲的农业也有路线斗争，但是还有更大的路线，光有农业不行，还要考虑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工农业要抓，但当前主要应该抓路线斗争。农业也有路线问题。

毛主席对华又简要叙述了党的历史，他说：中国也怪，中国党没有分裂。陈独秀81个人组织“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后来又转为托派。有个刘仁静，他见过托洛茨基，此人比我年龄小，现住北京。罗章龙另立中央，没有成功。此人现在湖北当教授。是浏阳人，现叫罗敖阶。瞿秋白、李立三不算分裂，是犯路线错误。王明搞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在全党夺权四年之久，召开了两次中央全会，即第四次、第五次全会（指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1934年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遵义会议是政治局扩大会议，推翻了王明的领导，张闻天负总责，实际上张闻天当召集人，我管事。正式管事是遵义后十年，一九四五年五月“七大”（1945年5月，七届一中全会举行。毛泽东同志在这次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才当选主席。出了两本书，《两条路线斗争》、《六大以来》，他们才解除武装。张国焘在长征路上，自立中央，也没有搞成。高、饶想夺权，没有夺成。有

人说三年灾害是我搞的，我要采取的办法他们又不赞成。后来北戴河会议，讲了形势、阶级、矛盾才好转了。

毛主席接着说：我批发了广州军区三支两军座谈会的纪要，在中央的批语中加了“认真研究”四个字，不加怕各大军区马虎过去。

毛主席继续说：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三天。是否定“九大”路线，否定二中全会三项议程，要改成讨论天才和要设国家主席问题。他们名为反对张春桥，实际是反我。是我把天才划掉，是我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上一中、一师七年是读资本主义的书，到一九一八年才读到马列主义。

毛主席在谈到九届二中全会上印发的反映华北组讨论情况的六号简报时说：这个简报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这是我个人认为。将来党中央还要讨论。

毛主席接着对华国锋说：说大有炸平庐山之势是有用意的，空军才能炸平。他们发称天才的语录，不给李德生同志发，他们几位是井冈山山头一方面军的。一次当着他们的面，我说李德生你好蠢呀，不是一个山头的，宝贝如何能给你呢？会上念的称天才的语录，事先也没有谈过，也不知是哪本书、哪一页的，是说假话嘛。

在讲到解决九届二中全会出现的问题的措施时。毛主席说：我是程咬金的三板斧，打石头、挖墙脚、掺沙子。看到三十八军的报告很高兴，当即批了。把二十四军、二十一军、三十八军整得厉害，特别是把三十八军整得苦。还批了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文件和刘子厚的检讨等文件，这是打石头。改组北京军区是挖墙脚。中央警卫团、北京卫戍区，他们没有插进来。掺沙子，掺了李德生、纪登奎。还少，叫李先念参加军委办事组。不能不管军队，开会不一定到，中南也要有人参加，可以不到会。你们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要当武官。

毛主席还说：路线要搞正，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的可以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汪东兴同志他管的中央办公厅、警卫团七千多人的范围，他分几次在一千多人中讲了自己犯的错误。犯错误愿意改正就好。

最后，毛主席对华国锋说：不要搞山头主义，山头主义害死人。全国都要团结，

还是几个原则。三个办法，打石头、挖墙脚、掺沙子。有些话不能听，一句话顶一万句，能相信吗？有的连半句也不顶，顶个屁。实际有的不算数，如天才和国家主席问题，我说了多少次，半句也不顶。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哩。

毛主席准备由武昌转移到湖南长沙。

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七日日下午二时，刘丰到毛主席的住处看望毛主席，毛主席同他进行了第二次谈话。

谈话开始时，毛主席问刘丰：怎么样？

刘丰回答说：这几天我想得比较多。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我也犯了错误，起了哄。干扰了主席。去年主席谈了以后，我心情很沉重。

刘丰讲的去年毛主席同他的谈话，是指九届二中全会结束毛主席从庐山回北京路过武汉时，同他谈的一次话。当时刘丰的态度不明朗。毛主席这次在武昌同他谈话，叮嘱他不要告诉别人，可是9月6日，他就告诉了陪同朝鲜军事代表团到武汉访问的李作鹏。

毛主席对刘丰说：你沉重什么？问题不在你。问题在北京。

毛主席又问：方铭同志什么病？

方铭当时是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毛主席问方铭的情况。刘丰没有回答。

毛主席又再次向刘丰谈到党内的路线斗争，点明了陈伯达也是反党阴谋集团的人。

毛主席总括说：我们党五十年，十次分裂，都没有分裂了。刘丰接着毛主席的话说：有主席领导，有主席思想，解放军也是分裂不了的。请主席放心。

谈到军队、毛主席说：我犯了个错误。胜利以后，军队的事情我管得不多。

刘丰插话说：主席还是管的。

毛主席说：我要管军队了。我光能缔造就不能指挥了吗？

在同刘丰的谈话中。毛主席很快又把话题转回到九届二中全会问题上。

他说：又是井冈山和中央苏区的人犯错误，他们想搞我的山头。四方面军的同志。从张国焘事件后，比较谨慎一点了。

毛主席再次讲到九届二中全会后采取的措施时，他说：我的方法是打石头、挖墙

脚、掺沙子。在庐山，五天时间我写了七百字，打了这样一块石头。以后批了三十八军的报告。他们把三十八军整得那样苦。还批了济南军区政治部的报告、刘子厚同志的检查。

毛主席谈到解放军的问题时说：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指挥解放军？郑维山能指挥解放军？华北八个军，就有五个军反对他们。天津的六十六军就不听他们的嘛！他们要把那几个坏人塞进天津市，六十六军就反对嘛！就是那二个军，还有军长、政委，师长、政委、团长、政委，会听他们的吗？

毛主席谈到掺沙子的办法，说：李先念这个人，比较正派，比较好。我要李先念同志也参加军委办事组，考虑再增加一些人，掺沙子。是不是其他军区也参加些人。

刘丰在中央苏区时是五军团的人，五军团是由宁都起义的部队改编成的。毛主席向刘丰问了五军团的情况后说：季振同（河北沧县人。1931年12月 14日与赵博生、董振堂等率部起义，起义部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他任总指挥，1934年夏被错杀。），我同周恩来讲了几次，这个人不应该杀。赵博生、董振堂这两个人也不错。

毛主席接着说：我七老八十了。你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搞团结，不要搞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党的方针是允许改正错误的。如某些同志，我们还是信任的。

毛主席讲到这里，再次向刘丰谈起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他说：这次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他们在庐山不是一天半，而是三天。

毛主席又说：我讲的话，什么一句顶一万句？有时一句顶一句，有时连半句也顶不了，顶个屁！他们的话才是一句顶一万句，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他们才是天才。陈伯达才是天才。

毛主席这次对刘丰说：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

毛主席还很生气地说：他们要捂住。总参二部部长都不知道。怕要开二百来人的会议（来解决）。

这里说的总参二部部长不知道，是因为当时毛主席接到总参三部部长给他写的

信，信中谈到过这个情况。

毛主席还对刘丰讲到他不赞成老婆当秘书、当办公室主任的问题。对一些负责人向林彪请示问题时要经过叶群这类事很不高兴。

谈话结束时，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说：为《国际歌》，列宁在欧仁·鲍狄埃逝世二十五周年时写了一篇文章纪念他。一百年了！国际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

毛主席问刘丰看到过新印的《国际歌》歌词没有。刘丰说他没有看到。毛主席叫张玉凤去拿。张玉凤说印的歌词和材料都已装箱上车了。毛主席说，到火车上再给他。刘丰问毛主席：翻印一些下发，可不可以？

毛主席点头表示同意。

随后，刘丰等人送毛主席到车站上车。刘丰扶毛主席坐下后，张玉凤拿来《国际歌》歌词。毛主席要张玉凤、吴旭君唱。毛主席同刘丰也跟着一起唱。唱一段，毛主席讲解一段，还讲解了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的文章。

毛主席说：究竟是英雄创造世界，还是奴隶们创造世界？我是历来主张奴隶们创造世界的。

毛主席还说：《国际歌》就是讲要团结，讲全世界无产阶级要团结。

唱完《国际歌》后，毛主席又与刘丰等人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

毛主席对刘丰动感情地说：是呀！你看，就是要步调一致嘛！不一致还行呀？

贰、本节简论

毛泽东这次巡视武昌主要找了三批人谈话。

八月十七日，找刘丰、刘建勋、王新、汪东兴谈话。主要是做刘丰、王新的工作。

八月二十五日，从北京找来华国锋谈话。主要是让他回湖南做工作。

八月二十七日，又与刘丰谈话。但刘丰始终没有揭露他与林彪集团之间的真实关系和活动，而且在李作鹏于九月六日到武汉时，就把毛泽东与他的谈话透露给李作鹏。这就进一步暴露了林彪集团的真实面目。

毛泽东的这三次谈话要点如下：

1，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山

头主义、宗派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2，党内有人如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罗章龙、高岗曾经多次要分裂党。都没有得逞。

3，这次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这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大中全会的三项议程，要改成讨论天才和要设国家主席问题。他们名为反对张春桥，实际是反我。是我把天才划掉，是我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

4，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有些话不能听，一句话顶一万句，能相信吗？有的连半句也不顶，顶个屁。实际有的不算数，如天才和国家主席问题，我说了多少次。半句也不顶。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哩。

5，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三天。

6，反映华北组讨论情况的六号简报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

7，说大有炸平庐山之势是有用意的，空军才能炸平。

8，他们发称天才的语录，不给李德生同志发；会上念的称天才的语录，事先也没有谈过，也不知是哪本书、哪一页的，是说假话嘛。

9，问题在北京。就是那些大将，包括黄水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他们都跟着起哄。陈伯达也是反党阴谋集团的人。

10，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指挥解放军？郑维山能指挥解放军？我要管军队了。我光能缔造就不能指挥了吗？

11，犯了错误的人：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他们要捂住。总参二部部长都不知道。

12，党的方针是允许改正错误的。如某些同志，我们还是信任的。对犯错误的人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也可能救不过来。

13，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

14，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脚。掺了李德生、纪登奎。还少，叫李先念参加军委办事组。李先念这个人，比较正派，比较好。我要李先念同志也参加军委办事组。

15，不要把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秘书。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还有黄永胜那里。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

毛泽东的这几次谈话，进一步说明了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的实质、意义以及中央的处理方针。

有人歪曲事实，硬要把毛泽东的南巡说成是为了打草惊蛇、逼林彪“上梁山”。把毛泽东与刘丰等人的谈话说成是故意让他们向林彪透露消息。这种诡辩式的议论不可多得，很有必要让更多的人见识一下：

《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中说：

“毛泽东为什么南巡？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采取了那么多措施，而林彪在‘冬眠’，毛不得不南巡，打草惊蛇。毛为什么第一站选武汉？因为他认为刘丰是林彪死党，毛与刘丰大讲林彪，却又对林彪严格封锁，但实际上毛希望刘丰透露。毛在武汉等了几天，刘丰没有报告林彪。他只能继续到长沙、南昌，让广州军区传达到师以上干部。这是为什么？因为广州军区是林彪的‘老窝’，两千多名师以上干部中总会有人报告林彪。林彪听了还能稳坐钓鱼台吗？果然，9月8日，林立果在接到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的报告两天后，回到北京策划杀毛。”

2012年4月24日修改

第五章第二节 毛泽东巡视长沙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七日，毛主席的专列夜间抵达湖南长沙。

到达长沙的当晚，毛主席同华国锋、卜占亚谈话，汪东兴也参加了。

卜占亚当时是湖南省军区的政委，毛主席对他不太熟悉。谈话开始时，毛主席先问了卜占亚的简历。然后毛主席又问汪东兴是否向刘兴元、丁盛、华国锋、韦国清传达了他前几次的谈话内容，我说传达了。毛主席说他明天要找他们谈话。

毛主席接着对华国锋、卜占亚又谈起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斗争中。他说：中国党有十次要分裂，没有分裂成。

毛主席扳着手指算着，讲了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等人的几次路线错误。

他说：当时，传说开除了我的党籍（指井冈山斗争时期——作者注）。不是党员就不能当党代表了，但可以当师长。我们一个师有两个团，一个是农民起义的团，一个是袁文才、王佐的团。南昌起义是正确的，但不上井冈山，想依靠外援，后来又打回湘南，我带了一个团到湘南去接他们。到了桂东沙田，我讲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逐步发展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一回我们没有接到朱德、陈毅他们，但接到了萧克。回到井冈山时，说朱德他们已到了宁冈。我们在宁冈会师。他们又说我可以当党代表，又让我当上了党代表。王明他们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夺中央的权四年之久，写了《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提出一省或数省首先取得革命胜利。他们讲不断革命，托洛茨基也讲不断革命，马克思也讲过要不断革命。我们讲不断革命是有阶段的，我们首先进行了民主革命，而后又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这就叫作不断革命论。李立三、王明他们提出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然后就是全国胜利。可是我们进行了几十年的民主革命，1949年才到了北京，还没有宣布我们胜利了。当时我们只是说这是第一步，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后来我们进行了土地改革，对资本家实行赎买政策。赎买政策实际上是我们和资本家的关系问题。资本家他们要进行生产，没有原料，我们供给他们原料，他们生产出来的东西归我们国家收买。比如你要织布，你没有棉花，不准

许资本家自己到处去买棉花，我们供给你棉花，你织出来的布也不准自己随便卖，要由国家收买。当时我们提出来的口号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我们这样做了几年。全国解放的时候，官僚资本占 80%，还有民族资产阶级，另外还有一些小企业主。怕他们干什么？过了几年，他们还不是敲锣打鼓欢迎公私合营了嘛？其实他们是表面拥护，心里是假的，假的也好嘛。

毛主席接着说：你们对民主党派的问题要研究研究，看还要不要？一个是要认识一下。还有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问题，有人说不要了，也不给利息了。我说不行。有的小资本家不要利息，大的资本家是不愿意的。应该拿一点利息。

毛主席肯定地说：民主党派还要存在。有的地方说不要了，不要太急了，急不得。你们湖南有个人叫周世钊，是个名人，是我的老同学。五一节周世钊来了，上了天安门。我问他民主党派还要不要，这个人算是个老实人，他说民主党派里也有现行反革命分子，有些历史上有一点反革命行为。这是对个人讲的。对民主党派来说，他们没有搞翻案，他们也没有发指示。作为民主党派来说，还是可以存在的。但作为民主党派内部某个人来说，有的人是有问题的，少数人问题很严重。他们中间也有左派。也有中派，也有右派。不要笼统地说民主人士都好或都不好。毛主席接着说：有些民主人士挨了斗，挨了批，有的拖了一两年了，问题也没有解决。不仅民主人士没有解决，什么“五一六”啊，他们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啊，有的是挂起来了嘛。应该把民主党的牌子都挂起来，因为我们国家在搞文化大革命中间，有的还不正规，把民主党派搞掉了，有什么好处呢？一个“拖”字解决不了问题，存在的问题在他们挂起牌子以后，可以再了解、再调查、再处理嘛。毛主席讲完这段话之后，又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并带着大家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唱完歌后，毛主席说：你们不光要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们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它的要求去做。你们找几本《国际歌》看看，《国际歌》里边什么都有了。你们明天就把《国际歌》念一念，议一议，谈一谈。不要每一句都搞对照，找目前最需要的要求去做。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结果我们党内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活动。这次不做结论，也是分裂行动了。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到了共产主义，斗争的性质可能有变化，一万年或几万年以后，

错误的东西也还是会有有的。但是那个时候文化水平高了，犯错误的人觉悟比较快，能及时认识改正。对犯错误的人，不管他怎么样，不要杀人。搞斗、批、改，也要搞得温和一些。

这时，毛主席表扬汪东兴在中南海的工作中正确地对待反对过自己的人。他说：他的办法好，凡是骂过他的，他都用了。

毛主席接着说：我这个人不大着急。在井冈山的时候，不是听说他们要把我开除党籍吗？我想你开除我的党籍，我也不着急，开除就开除吧！后来，他们说我被开除了党籍，就不能当党代表了，叫我当师长。在闽西的时候，把我下放了。我想下放就下放。你下放我，我就做群众工作嘛。开除我的党籍，有的同志想不通，要报告中央。我给他们说，开除党籍就开除嘛，还报告中央干什么。在湘赣边区一本油印的小册子上，我看到他们讲为什么要开除我的党籍。原因是说我讲了一句错话，叫做什么“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们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

毛主席讲到这里时，专列上的服务员拿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词，毛主席叫吴旭君、张玉凤来，一起唱这首歌。当我们唱到三大纪律的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时，毛主席说：等一等，这一条非常重要，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分成两派，怎么样能得胜利呢？

毛主席风趣地说：这句话要改为“步调不一致，一定要失败”。

我们唱过三大纪律的第二、第三条时，毛主席说：这两条问题不大。

当唱到八项注意的第一条“说话态度要和好，尊重群众不要耍骄傲”时，毛主席说：停！等一等，这一条也很重要，对待群众是不能耍骄傲，特别是我们的高级干部。我批示的济南军区的那个报告上说了：“把自己看成一朵花，把别人看成豆腐渣”。你带部队，你当过排长、连长，如果传到你的村里去，就了不得了。

毛主席接着说：到了村里边，你就不得了啦。特别是当了营长，更不得了啦。我们说话要和气，不要耍骄傲。

当我们唱到“第二买卖价钱要公平，公买公卖不许逞霸道；第二借人东西用过了，当面归还切莫遗失掉”时，毛主席说：这两条问题都不太大。好像现在还有这个习惯。

当唱到第五条“不许打人和骂人，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时，毛主席说：等一等，这条问题大。当了班长、排长、连长，不得了啦。听说还有骂人的，甚至有打人

的。听说不是有人把连长打死了吗？这就是和打人、骂人，教育不妥有很大关系嘛？我们讲要遵守纪律，一定要有自觉性。

毛主席又讲到部队的教育和练兵问题。他说：过去我们部队里搞军事训练、制式教练。从单兵教练、排教练、连教练到营教练，大约搞五六个月的时间。现在是只搞文不搞武，我们的军队成了“文化”的军队了。

毛主席接着谈到在军队开展的“三好”运动。他说：一好带三好，你那一好也许带得对，也许带得不对。还有那些积极分子代表会，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有些是开得好的。也有好多是开得不好的，主要是路线问题，路线不对，那积极分子代表会就开不好。你在那里搞什么所谓“超天才”。有人说我是天才。我只读了六年土学堂，七年洋学堂，我算什么天才呢？青年人，哪有那么多天才呢？青年人有个脾气，我批示的济南军区报告上说“看自己一朵花，看别人是豆腐渣”。对这个问题老年人、中年人也得注意。

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唱完后，毛主席要求大家把最后一句“革命纪律条条要记清，人民战士处处爱人民，保卫祖国永远向前进，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重唱一遍。

重新唱完这句后，毛主席说：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特别是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几条记不清了。如果都能记清，都能这样做，那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这样我们多好呀！特别是第一条，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要做到步调一致，经常商量商量，统一思想，这样才能步调一致嘛。还有一条，不要骄傲，就是不要骄傲自满，有军阀作风的一定坚决克服掉。

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八日晚上九时，毛主席找了广东的刘兴元、丁盛，广西的韦国清和汪东兴谈话。

毛主席对刘兴元、丁盛不很熟悉。在谈话开始时，分别问了他们的简历，还问了一些有关部队的情况。毛主席谈家常式地提问和了解情况之后，开始了正式谈话。毛主席对刘兴元、丁盛说：韦国清同志，我比较熟悉。你们两位，我不怎么熟悉。毛主席问韦国清：韦拔群和你都姓韦，是不是一家子呀？

韦国清回答说：是五服以外的，不是五服之内的。韦拔群到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接受过主席的教育。他回广西开展群众工作带回几本书，就在东兰县办

起了农民运动讲习所。

毛主席说：不能说 he 向我学习了什么。名义上，我是先生，他是学生，实际上，他是先生，我是学生。要做先生，先要当学生。广西的事，他比我知道得多。可惜这位同志已经牺牲了，我对他很怀念。

毛主席又说：彭湃是广东海丰县人，家里是个大地主。他在海丰地方工作时，有一次几万群众朝拜观音菩萨，有人问他去不去参加，他说去参加。这样做是对的。他参加朝拜后，就对农民说，观音菩萨靠不住，还得靠自己才行。于是，就拿起了棍棍棒棒闹革命。他这个人善于鼓动，不善于搞组织工作。搞群众工作不怎么扎实，搞得不怎么好，后来牺牲了。他发动群众时，曾经拿自己家里的钱发给农民来搞群众运动。

接着，毛主席又把话题转到党的历史上的几次路线斗争上来。

毛主席说：你们了解党的历次路线斗争吗？我们这个党有五十年的历史。中国这么大，山头又这么多，可是没有搞成分裂。你们说怪不怪呀？从五十年的路线斗争算起，一共有十次。

毛主席在讲到陈独秀组织“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时，又提到了刘仁静、彭述之的名字。

毛主席谈起井冈山时期的斗争，说：当时，瞿秋白他们在湖南弄到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话，他们就大为恼火，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撤了。以后，又说中央委员也撤了。不知道怎么传到了井冈山，说把我的党籍也开除了。于是，有人就不服气，要向中央写报告。我说不要写，开除有么事要紧。我既然被开除了党籍，就不能当党代表了。但他们说可以当师长。到后来又说我可以当党代表。那时，我们只有两个团，一个是秋收起义军编成的三十一团，一个是袁文才、王佐的三十二团。以后，成立四军了，朱德同志当军长，陈毅同志当政治部主任，我当党代表。在闽西开会，叫我下台。后来有人又叫我上台，我就上台了。再有就是李立三搞了那么一阵子。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夺了权，搞了四年。中央五中全会，我是政治局委员，说是不让我参加会。

1935年 1月，开政治局扩大会，张闻天、王稼祥和我主持的，这就是遵义会议。张闻天作报告。我是好比一个菩萨，被放在尿缸里，沉过几下，臭得很。

这次会议以后，我管事了。前面讲的这五次，我都无能为力，他们不听我的。

毛主席接着说：以后出了个张国焘，搞分裂。叶剑英同志在这件事上立了一大功，张国焘打电报给陈昌浩，说：“乘势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叶剑英同志是前敌的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拿出来，给我看了，所以我们才走的，不然当时我们那些人就当俘虏了。在这个关键时刻，叶剑英是有功劳的，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

毛主席说：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那时军队如果不到西北，哪里还有根据地，后来怎么能搞到华北地区、东北地区的根据地呢？到了陕北，张国焘又逃跑了。他是很害怕胡宗南的，后来又跑到西安胡宗南那里去了。张国焘如果不跑，要给他当政治局委员，你们信不信？

毛主席说：以后就是高岗、饶漱石，想夺权。还有去年庐山会议。这次会议搞出来的那些东西，我看他们搞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这就是他们的纲领。他们是有组织的，瞒着人去搞的。中央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二中全会前一段开得不好，后一段开得好，引起大家对读书学习的重视。

毛主席对刘兴元、丁盛、韦国清等人强调说：近一个时期以来。我的方针有三条：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起来，不要搞山头主义；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办法也有三条，就像程咬金的三板斧，一个是甩石头。头一块石头是批陈伯达搞的语录。第二块石头是批三十八军的报告。他们整三十八军实在是恶劣，对自己的队伍怎么能那个样子的整法。整二十四军、整三十一军、整六十九军、整三十八军，为什么要整？第三块石头是批济南军区的报告，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第二个办法是掺沙子。第三个办法是挖墙脚。

毛主席问他们：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样看法？

毛主席接着说：犯了错误，就做检讨。你们犯的错误，不就是拥护我这个天才，要我当主席。我怎么能是天才呢？我读过六年孔夫子的书、七年资本主义的书，1918年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管理员，可不简单呢！一个月的薪水八块大洋。不过宿舍很小，冬天很冷，没有煤炭烧炕。我们八个人挤在一个炕上，不能平着身子睡，只能侧着身子睡，面积不够。那七个人都是要出国留学的，到法国搞勤工

俭学的。那时图书馆里有暖气，我晚上就到那里去睡觉，又取暖又看书，开始看马列主义的书。我就在这个时候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

讲完党的历史上所发生的路线斗争之后，毛主席转向韦国清。他表扬韦国清，说：我看你这个人太文了一些。打莫边府的时候，你是坚决主张打的。开头他们不听你的，你很厉害，他们就听了。

韦国清说：我是根据主席的指示办的。

毛主席问韦国清说：你们那个民族(指壮族——作者注)，人口增加了一些吗？得有四五千万人了吧。可以编几十个师。南方几个省能打仗的，第一是广西，第二是广东，第三是湖南，你(指汪东兴)那个省(即江西——作者注)算第四。

讲到这里，刘兴元汇报了工作情况。毛主席听完汇报，说：陈独秀那个人是不讲民主的。今天我听你讲了十分钟，陈独秀办不到，他不听。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始他不同意，后来说同意啦。我说，那就请你通知招生吧。我开始招生的名额当中，他说农民比例太大，工人比例太小，不行。其实那时农民四万万人口，工人只有二百万，应该多培养农运干部。不过陈独秀也有个长处，就是不爱财。他穿的衣服倒都是干干净净的，办公桌上的东西都是摆得整整齐齐的。

接着，丁盛向毛主席汇报说，在延安整风中学过两本书，对他帮助很大，后来还参加过“七大”。

毛主席听后说：你参加过“七大”，了不起呀！你们(指刘兴元、韦国清、汪东兴)有没有参加呀？汪回答毛主席说：我参加了。我是“七大”的候补代表。

毛主席随即谈到要学习理论，讲到延安整风学习的事。他说：延安整风时，提出来要编书。后来叫王首道负责编书，编出来后，不行。改由胡乔木编，这个人有点知识，他收集和研究了那么多的文件，编了两大本，印出来，让大家讨论。通过学习，这才把问题弄得比较清楚了。

毛主席转向丁盛问：你打过些什么仗？

丁盛回答说：打过锦州。

毛主席说：打锦州时，有一个部队把蒋介石的增援部队挡住了，打得好。

讲到打锦州，毛主席想起一个动人的故事，他兴奋地说：我听说打锦州的时候，部队住在苹果园里面，不摘苹果吃。我就说，我们的部队有希望。

毛主席接着说：到了北京时，就有人提出要给部队增加军饷，说资本家吃大米、

馒头，我们的部队吃酸菜，生活太苦了。增加军饷才能和资本家比。我说我们的军队只吃酸菜，又能打仗，这就很有希望。为什么要增加军饷呢？提这个意见的人，是代表吃酸菜阶级的人说话的。

毛主席跟着强调：军队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要犯错误。我很久没有抓军队工作了，现在要抓军队工作。抓军队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要讲团结这些事情。进城以后，管军队工作开始时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他是打了胜仗的人嘛。以后就是林彪。他管不了那么多，实际上是贺龙、罗瑞卿管得多。以后是杨成武。再以后是黄永胜当总长，又是军委办事组的组长。办事组里面有一些人，在庐山会议上搞出那么些事来。我看黄水胜这个人政治上不怎么样强。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上也要谨慎。军队要谨慎，首先不要搞山头主义。庐山会议上他们搞的那些语录，李德生同志就有意见。我说李德生这个人好蠢，你不是那个山头的人，别人的山头可以给你呀？好的宝贝怎么会给你呢？

说到这里，毛主席沉思一会，把谈话内容转向“天才论”。他说：《国际歌》里面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全部的立场、观点。你们看，那里面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七百字的文，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你们都讨论了吗？《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学马克思主义就讲团结，没有讲分裂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个歌，你们要注意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

接着丁盛汇报他的战斗经历。当讲到冀东暴动的情况时，毛主席说：邓华这个人，跟着别人犯过错误，我对这个人寄予希望。杨勇被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钟赤兵这个人被敌人打掉了一条腿，是在娄山关被打掉的，你们不要歧视他。他是打娄山关负伤的。当时我看见一副担架抬着伤员，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他叫钟赤兵，当团政委。这个人似乎可以到你们广州军区，科委有人歧视他。

毛主席接着讲学习问题。他说：要认真读书。罗瑞卿当参谋总长的时候，让他和陈伯达商量，搞个读书目录，搞出来了三十本书。我看可以。以后又提出来这样说会妨碍学语录，把学理论的事停下来了。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

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读马、列的书。不好懂，怎么办？也是有办法的，可以请先生帮。边境作战时，有一个部队从生产的地方拉出来，上前线打仗，并且打得很好。我觉得我们的军队很有希望。

当丁盛讲到他自己参军的时间和在红四军工作的情况，毛主席笑着对他说：你不能摆老资格，不要搞宗派哟。

毛主席又指着刘兴元说：你也要注意。

毛主席接着说：韦国清，你虽是红七军的，可也编到三军团了。你们几个人都是我这个山头的啊，可要注意！

毛主席说：你们(指广州军区)写的三支两军的文件，我看了。一些问题解决得不算彻底，但还可以。我在中央的批语上加了四个字：“认真研究”，就是要引起大家重视。我们的干部，大多是好的，不好的总是极少数。不好的要给予适当的批评，好的要表扬，但不能过分。不能捧得太高，比如有人说“超天才”，对二十几岁的人(指林立果)就捧得这样高，这没有什么好处，实际上是害了他。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地方党委定的事，要拿到部队党委来讨论，这不是颠倒了吗？地方没有成立党委以前可以，地方已经有党委了，就不能那样办了。

毛主席最后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和办公室主任，你们这几位夫人怎么样？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免得误事。

今天就讲到这里。

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八日，毛主席与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和汪东兴谈话后，为了领会毛主席谈话的精神，座谈讨论了一次。

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九日，汪东兴将这次座谈的情况向毛主席汇报。

毛主席边听汪的汇报边插话。边交谈。

当汪汇报到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在座谈会上检讨他们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所犯的错误时，毛主席说：现在看来，是马列主义没有学好。

毛主席问汪：你对丁盛、刘兴元了解不了解？

汪说：不了解。只是在开会时有点来往，平常没有联系。通电话也是因为有事要办，没有深谈过。这一次他们谈得深一点，摆了摆思想问题。

毛主席又问：你们知道不知道这里面的原因是什么呢？

汪回答说：主要是学习问题。

毛主席说：对呀。我经常提到这个学习问题。大家在这方面口头上是同意的，但在实际中看法就不统一了。你看，这一次在庐山会议上，搞了一个称天才的语录，自己又不看马列主义的书，陈伯达搞的那一套就相信了，而且照着念，照着引用。

毛主席对汪说：你在会上没有念这个语录。

汪又讲了庐山会议上陈伯达要我打印称天才语录的事，毛主席听我讲完后说：这个没事。你是办公厅主任，你不是有意要打印陈伯达搞的语录。他是常委，他要你打印一些东西也是可以的，以后也没有用上。总理让封存起来，你就封存了，没有扩散。这是对的。

毛主席接着说：你发言被人利用，这是事实。在湖北检讨以后，我对你比较放心了。你没有什么问题。

汪说：我还是有错误。

毛主席说：当然，你发了言嘛。

毛主席对汪说：行政工作、组织工作，你是有一些办法的。你也是爱读书的，马列主义还是要学。我是关心你的。你去党校读了一年，你说你觉得用马列主义联系实际不够。我按你的要求把你下放了三三年。结果。现在看来，要学好马列主义是不容易的，联系实际用好马列主义更困难。你在政治方面运用马列主义要加强，光读马列主义的书还是不够的，还要读点历史，读点经济学，读点小说，读点哲学史。

毛主席讲完这段话后，为了强调学习历史、学会运用历史知识的重要性，讲了一段三国时期诸葛亮巧用空城计的故事。他说：司马懿这个人，怀疑心很重，诸葛亮没有兵力守城，赵子龙一时又赶不回来，城内空虚，结果诸葛亮就对他用了空城计。空城计的故事，能启迪人具体运用战略战术。

毛主席接着说：《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金瓶梅》，这都是文学作品，很重要的，是反映政治性的小说，体现了艺术性和思想性相结合的完美，写得很好，语言也很生动活泼。

毛主席还嘱咐汪把这些话向刘兴元、丁盛、韦国清等人传达，另有机会时向政治局传达。

毛主席当时还考问汪：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汪回答说：三个来源是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是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毛主席见我很快回答出来了，表示满意。

毛主席说：《共产党宣言》这一篇文章写得好。那个时候。马克思、恩格斯写《共产党宣言》时比你年纪小。只有三十岁左右。你看人家！

毛主席说：在党里为人也好，在社会上为人也好，个人为人处事也好，都要以团结为重，要辩证地看人，两点论地看人，变化性地看人。一分为二是辩证的嘛，二点论也是辩证的嘛。

毛主席说：为人不可太认真了，水至清则无鱼；不看书不懂文学，不做工作不懂事。你干事太认真。这样的话就好比水太清了，鱼就无法生存了。

一九七一年八月三十日，毛主席在离开长沙去南昌的前夕，又找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谈话。汪东兴也参加了。

谈话一开始，毛主席就问大家：你们谈了两天了吧，怎么样？

各人简要地汇报了两天中学习讨论主席指示的情况。

听完大家谈过以后，毛主席针对林彪一伙人的问题发表意见说：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作。九十九人的会议（指1971年4月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议。），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位大将的检讨（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人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做了总结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大家也都认为陈伯达做得不对，搞了一个称“天才”的语录。什么论“天才”，二中全会做了相当的结论，《我的一点意见》就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能靠一个人吗？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嘛。

接着毛主席谈到党的状况和党的历史问题。他说：全党人多，我们党有二千多万人，坏人不过是百分之一。这百分之一呢，叫做“吐故纳新”。还要挂起来一点，不过不多了，清理和挂起来的，就算百分之三。党内还有落后的分子，或者比较而言的。这些问题几年之后，或者十几年之后才能做结论。因为现在不打仗，没

有陈独秀。那个时候(指民主革命时期)是天天打仗，是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形势，很快就表现出来了。陈独秀他们 81 个人跑出去了，发表了声明。八七会议前，采取南昌暴动的政策是对的，南昌暴动基本上是正确的，后来是路线上犯了错误，但是取得了经验也是好的。城市不那么搞了，靠外援靠不住的，还得靠自己。没有兵怎么办？靠发动群众，还有俘虏兵嘛，他们也是群众。因为他们是国民党抓兵抓来的。

我们把他们俘虏过来，就是把他们从敌人那里分裂出来。

毛主席再一次提出：听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不注意了。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第五条，都很重要。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没有政策怎么样做工作呢？要很好地抓住重点，学习和讨论，不借鉴历史和政策，怎么行呢？当然现在你们还不能向战士们讲庐山会议的问题啦。

毛主席又说：庐山会议他们为什么要搞这个，收场又这么快，我们也不懂。刘建勋同志说搞了一天半，我说搞了二天，从开始的那一天，他们就搞起来了。

毛主席接着谈到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伙的问题：如果你们有理，你可以坚持，为什么那股妖风刮了三天就不利了呢？为什么要收得那样快呢？各大组组长都参加了政治局常委会的讨论，说要收回简报。你们的组长是谁呀？

毛主席说：总而言之，将来要把简报发给大家看。大家评论，是革命的，是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不要受群众落后议论的影响。这些落后的包括你们在内。不然的话，为什么被人家一股台风一卷，就把你们卷进去了。

毛主席说：军队历来就是讲雷厉风行的作风，我赞成。但解决思想问题，不能雷厉风行，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谁有道理听谁的。我历来就没有什么意见的，我的意见都是下边来的，下边是供应站。陈伯达给我几条语录，三十八军给了我一个报告，汪东兴那个自我检查，济南军区的反骄破满的报告，刘子厚也给了我一点材料。我有什么东西呀？我是向他们学的，然后我就打石头。

毛主席说：我看今后你们也应该这样。你们有什么学问呢？我不清楚。无非是找工人、农民开上两个会，然后总结一下。有些人一总结就说什么英明、伟大呀！英明领导啊！其实我算什么英明领导，一说英明领导，我就不寒而栗。我并不是什么英明领导，我不过是在下面的报告上批上几个字，写上几句话，下面供给材料给我的脑子进行加工。

毛主席接着说：你们都说过英明领导吧？当然，没有领导不行。没有一个英明领导，那你那个广东省怎么能管得起来呢？广州军区三个省有 1 亿多人口，你们管得起来吗？不过你们心中要有个数，不要在报纸上登。我到处走一走，和你们吹一吹，人数不要太多了。庐山会议上讲了要读书，我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

谈到这里，毛主席指着刘兴元问：你会写文章吗？

刘兴元说：不会。

毛主席指着丁盛说：你呢？

丁盛说：文盲。主席的书还可以看得懂，外国的书看不懂。

毛主席说：那怎么样办啊？请先生帮。你们都是书记，你们还要当学生。我现在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上午一本，下午一本，所以懂得点国际知识。有的人太忙了，只是看了一份《参考消息》，太少。你们没有时间，可以拿来叫秘书、秘书科长们看，他们看了以后，给你们的耳朵里吹一吹风。我看《参考资料》可以多印一点，看的人多一点。如果有的人不看，由他们去。

毛主席回过头来又谈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他说：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我看他呀，那些人帮了他的倒忙。那些人也不和我通气。你们经常和我通一通气，也可以嘛。给你们通气了没有？大家回答说：没有。

毛主席说：我这一次也是给你们通个气吧！要把脑子里的东西向人家讲出来，把正确的、错误的都讲出来，就舒服了嘛。像汪东兴，沾了个边，他在一千三百人的会上做了几次检查，他也没有倒嘛。你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了，倒不了。当然，也有少数人幸灾乐祸。

毛主席讲到这里，看了汪一眼。汪补充了一句说：我一共做了三次检查。

毛主席接着说：少数人说汪东兴下不了台了，但多数人还是说他检讨得好，其中包括我的护士长、服务员、护士都说好。

毛主席望着刘兴元说：我看你这个人比较爽快，说话不那么吞吞吐吐。

刘兴元回答：我有急躁粗暴的毛病。

毛主席说：我这个人也急，要改。军人搞惯了，就是急。急不好。战士才不管你呢。对战士管得要合理，要有理，就是合乎事实，讲道理。你们听了我一吹，又是什么英明伟大呀，又是英明领导呀，又是很多都是新东西呀，没听说过呀！

讲到这里，毛主席转眼看了看大家。

韦国清接上话头说：我们听了很受教育。

毛主席笑着说：看，你又来这一套了吧。

毛主席专门向大家讲了他的谈话与在北京召开的九十九人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谈的有所不同，他说：我说的这些，超过了九十九个人的会议总理作的总结了，是当作个人意见提出来的。比如华北组的简报究竟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还应该讨论。总而言之，它是不大好的就是了。不然的话，为什么要往回收呢？有几位大将，在各组放风，也不是那么妥当的吧。后来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忙收回记录。你看，才有几天呀，翻来覆去的。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

毛主席说：我们的高级干部不成熟。那次庐山会议也不过是二百几十个人，我本人也是二百几十个人中间的一个，还有一些高级干部。这次我给的高级干部吹一吹风，有中央委员，卜占亚他不是中央委员，我也跟他吹了，跟一个军区的政委吹吹风，还不行吗？华国锋同志，你满脑子的农业，当然，你也讲了农业路线问题，可是光有你的农业也不够，还要考虑到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回去能吹的就吹，不能吹的就守纪律，试试看。我一个人不能做决定。不要普遍搞，你们要个别的吹一吹风。

在谈到当时各地召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问题时，

毛主席说：过去，积代会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北京开的有缺点。首先是总参谋部召开的那个积代会，他讲“大树特树”，别人一句也不能讲。听说他那里有一个护士，说了一句不赞成的话，他们就不饶她。“大树特树”，不妥当。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其实是树他自己。我还要他来树吗？现在我已经树得了不得了嘛。

毛主席接着说：后来，国防科委开的积代会也不好。国防科委开积代会，有人还打电报祝贺，其实这是造声势，找一班人拥护自己。

毛主席对刘兴元、丁盛说：你们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怎么得了呀？他是办事组里边井冈山的独生子。

毛主席说：黄永胜是湖北咸宁人，17岁就当兵，原是叶挺部队警卫团的一名战士，这个团没有赶上南昌起义，在江西修水参加了秋收暴动，然后上的井冈山。

毛主席说：现在南方干部比较少了，高高在上了，稀稀拉拉了。北方干部多起来了，我很高兴，但是不要翘尾巴……总的来说，我们是有缺点的布尔什维克，这也没有关系。

毛主席特地嘱咐说：不要公开讲这次庐山会议，因为中央还没有作结论，你们只是说九次路线斗争就可以了。这是说现在的路线斗争还有些问题，

不要像我跟你们说的这一套。但是，我们军队应该进行教育，所有的高级干部都应该弄清楚我和你们吹的这些。军长、政委那么多，怕来不及。其实人家都知道了，什么“小小老百姓”啊！“小小老百姓”是谁呢？河北人都知道。总之，就是路线问题、山头问题、团结问题。我是程咬金的三板斧。我是到处讲。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或者一个一个的，或者三个四个的，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

毛主席接着说：方法就是三板斧，甩石头、挖墙脚、掺沙子。陈伯达这个“小小的老百姓”，他搞挑拨离间，他的话也不讲完。我们现在在下边，也不公开批评，批陈整风我们还叫批修整风。我们党是有纪律的。庐山这场斗争，还没有听到外国人说什么，华北开了一个多月的会，后来他们又开了三个月的会，可是没有发现外国人说什么。总而言之，无论干部、战士，全国党员有二千多万，讲百分之三的话，稍微大了一点吧？（这时大家插话说：百分之三大了一些，吐故纳新只有百分之一左右，包括挂起来的，不到百分之二。）现在我希望你们试试看，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这个问题很简单，不要那么长篇大论的报告。

讲到这里，毛主席看了看桌子上的表，说：今天我要走了，我这一路都要谈下去。

韦国清又表示：主席的谈话，对我们教育很大。

毛主席说：又是英明了吧，从来没有听说过吧。九十九个人的会议，已经刚讲了吧。马克思经常讲，不要看人家的声明，要看行动。声明无非是讲在口上，写在纸上，那比较容易，真正地实现，就难了。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可能要看几年、十几年、二十年吧。人们说：盖棺论定。我说有的人盖棺也不能论定。斯大林不是盖棺论定了吗？没有论定。

这时，毛主席又引伸地谈到斯大林的问题。毛主席说：斯大林搞雅尔塔协定，他们要瓜分世界，把中国的蒙古（指当时的外蒙古）划出去，把新疆、东北划给苏联

的势力范围，别国不能去；把日本划给美国的势力范围，你们知道不知道呀？

毛主席接着谈起中苏关系，他说：在朝鲜打仗时，两国关系比较好一些。《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和雅尔塔协定是两种不同的问题。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在内部争论时，他们说东北、新疆不容许第三人进入，我们说东北还有二十万朝鲜人，有的还没有加入中国国籍，怎么办？

他们答不出来。还有他们不许我们夺取政权，苏联共党始终是反对的，有电报还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斯大林曾给我们党来电报，说不能打内战，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灭亡的危险。

毛主席针对这个问题说：如果说国家有灭亡的危险还可以，民族怎么能灭亡呢？所谓民族，就是讲人嘛，几亿人口的大国，怎么能灭亡呢？我是顶了他们的。我们党内也有相当的人当时不想夺取政权，也不讲夺取政权。

毛主席再三说：我讲党的十次路线斗争问题，没有一次把党分裂掉的。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苏联形成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我们党分裂的基础是有的，特别是王明的那一次。

在座的有人问毛主席：对高岗、饶漱石，苏联是不是拉了他们一下。

毛主席说：拉是拉了他们一下。

毛主席说：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过去张国焘搞分裂，把共产党的武装对立起来，但没有搞成。

在结束这次谈话时，毛主席鼓励大家：很有希望。还是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团结起来。

贰、本节简论

毛泽东巡视长沙主要有四次谈话：

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七日晚，毛泽东同华国锋、卜占亚、汪东兴谈话。

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八日晚，毛泽东同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和汪东兴谈话。

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听汪东兴汇报刘兴元、丁盛、韦国清等人座谈的情况的谈话。

一九七一年八月三十日，毛泽东同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汪东兴的谈话。

毛泽东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在武昌谈话的基础上补充了一些新内容：

1，我们这个党有五十年的历史。中国这么大，山头又这么多，可是没有搞成分裂。从五十年的路线斗争算起，一共有十次。

我讲党的十次路线斗争问题，没有一次把党分裂掉的。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

2，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我看他呀，那些人帮了他的倒忙。

3，他们搞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他们是瞒着人去搞的。中央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二中全会前一段开得不好，后一段开得好。

4，我写了一个七百字的文，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什么论“天才”，二中全会做了相当的结论，《我的一点意见》就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能靠一个人吗？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嘛。

比如有人说“超天才”，对二十几岁的人就捧得这样高，这没有什么好处，实际上是害了他。

5，庐山会议他们为什么要搞这个，收场又这么样快，我们也不懂。刘建勋同志说搞了一天半，我说搞了二天，从开始的那一天，他们就搞起来了。如果你们有理，你可以坚持，为什么那股妖风刮了三天就不利了呢？为什么要收得那样快呢？

6，把简报发给大家看。大家评论，是革命的，是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

7，总参谋部召开的那个积代会，他讲“大树特树”，别人一句也不能讲。听说他那里有一个护士，说了一句不赞成的话，他们就不饶她。“大树特树”，不妥当。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其实是树他自己。我还要他来树吗？现在我已经树得了不得了嘛。

后来，国防科委开的积代会也不好。国防科委开积代会，有人还打电报祝贺，其实这是造声势，找一班人拥护自己。

8，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和办公室主任，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免得误事。

我看黄水胜这个人政治上不怎么样强。你们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怎么得了呀？他是办事组里边井冈山的独生子。

9，我的方针有三条：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起来，不要搞山头主义；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我们的办法也有三条：

第一个办法是甩石头。头一块石头是批陈伯达搞的语录。第二块石头是批三十八军的报告，第三块石头是批济南军区的报告，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

第二个办法是掺沙子。

第三个办法是挖墙脚。

10，九十九人的会议(指1971年4月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议。)，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位大将的检讨(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人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做了总结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

声明无非是讲在口上，写在纸上，那比较容易，真正地实现，就难了。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可能要看几年、十几年、二十年吧。人们说：盖棺论定。我说有的人盖棺也不能论定。

11，抓军队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要讲团结这些事情。

要认真读书。罗瑞卿当参谋总长的时候，让他和陈伯达商量，搞个读书目录，搞出来了三十本书。我看可以。以后又提出来这样说会妨碍学语录，把学理论的事停下来了。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

要学好马列主义是不容易的，联系实际用好马列主义更困难。

听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不注意了。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第五条，都很重要。这是重点。

12，我说的这些，超过了九十九个人的会议总理作的总结了，是当作个人意见提

出来的。

回去能吹的就吹，不能吹的就守纪律，试试看。我一个人不能做决定。不要普遍搞，你们要个别的吹一吹风。不要公开讲这次庐山会议，因为中央还没有作结论，你们只是说九次路线斗争就可以了。这是说现在的路线斗争还有些问题。不要像我跟你们说的这一套。但是，我们军队应该进行教育，所有的高级干部都应该弄清楚我和你们吹的这些。其实人家都知道了，总之，就是路线问题、山头问题、团结问题。我们现在在下边，也不公开批评，批陈整风我们还叫批修整风。

毛泽东在这些谈话中强调指出：我们党有五十年的历史，经过十次路线斗争，党没有分裂。这说明我们党是有希望的。这其中的经验教训也值得深入研究。毛泽东认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

毛泽东在这些谈话中第一次公开点了林彪的名；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

毛泽东在这些谈话中把林彪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搞突然袭击的纲领进一步概括为：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

毛泽东在这些谈话中对《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作了进一步阐述：我写了一个七百字的文，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就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能靠一个人吗？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嘛。

毛泽东在这些谈话中对林彪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搞的突然袭击明确指出是搞阴谋诡计：中央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他们为什么要搞这个，收场又这么样快？为什么那股妖风刮了三天就不利了呢？

毛泽东明确指出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的阴谋活动搞了三天而不是一天半：有人说搞了一天半，我说搞了二天、三天。因为这关系到对林彪八月二十三日的讲话怎么评价的问题。林彪的讲话是整个阴谋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还是在此之外？

毛泽东明确指出九届二中全会上发生的事件，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

2009年9月初稿

2012年4月

第五章第三节 毛泽东巡视南昌

第一部分 本节概述

一九七一年八月三十一日，许世友、韩先楚下午 5 点钟左右先后抵达南昌。他们到了以后，由汪东兴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向他们和江西的程世清三个人传达了毛主席在湖北、湖南的谈话内容。从下午5点半开始，到7点半结束，共传达了两个小时。

一九七一年八月三十一日晚 9 点，毛主席抵达了南昌。

晚上10点多钟，毛主席就同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和汪东兴开始了在南昌的第一次谈话。

毛主席开门见山，讲党的历史和路线斗争问题。他说：中国共产党的十次路线错误，是要分裂党，但没有分裂成。

毛主席对许世友说：在长征路上，张国焘搞分裂，他们成立伪中央，你是清楚的。许世友赶紧说，伪中央没有他，有陈昌浩等人。

毛主席接着说：陈独秀搞分裂，有 81 个人组成“中国共产党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

头一名是陈独秀，第二名是彭述之，第三名就是刘仁静。他们还发表了文告

毛主席接着又谈到庐山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问程世清说：去年的庐山会议，吴法宪向华东空军系统的王维国、陈励耘、韦祖珍这几个人打了招呼，有没有你程世清呀？’

程世清赶忙对毛主席说：我有错误，吴法宪对我有影响。主要的错误是我的思想没有改造好。

毛主席又问许世友说：许世友同志啊！你与上海、浙江的关系有些紧张、有些问题呀？

许世友马上回答毛主席说：我与上海的关系比较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春桥一直是保我的，一直是为我说话的，并且有我的大字报时，他还派人去覆盖。

毛主席说：覆盖不对。不应该覆盖嘛，让人家去看嘛。有什么关系呢？

许世友说：我与王洪文的关系也比较好。

毛主席对许世友说：你这个许世友呀，应该高抬贵手，刀下留人。

许世友说：哎哟，我和浙江南萍的关系请中央派人来调查。

毛主席说：据说舟山的问题到现在没有解决。你这个司令员没有责任呀？那样搞武斗，南萍有责任，但是都是南萍的责任吗？

毛主席转向韩先楚问道：你是湖北人吧？

韩先楚回答说：我是湖北人。

毛主席说：湖北的人我认识得很多，也可以说是不少吧。有个李求实是湖北人，有项英是湖北人，有黄富生，有施洋，有董必武，还有恽代英，这些都是我们党的名人嘛。这些都是湖北佬。

韩先楚只是笑，没有说话。

毛主席兴奋地说：湖北出人才呀！

毛主席接着说：汪东兴向你们传达了武汉、长沙谈话的内容，讲了庐山会议的问题。缔造人民解放军、领导我们军队的人，能缔造、能领导，就不能指挥吗？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呀？另外，我们这个军队是不是哪一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或者是哪几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我看不是，人多着呢。朱德、恩来、贺龙、刘伯承、叶挺，这么多人发动的南昌起义，他们就不能指挥了吗？

毛主席接着指出：南昌起义后，由于在指挥上、路线上有错误，起义军南下广东潮、汕地区与敌人作战，结果损失很大，最后余部又被迫返回到江西、湖南一带。毛主席又说南昌起义以后，指挥上、路线上有错误，想依靠外国人。朱德同志当时到了桂东地区，他有一个同学、朋友，姓范，叫范石生，关系不错，搞到一起，范送了他一点枪、钱、衣。

毛主席再次说：军队的缔造者、领导者就不能指挥，这是不对的。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我们党内还有很多同志是领导兵暴的、领导军队的。

毛主席说：张国焘在长征路上搞政变，他也是缔造者、指挥者。但是，他指挥军队搞分裂，拿军队作为本钱来搞分裂，那就不好了。长征时，同我们一起的右路纵队，有四军、二十军，这两个军同我们一起过的草地。他们当时把枪丢给干部

团的学生，我还是要他们把枪带上，他们愿意回去就回去，张国焘有命令嘛。他们不愿意回去，我们也欢迎。当时不能帮忙，军队不能帮忙，都拿着枪啊。张国焘打电报让他们回去，他们也愿意回去，那就回去吧！李先念和许世友都是和我们一起过的草地，后来还是回去了。

毛主席对许世友等人说：你们和张国焘是一个部队的，你们要接受这个教训。后来你们不是和我们又会合在一起了嘛。

这时许世友转换了话题。他对毛主席说：主席呀，有“五一六”分子怎么办呀？

毛主席说：怎么又谈到“五一六”啦？

许世友说：“五一六”在南京相当厉害。文凤来是“五一六”分子，这个人到上海，要毒害毛主席。

毛主席问许世友说：毒害我的事，你们查清楚了没有呀？

许世友回答不出来。

毛主席说：这件事，你们要查清楚，不忙作结论。

接着，毛主席问许世友：你们南京军区不是有一个有名的王、林、鲍吗？还有别的人？他们都是造反派吗？

毛主席是指除了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王必成当时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林维先当时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鲍先志当时任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之外，还有一些干部，难道他们都是造反派。

许世友说：他们都是造杜平的反。

毛主席反问许世友：他们为什么不造你的反？

许世友回答说：不。他们不造我的反。

毛主席对许世友说：你这个地方缺少一个“宰相”。“宰相”很重要啊！我准备另找一个政委帮帮你的忙。

最后，毛主席又提出了学习的问题。毛主席说：现在有个口号，叫作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人民解放军。要加一条。人民解放军学全国人民。

这是毛主席在南昌的第一次谈话，大约谈了 1 个半小时左右。毛主席谈完后。时间已到夜间零点。毛主席要汪东兴组织许世友等座谈一下。

一九七一年九月一日，毛主席休息。

这天下午，几位司令员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进行了座谈。

当天下午给毛主席检查身体，发现体温升高了，38度多。患了感冒。

晚上卧床休息。

一九七一年九月一日，毛泽东单独接见程世清。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日上午 8点钟，毛主席就起床了。毛主席问汪东兴：我们要走了，怎么办？

汪东兴说：您看呢？

毛主席说：还是见他们一下吧。

汪东兴马上就通知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来。可是怎么也找不着他们。找了半个小时，才知道他们打猎去了。

毛主席这一次与他们见面谈话的时间不长，比较简单。

毛主席对他们说：今天我要走了，汪东兴同志向你们传达的我在路上谈话的情况，你们也谈了谈。你们昨天座谈得怎么样？有什么新的意见没有？

韩先楚先发言。他说：我在座谈会上说，要听毛主席的。九届二中全会我们大家都起了哄，我们犯了错误，我们做自我批评，请主席放心。

许世友请示毛主席说：主席，您到浙江找不找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许世友提问毛主席的是不是要解决他与南萍闹矛盾的问题。

毛主席不准备解决这个问题，便说：不谈这个问题。到浙江不谈这个问题啦！

许世友问毛主席说：我回去吗？

毛主席说：你回南京去吧。下午我也走了。

大家再也没有说什么。

9月 2日上午的这次谈话， 40分钟就结束了。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日，毛泽东单独接见程世清。

毛泽东两次单独接见程世清的谈话主要内容如下：

程世清向毛主席报告：

一九七0年八月二十四日零点，庐山会议期间，吴法宪打电话要我去汇报华东组

的讨论情况，并带我到叶群那里。四大将一定有什么把柄被叶群抓住，先把四大将的问题弄清楚，叶群的问题就弄清楚了。

一九七一年七月，周宇驰曾两次来南昌，并运来一辆水陆两用汽车，要江西仿制。七月义再来时很神秘，把改装的水陆汽车很快用飞机运走，我怀疑他们要逃跑。林豆豆几次来江西，对我说：你见到主席也说说，叶群好多事包括到政治局开会，瞒着首长，林立虹也不知道在下边干什么。林豆豆还要我少与林家接触。从林豆豆的言谈中可以看出她与家人有矛盾。

在延安党校时就有传说，叶群是特务，也有人怀疑，林彪的病是叶群搞的。

林彪这么多年脱离实际，形而上学的东西很多，比如在部队搞四好、五好，弄的矛盾很多，相互不团结，事故很多，副作用大。

毛泽东说：你可以写一个调查报告。这些问题非常重要，将来只准报告总理，别人不能讲。

吃完中午饭后，便离开了南昌。

从南昌到杭州，专列走了近 13 个小时。毛主席在车上一直休息，抵达杭州的时间是9月3日的零点。

第二部分 本节简论

毛泽东巡视南昌主要有四次谈话：

一九七一年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同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和汪东兴谈话。

一九七一年九月一日，毛泽东单独接见程世清。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日，毛泽东同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和汪东兴谈话。

一九七一年九月一日，毛泽东单独接见程世清。

九月二日，毛泽东准备离开南昌，临时通知再次接见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可是找不到，因为他们去打猎了。九月十几日，毛泽东到上海以后，通知许世友去上海，南京军区都不知道许世友到那里去了，许世友说他去了一个军队农场视察农业生产去了。许世友在南昌接见中对毛泽东说：我与上海的关系比较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春桥一直是保我的，一直是为我说话的，并且有我的大字报

时，他还派人去覆盖。我与王洪文的关系也比较好。其实，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倒张”是比较积极的一个。这些事说明当时一些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和作风。

毛泽东在南昌的谈话中突出强调的一个问题，就是批判所谓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指挥的”的说法。他说：缔造人民解放军、领导我们军队的人，能缔造、能领导，就不能指挥吗？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呀？另外，我们这个军队是不是哪一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或者是哪几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我看不是，人多着呢。朱德、恩来、贺龙、刘伯承、叶挺，这么多人发动的南昌起义，他们就不能指挥了吗？军队的缔造者、领导者就不能指挥，这是不对的。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我们党内还有很多同志是领导兵暴的、领导军队的。张国焘在长征路上搞政变，他也是缔造者、指挥者。但是，他指挥军队搞分裂，拿军队作为本钱来搞分裂，那就不好了。

毛泽东的这些话，进一步在这些高级干部面前公开了他与林彪之间的分歧。

毛泽东巡视南昌的一个重大收获，就是进一步了解到林彪集团的一些秘密活动。而且，提供这些情况的是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江西省军区司令员程世清。这些情况涉及到的人有叶群、吴法宪、林立果等这些林彪集团的核心人物；涉及到的事既有政治方面的又有军事方面的。这就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更高的警惕和更深的思考。

2009年4月初稿

2012年5月2日修改

第五章第四节 毛泽东巡视杭州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一年九月三日零点，专列抵达杭州。

毛主席在车上找南萍、熊应堂、陈励耘和汪东兴一起谈了话。

当时，南萍任浙江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熊应堂任省军区司令员，陈励耘任空五军政委。这次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开始谈话时，毛主席问南萍：你们省里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南萍主要汇报了浙江天旱与抗旱的情况。

毛主席听后说：天不帮忙噢！

毛主席很快把话题扯到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上。他问南萍、陈励耘：庐山会议你们有什么错，听说吴法宪找你们谈了，他搞的那一套，说不是有八个人嘛？

毛主席看着陈励耘，又问道：其中有你一个，还有上海的那个王什么（指王维国），还有福建的那个叫什么？是不是就是那几个人。你们空军就八个中央委员嘛？

陈励耘听了立即紧张起来，慌忙解释：在庐山。吴法宪找我布置空中警戒时，阴一句，阳一句。这个人说话不算数的。

毛主席听后顺着说：是啊，说话不准确！

接着陈励耘又说：上山前都不知道他们这些事。

毛主席说：噢，上山前你不知道。空军有，海军有没有？他们是不是内部有通知呀？

陈励耘望着毛主席发怔，未作回答。

毛主席回过来谈九届二中全会六号简报的实质，把问题点得很透。他说：那份简报影响最大，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我也搞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这样搞？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我看他们是恐惧。

在座的人听了都没做声。毛主席接着谈如何正确对待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犯错误的人的问题。他明确地说：我看前途有两个，一个是改，一个是改不了。他们可能改，有的不一定能改。你们是受骗、受蒙蔽。对犯错误的，还是“惩前毖后，治

病救人”。比如说，我当班长，你们三个都是兵，我总是那么凶，抓着你们辫子不放，那么行吗？

陈励耘继续掩饰说，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他不了解情况，跟着犯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

毛主席看了陈励耘一眼，接过他的话题说：要搞唯物论，不要搞唯心论。

接下去，毛主席继续谈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他说：庐山乱了三天，实际一天半，后来停下，逛庐山，到现在一年了。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指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

林彪两次打电话、写信都被他们阻止了。（九届二中全会前，林彪曾经有两次想要打电话、写信给毛主席，但是都被叶群和黄永胜阻止了。）

毛主席继续说：庐山问题不那么好，但没有庐山会议，也不会有现在的情况。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光开不到一百人的会议不行，军队还可扩大到军长、政委参加，地方也要有相当这一级的同志参加。

他说：庐山会议，主要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国家主席问题，一个是天才问题。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那几个副词，我圈过几次了。

毛主席再一次向在座的同志强调说：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搞山头；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主席进一步要求大家：要学习列宁为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 25 周年撰写的那篇文章。列宁讲，唱《国际歌》走到哪里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朋友。大家要学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国际歌》歌词中讲“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这就是强调讲团结嘛！学马克思主义就要讲团结，没有讲分裂的！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首先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不一致，就不能胜利。再一条即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对人要和气，对战士、对下级要和气，不搞军阀作风。其他的也还有点问题，比如不打人、骂人，不调戏妇女，但在军队中问题不大。

毛主席说：我没有同你们讲过路线问题，过去见面，吹的都是些鸡毛蒜皮。无非是同南京的关系的事，谁知后边还有一个庐山会议。过去我就讲过，一个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个主要倾向，谁知“三支两军”掩盖着一个庐山会议的主要倾向！

毛主席接下去说：听话要分析，不要听小道的话，不要尽听，人家一吹就听了，

受蒙蔽了，不了解情况。所以要调查研究，听话要分析。

毛主席说：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提了三个副词，当时兵荒马乱，那时还需要嘛。“九大”后就不同了，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现在就要降温。到处挂像(指毛主席像)，日晒雨淋，可怜噢！还有那个“伟大”。我就有四个“伟大”，你们就一个没有啊！伟大的导师，就是一个教员嘛，当然导师比教员更高明一点。“九大”党章草案上那三个副词，我就圈去了。“九大”党章已定了，你们为什么不翻开看看。

毛主席还谈到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的问题。他说：这次庐山会议上，不少人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都搞不清楚。你们要学习马、列的书。现在学六本，文化高一些的，有人可能突破，明年再学几本。

最后毛主席又谈到军队问题，他说：进城那时，我管打仗，也管军队。朝鲜战争人家打胜了，我就没有管了，要人家去管。军队开始是聂荣臻管的，以后是彭德怀管，后头是林彪管。但他身体不好，也管不了那么多，罗瑞卿、杨成武也不听他的，我帮忙也不够。现在的几位大将(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我也不熟悉，不了解，同他们单独谈得不多，集体谈得也不多。黄永胜现在思想状况怎样，也不清楚。过去我没有管，现在我要管军队的事，我不相信军队要造反。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

毛主席说：除了他们外，主要是北京军区，他们先整了二十四军，又整了二十一军、六十一军，最后整了三十八军，有的采取组织调整的办法。二十一军调到陕西时，胡炜(二十一军政委、军长，后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陕西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就讲这下可好了，脱离了他们的指挥。都高兴离开北京军区。对六十六军就说不服，他们的前军长就顶住了，就是不让他们钻到天津市革委会里去。北京卫戍区他们就插不进去，因为有谢富治、吴德、吴忠，不听他们那一套。

毛主席问南萍：舟山还武斗不武斗啊？

南萍回答说现在不武斗了，但群众组织中派性还很强，政策还不够落实，最后地区会议开得比较好。

毛主席说：舟山主要是中级、上级的问题。有些问题，你们也支持了一下。

毛主席再一次说：对林要保。

毛主席又批判林的讲话：什么一句顶一万句，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谈话快结束时，毛主席又提到：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人民解放军，这不完全，还要加上解放军要学全国人民。最后，毛主席说：今天谈到这里。有些在别的地方谈的，请汪东兴同志再同你们谈谈。

一九七一年九月三日、四日，由汪东兴向南萍等人传达了毛主席南巡路上前几次谈话的内容。并座谈了一次，还对过一次笔记。

一九七一年九月四日，汪东兴将经毛泽东审改过的南巡讲话稿送给周恩来。

一九七一年九月四日，毛泽东让汪东兴通知丁盛和刘兴元，向广州军区师以上干部传达他南巡讲话的主要内容。

一九七一年九月五日，丁盛、刘兴元从长沙回到广州，按毛泽东的指示，召开广州军区2000多名师以上干部大会，由刘兴元吹风传达。

会上规定三条纪律：不准记录、不许传达、不准向北京报告。

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晚上，于新野到了杭州。

于新野是8日先坐飞机到上海，然后赶到杭州找陈励耘布置任务的。

于新野追问陈励耘毛主席到底在杭州讲了些什么话，陈就把毛主席同他们谈话的内容做了报告。

于新野告诉陈励耘，要在杭州、上海、南京之间谋害毛主席。

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晚上，毛主席在杭州得到新的信息。

杭州有一位同志派人暗示毛主席说：杭州有人在装备飞机；还有人指责毛主席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支线“碍事”，妨碍他们走路。

一些多次接待过毛主席的工作人员，在看望他老人家时也反映了一些可疑的情

况。

毛主席把汪找去，提出要把专列转移。

汪问：专列是向后转移，还是向前转移？向后是转到金华，向前是转到上海。汪还建议。也可以转向绍兴，即转向杭州到宁波的一条支线上，观察动静。

毛主席同意转向绍兴，说：“可以。那样就可以少走回头路了。”

一九七一年九月九日凌晨，毛主席的专列转到靠近绍兴的一条专线上。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日中午，毛主席叫汪东兴去。对他说：“走啊！不要通知陈励耘他们。”

汪说：“主席，不通知他们不行。”

毛主席问：“为什么呀？”

汪说：“不通知不行，您不是一般人。来的时候，都通知了；走的时候，不通知不好，路上的安全，还是要靠地方。”

毛主席又说：“那就不让陈励耘上车来见，不要他送。”

我说：“那也不行，会打草惊蛇。”

毛主席考虑了我的建议。他问：“那怎么办？”

汪说：“您看，是不是请南萍、陈励耘……”

汪刚说到这里，毛主席打断我的话说：“还有一个，就是空五军的军长白宗善，这个人也请来。为什么这次没有请他见面？”

汪回答说：“马上就通知他。”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日，毛主席决定离开杭州，让我中午通知南萍、陈励耘他们。下午2时半，他们来向毛主席道别，毛主席又同他们谈了一次话。参加谈话的人有南萍、熊应堂、白宗善及陈励耘。我也参加了。

毛主席同白宗善握手时，问道：你白宗善为什么不来看我？

白宗善当时任空五军军长，毛主席对他很熟悉。

陈励耘慌忙接口说：他那天在值班。

握过手，毛主席首先对他们讲了一个寓意深长的故事。他说：齐国和鲁国打仗，

我是帮齐国，还是帮鲁国呢？鲁国小，人少，但团结得好。齐国向鲁国进攻，鲁国利用矛盾，结果把齐国打败了。

这意思是讲大家要搞好团结，不要分裂，否则革命事业要失败。

毛主席接着说：听汪东兴同志说，你们批陈整风搞了两次，搞得还可以嘛，还不错。汪东兴同你们谈了一次，座谈了一次，对庐山会议认识深了些，学《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们办了。

毛主席再次向他们谈到我们党历史上的路线斗争问题。他说：红军三十万，到陕北剩下两万五千人，当时中央苏区八万，只剩八千。那时张国焘搞分裂，不愿到陕北去。那时不到陕北没有出路嘛！这是政治路线问题。后来，对四方面军回来的同志斗得凶，检讨一次、两次、三次、四次都通不过，过分了。当时到我这里告状的都是四方面军的人，一方面军的一个也没有。四方面军就灰溜溜了，一方面军就翘尾巴了。

毛主席带着警示的口气说：不要带了几个兵就翘尾巴，就不得了啦。打掉一条军舰就翘尾巴，我不赞成，有什么了不起。三国关云长这个将军，既看不起孙权，也看不起诸葛亮。到后来走麦城失败。当然，那时没有反骄破满啦。我找黄永胜他们谈了话，东兴也参加了，当面批评了黄。黄永胜不会不摇鹅毛扇子吧！他一字不提林彪。

毛主席有针对性地对在座的人说：要谦虚谨慎，不要翘尾巴，有错误不要紧，我们党内有这么个规矩，错了就检讨。这次汪东兴同志不是沾了个边嘛！

我当时插话，说我在庐山会议上犯了错误。

毛主席问：你们谁参加过“七战七捷”呀？

陈励耘说他参加过。

毛主席不信，说：我看不见得吧！你那时当什么官呀？

陈励耘回答说：当过副主任、主任、副政委。

毛主席随后又谈到陈毅同志。他说：陈毅打仗，有个好处，还能听听其他人的话。打孟良崮，他南边听粟裕的，北边听许世友的。

毛主席说：北京军区队伍多，有几个军，还有炮兵、工程兵，装甲兵也多。他们整这个军、那个军。陈伯达在华北几十天。周游华北，到处游说。我这次就是学他的办法，也是到处游说。我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我能不能到处游说？

这时参加谈话的几个人都说：毛主席到各地谈话，是造革命的舆论是完全可以的。

毛主席表示同意大家的说法。说：陈伯达搞的是反革命游说，我搞不同。

毛主席说：你们和南京的关系，我说了两年，还没有解决。我这边也讲，那边也讲。给你们讲的都可以公开讲。少数人可以讲，多数人也可以讲。你们同许世友同志不要针锋相对。对他也说不上，对你们也说不上，这主要由我负责。

毛主席问南萍：南京开会你们去不去？我同许世友同志在江西谈过次，这次还要谈。

南萍说：我们没有听主席的话。今后按许司令的指示办。

毛主席说：那也不对。错了的也执行吗？许世友同志是可以交朋友的，有时还可抓住他的主要问题，把道理说清楚。他还是可以交朋友的。你们空军受不受许的指挥啊？

南萍等人答复说：受他的指挥，听的。

毛主席听了点点头，表示这样做好。

毛主席又说：国民党不能打仗，日本比它厉害，开始可几个军打他个军或一个师。打仗没有什么，就是“集中兵力”四个字。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颇难。

最后，毛主席说：把我的像到处挂，我已说过多少次了，不要这样了。“万岁”，英文翻译为 LongLive，是“长寿”的意思，对年青人可喊对年纪大的就不要喊了。在谈话的时候，汪就布置专列做开车的准备。毛主席同他们谈了半个小时。谈完后，汪请他们到自己的房间里休息。

汪回到毛主席那里，请示说：“到上海后车停在哪里？”

毛主席说：“停在上海郊外虹桥机场专用线，顾家花园就不进去了。”

汪说：“上海那边要通知，是不是通知王洪文？”

毛主席说：“是。这个电话由你们打。”

当时，陈励耘在我的房子里，我就只好在毛主席那里给王洪文打了一个电话。

专列 10日 13点 40分由绍兴返回，14点 50分抵达杭州站。在离开杭州去上海的时候，我们没有通知其他的人送，而陈励耘却来了。陈励耘到了车站后，不敢同毛主席握手，也不敢接近毛主席。他心里有鬼，当时神情很不自然。

他跟汪握手时间：“车开后，要不要打电话通知上海？”

汪说：“你打电话给王洪文或者王维国，这两个人都可以，就说我们的车出发了，

还是在那个支线上停住。”以后我了解，陈励耘确实打电话通知了王洪文。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日十六点，毛泽东的专列开出杭州，向上海方向急驶。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日十八点十分，专列顺利开进上海，停在虹桥机场附近的吴家花园专运站。

贰、本节简论

毛泽东巡视杭州的讲话主要有两次：

一九七一年九月三日，毛主席同南萍、熊应堂、陈励耘和汪东兴谈话。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日，毛主席同南萍、熊应堂、白宗善、陈励耘、汪东兴谈话。

毛泽东在这些谈话中主要强调了：

- 1，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
- 2，庐山会议前，林彪有两次要打电话、写信都被叶群和黄永胜他们阻止了。
- 3，庐山乱了三天，实际一天半，后来停下，逛庐山，
- 4，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那几个副词，我圈过几次了。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提了三个副词，当时兵荒马乱，那时还需要嘛。“九大”后就不同了，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现在就要降温。到处挂像，日晒雨淋，可怜噢！还有那个“伟大”。我就有四个“伟大”，你们就一个没有啊！伟大的导师，就是一个教员嘛，当然导师比教员更高明一点。“九大”党章草案上那三个副词，我就圈去了。“九大”党章已定了，你们为什么不翻开看看。什么一句顶一万句，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
- 5，过去我就讲过，一个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个主要倾向，谁知“三支两军”掩盖着一个庐山会议的主要倾向！
- 5，光开不到一百人的会议不行，军队还可扩大到军长、政委参加，地方也要有相当这一级的同志参加。
- 6，过去我没有管，现在我要管军队的事，我不相信军队要造反。军队要统一，

军队要整顿。

毛泽东巡视杭州的一个重大收获就是进一步摸清了林彪集团的阴谋活动。陈励耘继续隐瞒，不肯暴露真实的活动；他们已经把目标盯在专列上。

九月八日，于新野到了杭州找陈励耘策划炸专列。这个情况毛泽东是否了解？为什么恰好有一天，他提出来把专列调离杭州？

2009年9月9日初稿

2012年5月3 日修改

第五章第五节 毛泽东巡视上海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日18点 10分，专列到了上海。

专列一到上海，汪东兴就把上海当地的警卫部队全撤到外围去了，在毛主席的主车周围全换上中央警卫团的部队，以防不测。在离专列150米远的地方是虹桥机场的一个油库，要是油库着火了，火车跑都跑不掉，所以特别派了两个哨兵在那里守卫。

王洪文到车厢里见毛主席。

毛主席问王洪文说：东兴同志打电话给你，要你通知许世友到上海来，怎么没有见他来呀？

王洪文回答说：电话我打了，南京说他可能下乡了。正在设法同他联系。

毛主席与王洪文聊了几句，就说：等许世友来了一起谈。

毛主席一直等到 十一日的上午 10点钟，许世友方才来。毛主席马上开始和许世友、王洪文谈话，谈了1个多小时。

毛主席问许世友说：许世友，你下乡啦，去搞什么呀？调查什么问题呀？

许世友回答说：我去看农场了，看大别山附近的军垦农场去了。

毛主席说：去那么远了呀。

许世友说：坐吉普车去的。

毛主席批评许世友说：怎么连家都不回呀？一天到晚，你这个司令员随便离开工作岗位，怎么行呀？向谁请了假呀？要是万一发生问题，你怎么样办呀？连南京军区都找不着你！将来这样的情况你要注意，告诉一下家里嘛。

许世友说：真对不起。我想主席还会在杭州住几天的，然后才能到我这里。我昨天夜里 12点多钟才回到南京的，先休息了一下，就没有打电话到上海。

许世友接着汇报说：今年农业可能会大丰收。军垦农场也不错，庄稼长势很好，丰收在望。

毛主席说：那好嘛！你去看看农业也好嘛。

许世友接着说：军队的情绪很好。军队里比较稳定，乱哄哄的情况也过去了。我

带着那些造反派去游过苏北。

毛主席问：是不是都是支持你的那一派？

许世友说：我把两派都带上了。

毛主席说：不能把领导机关搞乱了，更不能把军队搞乱了。我在江西就同你讲了，要“高抬贵手”。

许世友说：不会，我正在做他们的工作。

毛主席说：那好！

王洪文这时说了一句话：许司令，毛主席等你快15个小时了。

毛主席马上打断王洪文的话说：不要这样，不要紧嘛。

毛主席说：这段时间我们也休息了一下。不要提了，我们还是谈正事。

毛主席说：对庐山会议你们想得如何呀？是不是在思想上解决了问题呀？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呀？是不是都解决了呀？

毛主席说：我认为犯点错误是不要紧的，有的属于认识问题。现在有的同志对有些问题还认识不到嘛，那就等待，而且耐心地等待嘛。

毛主席接着说：认识一点就写出来，以便改正错误。犯了错误，也不认识，也不去想办法认识，在那里顶着，这个不好，可能不仅会使错误不能被认识出来，而且会加深的，甚至把错误当作包袱的。犯错误的包袱，常常是越背越重，这个不好。要把这个包袱甩掉，轻装上阵，那样人就会觉得舒服了。不然总是背着沉重的包袱，你不甩开，那怎么会好受呢？

许世友说：庐山会议的问题，按毛主席的指示办。

毛主席问他：我有什么指示呀？

许世友说：您的指示就是《我的一点意见》。

毛主席说：那个不是在后头吗？是你们犯了错误后，我想了五天才写的。你们是什么时候讲的，是24、25、26三天嘛！

许世友说：这个指示我拥护，我就是按您的意见办的。

毛主席说：不见得吧，我那个意见你学了没有？我那个意见上说，什么叫唯心论，什么叫唯物论，你讲一讲，我听听！

许世友当时哈哈地笑了。

毛主席对许世友说：你不是说执行我的指示吗？我要你们学习。你们又不动。人

家要搞那个论“天才”，找了几条称“天才”的语录，你找到了吗？

王洪文看许世友没有讲什么，就开始向毛主席汇报。他说：上海的五六位中委和革委会的主任和副主任，针对庐山会议出现的问题座谈了一次。

毛主席问：你们座谈了一些什么呀？

王洪文说：突出的是讨论了林彪的讲话。当时我们心里就嘀咕。

毛主席说：你们嘀咕什么呀？人家是副主席讲话呀。

王洪文说：他是副主席讲话，但当时我们都很少发言。

毛主席问道：那你们不是也都听了么？你不是也听了录音嘛！那时你们华东、上海就一个拥护的字都没有说呀？

王洪文回答说：有。那个时候不拥护也不好。这次我们座谈时，也讲了一些意见，但有的人在庐山会议上没有发挥。当时庐山会议上，就是安排要讨论的，我们华东组除了林彪的一帮人抢着发言外，我们也发了言，我也讲了几句。事后，听说林彪讲话是中央常委同意他讲的，特别是论“天才”的语录也以为是中央搞的。

毛主席说：谁说这个论“天才”的语录是中央搞的呀？当时我们发了语录没有呀？

哪一个文件上说发了语录呀？哪一个文件上写有这几条语录呀？

王洪文接着说：六号简报，我们一看到就火了。

毛主席问：你为什么一看到就火了呢？

王洪文说：简报里有一些话有问题。设国家主席问题，在北京讨论宪法时有争论，而且争论得很厉害。当时有人提议设国家主席，有人不同意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是毛主席的意见，可是他们不听，还要坚持他们设国家主席的意见。

毛主席问王洪文说：那你对简报的性质有什么看法？

王洪文说：这个简报是有错误的，是错误的简报。当时我们几个人到了主席那里谈过了。（实际上，对简报问题的意见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到毛主席那里讲的，王洪文没有去。）

毛主席说：这个简报现在还没有做结论，这个结论将来由中央来做。我认为是反革命简报，起码如你讲的是有错误的简报。为什么有错误的简报要在这个时候发呢？为什么有的同志发了言，登简报，又不先让本人看呢？

毛主席接着说：听了你们的意见，六号简报是错误的，是有人捣鬼，有人在搞阴谋诡计，不搞光明正大；不搞团结，是搞分裂。我讲话一句顶一万句？在这个问

题上，我看连一句也不顶。不是我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是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

毛主席讲完这些后，对许世友、王洪文又讲了党的历史上历次路线斗争的情况。谈到 11 点多钟，毛主席说：我今天不留你们吃饭了。王洪文，你请许世友到锦江饭店去吃饭，喝几杯酒。你们都去。

我送许世友、王洪文下车时，看到当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空四军第一政委的王维国脸红脖子粗地站在车门口等着。王洪文把他拉上车来，与毛主席在车厢门口握了一下手。

毛主席对王维国很冷淡，连话都没有讲。王维国就同他们一起走了。

送走他们后，毛主席立即对汪东兴说：我们走！

王洪文陪许世友等人吃饭时，接到飞机场保卫人员打去的电话，报告说毛主席的专列在 12 点半钟就开走了。

王洪文小声告诉许世友说：“毛主席的车走了。”

许世友说：“哎呀！怎么走了？”

王洪文对许世友说：“既然走了，我们还是吃饭吧。”

王洪文、许世友、王维国等人吃了两个多小时的中午饭。吃完饭已经是下午了。许世友便乘一架伊尔-14 飞机赶回南京，然后到车站接专列。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专列 18 点 35 分抵达南京站，停车 15 分钟。许世友在南京站迎接，

毛主席说：“不见，什么人都不见了，我要休息。”

我下车见了许世友，跟他说：“毛主席昨天晚上没睡，现在休息了。毛主席还说，到这里就不下车了。”

许世友说：“好！”他接着问我：“路上要不要我打电话？”

我说：“不用了，我们打过了。”

许世友又问：“蚌埠停不停？”

我说：“还没最后定。一般的情况，这个站是要停的，但主席没定。”

专列从南京开出后，到蚌埠车站是 21 点 45 分，停车 5 分钟。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零点10分，专列到徐州，停车 10分钟。

到兖州时是 2点 45分，没有停车。

到济南时是 5点，停车 50分钟。在济南车站，汪打电话给中办值班室，要他们通知纪登奎、李德生、吴德、吴忠到丰台站，毛主席要找他们谈话。

专列到德州时是7点40分。停车20分钟。

11点15分到天津西站，停车15分钟。

贰、本节简论

毛泽东巡视上海只同许世友、王洪文谈话一次。

毛泽东谈话的主要内容是询问许世友现在对庐山会议事件的认识如何？

许世友只说坚决按毛泽东的指示办。没有说自己在庐山会议问题上有什么错误。

毛泽东只在车箱门口与王维国握了一下手，没有说话。

毛泽东趁他们下车吃饭时，没有打招呼就离开了上海。

毛泽东到达南京没有再见许世友，而且一路不停地回到北京。

这说明，毛泽东在巡视南昌、杭州以后，对林彪集团的阴谋活动，已经有所察觉。

2009年4月初稿

2012年4月25日修改

第五章第六节 毛泽东回到北京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13点 10分，毛主席的专列驶抵丰台。车停好后，毛主席在车厢里同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和吴忠谈话，一直谈到15点多钟。

毛主席先问李德生访问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的情况。李德生谈了阿劳动党对我国邀请尼克松访华的态度和意见。

听完李德生的汇报，毛主席说：他们是左派，我们是右派。

毛主席说：怕美帝从亚洲撤出来会增加对他们的压力，要我们把美帝拖住。他们（指美国）只有两亿人口，经不起伤亡嘛，所以他们就撤军。撤军，不一定就会增加对他们的压力。

毛主席说：我们的方针是路线决定一切。人多，枪多，代替不了正确的路线。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路线不正确，有了人和枪也可能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什么是纲？你们会打渔吗？纲就是串鱼网的那根绳子，目就是鱼网上面的一个个眼，你们讲的那个目，三天也讲不完。我今天是讲纲。

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开头是陈独秀，“八·七”会议后，他同刘仁静、彭述之那些人，81人签名的“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说我们是坏人，红军是破坏分子，以后他们就搞到托洛茨基那一派去了。后头就是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1928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的，李立三神气起来，搞了三个月，那时总理还未回来。李立三主张打大城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

毛主席继续说：李立三搞的那一套，我不赞成。李倒台是在三中全会。

王明倒台是在遵义会议。王明路线的寿命最长，他们借第三国际的力量，把总理封为调和主义，出了《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批评李立三“左”得还不够，非把根据地搞光不舒服，结果基本上搞光了。

毛主席说：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这四年我在中央毫无发言权。我们党五十年的经验，中国人不喜欢分裂，我们党内十次路线斗争，没有一次把党给分裂了的。

他接着说：再就是去年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隐瞒着三个，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出简报煽风点火。这样搞总是有个目的嘛！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我那个文章，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是第五天才写的。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毛主席说：我同林彪谈过，你说欧洲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这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话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

毛主席接着说：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犯了错误要批评，做好了工作要表扬，但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犯错误的人，允许改正错误。但发声明是容易的，无非是讲在口上、写在纸上。问题在于是不是实践他的声明，改正错误。这些人最没有勇气，收场那么快。刘建勋同志说搞了一天半，我说是三天。为什么那股妖风，只刮三天就不刮了，你有理为什么收回？说明他们空虚。我是哪里有石头抓起来就打，在庐山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是一块石头，济南军区三破三立的报告也是一块石头，三十八军的报告是一块大石头。以后又有刘子厚的检讨，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会根本不批陈，我加了批语，这也是甩石头。

谈到这里。毛主席对李德生说：他们在庐山搞的那个材料（指论“天才”的语录），你向他们要，一连说三次：“你的那个宝贝为什么不给我？”看他们怎么说。

毛主席接着说：进城以后，我很少抓军队工作，管军队工作的，开始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再以后就是林彪，实际是贺龙、罗瑞卿管得多。三任参谋总长罗瑞卿不大听他的。以后是杨成武、黄永胜。

毛主席提到黄永胜时说：我看黄永胜这个人政治不怎么强，是有头无脑。他检讨最没有勇气，怕得要死。要把脑子里的东西向人家讲出来。把正确的、错误的都

讲出来，就舒服了。

毛主席又对着汪东兴说：他沾了一点边，在一千多人的会议上作了几次检讨。

汪东兴说：正式地做检讨是三次。

毛主席说到汪在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团做检讨时说：只有七千兵，连婆娘、娃娃都算上，他也没有倒呀！你把心里话说出来，倒不了的。当然也有少数人幸灾乐祸，说这次汪东兴下不了台了，但是多数人还是说他检讨得好。五个人(指黄、吴、叶、李、邱)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的检讨，承认在政治上是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是宗派主义的。但是，他们的检讨里面是吞吞吐吐，因而使人怀疑他们能否改好。

毛主席接着说：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要掺沙子才行。李先念同志过去也是搞军队打仗的嘛，可参加军委办事组，以后还要从各大军区调一些人来参加军委办事组的工作。北京军区也要从各军调一些人，把那个山头主义的窝子捣烂。华北会议派了李德生、纪登奎同志到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脚。我的办法就是打石头、掺沙子、挖墙脚。

毛主席问在座的同志：陈伯达算不算一次路线？

纪登奎回答说：算！

毛主席说：还要看一看。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办公室主任。你们是不是夫人专政啊？林彪要给我打电话、写信，说是被他身边的人阻止了。要报告了，他们就搞不成了嘛！

毛主席接着强调：我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主席批评林彪不讲三要三不要的原则。

毛主席最后说：要抓路线教育，方针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十五点，持续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结束。

毛泽东单独交给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一项任务：调三十八军一个师到南口待命。

贰、本节简论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下午，毛主席的专列驶抵丰台。毛主席在车厢里同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和吴忠谈话。

毛泽东谈话的主要内容突出几点：

- 1，我们的方针是路线决定一切。人多，枪多，代替不了正确的路线。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路线不正确，有了人和枪也可能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 2，我们党五十年的经验，中国人不喜欢分裂，我们党内十次路线斗争，没有一次把党给分裂了的。
- 3，黄、吴、叶、李、邱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的检讨，承认在政治上是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是宗派主义的。但是，他们的检讨里面是吞吞吐吐，因而使人怀疑他们能否改好。
- 4，陈伯达算不算一次路线？还要看一看。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
- 5，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办公室主任。你们是不是夫人专政啊？林彪要给我打电话、写信，说是被他身边的人阻止了。要报告了，他们就搞不成了嘛！林彪不讲三要三不要的原则。

毛泽东单独交给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一项任务：调三十八军一个师到南口待命。这说明，下一步的措施是如何防范反革命阴谋活动的问题。

2009年9月9初稿

2012年4月25日修改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六章 林彪集团的覆灭

第一节 林彪等人叛逃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晚，林立果、周宇驰向王飞谈了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之后，王飞召集鲁珉、贺德全、刘世英、朱铁铮等研究执行这一计划。

于新野在会的中间，把林彪的亲笔信又交给了王飞。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傍晚，周宇驰在空军学院召集江腾蛟、王飞一伙开了一个秘密会议。会上确定，由王飞、江腾蛟负责组织人员，保护黄永胜等人南逃。他们计划：13日早晨 8点钟，林彪由山海关机场直飞广州；13日早晨 7点钟，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由北京西郊机场直飞广州。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18点22分，值班员李万香接李海滨（西郊机场调度室主任，当时在山海关机场）电话：19点来一架252号三叉戟。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十九点四十分，二五六号三叉戟秘密从北京飞往山海关机场。

20点15分降落山海关的却是256号飞机。

李海滨告诉值班员李万香，对外只讲252，不准讲256。

（23点44分，李作鹏来电话查问飞机号码，我回答是256。而后值班员李万香请示李海滨，李说还是讲252。值班员李万香于23点50分打电话给李作鹏将机号改为252。）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二十点十五分，山海关机场调度打电话给八三四一部队二大队长姜作寿：有个大飞机从北京来，是哪位首长？怎么也没见你们来人接？

姜作寿说：我了解一下情况。

李文普说：我没有听说谁要来。

叶群告诉李文普：老虎听说姐姐今天订婚，很高兴，坐飞机赶回来祝贺。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晚，飞机落地了，在山海关机场，林立果对机组人员说：“明天首长（指林彪）要坐这个飞机”，你们“要听林副主席的指挥，关键时刻要起作用”。

刘纯结接到派车接林立果的命令。二十点三十分，过秦皇岛市不远，碰上了林立果的车。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晚，叶群指示秘书和工作人员说，不请人吃饭，但要准备好烟、酒、糖果、茶等，另外再准备两部电影招待大家。

叶群与林立衡、张清林一起看电影，电影的名字叫《甜甜蜜蜜》。

林立果21点钟到了林彪住地。送了一束鲜花给林立衡，表示祝贺。

林立衡看出：林立果回来后，家里好像有事不让她知道。叶群一退场，随即和林立果去了林彪的房间。

林彪、叶群、林立果三个人在一起谈话，叶群说：去广州不行，去香港也行呀！随后，林立果对张恒昌说：去广州！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晚九时许，由王飞、于新野召集刘世英、鲁珉、贺德泉（即贺德全，空军司令部某部原部长）、朱铁铮（空军党委办公室原处长）、郑兴和（空军司令部某部原处长）等开“七人黑会”，

王飞向他们讲：林立果已经回北戴河了！要他们立即组织一批可靠人员，护送黄、吴、李、邱于明晨（十三日）由西郊机场乘飞机去广州，到广州后另立中央，并与苏联搞联合等。

在这次会上，王飞和于新野组织他们拟定了去广州的人员名单，有二十三人，编为六个小组，并研究了行动时的有关具体问题。如出发时间、车辆安排、如何分工串联，以及到机场后进行动员和配发枪支等等。

王飞还宣布江腾蛟是这次行动总指挥，鲁珉、贺德全是副总指挥。

（鲁珉参加了这次黑会后，有意把眼睛搞红肿了，第二天住进了医院。十三日向

中央投案自首)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二十一点多，林豆豆问李文普，他们要到哪里去？

李文普说：主任叫我安排明早六点去广州，先不要通知八三四一部队。

林豆豆说：老虎尽干坏事，要害毛主席，他们要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这不是要外逃吗？你们赶快去报告八三四一部队？

李文普说：如果真有什么事，到时候还可以在飞机上采取措施。

林豆豆和刘吉纯都不同意上飞机：林说：你不能让首长上飞机。你不去，我去。林立衡马上去向当时在北戴河保卫林彪的 8341 部队的副团长张宏和二大队的队长姜作寿报告。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晚上二十一点多，林豆豆和刘吉纯到八三四一部队报告情况。

张宏、姜作寿听到林立衡的报告，姜作寿立即打电话将情况报告给在北京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张耀祠立即赶到汪东兴的办公室，说：“情况很紧急，林彪要走动，怎么办？”

汪马上打电话找周总理。周总理当时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主持讨论将在四届全国人大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汪将林立衡报告的情况向周总理报告后，周总理问汪：“报告可靠吗？”汪回答说：“可靠。”

周总理对汪说：“你马上打电话通知张宏，如果有新的情况，立即报告。”

汪和张耀祠都守在汪的办公室的电话机旁。过一会儿。张宏又来电话报告说：林立衡还报告，她听接林立果的汽车司机讲，林立果是乘专机从北京来的，这架专机现在就停在山海关机场。由于林立衡的报告，掌握了林立果是乘专机去北戴河，山海关停有专机的重要情况。汪马上又将这个情况报告给周总理。

这时，周总理听了这些情况后，安排其他人继续开会，自己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的一间小房子里处理北戴河方面的问题。他打电话给汪，要汪不离开电话机，随时掌握北戴河那边的情况。汪说，不会离开，我就在电话机旁边等着。周总理接着打电话把在大会堂参加《政府工作报告》稿讨论会的吴法宪从会场上找出来，问他知道不知道有一架飞机从北京飞到北戴河去了。吴法宪回答说不知道，并说

他要问一问空军调度室。周总理要求吴法宪立即去问。吴法宪就到另一个房间去打电话了。周总理这时又打电话给汪，让汪立即转告北戴河的张宏。让他查一查，山海关是不是有一架专机，如果有什么新情况，马上向他报告。

张宏很快答复说，他已问过山海关机场。确实有一架专机，专机的机组人员正在休息。这个机场归海军管理。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晚十时以后，吴法宪打电话告诉胡萍说总理追查256号飞机的事。

胡萍就一面找人造假说谎应付追查，一面给周宇驰通风报信，要他打电话告林立果早打主意，同时又给已去山海关的潘景寅打电话，假借发动机有故障，飞机不能回来，好留下林彪使用。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晚上二十三点半钟，周总理亲自打电话给叶群。

周总理问叶群说：“林副主席好不好呀？”

叶群说：“林副主席很好。”

周总理问叶群知道不知道北戴河有专机。叶群说她不知道。

叶群稍微顿了一下后，又改口对周总理说：“有，有一架专机，是我儿子坐着来的。是他父亲说，如果明天天气好的话，他要上天转一转。”

周总理在电话里又问叶群：“是不是要去别的地方？”

叶群回答周总理说：“原来想去大连，这里的天气有些冷了。”

周总理说：“晚上飞行不安全。”

叶群说：“我们晚上不飞，等明天早上或上午天气好了，再飞。”

周总理又说：“别飞了，不安全。一定要把气象情况掌握好。”

接着，周总理还说：“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

周总理提出要去北戴河，这一下子叶群警觉了，她慌了。周总理要是一来，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的阴谋也就搞不成了。叶群劝周总理不要到北戴河来，对周总理说：“你到北戴河来，林彪就紧张，林彪会更不安。总之，总理不要来。”这时，周总理把李德生叫到电话间说：林彪要乘飞机跑了。派李德生到空军司令部作战值班室去协助他临时负责指挥，还派杨德中陪吴法宪去了西郊机场。派纪

登奎去北京军区空军指挥所。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二十三时半，林彪听了叶群的汇报，得知周总理要来北戴河。他说：“我也不休息了，今晚反正睡不着觉了。你们赶快准备东西，我们马上走。”此时，叶群更加惊慌，她也说：“越快越好。”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二十三时半，林立果从北戴河给周宇驰打电话，命令停止“南下”，要“北上”（指叛国投修）。

周宇驰急忙告诉王飞：“暴露了，不搞了”。

王飞在会上宣布去广州计划作废，当场销毁了一些罪证，订立攻守同盟。

并告诉他的亲信：明天不走了，“就当没有这回事”，“有人问今晚我们干什么，你就说是研究办公室副主任分工问题”。

王飞对他老婆说：“暴露了！”狂叫：“抓起来我什么也不讲”。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23点35分，李作鹏来电话告山海关机场值班员李万香：告诉你，它（指飞机）的行动听总理指示，黄总长指示、吴副总长指示，我的指示，四人中一人指示放飞才放飞，其他人指示都不可以。”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二十三时半，叶群给黄永胜打电话，想探听北京的消息，可是打到黄的办公室和家里都不在。叶群认为；黄永胜肯定是被抓了（实际上此时黄永胜正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周恩召集的会议，因周来去接电话，宣布休会，黄永胜留在那里打扑克），既然黄永胜被抓了，那么抓林彪的命令也已经下来了。此时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23点50分，林彪对李文普说：马上夜航去大连，不休息了，有些东西可以不带，够用就行了，到大连住一个星期就回来，回北京过国庆节。你准备一下，现在就走。

李文普说：要了飞机再走。

叶群说：一会儿吴法宪坐飞机来，我们就用那架飞机，我们可以先走，到机场休

息室等吴法宪。

叶群跟着李文普从林彪的客厅出来，她对李说：快调车，越快越好。有人要来抓首长，再不走就走不了了。

林立果也对李说：快点吧，有人要来抓首长，什么东西也别带。

林彪要走的命令一下，62号楼的人忙开了，慌了，都不知为什么要走得这样快。

林彪的汽车马上调到了他的住房门口。

林彪快要上车时，叶群派人找过林立衡。

林立衡自从报告了林彪要去外地的情况后，已经不敢再回去了。这时，二大队执勤的哨兵也报告，说林彪住地很乱，搬东西的人来来往往。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晚十二时左右，叶群和林立果闯进林彪的房间，叶群一把拉起林彪：快走吧，有人要抓你啦！

林立果叫小陈和小张快给首长穿衣服。

汽车刚调出库，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就出来了。林彪走在最后，连帽子、大衣都没有带。

林彪经过内勤室时问：东西都装上车没有？

林彪和叶群、林立果先后上了汽车。

林彪问林立果和警卫秘书：“去伊尔库茨克要飞多少时间？”

林立果说：“很快就到。”

林彪问完后，汽车就开动了。林彪的警卫秘书坐在前座上，后边是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

汽车驶到岗哨跟前，姜作寿执行拦阻任务站在路中间，叶群命令司机冲过去。

警卫秘书李文普，叫一声“停车！”司机没有听他的，只是将车速稍微慢了一下，李文普就打开车门跳下车。

这时，林立果开了一枪，李文普开了一枪，八三四一部队中队长肖奇明也开了两枪，打在汽车的玻璃上。

张宏、姜作寿等人看到这些，坐车跟上去。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李作鹏又于零时零6分来电话告山海关机场值班员李万

香再次强调：“中央指示，四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谁来指示，要报告我。要负责任。”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零时20分，山海关机场站长潘浩电话请示李作鹏，“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

李答：“可直接报告请示总理。”

李作鹏没有采取任何阻止飞机起飞的措施。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零点二十二分，林彪一夥乘坐红旗轿车，以极高的速度开到停在机场的三叉戟飞机附近。车还未停稳，林彪一夥就急忙下车。

叶群、林立果、刘沛丰等拿着手枪，乱喊乱叫：快！快！快！快！快！快！飞机快起动！飞机快起动！

叶群披头散发，林彪光着秃头，慌慌张张地跑到飞机驾驶舱门底下，在没有客机梯子的情况下，慌忙顺着驾驶舱的小梯子，一个一个往上爬。第一个上去的是刘沛丰，叶群往上爬的时候，林彪紧跟着往上爬，林彪的秃头都顶着了叶群脚。他们没等机组人员上齐，连付驾驶员、领航员、通讯报务员都没有上机，飞机滑行灯也没敢开，机舱门还未关上，飞机就急促起动，强行滑出。

在滑行中，右机翼撞坏停在滑行道旁的加油车罐口盖，刮掉了机翼上的铝皮，撞碎了机翼上的绿色玻璃灯罩和有机玻璃等。

在没有夜航灯光和一切通信保障的情况下，便在一片漆黑中，于零点三十二分，强行起飞。

林彪的红旗牌轿车时速开到 100公里左右，张宏他们乘坐的吉普车根本追不上。等张宏他们追到山海关机场的时候，林彪已经上了飞机。

张宏他们在机场上把林立果找对象选来的几个“美女”拘留了。这些“美女”当时都发了枪，她们拿着枪不让警卫战士进屋。张宏对她们说：“你们这是要干什么！我们是保卫林副主席的，你们怎么这个样子？”

警卫战士一进去，就把她们的枪缴了。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零点过，吴法宪从西郊机场打电话说：林彪的专机已经起

飞30多分钟了，飞机在向北飞行，即将从张家口一带飞出河北，进入内蒙古。吴法宪请示，要不要派强击机拦截。

毛主席听了报告以后说：“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

周总理同意毛主席的意见。

这时时针指向 13日凌晨 1 点 12分。飞机从起飞时算起，已经飞了 40分钟，快要飞出国境了。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晨一时多，周恩来、李德生、纪登奎在人民大会堂召见陈先瑞。

周恩来说：林彪跑了，现在情况不明，北京军区立即进入一等战备。

李德生说：你立即回军区，把作战、机要、通信和北空指挥所严格控制起来，没有总理的命令，任何人无权调动军队。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晨一时多，周宇驰来到空军学院，对李伟信和于新野说：“明日去广州的计划不行了，肯定没有飞机了，‘立果’已给我打过电话，他们争取走，叫我们能走都争取走，咱们只能用直升飞机跑。”

上飞机时，周宇驰对李伟信说：“你在后舱，我与于新野和两个飞行员在前舱（前后舱不通的）冲锋枪给你，在后边以应付万一情况。”

因前舱坐不下四个人，于新野又来后舱。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二时半，林彪等叛国投敌所乘的256号三叉戟飞机，在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全部烧死。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 3点多，在毛主席住地，空军司令部又打来了电话，说调度室报告，北京沙河机场有一架直升机飞走，机号是 3685，机上有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和正副驾驶员共5人，直升机正向北飞行。汪东兴马上将这个情况报告毛主席和周总理。

毛主席和周总理异口同声地说：“下命令，要空军派飞机拦截。”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三点多钟，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等，乘直升飞机向蒙古乌兰巴托逃跑。

在飞行中，李伟信问于新野：“我们今日将会是怎样的结果。”

他说：“不成功便成仁。”

空军的歼击机升空以后，由于天空很黑，直升机又没有开航行灯，所以经过一番搜索没有找到目标。

驾驶直升机的飞行员陈修文，装着很焦急的样子，喊叫说没有油了，要降落下去加油。其实油是够的。

周宇驰说不能降落。降落下去，大家就都别想活了。周宇驰还谎称，林副主席已经坐三叉戟专机在乌兰巴托降落了。说你们不要害怕，出了国境就行。

陈修文听周宇驰这样一讲，操纵飞机摇晃了一下，然后利用飞机晃动的机会改变了航向。这时，天已经发亮，陈修文看到头顶上的歼击机了。周宇驰他们也看到了，很紧张。飞机开始往回飞，陈修文并将罗盘破坏了。周宇驰发现后，问陈修文为什么改变飞机的航向。

陈修文说，头上有歼击机，如果不机动飞行的话，可能要被打下来。

周宇驰又问陈修文，罗盘怎么不对。陈修文说罗盘早就出了故障。

这样一来，周宇驰感觉到飞机的航向有问题。不知道飞机往哪里飞。陈修文知道方向，他驾驶飞机经张家口、宣化等地又飞回北京。直升机在怀柔沙峪的一个空地上空盘旋了 5 圈后，开始降落。当直升机降落到离地还有 20 米时，周宇驰开了两枪，把陈修文打死了。陈修文旁边的副驾驶员叫陈士印。他将陈修文身上流出的血抹在自己的脸上，躺在地上装死。于新野下飞机又向座舱打了一枪，一会周宇驰浑身是血走下飞机，骂于新野为什么乱开枪，这一枪正好打在他手腕上，他还说：“那个飞行员故意制造罗盘故障，实际离北京没多远，我把他打死了！”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从直升机上爬下来后，就往山上跑，一直到累得跑不动时才停下来。周宇驰说：“这样不行，早晚都是死，跑是跑不了的，咱们今天就死在这里吧。”他还说：“有两种死法。第一种是如果你们怕死，我就先把你们打死，然后我再自杀；第二种是如果你们不怕死，那就自己死。”说完这些话，周宇驰就把带在他身上的林彪的手令和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撕碎。这两个被撕碎

的罪证，后来都找到了。

于新野对周宇驰说：“我们还是自己死，不用你打。你喊‘一、二、三’，我们同时开枪。”当周宇驰喊过“一、二、三”后，“砰！砰！砰！”三声枪响，可是倒下的只有两个人，原来是李伟信怕死，他把枪弹射向了天空。看到周宇驰和于新野两个人都躺在地上死了，李伟信爬起来就跑。这时民兵已经赶到，就地把李伟信抓起来了。抓李伟信的时候，他还喊叫，说要找卫戍司令。

从直升飞机上缴获的物品：

- 1、北京——蒙古乌兰巴托——苏联伊尔库次克航行图
- 2、苏联伊尔库次克机场和恰克图导航台资料

伊尔库次克机场

位置：在伊尔库次克城东南8公里。标高：500m.

跑道：116—296 2750x60 (m) 水泥

导航台：116 方向 远台. 1R/514 3681m (距跑道端)

近台. 1/250 900m (距跑道端)

296 方向 远台 CN/514 3660m (距跑道端)

近台 C/250 960m (距跑道端)

恰克图导航台

位置：在恰克图城.

呼号： RT 频率： 695

- 3、从直升飞机上缴获的林彪一夥盗窃的我党我军大批绝密文件的一部份

- 4、从直升飞机上缴获的林彪一夥盗窃的大量美元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中午十二时在西郊候机室，吴法宪拍着胡萍的肩膀说：“没有你的事，你回医院休息去。”

于是就叫秘书用他的汽车把胡萍送去医院。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下午，李作鹏的秘书刘继祥来电话找山海关机场值班员李万香更正李的电话内容。

他说：李政委说的是四个首长联名指示放飞才放飞，不是其中一人指示放飞才放

飞，要李万香好好想一想。

李万香即回答：李的两次电话从未说到联名指示的问题，我是这样听的，也是这样记录的。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如何处理同林彪有密切关系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问题，毛主席对周总理说：“看他们十天，叫他们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老同志，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交代好了就行。”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四日上午 8 时 30 分，在乌兰巴托，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打电话通知中国大使馆，说蒙古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约见中国驻蒙古大使，要向大使通报一架中国喷气式飞机在蒙古失事的情况。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四日中午 12 时 20 分，中国驻蒙古大使将一架中国飞机在蒙古失事的情况报告中国外交部。外交部在代外长姬鹏飞主持下召开了党组会，并将这个情况很快抄报了党中央。

当时，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会，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接的报告。

周总理看到报告后，在会场上对汪说：“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消息，你是不是马上去报告毛主席。”

当时，毛主席就住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汪跑了一段路到北京厅，把这个消息报告了毛主席。

毛主席想了一下，问汪：“这个消息可靠不可靠？为什么一定要在空地上坠下来？是不是没有油了？还是把飞机场看错了？”

汪说：“飞机到底是什么情况，现在还不清楚，大使准备去实地勘察。目前还不知道飞机是什么原因坠落下来的。”

毛主席又问：“飞机上有没有活的人？”

汪说：“这些情况都不清楚，还要待报。”

贰、本节简论

林彪究竟知不知道是要逃往苏联？

这里回放一下有关林彪的几个镜头：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晚，林立衡看出：林立果回来后，家里好像有事不让她知道。叶群一退场，随即和林立果去了林彪的房间。

林彪、叶群、林立果三个人在一起谈话，叶群说：去广州不行，去香港也行呀！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二十三时半，林彪听了叶群的汇报，得知周总理要来北戴河。他说：“我也不休息了，今晚反正睡不着觉了。你们赶快准备东西，我们马上走。”此时，叶群更加惊慌，她也说：“越快越好。”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23点50分，林彪对李文普说：马上夜航去大连，不休息了，有些东西可以不带，够用就行了，到大连住一个星期就回来，回北京过国庆节。你准备一下，现在就走。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晚十二时左右，叶群和林立果闯进林彪的房间，叶群一把拉起林彪：快走吧，有人要抓你啦！

林立果叫小陈和小张快给首长穿衣服。

汽车刚调出库，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就出来了。林彪走在最后，连帽子、大衣都没有带。

林彪经过内勤室时问：东西都装上车没有？

林彪和叶群、林立果先后上了汽车。

林彪问林立果和警卫秘书：“去伊尔库茨克要飞多少时间？”

林立果说：“很快就到。”

林彪问完后，汽车就开动了。林彪的警卫秘书坐在前座上，后边是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

汽车驶到岗哨跟前，姜作寿执行拦阻任务站在路中间，叶群命令司机冲过去。

警卫秘书李文普，叫一声“停车！”司机没有听他的，只是将车速稍微慢了一下，李文普就打开车门跳下车。

这时，林立果开了一枪，李文普开了一枪，八三四一部队中队长肖奇明也开了两枪，打在汽车的玻璃上。

张宏、姜作寿等人看到这些，坐车跟上去。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零点二十二分，林彪一夥乘坐红旗轿车，以极高的速度开

到停在机场的三叉戟飞机附近。车还未停稳，林彪一夥就急忙下车。

叶群、林立果、刘沛丰等拿着手枪，乱喊乱叫：快！快！快！快！快！快！飞机快起动！飞机快起动！

叶群披头散发，林彪光着秃头，慌慌张张地跑到飞机驾驶舱门底下，在没有客机梯子的情况下，慌忙顺着驾驶舱的小梯子，一个一个往上爬。第一个上去的是刘沛丰，叶群往上爬的时候，林彪紧跟着往上爬，林彪的秃头都顶着了叶群脚。从以上几个片段，可以看出：

第一，林彪知道叶群他们是要逃往广州或香港；

第二，林彪知道周恩来要来北戴河以后，立即提出马上走；

第三，林彪对李文普说：马上夜航去大连；这究竟是他真的是要去大连，还是不愿意告诉李真实意图？

第四，叶群一把拉起林彪：快走吧，有人要抓你啦！此时，林彪应该已经知道这次转移决不是平时的动一动，而是逃跑；

第五，林彪走在最后，连帽子、大衣都没有带。这就更说明是逃跑了；

第六，林彪经过内勤室时问：东西都装上车没有？这说明他此时的状态是清醒的，决不是吃了安眠药以后的迷惑状态；

第七，林彪问林立果和警卫秘书：“去伊尔库茨克要飞多少时间？”有人认为，这是李文普一个人提出的孤证，不足以采信。

第八，汽车驶到岗哨跟前，姜作寿执行拦阻任务站在路中间，叶群命令司机冲过去。警卫秘书李文普，叫一声“停车！”司机没有听他的，只是将车速稍微慢了一下，李文普就打开车门跳下车。这时，林立果开了一枪，李文普开了一枪，八三四一部队中队长肖奇明也开了两枪，打在汽车的玻璃上。在林彪的眼皮底下发生的这种惊心动魄的情况，难道林彪还会以为这是一次平常的转移吗？

第九，叶群、林立果、刘沛丰等拿着手枪，乱喊乱叫：快！快！快！快！快！快！飞机快起动！飞机快起动！在林彪的眼皮底下发生的这种惊心动魄的情况，难道林彪还会以为这是一次平常的转移吗？

第十，叶群披头散发，林彪光着秃头，慌慌张张地跑到飞机驾驶舱门底下，在没有客机梯子的情况下，慌忙顺着驾驶舱的小梯子，一个一个往上爬。第一个上去的是刘沛丰，叶群往上爬的时候，林彪紧跟着往上爬，林彪的秃头都顶着了叶群

的脚。在林彪的眼皮底下发生的这种惊心动魄的情况，难道林彪还会以为这是一次平常的转移吗？

确定无疑地这是一次逃跑，而且是惊慌失措的溃逃！如果硬要说，此时，林彪还是不由自主的，是被人劫持的，是要逃往大连，这都不过是自欺欺人蠢话！自己走路、自己上汽车、自己上飞机，有这样的不由自主、这样的被劫持吗？大连与北戴河有什么区别？既然是怕有人抓他，逃往大连与呆在北戴河有什么区别！

再回过头来说，林彪为什么要逃跑？为什么要怕有人抓他？那是因为他心里清楚：他指挥搞了谋杀中央领导人的活动，他阴谋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他指使叶群、林立果搞了反革命五七一计划。

够了，够了，林彪的一个逃跑行动，胜过十打声明。其他任何辩解都是徒劳无益的！

2009年11月10日修改

2012年4月26日修改

第六章第二节 揭批林彪集团罪行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四日中午，王飞在电话上与江腾蛟搞攻守同盟：“我们什么也不知道”。

江腾蛟叫他老婆用暗语告诉王飞：“你要江政委买的药，统统统统被人卖光了”。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五日，王飞同他老婆在家销毁罪证，转移赃物，还准备了一个假检讨，说他是“好心为坏人办坏事”。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五日早上，赵庆生、董崎、陈庆军、程兆贤等秘密开会，研究对策。会后即分头掩埋和烧毁材料，与骨干通报情况，并用暗语打电话和派人向林彪死党江腾蛟、王维国、米家农以及辛国良等人通风报信。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七日，刘锦平又亲自召集张国民、赵庆生、陈庆军、程兆贤等开会，统一口径。刘锦平一伙还暗中布置“战略性退却”，要一些人“不再暴露”，“打进去”，“万不得已时，也只交代孤立性的问题，不交代有组织的活动”。有的竟散布“二十年以后再看”等等反革命言论。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逃出国的通知

毛主席批示：照发。

一、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

二、林彪叛党叛国，是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是林彪这个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的总暴露、总破产。

三、我们党是从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

四、当前，全党必须提高革命警惕，防止敌人破坏，必须继续加强战备。中央军委已有部署，必须坚决落实。

五、林彪叛党叛国问题，根据内外有别、有步骤地传达的原则，目前只传达到省、

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以上的党组织。有关林彪的文字、图画、电影等均暂不改动。并望切实注意严格保密。

六、你们讨论本通知的情况和意见，望及时报告，密封专送中央。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三日，黄永胜等人，在十天中既不揭发林彪的罪行，又不交代自己的问题。

周总理向毛主席报告说，黄永胜他们在拼命烧材料。

毛主席说：“是啊，那是在毁证据嘛。这些人在活动，这些家伙是要顽抗到底了。”

周总理对毛主席说：“我马上办。今天晚上办不成。明天早上一定办成。”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宣布的对黄永胜等人的处理决定。

周总理对他们宣布说：“限你们十天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你们不听。这个事还小呀，还有什么事比这个事更大！你们对党对人民是犯了罪的。现在宣布对你们实行隔离审查。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六日至十月十五日，受中共中央委托，李富春连续主持召开部分在京老同志座谈会，揭发批判林彪一伙。

陈毅、聂荣臻、徐向前、蔡畅、邓颖超、邓子恢、张云逸、张鼎丞、曾山、王震等出席。

朱德、刘伯承也分别写信或谈话，揭发林彪历史上的问题。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关于扩大传达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关于黄永胜等人离职反省的通知

毛主席批示：同意。

各大军区党委常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常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绝密）：

中央鉴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同志参加林、陈反党集团的宗派活

动，陷入很深，实难继续现任工作，已令他们离职反省，彻底交代。

军委日常工作，中央已决定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主持，并筹组军委办公会议，进行集体领导。

一九七一年九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对九一三林彪事件以来各项工作作初步总结。

会议商定：

（一）逐步扩大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的传达范围。

（二）建议在叶剑英主持下，组成由叶剑英、谢富治、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陈士渠、张才千、刘贤权十人为成员的军委办公会议。

（三）军委三总部分别由李德生、张才千、余秋里主持。

（四）提议华国锋为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

（五）派刘西尧等人去国防科委主持工作。

（六）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吴德、吴忠十人组成中央林陈反党集团专案组，下设由纪登奎、汪东兴领导的办公机构。

会议还研究了有关外事工作。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研究广州、南京等地清查与林彪有关的人和事的问题，决定派李先念、华国锋、张春桥前往帮助和检查工作。

一九七一年十月三日，中共中央关于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的通知毛主席批示：同意。

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和党的核心小组：

中央决定，撤消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军委办公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主持，并由叶剑英、谢富治、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陈士渠、张才千、刘贤权十同志组成，即日成立，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军

委日常工作。特此通知。

一九七一年十月三日，中共中央关于成立中央专案组的通知

毛主席批示：同意。

各大军区省委常委，各省、市、自治区省委常委，中央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常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和党的核心小组：

为彻底审查、弄清林——陈反党集团的问题，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专案组，集中处理有关问题。中央专案组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吴德、吴忠十人组成。在专案组领导下，设立工作机构，由纪登奎、汪东兴两同志负责进行日常工作。各地、各单位今后凡向中央上报有关林——陈反党集团的揭发材料，统请以绝密亲启件送交中央专案组统一处理。

一九七一年十月四日，毛泽东会见新成立的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

周恩来陪同会见。

毛泽东指出：林彪、陈伯达搞阴谋活动，蓄谋已久，目的就是要夺权；文化大革命中整几位老师，也是林、陈他们搞的。

毛泽东还说：要好好整顿我们的军队，头脑不要太简单了。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下达指示，要用军委名义。

一九七一年十月六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扩大传达林彪事件的通知

一、当前全国形势很好。

二、中央在审查林彪叛党叛国事件中，查出了大量物证人证，进一步说明：林彪叛党叛国是“九大”以来，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以来两个司令部，即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间斗争的继续。

三、为了使全党全军全国革命群众早日了解林彪叛党叛国事件，中央决定：在十月中旬将传达范围扩大到地方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军队连级党员干部，空军各机组、空勤地勤成员。

四、目前国内外敌人对我国内形势进行种种猜测，制造许多谣言。全党全军务必提高警惕，加强战备。对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应坚决打击。中央重申：要严格

执行保密规定，不得向没有听传达的传播。

五、各级党委传达讨论情况，逐级密封上报，特别重要紧急情况可以直送中央专案组处理。

一九七一年十月六日，曾山揭发大叛徒、大卖国贼林彪的错误和罪行

一九七一年十月六日，邓子恢揭发大叛徒、大卖国贼林彪的错误和罪行

一九七一年十月八日，李富春揭发大叛徒、大卖国贼林彪的错误和罪行

一九七一年十月十日，陈毅给毛主席的信及揭发材料

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二日、十三日，周恩来在广州两次听取广州军区负责人关于清查与林彪事件有关的人和事的情况汇报。

周恩来说：他是副统帅，打下来我怎么向人民交待？只好打开雷达监视飞机的行动，直到飞机飞出国境，才算是真相大白。这件事报告了主席，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要跑，有什么办法。

一九七一年十月中旬，纪登奎批转《保定分区学习班情况反映》（其中说：一些人在批揭批林彪过程中，把矛头指向三十八军）。

周恩来批示：要求军队方面的同志说明有关真相，团结起来，大批大揭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二日，朱德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信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关于向全国群众传达林彪叛党叛国事件的通知

毛主席批示：照发。

一、传达的文件：毛主席最近批示的五个重要文件（中发[1971]66号文件）和

本通知，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

二、传达的范围：全体共产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战士，工厂、矿山、企业、事业位全体职工，农村人民公社全体贫下中农和中农，大学、中学的教职员和学生单，小学教职员和高年级学生，城镇居民中的劳动人民，党、政、军机关工作人员。

地、富、反、坏、右、资本家，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和正在进行审查的人，都不能听传达。外国人也不能听传达。

三、传达的方法。根据若干试点单位的经验，首先应将中央文件原原本本地向群众宣读。

四、加强领导。

五、在广大群众中传达以后，原来关于林陈反党集团问题的保密规定，应作相应的修改。在工农兵和劳动人民中议论这个问题，是允许的。但是，仍然不登报，不广播，不写大字报，不写标语口号。同时，要教育听传达的群众，提高警惕，不要向阶级敌人泄露。

六、各单位传达讨论情况和揭发材料，逐级上报。重要的可以直送党中央和毛主席。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印发毛主席最近批示的五个重要文件

1971. 10. 24；中发 [1971] 66号

目 录

一、中共中央通知

中发 [1971] 57号

二、中共中央通知

中发 [1971] 61号

三、中共中央通知

中发 [1971] 62号

四、中共中央通知

中发 [1971] 64号

五、中共中央通知

中发 [1971] 65号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原题为：毛主席最近批示的五个重要文件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印发毛主席最近批示的七个重要文件
1971.10.24；中发 [1971] 68号

目 录

一、中共中央通知

中发 [1971]. 67号……………1页

二、中共中央通知

中发 [1970] 62号……………5页

三、中共中央通知

中发 [1971] 57号……………13页

四、中共中央通知

中发 [1971] 61号……………21页

五、中共中央通知

中发 [1971] 62号……………23页

六、中共中央通知

中发 [1971] 64号……………25页

七、中共中央通知

中发 [1971] 65号……………27页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原题为：毛主席最近批示的七个重要文件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会议。

讨论各地揭发批判与林彪事件有关的人和事的情况。

会议一致认为：武汉、成都两个军区问题较大，需中央给以帮助。

根据周恩来会前与毛泽东商定的设想，在京召开武汉、成都两地区党、政、军负责人座谈会，学习文件，深入批林。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九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

汇报政治局讨论意见，提出中央帮助解决问题的总的方针是：遵照主席指示，治病救人，以利团结和工作。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局会议。

听取来京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成都军区和四川省党政负责人关于揭批林彪反党集团的情况汇报。

会上，对有关人员进行了批评，要求他们回川之后，继续揭批林彪一伙，并敢于接受批评，加强领导，搞好团结。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人员时的讲话我讲了一路，一路都讲，无非是讲了一点材料。陷得比较深的是广州，他们现在搞得比较好。其次是武汉。[周恩来：武汉检讨还没有写出来。]

（此时叶剑英进来了）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师。老师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周恩来：后来杨成武大树特树绝对权威。）那是树他自己的。（周恩来：也是树林彪的，李作鹏搞了一个讲话更厉害了，简直说得不象话了。）问题搞清楚了，是林支持的，搞了一个什么“五·一六”，打倒一切。搞得这一些人不能够到家，抬不起头来。八届十二中全会，陈毅把污水尽往自己身上刷，我说，你不要讲了。

（周恩来：万人大会斗陈毅，外事口的一些外国专家也参加了，当时搞不清楚。斗完后要把陈毅抓走，大会堂的服务员不让抓走。问服务员为什么不让抓？服务员说主席叫保我们就保。）斗他的时候，向前向后三鞠躬，上汽车后又推翻了，又不承认了，说是你们逼我讲的。

杨勇是怎么一回事？（叶剑英答：当时我也不清楚。）廖汉生为什么要抓？（周恩来：廖汉生是与贺龙有关系。就是贺龙，主席当时也不同意这样搞。）杨勇这个事情是林彪支持搞的，林对我说过，后又不承认。

你们如果有时间，鲁迅的有一本书是值得看看的。《准风月谈》的后记里，有曹聚仁写的一篇《文艺座谈遥领记》。曾今可要开文艺座谈会，请了曹聚仁没去，报上登出来，他成了发起人。曹就问龙榆生，那天的会是怎么开的，龙说：就是吃点点心、喝喝茶。曹聚仁说：“吃了人家的茶，就是人家的人啦！”这件事，可见那时斗争的复杂。现在，吃了人家的茶，就是人家的人？我看不一定。今天你们吃了我的茶，就是我的人吗？不一定。总理、康老都喝过他们的茶嘛！吃了他的茶，就是他的人，不要党，不要中央了吗？

《我的一点意见》写好后，第二天早晨总理、康老去找林彪，看了以后，他说同意了。《我的一点意见》当时没有题目，撇开一些问题，中心是个主席问题，我就撇开。那个司令部要我当国家主席是假，林当主席、林接班是真。也有一些人是真心要我当主席，和林彪不一样。有人说，我不当主席，老百姓通不过。我说：我不当主席有十几年了嘛。我这个人，同你们吹一吹是可以的，要我当国家主席，天天去迎接外宾，迎来送往，什么国书啊，那一套，无非是催我见上帝。（叶剑英：主席很忙，还有很多东西还没有写出来。）和大家吹一吹就是了。

那些人整叶剑英的黑材料，我都看过，他们是步步升级，先是炮轰，后是打倒。后来他们看形势打不倒了，也就不打了。“红造”并不都是“五·一六”。整理的黑材料，有一条国民党报上的消息，说红军长征了，叶在江西投降敌人。他是跟着长征了嘛，你们这些老同志都是长征的，那有那个事呢？

红军的传统历来不能自己打自己。（指张国华）你就是王佐部队的一个兵。（周恩来：后来是司号长。）王佐这个人无论如何是有功劳的，而且还加入了党。就是舍不得那个山头，吃不了苦。王佐这个人被彭德怀杀了，这就不好了嘛！那有共产党的部队打共产党的部队？五军团的冀登同也不该杀。人还是少杀一点好。我们对反革命，不杀，保存起来对党有益，因为他们是活证据嘛。你把解方这样的人杀了干什么。（周恩来：那个王实味也可以不杀。）不杀，现在多好。国民党抓刘少奇、审判刘少奇的人，抓陈伯达、审判陈伯达的人还活着，这些都是活证据嘛。

关于成都地区问题，毛泽东说：错了改了就好。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

的通知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会议。

约来京参加武汉地区座谈会的武汉军区和湖北省党政负责人谈话，了解对与林彪事件有牵连的人和事的揭批情况。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

报告：

武汉地区的会不如成都地区开得好，但后期大有进展。

刘丰会后自杀未遂。

从现在情况看，武汉地区领导同志座谈会不宜再拖下来。

建议主席近期接见一次参加该地区座谈会的负责人。

毛泽东阅批：同意。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的材料之一

早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前，林彪和他的老婆叶群就背着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同志，同老反共分子陈伯达勾结在一起，指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多次开会，多方串连，阴谋策划，妄图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九大”前夕，林彪伙同陈伯达妄图破坏毛主席亲自主持的“九大”政治报告的准备工作。

“九大”以后，林彪和陈伯达破坏《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出版工作。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在林彪的指使下，吴法宪任命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任命周宇驰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林彪趁毛主席不在北京，擅自发布所谓“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调动全军进入战备状态，这样的大事，竟不请示毛主席、党中央，实际上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

林彪、陈伯达及其一伙在庐山会议上的全部活动，完全是有准备、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的。他们突然袭击，煽风点火，背叛“九大”路线，破坏九届二中全会原定议事日程，妄图分裂我党我军，向毛主席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它的性质完全是一次被粉碎了的反革命政变。

林陈反党集团策动的反革命政变，是有国际背景的。

九届二中全会召开前，七月中旬，陈伯达一反常态，特意穿上军装，窜到中蒙边境活动。他在李雪峰、郑维山的陪同下，到处接见前线驻军，召开群众大会，发表讲话，制造声势。他的这些活动是做给苏修看的。

九届二中全会召开期间，正当林陈反党集团兴风作浪的时候，苏修叛徒集团遥相策应。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六日，勃列日涅夫偕同国防部长格列奇科率领的武装部队代表团，窜到中苏边界附近的阿拉木图，在那里发表蛊惑人心的讲话，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出动了火箭、炮兵、坦克和空降部队。随后，勃列日涅夫又到接近我国的塔吉克、吉尔吉斯、土库曼、乌兹别克等中亚地区活动，一直呆到九月九日，我党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以后，他才离开中亚。格列奇科还到后贝加尔、蒙古等地活动，视察中苏边境地区的武装部队，叫嚷边防军要“加强战斗准备”，对我施加压力。同时，继续发表反华文章，对我进行恶毒攻击，但却不点林彪的名，集中攻击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一九七一年六月至九月上旬，苏修反华文章急剧增加，据初步统计，苏修中央一级的报刊、电台发表和广播的反华文章，竟达七百九十六篇。

这一切绝不是偶然的。

- (一) 九届二中全会以前
- (二) 九届二中全会上
- (三)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日，肖克对林彪的揭发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聂荣臻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信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中央政治局会议。

根据毛泽东二十日谈话精神，会议决定：今后在毛泽东像上一律不印林彪题的四个伟大，也不再提四个伟大。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

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的材料之一下发，要求各级党组织进行传达、讨论。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周恩来批阅李德生报来的《一九七〇年七月十四日空军政治部党委讨论空军党委常委七月六日办公会议精神纪要》。

周恩来批示：要将此事真相查清。空政纪要中提出的这五条措施，是最封建、最买办、最法西斯的。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至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召开在京上层爱国人士人士座谈会。

周恩来主持并传达中央关于揭批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一系列文件，并介绍九一三事件后中央采取的若干重要措施情况。

叶剑英、李富春、聂荣臻、徐向前、蔡畅、邓颖超、王震、曾山、张云逸、张鼎丞等在京老同志先后参加了座谈会。

周恩来说：林彪事件，乍听起来是坏事，但再看再听再想，又是大好事，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大收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二十二年的伟大胜利。基本的东西是搞马列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路线清楚了，在这条路线下就要团结大多数，不仅在党内如此，就是劳动人民和爱国人士中，也要团结大多数。在正确路线下，组织问题就是团结问题。粉碎林彪事件说来惊险得很，但当时处理并不紧张，因为我们相信绝大多数群众，相信绝大多数干部。

周恩委托以李副春为首的十位老同志参加和领导各组座谈，并负责解释文件。

贰、本节简论

林彪突然叛逃，打乱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堵塞漏洞，稳定局势。

一、根据内外有别、有步骤地传达的原则公布林彪出逃真相。

第一步：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逃出国的通知

目前只传达到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以上的党组织。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六日至十月十五日，受中共中央委托，李富春连续主持召开

部分在京老同志座谈会，揭发批判林彪一伙。

陈毅、聂荣臻、徐向前、蔡畅、邓颖超、邓子恢、张云逸、张鼎丞、曾山、王震等出席。

第二步：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关于扩大传达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传达到县、区、乡

第三步：一九七一年十月六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扩大传达林彪事件的通知在十月中旬将传达范围扩大到地方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军队连级党员干部，空军各机组、空勤地勤成员。

第四步：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关于向全国群众传达林彪叛党叛国事件的通知

传达到全体人民，但不向敌人、外国人泄漏。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至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召开在京上层爱国人士人士座谈会。

国内外敌人对我国内形势进行种种猜测，制造许多谣言，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为林彪反党集团辩护。

右倾保守势力以及犯错误的人必然乘机翻案，攻击文化大革命。

群众受过去大树特树的影响，对发生林彪案件感到不可理解。

这些都要做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

二、抓紧清理有关林彪案件的人和事

1，对黄永胜等人实行隔离审查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宣布的对黄永胜等人的处理决定。

现在宣布对你们实行隔离审查。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关于黄永胜等人离职反省的通知

军委日常工作，中央已决定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主持，并筹组军委办公会议，进行集体领导。

2，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

一九七一年九月三十日，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建议在叶剑英主持下，组成由叶剑英、谢富治、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

奎、汪东兴、陈士渠、张才千、刘贤权十人为成员的军委办公会议。

军委三总部分别由李德生、张才千、余秋里主持。

3，成立中央林陈反党集团专案组

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吴德、吴忠十人组成中央林陈反党集团专案组，下设由纪登奎、汪东兴领导的办公机构。

一九七一年十月三日，中共中央关于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的通知三、抓紧处理几个重点地区的问题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研究广州、南京等地清查与林彪有关的人和事的问题，决定派李先念、华国锋、张春桥前往帮助和检查工作。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会议。

会议一致认为：武汉、成都两个军区问题较大，需中央给以帮助。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会议。

听取来京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成都军区和四川省党政负责人关于揭批林彪反党集团的情况汇报。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人员时的讲话陷得比较深的是广州，他们现在搞得比较好。其次是武汉。

关于成都地区问题，毛泽东说：错了改了就好。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会议。

约来京参加武汉地区座谈会的武汉军区和湖北省党政负责人谈话，了解对与林彪事件有牵连的人和事的揭批情况。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

报告：

武汉地区的会不如成都地区开得好，但后期大有进展。

刘丰会后自杀未遂。

从现在情况看，武汉地区领导同志座谈会不宜再拖下来。

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对敌

在发生林彪叛逃事件以后，如何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对敌，就成了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特别是对那些在十七年中犯过错误的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犯

过错误的同志，应该团结他们一道工作。

但是对于他们曾经犯过的错误，不应该轻易地全盘否定。如“二月逆流”问题。

五、林彪事件中受益最大的几个人 ‘

第一个是叶剑英，林彪事件后由他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他有一个“二月逆流”的问题，但这个时候被毛泽东基本否定了。他的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真实面貌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到一九七五年，他与邓小平相钩结，大刮右倾翻案风，阴谋逮捕左派领导人，他的真实面目才终于被毛泽东看清了。

第二个是华国锋，他被提升为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相当于国务院的副总理，从其他同是所谓支持文革的老干部中突出出来了。

第三个是汪东兴，他不仅是中央林彪反党集团专案组的成员，而且与纪登奎共同领导专案组的办公机构。这是一个清查有关林彪反党集团的人和事的、权力很大的机构。其实，他早在一九六八年以后就开始与林彪集团相钩结，一九七〇年八月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搞的突然袭击中，他也是一个重要成员。经过毛泽东的批评教育，他看到风向不对，立即伪装检讨并揭发陈伯达的问题，蒙混过关。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逝世以后，他的真实面目立刻就暴露出来了。

2009年10月某日初稿

2012年4月27日修改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七章 开展外交新局面

第一节 毛泽东决定开展中美谈判

壹、本节概述

一九六八年冬天，毛泽东读了有关美国总统竞选的材料，并对在中国的美籍专家柯弗兰写的文章（其中称共和党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将当选本届美国总统）表示“欣赏”。

他还仔细阅读了不久后当选第三十七届美国总统的尼克松所写的《六大危机》，认为该文“写得不错”。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某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尼克松在一月二十日发表的就职演说。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一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试图与中国领导人直接通话，商谈两国关系问题。随后，苏驻华使馆临时代办称“有话要转达”给中方。周恩来与有关方面拟定了一份答复苏方的备忘录，内称：“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请示报告上批示：

“同意备忘录的立场，即准备举行外交谈判。”

一九六九年某月，毛泽东提议由陈毅挂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研究一下国际问题。”

同年七月和九月，他们先后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两份研究报告送交中央。在这两份报告里，提出：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

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在目前美、苏两国都急于打“中国牌”的情况下，中国处于战略主动地位。

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七日，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马丁致函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刘兴元，询问今年二月十六日因乘游艇越入中国广东珠海附近海域被中方拘留的两个美国人鲍德温、唐纳德的下落、健康及释故事，并要求转递这两人亲属信件。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七日，外交部就美国驻香港总领事来函一事报告：此举显然是美国政府采取试探我反应的一个新行动，建议接过此事，适时（十二月初）释放美二人，并发消息，通知美驻波兰大使。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说：“尼克松、基辛格的动向可以注意。”

近期内，急于对付苏联的美国政府在中苏珍宝岛冲突后，积极地作出一系列姿态，如：宣布放宽对中美之间的人员往来和贸易限制，不同意苏联提出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及其他旨在孤立中国的行动，下令停止派驱逐舰到台湾海峡巡逻，等等。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日，在波兰首都华沙文化宫举办的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上，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在众目睽睽之下追赶中国使馆官员，急切地向中方人员表示，尼克松总统本人打算同中国领导人进行“重大的具体的会谈”。

当天晚上看到发自中国驻波兰使馆电文的周恩来，立即将这个情况报告毛泽东，并说：“找着门道了，可以敲了，拿到敲门砖了。”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四日，周恩来就在华外国人研究处理小组十一月二十日关于两个美国人被拘一事的报告，致信毛泽东、林彪：经过政治局在京同志商榷，拟同意外交部对释放美国游艇的意见，时间拟定七日或以后。

毛泽东批示：照办。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周恩来在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时，请他转告叶海亚·汗总统：尼克松如果要同中方接触，尽可利用官方渠道。

周恩来在谈话中指出：当前国际事务错综复杂。从全世界来说，美苏两国既相互争夺，又相互勾结，争霸世界现在是超级大国撤军备战，但同时也进行谈判。首先美苏在赫尔辛基进行核会谈。另外，中苏举行边界会谈，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注视。另一方面中美之间的关系也在变化，美国大使在华沙向我试探，他在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时装展览会上同我译员进行了谈话。对美其名曰关系，中国的立场一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是美国一切武装力量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去。感谢叶海亚总统把中国的立场说得很清楚。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就外交部复电稿事报毛泽东。

外交部拟稿复中国驻法国、瑞士使馆电稿：美方人员如要求见我大使、全世界可拒绝接见如要求见我一般工作人员，可接见，我必须两人在场，只听不说，允为转达，但均不约回答日期。

周恩来说：我外交部采取一切拒绝态度，恐不甚适当，现改复我驻法、驻瑞两使馆一电，采取只收、只听，暂不答复态度。而在对我有利于接触时，才给回答。关于中美华沙会谈，拟在一月初答复：定在二月二十日恢复会谈。

毛泽东批示：同意。

一九七〇年一月十五日，周恩来修改外交部致中国驻波兰使馆全世界雷阳电稿及即将举行的第一三五次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中方发言稿，加写：在我发言后，美方如重提美与台湾有条约关系，我应答以“美蒋条约”是全中国人民所不承认的；美方如询更高级会谈或其他途径何所指，可答以美国政府如对此感兴趣，可提出方案也可在大使级会谈中双方商定出方案。

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日，中美两国恢复了中断了两年多的华沙大使级会谈。

一九七〇年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外交部给中国驻波兰代办雷阳电稿和参加第一三六次中美会谈中方发言稿。

根据周恩来提议，将中美其名曰会谈中方发言稿中“如果美国政府愿意派部长级的代表或美国总统的特使到北京进一步探讨中美关系中的根本原则问题，中国政府愿予考虑”中的“考虑二字改为”接待“。

会后，周恩来又在改处加旁注：“接待两字是我提议改的。因我方在一三五次会议发言中，已经提到考虑和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进行，而美方在上次谈话已提到来北京直接讨论并且顺着这段话，最后还用考虑也显得太轻了，故改为接待较欢迎为轻，较考虑就落实了一些。

同日，周恩来将讨论结果报毛泽东、林彪。

毛泽东批示：照办。

一九七〇年一月、二月，中美进行两次会谈中：

美大使表示：美国政府愿意改善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对中苏分歧，它无意站在那一方，无意参加反对中国的联盟，也不支持勃列日涅夫主义。美国和台北政府的关系，有协助保卫台澎的义务，但并不妨碍你们双方达成任何和平解决。随着亚洲和平和稳定的增长，美国将能削减现在台湾的所有军事设施。美国愿讨论不仅台湾问题，而且在中美之间的全部双边问题，并愿讨论一项联合宣言，肯定两国政府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美国政府还准备派代表到北京直接商谈，也愿在华盛顿接待中国代表。

我代办在两次会谈中表示：只有严格遵守五项原则，才能实现和平共处。我重申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容外人侵占，因此必须商定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才能从根本上改善中美关系，并推动其他问题的解决。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不容外人干预，更绝对不能允许进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活动。为解决这个主要矛盾，需要“进行更为彻底的探索”，我方提出如果美方愿意派部长级的代表或美国总统的特使到北京商讨，中国政府愿予接待。

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一日，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报来巴总统叶海亚·汗向张彤大使转达尼克松口信：准备开辟一条白宫通向北京的直接渠道，如果北京同意的话。这样一条渠道的存在，将不会被白宫以外的人知道，而且我们可以保证完全自由的决断。

周恩来阅后批：尼克松想采取对巴黎谈判办法，由基辛格秘密接触。

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就推迟中美北京会谈事致信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提出：将会谈日期推迟至四月中旬，即在中国总理访问朝鲜之后、美苏举行限制核武器谈判之前。

毛泽东批示：可略推迟几天，以四月十五日为好，请总理酌定。

一九七〇年五月四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政府悍然出兵侵入柬埔寨，扩大在印度支那的侵略战争。

一九七〇年五月十六日，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当前形势和外交部的建议。

商定：（一）推迟原定五月二十日举行的中美会谈，将双方联络员的会晤，定在六月二十日；（二）建议毛泽东发表一简短声明，支持国际反美革命斗争、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和西哈努克政府；（三）召开国内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北京群众大会请毛泽东、林彪出席，西哈努克讲话。

次日，毛泽东批示：照办。

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毛泽东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严厉抨击美国政府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对内对外政策，强烈谴责美军近年来对印度支那的侵略。

声明指出：“尼克松政府内外交困，国内一片混乱，在世界上非常孤立。抗议美国侵略柬埔寨的群众运动席卷全球。”“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怕美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各国人民，一有风吹草动，它就惊慌失措。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声明指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

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一日，首都北京以及全国各地军民举行集会游行，坚决拥护毛泽东的“五·二〇”声明，支持印度支那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

毛泽东、周恩来等出席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的五十万人的盛大集会，林彪宣读了毛泽东声明的全文。

一九七〇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会见斯诺和夫人。

一九七〇年十月初，尼克松会见美国《时代》周刊杂志记者时称：“如果说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想做的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

一九七〇年十月下旬，尼克松当面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商量，请叶作为“中介人”，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提供助力”。

随后，借欢迎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宴会的机会，尼克松谈到国际问题时“第一次有意地”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并在私下托罗领导人再次将希望美中进行高级接触的“口信”转达给中方。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五日，周恩来与斯诺及其夫人长谈。

周恩来在谈到中美关系时说：中美谈判从一九五五年开始到现在，没有解决什么问题。为要解决问题，现在就要谈台湾问题，就是美国武装侵略和占领了台湾及台湾海峡。其他问题都是次要的。对此，我们谈判的态度和方针不会改变，应改变的是美国政府。我们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日至十四日，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叶海亚·汗来华进行访问。

十日晚，周恩来单独同叶海亚会谈时，叶海亚转达了尼克松准备派其高级助手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点与中国相应的代表对话的口信。

周恩来感谢叶海亚去年以来几次转达尼克松口信，并表示将把叶的传话内容报

毛泽东。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四日，周恩来同叶海亚单独会谈。

周恩来回答在尼克松的“口信”时说：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涉；美国武装力量占领台湾和台湾海峡，是中美关系紧张的关键。中国政府一直愿意以谈判来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尼克松总统表示要走向同中国和好。如果美方真有解决上述关键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总统派特使来北京商谈，时机可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商定。

周恩来并且特别说明，这条“口信”是得到毛泽东主席批准的。

十二月九日，美方正式获悉周恩来的“口信”。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四日，周恩来同罗马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勒杜列斯库会谈。

勒杜列斯库向周恩来转达了尼克松和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对寻求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解决办法表示的关切，以及尼克松两次表示美方愿同中国领导人就改善中美关系进行谈判的愿望。

对此，周恩来重申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一贯立场，提出：如果美国真有解决这一关键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尼克松的特使或尼克松本人来北京商谈。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中国外交部就美国政府下令恢复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实行轰炸一事发表谴责美国政府的声明。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会见斯诺说：尼克松他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毛泽东七十七岁诞辰前夕，《人民日报》头版以显著位置刊出毛泽东和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合影照片，用含蓄的方式向美方发

出信息。

尼克松后来回忆道，毛泽东同斯诺所谈欢迎他访华的内容，“我们在几天后就知道了”。

一九七一年一月五日，经过巴基斯坦总统的传话，尼克松总统的回答口信：美国认为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是有益的，它不仅限于台湾问题，而应包括解决其他问题的步骤，美国建议在第三国开一预备会议，作出各种安排。

一九七一年三月五日至八日，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越南。

一九七一年三月中旬，中国乒乓球队到日本参赛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有关方面对是否参赛问题却产生两种不同意见。其中不赞成去的意见还占多数，理由是获悉国外敌对势力企图对中国队参赛进行破坏活动，去了危险性很大。周恩来以很大耐心说服不同意参赛的一方。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五日，周总理给毛主席的报告中说，我乒乓球队拟仍前往日本名古屋参加三十一届国际乒乓球比赛。到日本后支持柬民族团结政府不承认朗诺集团的球队为合法，并主张驱逐，对南越卖国集团派的球队，亦采取同一态度，对以色列也询问阿联、叙利亚的态度。如不成，就避开与他们比赛。我球队如去，当作好各种警戒准备。此次出国参赛，已成为一次严重的国际斗争，我方提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即使输了也不要紧。

当天，毛主席批示：“照办，我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八日至四月七日，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比赛期间，中国和美国运动员进行了友好接触，美国乒乓球队向中方提出访华的请求。

一九七一年四月三日，外交部、国家体委就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问题写报

告给周恩来。报告认为目前时机还不成熟。

一九七一年四月四日，周恩来将圈阅后报告送毛泽东审批。

一九七一年四月六日，经过三天考虑，毛泽东终于在世乒赛闭幕前夕作出决定：邀请美国队访华。他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道：

“毛主席在四月六日那天给我看了份文件。这是什么文件呢？这是由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起草的一份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这上面，毛主席在他自己的名字上圈阅了。我当时想，这么看来，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个大局已定，因为大家的意见都一致。主席让我看完文件后退给外交部去办理，办完这件事以后我觉得主席有心事，因为我跟他相处久了，看得出来，至于有什么心事我不知道。就在四月六日那天，他要提前吃安眠药，他要提前睡觉。晚上十一点多了，他坐在这儿，当时那儿是床，他就坐在床边、床前面的桌子上吃饭，我坐在他对面。他因为吃了大量的安眠药，困极了，他就脑袋这么低着，就在那儿这么低着睡，就是不肯躺。过了一会儿，他突然间说话了，嘟嘟啾啾的，听不清楚说什么。听了半天，我才听出来，他要我去给王海容同志打电话，当时王海容同志是外交部副部长，他说要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我的天哪，我一听这话当时就愣了。我想这跟白天退走的文件正好相反，如果我按他现在说的去办，那跟文件的精神不符合呀，那总理和他都画了圈的，那可能会办错了。再有，主席曾经跟我交待过，他说他吃了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那么现在他跟我交待的这件事就是他吃了安眠药后讲的，那算不算数呢？我如果照他现在说的去办，那不就是错上加错了吗？我在提醒自己，这么大的事可不能轻举妄动。我得想一个办法来证实主席现在到底是清醒还是不清醒。用什么办法呢？我想，那就是我得让他再主动地讲话。过了一会儿主席勉强地抬起头来，使劲睁开眼睛看着我说：小吴，你怎么还坐在那儿吃呀？我叫你办的事你怎么不去办呢？我想这下可好了，主席可说话了，我就很大声地问他，我说：主席，你刚才都跟我说了什么啦，我尽顾吃饭了，没听清楚，你再跟我说一遍。不错，他又断断续续，一个字一个字地、慢慢吞吞地又把刚才交待的事重新说了一遍。我就反问了一句，我说你现在都吃了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主席就向我这么挥了一下手，说：算，赶

快办，要不就来不及了。这个时候我意识到了，毛主席作了最新的决定。”

毛泽东自己也讲过：“那个文件（指关于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请示），我本来也是看了的，划了圈。后来到了晚上，考虑还是要请，就叫打电话。结果那边他们也是没有准备，就去请示东京的大使馆，马上发护照，就来了。”

一九七一年四月七日，外交部电话通知在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对外宣布：正式邀请美国队访华。

邀请美国乒乓球队的消息一传到名古屋，立刻在全世界引起轰动。日本各大报纸都在头版显要位置登出有关报道，并大加评论。这件事产生的影响，已“超过三十一届国际比赛的消息”。

消息很快传到美国白宫。美国总统尼克松后来回忆道：

“这个消息使我又惊又喜。我从未料到对华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得到实现。我们立即批准接受了邀请。中方作出的响应是发给几名西方记者签证以采访球队的访问。”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四日，美国宣布结束已存在二十年的对我们两国间贸易的禁令。

尼克松还下令采取一系列新的步骤，放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货币和航运管制。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四日，周恩来会见应邀来我国访问的加拿大、哥伦比亚、英格兰、尼日利亚和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全体成员。

周恩来在同以美国乒乓球协会主席格雷厄姆·斯迁霍文为团长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全体成员谈话。引“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古语，对他们表示欢迎。

他说：中美两国人民过去往来是很频繁的，以后中断了一个很长时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我们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人民大多数的赞成和支持。

他在回答美国队员格伦·科恩询问对美国青年中流行的嬉皮士运动的看法时说：现在世界青年对现状有点不满，想寻求趣。青年思想波动时会表现为各种形式。但各种表现形式不一定是成熟的或固定的。按照人类发展来看，一个普遍真理

最后总要被人们认识的，和自然界的规律一样。我们赞成任何青年都有这种探讨的要求，这是好事。要通过自己的实践去认识。但是有一点，总要找到大多数人的共同性，这就可以使人类的大多数得到发展，得到进步，得到幸福。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一日，周恩来给尼克松回了一个口信，指出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两国高级负责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进行直接晤谈。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尼克松回话，表示诚挚谢意，愿在两星期内给予答复。

一九七一年五月十七日，尼克松口信表示：为解决两国之间那些分歧问题，并由于对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重视，他准备访问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位领导人进行直接交谈，双方都可以自由提出各自主要关心的问题。

尼克松提议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来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议，基辛格准备在六月十五日以后到中国来。

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二日，尼克松又补来一个口信，说明美国总统在五月二十日发表的关于美苏两国政府同意在今年内制订出一个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的部署的协定，决不会影响美国总统的政策，这个政策是不签订任何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基辛格也准备把这个问题列入他将参加的预备会议的议程之中。

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九日，周恩来总理给尼克松总统的口信

周恩来总理向叶海亚总统表示诚挚的谢意，感谢总统阁下极其迅速地转来了尼克松总统的三次口信。

周恩来总理认真研究了尼克松总统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五月十七日和五月二十二日的三次口信，并且十分高兴地将尼克松总统准备接受他的建议访问北京

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诸位领导人进行直接交谈一事报告了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主席表示欢迎尼克松总统的访问，并且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好与总统阁下进行直接交谈，自由地提出各自关心的主要问题。不言而喻，首先要解决中美之间的关键问题，也就是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一切武装力量的具体办法问题。周恩来总理欢迎基辛格博士作为与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性会议的美方代表，提前来华为尼克松总统的访问北京作准备工作并进行必要的安排。

周恩来总理建议，基辛格博士最好将来华时间定在六月十五日至二十日之间，地点可在北京，由伊斯兰堡可直飞北京不公开的机场。乘机可用巴航波音机，如需中国专机，亦可派往接送。会谈连同空航来往，约需三至四天。通讯如需架设自带的无线电机，可于抵离北京期间临时启用。

鉴于基辛格博士行动难于严格保密，也可以考虑以公开身份来谈。如仍需保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当严格保证。在会谈有成效后，如需会后公布，当由双方商定。

其他细节，可通过叶海亚总统和中国大使直接磋商和安排。

周恩来总理热烈期待基辛格博士不久前来北京的会晤。

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九日，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

现在，我们应对基辛格的预备会议和尼克松的访问，作出各种可能的估计，预拟出各种对策，以便根据实际发展和变化，随时提出审查和讨论，必要时可加以补充和修改。

一、美国一切武装力量和专用军事设施，应规定期限从中国的台湾省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这是恢复中美两国关系的关键问题。这一条如不能事先有原则商定，尼克松的访问就有可能推迟。

二、台湾是中国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外人不容干预。要严防日本军国主义在台湾的活动。

三、我力争和平解放台湾，对台工作要认真进行。

四、坚决反对进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活动。如美利坚合众国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五、如因前三条尚未完全实现，中美不便建交，可在双方首都建立联络机构。

六、我不主动提联合国问题，如美方提到联合国问题，我可明确告以我绝不能接受“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的安排。

七、我不主动提中美贸易问题，如美方提及此事，在美军从台湾撤走的原则确定后，可进行商谈。

八、中国政府主张美国武装力量应从印度支那三国、朝鲜、日本和东南亚有关各国撤走，以保证远东和平。

有人问：为什么要先与尼克松商谈呢？

因为他是当权派，如能得到他的赞同，这些主张在大选前实现的可能性就大些。如先与其反对派谈，即使得到赞同，成为竞选纲领，当选后亦未必兑现。不如先当权派，后反对派，这样我们就更加主动。并且基辛格来谈招致失败，对尼克松竞选大不利，这也可对基辛格增加压力，或者也可使反对派振振有词。

有人问，中美会谈不同一般，会不会影响美国人民的斗志？

美国群众运动，在尼克松上台后，确是高涨，重点在反战和反种族歧视。有人说，运动处于抛弃改良走向革命的过渡之中。我们正好以从越南撤军和从台湾撤军、走向同中国建立正常关系这两张牌动员美国群众，影响当权派中反对派的政策，增长群众的斗志。目前美国真正左派朋友都承认，美国正处在革命大风暴的前夕，群众思潮动荡起伏，需要正确领导，也正在开始锻炼和考验领导。几年内，还不能预言美国有爆发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可能，而印支抗美战争，中美人民来往和两国会谈，正是动员美国群众、考验群众领导的好机会。当年中国大革命（1924-27）前夕，苏俄一方面派代表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进行国共合作，另一方面派大使驻北京与北洋政府进行外交谈判，列宁当时采取这样的外交路线，是起了动员中国人民群众的作用的。这段历史可供参考。

又有人问，中美会谈会不会有碍印度支那抗美战争和巴黎谈判？

这可能有一时波动，但谈清楚了会更有助于印支抗战和巴黎谈判，因为尼克松已认清美苏争霸的焦点在中东和欧洲，还不是远东。中美会谈如有进展，必将有助于印支撤军和巴黎谈判。即使步骤有先后，也更利于支援印支抗战。

又有人问，尼克松、基辛格这一手是否有诈？

表面谈和，实质不变，以涣散我备战士气，小则放蒋出笼，大则引苏东向。今天的形势是我们不断同帝、修、反斗争胜利的结果，也是美帝内外交困和美苏争霸

世界的必然趋势，姑不论美帝有无欺诈的可能，我现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斗、批、改阶段，战备不懈是我经常任务，若有风吹草动，正好锻炼我动员和作战能力，也正好更加暴露其反动面目，提高人民觉悟。反之，如能谈好，至少可使两霸相争加剧，我可增强战备力量。敢战方能言和，谈和更需备战。这是我党同帝、修、反斗争的多次经验，应当永志不忘！

一九七一年五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的通知

毛主席批示，照发。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或党的核心小组，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党委，党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

现将《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发给你们。此件请印发党的基层党支部，口头传达至全体党员，并认真组织学习，正确领会主席谈话精神。

斯诺访华后，陆续在外国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文章，谈及毛主席同他谈话的情况。新华社编印的《参考消息》将陆续转载斯诺的文章。请在阅读斯诺的文章时注意，以毛主席的谈话为准。如非党员干部和群众据此提出问题，亦请以毛主席的谈话为准予以回答和解释。

党内外的反映，请汇集后报告中央。

一九七一年六月四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宣读《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

一九七一年六月四二十一日，周恩来会见并宴请在华访问的美国《纽约时报》、《每日新闻》、《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和夫人。

周恩来说：“我们要求美国政府不要干涉中国内政，美国一切武装力量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这个问题解决了，一切问题就解决了。中美关系，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关系就可以建立了。这是我们从一九五五年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十五年来的一贯主张，

没有别的要求。

贰、本节简论

毛泽东时刻关注着中国的国际环境的变化。

一九六九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日，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发表就职演说。二是，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苏联边防军侵入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制造严重的流血事件。

一九六九年某月，毛泽东提议由陈毅挂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研究一下国际问题。”

一九六九年七月和九月，他们先后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两份研究报告送交中央。在这两份报告里，提出：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在目前美、苏两国都急于打“中国牌”的情况下，中国处于战略主动地位。

中美开始新的秘密接触。

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七日，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马丁致函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刘兴元，询问今年二月十六日因乘游艇越入中国广东珠海附近海域被中方拘留的两个美国人鲍德温、唐纳德的下落、健康及释故事，并要求转递这两人亲属信件。这是美国希望与中国接触而采取的一项行动。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说：“尼克松、基辛格的动向可以注意。”近期内，急于对付苏联的美国政府在中苏珍宝岛冲突后，积极地作出一系列姿态，如：宣布放宽对中美之间的人员往来和贸易限制，不同意苏联提出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及其他旨在孤立中国的行动，下令停止派驱逐舰到台湾海峡巡逻，等等。

经过一系列的接触，于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日，中美两国恢复了中断了两年多的华沙大使级会谈。

尼克松寻找新的接触渠道。

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一日，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报来巴总统叶海亚·汗向张彤大使转达尼克松口信：准备开辟一条白宫通向北京的直接渠道，如果北京同意的话。

这样一条渠道的存在，将不会被白宫以外的人知道，而且我们可以保证完全自由的决断。

周恩来认为：这是尼克松想采取对巴黎谈判办法，由基辛格秘密接触。

但是，这一次试探行动由于一九七〇年五月，美国政府悍然出兵侵入柬埔寨，扩大在印度支那的侵略战争而遭到破坏。

一九七〇年五月四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的侵略行动。

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毛泽东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严厉抨击美国政府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对内对外政策，强烈谴责美军近年来对印度支那的侵略。

中美双方进行新一轮的秘密接触。

一九七〇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会见斯诺和夫人。

一九七〇年十月下旬，尼克松当面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商量，请叶作为“中介人”，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提供助力”。随后，借欢迎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宴会的机会，尼克松谈到国际问题时“第一次有意地”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并在私下托罗领导人再次将希望美中进行高级接触的“口信”转达给中方。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日至十四日，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叶海亚·汗来华进行访问。叶海亚转达了尼克松准备派其高级助手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点与中国相应的代表对话的口信。周恩来回答在尼克松的“口信”时说：如果美方真有解决台湾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总统派特使来北京商谈，时机可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商定。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会见斯诺说：尼克松他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毛泽东七十七岁诞辰前夕，《人民日报》头版以显著位置刊出毛泽东和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合影照片，用含蓄的方式向美方发出信息。

一九七一年一月五日，经过巴基斯坦总统的传话，尼克松总统的回答口信：美国认为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是有益的，它不仅限于台湾问题，而应包括解决其他问

题的步骤，美国建议在第三国开一预备会议，作出各种安排。

毛泽东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八日至四月七日，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比赛期间，中国和美国运动员进行了友好接触，美国乒乓球队向中方提出访华的请求。

一九七一年四月三日，外交部、国家体委就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问题写报告给周恩来。报告认为目前时机还不成熟。

一九七一年四月四日，周恩来将圈阅后报告送毛泽东审批。

一九七一年四月六日，经过三天考虑，毛泽东终于在世乒赛闭幕前夕作出决定：邀请美国队访华。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四日，周恩来会见应邀来我国访问的加拿大、哥伦比亚、英格兰、尼日利亚和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全体成员。

中美双方达成基辛格秘密访华的协议。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四日，美国宣布结束已存在二十年的对我们两国间贸易的禁令。尼克松还下令采取一系列新的步骤，放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货币和航运管制。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一日，周恩来给尼克松回了一个口信，指出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两国高级负责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进行直接晤谈。

一九七一年五月十七日，尼克松口信表示：为解决两国之间那些分歧问题，并由于对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重视，他准备访问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位领导人进行直接交谈，双方都可以自由提出各自主要关心的问题。

尼克松提议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来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议，基辛格准备在六月十五日以后到中国来。

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九日，周恩来总理给尼克松总统的口信。建议：基辛格博士最好将来华时间定在六月十五日至二十日之间，地点可在北京，由伊斯兰堡可直飞北京不公开的机场。

中国关于进行中美谈判的基本立场。

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九日，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

一九七一年五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的通知。

这两个文件充分阐明了中国关于进行中美谈判的基本立场：美国一切武装力量和专用军事设施，应规定期限从中国的台湾省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台湾是中国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外人不容干预。

中美谈判在国内外都引起了不少人的疑虑。

有的人不理解：为什么与美国进行谈判要先与尼克松商谈。

有的人怀疑：中美会谈会不会影响美国人民的斗志。

有的人担心：中美会谈会阻碍印度支那抗美战争和巴黎谈判。

有的人提出：尼克松、基辛格这一手是否有诈？表面谈和，实质不变，以涣散我备战士气，小则放蒋出笼，大则引苏东向。

党中央和毛泽东对谈判的形势作了充分的估计：如谈不好，美国放蒋出笼、引苏东向，正好锻炼我动员和作战能力，也正好更加暴露其反动面目，提高人民觉悟。反之，如能谈好，至少可使两霸相争加剧，我可增强战备力量。

正如中央政治局报告指出的：敢战方能言和，谈和更需备战。这是我党同帝、修、反斗争的基本经验。

2009年4月初稿

2012年4月28日修改

第七章第二节 基辛格访华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在巴基斯坦方面的配合下，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从伊斯兰堡秘密启程，飞往北京。

至十一日，三天内，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基辛格举行了六次会谈，着重就台湾问题交换意见。

周恩来指出：台湾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个人干预；美国必须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必须限期撤走驻台美军，必须废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

基辛格表示：美国承认台湾属于中国，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美国不再与中国为敌，并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逐步减少驻台美军；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历史可以解决。

会谈中双方商定尼克松于一九七二年五月前访华。并确定巴黎作为今后秘密联系渠道，中美华沙渠道不再恢复。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三日，下午，周恩飞往河内。

本日至十四日，周恩来与黎笋、范文同会谈，通报中美会谈情况。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五日，周恩来从北京飞往平壤，同金日成会谈，通报中美会谈情况，并介绍中共党内批陈伯达的情况。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五日，晚，周恩来与叶剑英同往西哈努克和宾努住地，向他们通报中美会谈情况。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六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公告

公告宣布，获悉尼克松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我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七日，周恩来接见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谈中美关系。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八日，周恩来在修改外交部就中美关系问题发稿各驻外机构的通报时，强调：坚持既定的原则立场，绝不会拿原则作交易。必须说明，除中美关系外，其他问题如涉及中美两国之外的国家，只能由当事国负责解决，我们只能阐明立场，交换意见，不许越俎代庖。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七日，周恩来接见法国议会代表团。

周恩来说：联合国只要出现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或者类似的形式，我们就不去，坚决不去。

一九七一年七月中旬，越南人民报发表社论《尼克松主义一定破产》，影射中美会谈。

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二日，周恩来接见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大使转交恩维尔·霍查代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关于中美关系的一封信。当日，政治局会议讨论了霍查的来信。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叛逃。

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七日，周恩来召集外交部有关人员开会。

拟出基辛格第二次访华接待方案，安排中美双方的对口会谈和活动计划。将方案报毛泽东审阅。

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九日，毛泽东对基辛格第二次访华接待方案作出批示：基本同意，某些地方可能要在会谈中临时修改。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基辛格第二次访华，为尼克松总统访华作具

体安排。

周恩来同基辛格在北京举行会谈。着重就台湾、印度支那、朝鲜、日本、次大陆等重要问题交换意见。

周恩来指出：美国的对外政策有一个历史传统，不可能一下子隔断，但是要打破一些框框。在这方面先有尼克松总统今年七月六日在堪萨斯城的讲话，后又有最近英国首相希思在访党年会上的讲话。我相信尼克松总统和毛泽东主席谈话时，虽然双方立场不同，但能互相了解，能谈到点子上去，能打到共同点。既要进入一个新时代，就要改变一些关系，否则就无改革可言。掌舵者应善于迎潮水而上，不然有可能被潮水淹没。只有掌握时代精神，才能改进世界情况。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四日，中美双方开始讨论尼克松访华的联合公报。

中方首先否定了美方提出的公报草案。

周恩来提出：可各说各的，明确写出双方的分歧，同时也写出双方的共同点，以便共同遵循。

毛泽东同意各说各的原则。

经过反复会谈，基辛格同意了中方关于联合公报的基本原则，并提出美方修正方案和补充意见。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晚，在纽约举行的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驱逐台湾蒋介石集团代表问题的提案进行表决。当联合国会议大厅里的电子统计牌显示该提案以七十六票赞成、三十五票反对、十一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时，整个会场立刻沸腾起来。

当得知联合国通过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决议时，毛泽东很高兴，说：“是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

当天下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及外交部有关人员开会，决定立即组团出席联大。以乔冠华为团长、黄华为副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很快组成。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六日，中美双方就联合公报草案达成初步协议。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外交部代理部长姬鹏飞收到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发来的电报，通知第二十六届联大通过的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力的决议。

当日，毛泽东、周恩来召集会议商定立即组团出席本届联合国大会。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周恩来会见美国友好人士谢伟思和夫人。

周恩来说：那天联合国的表决完全出乎意外，不但出乎我们的意外，也出乎美国的意外。我们没有派一个人去活动，而且提案国是由地中海两岸的两个国家带头的。这么多的国家我们寄予希望我们感谢他们，但是我们能不能满足这个希望，完成这个任务，我们要好好考虑一下。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八日，周恩来会见日本《朝日新闻》客人。

周恩来说：二十二年来，被推翻的蒋介石集团窃据中在的席位，完全是不合理的。就是因为美国在操纵指挥棒，有人给它配合。这次投票，七十六比三十五，这是铁的证据，代表了全世界多数国家大多数人民的愿望。美国在联合国再利用表决器就不灵了。这次表决结果是违反美国人的意愿的，也是违反佐藤政府的意愿的。所以，我们不能不重视这一次表决的精神，因为它代表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七十六个国家，还加上弃权的十七个国家人民的愿望。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九日，外交部代理部长姬鹏飞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吴丹，通知中国政府将在近期内派团出席本届联大。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一日，周恩来同刚抵北京的金日成会谈。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日，毛泽东会见金日成。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日，外交部代理部长姬鹏飞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告知中国代表团主要成员名单。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三日，金日成回国。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六日，外交部关于为出席第二十六届联大代表团送行计划报告

报告说：以乔冠华为团长、黄华为副团长的中国出席第二十六届联大代表团预计十一月九日离京经上海、巴黎去纽约。一、代表团离京时，建议请姬鹏飞、李耀文、马文波、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其他同志、有关司负责人，与外交有关的其他部门负责人送行。二、代表团抵、离上海时，建议请市革委会一位副主任、一位常委和外事组负责人迎送。三、因许多驻华使节主动要求为代表团送行，建议通知各国驻华使节、苏联边界谈判团和各国驻京记者。四、代表团离京和途经上海，拟发一综合消息。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外交部上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代表团团长乔冠华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到达纽约机场发表的书面讲话。

讲话指出，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其他国家建立和发展正常的关系；一贯支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解放、反对外来干涉、掌握自己命运的正义斗争。我们代表团将遵循我国政府的既定政策，在联合国里同一切爱好和平和主持正义的国家代表一道，为维护国际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的事业而共同努力。

毛泽东批示：同意。

（这个讲话载于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外交部上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在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稿。

发言稿说：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本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这是敌视、孤立和封锁中国人民的政策破产，是美国政府伙同日本佐藤政府妄图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的计划的失败，是毛泽东主席的外交路线的胜利，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胜利。我代表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在这里重申：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企图把台湾从祖国分割出去的阴谋，都是我们坚决反对的。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这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我们一贯主张，国家无论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成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准则。各国人民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维护本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任何国家都无权对另一个国家进行侵略、颠覆、控制、干涉和欺负。我们反对大国优越于小国、小国依附于大国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理论，反对大国欺侮小国、强国欺侮弱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我们主张，任何一个国家的事，要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来管；全世界的事，要由全世界各国来管；联合国的事，要由参加联合国的所有国家共同来管，不允许超级大国操纵和垄断。中国现在不做、将来也永远不做超级大国。

毛泽东批示：同意。

（这个发言载于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人民日报》。）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八日，毛泽东在外交部关于为出席第二十六届联大代表团送行计划报告上的批语

规格似宜高一点，今晚可谈一下。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八日晚，毛泽东接见代表团的成员。当周恩来带领大家来到中南海时，毛泽东站在书房门口同大家一一握手。谈话当中，毛泽东兴致很高，从世界大势一直谈到国内问题。他说：你们这次去联合国可以放心了，我的那个“亲密战友”不在了。我国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倒台，一个就是恢复联合国席位。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九日，代表团启程。按照毛泽东提出的送行规格“宜高一点”的意见，周恩来、叶剑英等前往机场送行。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中旬，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次出现在联合国裁军问题的大会上。

会上，各国代表不顾原定议题，纷纷登台发表一篇篇热情洋溢的贺词，欢迎中国

代表团的到来。

毛泽东指示有关部门：要将联大会议上各国代表的发言全文刊登在国内报纸上，不要只登摘要。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周恩来与英国作家马克斯韦尔的谈话

周恩来在谈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时说：

联合国表决的结果，我们就没有料到来得这么快，恐怕美国也没有想到它的“两个中国”的方案会失败得这么惨。结果呢，这门就打开了。人们说：尼克松可以到中国，为什么我们不能去？

联合国以五十九票对五十五票否决了美国的提案，在反对美国提案的五十九票里，其中有十个没有跟中国建交的国家。它们后来也投了支持阿尔巴尼亚、阿韦及利亚提案的票。如果这十票不是反对，而是弃权，那就变成五十五对四十九，美国程序性提案就会通过。这件事就表明了尼克松表示要到中国来以后发生的变动。这是第一。

第二，一部份刚跟中国建交的国家还受到美。它们是在美国的压力下没有办法才投弃权票的。国的压力。在程序性提案表决时投弃权票的十五个国家中，多数是跟中国刚建交的

它们投弃权票也等于是支持我们，因为弃权票多了，其他票的总数就减少。结果就出现了刚才说的情况：美国的提案被否决。这马上就引出一个什么结果呢？七十六票对三十五票。不仅超过三分之二票数，而且是压倒多数的国家支持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二十三国的提案。反对的只有三十五票。

那七十六票怎么得来的呢？反对美国提案的五十九票没有变化。原来对美国提案弃权的十五票当中，有十二票转过来支持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的提案，这里大多数是跟我们建交的，这是一个特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有些原来支持美国提案的国家，现在转过来支持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的提案。

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如墨西哥、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提案一通过，它就宣布跟蒋介石断交。这就说明它支持的是美国的程序性提案，并不支持美国的意见，也不支持蒋介石。这一点，它的总统在联合国的演说中就说明了。另一种情况的国家，一个是以色列，一个是葡萄牙。它们这样做是什么原因，你是清楚

的。这样就增加了十七票，变成了七十六票。而弃权的也增加了，原来十五票弃权，现在十七票弃权。反对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提案的票数，仅仅只有三十五票，一下子就把联合国的形势变了，当然这里有偶然性，但是必然的趋势往往通过偶然的现象表现出来。这说明一种趋势：中国不能再被封锁了。

原来我们不打算马上去联合国。但是我们一听到有七十六票支持我们去，我们就不能不去了。否则绝大多数支持我们的国家会失望的。

七十六票不仅反映了全世界人民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二十二年来被剥夺的权利和驱逐蒋介石集团的正义要求，而且也说明了二十二年来美国的主张是错误的，在十一月十五日联合国大会的欢迎会上，有五十七个国家踊跃发言。

美国是东道主，也抢先发了言，逼得苏联也不能不讲话了。接着蒙古也讲话了，日本也讲话了。五十七个发言的国家中，有八个国家跟中国还没有建交。还有加纳，它同我们还未复交。有些建交的国家因为会议时间拖得太长，来不及讲了。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日，范文同总理率越南党政代表团访华。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周恩来与范文同会谈。双方通报了越美会谈、中美会谈的情况。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会见范文同一行。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中越双方在中越联合公报上签字。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三十日，新华社发表公告：中美两国政府商定，尼克松总统将于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开始对中国的访问。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评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

围绕着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权利问题而进行的激烈斗争，是本届联大最令人注目的一件大事。二十多年来，美国政府无理阻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

的合法权利，遭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反对。在这届大会上，它被迫变换手法进行捣乱，苦心炮制了驱逐蒋介石集团是一个所谓“重要问题”的提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蒋介石集团都应占有席位的所谓“双重代表权”的提案，妄图在联合国中制造“两个中国”。但是，同美国政府的预料相反，所谓“重要问题”提案一付诸表决就被打掉。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二十三国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一切合法权利、立即把蒋介石集团代表驱逐出联合国的提案，则以七十六票对三十五票的压倒多数，在热烈的欢呼声中获得通过。美国的所谓“双重代表权”提案自然报废。它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宣告破产。这是全世界人民的重大胜利，是美帝国主义的惨重失败，也是对某些假意支持而实际反对中国的势力的一个沉重打击。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恢复，是全世界人民和主持正义的国家进行长期斗争的结果。我国出席本届联大的代表团第一次参加联合国的工作，受到许多友好国家的热烈欢迎，得到它们各方面的热情帮助。这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我们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我国代表团在联合国的讲坛上，阐明了我国政府对于当前重大国际问题的原则立场，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同广大的中小国家一起战斗。尽管我们在联合国能起的作用是有限的，但是我们愿意尽我们的力量，履行我们的责任，不辜负各国人民对我们的信任和期望。中国永远不做侵略、颠覆、控制、干涉和欺负别人的超级大国。我们坚决同第三世界国家站在一起，同一切爱好和平和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站在一起，为维护各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为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的事业而共同奋斗。

贰、本节简论

一九七一年下半年，基辛格两次访华。

基辛格第一次访华。

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至十一日，周恩来与基辛格会谈。

双方主要就台湾问题交换意见，着重谈了三个问题：

一、关于台湾地位问题

周恩来指出：美国必须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

基辛格表示：美国承认台湾属于中国，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

二、关于台湾美国驻军问题

周恩来提出：美国必须限期撤走驻台美军。

基辛格表示：美国不再与中国为敌，并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逐步减少驻台美军。

三、关于美蒋条约问题

周恩来提出：美国必须废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

基辛格表示：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历史可以解决。

这样，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虽然仍有不小差距，但基本达成一致。由于这一关键问题得到解决，双方达成尼克松访华的协议。

基辛格第二次访华。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基辛格第二次访华，为尼克松总统访华作具体安排。并就中美联合公报交换意见。

美方首先提出的公报草案。

中方否定了美方草案。周恩来提出：可各说各的，明确写出双方的分歧，同时也写出双方的共同点，以便共同遵循。

基辛格同意了中方关于联合公报的基本原则，并提出美方修正方案和补充意见。

十月二十六日，中美双方就联合公报草案达成初步协议。

与周边有关国家密切磋商

既然对中美谈判有人有疑虑，特别是周边有关的国家，这就必须与它们保持密切的磋商。

基辛格第一次华后，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三日下午，周恩飞往河内。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五日，周恩来从北京飞往平壤，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五日晚，周恩来与叶剑英同往西哈努克和宾努住地，向他们通报中美会谈情况。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六日，中美双方才同时发表公告。

这说明中国的原则立场是：除中美关系外，其他问题如涉及中美两国之外的国家，只能由当事国负责解决，我们只能阐明立场，交换意见，不越俎代庖。

基辛格第二次华后，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一日至三日，金日成访问北京，周恩来同金日成会谈，毛泽东接见金日成。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范文同总理率越南党政代表团访华。周恩来与范文同会谈。毛泽东会见范文同一行。发

表中越联合公报。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三十日，新华社才发表尼克松访华的公告。即便中国共产党做得如此周到，也还是存在问题。这就是阿尔巴尼亚。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七日，周恩来接见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谈中美关系。

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二日，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转交恩维尔·霍查代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关于中美关系的一封信。这封信明确地表示反对中美谈判。当日，政治局会议讨论了霍查的来信。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将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驱逐台湾蒋介石集团代表问题进行讨论。美国等在联合国推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阴谋活动。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七日，周恩来接见法国议会代表团时说：联合国只要出现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或者类似的形式，我们就不去，坚决不去。

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毛泽东认为在这方面已没有多少问题需要他思考了，而把大部分时间用到研究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上。他广泛收集国际上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反映，认真阅读新华通讯社所编的每天两本的《参考资料》，或者要工作人员把有关消息读给他听，还要看大量文件、电报。那时，局势仍不明朗，不少人对联合国这次能否通过这项决议抱着怀疑的态度。毛泽东说：“看问题不要只看表面现象，要看实质。”接近联合国投票时，他说：“我们就算有十亿人口，在联合国也只是一张票，一个小国也是一张票，我奉劝你不要看不起小国。”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晚，在纽约举行的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驱逐台湾蒋介石集团代表问题的提案进行表决。提案以七十六票赞成、三十五票反对、十一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

这个胜利是毛泽东外交革命路线的胜利。一方面，中国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革命要求，团结起来，共同反对两霸；另一方面，同美苏两霸进行谈判，打破对中国封锁、围堵。

2009年4月初稿

2012年4月28日修改

第七章第三节 尼克松访华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二年一月二日，周恩来召集外交部核心小组成员及有关负责人开会，评论外交部起草的中美联合公报草案设想（修改稿）。

周恩来提出：草案关于台湾措词不能变，对国际形势部分可提出不同意见。

一九七二年一月三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亚历山大·黑格率先遣组抵达北京。

一九七二年一月四日，周恩来接见黑格。

黑格转达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口信。

周恩来表示，中美两国接近，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对中美两国人民和远东各国人民都有利。

会见后周恩来嘱熊向晖主持起草《对美方口信的答复》稿。

周恩来将该稿修改后送毛泽东审批。

周恩来到毛泽东处汇报会见黑格情况。

毛泽东同意《对美方口信的答复稿》。

一九七二年一月四日，周恩来召集与黑格一行会谈的中方人员开会，研究美方提出的尼克松访华期间的若干技术问题。

江青等人提出，不应用电视宣传尼克松。

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周恩来召集与黑格一行会谈的中方人员开会，研究美方提出的尼克松访华期间的若干技术问题。

周恩来提出，原则同意通过卫星电视转播尼克松在华活动实况。将采取由中国政府出资买下供美方使用的通讯卫星，然后再租给美方使用的办法，以维护国家的主权。

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周恩来、叶剑英分批接见以黑格为首的美国先遣组成员、技术顾问和专机机组人员。

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周恩来、叶剑英再次接见黑格。

答复四日黑格转达的美方口信，要点是：

（一）随着中美领导人会谈的临近，某些敌对势力加紧破坏，中国对此已有准备。

（二）尼克松访华公告发表后，苏联在欧亚的动作更暴露出它扩张主义的面目，次大陆也将从此动荡不已。

（三）在越南问题上，中美之间有根本分歧，美国现行对越政策对于总统访华也带来不利因素。

（四）美方对中国的生存能力表示怀疑、并声称要维护中国的独立和生存能力的说法，令人惊讶。中国认为，任何国家绝不能靠外力维持其独立和生存，否则只成为别国的保护国和殖民地。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在不断抗击外来侵略和压迫的斗争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并定会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

（五）中美两国关系并未正常化，但中国方面将以应有的礼仪接待尼克松总统，并将为谋求中美高级会谈取得积极成果作出自己的努力。

（六）关于台湾问题，中方在公报草案中已尽力照顾到美方的困难。中国人是有着非常强烈的感情的。如果美方真有改善中美关系的愿望，就应该在中美关系的这个关键问题采取解决问题的积极态度。

在会晤，周恩来还对黑格当天转达的基辛格口信作了评论。他说：中美两国关系没有正常化，贸易发展是有限度的，必然是缓慢的；但中美双方总要向远处看，中美关系总要走向正常化。

一九七二年一月中旬，毛泽东病危，经过救治转危为安。

一九七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布托。

一九七二年二月五日，周恩来批示同意李先念、华国锋、余秋里转来的国家计委

《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

报毛泽东批准。

一九七二年二月七日、八日，中央召集北京、上海、浙江党政军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研究部署接待尼克松的安全保密、宣传教育、新闻报道、接待方针等工作。

经周恩来同意确定的接待工作的总方针是：不冷不热，不亢不卑，待之以礼，不强加于人。

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二日凌晨，毛泽东由于肺心病在心律失常情况下严重缺氧，突然休克了。

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九日，周恩来在研究尼克松访华的新闻、宣传部门负责人会议上讲话。

他说：美国搞撤军备战既是针对我们的，但更多的是针对苏联的，它把我们看做是潜在的敌人。新华社的报道一定要注意这一点。你们今天写的尼克松启程来华的消息中，未摘他说的这样一段话：“当我们展望将来的时候，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美国政府之间存在巨大的分歧。将来我们之间仍将存在分歧。但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情是寻找某种办法，使我们有分歧而不致成为战争中的敌人。”这段话说得最清楚不过了。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午，尼克松总统和夫人、国务卿罗杰斯和总统助理基辛格一行抵达北京机场。周恩来、叶剑英等到机场欢迎。

尼克松来华的日子，距离前面所说毛泽东那次突然休克的危急日子只有九天，他的健康状况仍然处在极不稳定的状态，随时都有恶化和发生危险的可能。能不能在这种情况下会见尼克松呢？毛泽东表现出惊人的意志力，决定仍会见尼克松，尽管人们当时几乎都不知道他的实际健康状况。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下午二时，毛泽东会见尼克松。

尼克松、基辛格等在周恩来陪同下，来到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地。

尼克松在日记中写下他初次见毛的印象：

“我们被引进一个陈设简单、放满了书籍和文稿的房间。在他坐椅旁边的咖啡桌上摊开着几本书。他的女秘书扶他站起来。我同他握手时，他说：‘我说话不大利索了。’每一个人，包括周在内，都对他表示他所应得的尊敬。他伸出手来，我也伸过手去，他握住我的手约一分钟之久。这一动人的时刻在谈话的记录里大概没有写进去。他有一种非凡的幽默感。尽管他说话有些困难，他的思维仍然像闪电一样敏捷。这次谈话本来料想只会进行十分钟或十五分钟，却延续了将近一个小时。”

在这将近一个小时的谈话中，毛泽东从哲学问题谈起。对台湾问题、越南问题、亚洲及世界其他地区局势等，他说：“这些问题我不感兴趣，那是他（指周恩来。——引者注）跟你谈的事。”

对中美关系，毛泽东说：“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可是我们两家也怪得很，过去二十二年总是谈不拢，现在的来往从打乒乓球算起只有十个月，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时算起有两年多了。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要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也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就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

巴基斯坦前总统介绍你和我们认识。那时候我们驻巴基斯坦的大使坚决反对跟你往来，说是有个比较，还是民主党的那位前总统约翰逊，还是你尼克松，究竟哪个比较好。我们这方面也不那么高兴那位约翰逊总统。从杜鲁门到约翰逊，我们是都不那么高兴的。这个中间有八年是共和党的总统，那个时候你们也没有想通。

（这是毛泽东同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谈话的一部分。根据谈话记录稿刊印。）

尼克松说：“主席先生，我知道，我多年来对人民共和国的立场是主席和总理所完全不同意的。我们现在走到一起来了，是因为我们承认存在着一个新的世界形势。我们承认重要的不是一个国家的对内政策和它的哲学，重要的是它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政策以及对于我们的政策。”

毛泽东说：“就是啰。”

当尼克松称赞“毛主席的著作感动了全国，改变了世界”时，毛泽东诙谐地回答：“没有改变世界，只改变了北京附近几个地方。”

在回顾了二十多年中美关系的状况后，毛泽东特别谈到最近两年中美接触的过程和背景，肯定了尼克松、基辛格所起的重要作用，并对尼克松说：你当选我是投了一票的。我喜欢右派。我比较高兴这些右派当政。

最后，毛泽东告诉尼克松：“我跟早几天去世的记者斯诺说过，我们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着呢？”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晚，中美举行首次大范围会谈。

商讨和宣布了会谈办法和公报形式与内容。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为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举行欢迎宴会。

周恩来在祝酒词上说：

总统应邀来华，使两国领导人有机会直接会晤，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这是符合中美两国人民愿望的积极行动，这在中美两国关系史上是一个创举。

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根本不同，在中美两国政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但是，这种分歧不应当妨碍中美两国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更不应该导致战争。

我们希望，通过学习坦率地交换意见，弄清楚彼此之间的分歧，努力寻找共同点，使我们两国的关系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

尼克松致了答词。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二日，由周恩来同尼克松进行会谈，就国际形势和双边关系坦率而又深入地交换意见。

在台湾问题上，美方认可只有一个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逐步从台湾撤出美军，但仍存在不同看法。

周恩指出：还是那句话，不愿丢掉老朋友，其实老朋友丢掉一大堆了。老朋友有好的，有不好的，应该有选择嘛。你们希望和平解放台湾，我们只能说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因为这是我们同蒋介石两方面的事。

中方重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外国无权干涉。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中美继续举行三次限制性会谈。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周恩来同基辛格举行会谈。

中美联合公报稿中有关措词还没有确定下来。

这时，周恩来告诉基辛格：反正双方观点已经接近，我们也报告了毛主席，但还要设法用双方都能接受的最佳措词表达。

最后，这个问题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得到了解决。

基辛格又提出将公报稿中“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最后一句改为“人民要进步”。

周恩来认为还是用原来的提法好，因为这一段讲的是中方的立场。

事后，周解释说：我们本来也想让一步，因为我国宪法里也有人类进步的说法。

但把公报初稿送到主席那里，主席说：还是恢复“革命”这个词。

在连续几天的中美会谈期间，周恩来每天深夜或次日凌晨都要去毛泽东那里汇报情况（他陪同尼克松一行赴杭州、上海时除外），交换意见，往往一谈就是一两个钟头。正如周恩来后来所肯定的基辛格的说法：“中国总理的每一个步骤都是向毛主席报告的，等于毛主席参加了会谈。”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五日晚，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举行答谢宴会。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凌晨，中美联合公报基本谈定。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六日上午，周恩来同尼克松在机场休息室举行第二次大范围会谈。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周恩来陪同尼克松和夫人访问杭州、上海。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七日，中美联合公报终于谈定。

双方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布中美《联合公报》内容。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同尼克松在上锦江饭店举行第五次限制性会谈。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尼克松结束访华回国。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中美《联合公报》发表。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自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二月二十八日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陪同总统的有尼克松夫人、美国国务卿威廉·罗杰斯、总统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和其他美国官员。尼克松总统于二月二十一日会见了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两位领导人就中美关系和国际事务认真、坦率地交换了意见。

访问中，尼克松总统和周恩来总理就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以及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进行了广泛、认真和坦率的讨论。此外，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和外交部长姬鹏飞也以同样精神进行了会谈。

尼克松总统及其一行访问了北京，参观了文化、工业和农业项目，还访问了杭州和上海，在那里继续同中国领导人进行讨论，并参观了类似的项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领导人经过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接触之后，现在有机会坦率地互相介绍彼此对各种问题的观点，对此，双方认为是有益的。他们回顾了经历着重大变化和巨大动荡的国际形势，阐明了各自的立场和态度。

中国方面声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国家不分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大国不应欺负小国，强国不应欺负弱国。中国决不做超级大国，并且反对任何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方面表示：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各国人民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有权维护本国独

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来侵略、干涉、控制和颠覆。一切外国军队都应撤回本国去。中国方面表示：坚决支持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为实现自己的目标所作的努力，坚决支持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的七点建议以及在今年二月对其中两个关键问题的说明和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联合声明；坚决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二日提出的朝鲜和平统一的八点方案和取消“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的主张；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和对外扩张，坚决支持日本人民要求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和中立的日本的愿望；坚决主张印度和巴基斯坦按照联合国关于印巴问题的决议，立即把自己的军队全部撤回到本国境内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停火线的各自一方，坚决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维护独立、主权的斗争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争取自决权的斗争。

美国方面声明：为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需要对缓和当前的紧张局势和消除冲突的基本原因作出努力。美国将致力于建立公正而稳定的和平。这种和平是公正的，因为它满足各国人民和各国争取自由和进步的愿望。这种和平是稳定的，因为它消除外来侵略的危险。美国支持全世界各国人民在没有外来压力和干预的情况下取得个人自由和社会进步。美国相信，改善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国与国之间的联系，以便减少由于事故、错误估计或误会而引起的对峙的危险，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的努力。各国应该互相尊重并愿进行和平竞赛，让行动作出最后判断。任何国家都不应自称一贯正确，各国都要准备为了共同的利益重新检查自己的态度。美国强调：应该允许印度支那各国人民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命运；美国一贯的首要目标是谈判解决；越南共和国和美国在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七日提出的八点建议提供了实现这个目标的基础；在谈判得不到解决时，美国预计在符合印度支那每个国家自决这一目标的情况下从这个地区最终撤出所有美国军队。美国将保持其与大韩民国的密切联系和对它的支持；美国将支持大韩民国为谋求在朝鲜半岛缓和紧张局势和增加联系的努力。美国最高度地珍视同日本的友好关系，并将继续发展现存的紧密纽带。按照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议，美国赞成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停火继续下去，并把全部军事力量撤至本国境内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停火线的各自一方；美国支持南亚各国人民和平地、不受军事威胁地建设自己的未来的权利，而不使这个地区成为

大国竞争的目标。

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际争端应在此基础上予以解决，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准备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实行这些原则。

考虑到国际关系的上述这些原则，双方声明：

——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的；

——双方都希望减少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

——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任何一方都不准备代表任何第三方进行谈判，也不准备同对方达成针对其他国家的协议或谅解。

双方都认为，任何大国与另一大国进行勾结反对其他国家，或者大国在世界上划分利益范围，那都是违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的。

双方回顾了中美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严重争端。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双方同意，扩大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是可取的。为此目的，他们就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和新闻等方面的具体领域进行了讨论，在这些领域中进行人民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将会是互相有利的。双方各自承诺对进一步发展这种联系和交流提供

便利。

双方把双边贸易看作是另一个可以带来互利的领域，并一致认为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的。他们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便利。

双方同意，他们将通过不同渠道保持接触，包括不定期地派遣美国高级代表前来北京，就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进行具体磋商并继续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双方希望，这次访问的成果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新的前景。双方相信，两国关系正常化不仅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会对缓和亚洲及世界紧张局势作出贡献。

尼克松总统、尼克松夫人及美方一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给予他们有礼貌的款待，表示感谢。

一九七二年三月一日，毛泽东听取周恩来关于中美会谈情况的汇报。

一九七二年三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中美会谈情况的汇报。

一九七二年三月三日，周恩来在中央国家机关有关单位负责人会议上宣读中美《联合公报》。

他说：

尼克松上台后，情况有变化，事物前进了，这就要求解们要在原则性基础上有灵活性。没有灵活性，就不能推进国际和平的实现。

此次中美高级会晤，第一，双方没有密约；第二，我们坚持原则；第三，谈不上那一方胜利。将来，要用实践证明《联合公报》是否有效。

一九七二年三月四日，周恩来飞往河内，向越南党政领导人通报尼克松访华情况。

一九七二年三月五日，周恩来送审外交部关于中美联合公报向驻外使领馆等的通报稿。

通报稿中写道，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访华和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在美国引起了强

烈反响，在国际上震动也很大。总的说来，对公报的反映是积极的，大都认为这标志着中美关系有一个新的开始，国际形势将发生重大变化。这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转折，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但同时也必须看到，这些协议还是纸面上的，能否实现还要看美国今后的实际行动。今后事态发展还会有曲折反复，我们必须有所准备。对外表态时要谨慎从事，说话不要过头，特别是不宜由我正面宣传联合公报是我们的胜利，美国的失败。同美驻外官方人员的接触，我不主动，也不回避，应掌握不冷不热、不亢不卑的精神，注意礼貌、落落大方。

一九七二年三月六日，毛泽东在周恩来送审外交部关于中美联合公报向驻外使领馆等的通报稿上批示：

此件很好，国内似也适用，但应略作修改和补充。

（引自《毛泽东文稿》第13册）

一九七二年三月七日至九日，周恩来前往平壤同金日成会谈，通报尼克松访华情况。

贰、本节简论

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开始。尽管不少问题还有待此后逐步解决，但重要的是，中美关系的突破为中国打开全新的外交格局创造了必要前提。

毛泽东说得很透彻：“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2009年4月初稿

2012年4月28日修改

第七章第四节 中日恢复邦交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八日，周恩来会见日本公民党访华团。

最近，日本公民党就中日关系问题发表五点主张：一、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二、反对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论调；三、日台条约是非法的必须废除；四、美国武装力量必须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五、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席位。

周恩来在会见中说：如果按照公民党主张的五点，日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就可以恢复，战争状态就可以结束，中日关系可以得到发展，中日两国人民就有可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订立和平条约，并可以进一步考虑缔结互不侵犯条约。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日，周恩来会见日本东京都知事美浓部亮吉和以飞鸟田一雄为团长的日本恢复日中邦交国民议会访华团。

周恩来说：中日之间存在一低频台湾问题。我们认为，单说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或者说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还不够，还要说台湾已经归还它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世界上有一股逆流，说台湾地位未定，就是说，那个地方还有可能独立或者民族自决，这等于说要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这种分裂思想在帝国主义者的头脑中是存在的。台独分子就是要搞台湾独立。现在联合国就有人说，蒋介石用中国的名义不能进联合国，如果用台湾的名义可以到联合国去。这个谬论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欧洲，在世界各地都还有市场。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周恩来与英国作家马克斯韦尔的谈话

关于中日关系问题

马克斯韦尔：我在北京期间，了解到日本的政策——她的经济政策和军事潜力——已成为使你们政府关切的事情。

总理：最近我跟日本的一些企业家谈话。他们提出“修正资本主义”这样一个口

号，当然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从这里也了解到日本的企业家面临着一个困难。它的经济发展到现在阶段，从生产数字来说，在西方国家几乎占第二位，美国以下就是它，从整个世界来说，美国、苏联以下就是它。

但它的经济是畸形发展，首先是资源缺乏，绝大多数靠进口。经济自由膨胀，造成公害，把日本本土和西周的淡水鱼和海水鱼都搞坏了，要到远处去打鱼。公害最厉害的，一个是美国，一个是日本。这是第一。

第二、为要大量吞吐，就需要很大的运输量，所以造船事业最发达的是日本，当然这些船不全是自己用。日本的运油船大到载重三十五万吨，现在甚至计划搞五十万吨的油船。

在这样的情况下，运油只能通过管子装卸，靠岸很困难，所以日本的炼油化工厂多设在沿海，这样海水也污染得很厉害。美国也是这样。

日本的市场大部份是在海外。但海外市场有限，他们就要争夺。日本本身农业却破产了。本来日本农业还能够自给，大米还能够出口。城市大部份人过去都是吃大米的。现在改吃面包了，要进口美国的面粉。现在为了发展工业的需要，把农村的土地和劳动力集中，所以粮食的总产量比过去低。工业发展到现在，日本纯粹的农业区域少起来了。

这种畸形发展，照原样继续下去，是很危险的，势必要跟人家争夺殖民地。譬如，它要向南亚次大陆、非洲、拉美和远东国家投资。

这个投资带有新殖民主义的性质。经济扩张必然带来军事扩张。譬如它从中东运石油到本国要经过马六甲海峡，油船在这里通过过多，会把那里的海水弄脏。日本军国主义份子说，马六甲海峡是它的生命线。

这引起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两个国家的不满，他们并没有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给它们带来的祸害。美国人民也不会忘记日本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给他们造成的灾难。日本军国主义者现在想重新唤起日本武士道精神。这，你看一个电影就懂得了。

但日本军国主义也不是那么容易复活的。因为七十年代的亚洲，人民已经觉悟起来了。照刚才讲的，一旦战争起来，日本这个岛国怎么作战？

日本现在面临着的矛盾是走战争的道路，还是走和平的道路。走这样经济扩张的道路，必然要带来军事扩张，必然要引起战争。

另一条道路是建立一个独立、和平、中立、民主的日本。这样的日本是受欢迎的。现在日本人正走在岔路口上。日本的企业家都要考虑这个问题，不然为什么提出修正资本主义呢？我们说：修正社会主义，就变成复辟资本主义；可是你修正资本主义，是无法进入社会主义的。那就可能采用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但是日本虽然是战败国，战后二十六年的日本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那样被凡尔赛条约所束缚，没有凡尔赛条约造成的那种政治和经济条件。所以我们说日本正处在岔路口上。当然大多数人民总想得到一个和平的环境。

“要维持老朋友是美国的政策”

日本应该跟中国友好，我们并不需要向外扩张。所以昨天我跟日本企业家们说，你们的政府太不讲现实了，对有七亿多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而把台湾蒋介石看作代表中国，这真是荒谬。这次在联合国都改变了局面，日本不改变能行嘛！尽管这里存在着矛盾，这矛盾总要解决啊。

马克斯韦尔：我在北京期间，了解到日本的政策——她的经济政策和军事潜力——已成为使你们政府关切的事情。

总理：最近我跟日本的一些企业家谈话。他们提出“修正资本主义”这样一个口号，当然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从这里也了解到日本的企业家面临着一个困难。它的经济发展到现在阶段，从生产数字来说，在西方国家几乎占第二位，美国以下就是它，从整个世界来说，美国、苏联以下就是它。

但它的经济是畸形发展，首先是资源缺乏，绝大多数靠进口。经济自由膨胀，造成公害，把日本本土和西周的淡水鱼和海水鱼都搞坏了，要到远处去打鱼。公害最厉害的，一个是美国，一个是日本。这是第一。

第二、为要大量吞吐，就需要很大的运输量，所以造船事业最发达的是日本，当然这些船不全是自己用。日本的运油船大到载重三十五万吨，现在甚至计划搞五十万吨的油船。

在这样的情况下，运油只能通过管子装卸，靠岸很困难，所以日本的炼油化工厂多设在沿海，这样海水也污染得很厉害。美国也是这样。

日本的市场大部份是在海外。但海外市场有限，他们就要争夺。日本本身农业却破产了。本来日本农业还能够自给，大米还能够出口。城市大部份人过去都是吃大米的。现在改吃面包了，要进口美国的面粉。现在为了发展工业的需要，把农

村的土地和劳动力集中，所以粮食的总产量比过去低。工业发展到现在，日本纯粹的农业区域少起来了。

这种畸形发展，照原样继续下去，是很危险的，势必要跟人家争夺殖民地。譬如，它要向南亚次大陆、非洲、拉美和远东国家投资。

这个投资带有新殖民主义的性质。经济扩张必然带来军事扩张。譬如它从中东运石油到本国要经过马六甲海峡，油船在这里通过过多，会把那里的海水弄脏。日本军国主义份子说，马六甲海峡是它的生命线。

这引起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两个国家的不满，他们并没有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给它们带来的祸害。美国人民也不会忘记日本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给他们造成的灾难。日本军国主义者现在想重新唤起日本武士道精神。这，你看一个电影就懂得了。

但日本军国主义也不是那么容易复活的。因为七十年代的亚洲，人民已经觉悟起来了。照刚才讲的，一旦战争起来，日本这个岛国怎么作战？

日本现在面临着的矛盾是走战争的道路，还是走和平的道路。走这样经济扩张的道路，必然要带来军事扩张，必然要引起战争。

另一条道路是建立一个独立、和平、中立、民主的日本。这样的日本是受欢迎的。现在日本人正走在岔路口上。日本的企业家都要考虑这个问题，不然为什么提出修正资本主义呢？我们说：修正社会主义，就变成复辟资本主义；可是你修正资本主义，是无法进入社会主义的。那就可能采用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但是日本虽然是战败国，战后二十六年的日本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那样被凡尔赛条约所束缚，没有凡尔赛条约造成的那种政治和经济条件。所以我们说日本正处在岔路口上。当然大多数人民总想得到一个和平的环境。

“要维持老朋友是美国的政策”

日本应该跟中国友好，我们并不需要向外扩张。所以昨天我跟日本企业家们说，你们的政府太不讲现实了，对有七亿多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而把台湾蒋介石看作代表中国，这真是荒谬。这次在联合国都改变了局面，日本不改变能行嘛！尽管这里存在着矛盾，这矛盾总要解决啊。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周恩来与英国作家马克斯韦尔的谈话

关于中英关系问题

马克斯韦尔：最后，由于时间已经很晚了，你能不能简短地谈一下中英关系的问题。

总理：英国承认中国。在西方国家中是较早的，但到现在还未能交换大使，原因是英国政府坚持那个站不住脚的逻辑。

它公开可以同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立场，即台湾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份。照理这不是很清楚了吗？但它又说，如果有人问起，英国政府将说，英国关于“台湾地位未定”的立场没有变化。简直莫名其妙。我和麦克唐纳先生（前英国驻东南亚高级专员，他不久前到过北京）谈过，我说这些是你们文官制度搞出来的。他说，在工党内阁和保守党内阁中，有那么一些学法律的人搞出来的。他们说，过去说过“台湾地位未定”。由于说了这样的话，现在不能改了。这不是荒唐吗？

我说你们英国政策改变了多少次，为什么这个政策不能改呢？张伯伦的政策不是邱吉尔把它改了吗？它就是要保留这一点。这次在联大表决的时候，英国投票支持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提案，反对美国提案，算是实现了它的诺言。但这个保留毫无道理吧！是否等将来如果台湾有别的大国搞“独立国家”的阴谋，你要承认它？他不敢回答。你这样搞，我们不干。因为你们留一个尾巴，而且很长。

马克斯韦尔：如果英国采取中加建交公报的措词，是不是够了呢？我想，那个公报中说，加拿大“注意到”中国政府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

总理：英国同加拿大不一样，英国是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签字国，对台湾归还中国承担了义务，我们坚决反对“台湾地位未定”的谬论。而且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这是英国发明的。

因为美国丢了中国以后，美国难过得很，互相推卸责任，发表了艾奇逊的白皮书，一方面骂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责备蒋介石，好像美国政府总是做得对的。杜鲁门在一九五〇年一月声明，台湾已经归还中国，美国对台湾和中国其他地方没有领土野心。开罗宣言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嘛，台湾又已经归还祖国，现在联合国也承认只有一个中国。

但英国为了帮美国造一个籍口，一九五一年开始在法律上做文章，旧金山和约故意只说日本已放弃了那些领土。《注：此处删去了“包括台湾和其他地方”几个

字》，但不说这些地方究竟归于谁，这是伏笔。还制造舆论说，等太平洋地区局势和缓后再说。苏联也没有在旧金山条约上签字，这个条约也未说南库页岛（在北太平洋上的一个有争议的岛屿）应交谁，为什么不说不说南库页岛也是地位未定？这个岛的南半部是一九〇四至〇五年的日俄战争后割让给日本的，这比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把台湾割让给日本——晚十年就是了。

日本投降以后，中国的行政长官接受了日本的投降，台湾地位问题早已解决了，所以英国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是当时的英国工党政府挖空心思出来的。当时美国占领了台湾海峡。英国是要帮美国忙的。

马克斯韦尔：我想这一切现在对中国实际上不产生什么问题。但是看来交换大使是不能早日实现了，而我想这将是伦敦的损失。

总理：我们没有什么，对英国不利。它已承认了我们二十二年，而其他承认我们比它晚的国家都交换了大使。

马克斯韦尔：我想，为英国目前立场所作的解释是，英国政府不能违背其过去政府说过的话。

总理：这是表面的话。实质上是要留一点尾巴，将来如果台湾宣布独立，它好承认。尽管英国是你的祖国，但我要批评英国的传统政策。它在任何一个地方总要留一个尾巴，你是研究南亚次大陆的，非常清楚。譬如查谟、克什米尔、东西孟加拉、东西旁遮普等，它任何地方总要留一点麻烦。

现在英国首相说，英国回到欧洲去，你既然要回到欧洲去，就该让亚洲人和缓一点嘛！应该把事情弄得更好些。谭森先生（前英国驻北京代办，他已在上月离任）可能有一个误会。以为我们老实，好说话。我们不隐蔽我们的观点，敢于承认错误。

你知道，火烧英国代办处，是坏人搞的，完全违反了毛主席的政策，那时候有一个阴谋的反动组织，叫做“五一六”，煽动一批群众去包围英国代办处，我们通过广播车，要他们无论如何不能冲进去，英国代办也听到了，他懂得了我们的政策。事后我们为它把房子修复了，表示了歉意。

我看英国有点误解，觉得中国人好说话。不是那么简单！我们对原则是一定坚持的。

马克斯韦尔：三个星期以前，这里有一位外交官——不是英国的外交官——告诉

我，中英谈判已经突破，即将互派大使。看来他的消息不正确。

总理：中英如要互派大使，他们就必须割掉那个尾巴。

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三日，中英两国关于互换大使的联合公报签字公布。

两国之间自一九五四年起建立的代办级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

接着，中国同荷兰、希腊、联邦德国等国家相继正式建交或实现外交关系升格。

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出现重大变化。

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五日，周恩来会见日本公民党第二次访华团。

周恩来说：如果田中做了首相，要到中国来谈中日两国关系问题，我们欢迎。如果一位现任首相准备解决日中关系问题，亲自到中国来谈，当然我们不好拒绝。这样就打破了从吉田到佐藤这一个体系。有这样勇气的人来，我们怎么能拒绝呢？不然就不公道了。从原则来讲就是，新的日本政府不敌视中国，不阻挠恢复日中邦交。而是继续日中友好，努力恢复日中邦交，也就是合乎大家常说的三原则。这样的政府，也就是不继续佐藤路线的政府，我们愿意接触。

一九七二年六月十四日，周恩来会见日本日中友好旧军人代表团及其他友好人士。

周恩来说：日本现正走在十字路口，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经济继续膨胀，军事力量也随着扩张，走军国主义道路；另一种是，日本真正摆脱大国的控制，走独立、民主、和平、中立的道路，在这个基础上搞自卫武装，不侵略别人，也反对别人的侵略。

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基辛格一行来华访问。

周恩来与基辛格就促进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举行了五次限制性会谈。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四日，中美双方发表公报，一致认为：一九七二年二月中美《联合公报》所拟议的这种磋商是有益的，继续这种磋商是可取的。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周恩来会见美国民主党领袖和夫人、共和党领袖和夫人。

周恩来说：

杜勒斯时代的观点要变了，他好像认为什么都是铁板一块，这怎么可能呢？杜勒斯的思想指导了你们整个五十年代。

如果不是必经阶段总统改变政策还执行杜勒斯时代的政策，当然我们两国就不可能接近了。但是，并不是说，写在公报上的现在都实现了。我们并不是要马上把台湾归还我们，因为你们承认了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尼克松创立中美两往来，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这是你们两党都赞成的。不管你们哪一个党当权，我们都是一样的态度，我们不会改变的。

一九七二年七月六日，日本佐藤内阁下台，成立田中角荣为首的新内阁。

田中在就职当天声明说：在动荡的世界形势下，应该加速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强有力地开展和平外交。

一九七二年七月九日，周恩来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说：田中内阁七日成立，声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

一九七二年七月十日，周恩来会见法国外交部长。

周恩来说：

你们在西方大国中是承认我们的。

日本在对华关系上出现了新气象，这是战后二十七年来日本政府第一次这样做，我们对田中政府这样做没有理由不欢迎。

一九七二年七月十日，毛泽东会见法国外交部长。

一九七二年七月上旬，毛泽东的指示

对中日恢复邦交问题应采取积极的态度。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总之，现在到了火候，要加紧。

一九七二年七月上旬，周恩来托中国农业代表团访问日本的外交部日本处延长陈抗向正在日本的孙平化转达：要抓住时机争取向田中首相当面转达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和传话，“只要田中首相能到北京当面谈，一切问题都好商量。

一九七二年七月十六日，周恩来接见日本社会党副委员长说：

支持田中政府恢复日中邦交这一点，你们社会党、公民党、民社都表了态的，我认为你们的话是对的。

如果现任首相、外相或其他大臣来华谈恢复日中邦交问题，北京机场准备向他们开放。

现在我们应该向前看，而不应该向后看，要解决今后的问题。田中政府采取这样向前看的政策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愿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恢复日中邦交并不要反对哪一个国家，不是为了反对美国或者苏联。

以中国为中心，我不同意。如果说中日两国友好来推动远东的和平，那还可以。但拿中国作中心，那恐怕不恰当，是错误的。亚洲、太平洋地区所有国家应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一句话，就是我们反对任何霸权，也不谋求霸权。

请转告在野党和日本其他友好人士：如果我们中日两国得复交了，过去二十多年来的友好往来会更加密切，更多起来，而不会冷淡下去。许多日本朋友对促进中日邦交的恢复、促进中日友好往来是尽了力的，当然我们更应该尊重他们。中国人民结交了新朋友，是不会丢掉老朋友的。

一九七二年七月十七日，周恩来与阿拉伯也门总理兼外交部长会谈。

一九七二年七月十九日，周恩来接见联邦德国联邦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

周恩来：我们两国不是关系正常化的问题，而是建交问题。中美其名曰和中日之间可以用关系正常化这个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有它的特点，它从来没和蒋介石发生关系，你们没有这方面的问题。这一点恐怕应归功于阿登纳总理，他是有远

见的。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周恩来接见日本公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长竹入义胜并举行第一次会谈。

竹入是受田中首相委托来华的。

周恩来说：现在发生了一个具体问题。因为田中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正统政府，我们对正统二字不太理解。我们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有这样一种解释：合法的反义词是非法。中国人民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蒋介石被推翻了。所以它是非法的。去年联合国也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力，把蒋介石集团赶出去了，也就是说，国际组织也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合法的，蒋介石政府是非法的。

竹入表示，公民党也是作这样的解释。

周恩来说：公民党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问题。我不知道田中政府中的法律专家说正统二字是否有别的意思。我为什么要问正统这个词的意思呢？因为汉语中有正统就有偏安，可能和日本的评议不同。这是一个名称问题。如果正统和合法意思一样，我们也可以同意。

竹入表示，回去以后，一定建议田中，今后讲话中一定要用合法这个词。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周恩来报告同竹入义胜会谈情况。

会议通过《中日联合声明要点（草案）》及复交三原则：

- （一）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
- （二）联合声明公布后，日本政府将从台湾撤出其使馆，并采取有效措施使蒋介石集团的使领馆从日本撤走；
- （三）对日本的团体和个人在台湾的投资和经营的企业，在台湾解放时当予以适当照顾。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审阅《中日联合声明要点（草案）》。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周恩来同郭沫若、廖承志等与竹入义胜继续举行会谈。

周恩来指出：缔结日台条约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了。这个条约根本无视中国的存在，同一个逃一台湾的蒋政权缔结结束战争状态，是非法的、无效的，是应当废除的。中方将坚持把结束战争状态和复交三原则两个问题写入联合声明的立场。

竹入表示，将带回向田中首相、大平外相报告。

一九七二年八月七日，周恩来同廖承志会见日本社会党众议员黑田寿男一行。周恩来说：我们的外交，是通过上层的关系来接近人民群众。我们支持独立、和平、民主、中立、繁荣的新日本，反对日本由经济大国走上军事大国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把日本人民带到新的战争灾难中去。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谁阻挠日本人民实现这个目标，谁就是敌人。

一九七二年八月七日，七机部就引进英国军用型斯贝航空发动机问题，将与英国进行谈判。

周恩来批示：要极其认真地进行谈判和将来的考察凡遇有问题，必须事前请示，再予答复。在英要通过使馆请示国内，千万不能大意。

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八日，周恩来同廖承志会见日本自民党议员川崎秀二和日本青年访华团一行。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日，周恩来同郭沫若、廖承志会见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和夫人，以及其他日本朋友。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二日，毛泽东会见来华作内部访问的金日成。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周恩来同金日成会谈。

双方就国际统一战线朝鲜、日本、美苏及联合国等问题交换意见。

周恩来说：外交上争取同上层来往，目标是为了人民。同上层来往，又寄希望于人民，两者有联系，又有区别。要防止两种错误倾向：一是要求人民运动服从自己的外交政策；二是搞包办代替，强加于人。上层活动必须有原则性，但不取消容许的灵活性。我党几十年上层统战工作经验证明：同资产阶级决裂时容易犯“左”的错误，即只斗争不联合；同资产阶级联合时容易犯右的错误，即只联合不斗争。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十日，周恩来接见以稻山嘉宽为团长的日本经济界访华团。

周恩来提出：中日关系正常化以后，政府、民间贸易并行不悖。

一九七二年九月八日，中共中央转发外交部“关于接待日本田中首相访华的
内部宣传提纲”

宣传提纲指出，日本内阁首相田中角荣即将来华访问，与我国领导人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这是当前我国外交战线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田中首相访华，一是当前国际大好形势的反映，二是中国国际威望不断提高的标志，三是中日两国人民长期共同斗争的结果，四是日美、日苏矛盾进一步发展的表现。

邀请田中首相访华，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是毛主席、党中央的一个重要战略部署。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有利于反对美苏两霸特别是反对苏修的斗争，有利于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有利于我国解放台湾的斗争，有利于缓和亚洲紧张局势。

毛泽东批示：同意。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316页）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二日，周恩来同廖承志会见日本日中备忘录贸易办事处负责人。

周恩来引“饮水不忘掘井人”语，对长期致力于日中间半官方贸易和政治疏通工作的日本朋友表示感谢。当场要求打电话给在日本的老朋友冈崎嘉平太，请冈崎

来北京迎接中日邦交恢复日。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七日，周恩来同董必武会见赞比亚副总统及所率赞友好代表团。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八日，周恩来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会长小坂善太郎及所率日本自民党访华团。

周恩来说：

你们是第一次来中国访问的自民党代表团，是正式代表团，是在田中角荣阁下担任了新总裁后委派的代表团，实际上是为田中首相访华做准备工作的，所以特别值得欢迎。

中日之间来往几乎没有中断过，这是两国关系的一个特点。日本政府的做法有时开明，有时不开明。真正迈出第一步的还是田中首相，所以说揭开了中日关系新的篇章。田中首相下决心到中国来访问，谈判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一定会矗立起中日睦邻友好关系。我们相信成果会是丰硕的。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九日，周恩来会见小坂等人。

周恩重申中方对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绝无改变余地。

日本自民党副总裁、日本政府特使椎名悦三郎在日本宣称：日将同中华民国的历来关系包括外交关系在内照过去原样保持下去。

中方驻日代表约见大平外相要求对方澄清此事。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日，周恩来单独会见古井喜实。

古井喜实受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之托带来日方准备的联合声明草案。

周恩来就这个草案发表意见。

中日双方同时发表关于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邀访华的公告。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五日，田中首相一行应邀访华，

下午，周恩来和田中举行第一次限制性会谈。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五日，晚，周恩来为田中举行欢迎宴会。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同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举行第二次限制性会谈。

周恩来对昨日宴会上田中致辞里所用“麻烦”一语提出异议，指出：田中首相对过去的过程感到遗憾，并表示要深深地反省，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但是，“添了很大麻烦”这一句话，引起了中国人民强烈反感，中国被侵略遭受巨大损害，决不以说是“添麻烦”。

周恩来说：我们非常欣赏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所说的这样一句话：恢复日中邦交应从政治上解决而不要从法律条文上去解决从政治上解决容易解决问题，而且可以照顾双方；如果只从条文去解释，有时很难说通，甚至发生对立。

周恩来指出：当时蒋介石已逃到台湾，他是在缔结旧金山和约后才签订日台条约，表示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那里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是慷他人之慨。遭受战争的损失主要是在大陆上，我们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所以放弃了赔偿的要求。

（周恩来在一次国务院会议上说明：这也是鉴于历史教训和中日关系大局考虑的；此事不是他个人意见，是毛主席和中央作的决定。）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同田中首相举行第三次限制性会谈。

就广泛的国际问题交换意见。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会见田中一行。

毛泽东对田中说：“中日有两千多年的来往。历史记载中，第一次见于中国历史的是后汉嘛。”“你们到北京这么一来，全世界都战战兢兢，主要是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这两个大国。它们不大放心了，晓得你们在那里捣什么鬼啊？”

田中说：“我这次也到美国和尼克松总统进行了会谈。美国也承认日本来访中国是符合世界潮流的必然发展趋势的。”“只要双方不玩外交手段，诚心诚意地进行谈判，一定可以取得圆满的结果。”

毛泽东接着说：“现在彼此都有这个需要，这也是尼克松总统跟我讲的。”

陪同会见的除周恩来、姬鹏飞外，还有外交部顾问廖承志。

当廖承志讲到他出生在日本时，毛泽东同田中开玩笑说：“你们如果要，把他带回去嘛”

田中也笑着说：“廖承志先生在日本是非常有名的。我前天对周总理说，如果他到日本竞选参议员，肯定可以当选。”

毛泽东说：“那他到日本去当参议员好了，好不好？跟你开始谈判吧！”

双方谈话的气氛十分轻松而活跃。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和田中首相举行第四次限制性会谈。

周恩来说：

明天发表建交的联合声明以后，大平外相根据田中首相的指示，准备对记者发表一个讲话，声明日本政府将跟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对此我们表示欢迎。这证明你们这次来是讲信义的，这是我们两国和平友好的良好开端。

我们重建邦交首先要讲信义，这是最重要的。我们跟外国交往，一向是守信义的。我们总是说，我们说话是算数的。中国有句古语说：“言必信，行必果”。你们这次来表现了这种精神。

周恩来并当场将“言必信，行必果”写出交给田中。

田中也将日本旧宪法上的一句话“信为万事之本”写成汉字交与周恩来。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批准中日联合声明草案。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八日，田中首相举行答谢宴会。

周恩来发表讲话，说：

我们即将结束两国间迄今存在的的不正常状态。战争状态的结束，中日邦交的正常化，中日两国人民这一长期愿望的实现，将打开两国关系中的新篇章，并将对和缓亚洲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做出积极的贡献。

中日两国是社会制度根本不同的国家。但是，我们双方富有成果的会谈证明，只

要双方都具有信心两国间的问题是可以通过平等协商得到解决的。我相信只要我们双方信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们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定能不断得到发展，我们两国伟大的人民定能世代友好下去。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周恩来总理和田中首相在中日联合声明上签字。

《联合声明》说：

“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

“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决定自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起建立外交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日本外交大臣大平正芳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指出，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蒋条约已宣告结束。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周恩来陪同田中首相到上海参观访问。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代表会谈顺利结束

外交部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代表在波恩就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和互派大使以及与此有关的问题进行了会谈。会谈于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顺利结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姬鹏飞邀请联邦外交部长瓦尔特·谢尔正式访问中华人

民共和国。联邦外交部长接受了这一邀请并将于一九七二年十月十日至十四日访问北京。

在访问期间，两国外交部长将签署和发表关于建立外交关系和互派大使的联合公报。此外，联邦外交部长将同中国政府就双边关系和国际形势进行会谈。

一九七二年九月三十日，周恩来送别田中首相回国。

一九七二年十月七日，周恩来会见台湾同胞、旅美华侨四十余人。

周恩来说：赔款不能要。我们自己吃过赔款的亏的。甲午战争，中国赔款二亿两白银；庚子事件，中国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直到抗日战争，还没有赔完。鉴于这个教训毛主席说，赔款要不得，要了赔款会加重日本人民的负担。虽然半个世纪来日本欺负我们，现在平等了，我们和日本人民友好，才能使他们起变化。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一日，中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两国外长签署建交公报。

贰、本节简论

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三日，中英两国关于互换大使的联合公报签字公布。两国之间自一九五四年起建立的代办级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接着，中国同荷兰、希腊、联邦德国等国家相继正式建交或实现外交关系升格。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出现重大变化。这时，解决中日关系问题，就成为外交工作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一九七二年七月上旬，毛泽东提出：对中日恢复邦交问题应采取积极的态度。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总之，现在到了火候，要加紧。

经过一系列工作，至日本田中角荣内阁上台，终于实现了中日恢复邦交。

2012年3月11日修改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八章 批林整风

第一节 一九七二年的新形势新任务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二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当代世界各种基本矛盾都在激化，特别是美帝、苏修同包括它们本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矛盾，以及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争夺世界霸权、划分势力范围的矛盾，更尖锐了，更扩大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颠覆、控制、干涉和欺负，激起亚非拉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群起而攻之。侵略和反侵略、革命和反革命的局部战争连绵不绝。帝国主义阵营四分五裂。修正主义集团日趋瓦解。各国反动派惶惶不可终日。各种政治力量进一步分化改组。今日世界形势的特点，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乱”，或者叫“天下大乱”。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个伟大的历史潮流猛烈地冲击着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腐朽统治。

过去的一年，是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取得伟大胜利的一年。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了刘少奇一类骗子里通外国，妄图改变党的路线和政策，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阴谋，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这对于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深远的意义，对于社会帝国主义，对于全世界的帝、修、反，是一次十分沉重的打击。这是中国无产阶级和全国人民的伟大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一九七一年，我们胜利完成了发展国民经济第四个五年计划头一年的战斗任务。工农业总产值，比一九七〇年增长百分之十左右。农业连续十年丰收，粮食生产在受灾比较重的情况下，比大丰收的一九七〇年又有增长，达到四千九百二十亿斤。毛主席提出的扭转南粮北调的任务开始实现。工业生产持续上升，质量提高，

品种增加。钢产量比一九七〇年增长百分之十八，达到两千一百万吨，标志着整个工业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基本建设进展较快，全国物价稳定，市场繁荣，国家和人民的储备进一步增加。人民生活有所改善。文化教育战线的革命，也有不少新的发展和创造。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又有某些提高。人民解放军建设得更加强大，我国国防空前巩固。

毛主席指出：“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一年来的工作，充分证明了这个论断的正确性。在新的一年里，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继续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加强党的领导，把各条战线的斗、批、改深入下去，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发展，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执行党的“九大”提出的路线，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一九七二年三月九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抓路线教育 促春耕生产》

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七日，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的通知

1972. 03. 17；中发 [1972] 12 号

毛主席批示： 同意

中共中央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种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

一九七一年八月中旬至九月十二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到外地巡视，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进行了多次重要谈话。许多单位要求将毛主席的谈话整理印发。中央根据毛主席在各地谈话纪要，综合整理了一个纪要，现印发给你们，请你们按照中发 [1972] 3号文件规定的范围，即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进行传达。

毛主席的谈话，以路线斗争为纲，总结了我党五十年来十次路线斗争的经验，提出了“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个基本原则问题，明确指出一九七零年庐山会议的斗争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反复强调对犯错误的干部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毛主席的谈话，是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加强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是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有力武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谈话，进一步展开对林陈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把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中共中央

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七日

一九七二年四月十六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以粮为纲 全面发展》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过去狠抓粮食生产是正确的，今后也必须把粮食生产抓紧，决不可稍微放松。没有粮食生产的发展，就说不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也说不上多种经营的发展。对于进一步发展粮食生产，必须继续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同时，也必须注意，粮食生产和多种经营决不是互不相容的，而是互相促进的。既要增产粮食，又要多种经营，全面发展，在劳动力、土地、资金等方面确有一定的矛盾。这些矛盾都是可以解决的。而且，也只有很好地安排粮食生产和多种经营，才更有利于使全劳力、半劳力、辅助劳力和有各种专长的社员各尽其能，而且在各个季节都有活可干。发展多种经营，可以为集体经济积累更多资金，加快农业机械化，这就又可以腾出更多劳力全面发展农业生产。至于土地，在多种经营的条件下，比单一经营更便于合理安排、充分利用。荒山、水面、河滩、“四旁”等等，单一生产粮食不便利用的，实行多种经营就都能排上用场。肥料不足，从发展牧业、林业、油料、养蚕等方面，正好可以开辟更多的肥源。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限的，地力、物力的潜力是可以一挖再挖的。以粮为纲，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综合利用，正是人尽其力、地尽其利、物尽其用的一条广阔的道路。这样做，才符合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有的同志划不清正当的多种经营和资本主义倾向的界限，不敢抓多种经营，忽视抓多种经营。对此，应当加强路线和政策教育，予以澄清。有资本主义的多种经营，有社会主义的多种经营，决不可把两者混为一谈。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决定于执行什么路线，决定于指导思想是什么。如果是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只顾赚钱，不顾国家计划和人民的根本利益，那样搞多种经营当然会走到

资本主义道路上去，那是必须批判、必须制止的。但是，决不可把党的方针、政策所提倡和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倾向来批判。正是为了进一步壮大社会主义经济，进一步战胜资本主义势力，才更要下气力领导群众搞好多种经营。这个重要的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必去占领。我们不去有领导有计划地发展多种经营，那就等于在这个阵地上给资本主义让路，那才是错误的事情。在积极办好集体经济、保证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应该允许和指导社员利用剩余时间和假日，从事适当的家庭副业。“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要教育社员先公后私，反对弃农经商。

以粮为纲，是就全局而言。就各个不同地区来说，要注意因地制宜。一般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队应该以发展粮食生产为主，把粮食生产抓紧抓好，同时根据当地条件，积极发展其他经济作物和牧业、林业、渔业、副业生产。经济作物集中产区，应该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牧区、林区、渔区，应分别以经营牧业、林业、渔业为主。这些地区，当然也要在可能条件下积极地生产粮食和其他作物，也不要搞单一经营；但是，应当集中主要力量完成主要任务。对于这些地区的粮食供应或留粮标准，要保证每人平均口粮不低于附近粮食产区的一般水平。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三十年前，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伟大领袖毛主席总结我们党内斗争的历史经验，提出了一条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毛主席反复强调了这一方针，指出：“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的”，“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严肃地批判了刘少奇一类骗子“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党坚持毛主席制定的方针政策，教育和挽救了犯错误的同志，促进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革命团结，保证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在当前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搞好斗、批、改的过程中，我们要继续贯彻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这对于落实党的“九大”团结、胜利的路线，发展革命大好形势，有着重要意义。

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除了极少数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和屡教不改、不可救药的分子外，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不论

老干部、新干部，党内的同志、党外的同志，都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取教育为主的方针。对犯错误的同志，第一要进行严肃的批评，分清是非，目的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第二还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努力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欢迎进步。

要搞“五湖四海”，不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是思想上、政治上、力量上最强大的一个革命阶级，它可以而且必须把绝大多数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敌人。”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包括犯了错误并且认真改正错误的人。毛主席指出：“有错误不要紧，我们党有这么个规矩，错了就检讨，允许改正错误。”正如得过伤寒病可以产生免疫力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认真改正错误，善于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有了免疫力，就有可能工作得更好。

“要提倡顾全大局。”对犯错误的同志的处理，要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以党的利益高于个人和局部的利益为出发点。要关怀他们，教育他们，只要他们认识错误并决心改正，就要信任他们，发挥他们的作用。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干部，都是党的宝贵财富，都要在革命实践中努力学习，斗私，批修，自觉地改造世界观，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路线斗争觉悟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我们应当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正确认识自己，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同志，坚持真理，改正错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必须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错误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认真学习党内历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排除“左”、右干扰，提高贯彻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我党历次两条路线斗争证明，毛主席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得到广大干部和党员衷心拥护的。绝大多数干部和党员要团结不要分裂，坚持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基础上搞团结，反对在修正主义路线下搞分裂，这是我们党不断巩固、兴旺、发展，革命事业不断前进和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我们这样大的党，这样大的国家，这样多的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

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粉碎了国内外阶级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破坏，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新胜利。这充分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说明了毛主席正确方针的巨大威力。只要我们继续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这个方针，就可以使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事业中，取得更伟大的胜利。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四日，社论）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坚持毛主席革命线就是胜利——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

要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反对唯心论的先验论。《讲话》精辟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第一观点，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刘少奇一类骗子否认认识来源于实践，宣扬什么“超天才”、“先知先觉”，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改造主观世界。一切革命知识分子、革命文艺工作者，要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中去，在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改造世界观，转移立足点，学习和总结亿万工农兵所创造的宝贵经验，努力反映工农兵的火热斗争生活。

要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论，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刘少奇一类骗子从剥削阶级的精神宝库中，拣起破烂的人性论，向无产阶级专政进攻。毛主席在《讲话》中，对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人性论的种种表现，早已作过彻底的批判。我们要按照《讲话》的要求，努力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实践中，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共产党员要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对一切公开的和暗藏的敌人，对一切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错误言行，要以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大无畏精神，坚决斗争到底。要勤勤恳恳、老老实实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反对剥削阶级的唯心史观。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

还是少数“英雄”创造历史，反映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历史观的斗争。《讲话》深刻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是“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的光辉思想。刘少奇一类骗子却颠倒历史，否定工农兵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作反革命的舆论准备。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努力学习和掌握唯物史观，联系当前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实际，分清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不断增强路线斗争观念。

无产阶级文艺是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各级党的组织，要从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重视并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认真总结经验，加速文艺战线斗、批、改的步伐。一是抓路线，抓方向，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排除形形色色来自右的和“左”的方面的干扰和破坏，经常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不断肃清刘少奇一类骗子在思想文化战线的种种流毒。二是抓党的政策的落实，切实搞好文艺队伍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特别是要切实抓好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认真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正确地发挥专业和业余文艺工作者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逐步提高他们的路线斗争觉悟和思想、业务水平，在斗争实践中发展和壮大无产阶级文艺队伍。三是抓发展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坚决贯彻毛主席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等一系列方针政策，学习革命样板戏的经验，勇于实践，敢于创社会主义之新，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积极促进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繁荣，努力适应当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适应广大工农兵日益增长的需要。

一九七二年七月六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坚持数年 必有好处》

“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总结党的历次路线斗争经验提出来的极为重要的指示。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广大干部特别是县、团党委以上领导干部，热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认真读马列的书，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初步形成了风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在前一阶段学习中，许多单位的领导同志，把看书学习同批修整风结合起来，学习中央规定的六本马列著作和五本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深入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

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它的理论基础——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许多同志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和路线斗争觉悟进一步提高，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空气更加浓厚。不少同志在实际工作中比较自觉地坚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从而推动了各条战线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使革命和建设工作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成效如何，要看我们能不能够和在多大程度上善于识别和抵制反马克思主义的歪风邪气。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二十二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告诉我们：这种斗争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掌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为了更坚定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战胜那些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倾向和路线，不管是以“左”的或右的形式出现。革命的同志们必须努力锻炼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想作斗争的能力，锻炼自己的识别能力，在批修整风的斗争实践中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战斗武器。

一九七二年八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发扬光荣传统——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四十五周年》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人民解放军开展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取得了很大成绩。广大指战员以毛主席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个基本原则为武器，深入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提高了人民军队的政治觉悟。干部战士认真看书学习形成风气。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更加亲密。一个群众性的练兵热潮正在兴起。我们的部队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有了新的加强。全军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朝气蓬勃，奋发前进。

中国人民解放军忠于党，忠于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

我们的军队是在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成长的。

一个很好的内部和外部的团结，是我们这个军队的显著特征。

要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一九七二年十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夺取新的胜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三周年》

一年来，我国继续全面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我们进一步发展了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我们坚决支持越南、老挝、柬埔寨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支持亚非拉各国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保卫国家主权的正义斗争。我们坚持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争取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对亚非拉国家，我们是这样做的；对第二中间地带的国家，我们也是这样做的。即使过去采取敌视我国政策的国家，当它表示愿意改变这种政策，我们也同它谈判改善国家关系的问题。我们坚持了原则性，也为实现这种原则性而采取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我国的外交政策，在世界上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同情和支持。我们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更加广泛。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在被剥夺了二十多年之后终于得到了恢复，蒋介石集团被驱逐出联合国。一年来，又有二十个国家同我国建立和恢复了外交关系，许多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以及政府代表团来华访问。在中美两国关系中断了二十多年之后，美国总统尼克松今年二月访问中国，中美两国领导人就中美关系和国际事务进行了认真、坦率和有益的会谈。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打开了。最近，日本田中总理大臣应邀访华，中日两国领导人进行了友好的会谈，达成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重大协议。战争状态的结束，中日两国外交关系的建立，中日两国人民这一长期愿望的实现，揭开了中日两国关系的新篇章。这对缓和亚洲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将发生积极的影响。毛主席的外交路线的这些伟大成就，使那种梦想孤立中国的政策完全破产，也使那种仍然妄图包围中国的反革命计划正在瓦解。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毛泽东指示

我们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贰、本节简论

继续批林整风是一九七二年的工作重点。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

一、继续发出批林整风的文件。

二、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

三、解决几个省区的批林整风问题。

1, 新疆

2, 四川

3, 浙江

4, 江西

5, 贵州

6, 湖南

7, 河南

8, 山东

9, 海军

10, 北京军区

四、落实干部政策，调整领导班子。

在对外关系方面也完成了几项重大任务：

首先是尼克松访华。

一九七二年一月四日至六日，周恩来、叶剑英接见以黑格为首的美国先遣组成员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午，尼克松总统和夫人、国务卿罗杰斯和总统助理基辛格一行抵达北京机场。周恩来、叶剑英等到机场欢迎。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下午二时，毛泽东会见尼克松。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尼克松结束访华回国。中美《联合公报》发表。

其次是对西欧各国的外交取得突破。

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三日，中英两国关于互换大使的联合公报签字公布。两国之间自一九五四年起建立的代办级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

接着，中国同荷兰、希腊等国家相继正式建交或实现外交关系升格。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一日，中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两国外长签署建交公报。

再次是基辛格访华。

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周恩来与基辛格就促进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举行了五次限制性会谈。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四日，中美双方发表公报，一致认为：一九七二年二月中美《联合公报》所拟议的这种磋商是有益的，继续这种磋商是可取的。

第四是中日建交。

一九七二年七月上旬，毛泽东提出：对中日恢复邦交问题应采取积极的态度。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总之，现在到了火候，要加紧。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五日，田中首相一行应邀访华，下午，周恩来和田中举行第一次限制性会谈。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同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举行第二次限制性会谈。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同田中首相举行第三次限制性会谈。就广泛的国际问题交换意见。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会见田中一行。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和田中首相举行第四次限制性会谈。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周恩来总理和田中首相在中日联合声明上签字。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日本外交大臣大平正芳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指出，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蒋条约已宣告结束。

这一年，中国先后同十八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或实现外交机构升格，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同外国建交最多的一年。

2009年5月初稿

2012年5月4日修改

第八章第二节 开展批林整风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二年一月一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的指示的通知

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的指示的通知》。《通知》指出，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最近发出的“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的指示，对于提高全军指战员的觉悟，增进军政、军民之间的团结，使人民解放军更好地肩负起保卫祖国的伟大历史使命，必将发挥巨大作用。《通知》要求，全军指战员要深刻认识“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的重大意义，积极开展“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的活动，提高向全国人民学习的自觉性，利用一切机会，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方法，虚心地向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地方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学习，经常征求人民群众的意见，听取批评，接受监督。要抓紧新年、春节开展拥政爱民活动及冬季野营训练等机会，掀起向人民群众学习的热潮。各级党委要加强领导，把向全国人民学习的活动抓紧抓好，长期坚持下去，务必取得切实的效果。

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叶剑英谈话。

毛泽东说：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今后不要再诘二月逆流了。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毛泽东出席陈毅追悼会。

毛泽东对陈毅一生作了肯定评价，并说：邓小平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周恩来在悼词中说：陈毅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几十年来，他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战斗，坚持工作，努力为人民服务。他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战友、老同志，是我党我军的一大损失。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二日，周恩来同部分政治局委员接见来京参加新疆工作会议的

全体代表。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扩大《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的发放范围的通知

1972.01.13；中发〔1972〕3号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

为了加深对粉碎林陈反党集团重大意义的理解，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进一步开展革命大批判，中央决定：

一、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扩大发放范围。工、矿、企业发至班组，二十人以下的发一份，二十人至四十人的发两份，四十人以上的发三份；农村发至生产队，三十户以下的发两份，三十户至五十户的发三份，五十户以上的适当增发，居住过分分散的酌情增发，大队发二至三份；军队发至排，每排发两份；大、专院校和中学，每个教学班发两份，小学五、六年级，每个教学班发两份，教职员工平均每十五人左右发一份；商业部门发至班组和营业点，二十人以下的发一份，二十人以上的发两份；机关发至科、室，大体按每十人左右一份；街道发至居民委员会，大体上按有阅读能力的每二十人左右发一份。除地、富、反、坏、右和反动资本家外，均可阅读。

二、各省、市、自治区和地、县都应认真办好学习班，培养训练宣讲队伍。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学好，亲自宣讲，和群众一起阅读学习，开讲用会、座谈会，并根据文件的精神解答群众中提出的一些问题，以加深对文件的理解。好的发言稿，请选送中央。

三、文件发至基层后，要指定双人妥善保管，不许传抄，不许个人携带外出。如有遗失要追究责任，酌予处分。

四、中央将陆续发表这类材料，均照此办理。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的通知

1972.01.13；中发〔1972〕5号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传达和讨论《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的通知及附件

1972.01.13；中发 [1972] 4号

毛主席批示：照发。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

现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发给你们，请你们按照中发 [1972] 3号文件的精神，立即组织传达和讨论。传达讨论的重点是批判林彪一伙炮制的《“571工程”纪要》反革命纲领。传达的步骤应分两步，第一步在干部中传达，第二步向群众传达。各级党委首先是党的负责干部，要认真阅读文件，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逐条逐段地批判林彪的这个反革命纲领。只有这样，才能做好组织传达讨论的工作，领导广大群众进一步展开对林陈反党集团的大批判。

中共中央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三日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

《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主要内容是讲林彪一伙制定的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中央专案组调查了这个反革命政变纲领的出笼经过和林彪一伙根据这个纲领进行反革命政变的准备情况。现报告如下：

（一）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在全党开展批陈整风，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的同时，毛主席、党中央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林彪，对黄、吴、叶、李、邱，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耐心的教育。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召开了华北会议，一九七一年一月底改组了北京军区。毛主席、党中央的这一重大决策，挖了林陈反党集团的墙角，使他们在首都和华北地区发动反革命政变的阴谋受到沉重打击。

林彪一伙拒绝党的教育和挽救，死不悔改。他们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加紧策划新的反革命阴谋。

一九七一年二月，林彪、叶群、林立果在苏州继续策划反革命政变。二月下旬，林彪、叶群派林立果从苏州去上海，接着又从上海去杭州，找他们的同伙研究和制定反革命政变计划。三月十八日，林立果带于新野〔空军党委办公室（即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下同）原副处长〕从杭州回上海。当晚，林立果对于新野和已在上海的李伟信〔空四军政治部秘书处原副处长〕说：“根据目前局势，要设想一个政变计划。”林立果要立即把周宇驰〔空军党委办公室原副主任〕从北京叫来商量，并说：“刚才已经把我们在杭州研究的情况，给‘子爵号’（叶群的代号）说了一下，她说在上海要注意荫蔽、安全。”

三月二十日，周宇驰到上海。林立果召集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开会，研究制定政变计划。林立果说：“这件事与首长（指林彪）谈过，首长叫先搞个计划。”林立果、于新野等按照林彪的旨意和在杭州同陈励耘商量的框框，在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写出了反革命政变纲领。林立果按“武装起义”一词的谐音，将这个反革命政变纲领的代号定名为《“571工程”纪要》。

三月底，林立果在上海召集江腾蛟〔南京军区空军前政委〕、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南京军区空军原副司令员〕，开了一个所谓“三国四方会议”〔所谓“三国”，是指王，陈，周；“四方”，指江，王，陈、周。〕，开了一整夜。据陈励耘交代，这次会议，讨论了政变问题。

根据缴获的于新野的工作日记记载，一九七一年四月，在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期间，林彪一伙策动他们的死党周宇驰、刘沛丰〔空军党委办公室原处长〕、于新野等，在四月二十三日晚开了一个黑会，讨论了中央会议的形势，讨论了林彪黑司令部“根据斗争形势”，“准备加快、提前”实行“571”反革命政变计划的问题。据李伟信交代：于新野对他说，在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的时候，林彪、叶群要搞“571”，黄永胜他们也同意。

林彪一伙制定的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已从林立果在北京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查获。经参与政变的李伟信、刘世英〔空军党委办公室原副主任〕、程洪珍〔空军党委办公室一处原秘书〕等人证实，并经与于新野的其他记录本的笔迹核对，证明这个反革命政变纲领是林彪死党于新野手记的。原文见影印件。

（二）

根据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武汉等各地方、各部队、各单位的揭发及案犯的交代，林彪一伙按照《“571工程”纪要》这个反革命纲领，从多方面进行了反革命政变的准备。

一、建立反革命政变的组织和据点

早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前，林彪就指挥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采取种种恶劣手段，拉山头，搞宗派，结成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与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相对抗。林彪、叶群继续大量搜集古今中外政变的材料，挖空心思地研究反革命政变的伎俩。在林彪一伙的操纵下，建立了以林立果为头子的反革命别动队“联合舰队”，在上海、广州等地建立了“分舰队”和所谓“左派组织”。林彪说：“林立果不但要指挥空军的小联合舰队，全军的大联合舰队也要归他指挥”。

按照《“571工程”纪要》的计划，一九七一年三月底在上海召开的所谓“三国四方会议”，对执行反革命政变计划作了组织上的准备和分工。据缴获的程洪珍的工作日记记载：这次会议，“组织上明确了三点，每点的头：上海——王（维国），杭州——陈（励耘），南京——周（建平），互相配合。江（腾蛟）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

林彪指使林立果、周宇驰等人，在北京、上海、广州、汕头和北戴河等地，设立了十多处反革命秘密据点。从这些秘密据点里查获了大量的通信、电台、窃听、录相、录音、照相、警报器等进行特务活动的器材装备，大量的枪支弹药，窃取的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文件。他们在这些秘密据点里，召开黑会，秘密串连，收集情报，训练骨干，策划各种阴谋活动。

二、制造反革命政变舆论

林彪一伙根据《“571工程”纪要》拟定的“掌握舆论工具，开展政治攻势”的反革命计划，四出活动，为林彪发动政变，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

林彪一伙到处进行反革命宣传，挑动干部，分裂军队，欺骗群众。他们说：“现在形势很紧张”，“路线斗争尖锐复杂”，“现在的斗争是争夺领导权的问题”，“是有人要夺林副主席的权”，“林彪不当国防部长，就完全架空了”。他们说：“要特别注意九、十两个月。九月开三中全会，十月开四届人大，这是权力再分配的斗

争，斗争的实质是保卫接班人的问题，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反革命谬论，是林彪提出的“要设国家主席”的反党纲领的继续和发展，更加露骨地暴露了林彪篡党夺权的野心。

他们狂热地吹捧林彪，到处散布黄永胜、李作鹏、刘锦平〔民航总局原政委〕等人炮制的恩格斯、斯大林、林彪“三大助手”中，“林彪是最好的助手”、“最光辉的助手”的谬论。黄、吴、李、邱等人在北京、河北、山西、湖北等地建造林彪纪念馆，为林彪树碑立传。周赤萍〔福州军区原政委〕写的《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同志》，吹捧林彪是部队的“统帅”，“非凡的天才”，“一贯正确的英明的领导者”，在政变前的几个月内再版三百万册，向军内外广为散发。他们叫嚣《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一文，没有突出林彪的“功绩”，他们炮制了歪曲党的历史的党史材料和所谓“两条路线教育材料”，大肆吹捧林彪。林彪一九六九年写了一首反动诗词《重上井冈山》，词中说，“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明目张胆地攻击毛主席，要翻历史的案。叶群、黄永胜、李作鹏、吴法宪把林彪的这首反动诗词谱成歌曲，一九七一年五月再次秘密录音。同时，林彪一伙利用一九七一年七月召开的空军某部现场会议，再次掀起吹捧林立果的反革命妖风。林彪一伙胡吹林立果是“群众的最好领袖”，是“第三代的接班人”，林立果那个所谓“讲用报告”，是“第四个里程碑”。

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后，继续反对“九大”路线，反对毛主席圈去三个副词的指示，攻击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文献，抗拒对唯心论的先验论的批判。林彪一伙坚持“天才”的反党纲领，顽固地认为，人的才能是先天就有的，否定人们的社会实践。林彪一伙到处大讲“天才”，胡说什么“天才论不等于先验论”，不承认天才，“是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与唯物主义的可知论的混合”，“极左派把天才加以唯心主义的虚无主义的解释，然后大加批判，这是诡辩论”。他们鼓吹“应是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的反动观点，继续吹捧林彪、林立果是天才，叫嚣“我们要承认天才，学习天才，宣传天才，保护天才”，为林家父子封建法西斯王朝上台作舆论准备。

三、妄图拉拢某些部门、某些部队的一些人，为林贼篡党夺权服务

林彪、叶群、黄、吴、李、邱一伙，采用封官许愿，请客送礼，接见照像，参观游览等种种手段，搞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妄图分裂党、分裂军队，欺骗和拉拢

某些部门、某些部队的一些人。从一九七一年三月到九月初，林彪一伙派出了林立果、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江腾蛟、刘锦平、王维国、陈励耘、王飞 [空军司令部原副参谋长]、胡萍 [空军司令部原副参谋长]、鲁珉 [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原部长]、李伟信等，先后分别窜到北京、上海、杭州、广州、武汉、成都等地，进行反革命游说和反革命阴谋活动。

四、秘密建立反中央政治局同志的黑“专案”

在林彪的指使下，林彪一伙秘密地组织亲信，收集和复制反中央政治局同志的黑“材料”，甚至私设反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密的“专案组”。这些黑“专案组”，由黄、吴、叶、李、邱直接控制，亲自出面布置任务，批阅和修改黑“材料”。他们采取捏造事实、制造谣言、肆意中伤等反革命手段，阴谋陷害中央政治局同志，为发动反革命政变作准备。

在林彪的支持下，黄、吴、叶、李、邱对反对过他们的革命干部和群众，进行残酷迫害，私立专案，私设监狱，违法乱纪，草菅人命，实行法西斯专政。

五、秘密组织为反革命政变服务的武装力量

林彪一伙根据《“571 工程”纪要》拟定的反革命计划，在上海由王维国组织了名为教导队、实为反革命政变服务的武装力量。这个教导队规定在政治上，要培养对林彪、林立果的“感情”，欺骗和蒙蔽战士要“自觉”做到在林立果的指挥下，“誓死捍卫”林彪和林立果，“狂风恶浪不动摇，海枯石烂不变心”。在军事上，进行“步兵动作、打靶、刺杀、捕俘、格斗”等训练，并配备了最好的武器。林彪一伙根据《“571 工程”纪要》提出的“领”和“自造”武器的两项办法，通过合法的和非法的形式，搞到了一批武器装备，为反革命政变作准备。

林彪一伙丧心病狂地准备使用火焰喷射器、炸药、爆破器材、毒气航弹等，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

六、建立反革命特务组织

林彪一伙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秘密地组织了所谓“调查小组”、“技术小组”、“战斗小分队”等反革命特务组织。林立果通过米家农 [广州民航局原政委] 组织的“战斗小分队”，就是这种性质的组织之一。这个组织成立后，曾强迫队员集体向林彪、林立果多次宣誓效忠。林彪一伙规定的誓词说：“永远忠于林副主席”，“一切听从副部长的调动，一切听从副部长的指挥，我们要做副部长的宣传

员、保卫员、通讯员、战斗员”，“我们要成为宣传副部长的先锋，捍卫副部长的尖刀，紧跟副部长的闯将”。这个“战斗小分队”有自己的反动“队歌”，有多种联络密语和暗号。还规定了法西斯纪律：不准探亲，不准亲友来队，不准单独活动，不准恋爱结婚，不准单独谈话，谈话者必须三人以上，不准随便打电话，通信要经过审查，不准泄露“林副部长”的秘密活动，等等，违者要受到批判或处分。这种“战斗小分队”的人员，绝大多数是受蒙蔽的青年，他们是可以教育好的。

七、秘密组织情报网，进行特务情报活动

林彪一伙根据《“571 工程”纪要》拟定的“情报保障，掌握三个环节：搜集、分析、上报”的反革命计划，在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地组织了情报网。他们使用打进去拉出来、安钉子、搞窃听、暗中监视等特务手段，搜集情报，掌握动态，上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林彪一伙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想方设法探听毛主席的行动路线。

林彪一伙千方百计窃取毛主席到南方视察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的谈话内容。一九七一年九月上旬，刘丰〔武汉军区原政委〕、王璞〔广州军区空军原司令员〕、顾同舟〔广州军区空军原参谋长〕、陈励耘、王维国等人，把毛主席同一些负责人的谈话内容，报告了林彪，为林贼发动反革命政变选择时机，提供了线索。

他们还在中央某些要害部门安插亲信，为他们“站岗放哨”，探听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动向。

他们还大量地搜集许多地方和军区负责人的动态情报，从北京、广州等地的秘密据点里查获了大批手抄的这种情报。

八、为反革命政变建立通信网

林彪一伙按照《“571 工程”纪要》拟定的准备“通讯器材，包括01工程”的反革命计划，在上海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研制电信通信装备。林彪一伙大量盗用通信装备器材，私调几十对专线，以北京为基点，组织秘密通信网。他们还试制了代号为“01工程”的无线电收发报机。林立果要求这种收发报机，通信速度快，保密性能好，体积小，便于伪装，要求能在市内进行无线电通信联络，在发动反革命政变时使用。

九、秘密进行驾驶直升飞机，坦克、水陆两用汽车训练

林彪为了进行反革命政变，指使其死党林立果、周宇驰，秘密进行飞行训练和驾驶坦克、水陆两用汽车的训练。林立果、周宇驰等人，先后十次去某坦克部队秘密学习驾驶坦克。从一九七一年五月份起，周宇驰开始秘密学习驾驶直升飞机。七月，周宇驰以练习直升飞机的飞行作掩护，先后飞到南昌、庐山、广州、郑州等地，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八月至九月初，周宇驰从北京多次飞往北戴河，给林彪、叶群递送情报，密谋发动政变。在北戴河据点，秘密建立了一个直升飞机机场。他们还私调和仿造水陆两用汽车，在北戴河海面进行驾驶训练。

十、盗窃航行资料，为叛国投敌作准备

林彪、叶群指使周宇驰，从空军司令部窃取了我国三北地区雷达兵部署图，可作导航用的我国周围各国广播电台频率和时间表，港澳航线图以及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航线图、机场位置、呼号、频率表，华东、中南几个省一、二、三级机场资料等。林立果、刘沛丰等还窜到广东深圳、沙头角，拍摄了大量地形照片。他们还乘坐飞机，越过规定的航线，察看了九龙的地形。林立果说：“万一情况紧急了，可以让首长（指林彪）到香港指挥、遥控”。

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一伙按照蓄谋已久的《“571工程”纪要》反革命纲领，“破釜沉舟”，发动政变。林彪如同一切反动派一样，是注定要灭亡的。他们的反革命“联合舰队”迅速地沉没在中国人民的汪洋大海里了，而毛主席率领的伟大中国人民的革命舰队，正在乘风破浪地胜利前进。他们鼓吹的“江田岛精神”，不但仓惶逃命的林彪、叶群、林立果不实行，一小撮死党中的大多数人也是不实行的。在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下，受林彪一伙欺骗和蒙蔽的人们，绝大多数都在觉醒起来，反戈一击，揭发和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参与反革命政变的分子，大多数正在向党坦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党我军我国人民取得了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阴谋的又一次伟大胜利。

（三）

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将《“571工程”纪要》这个反革命政变纲领全文印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好处极大。林彪的《“571工程”纪要》这个反革命纲领，同它的作者们一道，已经被

人民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它如同一切反革命文件一样，并不是成功的纪录，而只是失败的纪录，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林彪及其一伙怎样耍两面派呢？他们怎样以假象欺骗我们，而在暗地里却干着我们意料不到的事情呢？这一切，广大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是不知道的。这个反革命纲领，具有极大的尖锐性和鲜明性，彻底地揭露了林彪及其一伙的伪装，使我们看清了他们的真面目。林彪这个口口声声喊着“高举”、“紧跟”、“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家伙，原来是一个打着拥护毛主席的旗号、挂着共产党的招牌，实际上极端仇视毛主席、极端仇视共产党、极端仇视中国人民解放军、极端仇视中国人民、极端仇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叛徒、卖国贼！

《“571 工程”纪要》这个反革命纲领，是地、富、反、坏、右和帝、修、反多年来反华、反共、反人民的各种反动观点的大杂烩。它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肆意污蔑我们党在毛主席领导下半个世纪的革命历史，一笔抹煞全国人民长时期英勇奋斗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把国内外大好形势说得漆黑一团。它捏造事实，制造谣言，挑拨离间，恶毒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上，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为了篡改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总是用“独裁者”、“暴君”这种胡言乱语，诽谤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第一国际时代的阴谋家巴枯宁，曾经咒骂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独裁者”[恩格斯致奥·倍倍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三八七页。]。第二国际时代的叛徒考茨基，也曾经咒骂列宁是“独裁者”[考茨基，《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第三十四页]。第三国际时代的叛徒托洛茨基，曾经咒骂斯大林是“专制君王”[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第五四〇页]。以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又疯狂攻击斯大林是“迫害狂”[赫鲁晓夫：在苏修二十大的秘密报告]、“暴君”、“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赫鲁晓夫：一九六二年在苏联政府“五一”招待会上的讲话]。林彪和林彪一伙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攻击，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阴谋家、叛徒们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攻击，一模一样。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由于他们共同的反动阶级本性，由于他们共同的反马克思主义、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思想体系所决定的。

对国内外阶级敌人的这种攻击和谩骂，毛主席早就痛斥过。毛主席在一九四九年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在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主席发表了《破除迷信》的重要讲话。当毛主席讲到“秦始皇是一个厚今薄古的专家”时，林彪插话指责“秦始皇焚书坑儒”。毛主席当场驳斥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得比他多。我们在镇反中，镇压了几十万反革命，我看有四万六千个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坑掉了。我跟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他们说得不够，往往还要我们加以补充。”

林彪的这个反革命纲领，这样恶毒地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毒攻击中央负责同志，恶毒攻击我们的党，恶毒攻击中国人民解放军，恶毒攻击我国工人、农民、革命干部、红卫兵、知识青年和其他革命人民，它的实质，是反对党的“九大”路线，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改变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国内，他们要联合地、富、反、坏、右，实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在国际，他们要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联苏联美反华反共反革命。如果他们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得逞，中国就会象毛主席曾经指出的那样：“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但是，林彪一伙的反革命阴谋是绝不能得逞的。他们同一切反动派一样，总是错误地估计形势，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的力量。他们是极端狂妄，又极端虚弱的。他们所谓的“基本力量”和“可借力量”，不过是这伙反革命自己的如意算盘，真正死心塌地跟着他们搞反革命政变的，只是一小撮。在毛主席领导下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内，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林彪一伙图谋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只能是痴心妄想。

毛主席指出：“以损人的目的开始，以害己的结果告终。这将是一切反动政策的发展规律。”林彪一伙正是按照这条规律办事的。我们要搞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林彪一伙要搞修正主义；我们要团结，林彪一伙要分裂；我们

要光明正大，林彪一伙要搞阴谋诡计。总之，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林彪一伙要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倒行逆施，根本违背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违抗我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妄图把已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重新扶植起来，扭转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前进的巨轮。其结果，就只能叛党叛国，身败名裂，粉身碎骨，自取灭亡。

一九六六年七月，毛主席曾经指出过：“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

林彪及其一伙是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的代言人。他们在《“571 工程”纪要》这个反革命政变纲领中咒骂革命的话和他们的反革命策略，必将激起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也必将引起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共鸣。这是可以预料到的。我们相信：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我国广大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能够认真地研究这个反革命文件。通过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这个反革命纲领的逐条逐段的批判，通过对林陈反党集团的揭发和批判，并且同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结合起来，必将大大提高我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敏感，大大激发我国人民战斗的意志，坚决地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一切阴谋诡计，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进一步地巩固起来。

附件一：反革命政变纲领《“571 工程”纪要》（影印件）

附件二：反革命政变纲领《“571 工程”纪要》（原文印件）

附件三：李伟信的笔供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讨论各地工作情况。

会议认为，新疆、江西、贵州、云南等地问题值得引起注意，尤其是新疆在批林整风运动中，仍将斗争主要矛头指向王恩茂，不利于团结对敌。

会议商定，近期约新疆党委和军区负责人来京谈，以促进他们的认识和团结。

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同部分政治局委员接见来京出席新疆工作会议的代表。

周恩来说：把批判矛头对准王恩茂的两个主义和一个王国，是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中央的政策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犯了错误改了就好。

现内部最大的问题，是出了林彪反党集团，从九一三至今，已经四个多月了，你们还没有自觉地深挖思想。

林彪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而毛主席讲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混淆。

听说新疆现在还有人讲二月逆流，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叶副主席已经主持军委工作，你们听到那些话，为什么不批驳？

一九七二年二月六日，王必成在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干部学习班上的讲话

一九七二年三月五日，毛泽东对苏振华来信的批语

此人似可解放了。如果海军不能用他，似可改回陆军（或在地方）让他做一些工作。可否，请中央酌定。

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七日，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的通知

1972.03.17；中发 [1972] 12 号

毛主席批示： 同意

中共中央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种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

一九七一年八月中旬至九月十二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到外地巡视，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进行了多次重要谈话。许多单位要求将毛主席的谈话整理印发。中央根据毛主席在各地谈话纪要，综合整理了一个纪要，现印发给你们，请你们按照中发 [1972] 3号文件规定的范围，即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进行传达。

毛主席的谈话，以路线斗争为纲，总结了我党五十年来十次路线斗争的经验，提出了“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个基本原则问题，明确指出一九七零年庐山会议的斗争是两条

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反复强调对犯错误的干部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毛主席的谈话，是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加强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是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有力武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谈话，进一步展开对林陈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把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一九七二年三月十八日至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讨论两广、四川和湖南等地批林整风中存在的问题

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九日，刘兴元、李大章等七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问题的请示报告

去年九·一三以前，我们没有把“批陈”作为头等大事来抓，而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了“一批、两清”（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三老会”）运动上，有些地方，把斗争矛头指向了持有不同意见的群众和干部，混淆了阶级阵线，违背了毛主席关于重点在批陈的指示，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过去，我们对此认识不足，没有及时纠正这个错误。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1）四川军民是热爱毛主席，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林贼及其死党所谓的“根据地”和“借用力量”，只不过是这伙反革命的如意算盘，真正死心塌地跟着他们搞反革命政变的，只是一小撮。成都地区犯方向路线错误的只是个别人。

（2）现已查明，林贼一伙在进行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活动中，对成都地区在思想上、组织上是下了很大功夫的。林贼一伙把温玉成派来成都军区，又先后派出死党刘沛丰、于新野、刘锦平、王飞、鲁珉等人来川进行反革命串连，同丁钊（空军“成指”原政委）等人策划过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活动。

（3）在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中，梁兴初、陈仁麒、谢家祥三同志上了贼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军区党委和省委遵照中央的指示，召开了几次会议，在狠批林陈反党集团的同时，本着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对梁兴初等同志所犯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揭发批判和耐

心诚恳的帮助。犯错误的同志在会上作了检讨和交代，表示愿意改正错误，同林贼一伙划清界限，彻底决裂。我们要遵照毛主席“有错误不要紧，我们党有这么个规矩，错了就检讨，允许改正错误”的教导，对他们的这种态度，应当欢迎。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批转四川省委“关于继续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问题的请示报告”

1972. 03. 23；中发 [1972] 14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中共中央批示

中共四川省委、成都军区党委：

中央同意刘兴元、李大章等七同志的请示报告。

中央希望你们领导全省广大军民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谈话纪要》和中共中央一系列有关文件。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锐利武器，进一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

对犯错误的同志，要遵照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

你们在斗争中，要特别警惕一小撮阶级敌人乘机捣乱和破坏。要排除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要认真地区别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增强军政、军民、军队之间的团结。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对杨成武家属来信的批语

请汪印发政治局同志研究。此案处理可能有错，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六日，谢富治因病逝世。

一九七二年三月三十日、三十一日，中央政治局会议。

讨论江西、浙江问题。

一九七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纪登奎在国务院汇报干部会议时的讲话精神
主要讲三个问题：

一、在原则问题上不能让步：最近发了毛主席的谈话纪要（指十二号文件），精神就是要解放干部。国家机关解放一批干部，解放了就要分配工作。有的要经中央批准，有的要经毛主席批准。过去是正部长如谷牧同志、胡耀邦同志都要报毛主席批。现在报的材料太简单了，手续也不完备，要报毛主席看，不行。最近苏振华同志写了一个检查，很认真检查了在地方工作时的错误（毛代表说：苏振华过去在地方上做过县委），军队里犯的错误，一段一段很清楚，毛主席看了批了，可以安排工作。林业部一个副部长写的检查很认真，但我们整理时只说他犯了一般错误。他检查他过去支持了出版刘志丹的小说。毛主席说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就是指的这本书，他那时的错误，就等于现在出版林立果的反党材料一样是反党性质的，但结论是一般错误是不对的。

又如有个同志反对学习大寨，实行包产到户，是犯了走资派错误，他本人写得很深刻，但我们写得太轻了。不要在原则问题上马马虎虎，要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这样对他们有利，也不会背包袱，否则到下面工作也不好。有个副部长在土改时有反攻倒算问题，没写清楚，这是个大的问题，路线问题，要在结论中写清楚，没有还的账一定要还，你忘了群众忘不了。

欠了账一定要还。各省委成立党委时，总理亲自抓，对这类问题都要回到原来的地方去检查，有的受了处分。这样对本人有好处，这笔账要还，至少要写封信，回到原来的地方作检查。当了官也不行，欠了账要还，如果不愿意这样做就

不好。

二、整理材料问题：正部长和中央文革直接处理过的人的材料要报主席批，副部长报中央批。本人检查要用路线观点来说清问题，光用“滔天罪行”、“狼子野心”这些不能解决问题。不要在批判他的时候“滔天罪行”，解放他时又不讲原则，原则是非要分清楚，不要写得太长，要实事求是，另外要写个报告，对这个人的政治历史问题，一贯表现和他检查的要表态，提出使用意见。

材料问题要选择，不要带一大包，一个人一大包材料是包袱。结论、组织意见、本人检查，如有政治历史问题要附上主要能说明问题的材料，其他材料暂时放着，不要转。待中央研究后处理，不要搞邱会作那个办法。（总后下放了很多干部到

新疆，去时这边欢送，那边欢迎，各人的材料也没弄下去，以后就把人家在运动中的材料一大包一大包的转下去了。）

组织结论要和本人见面，文化大革命大家都知道，意见不一致就不要分配。如有个单位对一个副部长的入党时间问题，他自己说是1937年入的党，但调查的是1938年，他一直保留意见，故必须把问题弄清楚。（夏部长说：1937年入党的算内战时期的干部，1938年的就算抗日时期的干部，故这两个年头是有区别的，如1938年1939年区别就不大了。）不要带着问题下去，矛盾不要带到地方去。结论是斗批改的最后阶段，思想要做通，不要把不干不净的分到地方去。哪些材料装档案，哪些不装还要研究。对副部长的材料各个核心小组的成员要看，领导不看材料不好。（纪登奎同志谈到一份材料上写着“一般的吹捧蒋介石”，认为这种提法就不确切，怎么叫“一般的吹捧蒋介石”？）这也是斗批改的水平问题。前一段分配到各省市去的干部，大部分是好的，但也有问题，有人批评我们把“五·一六”也派下去了。

三、清查“五·一六”问题：全国总工会汇报时，纪登奎同志说：有人告状，江青同志把信转给我了，你们单位有多少“五·一六”？答：有200人。纪登奎同志说：有那么多吗？这就是扩大化了，答：我们定了两个。又问农林部有多少“五·一六”？答：有100多。纪登奎同志说：有这么多吗？会后全总和农林部的留下谈谈。以后又问交通部有多少？交通部的同志没有讲。

（1972年4月整理）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浙江来京开会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

在揭批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在浙江省出现了很大的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南萍、熊应堂两同志。自批陈整风以来，特别是林彪叛党叛国事件发生以后，他们以种种手法，错误地打保票、捂盖子，对抗中央指示，压制群众揭发问题，严重地阻碍了运动的深入发展。这主要是因为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他们在检查交代中初步认识到，上了贼船，陷得很深，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一个月来，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多次耐心启发教育和与会同志的热情帮助下，态度逐渐好转，认识逐

步提高。他们已检查交代的主要问题是：早在一九六九年一月中央召开解决浙江问题会议期间，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就秉承黄永胜、吴法宪背着中央向他们下达的黑“指示”，不顾大局，以“胜利者”自居，破坏“一月会议”精神的贯彻。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南萍同志支持了林彪一伙“设国家主席”的反党纲领，配合林陈反党集团向党进攻。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南萍同志继续充当林陈反党集团的吹鼓手，吹捧林贼八月二十三日的“讲话”“激动人心”。在一九七一年一月省党代会工作报告中，在引用党章原文时竟又加上“三个副词”，篡改了党章。并在许多文章、讲话中，宣扬了“天才论”。尤为严重的是，直到去年十月一日，《浙江日报》还公然刊登了林贼的画像。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对林彪及其死党黄永胜、吴法宪、陈励耘、王维国、江腾蛟等人，言听计从，积极投靠，互相吹捧，打的火热。他们同陈励耘一起，根据黄永胜、吴法宪的决定，花二千余万元在杭州为林贼修建了“行宫”。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对毛主席、党中央的多次指示听不进去，而接受了黄永胜、吴法宪、陈励耘等人的挑动，反对南京军区领导，阻挠舟山问题解决，分裂军队，破坏团结。我们认为，南萍、熊应堂两同志的这些检查，同刚来京时比较，是有进步的。但是，检查还不够深刻。他们表示，回浙江后要放手发动群众，在彻底揭批林陈反党集团罪行的同时，把自己摆进去，接受群众的教育帮助，并作进一步检查。对此，我们表示欢迎。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批转解决浙江问题会议的“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

1972. 04. 25；中发 [1972] 16 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中共中央批语

中共浙江省委：

中央同意浙江省委和驻浙部队来京开会的十位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

中央希望你们认真学习《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和毛主席、党中央对第十次路线斗争的有关指示，放手发动群众，结合浙江实际，认真抓好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有步骤地进一步揭发和批判林陈反

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

中央认为，驻浙部队、浙江省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是热爱毛主席的，是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参与林陈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活动的，只是陈励耘等一小撮。在这次路线斗争中犯了严重方向路线错误的，也只是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在斗争中，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待犯错误的同志，要遵照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坚决同林陈反党集团划清界限，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认真改正错误，并取得群众的谅解，党还是予以信任的。

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做好各方面的工作。浙江地处海防斗争前线。你们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防止阶级敌人的捣乱和破坏。要排除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克服无政府主义。要增强军政、军民、军队之间的团结，以路线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江西来京开会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

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在江西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是来自程世清同志。九届二中全会以来，特别是林贼叛国投敌、自取灭亡以后，程世清同志采取了各种办法，对抗中央，压制群众，不准联系江西的实际，不认真进行揭发批判，竭力捂住盖子。事实上，第十次路线斗争在江西反映得很尖锐、很突出。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中，程世清同志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根据揭发和程世清同志自己交代，早在“九大”以前，程世清同志就上了贼船，并且制造谎言，篡改党的历史，积极吹捧林贼，散布反动言论。一九六九年九月，林贼及其死党叶群、吴法宪、林立果等人，窜到井冈山，阴谋策划在江西建立反革命“根据地”，林贼还就国际、国内形势和党内路线斗争等问题，同程世清同志进行了广泛深谈。林贼同苏修一唱一和，胡说什么“在中国，小资产阶级可能把权抢走”，提出了“防止小资产阶级抢权”的黑纲领，反对党的基本路线，把矛头直接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程世清同志积极执行了林贼的黑“指示”，为林贼的反革命阴谋效劳。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期间，程世清同志与林贼及其死党叶群、吴法宪

等多次密谋，向党进攻。庐山会议以后，程世清同志为法西斯分子林立果制造水陆两用汽车，特别是一九七一年六、七、八、九月间，林贼的死党周宇驰、刘锦平、查全伦、程洪珍、王佐、顾同舟、解耀宗等人，纷纷窜到江西，紧锣密鼓，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程世清同志先后同周宇驰、查全伦、顾同舟、解耀宗见面谈话，相互送礼，行动很不正常。

几年来，江西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受到林陈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严重干扰。根据揭发和程世清同志自己的交代，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程世清同志背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犯了形“左”实右的错误。例如：在农村中，不区别具体情况，违反多数群众的意愿，全面实行扩社并队；不根据当前农村经济的实际可能，不考虑群众生产、生活的方便，拆掉一批民房盖新村。在城市中，将集体所有制的合作商店全部解散；不区别一般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反动资本家的界限，均按地、富、反、坏对待；要南昌市拆掉大批房屋，另建新城镇。在工农业生产和文教卫生工作中，存在有乱出主意，乱提口号，强迫命令，瞎指挥的错误。在组织上，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在作风上，骄横跋扈，家长制，一言堂。尤其严重的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许多重要指示，有的严加封锁，有的肆意歪曲，有的弄虚作假，欺骗干部和群众。

杨栋梁、文道宏、李登云三同志，也初步检查了自己所犯的严重政治错误。于德馨同志检查了自己所犯的错误。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约见准备派往浙江帮助贯彻中央精神、解决浙江问题的许世友、王洪文。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和叶剑英约见来京参加的浙江省党政军负责人。

周恩来说：你们的报告主席、中央已经批了，回去后先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中央派许世友、王洪文去帮助。中央决定谭启龙、铁瑛参加浙江省委常委，分别担任省委第一书记、书记，主持省委工作要把浙江搞好。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对《江西来京开会同志关于继续开展粉碎林

陈反党集团斗争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语

1972. 04. 27；中发 [1972]17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中共江西省委：

中央同意江西省委和驻赣部队来京开会的十一位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

中央希望你们认真学习《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和毛主席、党中央对第十次路线斗争的有关指示，放手发动群众，结合江西的实际，认真开展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彻底揭发和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有步骤地揭发和批判程世清同志所犯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

在斗争中，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本着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在斗争中，要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排除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防止反复，以利于把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认真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坚决纠正程世清同志在重大政策问题上所犯的严重错误。在纠正错误的时候，要认真调查研究，分别轻重缓急，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

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江西军民，是热爱毛主席，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希望你们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和军队之间的团结，以路线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中央政治局还商定了江西省委主要领导人的排序方案。

周恩来和政治局成员约见程世清、杨栋梁。

一九七二年五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

通知指出：这种走后门的不正之风，严重干扰毛主席的教育路线，败坏党的优良作风，损害党群关系和军民关系，危害很大。

一九七二年五月三日，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

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意见。

一九七二年五月六日，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的通知

1972年5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的通知》。

《通知》回顾了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国出逃事件发生以来到现在8个月中毛泽东和党中央采取的5项措施。

指出：“为了总结和交流这一时期的经验，以利于进一步揭发和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和反革命罪行，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使全党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中央决定从5月20日起，召开一个全国性的批林整风汇报会议。”

一九七二年五月十八日，周恩来确诊患膀胱癌。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参阅文件之一——揭发林彪在历史上反毛主席、反党的罪行

目 录

- 一、朱德同志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信……………（1）
- 二、刘伯承同志揭发林贼罪行谈话记录（摘要）……………（4）
- 三、李富春同志揭发林贼的罪行……………（8）
- 四、陈毅同志给毛主席的信和揭发林彪早年的反党罪行……………（11）
- 五、聂荣臻同志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信和揭发林彪的反党罪行……………（21）
- 六、肖克同志对林彪的揭发……………（34）
- 七、曾山同志揭发林彪的罪行……………（46）
- 八、邓子恢同志揭发林彪的罪行……………（48）
- 九、蔡畅同志提出的林、叶二贼有里通外国嫌疑的几个线索……………（50）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一日，根据中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周恩来前往毛泽东处请求可否将毛泽东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写给江青的信印发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毛泽东表示可以印发作会议文件。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我们这次会议人数是三百一十二人，比去年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的九十九人扩大了。鉴于去年那个会议的人数比较少了一些，因此传达也就不很广。地方还好，中央的比如军事系统，中央文件发了六十多份，可是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他们就扣住了，只发了七份。所以当时批陈整风的传达，在军事系统，军委直属的，就非常窄狭。去年七月被主席发现了，说要继续跟各地方打招呼。犯错误就是要自己引以为戒，就要逢人便讲嘛，这才能够自己得到教训，得到警惕，人家可以监督，人家也可以引以为训嘛。这是主席对于历来犯路线错误的教导嘛。但是，当时黄永胜他们就不是这个态度。

这一次我们这个会议的名字改成批林整风了。九后二中全会以后，主席的一系列措施，都是教育一批干部，还要保林，使他自己知道那个错误的严重，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也是如此。《我的一点意见》，把打击的矛头对准了陈伯达这个骗子，由于主席的教导使相信他的人、上当的人觉悟了，警惕起来了。使跟他搞阴谋的人就不要搞了嘛。所以，从九届二中全会到去年九月十三日事件以前，一直提的是批陈整风。整个精神，从文件上你们可以看出，也是如此。但九月十三把这个问题真相揭穿了，头子就是林彪，而不是林、陈，不象高饶联盟那样。林彪搞的是阴谋活动，他反党、反主席的思想是长期存在的。刘少奇以后就是他挂帅来反对主席了。他是搞阴谋的，但是阴谋逐步要暴露，最后灭亡。这次第十次路线斗争，主要矛头就是要批判、揭露、粉碎林彪这个反党集团，教育大批干部，团结大批干部，是这样一个精神。所以，这次开的会议就定名为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也不要再说林陈反党集团了，就是林彪反党集团。

这场斗争，从二中全会以来分成两个段落，是贯串主席一条红线来指导这个运动的。因此人数我们就提议扩大，主席批准了。

这一次批林整风会议，首先要学文件。文件相当多，要把它归一下类。政治局原来讨论了，昨天又请示了主席，刚才政治局又开会讨论，大概初步定为这样的一些文件，正式的会议文件，有六种。

文件之一，就是《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和九届二中全会以来毛主席的文章、批示和重要谈话》，一共十二件。《我的一点意见》，主席和斯诺的谈话，以及主席去年

八、九月巡视南方各地，跟各地主要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这三个是全文，其他是批件。比如说主席对中联部关于跟荷兰党内的人谈话的批示；对三十八军报告的批示；对济南军区政治部的报告的批示；对华北会议的批示；对去年计划会议的批示等等，这些都可以在会议文件之二大本里找到。这个只印批示，不印原来的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去查就行了。但是为的要贯串起来学习主席思想，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主席如何教育大家，对林彪这些人如何教育，都可以从文件之一中看出来。

文件之二，就是刚才说的，从九届二中全会以来，有主席批示的、中央发的有关文件都印在一起了。里头有的是要查的了，比如刚才说的主席的八个批示，从文件之二里头就可以找到报告的原文。同时，也有跟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联系起来学的，如材料之一，材料之二，在那个大本子里也有。从九届二中全会到九月十三日编为第一本；九月十三日以后到现在编为第二本，分为两个段落。

另外有一个单页电报，是批评新疆关于新疆日报擅自登出林彪大幅照片等严重错误的。这样性质的错误，不仅新疆有，浙江也有，比如这回安徽报告上检查也有。恐怕别的省这回讨论，你们回去自己检查也可能有。在去年九月十三日以后，我们只说以前已经发表过的文章，有林彪的话就不要勾掉了。但是还继续登林彪的照片，还不断地引林彪的语录，一直到十月、十一月，吹捧林彪的话在报告上还有，这就是错误的了。因为有这种情况，所以把这件也印出来，大家再看一看。这都是发过了的，但是不见得到会同志都看过。这是文件之二。

文件之三，这是这回学习的重点之一，就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原来已经发了材料之一、材料之二；现在发材料之三。这个作为送审稿，还不作最后稿。主席在上面批了：“同意印发，征求意见。”就是到会的三百一十二位同志都可以直接提意见，同时也可以拿这些材料深入地批判，深入地揭发。如果在批判和揭发当中，还有新的、好的材料，更有分量的材料，还可以补充进来。会后我们再进一步修改，作为中央文件发到各地去，层层下达。文件之四，就是中央专案组关于国民党老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罪行的审查报告以及陈伯达反革命历史的罪证。这个里头，也比过去的东西多了一些。就是他的国民党老反共分子证据确凿，托派证据确凿，

被捕叛变自首成了特务，这也是证据确凿。他整个思想是从国民党右派一直到托派、修正主义分子。主席昨天还说了一件事，就是文字上我们应该写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他说这个形容词，修正主义还有革命修正主义吗？当然只指反革命了，你要写反革命修正主义，好象对立面还有革命修正主义了，说笑话的。那么文字上应该是反革命的，就是他这个性质是反革命又是修正主义，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中国这个文字修辞若不那么严格，常言可以引起误解，主席昨天举了这个例子。

当然，现在大家主要的火力是对付林彪反党集团了，但是陈伯达也是主要成员，大家有什么知道的事情，或者跟他共事的时候知道一些什么事，还可以揭发，还可以批判嘛，这样来充实这个部分。因为陈伯达里通外国的材料还不完全，如果还有更有分量的材料就更好，这个我们还在继续审查。

至于材料之三那个前言，主席昨天也说了，“继续审查”那句话可以不写。主席说，大的罪状已经很够了，再多就是补充就是了。这个文件现在都已经印了，主席批评的意见，我们把它说出来，大家知道就是了。当然，也不是说没有材料了，不审查了，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再揭发也就是这类性质的问题了，还有比这个更凶的吗？要谋害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这个谋害罪状千真万确的证据，那么多嘛，人人愤慨的嘛。这个性质是不变的了，顶多就是补充材料，不是继续审查的问题，而是揭发的问题。我们的措辞上是有点毛病。这好在是征求意见了，大家有更尖锐的意见，还可以提给我们，我们是欢迎的。因为专案组抓这个工作越看多了，有时候明摆着措辞不当，有时就疏忽过去了。

现在确定的文件之五，是最重要的一篇，就是毛主席给江青同志的信。这个信只有政治局一部分同志看过，在座的你们各省市的，还有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没看过。就是在“九·一三”以后，今年印的吧？这封信是什么时候写的呢？就是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政治局扩大会议林彪在河北厅讲话以后，林彪讲话经过多次改动，送到主席那里，主席总是有点不安，里头有些话过头，叙述政变那种写法也不当。但是当时是为本要发动文化大革命，鼓革命群众之气，要打击、扫除那种修正主义的风，所以说有些过。但是当时的中央修改以后，还是请主席批。主席觉得不批，这篇东西不能发表，不是等于给群众泼冷水了吗？因为大家希望看到这篇东西嘛。实际上这里头有毛病，有些极“左”的话，有些不恰当

的。现在大家回想回想恐怕就会看出来。林彪那篇东西是不是可以作为参阅文件印给大家？刚才政治局会议没有讨论，再看一看。毛主席这封信一针见血。主席写这封信是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在武汉写的，我是七月十一日到武汉。那时见了个外宾，我跟主席报告我到国外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以后，主席要我留一天。第二天上午见主席，主席就把给江青同志的那封信的抄件给我看。是一个底子，那个字是徐业夫同志抄的，有些字还抄错，主席还改了的。那个信可写的深刻，现在大家想想看，那简直是完全看到了这些问题。当然了，当时不是说林彪这个人了，也可能想着利用右派来搞。那封信指林彪那些极“左”的话，这个极“左”，就形“左”实右，就落在林彪身上，是个右派。主席说七、八年后，结果六年就出现这个事了。只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才能预见到这么清楚。这封信贯穿了整个文化大革命，大家可以看一看。当然了，那封信可能有些事情大家不大懂的了，将来我们参加政治局的作日常工作的九个同志分到各组里，还可以加以解释。这个大概明天可以印给大家。非常深刻的一封信。前天，我们政治局决定要请示主席，我昨天去请示主席，原来主席还说等一等，昨天一请示说可以。这个我们当然先印给到会同志看了，先不外传了。这是会议文件之五。以上这些文件现在有的已经发了，有的明天要印发。

我们的会议除正式文件外，还有参阅的文件，我们也是不多选，选那些重要的。参阅文件之一，就是军委办公会议收集的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军事路线的罪行，有两本，我们现在选他第一本。就是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一直到解放战争，也挂了一点抗美援朝。重点是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有人把他说成好象是了不起的。现在陈毅同志故去了，他生前揭发了一件事，这个文件上面也选了。就是说，从三河坝离开，朱德同志拍胸脯，要大家跟他走。因为他是在旧军队呆过，懂得怎么样能够避开敌人，还能把自己的革命同志团结在一起，来继续打仗。三河坝的时候，林彪仅仅是个连长吧？（聂荣臻同志：连长）连长。他也离开队伍。当时离队之风那就是很盛了。比如那个时候师长周士第就离队了，还有李硕新也离队。李硕新后来做白区工作牺牲了。林彪也带着钱，带着枪离队，走不出去了，才折回来。上井冈山，他仅仅是一个营长吧？（朱德同志：连长。）还是连长。那怎么能把朱、毛会师说成了毛主席跟林彪会师呢？这是歪曲历史嘛。井冈山被林彪去逛了一下子，程世清同志他们

就这样子写，这是错的。所以，从军事路线的斗争上看出，林彪的“左”倾路线是一系列的。我也犯了“左”倾路线错误，那应该承认嘛，检讨自己嘛。那么林彪一点份没有吗？就那么正确吗？现在把他《论短促突击》印出来给大家看，他那篇文章最后一段是支持李德的，这也是关键性的文件了。长征的时候，在遵义会议上，他并没有发言。遵义会议以后，他不断地反对主席。给他的命令，他就反抗回去，不执行。到会理会议就更厉害了。军事科学院编写的那个军事文件上，对会理会议这部分，语言不详细，只有一两句。会理会议，他反对毛主席，要毛主席、朱总司令和我都下野，他推彭德怀挂帅。这一段，文件上没说几句。剑英同志，恐怕那要请你补充几句。主席现在在看，他对这个有兴趣，我们还可以补充几句。因为那一段会理会议只有几行，这是大事情。这个事情，荣臻同志也清楚。红军不少干部知道会理会议这个事情，但是不晓得内容。（聂荣臻同志：没有传达。）没有传达，照顾了当时那个困难的环境，应该这样子。他到张国焘那里，他也动摇；到陕北，他两次写信给主席要到陕南打游击；东渡黄河，他也动摇。大相寺会议，批一军团的本位主义，批判了聂荣臻同志，他也有份嘛，他一句话不吭。一直到抗日战争的平型关战斗等等。他后期在苏联，回来崇拜国民党。现在还查出来，他就在莫斯科的时候，大概是共产国际动员他写了一篇文章，大捧蒋介石、陈诚，还把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的话引了一段，但是只字没提毛主席。这是在一九四〇年七月写的，我们都回来了，我们是三，四月回来的。就是说，他的一些文章不亚于王明。他回来以后，解放战争，主席昨天说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他大概觉得他占了一个半。今天剑英同志说，恐怕他不止只认为一个半，是两个。因为主席说，辽沈战役是他指挥的了，平津战役有晋察冀；有华北的部队了，他算一半吧，所以一个半。实际上这一个半战役，主席说，最麻烦就是他了，不断地跟他商量，不同意又改，改了还不同意。总是主席的命令下去，三番五次地商量他才同意，有时硬不执行，几乎让东北的敌人跑掉，几乎让平津的敌人跑掉一部分。这个大家看文件就晓得。所以这本东西主席要去看，看了以后我们再印。

参阅文件之二就是在学习批林整风的一些文件时，在京的中央委员的一些老同志，有九位同志写了书面意见，我们也把它印出来了。老同志中有朱德同志、陈毅同志、富春同志，聂荣臻同志、还有曾山同志、邓子恢同志（邓子恢同志现在

病着，请假）等一共九篇。此外，还有一些老同志，如果还有揭发材料，我们还可以续印。

参阅文件之三，就是李力群同志对林彪罪行的揭发。……

参阅文件之四，就是刚说的《论短促突击》这篇全文找到了。这个事情也说明，尽管林彪死党那么精，到处都控制，就在军事博物馆的军事文献里，就有林彪的《论短促突击》。我看军博的那个管事的人大概也没去看，被我们耿飚同志派人去发现了，抄给我，是全文。军博已经被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控制了嘛，他应该去过过目嘛，他也顾不了这么多。所以，做坏事的人，心测不轨的人，怎么掩盖也掩盖不了的。国家这么大，能盖得住？现在就证明了，就从军事博物馆抄来的，是吧，耿飚同志，没错吧？（耿飚同志：没错。）他最后一段就是引用华夫的文章。华夫是谁呢？就是四中全会“左”倾机会主义王明路线统治的时期，当时，共产国际派来一个军事顾问，这个人是个德国人，中国名字叫李德。这个人的军事思想完全是不对头的，德国资产阶级的克劳塞维茨军事思想，也不是那样的，他就是拼了，分兵把口。那个时期有个杂志，叫《革命与战争》，林彪写了一篇文章登在那个杂志上，他特别称赞支持李德的观点。所以，他也有份的。彭德怀有份。当时李德很欣赏第三军团的两个头子，先欣赏彭德怀，后欣赏林彪，这不是偶然的。当然了，我们当时也是犯错误的了。林彪也不是正确的，他同样也是犯错误。你犯错误就得承认，这个事，他从来没有自我批评过。

参阅文件之五，是中央联络部搞的，就是中苏关系里头有十一个问题，它不是编年的，是按问题的性质分的。这个文件里头是讲些事实了，说明中苏关系是怎么造成的，都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搞我们的了，从海军基地、两国联合舰队这些引起的了。也作参阅文件。

今天政治局讨论，打算在会议文件里加一个之六。就是在二年半之中，前年九届二中全会到去年批陈整风，吴法宪、叶群先作了检讨，这个检讨都是前年写的，吴法宪检讨是九月二十九，叶群检讨是十月十二，这个检讨当然不深刻，但是先给主席看了，主席批得很尖锐。这两个批件很值得学习。所以，我们打算把他们这两个检讨印出来，印小一点，把主席批示印大一点，使大家可以学习。主席是批得很尖锐，但是总是教育他们，希望他们改。

然后就是去年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的时候，黄、吴、叶、李、邱五大将的检讨了，

那个检讨他们都是对了口径的。我们有时候帮他改，说那些东西应该说的更深刻一点，因为他给我们看过嘛。主席还是启发他们，先得到的是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的；主席还提议帮他们加一段，说，你们如果同意，你们把这段加进去。后来就是吴法宪、叶群的，主席也批了，这些在批陈整风会议上是发给大家的，我们这回打算跟前面两个批件摆在一起也把它再印出来。他们的检讨现在看许多是假话了，但是主席根据他们的书面的话，还是尖锐的批了，还寄予希望，要他们改的，我们可以对照来学。我们今天商量这作为文件之六，大概这个报告主席，主席会同意的，因为这样更有利嘛。

从前年庐山会议起，到去年“九·一三”，把这一段主席的这些文件汇集起来，这样就更看得完全一些了。所以我们这样学习就会更深入。这一次是我们党内第十次的路线斗争，也是最尖锐、最严重、最复杂的一次阶级斗争。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一日，中央批准外交部《关于调整党的核心小组的请示报告》的通知（概要）

1972. 05. 21；中发 [72]21号

1972年5月初，周恩来审阅外交部核心小组关于任命仲曦东等七人为外交部副部长、部长助理的请示报告，并报送毛泽东审定。在附信中说：“外交部副部长现只两人(乔、韩)，自从外交战线展开以来，实在忙不过来。几次同外交部核心小组商讨，认为非增加副部长和部长助理，才能把党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贯彻执行下去。同时还要从中青年干部中提一些人担负司局长职务，才能分担任务，培养和锻炼出更多的外交战线上的干部。”5月11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批准外交部的报告。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各小组召集人会议。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江青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的讲话

江青同志于五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华东组和中南组会议上，与华东组、中南组的同志一起学习《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并

作了三次发言。现将江青同志的这三次发言，综合整理如下：

毛主席的这封信，我有这样的看法，和同志们交换意见，共同学习。只是我个人的领会，不一定那么深，不一定那么准确。

一九六六年，中央在杭州开四月会议，当时我在上海，不知道会议情况。五月初，中央在北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我还在上海，也不知道会议情况。一九六六年七月，我收到了主席给我的信，当我读到：“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我当时虽然不知道主席指的是谁，但是我感觉到事关重大；心情沉重。当时和现在，我始终认为，这封信不是写给我一个人的，是写给全党、全国人民的。信中讲了世界革命问题，所以，也是写给全世界人民的。不过在当时，主席不好写给别人，只能写给象我这样的人。

听说主席写了这封信后，要秘书抄了一个抄件，并在抄件上做了亲笔修改。在主席那里（即白云黄鹤之处）首先看到这封信的抄件的，是总理、王任重。总理看了这封信后，提出他去大连说服林彪改正。主席同意。总理劝告林彪不要再作那种提法，据说当时林彪表面上是答应了。因此，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中央专门发了一个通知。现在事实证明，他实际上是耍了两面派。最近查了一下过去的批件，主席把林彪这个讲话，一直压到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几号才批发。

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十五年后才发表。毛主席的这封信，在六年后同志们就看到了。我们现在能看到这封信，是很幸福的，因为我们的毛主席健在，我们的党非常好，是团结的。

毛主席的著作，我没有全部读完，而且读的不好，时常是读一次领会一点。主席写的这封信共两千字左右，我觉得是我读过的短篇中很少见的重要著作。信的文字结构严谨，一气呵成，非常幽默，很有层次，通篇是说理，绝无剑拔弩张之处。这封信使人越读越有味道，越读越感到意义深远，涉及中国、外国、政治、历史、哲学，高度概括了国内外阶级斗争必然的发展规律，总结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宝贵经验，贯串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宝库里的光辉文献，对于指导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直至建设共产主义，都有着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对于社会主义，我们经过实践是比较清楚的。我坐在飞机上看到社会主义祖国的锦绣山河，心情是非常激动的。但是，对于共产主义，我没有看到。不过，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到了共产主义，还存在着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的矛盾。所以说，这封信的根本思想，对共产主义也还是适用的。

从林彪叛党叛国以后揭发的大量事实来看，林彪是历来反对毛主席的。我们这儿的老同志们是否知道林彪的底细呢？我就不知道。可能有的老同志知道，但顾全大局，不说。毛主席是深知其人的，但是在同志们面前，在我面前，从来没有讲过。毛主席背后很少说人家的坏话，总是说人家的功劳。我是在同林彪的接触中，并同他进行斗争中，逐步地了解林彪并非一贯正确，更不是象黄永胜、李作鹏他们“颂扬”的那个样子。这几年来，他采取种种阴险毒辣的手段，想把我干掉，更加深了我对林彪这伙的认识。毛主席在写这封信时，已经看出林彪不讲马列主义，不讲阶级，不讲党的领导，不讲人民群众，专讲个人，讲宫廷政变，看出了林彪在思想上、理论上不是一个马列主义者。这是肯定的。但是，如果说，主席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已经看穿了林彪搞的全部阴谋诡计，那怎么解释“九大”呢？直到林彪叛党叛国之前，主席和你们谈话时，还是要保林嘛，这怎么解释呢？毛主席对他一直是采取了团结、教育、保护的方针，真是做到了仁至义尽，这说明毛主席具有无产阶级政治家的伟大气魄。林彪干坏事，有一个暴露的过程，我们对他也会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对这个问题，我们要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主席是很尊重历史的。《我的一点意见》原件上有：找到林彪的几条，如获至宝。原件上陈伯达的名字后面也没有“同志”两个字。原件是我们回到北京后，我向主席做了请求，主席批准之后，才看到的。林彪叛党叛国事件发生后，中央印发这个文件时，我们想恢复原件那样子，主席不同意，说这是历史，不要再恢复原件了。

林彪把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奉为钟馗，名义是打鬼，实际是为着实现他的个人野心。毛主席的信中说：“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这段话，我个人现在看，是活龙活现地揭露了林彪的反动面目。林贼从当抗大校长到当国防部长，拉山头，结死党，“打着 B——52 旗号，打击 D——52 力量”，这不是同蒋介石如出一辙吗？

在国际上，苏联的党变修了。这同南斯拉夫不一样，因为苏联是个大国，是列宁

的故乡。它的变修，影响是大的。现在“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要知道苏修是怎么整我们的，可以看会议发的参阅文件之五。

毛主席虽然看到了国际国内这些阴暗面，但对革命的前途，充满着革命胜利的信心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有人问，虎气和猴气怎么理解？我是这样理解，虎气和猴气是对立的统一，主席讲虎气为主，这就是说不能搞折衷主义。

毛主席解剖了自己，也解剖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毛主席说：“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不到六年，林贼一伙就自己跳出来。现在全国人民更紧密地团结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同林彪反党集团进行着斗争。斗争并不是就此完结了，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七、八年横扫一次牛鬼蛇神，以后还要搞好多次。我们决不能搞阶级斗争熄灭论。

国内外阶级敌人，企图通过混在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但是，他们的阴谋是决不会得逞的。毛主席说：“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政变，迅速地被粉碎了，这一事实，证明主席这段话是多么英明的预见啊！我们要很好学习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要有反潮流的大无畏精神，决不能让修正主义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

这次学习有点象延安整风，延安整风是最大的学习。我在延安整风学习的过程中，不仅学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更重要的是开始学到了认识自己的困难性和重要性。主席不知给我说了多少次，要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我自己并不比同志们高明多少，主要是有毛主席这样的严师，不然尾巴也可能翘到天上去了。如“天才”、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在庐山会议上，我能坚持原则，是因为主席讲过多次，我对主席的指示是坚信不疑。因为我和主席共同生活，一起工作，已经几十年了，看到主席是说了就算数的。我们对毛主席的指示，要坚信不疑，要坚决贯彻执行。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周恩来参加东北组讨论。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毛泽东约见周恩来。

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

周恩来：要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根据毛主席去年巡视南方谈话中着重提到的中共党内十次路线斗争的问题，讲一点个人认识和我个人在历史上所犯的路线错误。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各组如今人会议。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九日至六月七日，周恩来起草将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的《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报告提纲。

一九七二年五月三十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

我现在正写一个讲话要点，写后将先送主席审查，并请约我一谈，好当面请示。

一九七二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对反映白坚情况摘报的批语

送总理阅处。

白坚在我的印象里不错，应为他做出政治结论。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日，毛泽东约见周恩来。

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

一九七二年六月四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各组学习讨论会议文件的情况汇报。

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报告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情况及浙江、新疆等地问题。

一九七二年六月五日，中央印发林彪一九四零年七月在苏联发表的一篇反党文章
1972.06.05；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参阅文件之六

中国人民的三年民族解放战争 林彪

一九七二年六月七日，周恩来将所写的《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提纲送毛泽东审阅。并附信说：两次在主席处听到片言支语关于路线的教训，我更急于要写出初稿。

毛泽东圈阅了提纲和附信。

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会后，周恩来去毛泽东处。

一九七二年六月九日，周恩来修改、补充《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提纲，形成二稿。

一九七二年六月十日，周恩来将提纲稿送中央政治局成员阅。

一九七二年六月十日至十二日，周恩来连用三个晚上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的报告。

报告依次就大革命时期的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瞿秋白盲动主义、李立三冒险主义、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以及抗日战争时期的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历史过程、错误危害等详加论述和说明。

在谈到王明右倾错误问题时，结合个人亲身经历，对自己作了严厉的剖析、检讨。并表示：我入党五十年，没有离开党的队伍。经过长期的复杂而又激烈的党内外、国内外的阶级斗争和革命战争的考验，我还在为党工作，继续坚持对敌斗争；年老了，也还有些革命朝气。这几年我党说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但做起来也并不容易。我平常爱读鲁迅和毛主席的各两句名诗以自勉：“横眉准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

王。”现在凡是在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活动中沾了边甚至陷得深的同志，都应该得到启发，不应该有任何顾虑。要彻底交待，认真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三日，陈云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小组会上发言。

陈云就所谓“伍豪问题”说：我当时在上海临时中央，知道这件事的是康生同志和我。对这样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共产党员要负责任，，需要向全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负责的态度，讲清楚。这件事完全是国民党的阴谋。

同日，陈云又写了书面发言：“我现再书面说明，这件事我完全记得，这是国民党的阴谋。”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在最后一次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的全体会议上，作《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的报告。

周恩来对一九三二年国民党特务伪造“伍豪词的情况作了说明。

还讲述了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就此事专门写给毛泽东的报告，公布了毛泽东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为此写的批示。并在会上公布：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会后将把报告录录音记录稿以及其他有关文献资料存入中央档案，并发给各省市存档。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对贺诚来信的批语

贺诚同志来信请中央处理。我意应给予工作。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共浙江省四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关于南萍，熊应堂问题的总结提纲

1972. 06. 28；省委 [1972] 9号

（二）南萍、熊应堂的主要错误和罪行

会议揭发和初步查证的大量事实证明，南、熊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不仅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而且积极投靠林彪反党集团，参与了他们的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又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浙江的黑后台，对党和人民犯下了严

重的罪行。

第一，在“九大”期间，南萍伙同陈励耘，按照林贼黑司令部的旨意，有计划地进行了一系列反党阴谋活动。

“九大”前，在中央解决浙江问题的一月会议期间，南、熊就同黄永胜、吴法宪秘密勾结，黄、吴背着中央向他们作了黑指示，进行反党分裂活动。

“九大”开幕前，南萍就在我省“九大”代表中灌输分裂主义思想。会议开始后，他们利用各种机会，散布流言蜚语，攻击某些中央领导同志。四月十二日，南萍抓住许世友同志在毛主席接见部分同志时的一句插话，恶意歪曲，攻击许世友同志的话“是放毒，要批判”，要每个代表表态。大会进入酝酿候选人时，南萍竭力污蔑、诽谤中央某些老同志，煽动代表反对这些老同志为候选人。毛主席指示要把这些老同志选进中央委员会，南萍却根据林贼黑司令部的旨意，规定对这些老同志“得票只能半数多一点”，并在浙江代表中具体布置谁投反对票，谁投赞成票。在华东大组进行预选时，有人对叶群投了反对票，南萍，陈励耘暴跳如雷，盗用浙江小组名义，向中央写信，说什么“这个问题发生在我们华东地区不是偶然现象，这反映了有反对毛主席、林×××的暗流”，“尽管我们通过了党章，但举起来的手中有一两只是假的，黑的，这一两只黑手是隐藏在党内的定时炸弹”，并借此大肆煽动代表反对南京军区。“九大”以后，南、熊利用传达“九大”精神的机会，继续恶毒攻击某些中央领导同志是“老右”、“老机”，破坏“九大”团结、胜利路线，大搞分裂活动。

第二，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南萍积极参与了林彪反党集团发动的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准备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猖狂向党进攻。

关于不设国家主席和毛主席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问题，毛主席作过多次明确的指示，南萍是很清楚的。但是，他对毛主席的指示根本不听，却完全按照林贼的旨意，坚持设国家主席的反党纲领，为林贼抢班夺权大卖力气。

早在二中全会前夕，江腾蛟就叫陈励耘“做南萍的工作”，要在二中全会上坚持设国家主席。八月十一日，黄永胜跟周总理陪外宾来杭时，背着总理，深夜找南萍和陈励耘密谈，说设国家主席是“群众的愿望”，向他们交了“底”。八月二十三日，林贼抛出了他的反党动员令，南萍和陈励耘都说这是“有所指”的。同时，他们和王维国两次秘密开会，进行阴谋活动。二十四日，江青同志在华东大组会

上对不设国家主席问题又一次作了明确解释，并当面批评了陈励耘。但是，二十五日华北组的反革命简报一出笼，南萍就同陈励耘密商赶写反党发言稿。陈励耘根据吴法宪的黑指示，进一步向他交“底”说：“国家总得有个主席，毛主席不当，还有接班人嘛！”南萍心领神会：“只要设了国家主席，毛主席不当，肯定是林彪当，林当了，于自己有利。”所以，在这天下午的大组会上，当王维国、陈励耘等人狂叫要设国家主席，疯狂向党进攻时，南萍当即表示陈励耘的发言“是代表浙江小组的”，紧接着抛出了自己的反党发言。直到毛主席戳穿了林贼的阴谋后，八月二十六日，他们还盗用浙江小组名义，由陈励耘口述，南萍执笔，再次写信向中央“表态”，顽固坚持要设国家主席，说这“是完全表达浙江全体军民的感情和心愿”的，继续向党进攻。

第三，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南萍、熊应堂积极参与了林贼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阴谋活动。

(1) 加紧推行对林贼“人家不宣传，我们宣传”的黑方针，大造反革命舆论，狂热吹捧林贼。

南、熊多次鼓吹要突出宣传“接班人”的问题。早在一九七〇年六月八日，南萍在各地区和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上就布置“要深入宣传接班人”，说：“现在是不是人家都那么服气了？不见得，所以我们要突出宣传这个问题。”九届二中全会前后，熊应堂也胡说什么对林贼的“宣传少了”，“党章上规定了，不一定都拥护”。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南萍违背中央规定，私自复写和带回了林贼的“八·二三”反党讲话，在省核心小组和驻杭部队军党委常委的会议上全文传达。九月十一日，南萍和陈励耘盗用省核心小组的名义向中央报告，说什么听了林贼的讲话，“心情异常兴奋”，“表示热烈拥护”。以后南萍还把这个讲话成段地塞进省党代大会工作报告和一些会议的讲话中。直到一九七一年五月二日，南萍在向省委常委传达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精神时，继续鼓吹林贼的讲话“很重要”，“林×××讲的三个副词还是完全对的”，顽固坚持林贼的反党纲领。

南、熊伙同陈励耘利用一九七一年一月省党代大会，进行了大造反革命舆论的全面部署。从工作报告到会场布置，都是他们精心策划的。会场门口挂的林贼和毛主席并立的巨幅画像，是南萍亲自选定的。南萍在会议上的报告，是他亲自交待按照吴法宪、李作鹏在空、海军“积代会”上报告的调子起草，并逐稿审阅，反

复修改的。省党代大会后，南、熊利用会议、文件、报刊、书籍、广播、戏剧，展览等各种形式，吹捧林贼达到了高潮，直到一九七一年十月一日，《浙江日报》还公然刊登了林贼的画像。

(2) 南萍，熊应堂同林贼死党黄永胜、吴法宪、江腾蛟、周赤萍、王维国、于新野等早有勾结，随着林贼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的加紧实施，他们之间的接触日益频繁，勾结更加紧密。

近几年来，南，熊到上海，总是住空四军巨鹿路招待所（南住过八次，熊住过六次），大搞政治交易。一九七〇年六月十七日，王维国在宴请南萍夫妇和林贼死党 xxx 等人时说：“我们是一个观点，一家人。”南萍说：“我们是一家人。”时过不久，王维国带口信给南萍说：“要注意身体，不要人家打不倒自倒，人家没夺权就让权了。”一九七〇年国庆节，王维国夫妇为鲁珉一家、熊应堂一家举行“家宴”。鲁珉老婆敬酒时说，“为林 xxx 找到了好的接班人干杯。”熊应堂同她碰杯，互相吹捧。同年十二月十二日，林立果来杭以前，陈励耘给南萍写了一封亲笔信，“一切正在准备中，据说需亲开嘎斯—69，我这里没有这种新车，请速从省战备车中调拨一辆。”南萍在信上批示：“速予调拨。”同年七月，陈励耘还把林贼送给他的芒果转送南、熊，“分享幸福”。

特别是当林贼炮制反革命政变纲领《“571 工程”纪要》，加紧实施武装政变的时候，南、熊同林贼的一些死党分子打得更加火热，出现了许多异常现象。一九七一年二月南萍到北京开会时，特地找江腾蛟密谈数小时。三月，周赤萍以“养病”为名来杭，南、熊热情接待，周还送了三本吹捧林贼的黑书给南萍。七月中旬，南萍到上海，王维国派×××、×××等到上海郊外十多里处迎候。七月三十一日，王维国等同南萍在空四军指挥员值班室密谈两小时，然后大加宴请。宴会上，王维国对南萍说：“记得你过去说过一句很好的话，不管出现什么风浪，我们要战斗在一起，团结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南萍说：“向空四军学习。”在此前后，南、熊频繁活动，从七月六日到八月七日，他们亲自指名，分别召开了多次很不正常的会议，分析形势，布置任务。南萍说，“现在出现一股风，要注意，要顶住。部队要稳定，机关要稳定。大家要承担很重的担子，遇到困难不要后退，越是困难越要去斗争，遇到困难要看到胜利。”熊应堂说：“我们现在都在经受考验，经受复杂斗争的考验，准备迎接困难”。这同林贼死党的黑话“要准备迎接重大

的政治风暴”，如出一辙。

(3) 在军事上，有许多行动是同林贼的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相一致的。

南萍过去很少过问军事工作，但一九七一年八月初从王维国处回来后，却突然察看了省军区基本指挥所坑道和二十军指挥所坑道。

一九七〇年二月，熊应堂和陈励耘密谋后，把省军区基本指挥所变成“合成指挥所”，把封闭的坑道三、四口扩大幅员，作为空五军指挥所。接着，周建平来杭，进行了具体勘察，并提出要在指挥所附近修建一个直升飞机场。吴法宪专为此事向南、熊表示“感谢”。这一工程南京军区和总参均不同意，而熊应堂却欺骗南京军区，调动两个营的兵力，强令加速施工，限期于一九七一年八月底完工，但林贼自我爆炸后，南、熊却撒手不管了。南、熊和陈励耘为林贼修建的“704工程”，设有作战室、地堡和直升飞机场，是林贼搞反革命政变的指挥所。现已查明，这个工程完全是按照林贼黑司令部的旨意，由南、熊和陈励耘三人共同策划的。他们一起看了地形，审阅了图纸和模型，批了建设经费。南萍在布置这个工程设计任务时说：完成这个工程“是个政治任务”，“是对世界人民作出贡献”，“房子本身就是战备工程”，“工程本身就是为了打仗”，“要保一辈子密”。一九七一年三、四月，他们两次开会，限定八月底完工。

《“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提出：“四、五军部队训练（地面训练）”。南、熊积极配合，派人为空五军进行捕俘、格斗、步兵战术、步兵打坦克骨干训练。

一九七一年九月六日，周建平以研究浙东南空军协同作战为名，窜到杭州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南、熊与周建平多次接触。在协同会议上，周建平提出“浙江陆、海、空三军要归南政委、熊司令统一指挥”，南萍提出要建立“联合指挥部”，熊应堂还叫省军区、二十军向周建平汇报了作战方案。他们决定把“联合指挥部”放在省军区前指。这是林彪反党集团妄图控制驻浙陆、海、空三军，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一个大阴谋。

一九七〇年，南、熊根据林贼“六大块四小块”的黑指示，擅自将中央定的建设多年的××小三线向××转移。同时他们与陈励耘密谋把二十军、空五军、省革委会的后方基地放在××山区，与空四军后方基地紧靠一起。

(4) “九·一三”前夕，南萍、熊应堂的一些活动，有参与林贼妄图谋害毛主席

罪恶阴谋的重大嫌疑。

早在一九七〇年，南、熊和陈励耘密谋策划，由南、熊具名写报告，经黄永胜、吴法宪批准，将警卫大权交给了陈励耘，使××处成了他们进行阴谋活动的重要据点。

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九七一年九月初来杭，×日中午中央直接通知了南萍，但南萍延至下午五时许才布置警卫，致使许多地方的警卫人员不能及时到达岗位。特别严重的是，南、熊明知陈励耘在庐山会议上参与了林彪反党集团的政变阴谋活动，中央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点了他的名，但仍把主席的警卫工作交给陈励耘控制。九月×日下午，于新野窜到杭州向陈励耘下达了林贼谋害毛主席的黑手令。当晚，南、熊同陈励耘三人借机在××室密谈了一个多小时。

九日下午，南、熊一反常例，提前于一时开省常委会，到三时一刻结束，会后不带秘书，不告诉任何人，也不坐自己的车子，匆忙而去，形迹可疑。南萍在检查中谎称是向×××同志汇报警卫工作，但据揭发，南、熊是和陈励耘一起在××处进行长时间密谈。十一日上午，他们三人又进行了一次密谈，至今拒不交代。毛主席离杭时，明确告诉南、熊和陈励耘不要去送，但陈励耘坚持要送，南、熊不加制止。据几方面揭发，陈励耘是带着两支手枪去“迎”“送”主席的。这一严重问题，正在进一步审查。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三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通过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期间征求过意见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和《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

通过中共中央转发这两份材料的通知。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日，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传达和讨论《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的通知及材料

1972. 07. 02；中发 [1972] 24号

毛主席批示：照发

中共中央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

现将《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即中央专案组选印的《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罪证》，发给你们，请你们按照中发〔1972〕3号文件的精神，立即组织传达、阅读和讨论。

各地在传达讨论“材料之三”时，要以《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为武器，深入进行批林整风运动，进一步揭发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展开对林彪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

各地在向群众传达有关第十次路线斗争的毛主席重要讲话、批示和中央文件时，采取了总结试点经验，开办学习班，重点培养骨干，然后向群众普遍展开传达宣讲的办法。这些办法是行之有效的。“材料之三”的传达方法，各地可以按照自己的经验，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进行。关于向群众传达的中央文件的蒙、藏、维、哈、朝少数民族文字的翻译问题，由民族出版机构负责解决。

一九七二年七月，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罪证

目 录

前 言

第一部份 林彪反党集团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罪证

一、林彪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动员令和他提出的反党纲领

1. 林彪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反党讲话录音记录稿
2. 林彪提出“设国家主席”的反党纲领和他妄图实现这个反党纲领进行的阴谋活动

二、林彪反党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向党发动的猖狂进攻

1. 陈伯达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华北组制造的五大谎言
2. 叶群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中南组煽风点火
3. 吴法宪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西南组散布的谎言
4. 李作鹏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中南组散布的谎言
5. 邱会作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西北组散布的谎言

6. 黄永胜炮制向党进攻的发言稿的罪行

三、林彪反党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的地下阴谋活动

1. 李作鹏一九七零年八月二十四日晚给叶群的亲笔信
2. 叶群私自收回的她在中南组的发言记录和叶群、黄永胜炮制的假证明
3. 陈伯达给林彪出谋献策的电话记录稿
4. 林立果亲笔写的与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的密谈要点
5. 吴法宪的亲笔交代
6. 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林立果在庐山一次密谋后的合影
7. 林彪反党集团在庐山发动的反革命政变失败后，在九江机场飞机上的合影

第二部份 林彪反党集团准备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罪证

一、林彪擅自发布的所谓“第一个号令”

二、林彪、黄、吴、叶、李、邱的结盟反党活动

三、林彪给周宇驰、刘沛丰的亲笔信

四、吴法宪对林立果、周宇驰等人的任职命令

五、林彪的反动词《重上井冈山》及其谱曲

六、林彪、叶群耍反革命两面派的一个记录

七、林彪打着“备战”的幌子，为篡党夺权进行的“七·二三视察”

八、林彪反党集团为发动反革命政变编造的陷害中央政治局同志的黑“材料”和收集的情报

九、林彪、叶群为研究反革命政变伎俩搜集的资料

十、周宇驰在林彪操纵的反革命别动队小“联合舰队”一次会上的发言记录（节录）

十一、“上海小组”的《入组须知》原稿

十二、反革命别动队小“联合舰队”的特务情报活动

十三、林立果在上海秘密召开的所谓“三国四方会议”

十四、于新野关于“准备加快、提前”实行“571”反革命政变计划的记载（节录）

十五、周赤萍对林彪的吹捧

十六、林彪反党集团为篡党夺权制造的反革命舆论

- 十七、反革命别动队小“联合舰队”的一次黑会的记录原件（节录）
 - 十八、林彪死党林立果等建立的反革命秘密据点
 - 十九、从秘密据点缴获的林彪反党集团进行反革命政变活动的大批器材
 - 二十、周宇驰秘密进行驾驶直升飞机的飞行训练
 - 二十一、林立果秘密进行驾驶水路两用汽车的训练
- 第三部份 林彪反党集团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另立中央，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和失败后叛国投敌的罪证
- 一、林彪反革命政变手令
 - 二、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
 - 三、王飞的亲笔供词
 - 四、在林彪反党集团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前夕，叶、黄、吴、李、邱进行频繁的电话联系
 - 五、叶群亲笔写的几个反革命政变骨干分子的代号
 - 六、黄、吴、李、邱等人向林彪、叶群报送的情报
 - 七、程洪珍关于林彪反党集团谋害毛主席、中央政治局同志的阴谋活动的记载
 - 八、林彪反党集团为谋害毛主席准备使用的伊尔—10强击机
 - 九、鲁珉的亲笔供词
 - 十、江腾蛟的亲笔供词
 - 十一、林彪反党集团为谋害中央政治局同志秘密描绘的钓鱼台地形图
 - 十二、王飞的亲笔供词
 - 十三、王飞等七人黑会拟定的随林彪、黄、吴、叶、李、邱南逃广州人员名单
 - 十四、刘世英的亲笔供词
 - 十五、林彪等南逃广州准备乘坐的飞机起飞时间表
 - 十六、李伟信关于南逃广州飞机途经上海给王维国的电话通知
 - 十七、胡萍的亲笔供词
 - 十八、李作鹏窜改中央命令的阴谋和山海关机场值班记录、值班员的说明
 - 十九、林彪、叶群仓惶逃命时丢下的准备带走的我党我军大批绝密文件
 - 二十、林彪、叶群等仓惶逃命、叛国投敌时的狼狈相
 - 二十一、林彪、叶群等仓惶逃命目击记

二十二、林彪、叶群所乘256号三叉戟飞机仓惶起飞时碰坏的加油车顶部和飞机右翼碰下的碎片

二十三、林彪、叶群等叛国投敌所乘三叉戟飞机坠毁的现场

二十四、周宇驰等所乘外逃被我迫降的直升飞机

二十五、从被我迫降的直升飞机上缴获的林彪叛党叛国罪证的一部份

二十六、李伟信的亲笔供词

一九七二年七月五日，周恩来在上海接见上海市委常委。

周恩来说：出了林彪事件，出了这么一个结局，谁也没有料到，谁也无法导演。林彪之死，真是天造地合。这是必然性的结果，偶然性地出现。

当前的主要工作，有两件事：一是专案审查，这么多人，要清查一下，排个队，要给他们政治生活、学习，不要搞政治隔绝；二是“三支两军”，军代表、军宣队问题，要肯定基本成绩，但也有许多地方风气搞坏了，要改。

一九七二年七月七日，毛泽东对廖汉生家属来信的批语

送总理阅处。

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未经中央讨论，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此件你阅后请交剑英、德生一阅。

一九七二年七月九日，中共中央批准公安部“关于公安系统落实干部政策情况和意见的报告

1972年7月9日，公安部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公安系统落实干部政策情况和意见的报告》。这个报告是在周恩来指示下起草的。

《报告》建议对应解放的干部抓紧工作，及时解放，原则上都应在公安部门分配适当工作。公安部机关军管已经完成了历史任务，应当予以撤销。

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并转发各地党委督促贯彻执行。

到1973年，全国公安机关陆续解放了一批领导干部，调回了一大批业务骨干。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复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

中共新疆军区党委电：

电话会议，除传达毛主席、党中央七一六批示和中央关于调整两个党委领导班子外，不要作过多解释，免生枝节。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转北京军区等单位关于对部队进行政策纪律教育的报告

一九七二年八月，美国纽约州宾翰顿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罗克珊·维特克来华访问。

周恩来告诉江青：如果不愿见，也可不见。

江青与维在北京、上海谈了几次，又准备在广州继续谈。

周恩来得知后派人告诉江青：只谈一次，最多两次只谈文艺，不谈其他。

一九七二年八月，周恩来提议将朱穆之从五七干校调回，并经毛泽东同意，安排朱参加新华社领导班子。

一九七二年八月九日，中共中央批转“四川省委、成都军区党委扩大会议总结提纲”

一九七二年八月九日，周恩来、张春桥、纪登奎、李德生听取四川省和成都军区负责人刘兴元、李大章等工作汇报。

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一日，毛泽东在林枫家属来信摘要上的批语连原信一起，请汪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意放他出来治病。林枫问题过去没有弄清楚，有些证据不足，办案人员似有一些逼供信。

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商谈四川问题。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1972年8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通知》后附有《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通知》说，三支两军必须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在一个地区，应当由当地最高一级的地方党委，对党政军民各个方面实行一元化领导。省军区、军分区、县人民武装部3级军事机构，除了保持军事系统的垂直领导和隶属关系外，同时是地方党委的军事工作部，受同级地方党委领导。驻各地的野战军，除了接受军事系统的垂直领导外，在与地方有关的各项工作上，也必须接受所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凡是实行军管的地方和单位，在党委建立后，军管即可撤销”。军管人员除少数需要留下担任地方工作的以外，其余调回部队。少数有某种特殊需要的地方和单位，对外可保留军管名义，对内不再行使职权。“已经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军宣队应即撤回部队”。“地方各级党委建立后，各级支左领导机构……及其办事机构应即撤销”。以后属于部队支援地方的各项工作，由部队政治机关负责；调整地方党委成员，更多地挑选一些熟悉全面工作的比较有经验的地方干部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继续留在地方工作的军队干部，除主管省军区、军分区、县人民武装部工作的军政主要负责干部外，原则上不再兼任军职。文件发出后，自1967年1月派出的军队三支两军人员陆续撤回部队。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六日，周恩来、纪登奎、李德生等约林彪之女林立衡及其未婚夫张清林谈话，于他们分别参加空军报社、总后卫生部学习党的关系和工作分配均由总政管理。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商讨贵州问题。

一九七二年九月，毛泽东对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如何开展批林整风的意见海军的会议，纠缠着历史问题。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在历史的旧账上纠缠，容易

走偏方向。

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二日，蓝亦农等呈中央和毛主席的信
主席、中央：

我们贵州十三个同志于九月三日来京，在春桥、登奎，德生，洪文、周兴同志帮助教育下，对我省地、师级干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进行了总结，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现将会议总结提纲（修改稿）送上，请审批。

蓝亦农 张荣森 贾庭三 李立

石新安 马扶增 张琦 李庭桂

陈行庚 张心田 薛光 吴荣正

吴向必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二日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二日，贵州省地、师级干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总结提纲（修改稿）

在我党第十次路线斗争的重要关头，蓝亦农、张荣森同志都是站在林彪反党集团一边，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蓝亦农同志的错误更严重。

一、蓝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积极配合林彪一伙向党进攻，为他们发动反革命政变效劳。在庐山上，他同林彪死党邱会作、李作鹏和上了贼船的梁兴初、谢家祥等同志，背着党中央，进行秘密串连。他提出在宪法上加上“三个副词”，坚持要设国家主席。吴法宪在西南组一煽动，他跟着起哄，提出要“揪人”。会议期间，韦祖珍向他“交底”，造谣说反对毛主席的就是中央某负责同志。

二、蓝、张极力转移批陈大方向，大肆吹捧林彪。九届二中全会后，蓝、张不认真传达贯彻毛主席关于批陈整风的一系列指示，批陈不痛不痒，反而为林彪及其死党涂脂抹粉。蓝亦农同志说，“黄永胜前段没上庐山，他的检查是为了给其他同志承担责任。”“吴法宪解决贵州问题作了一些工作，有功。”他们不抓批陈，用反资产阶级派性、反无政府主义、整顿军队、整顿机关为借口，转移批陈整风的大方向。他们擅自提出在全省开展“让毛主席满意，让林副主席放心”的群众

运动。九届二中全会后，蓝、张同林彪死党提出的“人家不宣传我们宣传”的反革命口号相呼应，更加起劲地吹捧林彪，调子越来越高。他们在遵义为林彪修纪念馆，并组织参观；利用遵义会议解说词，篡改历史，宣扬林彪。蓝从庐山上私自抄回了林彪的反党讲话。张从广州抄回了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期间又从梁兴初那里抄回了林彪在庐山上的反党讲话。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广为传播。蓝在去年八月省积代会的报告中，大肆贩卖林彪是“三大助手”中最光辉的助手的谬论，要“保卫接班人”，胡说什么这“是对一小撮阶级敌人的迎头痛击”。蓝、张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后，还在贵州私自印发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反党讲话，并大量印发《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学习资料》、《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和周赤萍吹捧林彪的小册子，为林彪反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

三、“九一三”事件后，蓝、张不但不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不向毛主席、党中央检查交代自己的问题，而且封锁中央。他们多次表白自己，谎称同黄、吴、李、邱没有打过一次电话，没有写过一封信，没有任何不正常的往来。并以各种借口，采取各种手段，压制干部和群众对林彪反党集团和他们自己的揭发，大捂盖子，千方百计转移斗争大方向。蓝、张还对抗毛主席关于云贵部队由周兴、王必成同志统一指挥的命令，擅自调动部队。

四、蓝、张同林彪死党和梁兴初等上了贼船的人拉山头，搞宗派。九届二中全会后，蓝同黄永胜、邱会作、黄志勇以及梁兴初、谢家祥、韦统泰等来往频繁，极不正常。他同梁、谢、韦等从一九七〇年以来传递材料达一百四十多件。张同温玉成、梁兴初有电话和信件往来。“九一三”事件前，关光烈给张荣森同志写了一封信，并送了皮包等礼物。蓝、张同林彪死党早就有不正常的关系。蓝在昆明时，就曾陪同邱会作的老婆胡敏，借选“外事人员”为名，搞阴谋活动。一九六九年十月，蓝、张到中央接受任务时，蓝事先去见了邱会作。在中央政治局同志接见他们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又单独接见蓝、张。蓝还向邱会作要求把云南的雷远高调到贵州工作，邱不同意，说：“昆明有个通风报信的也好嘛。”蓝将邱的这一黑旨意告诉了雷远高。蓝、张来贵州后，许多问题不向毛主席和党中央请示报告，而向黄、吴、邱等人写私人信件和打电话，对林彪死党的黑指示坚决执行。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期间，蓝亦农和梁兴初、任荣三人串连，由蓝执笔，联名告张国华同志的状，为吴法宪开脱。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同意《贵州省地、师级干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总结提纲》的通知

1972.09.15； 中发 [1972] 38 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中央批语

贵州省党委，省军区党委：

中央同意《贵州省地、师级干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总结提纲》。望你们抓紧批林整风，深入开展对林彪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加强军政、军民、军队内部和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搞好生产救灾，加强三线建设，努力完成党和国家规定的各项任务。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一九七二年九月某日，毛泽东提议将王洪文由上海调来北京参加中央工作。

九月二十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告知：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同意毛泽东的提议。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国务院批转“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老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住房情况的调查报告”

1972年9月29日，国务院批转《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老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住房情况的调查报告》。批语要求各单位认真检查上述3种人的住房情况，并规定住房被挤占的，原则上应予退还。

国务院科教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医学院、北京工业大学作的调查指出，这4所学校中的老干部（副部长级以上）、高级知识分子（三级教授以上）、爱国人士（全国人大、政协常委以上）共有208人，“文化大革命”前原有住房1036间，20105平方米。在“文化大革命”中，住房被挤占的有189户191人，占上述3种人总数的91.8%。被挤占住房508间，共10101平方米。此外，这4所学校的9至12级干部中还有17人被挤占住房88间，687平方米，占原住房面积的41%以上。

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根据毛泽东意见，约见来京参加解决湖南问题座谈会的广州军区和湖南党政负责人。就解决湖南问题打招呼。

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周恩来等领导人出席湖南问题座谈会。

周恩来说：三支两军的成绩是主要的，但林彪的一套做法助长了军队干部的骄气，党政、军有好些好作风被一风吹了。要认真进行教育，纠正不正之风。

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二日晚，中央政治局继续举行会议。

讨论湖南问题。

要求参加座谈会的成员回去后继续做工作，推动全省批林整风进一步深入。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一日，刘建勋等关于河南问题报告

毛主席、党中央：

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我们省委常委、省军区和驻豫部队三个军的负责同志，于十月十八日来到北京开会，向中央汇报和解决王新同志的问题。江青、先念、登奎、德生、洪文同志参加了我们的会议。武汉军区曾思玉、王六生、张体学同志参加会议，并讲了话。

在汇报会议上，刘建勋同志汇报了王新问题和河南省批林整风运动的情况。到会的同志都发了言，进行揭发批判，严肃认真地帮助王新认识错误，希望他揭发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彻底交代自己的问题，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但是，王新的态度很坏，至今有些重大问题仍然没有老实交代。

现将我们经过集体讨论和一致同意的中共河南省委《关于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送上，请批示。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一日，中共河南省委关于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

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在河南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王新。王新采取两面派的手法，对抗中央指示，不批陈，不批林，保自己，捂盖子，矛

头向下，批干部，批群众，竭力扭转批林斗争的大方向，继续进行了大量的反党阴谋活动。

大量事实证明，王新早就上了贼船，陷得很深，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顽固地站在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进行了反党乱军、妄图篡权的阴谋活动。

一、九届二中全会期间，配合林贼一伙向党猖狂进攻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林彪在庐山上第一个跳出来，煽风点火，突然袭击，发出了策动反革命政变的动员令。八月二十四日，在中南组会议上，王新积极追随叶群、李作鹏，把矛头直接指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作了向党猖狂进攻的恶毒发言。他说：“有的人利用修改宪法，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想刮这股风，我们很气愤。这是一股子反革命妖风”，“要把这些人、危险分子的丑恶面目揭出来，把他斗倒”，“这些人是阴谋家、野心家。要揭露他们的丑恶嘴脸”。林彪点火，叶、李煽风，王新呼应，配合得可好了。就在当天，二十四日晚，吴法宪把王新找到他的住处，策划于密室，进行了反革命串连。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时识破了林彪一伙的反革命政变阴谋之后，王新还和林贼死党宋城等人同游庐山，照相留念。

二、积极投靠林贼及其死党，竭力为林贼一伙效忠卖力

王新在庐山参与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决不是偶然的。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王新就竭力投靠林贼一伙，被他们封为“头号的大好”的人，得到了他们的赏识。一个拉，一个靠，相互勾结，由来已久。从党的“九大”以后，到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贼摔死，王新同北京来往电话一百四十五次，其中同党中央联系只有三次，大都是同林贼死党来往。“林办”、“吴办”到河南活动的人，都与王新单线联系，行动诡秘。林贼指派亲信，三下河南，王新亲自迎送，设宴招待。多次密谈。死党胡萍等人到河南看工事，进行阴谋活动，王新与他们秘密来往，当时就背着省党的核心小组、省军区党委，背着正在郑州的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同志，至今还不作彻底交代。于新野、何汝珍等人到郑州，以挑选“女护士”、“男内勤”为名，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王新与他们秘密勾结，使尽了种种卑劣的手段。王新奉“吴办”之命，为林贼挑选了两名历史教员，编写“文艺复兴”等历史资料，制造向党进攻的“炮弹”。王新

为林贼、叶贼窃取古字画，派人专程送给“林办”，而他竟然栽赃诬陷，造谣诬蔑中央负责同志。王新为调动工作问题，不顾中央已与省委商量决定了的指示，直接打电话给“林办”，要叶群为他说话。更不能容忍的是，王新两次派专人到武汉，通过刘丰看林贼住房，了解林贼是怎样生活的，回来后便在他的亲自指挥下，按照林贼在阴暗角落里过惯了的那种生活需要，将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郑州住过的房子，改为林贼的住处。

林彪反党集团炮制的反革命武装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出笼后，林贼死党刘锦平、王维国、周宇驰、王飞、解长林、王洪智等纷纷窜到郑州，王新和他们究竟搞了些什么阴谋活动，至今未做彻底交代。

王新还和林贼死党相勾结，擅自扣压了向中央报告的重要专案材料。

三、同刘丰秘密勾结，阴谋篡权

王新同刘丰的勾结也是由来已久的。他们经常单线联系，秘密串连，互通情报。从“九大”以后，到一九七一年九月，王新与刘丰来往电话达二百九十四次之多。他同刘丰一唱一和，狼狈为奸，干了许多坏事。他们反对“党指挥枪”的原则，严重地破坏了党的一元化领导。王新曾同刘丰私下议论，说什么二中全会上“把叶群也牵进去了，很被动。”他们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为林贼、叶贼鸣冤叫屈。在刘丰的盖子被揭开之后，王新还千方百计阻挠、破坏对刘丰的揭发和批判，竭力为刘丰给林贼送情报的反革命罪行开脱罪责。

王新伙同刘丰，攻击和陷害省委几位负责同志，阴谋篡权。他背着党中央和河南省党的核心小组、省军区党委，两次向刘丰等人送了陷害刘建勋同志的黑材料。第一次是在一九六八年正在筹备召开“九大”的时候，王新把一份写有同名人刘建勋名字的敌伪档案材料交给了刘丰和黄永胜、吴法宪。第二次是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王新将刘建勋同志的所谓“五·一六”问题的两份材料，带上庐山，送给了刘丰。

四、忠实推行林贼的反革命路线，在河南大搞反党乱军的阴谋活动

党的“九大”以后，林贼配合苏修，提出了“防止小资产阶级抢权”的黑纲领，制造篡党夺权的反革命舆论。王新从一九六九年下半年直到一九七一年七月，不断传播：“林副主席有指示，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有被小资产阶级抢走的危险”。他甚至到了林贼叛党叛国的“九·一三”前夕，还猖狂叫嚣：

“现在是小资产阶级的干扰，争夺领导权”，“这个命不革不行”，如此等等，为林彪反党集团大造反革命舆论。

王新反对党的一元化领导，肆意挑拨军政、军民和军队之间的关系。他曾背着省党的核心小组和省军区党委，通过省军区个别人，指令军分区党委考核、建立地、县委，胡说什么要把地方党委“‘军’起来”，“要占领阵地”。广大指战员遵照“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个马列主义基本原则，坚决抵制和揭露了王新的反党罪行，而王新则对抵制他错误的同志，制造种种借口，进行打击报复。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以后，王新紧密配合林贼一伙所谓“军队受压”的反革命叫嚣，一面攻击广大干部和群众“刮起了一股‘反军’风”，同时又攻击军政关系搞得好的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合穿一条裤子”，恶毒诬蔑人民解放军，在河南妄图反党乱军的正是王新。

河南省在无产文化大革命中站出来的革命领导干部多一些，毛主席曾多次鼓励过，这本来是一件好事。王新却极力反对，诬蔑“地方干部十几年来受刘少奇修正主义的影响很深，形成了习惯，不左就右，不右就左。”还胡说什么“和地方干部打交道要小心，今天在一块共事是朋友，说不定明天一翻脸就把你当敌人了。”九届二中全会后，他竭力扭转批陈整风、批林整风的大方向，硬说“河南的主要矛盾是派性”，大批所谓“派党论”。他乘“整风”、“整顿机关”和清查“五·一六”之机，把“派性”与资产阶级专政、资本主义复辟混为一谈，把造反派与极“左”思潮、与“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等同起来，蓄意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许多地方新老干部和军队干部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五、疯狂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大砍林县、兰考两面红旗

林县、兰考是毛主席、党中央表彰过的两面红旗。林县、兰考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产物。王新怀着刻骨的仇恨，以“派性”、“反军”、“资产阶级专政”、“独立王国”这四条罪名，打击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硬是要砍掉这两面红旗。他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对林县人民战天斗地取得的辉煌成就不是歌颂，而是恶毒咒骂，把林县的红旗渠、储备粮、粮食上纲要三大成就，诬蔑为闹派性的，“三大件”，“是说假话，欺骗中国人民，欺骗世界人民，是一种犯罪行为”。这完全是反革命分子和右派的言论。

六、对抗中央，压制群众，继续施展阴谋诡计

九届二中全会以来，毛主席、党中央耐心等待王新同志两年之久，给了他多次改正错误的机会，中央、武汉区党委甚至把揭发他的材料转给他，希望他同林彪反党集团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而他却对抗中央指示，长期不向党说真话。在去年的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和武汉地区座谈会上，他隐瞒罪行，不作检查交代。今年的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期间，中央领导同志一再耐心教育，他继续顽抗，不向党交心。中央批林整风会议以后，他变本加厉，搞阴谋诡计，欺上瞒下，制造混乱，妄图蒙混过关。他写信给毛主席、党中央，隐瞒真相，编造谎言；欺骗毛主席，欺骗党中央。他自立专案，找人为他对口径，写假证明材料。他搞假检讨，在省委和军区党委批林整风会议期间，一手炮制了一个所谓《王新同志七月三十日、八月五日在大会和商丘地区小组会上的发言》的简报，其实他根本没有在大会和小会上作过检讨。他背着省委、省军区党委，召开分裂会，大肆挑拨军政、军民关系。他恶毒攻击“省委常委是联络站”，挑拨省委常委的关系，破坏党的团结。

“九·一三”事件后，王新竟然背着省委，将他的办公室改为省委办公室，并擅自通知各地、市，要把所有关于批林整风的材料上报他所控制的这个由“王办”改成的所谓“党办”，妄图控制对林彪及其死党的揭发斗争。“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王新不但对林彪及其死党不作揭发，对自己的罪行不作彻底交代，而且用流氓手段对付党，狡猾抵赖，栽赃诬陷，威胁起来揭他盖子的同志。直到最近召开的省委常委、省军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以及这次中央召开的河南省来京负责同志汇报会议，经过同志们的揭发批判，王新在人证、物证面前，不得已检查交代了一些问题，但在重大的关键问题上，仍然不作彻底交代，继续顽抗，态度很坏，引起了同志们的莫大愤慨。

我们建议，中央责令王新离职反省，彻底交代。我们仍然希望，王新同志能够揭发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彻底交代自己的问题，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四日，中共中央同意《中共河南省委关于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

1972. 11. 04；中发 [1972] 42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中共中央批示

中共河南省委：

中央同意《中共河南省委关于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

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河南省委认真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全省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沿着党的“九大”团结、胜利路线前进，各项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总的形势是好的。中央希望你们领导全省军民，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把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巩固和发展当前的大好形势。

王新同志在党内第十次路线斗争中，上了贼船，陷得很深，顽固地站在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进行了反党乱军、妄图篡权的阴谋活动，严重地干扰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在河南省的贯彻执行。中央耐心等待他两年之久，给了他多次改正错误的机会，但他至今交代问题的态度不好。中央同意你们的建议，决定令其离职反省，彻底交代。

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时，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深入开展对林彪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要联系河南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继续揭发批判王新的错误。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真落实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在河南顽固推行林彪反革命路线的罪责，只能由王新来负。跟着王新犯了某些错误的同志，只要同王新的错误划清界限，彻底揭发批判，认真作自我批评，改了就好。不要搞人人过关，层层检查，不要揪住不放。对由于王新推行林彪反革命路线在工作中所造成的恶果，要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解决。

要增强党的观念，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切实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河南省军区和驻豫部队参加三支两军工作的广大指战员，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为人民立于新功，要在各级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认真执行中央有关三支两军工作的指示？继续开展拥政爱民、拥军爱民活动，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和军队之间的团结。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对中南海门诊部关于周恩来心脏病情况报告的

批语

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毛泽东对刘建章家属来信的批语
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周恩来给纪登奎汪东兴的信
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
此事请你们二人商办，他在桂林摔伤了骨头，曾请韦国清同志注意帮他治好。王良恩同志了解其情况，可问他关于震林同志一家的近情。
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听取李德生、王洪文关于新疆问题的汇报。
会议认为，目前该地区问题中心是大抓路线斗争，加强领导工作，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会上还讨论了华东等地问题。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谈山东问题。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关于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意见——中共北京军区委员会三届二十三次全体（扩大）会议纪要，
这场大辩论的中心问题是，当前国际、国内、党内、军内的形势好不好，是大好形势，还是漆黑一团？林彪的路线究竟是什么性质，是“左”的，还是右的？以及其它一些在深入批林整风中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这场大辩论，是由董立芳（二十八军政委）、汪易（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张照远（山西省军区副司令员）同志挑起的。

一、形势问题

国际、国内、党内、军内的形势怎么样？是大好形势，还是漆黑一团？应当肯定，不论国际、国内、党内、军内，都是大好形势。但是，董立芳同我们的看法相反。他说，他有“三个不满”，对党不满，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满，把形势说得漆黑一团。他对前途悲观失望，恶毒地攻击我们党“正在变”，“将来还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甚至胡说什么“最多中国变修”。他顽固地站在林彪路线一边，公开跳出来为林彪鸣冤叫屈。他的言论和行动，证明他是被打倒了的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二、林彪路线的实质是什么？

在批林整风中，有人错误地把林彪路线的实质归结为极“左”，或者说是“左”倾机会主义。他们提出了批判林彪路线主要地就是要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张照远同志在他所主管的部门，竟然把批判极“左”思潮与无政府主义作为当前的“头等大事”和“中心任务”，违背了中央关于批林整风是全党头等大事的指示。这种看法和做法，是完全错误的。

林彪为了实现其反革命目的，在某些时候，某些问题上，采取形“左”实右的手法，煽动极“左”思潮，利用极“左”思潮。他伙同陈伯达，支持和操纵一小撮“516”分子干了许多坏事，是人所共知的。林彪的路线，有时以极“左”面目出现，但它的实质是极右的。

这不是说，没有极“左”思潮，也不是说，对极“左”思潮不要批判。问题是决不能把林彪路线的实质归结为极“左”，不能以批判极“左”思潮代替批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不能把人民内部的某些缺点错误都统统挂到林彪路线上去加以批判，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搅乱我们自己的阵线。有的同志把群众中少数人的某些落后现象搜集起来，列举了所谓“十大表现”，把诸如迟到早退，小病大养，小偷小摸，学习不认真，开会不发言，开口骂人，打架斗殴等等之类，都说成是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统统都和林彪路线挂在一起加以批判。这不是批林，是整群众。这就严重地违背了毛主席指示的“首先是批林”的大方向。

三、林彪有没有一条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这个问题，也是董立芳提出来向党挑战的。他在批林整风中向党进攻，多次声称“林彪没有形成一条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与毛主席相对抗”，公开为林彪辩护。

董立芳胡说林彪没有形成一条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一条主要“理由”，就是所谓“四好的四个方面是体现了毛主席建军思想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董立芳为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辩护的另一条“理由”，就是把林彪的“六个战术”奉为打胜仗的“法宝”，胡说什么“过去仗就是这样打的，今后还要这样打”。

四、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反对唯心论的先验论

正当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深入批判林彪那个“天才论”的反党理论纲领的时候，董立芳却胡说什么“地主生活好，他的儿子就比一般人聪明”，攻击我们党对林彪“天才论”的批判是“形而上学”。汪易在九届二中全会后多次开会传达所谓“超天才”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同林彪死党吴法宪唱一个调子，吹捧林立果“放了一颗政治卫星”。张照远同志在“九·一三”以后，还说什么“不承认‘天才’就会造成思想混乱”。

五、要团结，不要分裂

汪易积极投靠林彪反党集团，早就上了贼船，陷得很深。华北会议后，他又第一个跳出来，搞阴谋诡计，制造分裂，破坏团结，挖无产阶级的墙角。他在一九七一年七、八月间给军区领导写的两封信，把军区常委分裂为“老常委”、“新常委”，造谣说“军区常委仍然是几个老常委左右一切”。他明明知道军区有的领导同志是由中央决定调动工作的，却捏造说是被排挤走的，进行挑拨离间。他过去为了爬上林彪的贼船，亲笔给林彪写信，说什么气要为忠于林彪而呼吸，血要为忠于林彪而奔流，不管遇到什么惊涛骇浪，就是粉身碎骨，也要永远“保卫林副主席”。林彪倒台了，他不批林，却诬蔑坚持批林的同志是“野心家、阴谋家”，进行政治陷害。他一贯制造谣言，拨弄是非，唯恐天下不乱；他拉拢一部分人，排斥一部分人，封官许愿，进行非组织活动；他挑动资产阶级派性，纠缠历史旧账，有意把水搅浑，大耍两面派，手段十分恶劣。

六、尊重和维护地方党委的一元化领导

董立芳就是一个例子。他身为军党委书记，军里担负着一个地区的三支两军任务，他自己也在一个工厂负责过支左工作，但他竟公然拒绝向当地省委汇报工作，甚至狂妄地说：“他（指省委和省委主要领导同志）算什么？他干他的，我干我的！”抗拒党的领导。另一个例子，是张照远同志。他分工主管山西省国防工办的工作，本应无条件地接受省委和省军区党委的领导，而他却到处伸手抓权，向省委、省

军区党委闹独立性，搞独立王国，严重地违反了党的一元化领导这个根本原则。

贰、本节简论

开展批林整风是一九七二年的工作重点。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

一、继续发出批林整风的文件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扩大《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的发放范围的通知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的通知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传达和讨论《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的通知及附件

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七日，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的通知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三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通过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期间征求过意见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和《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通过中共中央转发这两份材料的通知。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日，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传达和讨论《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的通知及材料

二、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

一九七二年五月三日，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意见。

一九七二年五月六日，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的通知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参阅文件之一——揭发林彪在历史上反毛主席、反党的罪行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其中讲到会议的文件之五是毛泽东《给江青的信》。

周恩来说：“现在确定的文件之五，是最重要的一篇，就是毛主席给江青同志的信。这个信只有政治局一部分同志看过，在座的你们各省市的，还有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没看过。就是在“九·一三”以后，今年印的吧？这封信是什么时候写的呢？就是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政治局扩大会议林彪在河北厅讲话以后，林彪讲话经过多次改动，送到主席那里，主席总是有点不安，里头有些话过头，叙述政变那种写法也不当。但是当时是以为的要发动文化大革命，鼓革命群众之气，要打击、扫除那种修正主义的风，所以说有些过。但是当时的中央修改以后，还是请主席批。主席觉得不批，这篇东西不能发表，不是等于给群众泼冷水了吗？因为大家希望看到这篇东西嘛。实际上这里头有毛病，有些极“左”的话，有些不恰当的。……主席写这封信是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在武汉写的，我是七月十一日到武汉的。那时见了个外宾，我跟主席报告我到国外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以后，主席要我留一天。第二天上午见主席，主席就把给江青同志的那封信的抄件给我看。是一个底子，那个字是徐业夫同志抄的，有些字还抄错，主席还改了的。……前天，我们政治局决定要请示主席，我昨天去请示主席，原来主席还说等一等，昨天一请示说可以。”

可是，后来有人说：这封信是假的。网络上还传播一篇张玉凤的回忆录，说什么这封信是康生的主意，由江青、张春桥写成，毛泽东是违心同意的，周恩来也上了当。即使张玉凤真是这样说的，即使她说的都是真的，也不能说明这封信就根本不存在。周恩来就亲眼见过，难道他也是说谎？可以推测的一种可能是：这封信的原件和抄件都不存在了（烧了）。康生出主意，由江青和张春桥把它恢复出来。所以政治局请示毛泽东要把这封信作为批林整风汇报会的文件，开始毛泽东没有答应，真到五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再请示才同意了。因为这封信的基本精神保留了原貌，可以把它看成是修改稿。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各小组召集人会议。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江青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的讲话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毛泽东约见周恩来。

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

周恩来：要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根据毛主席去年巡视南方谈话中着重提到的中共党内十次路线斗争的问题，讲一点个人认识和我个人在历史上所犯的路线错误。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各组如今人会议。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日，毛泽东约见周恩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

一九七二年六月四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各组学习讨论会议文件的情况汇报。

一九七二年六月五日，中央印发林彪一九四零年七月在苏联发表的一篇反党文章——中国人民的三年民族解放战争。

一九七二年六月七日，周恩来将所写的《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提纲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圈阅了提纲和附信。

一九七二年六月十日至十二日，周恩来连用三个晚上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的报告。

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三日，陈云就所谓“伍豪问题”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小组会上发言。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在最后一次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的全体会议上，作《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的报告。

三、解决几个省区的批林整风问题

关于新疆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二日，周恩来同部分政治局委员接见来京参加新疆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会议认为，新疆、江西、贵州、云南等地问题值得引起注意。

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同部分政治局委员接见来京出席新疆工作会议的代表。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复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

中共新疆军区党委电：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听取李德生、王洪文关于新疆问题的汇报。

关于四川

一九七二年三月十八日至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两广、四川和湖南等地批林整风中存在的问题

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九日，刘兴元、李大章等七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问题的请示报告，指出：梁兴初、陈仁麒、谢家祥三同志上了贼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批转四川省委“关于继续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问题的请示报告”。

一九七二年八月九日，中共中央批转“四川省委、成都军区党委扩大会议总结提纲”

一九七二年八月九日，周恩来、张春桥、纪登奎、李德生听取四川省和成都军区负责人刘兴元、李大章等工作汇报。

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商谈四川问题。

关于浙江

一九七二年三月三十日、三十一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江西、浙江问题。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浙江来京开会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指出：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批转解决浙江问题会议的“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约见准备派往浙江帮助贯彻中央精神、解决浙江问题的许世友、王洪文。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和叶剑英约见来京参加参加的浙江省党政军负责人。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共浙江省四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关于南萍，熊应堂问题的总结提纲

关于江西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江西来京开会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指出：九届二中全会以后，程世清同志采取了各种办法，对抗中央，压制群众，不准联系江西的实际，不认真进行揭发批判，竭力捂住盖子。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程世清同志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对《江西来京开会同志关于继续开展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语

关于贵州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商讨贵州问题。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二日，蓝亦农等呈中央和毛主席的信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二日，贵州省地、师级干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总结提纲指出：在我党第十次路线斗争的重要关头，蓝亦农、张荣森同志都是站在林彪反党集团一边，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蓝亦农同志的错误更严重。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同意《贵州省地、师级干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总结提纲》的通知。

关于湖南

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根据毛泽东意见，约见来京参加解决湖南问题座谈会的广州军区和湖南党政负责人。就解决湖南问题打招呼。

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周恩来等领导人出席湖南问题座谈会。

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二日晚，中央政治局继续举行会议。讨论湖南问题。

关于河南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一日，刘建勋等关于河南问题报告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一日，中共河南省委关于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指出：王新早就上了贼船，陷得很深，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顽固地站在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进行了反党乱军、妄图篡权的阴谋活动。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四日，中共中央同意《中共河南省委关于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

关于山东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谈山东问题。

关于海军

一九七二年九月，毛泽东对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如何开展批林整风的意见

关于北京军区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关于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意见——中共北京军区委员会三届二十三次全体（扩大）会议纪要，

四、落实干部政策，调整领导班子

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叶剑英谈话。

毛泽东说：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今后不要再诘二月逆流了。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毛泽东出席陈毅追悼会。

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说：林彪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而毛主席讲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混淆。听说新疆现在还有人讲二月逆流，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叶副主席已经主持军委工作，你们听到那些话，为什么不批驳？

一九七二年三月五日，毛泽东对苏振华来信的批语

此人似可解放了。如果海军不能用他，似可改回陆军（或在地方）让他做一些工作。可否，请中央酌定。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对杨成武家属来信的批语

请汪印发政治局同志研究。此案处理可能有错，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

一九七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纪登奎在国务院汇报干部会议时的讲话精神

一九七二年五月十八日，周恩来确诊患膀胱癌。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一日，中央批准外交部《关于调整党的核心小组的请示报告》的通知。

一九七二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对反映白坚情况摘报的批语

送总理阅处。白坚在我的印象里不错，应为他做出政治结论。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对贺诚来信的批语：贺诚同志来信请中央处理。我意应给予工作。

一九七二年七月七日，毛泽东对廖汉生家属来信的批语

送总理阅处。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未经中央讨论，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此件你阅后请交剑英、德生一阅。

一九七二年七月九日，中共中央批准公安部“关于公安系统落实干部政策情况和意见的报告

一九七二年八月，周恩来提议将朱穆之从五七干校调回，并经毛泽东同意，安排朱参加新华社领导班子。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

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一日，毛泽东在林枫家属来信摘要上的批语：连原信一起，请汪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意放他出来治病。林枫问题过去没有弄清楚，有些证据不足，办案人员似有一些逼供信。

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对邓小平来信的批语。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六日，周恩来、纪登奎、李德生等约林彪之女林立衡及其未婚夫张清林谈话。

一九七二年九月某日，毛泽东提议将王洪文由上海调来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九月二十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告知：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同意毛泽东的提议。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国务院批转“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老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住房情况的调查报告”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对中海门诊部关于周恩来心脏病情况报告的批语：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毛泽东对刘建章家属来信的批语：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周恩来给纪登奎汪东兴的信

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

此事请你们二人商办，他在桂林摔伤了骨头，曾请韦国清同志注意帮他治好。王良恩同志了解其情况，可问他关于震林同志一家的近情。

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

五、整顿军队

一九七二年一月一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的指示的通知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转北京军区等单位关于对部队进行政策纪律教育的报告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2009年5月初稿

2012年5月4日修改

第八章第三节 批判极左思潮问题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中央航空产品质量座谈会上说：为什么合理的规章制度没有恢复？要批判林彪反党集团，批判无政府主义，批判极左思潮。

一九七二年四月九日，周恩来在广州讲话。

他在讲话中着重批判了极左思潮对企业管理、产品质量带来的恶劣影响，指出：现在是不敢管，无政府主义泛滥，领导机关不敢讲话。一九六七年是极左思潮上升的时候，讲话没有人听。从那时起至今五年了，情况变了。

他在观看部队文艺演出时要求肃清文艺工作中的极左思潮。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的谈
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国家也有人家骂我们，说是整了左派。我们的“左派”是什么一些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

毛：被那些“左”派夺了权。一个半月，权不在我们手里，在那些所谓“左”派的手里。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没有多少问题，几个月过去了，几年过去了，总后台的人现在也过去了，叫林彪。坐一架飞机往苏联去，其目的是想见上帝。

一九七二年八月一日、二日，周恩来接见回国述职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人谈话纪要，

他说：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鼻子底下就有；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有几年，他利用二月逆流要把老干部都打倒，把所有政治局的老同志都搞掉，都换上他的死党。他们打倒一切，破坏毛主席的威信和威望。林彪用极左的方法破坏毛主席的威信，把毛主席说过了头，什么“顶

峰”呀，“一句顶一万句”呀，“第三个里程碑”呀，等等，其实这些都是假的，结果是要谋害主席。这样的人暴露出来是大好事。

他说：极左思潮，就是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很抽象，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工作，还要犯错误。

一九七二年八月八日，张春桥、姚文元与人民日报社军宣队负责人及有关人员的谈话中强调批林“不要过头”。

一九七二年九月，两报一刊国庆社论起草人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先后两次在社论稿中写入批判极左思潮的内容。

姚文元在审稿中均删去。

九月三十日，周恩来约有关人员谈国庆社论。

经周恩来审定，社论提出：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阔”，“继续全面地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提倡又红又专，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为革命学习业务、文化和技术”。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龙岩“的《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学习笔记》文章。

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一伙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做官当老爷，大搞特殊化，反对干部和群众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反对思想政治工作，鼓吹“规章制度万能论”，对群众实行资产阶级的“管、卡、压”，妄图使群众成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驯服工具”，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种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恰恰为无政府主义的滋长准备了肥土沃壤。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一类骗子又狡猾地利用群众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不满，大肆煽动极“左”思潮，只要民主，不要集中，只要自由，不要纪律，鼓吹“群众说了算”，鼓吹“规章制度无用论”，叫嚷要“砸烂一切”。他们这样作，就是要把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引向邪路，彻底破坏社会主义的劳动纪律，瓦解社会主义生产，从根本上动摇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

刘少奇一类骗子的手法，揭穿了说，就是用极“左”的形式，来掩盖他们的右的反革命实质。他们口头上“发表一些最左、最最最革命的言论”，招摇撞骗，实际上“进行着简直是流氓式的煽动，即利用劣根性、利用小私有者‘捞一把’的欲望来进行煽动”。他们叫嚷“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蛊惑人心的反革命口号，就是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刘少奇一类骗子极力煽动无政府主义，并不是真的不要任何政府。他们只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而使他们所代表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政府上台。他们只不过是把无政府主义思潮当作他们实现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的工具而已。所以，他们一面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一面又拉山头，结死党，挖空心思地“大树特树”他们一小撮的“绝对权威”，并利用窃取的权力，大搞“以我划线”，妄图对干部和群众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法西斯统治。他们这种滔天罪行，流毒所及，歪曲和破坏了党的一元化领导，腐蚀了党的优良传统，在干部和群众中制造了思想混乱，为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泛滥准备了条件。

由此可见，刘少奇一类骗子，正是煽动和利用无政府主义的罪魁祸首。今天，要肃清无政府主义思潮，首先就要深入批判他们这些反革命罪行，彻底肃清它的流毒。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纪众言的《坚持无产阶级铁的纪律——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一点体会》文章

加强无产阶级纪律，必须首先提高广大党员特别是各级党组织领导班子的思想觉悟。

加强无产阶级纪律，必须密切领导和群众的联系，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加强无产阶级纪律，必须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左”右干扰和破坏，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李定的《一个阴谋家的丑史——读〈巴枯宁〉》文章

针对人民日报发表的这三篇文章，一些领导人提出了不同意见。

姚文元提出：当前要警惕的是右倾思潮抬头，不能说什么都是无政府主义，不能批到群众头上，不要混淆两类矛盾。

江青说：这版文章就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八日，周恩约见公安部负责人。

周恩来说：干部下放是你们带的头，统统下放，等于靠边站。底下跟着你们学，上梁不正下梁歪。这是政治性错误。你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怕出事，把耳目、有经验的干部都不要了，这还不是政治性错误？这是肯定的。我还不给你们加方向、路线错误的帽子。难怪公安会议开了，我说了话，底下也不执行。你们给底下一个机会，搞极左思潮，否定一切，统统搞掉。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联部、外交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
报告提出：会议的任务：联系外事工作的实际，以批林整风为纲，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研究和解决外事工作中的一些迫切问题，以便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周恩来对中联部、外交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的批语

拟同意，请送耿飏同志会签后，再呈主席、康生（暂不送）、江青、春桥、文元、剑英、先念、登奎、德生、东兴、洪文同志批示。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一日，张春桥对中联部、外交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的批语

我不了解外事工作的全面情况，但是，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建议外事会议批林要批得全面一些，同时要讨论毛主席关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日，江青对中联部、外交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的批语

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他在某些问题上形左实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因为，没有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暴露不出他们来，他们还隐藏下来，那对我们党和人民将造成很大的损失。当然，天也塌不下来。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初，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召开全国外事工作会议问题。

根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外事部门删去了原来报告中有关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等词句。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写信给毛泽东表示“很同意”周恩来不久前关于人民日报社等单位要批透极左思潮的意见，并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等反对批极左的一些情况。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六日，毛泽东约见江青
要她将王若水的这封信转给周恩来、张春桥和姚文元等。
毛泽东提出：由他们一起找写信人谈话，解决这个问题。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六日，江青会见周恩来
江青提出：“建议我们先谈谈，统一一下认识。否则，冒冒失失地找他们来，各说各的不好。”

周恩来同意在政治局内部“先谈一下”。（周恩来对江青所送批件的批示，手稿，。）

当天，张春桥、姚文元说：“主席说，林彪历史上一贯是右的。”“林彪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右的。”

张春桥还提出：“只讲极左思潮说服不了我。林彪也有个发展过程，只讲极左怎么行？”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日，周恩来和江青谈话。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十六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讨论王若水十二月五日信和对批极左问题的认识。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在住处召集小范围的会议
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等参加。

毛泽东在会上说：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

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他认为：“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周恩来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约人民日报社鲁瑛、
吴冷西、崔金耀、王若水谈话。

传达毛泽东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的指示。

江青在讲话中指出：王若水十二月五日信客观上对中央起挑拨作用。提出要批一篇文章（指署名龙岩的《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一文），批一个版面（指十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登龙岩文章的第二版），批一个部门（指人民日报理论部）。

周恩来在讲话中提出：我们内部极左思潮要批透，但不是讲林彪整个路线。并表示：这是中央务虚不够，不能完全责备报社工作的同志。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关于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意见——中共北京军区
委员会三届二十三次全体（扩大）会议纪要，

二、林彪路线的实质是什么？

在批林整风中，有人错误地把林彪路线的实质归结为极“左”，或者说是“左”
倾机会主义。他们提出了批判林彪路线主要地就是要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
主义。张照远同志在他所主管的部门，竟然把批判极“左”思潮与无政府主义作

为当前的“头等大事”和“中心任务”，违背了中央关于批林整风是全党头等大事的指示。这种看法和做法，是完全错误的。

林彪为了实现其反革命目的，在某些时候，某些问题上，采取形“左”实右的手法，煽动极“左”思潮，利用极“左”思潮。他伙同陈伯达，支持和操纵一小撮“516”分子干了许多坏事，是人所共知的。林彪的路线，有时以极“左”面目出现，但它的实质是极右的。

这不是说，没有极“左”思潮，也不是说，对极“左”思潮不要批判。问题是决不能把林彪路线的实质归结为极“左”，不能以批判极“左”思潮代替批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不能把人民内部的某些缺点错误都统统挂到林彪路线上去加以批判，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搅乱我们自己的阵线。有的同志把群众中少数人的某些落后现象搜集起来，列举了所谓“十大表现”，把诸如迟到早退，小病大养，小偷小摸，学习不认真，开会不发言，开口骂人，打架斗殴等等之类，都说成是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统统都和林彪路线挂在一起加以批判。这不是批林，是整群众。这就严重地违背了毛主席指示的“首先是批林”的大方向。

贰、本节简论

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极左思潮，是从一九六七年八月开始的。当时是以王力、关锋、戚本禹为代表。并且与北京的“五·一六”兵团挂上了钩。

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事件出来以后，全国开展批林整风，国内外有人攻击说这是整左派。

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国家也有人家骂我们，说是整了左派。我们的“左派”是什么一些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总后台的人就叫林彪。很明显，毛泽东的讲话是就所谓“整左派”这个问题来说的，并不是评价林彪所执行的整个路线。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周恩来提出要批判林彪反党集团，批判无政府主义，批判极左思潮。

周恩来的讲话是把三个东西并提的，没有说林彪的路线就是无政府主义、极左思潮。

在周恩来以后的讲话中多次强调要批极左思潮、批无政府主义。特别是一九七二年八月他在外事工作会议的讲话，更加突出、系统的批判极左思潮。

可是，这个时候在社会上已经刮起了一股右倾思潮。这股思潮认为林彪的路线就是极左路线，林彪的极左路线就是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林彪的路线错了，也就说明文化大革命错了；林彪摔死了，也就意味着文化大革命失败了。

这样一来，在政治局内部对批判极左思潮的问题就发生了分歧。这个分歧具体表现在四件事情上：

一是一九七二年的国庆社论中，是否要写上批极左思潮？

二是一九七二年十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龙岩”的《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学习笔记》文章，是否恰当？

三是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联部、外交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提出：以批林整风为纲，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是否恰当？

四是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写给毛泽东信，支持批判极左思潮，如何对待？

从这四件事来看，它涉及到中联部、外交部、人民日报社这样三个重要部门，而它们的指导思想就是批林彪反党集团就是批极左思潮、批无政府主义。就是要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指导思想。（《毛泽东传（1949-1976）》说：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由于毛泽东的“裁决”而告一段落。事实再次表明：毛泽东，可以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纠正错误，包括调整若干重要的政策；但他不会允许“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也证实了这一点。）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档案迄今为止没有公布，人们不知道政治局内部对这几件事讨论的具体情况。但是，从一些零星材料可以看出：

关于国庆社论，周恩来最终同意了姚文元的意见，删除了批判极左思潮的提法，改为正面阐述要做什么。

关于人民日报发表三篇文章，周恩来最后也同意了江、张、姚的意见。

关于外事会议的报告，周恩来经过政治局讨论也同意了删除原来的提法。

关于王若水的信，经过政治局两天的讨论，毛泽东召集的小型会议，达成一致意见。并由周恩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找人民日报的领导人谈话。

周恩来指出：我们内部极左思潮要批透，但不是讲林彪整个路线。并表示：这是中央务虚不够，不能完全责备报社工作的同志。

至此，关于批极左思潮的问题，可以说是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对指导当时的批林整风运动，具有重大意义。在这个问题的解决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作出了重要贡献。

2009 年 5 月初稿

2012 年 5 月 4 日修改

第八章第四节 江青接受美国学者采访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二年七月十九日，中国对外友协邀请美国学者维特克夫人访华

1972 年中美关系发生转折后，维特克夫人提出访华要求。由于她曾翻译过《红旗飘飘》中的一些文章，因而被认为是对中国友好、也对中国革命有所了解的人士。于是，经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推荐，中国对外友协邀请她于 1972 年 7 月 19 日至 9 月 1 日赴中国访问，目的是满足她“了解中国妇女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她们的贡献”。当时，中国驻外机构还建议她采访一些“最近被提拔到中央的妇女同志”。

维特克夫人到北京之后，邓颖超、康克清等接见了她，并对她谈了有关中国妇女运动与中国革命等问题。

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二日，江青接见维特克夫人

当时在中国对外友协的接待计划中，本来没有安排她会见江青。按照当时的惯例，江青的工作与外事无关，一般不安排她单独接见外宾。不过，经维特克夫人的一再要求，中国对外友协请示周恩来，让他决定是否同意江青会见维特克夫人。

对此，周恩来于 8 月 10 日批示说：“江青同志：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

江青见到周恩来的批示后，便决定于 8 月 12 日下午 3 点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见维特克夫人，陪同人员有姚文元（主管意识形态方面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海容（外交部部长助理）、张颖（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以及丁雪松。当时，本来是由中国对外友协副会长周秋野出面接待，但因周秋野有事，遂由张颖替代，恰好张颖与江青在延安时都在鲁艺，彼此认识。

江青说：“邓颖超、康克清都是老革命了，但她们都是搞妇女工作的，只能对你谈妇女运动。我可是大不一样，我的面要宽得多。我可以给你谈战争，谈军事，谈政治，谈经济、艺术，还有文化大革命。”以及她自己的“不少的罗漫蒂克”的故事。关于这一切，

江青又说：“我们合作吧。我提供材料，我给你说，你来写。我想你一定知道，美国以前有一位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他在 30 年代写过毛泽东，写中国共产党，在西方一举成名。你很年轻，很有才华。你写我，写现代的中国，那就是第二个斯诺，你将举世闻名。”

江青还说：“我跟随毛主席在西北战场作过战，我可以生动地介绍这段历史，不会枯燥的。不仅为你的书，也是为中国党、中国军队、中国人民。我好长时间想谈，你来了成了一个动力。”

谈话完毕，江青邀请维特克夫人在北京人民剧场观看了《红灯记》。

之后，江青又陆陆续续与维特克夫人谈了几次，并约定在广州继续谈。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日左右，周恩来多次召集陪同人员开会，研究江青接见维特克的谈话内容及时间

8 月 17 日、19 日、24 日，周恩来连续三次召集陪同人员开会，要张颖等人让江青约束话题(限于文艺，如说到 20 世纪 30 年代，多谈鲁迅。周恩来还让张颖带去一本线装本的《鲁迅诗集》作为参考)，按期结束，谈一次等。

一九七二年八月底，江青在广州继续接见维特克

两地的谈话总计 6 次，约 60 余小时。

江青要求翻译、接待人员把全部录音整理成文字送给对方，为其写作提供材料。

一九七二年九月，张颖将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记录面呈周恩来。

并提出：“我认为这些谈话记录，最好不要送给维特克。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意见，参加会见的几个同志都这样认为。江青同志的谈话，内容很庞杂，且有许多不恰当之处，有些谈法影响也不好。”

周恩来问：“你们大家都这样认为吗?可是江青同志亲口答应维特克女士了，不给不好吧?”

一九七二年十月，周恩来又召开了一次会议，专门讨论如何处理维特克夫人与江青的谈话记录的问题。

他把参加接待维特克夫人的有关人员都请来参加会议，并征求了每个人的意见。绝大多数人认为这份记录不必送给维特克夫人，因为她本人当场作了记录，而维特克夫人只表示要给江青个人写传记。有关江青个人的家庭情况、经历，事先已经给维特克提供过一份详细材料，而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涉及到各方面的情况和问题，倘若逐一核实，要耗费许多时间和人力，况且在江青谈话的内容中，有许多是不宜公开发表的。

周恩来与江青通电话，周恩来说：“关于你个人历史部分，已经送给维特克女士了。最近送来这些，过于庞杂，涉及面很广，一时也难于核对，是否可以不给或少给呢？”

江青说：“这怎么可以，这里要讲个国际信誉嘛。”

一九七二年年岁末，周恩来再次召集参与接待维特克夫人的有关人员开会。

他在会上宣布：“已经请示毛主席，记录不必送给维特克女士，一切工作都停止，所有记录稿全部清理封存，一份归入档案。”

第二天，张颖等将记录(仅是在北京的)草稿、铅印修改稿等全部归总在一起，清理出一份完整的记录，交给了外交部档案室归档，余下的则全部放进一个保险箱里，上锁并加封条，交给外交部保密室收藏。

贰、本节简论

关于江青接见维特克一事，闹得沸沸洋洋，说江青在谈话中“泄露了党和国家大量机密”。

关于这个方面，当时的主要陪同者张颖是这样说的：

“当时有人据此指责江青与“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之嫌”的维特克夫人合作，让这本书在西方出版，因而“泄露了党和国家大量机密”，如今看来，却并非事实，真的不过是谣言而已。

“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要说有不妥的内容可以，但说她泄露了党和国家的机密则言过其实。其实，当初一些参加谈话的中方接待人员(如张颖等)，之所以很快就对江青谈话的内容表示出惊讶和不满，甚至马上反映给周恩来，主要是因

为江青在谈话中涉及到了毛泽东的婚姻和家庭，这些也可以称为是领袖的隐私。张颖回忆，那时她“深感惊讶，本能地感到不妥”，“至于对其他内容并没有在意，更没有什么觉察到泄露了党和国家机密一说”。

“至于江青谈话中的不妥方面，甚至是机密的内容，大概就是江青还讲了贺子珍的一些话，如说毛泽东同她的分离是“她要求离婚的”，“在中央苏区时他们就已分居一年半了”，贺“非常固执，她不能理解毛主席的精神境界，不关心毛主席”，等等。关于她自己，江青也说了一些自己从前的绯闻。此外，就是说了关于批判《武训传》，乃至闲话《红楼梦》等。上述内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显然是不妥的，至于是否构成了机密，恐怕还谈不到。”

事实证明：维特克根据与江青的谈话及收集的其它资料，一九九五年出版的江青传记译名为《江青同志》，是一本严肃的历史著作。

2012年3月10日修改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九章 召开十大

第一节 一九七三年的新形势新任务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三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新年献词》

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那些千方百计破坏这场大革命的牛鬼蛇神，那些做梦也想着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的英雄好汉们，已经遭到了历史的无情嘲笑。

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胜利了，不要忘乎所以。过去军队打仗，打了胜仗就要总结经验，提出新的任务，继续前进。毛主席还指示我们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搞好批修整风，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沿着党的“九大”路线继续前进。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把批修整风这个头等大事继续抓紧抓好。

我们要充分看到广大群众在批修整风中激发出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制订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要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处理好农、轻、重的关系，搞好农业，加强农业。

要坚定地把上层建筑领域的斗、批、改继续进行下去，使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事业更加繁荣，更好地为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

人民解放军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努力提高政治水平和军事技术水平。

全国军民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各条战线的同志要遵照毛主席关于“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的教导，在执行各项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牢牢记住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牢牢记住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阶

级和阶级斗争的科学分析。只有这样，才能抓住主要矛盾，才不至于迷失方向，才能做好工作。

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是各条战线夺取新胜利的重要保证。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将继续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进一步加强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坚决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的和平共处，为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

一九七三年七月十一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一定要把“五·七”干校办好》

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办好民兵》

一九七三年十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认真学习继续前进——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四周年》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

1，学习十大文件，要抓住路线这个纲。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十大强调要特别重视九大再次肯定的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强调要继续执行九大“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号召。

毛主席制订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九大号召团结起来，就是为了实现基本路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争取更大胜利。十大充分肯定九大路线是正确的，

并着重总结了第十次路线斗争的经验，号召我们坚持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的原则。因此，十大路线是九大路线的继续。

学习十大文件，要抓住路线这个纲。讲路线，要讲基本路线。我们同刘少奇、林彪的斗争，集中到一点，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还是改变党的基本路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叛徒集团和林彪反党集团，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围绕着坚持或者改变党的基本路线的斗争，并不因此结束，以后还会长期进行下去。我们对党的基本路线，要经常学，反复学，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

2，学习十大文件，要抓住重点。

我们要学习十大对时代和形势的分析，充分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伟大胜利，弄清列宁分析过的世界各种基本矛盾在今天的表现，看到当前国际形势特点是天下大乱，进一步理解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和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采取的措施，增强战备观念，警惕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爆发，特别是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

要学习毛主席关于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的教导，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特点和规律，积极地正确地进行斗争。

要学习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领会培养千百万革命接班人这一战略措施的深远意义，为革命新生力量的成长创造条件。

要学习加强党的建设的问题，认识党的一元化领导最根本的是正确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领导，提高党委抓大事的自觉性；必须重视上层建筑，热情支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认识依靠群众是我们的一条基本经验，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爱护群众的积极性。

所有这些，都是十大文件中反复论述的路线斗争中的重大问题，是坚定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必须弄清楚的理论 and 实践问题，我们要学深学透。

3，我们要以十大文件为武器，把批林整风引向深入。

要充分利用林彪这个反面教员，批判他的反革命罪行，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向广大群众进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教育。

要掌握斗争大方向，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全面落实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

要在批林整风运动推动下，动员广大群众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用新的胜利迎接四届人大的召开。

一九七三年十月五日，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的谈话

今年农业丰收，可能超过历史上最高水平，去年（4800 亿斤）比前年（5000 亿斤）减产 4%，今年可能 5150 亿斤，公布 5100 亿斤。基本是增产，四、五个地方减产，超历史水平，是好事。

文艺，较好剧本发表不少了，不止十个，综合看，已经反映了中国革命各阶段的革命斗争。杜鹃山是写 28 年，红色娘子军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红灯记、白毛女写抗日战争，智取威虎山、沂蒙颂（比红嫂好，比京剧缩短，还加上美工，写军民关系交错好些）写解放战争，奇袭白虎团是讲抗美援朝，龙江颂、海港是写社会主义时期，一幅中国革命图画，不容易了。打下了基础，能更好前进。

广义讲，凡是主张专政的都是法家、主席讲我们也是法家，我们主张专政，不是地主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专政。主席给沙菲谈话，讲林彪骂秦始皇，就是骂专政，骂共产党，骂社会主义，我们要讲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领导。专政不只是靠自己，有同盟军，农民，知识分子，90% 以上的革命人民，对资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一分为二，我们反对的是坚持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党内走资派，地富反坏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正确处理内部矛盾，团结大多数是一致的。马克思讲无产阶级专政，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主席的人民民主专政，都讲专政，讲如何实行专政，这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消灭阶级差别，消灭剥削阶级，最后自己也消灭。

江西一个省委书记把小道消息当正道，说主席讲四句话“扫清庙宇，请进尊神，老师归位，小兵回营”，召开一个会议，干部通通换了一批。

主席看“十批”五遍。

林彪未垮台时，主席讲孔子学术虚伪，孔是私生子，讲非礼勿动，非礼勿言。林彪说孟子和孔子不同，孟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有好处，主席摇头。说刘少奇黑修养越养越修。

批孔子是五四时代就搞的问题，开倒车就要抬孔子。

“十批”中，主要是资产阶级观点束缚，不但有“人民本位”，也有阶级调和的。剥削阶级代表全民利益，得出这些结论，是资产阶级观点影响。在座的谁看过“十批”？研究方法受资产阶级观点影响，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也有这方面的内容，书应该出，不出不行，二十四史都出，但旧观点不扫清不行，应搞清楚。“十批”说孔子把人当作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个阶级上台，都是对另一个阶级推翻，打倒，讲专政，不是当作人。最文明的无产阶级把剥削者改造为自食其力的新人，劳动者，死不悔改的关起来，杀，多数改造为新人，把资产阶级的人改造为劳动的人。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抽象的人是不存在的，没有什么把人当人的事，这是受资产阶级观点影响。

历代统治者沿用秦制，一面又骂秦始皇，为什么，未进一步讲清楚。林彪骂秦始皇，不是因为革新。被打倒的阶级，反对打倒他的新的阶级，就要骂秦始皇。中国历史没有资产阶级专政一段。搞革新的人曹操、王安石都肯定秦始皇。主席过去讲，斯大林三七开，秦始皇也三七开，功是主要的。尊儒反法，主要是反对专政这一点。中国历代反动统治比残杀巴黎工人不知残酷多少倍。这不讲残酷。打倒封建阶级，打倒皇帝就不得了了。对巴黎公社就是血洗，资产阶级可以不管。秦始皇只不过坑四百多人，算什么？

人家攻作品太少。慢慢会多起来，搞一个戏不容易。

国庆社论把十大路线、九大路线、基本路线的关系，解决了。

中央办第二期学习班，主席讲，选一些在庐山会议上敢于批错误东西、敢于顶的工农同志，五号报到。我们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要经过斗争考验，否则锻炼不出人。要求增加工资也算是“反潮流”？首先是阶级路线问题，不是个人问题，主席讲，个别事错了，在正确路线下也有，区别在能平反。革命者要在阶级斗争中锻炼，反潮流指反修正主义潮流，不是反马克思主义潮流。为什么（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条原则，不是马列主义者搞不成的，不讲马列主义不行、马列主义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总理报告引恩格斯的话，主席也讲马克思主义是在同反马克思斗争中发展起来，作马克思主义者，也是这样，工人农民成长，和此有关系，讲马列主义一条原则。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国务院、中央军委转发“上海城市民兵情况调查”的通知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调查组关于“上海城市民兵情况调查”，总结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上海城市民兵建设的新经验，现转发你们，望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进行研究，因地制宜地加强城市民兵建设。

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战时敌人攻击的主要目标，战争打起来，城市不能轻易放弃，有些城市要学斯大林格勒长期坚守。从上海的经验看，平时管理和改造城市，战时保卫和坚守城市，都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因此进一步加强城市民兵建设，着重武装工人阶级，建设一支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城市民兵队伍，加强城市的防卫能力，是非常必要的，应当十分重视。要积极组织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维护城市的革命秩序，充分发挥民兵的作用，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同时要在阶级斗争中锻炼民兵，加强民兵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不断提高民兵的战斗能力。要在普遍搞好民兵三落实的基础上，按现有的武器装备条件，大力组训民兵武装基干营、团，民兵高炮营、团，和其他必要的专业分队，并随着民兵武器的增加不断扩大和加强。战争打起来，依靠这一批民兵的战斗骨干队伍，带动广大民兵和群众配合部队保卫城市，坚守城市。

各级党委要发扬全党抓军事，党管武装的优良传统，仿效上海的办法，对民兵工作进行认真研究和落实，切实把城市民兵建设抓紧。

贰、本节简论

一九七三年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批林整风。

但是，一种倾向往往掩盖着另一种倾向。这时，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思潮又悄悄地兴起了。特别是在文艺、教育领域复辟的思潮比较突出。

这一年，邓小平复出，一方面有利于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另一方面又在一些人中助长了复旧思潮。

这一年，毛泽东提出评法批儒的问题，就是要肯定革新、反对复旧。

这一年，召开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进一步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特别是九大以来反对林彪反党集团的经验。

十大以后，毛泽东根据外交工作中的一系列错误（这些错误周恩来负有重要责任），在政治局内部召开一系列会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这一年底，毛泽东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同时也决定邓小平参加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

2012年5月22日修改

第九章第二节 继续批林整风

壹、 本节概述

一九七三年一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讨论山东省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问题。

一九七三年一月五日，杨得志等人关于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林彪反党集团的黑手伸向了山东。他们在《“571 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中，把“济南”列为“借用力量”。林彪死党吴法宪、李作鹏、江腾蛟、王飞、程洪珍以及林彪操纵的反革命别动队小“联合舰队”的其他一些骨干分子，先后窜来我省，与易耀彩(北海舰队原政委)、辛国治(北海舰队原副政委)、吴宗先(济南军区空军原司令员)、包玉清(十三航校原副校长)等，秘密勾结，互相串连，大搞反革命阴谋活动。他们大量秘密印发法西斯分子林立果的反革命“讲用报告”，林彪死党李作鹏还窜到青岛等地作反革命讲演，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大造反革命舆论。他们积极建立秘密的反革命组织，发展反革命势力，进行所谓“路线交底”，组织“左派骨干”，成立“战备机组”，收集情报，安设反革命黑据点、联络点，极力为反革命政变作准备。

省委、济南军区党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有严重错误，他们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站错了立场，支持了华北组反革命简报，而且迟迟不觉悟，对自己的错误和第十次路线斗争在山东存在的一些问题捂了盖子。省委、军区党委对批林整风运动的领导也是有错误的。对第十次路线斗争在山东地区反映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抓纲不突出，对批林整风运动未能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对毛主席、党中央关于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贯彻得很不认真、很不得力。致使我省的批林整风运动，发展很不深入。对林彪及其死党在山东地区的阴谋活动从组织上清查不力，没有成立清查小组，有些重要线索，没有发动群众，深挖细找，穷追到底，彻底查清。对林彪死党在山东地区散布的种种反革命谬论，批得不深不透，有的没有广泛发动群众痛加批判。对积极参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阴谋活动的易耀彩、辛国治、吴宗先等，没有发动全省军民彻底揭发批判。对

一些地方出现的反动的政治谣言，没有严肃对待，认真批驳和追查处理。对青岛批林整风会议的领导上，没有抓住第十次路线斗争这个纲，设有正确贯彻批林整风的方针，转移了斗争大方向。这次会议期间，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通过严肃的批评和耐心的帮助教育，省委、军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对所犯错误作了检讨，并表示决心改正错误。省委、军区党委在京其他常委也作了自我批评，表示要认真接受经验教训。

一九七三年一月五日，周恩来约霍士廉谈陕西问题。

一九七三年一月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继续讨论山东问题。

会议商定，王洪文赴浙江说服省委主要领导同志，要看运动主流，不要纠缠于历史旧帐，助长派性，放松批林整风的深入。

一九七三年一月七日，周恩来将政治局商定的意见报告毛泽东。

一九七三年一月七日，中共中央对山东省来京参加汇报会议的同志《关于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的批示

1973.01.07；中发 [1973]4 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共中央批示

中央同意山东省、青岛市来京参加汇报会议的二十四位同志《关于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

希望你们认真学习毛主席、党中央关于第十次路线斗争一系列重要文件，遵照毛主席“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等三项基本原则以及“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等重要指示，放手发动群众，有步骤地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彻底揭发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其散布的谬论和谣言，联系山东实际，查清林彪反党集团及其死党在山东地区进行的反革命阴谋活动，把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希望你们加强党的一元化的领导，牢牢掌握批林这个斗争大方向，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犯错误的同志，要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积极帮助他们认识和改正错误，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目的，努力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要支持和发扬无产阶级正气，克服歪风邪气。要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加强军民、军政和军队内部的团结，加强组织性纪律性。要以批林整风为纲，全面安排各项工作，落实党的政策，把山东地区的生产和战备切实搞好，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一九七三年一月九日，在毛泽东处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

研究浙江及其他省、自治区批林整风运动情况。

一九七三年一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讨论同意陕西省委负责人来京汇报批林整风运动情况。

一九七三年一月十八日，周恩来报告毛泽东，经毛泽东同意，政治局拟于二十日听取陕西来京负责人汇报。

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四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关于严防坏人进行诈骗活动的通知

1973. 01. 24；中发[1973]8号

毛主席批示：照发。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革命委员会，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

根据有关部门反映，最近一个时期，各地不断发生诈骗案件。有的私刻公章，伪造函件，冒充党、政、军干部或高干子弟，到处招摇撞骗；有的伪造中央文件，蒙骗群众，煽动一些人上访闹事；甚至有的模仿中央领导同志的声音、笔迹，冒充中央领导同志的秘书，用打电话、造假信、说假话等手法，进行诈骗活动。由于我们有的同志思想麻痹，敌情观念薄弱，有的单位办事制度不严，存在某些不正之风，使坏人钻了空子，在政治上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这类案件的发生，是当前阶级斗争的反映，林彪反党集团搞的那种歪风邪气，助长了这些招摇撞骗等不良行为的滋生和发展，对我高尚的社会风气和良好的革命秩序是一个严重的危害，必须引起各级党委的注意。现遵照中央的指示，特作如下通知：

一、各级党委要以批林整风为纲，抓住典型事例，教育干部和群众，提高革命警惕，严防坏人进行诈骗活动。在党委的领导下，公安部门要与群众相结合，抓紧对各种诈骗案件的侦破工作。对于查有实据的案犯，要依法惩处。

二、一切人事调动，财物发放，器材设备调拨，招收职工和征集新兵等，都要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坚决纠正私人介绍工作、“走后门”“拉关系”等不正之风。如有违犯要严肃处理。

三、中央领导同志和各地负责同志交办的事项，应按规定手续下达。电话传达时，要说明自己的单位、姓名、职务。有保密电话的，要用保密电话传达。各级领导机关的印章和介绍信，要严格执行使用制度，妥善保管。

四、对于上级机关打来的电话，或发来的信件等，如发现疑点，应该向有关部门进行核对。

五、严禁私自翻印、传抄中央文件。如发现伪造、传抄文件，要一面追查，一面上报。

以上各项，请研究执行。

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批转海军“四·五”会议的情况报告

1973.02.20； 中发 [1973] 10 号

一九七二年七月，为了贯彻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精神，海军党委召开四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四·五会议）。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海军的会议，纠缠着历史问题。在批林整风中，在历史问题的旧账上纠缠，容易走偏方向。中央政治局约肖、苏、王、吴同志开个会，解决一下。”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起，这个开了几个月的会议转向批海军司令肖劲光上了林彪“贼船”。后肖劲光写了几次检查。

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中央批转了这个“四·五会议”的情况报告。

说肖劲光上了“贼船”的罪证，大约有如下一些：

- 1) 1967，1968 年肖给林彪写信，检讨自己，表示效忠；
- 2) 九大前林彪找肖等海军五人谈话，肖同意全力支持林彪死党李作鹏在海军的领导；
- 3) 在九大选举政治局委员时，肖没有选江青等人；
- 4) 九届二中全会上在华北组的发言支持设国家主席和林彪；
- 5) 利用准备与台湾海军作战的“七九方案”搞“北兵南调”，准备策应林彪的在南方另立中央等等。

一九七三年某月，毛泽东关于要办好工农兵干部学习班指示

要办好工农兵干部的学习班，每期三个月，一年办四期，一面读书，一面参加工作。

一九七三年五月十八日，空军党委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情况报告

林彪反党集团在空军的罪行

第十次路线斗争，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林彪反党集团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其罪恶目的，就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分裂我们党，背叛“九大”路线，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这场斗争，在空军表现得非常尖锐、非常严重。林彪抓军队，首先抓空军，下了很大功夫。林彪和他的大小“舰队”进行了猖狂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妄图把空军变成他们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基本力量”和“可靠基地”，利用空军所谓“机动能力强”，“夺取全国政权”。

一、大树特树林彪一家的“绝对权威”

早在“九大”以前，吴法宪就在空军提出“忠于”林彪的口号，吹捧林彪“是当代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亲自给林彪写誓言，要“永生永世、世世代代”忠于林彪及其一家。吴法宪一伙利用一切机会，鼓吹林家父子是“天才”，叫嚷：

“无产阶级三个伟大领袖的三个助手”，林彪“最光辉”，“比恩格斯、斯大林高的多”等等。林立果是什么“群众最好的领袖”。“杰出的政治家”、“优秀的军事家”、“卓越的思想家”、“天才的理论家”、“出色的科学家”。他们还制造林彪同毛主席“不可分”的谬论，胡说：没有林彪的“捍卫”，“就没有毛主席”；“忠于林副主席，就是忠于毛主席”；“紧跟林立果，就是紧跟毛主席”。他们鼓吹“选择政治领导”，向林家“集中投资”，把“政治生命依附于林副主席一家”，要“一辈子都紧跟首长(林彪)、林副部长(林立果)”。为建立林家封建法西斯王朝大造反革命舆论。

二、拉山头，结死党，秘密建立法西斯特务组织

长期以来，林彪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在空军搞阴谋，搞什么“打内堂”(即到林彪那里“摸底”、“咬耳朵”)、立“标兵”，安插吴法宪当空军司令，派子女来空军“保权”。他采取打进来、拉出去的手段，篡夺空军党委领导权，八个常委中有吴法宪、王秉璋、刘锦平三个死党。曾国华问题严重，正在隔离审查。王辉球、曹里怀、邝任农三同志上了贼船。他们私设常委办公会，把不是党委常委的江腾蛟、王飞、陈绥圻等塞进去，控制了空军领导核心。“小舰队”的林立果、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刘世英、朱铁铮、程洪珍等人把持空军党委办公室，直接发号施令，使“党办”成了林彪直接指挥的“特殊权力机构”和“小舰队”的“大本营”。林彪、吴法宪一伙控制一些机关和单位，发展法西斯特务组织，建立“安全的基地，可靠的基地，信任的基地，放心的基地”，为发动反革命政变作组织准备。

三、“九大”期间，大搞反党分裂活动

“九大”期间，在林彪策划下，黄永胜、吴法宪、叶群窜到空军组搞阴谋活动。选举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时，吴法宪亲自向空军组布置对黄、吴、叶、李、邱等人投全票；对一些中央同志投半票；对另一些中央同志不投票。妄图排挤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志，篡夺中央领导大权。“九大”闭幕后，吴法宪召集王秉璋、曾国华以及王辉球、曹里怀、邝任农同志开黑会，说他们当上中央委员是林彪的“最大关怀”和“信任”，曹里怀同志当上中央委员是叶群“讲了话的”。他们都感恩戴德，表示要忠于林彪，支持吴法宪。

四、抛出“两个一切”，向毛主席、党中央夺权

九届二中全会前夕，经过林彪、吴法宪等人的策划，在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上，抛出了“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公然向毛主席、党中央夺权。到会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成员一致拥护，并分别在司、政、后、民航、三机部、六院积极推行。王辉球同志主持政治部党委制定了反动的“五条措施”，提出：“一切重大问题”，“都要及时地主动向立果同志请示报告”；要“时时想到他，事事请教他，处处保卫他”；“老老实实地服从他的调动，服服贴贴地听从他的指挥”；要把“服从他的领导，执行他的指示，提高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按照“两个一切”，林立果成了空军的太上皇。

五、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山上山下紧密配合，猖狂向党进攻

山上，吴法宪在林彪的指挥下，找空军与会的某些中央委员“交底”，策动他们向党进攻，要他们“坚持设国家主席”，坚持“天才”观点，并指名道姓地恶毒攻击中央负责同志。林彪抛出反革命政变动员令后，吴法宪上窜下跳，煽风点火，充当反党的急先锋。王秉璋、王维国、陈励耘、曾国华等纷纷出动，紧密配合。王辉球同志在东北组发言，攻击中央负责同志，叫嚷：要“揪出来示众，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支持反革命的六号简报。邝任农同志在华北组用流氓语言叫嚷：“一定要揪出来斗倒斗臭，千刀万剐。”曹里怀同志在西北组发言拥护林彪的反党讲话，说什么“会议的方向、指导思想”，反对毛主席规定的会议方针。阴谋败露后，吴法宪又找王秉璋、曾国华及王辉球、邝任农、曹里怀同志订攻守同盟，对抗毛主席、党中央。

山下，在空军“三代会”上把法西斯分子林立果捧为“超天才”也达到了高潮。经过精心策划，抛出了由林彪、叶群亲自指挥炮制的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讲用报告”。这个黑“报告”鼓吹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对唯物论的反映论；鼓吹“唯生产力论”，反对党的基本路线，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鼓吹“空军制胜”的唯武器论，反对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借着所谓“要强盛”的幌子，鼓吹大国霸权主义，卖国主义。黑“报告”出笼后，林彪死党鼓噪而起，吴法宪立即大叫“放了一颗政治卫星”。王、曹、邝、梁四同志也带头吹捧。在会内会外刮起吹捧林立果的反革命妖风。大吹林立果的黑“讲用报告”是什么“第二个《共产党宣言》”、“第四个里程碑”，林立果是什么“伟大的天才、

全才、全局之才”、“第三代接班人”、“无产阶级之首”、“七十年代红太阳”、“黑夜的明灯”、“宇宙的巨星”。

在此期间，江腾蛟组织炮制四篇反党文章，狂热吹捧林彪，叫嚣：“林副主席，决定了我们党的性质，决定了无产阶级的命运，决定了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决定了人类的彻底解放”，“必须忠于林副主席”，要把“保卫林副主席的接班人地位”，“作为高于一切的革命大节，毕生的战斗使命”。紧密配合林彪的反革命政变阴谋。

六、炮制《“571 工程”纪要》，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九届二中全会后，吴法宪一伙极力封锁毛主席的指示，蒙蔽群众，欺骗中央，对抗和破坏批陈整风。

在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前夕，林彪、叶群指使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陈励耘等，炮制了反革命政变纲领《“571 工程”纪要》。林立果召集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开所谓“三国四方”会议，进一步策划了反革命政变的准备和分工。林彪死党按照《“571 工程”纪要》，加紧进行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准备。

大造反革命武装政变的舆论，利用推广所谓“安全经验”，发动“夏季攻势”，再次刮起吹捧林立果的妖风。他们大搞“路线交底”，疯狂叫嚣：当前“是决战的形势，摊牌的形势”，要“采取一种非常的手段”，“文斗不能解决问题，武斗才能解决问题”，给林彪“制造一个上台的条件”，“先下手为强”，“强行接班！”

发展反革命政变组织——小“联合舰队”、“分舰队”，建立反革命秘密据点和通信网，秘密组织反革命政变的武装力量“教导队”，研制和进口大批特工器材，窃取重要情报和核心机密。大搞到各地的反革命串连，网罗党羽，扩充反革命势力。

策动“北兵南调”。一九七一年八月，黄永胜、吴法宪、阎仲川指使梁璞同志，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借东南沿海战备之名，炮制“八·二六”作战预案。他们还指使一些单位造枪改炮，改装飞机。大搞空军“陆战”训练。掌握空运、空降。阴谋加强其反革命“根据地”建设。

林彪死党策划召开的“安全经验”现场会、策动“北兵南调”、大搞空军“陆战”训练、窃取器材经费等反革命阴谋活动中，有许多是王辉球、邝任农、梁璞、曹里怀等同志积极参与的，是负有严重责任的。

经过一系列反革命准备，林彪直接指挥他的死党，在空军具体策划两项反革命阴谋，“破釜沉舟”，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攻打钓鱼台，谋害中央政治局负责同志；私调飞机，南逃另立中央。阴谋破产后，林彪仓惶逃命，狼狈投敌，自取灭亡，成了可耻的叛徒、卖国贼。

一九七三年六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对《空军党委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情况报告》批示

1973.06.16；中发 [1973]22 号

毛主席已圈阅。

中共中央批示

空军党委并各大军区党委：

中央同意《空军党委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情况报告》。中央认为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弄清了路线，改组了空军领导班子，它对深入批林整风，加强空军建设将起重大作用。

空军广大指战员是忠于党、忠于人民，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死心塌地跟着林彪搞反革命阴谋的只是吴法宪等一小撮死党。林彪反党集团妄图把空军作为反革命政变的“基本力量”完全是痴心妄想。“九·一三”后空军广大指战员坚决贯彻执行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一系列指示，积极投入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批林整风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形势很好。希望你们认真贯彻这次会议的精神，遵照毛主席“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的指示，继续把批林整风这个头等大事抓紧抓好。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揭发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其散布的种种谬论和谣言，查清林彪及其大小“舰队”在空军的反革命阴谋活动，把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在批林整风中，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对犯错误的同志，要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积极帮助他们认识和改正错误，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目的。

中央希望你们认真汲取第十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增强党的观念，加强党的领导，发扬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纠正不正之风。要以批林整风为纲，搞好战备、训练和各项工作，消除林彪反党集团破坏空军建设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团结起来，为“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保卫祖国，准备战胜侵略者”而奋斗！

一九七三年三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四届五次扩大会议绝密材料——林彪死党刘锦平的反革命罪行汇集（民航系统揭发的材料，初稿）

一九七三年四月八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四届五次扩大会议绝密材料——林彪反革命别动队头目法西斯分子林立果的主要罪行材料汇集（初稿）

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七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四届五次扩大会议绝密材料——林彪死党王飞主要罪行材料汇集（初稿）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对叶飞来信的批语

纪、汪酌处，此人似可解放，分配工作。

一九七三年七月十日，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反党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的阴谋败露后，林彪带着叶群、林立果和几个死党，私乘飞机，叛党叛国，仓惶逃命，投奔苏修。他们所乘外逃的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林彪、叶群等成为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

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以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声讨了林彪，揭发批判了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开展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批林整风运动。经过广大群众的揭发和中央专案组的调整研究，查获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大量罪证。中央专案组编印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之二、之三，说明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经过。这些材料揭穿了林彪的伪装和欺骗，彻底揭露了林彪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事实真相。这些材料提供了林彪反党集团密谋发动反革命政变，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确凿证据。它足以证明，林彪是长期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林彪反党集团是一个叛党叛国的反革命阴谋集团。

一

中央专案组根据调查核实的物证、人证，现已查明：

（一）早在“九大”前后，林彪就招降纳叛，结党营私，伙同他的老婆叶群，勾结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结成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他还通过他的儿子林立果，秘密建立反革命特务组织小“联合舰队”。林彪反党集团是国内地、富、反、坏、右和国际帝、修、反的代理人。它的骨干分子，是一小撮混入党内的叛徒、特务、托派分子，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新的反革命分子和右派分子。他们密谋发动反革命政变，妄图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二）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反党集团向党发动的突然袭击，是有预谋的。在林彪的直接指挥下，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在会前和会中多次秘密开会，多方串连，阴谋策划，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地向党进攻。从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林彪发表反党讲话，到八月二十五日上午林彪、陈伯达指使李雪峰炮制的反革命六号简报出笼，他们专了两天半的政。他们的反党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唯心主义的“天才论”，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向毛主席、党中央夺权。它的性质，是一次被粉碎了的反革命政变。

（三）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彪反党集团立即秘密进行反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准备。他们炮制了《“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并从政治、军事、组织、情报等各方面加紧进行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活动。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林彪下达了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手令。九月十日，林彪给黄永胜一封亲笔密信。在林彪的直接指挥下，林彪死党用穷凶极恶的手段，妄图乘毛主席外出巡视的机会，在外地谋害毛主席，并策划于同一时间，在北京谋害中央领导同志。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林彪又通过吴法宪私调飞机，要与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一道，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妄想造成所谓“南北朝”的局面。林彪还企图勾结苏修，对我实行南北夹击。他们的种种阴谋，都遭到彻底的破产。

（四）林彪叛党叛国是有其历史根源的。林彪出身于大地主兼资本家家庭，入党以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早在土地革命初期，林彪对中国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林彪追随王明“左”倾机会主义

路线，竭力宣扬“短促突击”。遵义会议以后，在毛主席指挥红军从挫折走向胜利的紧急关头，林彪伙同彭德怀要夺毛主席的权。红军到达陕北之初，林彪蛮横地一再坚持要脱离红军主力部队，独自到陕南去“打游击”，向党闹独立性。在抗日战争时期，林彪发表反党文章，无耻吹捧蒋介石和国民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中，林彪一再抗拒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和战略部署。林彪伙同刘少奇反对毛主席抗美援朝的英明决策，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林彪是高饶反党联盟的幕后策划者。在六十年代初我国遭受严重自然灾害，赫鲁晓夫叛徒集团掀起反华逆流的时候，林彪反对党的总路线，要搞“包产到户”，反对我党揭露和批判苏修，要跟苏修妥协。林彪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期间，培植亲信，打击陷害革命干部，竭力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他提出“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等反党乱军的口号，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妄图篡夺毛主席的统帅地位，炮制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不能指挥军队的谬论，狂妄地提出军队要由他“直接指挥”。他反对毛主席提出的“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的原则，要从根本上篡改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毛主席、党中央对林彪历史上所犯的错误，一贯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就是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仍然对他进行了仁至义尽的教育和挽救，给他以悔过自新的机会。但是，林彪对党一直玩弄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阳奉阴违，口是心非，欺骗党，欺骗人民，最后终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

二

林彪反党集团的出现，是国内外激烈阶级斗争的尖锐表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场大革命，首先取得了粉碎刘少奇叛徒集团的伟大胜利。但是，阶级敌人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还要作垂死的挣扎。帝国主义特别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时时刻刻都在企图颠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在这样的形势下，林彪反党集团作为国内外阶级敌人的代表，迫不及待地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妄图把毛主席领导下我党我军我国人民亲手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再扶植起来。在国内，他们

要联合地、富、反、坏、右，实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在国际，他们要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联合帝、修、反，反华反共反革命。

但是，这不过是林彪及其一小撮死党的痴心妄想。他们表面上极端狂妄，本质上极端虚弱。他们的阴谋，是见不得人的。因而成不了什么气候，无碍大局。他们的失败，是必然的，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党是久经考验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取得了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伟大胜利。这是对国内外阶级敌人最沉重的打击，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三

鉴于林彪反党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叛党叛国，罪大恶极，中央专案组建议党中央：

（一）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的党籍。

（二）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三）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特务、叛徒、卖国贼叶群的党籍。

（四）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雪峰

的党籍，撤销他们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五）对参与林彪反革命政变的其他骨干分子，由有关部门负责审查，按照党的政策，区别情况，提出处理意见，报中央审批。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批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

1973. 08. 20；中发 [1973] 34 号

中共中央决议

中共中央一致通过并批准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日

一九七三年八月四日，毛泽东对郭化若来信的批语

总理、剑英同志：

请考虑可否给郭化若分配工作。并希将孙子序言改版，写一篇批判吸收性的序言。
此信并请告郭。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毛泽东对罗瑞卿来信的批语

似可释放。请中央酌定。

贰、本节简论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批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永远开除林彪、陈伯达、叶群、黄永盛、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雪峰の党籍。

后来在邓小平手上为李雪峰平了反。

当时，为什么把李雪峰的问题看得那么严重？根据主要是两条：一条是陈伯达在华北进行了许多活动，都与李雪峰有关系；二是九届二中全会上，华北组的简报应该归李雪峰负责。从具体情节上说，李雪峰可以推脱责任。从政治责任上说，李雪峰确实是逃不过的。更重要的是李雪峰一贯的政治立场和态度，文化大革命前，他是紧跟刘少奇的；文化大革命中，他执行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文化大革命后，他追随邓小平，反对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2009年12月7日初稿

2012年5月4日修改

第九章第三节 邓小平复出

壹、本节概述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

我这次犯这样严重的路线错误，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有思想的根源，也有作风的根源。在思想方面，最根本的一条是，长期以来，不但没有高举，简直可以说没有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按理说，我的工作岗位是接近毛主席的，可以经常地知道毛主席的教诲和指示，但我却对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差，宣传最少，用得也最不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灵魂，掌握毛泽东思想多少，是鉴别我们究竟有多少马列主义、多少无产阶级思想的标准。不进则退，既然学得很差，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就会多起来，就必然在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上，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一直发展到这次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这是必然的。回想起来，这些年来，我的思想和工作，都是退步的，由于学习不力，没有跟好主席思想，犯了不少错误。我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是做得很不好，书记处直接管辖的中央各部门，问题也最多。在对待阶级斗争问题上，在对待党内斗争问题上，我的思想是偏右的。在毛主席炮轰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所说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倾错误，我是有份的，对于一九六四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我虽然有些不同的意见，但也不是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不是完全站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方面的。至于一九六二年以前，还有不少错误，应该利用这次机会，严肃地加以检讨和清理。没有跟好主席，学习毛泽东思想很差，是与我的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作风，密切相连。长期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下去的少，同群众接触少，同干部接触少，同负责同志之间接触也少，对待工作不够勤谨，没有认真地向群众做过调查研究，日常解决问题的方法又很简单，有时还很生硬，这就只能把自己置于非常闭塞的地位，发展了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这样，在我的思想和工作中，不可避免得常常犯严重的错误，常常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然要发展到同毛泽东思想相抵触的地步。而我自己，又长期不自觉，产生并发展了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的情绪，结果处理事情往往不够认真，向同志、向群众请教很少，特别是向主席的请示报告很少，这不但是错误的重要原因，在组织

纪律上也是不容许的。一九六四年底，毛主席曾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这个严肃的批评，对我有所震动，但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自己，并没有找到病根所在，我的错误思想和错误作风，没有得到改正，这次犯路线错误当然是不可避免的，这次不犯以后也必然要犯的。总之，我的思想和作风，同毛泽东思想是格格不入的。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没有紧跟毛主席，这就严重地脱离了领导，加之又严重地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完全暴露了我这个人，不是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完全不适合担任重要领导工作的。这次犯路线错误，是一次自我大暴露，证明我是一个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是一个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的人，是一个没有过好社会主义关的人。现在初步用镜子照照自己，真是不寒而栗。以我现在的思想作风和政治水平，担任中央领导工作，对党对人民的事业是不利的，我自己应该深刻反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努力改造，努力改正错误，保持晚节力求做一点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情，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有这样的信心，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在一个相当时间内，错误是会得到改正的。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自己跌了跤子，应该自己努力站起来。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同志作为主席的助手和接班人，并且选拔了一些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同志到中央的主要岗位上来，这是非常必要、非常重要的措施，对我国对世界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我衷心地表示拥护。林彪同志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正是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正是他把毛泽东思想举得最高，学得最好，用得最活，正是他善于吃透两头，对重大问题即时向主席请示报告，既最了解主席的思想和意图，也最了解群众和下面的情况，所以他的思想水平和领导水平很高，成为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他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对于我这样犯错误的人，应该老老实实地向林彪同志学习，学习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学习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是我改正错误，力求做一点对党对人民有益工作的唯一可靠的途径。

我的上述检讨，当然只是初步的，不深刻的，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批评和指正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日至七月五日，邓小平向中央写了《我的自述》，全文约三万言。他在这个材料中，比较全面地叙述了他的政治历史和工作经历，检查了他的错误：

一九六七年十月九日，毛泽东对陈伯达、江青关于选编《刘少奇言论》报告的批示中指出：“《说明》中，不提邓小平。是否妥当，请酌定。”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五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九大和整党问题时指出：“邓小平要批，请军委准备一篇文章。我的意见还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怎样把刘、邓拆开来。”

一九七二年五月，周恩来被确诊患有膀胱癌，仍继续主持极为繁重的中央日常工作，但他的健康状况已趋恶化。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摘录）：

主席：

前天，（八月一日）我第四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听了关于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关于陈伯达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份子的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显照出来，特别是如果不是主席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及时地查觉出他们的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言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

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主席知道，林彪、陈伯达对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了。

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热情地庆祝在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摧毁了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然也犯过一些个别的错误。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书记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〇、六一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我犯的错误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

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

主席万寿无疆！

邓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这封信是邓小平委托江青递交毛泽东的）

在这封信中，邓小平不仅表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而且，再一次肯定了对自己过去所犯错误的检讨。并且表示“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在邓小平的信上，作了批示：“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捱整的，即邓、毛、谢、古（注）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

（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周恩来致信中央政治局分管干部审查工作的纪登奎、汪东兴：邓小平同志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同一天，周恩来又约纪、汪两人谈话。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纪登奎、汪东兴就安排邓小平、谭震林工作问题向周恩来报告，建议邓小平回京后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

周恩来看后表示：谭震林安排工作的事可先办，邓小平的工作待请示主席后再定。

一九七三年二月，在江西居住了三年多的邓小平接到中央要他回京的通知。

一九七三年年三月九日，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明自己大量便血情况，已经毛泽东同意，请假两周，到玉泉山检查身体。

这期间政治局会议和报告由叶剑英主持和签署，军委事情由叶剑英处理。

一九七三年三月九日，周恩来将草拟的《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送审稿)》报送给毛泽东，并在送审稿上写道：“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问题，政治局会议几次讨论过，并在主席处开会时报告过。现在小平同志已回北京。为在全国树立这样一位高级标兵，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

同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

周恩来立刻将批件和附件送给邓小平，征求他本人意见。

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毛泽东的批示和邓小平的问题，一致认为：毛主席的批示，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总是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全面地、历史地评价他们的功过，认真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邓小平同志从全国解放以来，特别是在他担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期间，所犯的 error 是严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邓小平同志的揭发批判是正确的，必要的。经过毛主席、党中央的耐心教育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对自己的错误作了认真的检查。有了悔改的表现。我们对他的进步应当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希望他在实践中继续改正自己的错误。遵照毛主席批示的精神，

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恢复他的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由国务院分配他担任适当工作。

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商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一九七三年四月三日，中共中央关于中发 [1973] 14 号文件传达范围的通知
1973.04.03； 中发 [1973] 16 号

一，中发 [1973] 14 号文件是按县团级文件发的，可以口头传达全文到党员干部和非党员干部。并进行讨论。

二、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不包括邓小平同志的信和《我的自述》（摘录）两个附件]，可以口头传达到党内外群众，并加解释。

三，对爱国人士，由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负责人，按照本通知第二条规定，向他们作传达、解释。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委员。

贰、本节简论

重新启用邓小平

当时为什么要启用邓小平？

第一，邓小平与刘少奇确实有区别。邓小平在历史上至少不存在叛变问题。

第二，邓小平明确表示承认错误、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永不翻案。这是政治前提，没有这一条根本不可能考虑让他重新出来工作。中央下发的关于邓小平

任职的通知，特别附有邓小平同志的信（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以及邓小平的《我的自述》，就说明这一点。

第三，经过文化大革命风浪的领导干部，究竟发生了那些变化，还需要放到实践中去继续考验。对邓小平的重新任用也同样包含这层用意。

第四，周恩来已经查出身患癌症，急需有人来顶替他的工作。

有人认为，当时党中央和毛泽东重新任用邓小平是犯了一个大错误。根据事后情况的变化作出这样的推断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可能预测到以后的情况变化。

对邓小平的任用有一个过程：

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一九七三年八月，邓小平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代表大会，并当选了中央委员，但并没有选入政治局。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决定邓小平为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同时，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后来毛泽东说是总参谋长）。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应该如何评价？是对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和悔改，还是“逃过文化大革命这一关”的策略？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日至七月五日，邓小平向中央写了《我的自述》，对十七年工作作了全面的检讨，并且表示“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他的这个检讨和保证应该如何评价？是真诚的悔改，还是过关的策略？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五日，毛泽东提出：“邓小平要批。我的意见还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怎样把刘、邓拆开来。”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在这封信中，邓小平不仅表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而且，再一次肯定

了对自己过去所犯错误的检讨。并且表示“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这是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政治前提。对于邓小平的这个“欢呼”、“保证”应该如何评价？是真诚的拥护，还是上台的策略？

有人认为：“为了大局，为了实现自己的想法，邓小平也可以作一点违心的检讨”。（摘自权延赤著《毛泽东和周恩来》）

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在邓小平的信上，作了批示。这说明，毛泽东当时对邓小平的“检讨”、“欢呼”、“保证”，相信他是出自真诚的。相信的理由除了批示中说的四点，还有一点，就是邓小平对过去的错误作了“检讨”，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表示“欢呼”，对出来工作以后的立场提出了“保证”。再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邓小平的这些检讨、欢呼、保证，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还可以在在实践中进一步检验嘛！

周恩来当时也是相信邓小平的。他可能更多地认为邓小平本来就是执行党的正确路线的。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在邓小平来信上作出长篇批示以后，周恩来立刻抓紧连续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

江青恐怕是半信半疑。说她是半信，因为邓小平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给毛泽东的这封信，就是邓小平委托江青递交毛泽东的。说她是半疑，因为从毛泽东的批示到作出恢复邓小平的职务的决定，拖延几个月的时间，与她以及政治局的其他几个人犹豫不决有关系。他们只想让邓小平“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

据张玉凤回忆：邓小平当年复出，毛主席是迟疑不决的，问了叶剑英、李先念，他们很赞成；问了汪东兴、江青、张春桥，他们很反对；问了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他们都表示：「主席定论」。主席就召见江青、张春桥、华国锋、陈锡联、汪东兴，说：「总理病不轻，我很着急，他催得我好紧。我不至立即去见马克思，谅他（指邓小平）不敢翻案。今天就定论：请第二号走资派出来，不要太固执。春桥出来主持工作，老师、将军不会服，今天在座的也不会服，你（指江青）也不会真服。」（《张玉凤揭毛泽东晚年秘密材料》阿波罗新闻网 2007-03-04）她的这种说法可能符合当时的真实情况。

从以后的历史来看，邓小平在靠边站的几年中，思想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甚至可以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是，他当时公开说的或写的，没有人能够否定；他当时没有公开说的或写的，没有人能够肯定。

据《秦城冷月》记载：

一九七四年二月以后，“他看到有关《三上桃峰》的材料后，冷冷地对前来看他的胡耀邦说：我看呀，江青本身就很空虚，一有点情况就担心别人为刘少奇翻案。我看他自己也觉得刘少奇的案子不扎实，为什么光担心人家翻案？要是你心中没鬼，还怕人家说什么呢？这里的问题很能说清楚问题的实质。”

“邓小平很感动地对谢振华说：老谢，你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敢于讲真话，支持正义，令我非常感动，但是现在还不到把盖子揭开的时候，人家就是要整一些同志的，就是没有这出戏，也会找出另外的问题来的。江青这个人太放肆了！完全是为所欲为，丝毫不受党纪国法的半点约束。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哇。我们国家要是再这样下去，党的优良传统就会彻底地丧送在这些人手里。人妖颠倒、是非混淆。”

（下册第 249 页）

他的这些私下议论，知道的人肯定很少。

2009 年 5 月初稿

2012 年 5 月 4 日修改

第九章第四节 继续搞好文艺革命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三年一月一日，中央首长在电影戏剧音乐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

周恩来讲话：

电影不只是故事片，还有科教片。但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的要求来说，太少了，这是我们的缺陷。

青年人喜欢新的东西，我们要拿革命的新东西给他们。总结七年来这方面的工作，还是薄弱的，文化组要把电影工作大抓一下。

（江青插话说：不是七年，是解放以来，二十几年电影的成绩很少，放毒很多，取得经验太少，很糟。）

教学片也要搞一点，推动教育革命。

文化组要把一些项目接过去，出版、图博你们还得接受呀，要拖到七五年吗？一年接一点嘛。

要迎头赶上。进口以后再学嘛。

群众提意见，说电影太少，这是对的。这是我们的缺陷。

（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二年七年内没有拍摄一部故事片，希望三年内填补空白。）

你们有什么要求，通过文化组提出，中央批准，党和国家就帮助。

李先念讲话：

电影工业会议正在开，我听了一次汇报，有了几期简报。保定厂的生产形势还好，质量不稳定，还有些问题，比以前听到的消息好些。

（张春桥插话说：不一定。我了解了一下，好多单位一块搞，比较复杂，电影工业包括化工等等，好多单位现在没有人统一管。邱会作插手了，破坏得相当厉害。单打一，把这门搞得水平很高，很困难。）

其它上不去，它也上不去。

叶剑英讲话：

我们不要延续人家的东西，要创新。现在供不应求，要质量，也要数量。

我们的片子不够，就要增加生产。

你们是：“八一”厂的吧，要配合军队搞一些教学片，什么地道战、地雷战、打坦克的、防原子的。

江青讲话：

我抛砖引玉，你们思考。我应作自我批评，整了你们多少年了。批评也可以说是爱护。每一次批得时候多，批得有的人混身疼。我可能有说过的，说错的，请同志们原谅，当然也要指出：批评对的，你们就要照着做。我还有一点要自我批评的，就是很久不见你们了，当然我也可以推卸，很忙，可是总理比我忙得多。我好久不见你们，该作自我批评。

我觉得电影工业是很重要的，是综合的工业，应该很好抓上去。电影在我国有很大的发展前途。因为我们的电视不发展。资本主义国家，修字号国家电视很多。电影才有五十年的历史，有的国家已经开始衰亡了。美国的好莱坞已经成了游览的地方。我们上山下乡的十六毫米影片还很少，八·七五还没过关，彩色印染法还没有过关。我们黑白底片原来过关了，但遭到了破坏。我们应该攻坚。今年如果印染法能够拿下来，就可以大批生产出口，就很了不起。你们现在用的胶片，是伊斯曼，是先进的，这几个样板戏，光、色、构图有缺点错误的话，同志们要负责。当然我也有责任，批你们批得不够。有几个厂分散在各地。我不可能到各厂去，大家聚拢来谈一谈，我抓了一下北京的。我还抓了电视，用电视促你们的。我是不看电视的，偶尔看了一次，还不错。电视我是批过的，后来上去了，我们又表扬了他们一下。我就请了些同志看电视，看了不少次。为什么《智取威虎山》影片那么久出不来？那么为难，拍不出来。学费交得太多了。

当然总的说，六四年会演以来，工农兵在我们国家是占领了舞台、银幕，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赶下去了。但是太少了，同志们有责任，我们也有责任。有几个现成的，因为没有精力抓，也走了弯路。

你们批林整风学习也不够，批林整风要掌握武器，你们第一是受刘少奇的毒害，接着又是林彪。他们可不得了，要整死人的，为了一个八一厂，今天欢迎我们了，明天又赶我们走，叫演员吃冷饭，把嗓子都搞坏了。查查军委办事组的材料有一口袋。这几条汉子真可恶啊！现成的不给用。棚也不借给，搞得我们只好借地方。搞得我们好苦噢。我要问一下北影的新建厂建成了没有？（狄答：主要工程都完了。）

在我们这条战线上斗争是很激烈的，要揭要批。他们要破坏一个戏，使用种种手段。六九年冬天他们千方百计整我们，我被他们整得什么也吃不下去，突然耳朵都聋了。差点把我整疯了。没有被他们整疯就了不起。十次路线斗争很尖锐，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取得这成绩，还能站住，还能前进，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七三年怎么上阵呢？首先是洗脸、洗澡。洗脸洗澡的先决条件是剥画皮，批判揭发林彪反党集团在各条战线上的罪行。我建议你们不要散，用一个星期到十天，首先是批林，其次是整风，不要搞倒了，先不要联系自己。你们是有成绩的，不要翘尾巴。才作了一点成绩，人民给我们的荣誉太高了，不要把尾巴翘上天。要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小心谨慎地为人民服务，要深入到工农兵当中去，真正向工农兵学习。还要鼓鼓气，大有潜力，我们已经走出一条路了，要继续干。现在我们的党和人民支持我们嘛，就靠我们干。怎么干？要揭林、批林，然后每一个戏，每一个团搞一点总结。

张春桥讲话：

七三年的第一天，政治局的头一个会，就是讨论电影。

从接见到交流，这说明我们党根据毛主席一贯的教导，对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文艺是很重视的。你看大年初一就开这么个会，用不着多说，这个行动本身就很说明问题。

现在全国形势很好。各方面对文艺的要求很迫切，要求多搞一些。说少的绝大多数都是出自内心的要求，希望多搞一些。当然也不排除少数别有用心的人。要分清两类矛盾。广大人民的要求，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要求，要我们多搞一些。能不能改变这个状况？现在条件比过去好多了。

建国以前就不说了，新中国二十几年来，文艺战线斗争是很尖锐的。许多大的斗争都是从文艺领域开始的。

从《武训传》到《清宫秘史》都是毛主席提出来要批判的。《武训传》是批了，《清宫秘史》没有批起来。刘少奇在阻挠，因为他认为是爱国主义的。

后来林彪集团又破坏，斗争很尖锐。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斗争，现在领导机关发生了变化，阻力小了。积累了一些干部，有了一个队伍，没有这个队伍是不行的。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有根据主席讲话进行实践的经验，也有受到刘少奇错误路线破坏的经验。尽管这个队伍内部还有一些问题，但总是有些经验的吧。只是

正面经验少了些。问题是我们现在的队伍还不那么大，正在滚雪球。刚才叶帅说过去有几万人，过去不是有几万，是有几十万。现在有些人还在下边，下乡下厂，和工农结合，将来他们还是能搞出一些东西来。

你们现在搞了一个综合性的总结，我看粗了一些。还是一部戏一部戏的总结，不但要总结成功的，也要总结失败的。因为是付了学费的，如不好好总结，学费就白花了。刚才讲了批林问题，练功问题，我再补充一点，就是对总结经验，我们重视还不够。包括戏剧团体。

过去一提就是洋人，什么斯坦尼体系。连梅兰芳还写了几本书。资产阶级还是总结了一些经验的。所谓体系，就是他们经验的总结。但是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跟我们是根本不同的。所以不能照搬，照搬就会犯错误。我们不善于总结经验。我希望从领导也好，从创作同志也好，每一个人都要用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好好总结，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不善于总结经验，提高得就慢，要把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总结经验当作一件重要问题来抓。你们总结了一下，还不够，还可以继续总结。

有的厂不在北京，回去也要向省委汇报，告诉他们七三年元旦中央政治局开了这样一个会，希望各省委、自治区党委也要重视。有的也重视，但不经常，不知道怎么抓。抓也不一定抓得很对。他们也要好好总结领导的经验。

姚文元讲话：

首先祝贺同志们已在取得的成绩的基础上，总结经验，继续前进，争取更大的胜利。刚才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谈得很多了，我补充一点，就是学习。

革命的文艺工作者要自觉地学习，读马列主义的书，读毛主席的书，还要深入生活，向工农兵学习。还有文艺工作者本身的专业知识也要学习。基本功要好好磨练，尽可能把武器磨得更好一些，毛主席说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我们要把这个武器搞得更精一些。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有许多关于文艺方面的指示、批示，我们应该好好学，要反复看，反复学。在批林整风中，要着重批林，包括批刘少奇，要批得好，批得深，批得透，要掌握好毛主席的文艺思想、革命路线。刘少奇、林彪都是破坏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今后创作更繁荣，就是要学习毛主席的思想、革命路线。关键在于实践，江青同志不是说嘛，我们现在的这些成绩都是实践毛主席革命文艺

路线的结果。总结经验要总结得好，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把感性的上升到理性，也要学习，学习主席文艺理论，这样才能总结得好，总结出比较符合客观实际，水平比较高的，指导意义比较大的经验来。在新年的时候，我愿意和同志们一起学习，继续改造自己世界观，改造旧思想，彻底同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旧思想决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现有基础上争取更大的胜利。

一九七三年一月四日，中共中央关于一切参观场所不要要求观众题词、留言和提赞扬意见的通知

毛主席最近指示，所有各地参观场所，不要请中外参观者题词、留言和提赞扬的意见。毛主席这个指示非常重要，各地方、各部队、各部门在国内外举办的纪念馆、博物馆、展览会以及一切参观场所，都要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毛主席指示的主要精神，就是要我们努力做到实事求是，谦虚谨慎，不要把自己意见强加于人。这些参观场所都不要请人题词，一般都不设留言簿，以免强人所难地写些奉承的话，甚至是违心的话。在参观时，更不要当场请人家提意见，使人家不好不说几句赞扬的话。如果参观者当场或事后对展览的内容、方式和人员服务的态度，主动地向我们提意见，甚至是批评的意见，除非是恶意攻击必须予以回驳者外，一般应表示欢迎。

一九七三年一月十四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对文艺工作者的讲话

周恩来讲：现在开计划会议，计划会议给电影工业要加劲。进点口，作参考，但自力更生为主。进点口作参考，这才能超过。但不要寄希望于进口，要自力更生。上海、北京电影工业要协作，参考外国的东西，以便超过，一年不行，三年嘛，到一九七五年超过嘛。

李先念讲话：

电影工业很复杂，是综合性的，是个重要部门。现在开了会，希望同志们搞上去，要有个志气，要迎头赶上。卫星都上天了，三座大山都打倒了。钢都超过两千万吨，主席讲了，我们还不是搞上去了。这个我们为什么上不去？现在好一些了。我们要很好做工作，还有派性。

江青讲话：

我们中国人要有志气，我们不搞大国沙文主义，不称霸，但是在电影工业上，我们要迎头赶上，不做爬行的奴隶。我向你们呼吁，要彻底批林，彻底揭发大汉奸、大叛徒、大卖国贼林彪的罪行。只有把林彪的罪行批深批透批臭，你们才能提高觉悟，擦亮眼睛，攻克科学尖端。

只有批林才能团结起来。首先批林。

这是用艺术手段宣传毛泽东思想，不然就是强加于人。

用艺术手段宣传毛泽东思想，干巴巴地老是万岁万岁，人家最讨厌。

张春桥讲话：

电影工业不仅是电影工业问题。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人造卫星上天了，全国都欢呼。如果我们再往前想一想，在卫星上拍照，那个照相机要求就得高了，胶片也就要求更高了。我举这两个例子就说明问题，不仅地面上的要求，也是天上的要求。我们要赶超，要有远大目标，要把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都赶超过去。

轻工业部门有多少万种，头发夹子、钮扣、牙刷，这些东西也要搞，搞不好，群众也不满意。也应该重视，不过这些还有人抓。比较起来电影机、照相机更重要一些，也要有人抓。可我们真要立大志，就要把这些高水平的东西搞上去，这些过了关才行。不然我们的卫星打上去了，拍的照，发不回来，有什么用呢？所以只有这些过了关，我们的人造卫星打上去，才有更大的成果。大家不要只看成电影方面的需要，当然电影也是很重要的。这个过了关，整个化学、机器制造水平都会提高。抓住这事，促进整个工业发展。阻力是有的，困难是有的，主要是林贼一伙破坏，比如洗印厂，上海搞出染料，就是不试验，一等就是两个月。群众是关心工业发展的。要依靠群众，依靠革命技术人员，在党领导下是能够促上去的，是可以突破的。

姚文元讲话：

电视在努力，他们有雄心壮志。昨晚我看了他们一个计划，彩色电视也有决心赶上去。

昨晚看了《海港》部分样片，召集这个会很及时。江青同志已讲了详细的意见。第一就是要把《海港》拍好，第二要促进整个电影工业的发展，也要把其他电影拍好。要批林，要鼓足干劲，要振奋革命精神，扎扎实实，百折不挠，坚韧不拔，一丝不苟地解决一系列具体问题。在文艺革命中，我参加了许多会，我体会到都

是这个精神，这是无产阶级的科学态度，要继续下去。革命精神要和科学态度相结合，舞台戏就是这样搞出来的。《海港》是表现工人阶级的，是社会主义革命时代，是表现中国工人阶级国际主义的。应该把社会主义时代中国工人阶级英雄形象，崇高的国际主义思想表现出来，用光、配色、构图、造型、电影语言，用种种手段去表现。

希望大家认真讨论，把取得的成绩巩固下来，不满足，继续前进。不仅电影摄制组，还有其他各团，要总结，要前进再前进。今天我们看了两部片子，用光、配色、技术、艺术技巧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借鉴。这不是今天看了，从拍样板戏以来就看了不少了，如《智取威虎山》一个骑马动作，就请上海演员们看了许多骑马的片子。艺术创作就是要有一丝不苟、严肃认真的态度。这样才能把工人阶级的形象搞丰满，表现出革命的新中国的面貌。既要重拍，就要拍好。于会泳、浩亮、庆棠回来了，可以参加，帮一帮。

我们现在报纸上还是黑白照片。外国能很快印出彩色照片，今天拍的，明天就登。外国能做的，中国也一定能做到，只要经过努力。就要有这样的雄心壮志。电视还有点雄心壮志，希望你们互相竞赛。

江青同志还是鼓励你们的。《龙江颂》是肯定的嘛，《奇袭白虎团》也表扬了嘛，就是今天《海港》有几个镜头江青同志也肯定了。希望你们搞好。

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四日，江青在国务院文化组成员于会泳的一封检讨信上批示：戏、电影少了不能怪会泳同志一个人，而且少也是相对的。（国务院文化组里）正气不得伸张，原因是未抓紧批林。

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五日，张春桥在国务院文化组成员于会泳的一封检讨信上批示：同意江青同志的意见。文化组应当集中研究一下，把应当揭开的问题揭开，否则，拖下去，很不利。

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国务院文化组成员于会泳的一封检讨信上批示：告吴德，领导文化组（可扩大一些有关同志参加）集中研究和讨论一下，伸张正气，首先批林，激发出新的革命干劲。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四日，江青观看歌舞演出的讲话

怎么一看都是少数民族的东西，汉族的为什么不搞？

汉族的歌舞也很丰富多彩，应该很好发展，要攻汉族舞，要搞些短小的汉族歌舞。

《霸王别姬》就可搞成一个很好的剑舞。京剧可说是集汉族歌舞精华之大成。

《击鼓骂曹》可以搞成一个很好的器乐曲。

要很好发展汉族舞蹈，不要都搞少数民族的。

弹筝的女同志不敢穿裙子，可以穿褶裙，设计几种，淡绿、淡蓝、银灰色的。

你看又不敢穿裙子。你们不敢穿我就带头穿。不要把女同志打扮得灰溜溜的。墨绿的、玫瑰红的都可以。褶子可以打在两边，可搞飘带，袖口、领边，可绣些小花。京剧的大包裙，中国不穿，朝鲜还穿。

朱××的裙子很难看，又短，至少可加长二寸，设计白色的，你们不敢穿，我带头穿。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五日，江青看《杜泉山》剧后的讲话

柯湘主调音乐要京剧化一点。现在我跟你们说，京剧还是要姓京。

一九七三年七月一日，江青在中央乐团音乐会中间及演出后的讲话

伴奏的女同志还是穿裤子，不敢穿裙子。女同志“夏穿裙，冬穿裤。”设法把裙子设计出来。女同志穿裙子，还要解决袜子问题。舞台上，生活中都要注意。出国要穿连衣裙，四幅，拼起来，直着垂下来。样板团的女同志要穿裙子。但不要穿超短裙。军队女同志服装也要设计得好看些，也可以穿裙子，还有衬衫。

南方的越剧正在改革，有人说改得好，有人说改得不好。我说改好，不改不适合时代的要求，不改怎么行？声部要改，搞音乐的要帮助他们去改。

总政出了两期简报，题目是“落实江青同志等中央首长关于音乐舞蹈的指示”——（指六月二十四日）里面说“尽量少安排少数民族歌舞”。不要片面性、绝对化。我不是说不让演少数民族歌舞，是比例太大，要提倡搞汉族舞。我一说剑舞，都去搞剑舞，也可以搞棍舞、刀舞，要举一反三。要有辩论法。剑舞可以穿古装，也可以穿现代服装。千万注意不要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穿裙子也不要那么死，也可以穿裤子。一不能辩证，二不能举一反三。

头发谁都不敢烫，我带头烫。不能都弄成三毛流浪记。总不该让四十岁以上的女同志梳两个小髻。该烫的还是可以烫。一当然也不能搞成奇装异服。上海出现过这类现象，要煞一煞。但也不能乱蓬蓬。有的女同志，年岁大了，可以梳抓髻，结彩带。长发也可以，把长发盘起来。

毛主席指示，将《杜泉山》仍改为《杜鹃山》。

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八日，江青看《半篮花生》等样片时的讲话

《半篮花生》很新鲜，并不难改。

《送货路上》：很活泼，内容不错，表演形式有好有坏。

《两张图纸》：把新干部说得一无是处。当前主席提倡提拔新干部，唱了反调。

《园丁之歌》：剧名就不合适。园丁应是共产党，怎么是教师、知识分子呢？男教师是二流子。

（张春桥：教育路线也有问题，学生受教员摆布，女教师是热爱工农的，但最后给小孩子出了难题。）

教室看不出典型环境。

女教师还给男教师说好话，男教师转变也不合理。

“没有文化怎能担起革命重担”，这句话问题大了，应是“有文化能更好革命”。这句话简直是反攻倒算。

女的表演简直是青衣花旦，化妆像少奶奶。

矛盾也没有很好解决。

全国创作蓬勃开展，要抓一下评论队伍。创作组要组织一个小的评论组，鼓励创作，指出方向。

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八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批判《园丁之歌》稿件上的批示
请春桥、文元同志先阅，并请提出意见。

江青 七月二十八日

看了一遍，觉得有两个问题需要研究：

一、是否要肯定教师的大多数是好的，文化大革命中也有进步，坏人是极少数。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是长期的，此剧的路线，及其歌颂的人物，都是错误的。

二、关于学文化的问题，在批判这个电影的修正主义观点同时，是否要肯定学生学社会主义文化及学马列、毛主席著作也是必要的。以全面说明毛主席的教育方针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妥否，请斟酌批示。

（建议改后我们不再看了）

文元 七月二十八日

同意文元同志意见，可以考虑先发两篇，看看反映再发别篇文章。文章不多，在质量。批周赤萍小册子，一篇文章就收效。

春桥 七月二十八日

同意春桥、文元同志意见，请照办。

江青 七月二十八日

一九七三年八月五日，江青接见刘诗昆等人时的讲话

刘诗昆在运动中被捕，关了六年，放出来了。过去主席问过他，是新四条汉子（黄、吴、李、邱）不放，是想搞叶帅。刘还是有错误的，抓彭、罗、陆、杨，还有“一·一九”夺权。最近主席又问了。这次接见是传达了主席对他的关心，希望他搞点名著的东西。“战台风”改为钢琴、乐队。要刘恢复基本功，给他一个钢琴，让他跟乐团去日本。

关于殷诚忠入党，让吴德作他介绍人，殷跟我们走了多少年，一直要求入党。赵燕侠可以去艺校工作。开始她是跟我们搞革命样板戏的，记一功。还可以回团演阿庆嫂，同时在艺校教书。

白淑湘是第一个演吴清华的，最近写了个检查，还不错，应该记一功的。去全团作检查，取得群众的谅解，还可以回团演吴清华。

崔嵬，让他拍《平原作战》。崔检讨不错，我们欢迎，完全可以让他工作了。只要承认错误，愿意改，就可以了。

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九日，江青听取上海乐团音乐会时的讲话

这个作品有中国声乐的特点，我们的东西就是好。我们最重要的，要创造自己的文化艺术。

要教育专业和业余文艺工作者，要重视自己的文化艺术，不要轻视，不要盲目崇拜。毛主席对刘诗昆说：“要写自己民族的东西。”外国的东西，有的是吹出来的，其实思想上、艺术上都不行。有人却把它们当作楷模，认为不可变。费城交响乐团来中国，听了我们的音乐，认为很好，而我们自己却不以为然。外贸部反映，外国人对《杜泉山》的反映很强烈，而我们有些人却不愿去看。

上海最近又有一些人反对现代革命作品，这些人中，有的是资产阶级权威，有的是旧上海乐团培养出来的观众。创办的创作评论小组，要对外国音乐进行评论，如对“无标题音乐”。最近，土耳其有音乐家要来，要搞清他们演的节目内容，不要再象费城乐团那样。“无标题”音乐是否没有内容，仅表示某种情绪，要研究。

要提倡和重视创作，可以把京剧的片段写成钢琴曲或管弦乐曲。“穿林海”（乐队演奏）一段就很好。还有一些唱段。如“狱警传”都可以搞成钢琴曲，突出人的作用。搞古代的要慎重，要推陈出新。有的可以不动，有的要出新，出新是很重要的创作。

近来有些人又借故事片少，向我进攻，这些话是放屁。我们自始至终在抓。有些原因，电影工业跟不上，“八·七五”放映机过不了关，林贼捣乱等等。

五七艺校招生要贯彻阶级路线，但不能搞关门主义。要讲成份，但不能唯成份，不要查三代，要重表现。要坚持以工农兵子弟为主，但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把一些有条件的学生弄掉。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周恩来批复同意对外友协关于邀请土耳其两音乐家于十二月上中旬来华作访问演出的报告。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八日，江青批示对外友协关于邀请土耳其两音乐家于十二月上中旬来华作访问演出的报告：建议今后少接待或不接待资本主义国家的文艺团体，其后果是严重的。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周恩来又批：今后尽可能地少接待，或有选择地接待，完全不接待不甚可能，但我事先可调查清楚，避免请来我无法接受或不了解其内情的文艺团体。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继续批评对外友协的报告是宣扬无标题音乐、无社会内容，是开门揖盗。并在上海、天津、北京等地发起批判资产阶级无标题音乐泛滥活动，号召大家与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开展斗争。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对批评江青的一封信的批语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

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容许批评。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国务院关于禁止私自放映封存影片的通知

近来，有些地区和部门未经中央批准私自放映封存影片而且看的范围很广，这是违反中央规定的。中央有些部门，在京召开的专业会议，看内部参考影片，范围过火，看后也不组织批判消毒。这个问题，各地区，各部门，应当引起重视，严肃处理。今后，对封存的影片，必须严格管理，对经批准放映的内部参考影片，必须严格控制放映范围。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毛泽东对电影《园丁之歌》的评价
我看是出好戏。

贰、 本节简论

一九七三年，文艺领域里的革命，又有了许多新的进展。

一九七三年春节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同志集体接见文艺界的人士。

当时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新的艺术作品少了，原有的艺术作品又不能上演、出版、流通，不能满足群众的需要。

从主管这方面工作的江青的主观思想上来看，要求过高、过严，考虑群众的需要不够，是一个重要原因。

以湖南创作的花鼓戏《园丁之歌》为例。

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八日，江青等人在审查中认为，剧名就不合适。园丁应是共产党，怎么是教师、知识分子呢？“没有文化怎能担起革命重担”，这句话问题大了，应是“有文化能更好革命”。这句话简直是反攻倒算。此剧的路线，及其歌颂的人物，都是错误的。

他们提出的一些具体意见，是应该考虑的，对剧目加以修改、提高。但是，上纲过高，从政治上加以全盘否定，就不正确了。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毛泽东在长沙看了电影《园丁之歌》之后说：我看是出好戏。在这种情况下，首先必须调整文艺政策，鼓励创作，团结广大群众。

周恩来说：群众提意见，说电影太少，这是对的。这是我们的大缺陷。

江青说：当然总的说，六四年会演以来，工农兵在我们国家是占领了舞台、银幕，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赶下去了。但是太少了，同志们有责任，我们也有责任。这说明，领导层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当时确实也存在一股借文艺作品少，攻击文化大革命、攻击江青等人的右倾复辟风。不重视这种严峻的形势，也是不对的。它可能导致更严重的问题。

2009年12月21日初稿

2012年5月4日修改

第九章第五节 批判教育领域的复辟回潮

壹、 本节概述

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四日，新华社通讯员《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日益深入人心》

“五·七”道路育新人

社会主义企业的主人翁

北京来的好“摩雅”

教育革命开新路

一九七三年八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

编者按：七月十九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一位下乡知识青年的信，并为此加了编者按。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

毛主席关于“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指示，发表已经五年了。教育战线的斗、批、改，正在继续深入。我们要认真学习和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搞好无产阶级教育革命。

* * *

《辽宁日报》编者按：这里刊载的是张铁生同志在今年大学招生考核试卷背面写的一封信。

张铁生同志是一九六八年的下乡知识青年，共青团员，现任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队长。他对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

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把有实践经验的优秀工人、农民、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选送大学，这是我国教育制度上的重大改革，它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同时，也必然会遇到各种旧的思想、旧的习惯势力的阻力。大学招生，在群众评议、群众推荐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文化考核是需要的。但是，文化考核的目

的，主要是了解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是检查记住多少中学课程？录取的主要标准，是根据他在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的一贯表现，还是根据文化考试的分数？是鼓励知识青年积极接受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再教育，努力钻研和完成本职工作，还是鼓励他们脱离三大革命运动实践而闭门读书？今天，我们发表张铁生同志的信，目的就在于请大家讨论、研究这些问题，欢迎关心教育革命的同志发表自己的看法。

* * *

尊敬的领导：

书面考试就这么过去了，对此，我有点感受，愿意向领导上谈一谈。

本人自一九六八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职工作。每天近十八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我的时间只在二十七号接到通知后，在考试期间忙碌地翻读了一遍数学教材，对于几何题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题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不愿没有书本根据的胡答一气，免得领导判卷费时间。所以自己愿意遵守纪律，坚持始终，老老实实地退场。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己钻到小屋子里面去，那是过于利己了吧。如果那样，将受到自己与贫下中农的革命事业心和自我革命良心所谴责。有一点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我在队里是负全面、完全责任的。喜降春雨，人们实在忙，在这个人与集体利益直接矛盾的情况下，这是一场斗争（可以说）。我所苦闷的是，几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我也不再谈些什么，总觉得实在有说不出的感觉，我自幼的理想将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这是我唯一强调的理由。

我是按新的招生制度和条件来参加学习班的。至于我的基础知识，考场就是我的母校，这里的老师们会知道的，记得还总算可以。今天的物理化学考题，虽然很浅，但我印象也很浅，有两天的复习时间，我是能有保证把它答满分的。

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等都清白。对于我这个城市长大的孩子，几年来真是锻炼极大，尤其是思想感情上和世界观的改造方面，可以说是一个飞跃。在这里，我没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算不得什么基础知识和能力），我感觉并非

可耻，可以勉强地应付一下嘛，翻书也能得它几十分嘛！（没有意思）但那样做，我的心是不太愉快的。我所感到荣幸的，只是能在新的教育制度之下，在贫下中农和领导干部们的满意地推荐之下，参加了这次学习班。

一九七三年八月十三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央直属的原九所艺术院校合并，改称中央五七艺术大学，下设音乐学院、戏剧学院、美术学院和戏曲学校、舞蹈学校、电影学校。

该大学于本年十一月成立，江青任名誉校长。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日，新华社报道：在伟大的批修整风运动推动下 北京大学教育革命深入发展

一九七三年九月，国务院科教组召开教育战线批判孔子问题座谈会
科教组负责人迟群在会提出：要把批孔作为贯彻党的十大精神、深入批林整风的一项大事来抓。哪些地方不重视批孔，哪些地方就属于针插不进，水泼不进。
周恩来对迟群的言论进行了批评。

一九七三年十月，国务院科教组召开理工科院校教育革命座谈会
十月十五日，科教组负责人迟群在会指出：教育界出现了复辟、回潮现象。
他说：九月，科教组开的那个批孔会是正确的，大方向是正确的；科教组没有降调，谁降调谁负责。反对批孔，就是复辟。
当晚，周恩来找迟、谢静宜等谈话。

一九七三年十月，清华大学开展反右倾回潮运动
运动中提出：上揪代表人物，下扫社会基础。有六十多人列为重点审查对象。
迟群在《教育革命通讯》上发表署名文章，提出教育界出现了一股翻案风，有人搞反攻倒算，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清华大学的这场运动，波及到北京和外省市的一些院校。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北京日报刊登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

《北京日报》编者按：我们热情地向读者推荐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红小兵黄帅同学（女）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希望引起大家的讨论。这个十二岁的小学生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中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远没有肃清，旧的传统观念还是很顽强的。

在教育革命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我们千万不能忘记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黄帅同学提出的问题虽然直接涉及到的主要是

“师道尊严”的问题，但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远不止于此，在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上山下乡、工农兵上大学、“五·七”道路、开门办学、考试制度、教师的思想改造、工人阶级领导学校等问题上，也都存在着尖锐的斗争，需要我们继续努力作战。在这一场战斗中，革命的教师和学生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要互相学习，互相支持，团结起来，共同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开火。我们希望大家都要当教育革命的促进派，而反对那种促退派；要当动力，而不要成为阻力，更不要站在运动的对立面。毛主席教导我们：“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有了许许多多象黄帅这样的积极分子，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就大有希望。学校的领导和革命的教师、包括在教育革命中有一些缺点或者犯有一些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都应当积极投入这场斗争，坚决支持教育革命中出现的革命的新生事物，热情地欢迎和支持这些可爱的革命小将，帮助他们永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我们要认真学习十大文件，贯彻十大精神，用党的基本路线武装头脑，深入批林整风，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在提高路线斗争觉悟的基础上，总结工作，搞好教育战线的斗、批、改。要警惕修正主义的回潮。在斗争中，要认真执行党的政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区分正确与错误。要把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在教育革命中，还要注意维护按照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的教学制度、纪律和秩序。希望大、中、小学的干部、教师和同学们把在这一斗争中的经验、体会，以及对于各种错误观点、错误倾向的批判文章写给我们，以便在报纸上开展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从而推动教育革命的发展。

来信

我是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二班的学生。九月听了红卫兵节目报道的兰州十四中学红卫兵帮助老师的事迹，受到启发，随后我给老师写了三篇日记提意见。顿时，师生的关系紧张起来，老师批判我“拆老师的台”、“打击老师威信”、“恶意攻击老师”。我认为，老师是“压制民主”，“打击报复”。这星期班上可热闹了，老师上课的主要任务就是鼓动同学训斥我，我去上课就是准备挨整。老师拍桌瞪眼在班里说：“直到现在，我还是公开号召同学们和黄帅划清界限”，“跟黄帅一起跑的人立场站错了”。班里还出了板报，点名批判我的日记。平时每日换一期，这篇板报老师宣布登一星期，并对板报组表示“感谢”。最近，班里同学在老师的率领下，不断对我嘲笑讽刺，大轰大哄地进行围攻，甚至个别同学提出把我“批倒批臭”的口号。

我是红小兵，热爱党和毛主席，只不过把自己的心里话写在日记上，也表示了日记中是有缺点的，如个别用词不当影响了老师的尊严，可是近两月老师一直抓住不放。最近许多天，我吃不下饭，晚上做梦嚎声惊哭，但是，我没有被压服，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意见。

究竟我犯了啥严重错误？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

（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二班学生 黄帅 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日记摘抄

一九七三年九月五日

今天，我班的×××同学犯了错误，当老师问他情况时，他带理不理，不象承认错误的样子。我看他那样，无意识的笑了一笑。老师把我叫起来，批评我不该笑。这点我虚心接受，一定改正。但是老师说：“有同学反映你和×××……，你内心非常爱听×××骂”。这句话我不能接受。我敢发誓：除了他骂我，我跟他顶嘴以外，我再也没有和他瞎逗过。今天的日记如果错了，请批评指正。

九月七日

今天，××没有遵守课堂纪律，做了些小动作，老师把他叫到前面，说：“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这句话你说得不够确切吧，教鞭是让你来教学，而不是让

你用来打同学脑袋的。我觉得你对同学严厉批评很多，耐心帮助较少，拍桌子，瞪眼睛，能解决思想问题吗？希望你对同学的错误耐心帮助，说话多注意些。

九月二十八日

今天，老师批评我不该给他提意见。对不起，以后我有意见，还是要提的。象今天老师骂我装病，这就是唯心主义。×××的椅子丢了，站着上课。算术老师把老师上课时坐的椅子借给×××坐，这种关心同学的精神值得我学习。第三堂课时，你不应该把椅子夺回来自己坐。

十月十三日

今天，××在课上向老师提了意见，老师说是我起的头，说我提意见纯粹是为了拆老师的台，降低老师的威信。同学应该正确接受老师批评，老师应该冷静考虑同学的意见。

十月十八日

今天，老师在全班又批判我。我对老师的意见有些是能够接受的，但不能接受的很多。如“黄帅你也真表帅，从小就表帅，太帅了”，这不是讽刺是什么？你还说：“黄帅从现在起不许打篮球”，……我感到这更是报复行为。

十月十九日

最近我是天天受老师和同学的训，以下就是老师对我批评中的语言：“听校外群众说：中关村一小出了一个反潮流者，好家伙，这事儿都传到社会中去了”；“你在这次斗争中，当不了张铁生那样的人物”；“直到现在我还是号召同学对黄帅的错误要批判，不要跟着她跑，要和她划清界限”；“黄帅你这样折腾，也是没有好结果的”。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黄帅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在《北京日报》发表后中关村第一小学教育革命形势大好》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三十日，新华社记者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就新型大学生 全国近三万名工农兵大学生陆续毕业，朝气蓬勃地回到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去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三十日，新华社记者报道：一代新人在战斗中成长——记北京大学首届毕业的工农兵学生

贰、 本节简论

在教育领域，这一年发生了两件引人注目的事。

一件是辽宁省考生张铁生交白卷。

一九七三年六月三十日，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下乡知识青年张铁生，参加高等院校招生文化考查，数理化试卷交了白卷。他在试卷的背面给领导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的感想。

七月十九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这位下乡知识青年的信，并为此加了编者按。

一九七三年八月十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并加了编者按。

一九七〇年以后，我国高等院校试行招生，在工农兵青年中，采取由群众推荐、领导审查、文化考查的办法，录取新生。这是教育领域里的一项重大革命，废除了旧的高考制度的积病，具有深远的意义。

在当时的辽宁省，录取的主要标准，是根据他在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的一贯表现，还是根据文化考试的分数？是鼓励知识青年积极接受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再教育，努力钻研和完成本职工作，还是鼓励他们脱离三大革命运动实践而闭门读书？情况不清楚。不过经过媒体讨论以后，张铁生是被铁岭农学院录取了。

一九七六年以后，恢复了旧的高考制度，张铁生被讽刺为“白卷英雄”。经过又三十多年的实践经验，中国的高考制度成了世界上最落后的考试制度，比较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还要落后多少年。

另一件是北京市小学生黄帅写日记。

一九七三年九月，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十二岁的学生黄帅，听了红卫兵节目报道的兰州十四中学红卫兵帮助老师的事迹，受到启发，随后，她于九月五日、九月七日、九月二十八日，给老师写了三篇日记提意见。顿时，师生的关系紧张起来，老师批判他“拆老师的台”、“打击老师威信”、“恶意攻击

老师”。而黄帅认为，老师是“压制民主”，“打击报复”。老师拍桌瞪眼在班里说：“直到现在，我还是公开号召同学们和黄帅划清界限”，“跟黄帅一起跑的人立场站错了”。班里还出了板报，点名批判黄帅的日记。班里同学在老师的率领下，不断对黄帅嘲笑讽刺，大轰大哄地进行围攻，甚至个别同学提出把黄帅“批倒批臭”的口号。

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一日，黄帅写信给北京日报反映她在学校的情况。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北京日报刊登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并加了编者按。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黄帅的日记的是非本来是很清楚的。后来，复辟派拿这件事做文章，攻击文化大革命，实在是没有道理。

正是针对在全国发生的类似问题，清华大学率先开展了反右倾回潮运动。其实，这种右倾回潮并不仅仅存在于教育领域。

2009 年 12 月 28 日初稿

2012 年 5 月 4 日修改

第九章第六节 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

壹 本节概述

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九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五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有关事项。

一九七三年五月十九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商定中央工作会议的议程，并通过出席会议的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人名单。

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报送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人员名单，其中有：陈云、李富春、邓小平。

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日至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及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共 246 人。

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日，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

周恩来宣布会议主要议题是：一、筹备召开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二、讨论批林整风问题；三、讨论本年度的国民经济计划。

周恩来指出：中共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九大是胜利的大会，但受到林彪的干扰，林是昙花一现的人物。今后，全党仍要继续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

在谈到邓小平“复出”一事时，周恩来表示：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小平同志今天出席了会议，同样情况的，还有其他一些人也出席了会议。

周恩来还宣布：王洪文被指定出席筹备十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并正式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

（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王洪文出生于一九三二年，这时四十岁，做过农民，做过工人，当过兵，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头头。这些使毛泽东对他抱有很大希望，准备在实际工作中加以培养和进一步考察。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王洪文从一九七二年九月起留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72年9月20日。）

周恩来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一、项目多了，计划工作至今没有走上轨道；二、搞计划要依靠地方，以省、市、自治区为主；三、要把协作区搞起来。一旦有事好办。

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

周恩来就中央关于党的十大代表产生的决定草案说：这个决定草案已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多次，总人数从九大一千五百人减为一千二百人自然有些困难但是可以解释的。

他提出：在九届二百七十九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当中，有二百二十三人均拟推选为十大代表。

毛泽东圈阅了此信。

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中央工作会议分组进行讨论。

周恩来参加东北组讨论。

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周恩来就党的十大代表名额产生情况讲话。

张春桥就党章修改问题作了说明。

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处举行会议。

根据周恩来的建议，董必武、朱德、许世友、陈锡联参加会议。

毛泽东提出：要注意抓路线、抓上层建筑、抓意识形态，学一点历史，批判孔子。

毛泽东强调：批林整风，要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以九一三划线：犯了错误的允许改过，暂时未认识到错误的可以等待。

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六日，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

周恩来传达毛泽东五月二十五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内容。

李先念讲解一九七三年国民经济计划。

周恩来说：关于基本建设问题，从大跃进到现在都没有解决好，我们大家都犯过一些错误。关于开展对外贸易，我们主要依靠自力更生，但先进技术还是要学，要互通有无，平等贸易。

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中央工作会议分组讨论。

周恩来先后参加东北、华东、西南、华北、西北和军队组讨论。

周恩来听取各组汇报。

一九七三年五月三十一日，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

周恩来在会上着重谈了国民经济计划问题：

要继续认真贯彻毛主席关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指示，坚持企业下放，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要在中央统一计划下，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条条要督促帮助地方，不能放而不管；打倒条条专政，是打倒专政，而不是打倒条条。

关于计划体制，总是要搞协作区，东北、华北先搞，其他地区准备此外，中央将大力帮助西北、西南，首先把农业、轻工业搞上去，为今后建立协作区打好基础。为缩短基本建设战线，计委和中央有关部门要逐省进行调查研究，逐个项目研究商定。争取后两年半国民经济有一个更大发展。

会议讨论了《中央关于党的十大代表的产生的决定》，确定代表名额为 1740 人。会议同意经毛泽东审定的《中央政治局关于修改党章问题的请示》中的各项规定。同意党章修改问题的重点是总纲部分；按毛泽东多次提出的现在还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进行修改，不写入“三个里程碑”的提法。不写入人名，增加毛泽东近年来若干新指示和“第十次路线斗争”的经验等内容。

会议决定由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负责中共党章修改小组，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起草《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会议宣布解放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李葆华、廖志高、江华、江渭清、王稼祥、秦基伟、李成芳、方强、陶鲁笏、曾希圣等 13 名老干部。

会议还宣布，经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决定王洪文从上海调中央工作，与华国锋、吴德两人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政治局的工作。

会议印发的文件有：林彪、叶群的日记和笔记；毛泽东审定的《中央关于党的十大代表的产生的决定》；毛泽东审定的《中央政治局关于修改党章问题的请示》。会议结束。

一九七三年六月初，政治局确定政治报告起草小组成员并开始起草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

政治局确定的报告起草小组成员有周恩来、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叶剑英、李先念六人，由张春桥执笔。

一九七三年六月十六日，政治报告起草小组开会，确定报告要点。

一九七三年六月十六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政治报告起草小组讨论情况。

毛泽东在听汇报后，基本认可了报告稿的要点，并提出具体补充意见。

毛泽东提出：政治报告中要指出时代的特点，现在，仍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这个的马克思主义与列宁所处的时代相同，要引用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所说过的话为证。

还指出：报告中要指出一种倾向常常掩盖另一种倾向。

此外，应多引用一些马、列的话。

一九七三年六月十七日，周恩来就起草十大政治报告问题给张春桥的信，转告毛泽东的意见。

一九七三年七月三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讨论、修改党的十大政治报告草稿和修改党章报告草稿。

一九七三年七月六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宣读、讨论十大政治报告国际形势和任务部分，并商定由张春桥、姚文元再加斟酌后，印成修改送审稿报送毛泽东。

一九七三年七月七日，毛泽东看了周恩来报送的几经修改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的报告送审稿，表示“原则同意”。

一九七三年七月七日、八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讨论通过十大修改党章报告草稿和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稿。

一九七三年七月十日，在毛泽东处召开政治局会议。

讨论通过《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

会议谈到由谁作政治报告的问题。

之后，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提出：十大政治报告可由王洪文来作。

一九七三年七月三十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周恩来传达毛泽东七月二十九日关于党的十大准备工作的指示。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继续讨论毛泽东七月二十九日关于党的十大准备工作的指示。

会议决定：十大代表分省、市、自治区在各地集中，召开不公开的预备会议，讨论十大文件草稿；中央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可先开预备会议，草拟各项人选项名单，此事拟由王洪文为主，张春桥、纪登奎、李德生为副进行工作。

一九七三年八月六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江青在会上传达毛泽东有关儒法斗争的谈话及所写的七律诗，并要求将此内容写入十大政治报告。

周恩来表示：对此需要理解、消化一段时间，不必马上公布。

一九七三年八月七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讨论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政、军部门出席十大代表分别召开预备会议的有关问题。

一九七三年八月八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十大准备工作的通知。

《通知》要求将要出席中共十大的各代表组就地召开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的预备会议，讨论中共中央下发的《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草稿）、《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草稿）、《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等 3 个文件，并学习中共中央下达的有关批林整风文件，为中共十大的正式召开作好准备。

一九七三年八月十三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讨论王洪文主持下的中央十大筹备小组提出的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名单和十大主席团名单。

一九七三年八月十三日，周恩来与王洪文联名写信给毛泽东。

信中提出：为使筹备和准备工作衔接得好，主任仍为洪文同志，副主任七人（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张春桥、纪登奎、李德生）均是在京政治局同志。毛泽东圈阅了此信。

一九七三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员表示：“希望这次会议开成真正是团结的、胜利的大会。”

一九七三年八月十九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讨论已列出的第十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名额及其成员名单，并作了增补。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日，在毛泽东处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
议定名单。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日，毛泽东批示：原则同意十大政治报告稿。
并确定由周恩来作政治报告。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介绍各地召开预备会议情况，以及对十大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报告讨论修改情况
/
中共中央作出决议，正式批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
宣读经毛泽东圈阅的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名单，获一致通过。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日，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周恩来介绍自五月中央工作会议以来十大各项筹备工作情况，宣布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即日成立，中央政治局内已先成立一筹备小组，由王洪文任组长。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一日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议十大主席团领导成员名单。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担任十大主席团主席、副主席的人，也就是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的人选。

主席团主席由毛泽东担任，没有任何异议。

当议到副主席人选时，会上先后提出四人，即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和叶剑英。这时，政治局委员许世友提出：“我看只要一个副主席就行了！”他所讲的“一个副主席”，是指周恩来。

后来，他又认为有三个老同志（即周、康、叶）就够了。

许世友的态度，表明他对迅速“进入”党中央核心并在十大筹备工作中身居要职的王洪文强烈不满。这种看法也代表了很多老干部的意见。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到向毛泽东汇报中共中央政治局选举筹备小组关于十大组织人事安排酝酿的结果。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二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商定：十大主席团主席为毛泽东，副主席为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秘书长为张春桥。

关于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人选，除以上七人外，另增加董必武、朱德两人。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三日晚，在周恩来主持下，召开了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进一步协商将在十大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名单。会上，周恩来讲了话：

关于政治报告，他说：政治报告署了我的名字，但不是我写的，是张春桥按照毛主席的思想、路线起草的，经毛主席看过，报告是毛主席的思想，主席要我作报告。

他着重说明毛泽东选调王洪文到中央工作的情况，表示：主席讲的我要传达，因为主席给我不知说过多少次了。我们应该按照这一精神，重视选拔青年干部，不能看不起“儿童团”。他又说，我年纪大了，但我还是要为党鞠躬尽瘁的，我们是立党为公，不是立党为私。

在讲到十大主席团增加了一些老同志，他说，邓小平同志说过，有的老同志身体不好，可以做顾问。毛主席对邓小平同志的意见很重视，提出组织一个顾问委员会，他当主席。主席跟我讲，我说不行；他又跟政治局的同志讲，大家也都不同意。主席说，你们大家都不同意，我只好鞠躬尽瘁。

到会的许世友仍很不服气，多次插话陈述自己的意见。

会上，当提名为十大主席团秘书长的张春桥指责许世友“反对主席的意见”时，许世友当众大声训斥张春桥：“你有什么了不起！”

会议通过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以及中央领导机构全体成员名单。

（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负责人会议记录，1973年8月23日。）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十大选举筹备委员会各小组协商通过十大主席团副主席、秘书长及主席团全体成员名单。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周恩来宣读并解释毛泽东圈阅的中共十大主席团名单、中共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预选）名单、中共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预选）名单。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十次大会预备会。

会议通过十大主席团一百四十八人名单。

会议通过十大的三项议程：（一）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二）王洪文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三）选举第十届中央委员会。

周恩来讲法：

讲话中传达了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希望这一次大会真正能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大会。希望我们这次大会，大家团结起来，不搞阴谋诡计。我们要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人，对外反对帝、修、反，对内反对刘少奇、林彪反党集团中最死不悔改的一些死党。我们要坚持原则，当然，不排除必要的灵活性。在任何一级党组织，大多数决定了，少数就应该服从大多数。”

（据周恩来在中共十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8月24日。）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晚，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

毛泽东主持开幕式。

大会通过的主席团领导成员是：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秘书长张春桥。

毛泽东宣布开会。

周恩来先问：“主席讲几句不讲？”

毛泽东说：请周恩来作报告和请王洪文讲话。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周恩来作政治报告

当周恩来读到报告中的“时代没有变，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今天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时，毛泽东插话：“哎，不错。”

当周恩来读到“应当强调指出：有不少党委，埋头日常的具体的小事，而不注意大事，这是非常危险的”时，毛泽东说：“对。”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王洪文作党章修改报告。

周、王讲完后，毛泽东宣布：“报告完毕，今天就到此为止，散会！”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十大代表开始分组讨论。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在毛泽东处开会，汇报十大各项议程进展情况。

毛泽东表示将不参加十届一中全会。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十大主席团会议。

周恩来讲话说：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犯错误的省委第一书记，只要承认错误态度比较好，绝大多数都解放了，并都在这次提作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对犯有严重错误的老同志，有的也还要保留，这是一个代表性问题，体现了毛主席的教育干部政策。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十届大会，

通过了政治报告、修改党章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八日，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

在新当选的一百九十五名中央委员和一百二十四名候补中央委员里，除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朱德、董必武、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外，还有在九大上没有当选的一批老干部，如：邓小平、王稼祥、谭震林、乌兰夫、李井泉、苏振华、杨勇、廖承志、陶鲁笳、叶飞等。

据周恩来说：这一届中央委员会中，“工人、农民、现役军人以及其他劳动人民合起来比例约为百分之六十七，其余百分之三十三，很大一部分是革命干部，这里边很多过去也是军人。”

（周恩来在毛泽东会见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时的插话记录，1973年11月2日。）

不少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被选入中央委员会。

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同他有亲属关系的毛远新、王海容等没有被提名参加中央委员会的选举。

（据周恩来在十大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8月28日。）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十大主席团结束会

周恩来讲：我们还是要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还是要抓批林整风这个纲、阶级斗争这个纲，纲举目张地解决各种问题，做好各项工作。

一九七三年八月三十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预备会。

就选举中央领导机构成员事进行协商。

一九七三年八月三十日，召开十届一中全会。

在周恩来主持下，十届一中全会选出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

毛泽东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是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

中央政治局委员二十一名、政治局候补委员四名，政治局常委除主席、副主席外，还有朱德、董必武、张春桥三人。

这个选举结果，和会前酝酿、协商的情况是一致的，符合毛泽东对党中央人事安排的考虑。

一九七三年八月三十一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新闻公报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二日，周恩来与王洪文向毛泽东汇报筹备四届人大会议情况。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讨论四届人大会议各项筹备工作情况。商定：

二、发出关于召开四届人大会议的通知，有关代表名额的调整，由中央指定的组织工作小组负责处理。

三、关于修改宪法草案工作，拟选几个重点单位度作修改。

四、关于四届人大的其他筹备工作，拟先在政治局内组成三个小组进行：

1，组织工作小组，王洪文任组长

2，宪法修改小组，康生任组长，张春桥为代组长

3，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小组，周恩来任组长

以上三组工作，均需在十月五日前进行完毕。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四日，周恩来报告毛泽东

报告提出：这些程序如果进行顺利，四届人大正式会议开五六天就能解决问题。

毛泽东圈阅了报告。

一九七三年十月五日，周恩来就新华社的《国内动态清样》中一则反映浙江温州地区情况的报道，批告王洪文：如今天大字报仍在街上，无论如何，要劝张永生、翁森鹤（将大字报改到机关、工厂内，这与目前开人大形势也有关系，请你再过问一下。

一九七三年十月十六日至十九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讨论四届人大会议筹备工作，并基本通过政府工作报告草稿。。

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公安部部长李震自杀身亡。

贰、 本节简论

党的十大召开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进一步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巩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发生以后，党内外议论纷纷。右派势力乘机攻击文化大革命，散布林彪叛逃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破产了、失败了。

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针对社会上流传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的说法批驳道：怎么能这样说呢？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集团揪出来了嘛，又把林彪集团揪出来了嘛，这是个伟大胜利。如果不是这场大革命，刘、林他们怎么能发现？怎么能打倒？

党的十大的政治报告正确地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回答了人们提出的问题。

二、把工农干部选进中央领导机构。

毛泽东在九大后，特别是庐山会议和“九一三事件”后，“多次说要提工农出身的同志为党的副主席、常委。”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同周恩来等的谈话说：“外国人说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寄希望于年轻人，说是我们死了就会变修。怎么办？我的意见就是要搞一点年轻人来当共产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所谓年轻人，就是年龄在三十至四十之间，要工人和农民。老年、中年还要。你们多找找，南方北方都找。文化水平低一点，用一批知识分子扶助。”

一九七二年九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王洪文从这时起留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

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日，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宣布：王洪文被指定出席筹备十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并正式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

一九七三年五月三十一日，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宣布，经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决定王洪文从上海调中央工作，与华国锋、吴德两人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政治局的工作。

会议决定王洪文参加中共党章修改小组，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起草《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

一九七三年六月初，政治局确定王洪文为政治报告起草小组成员。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可先开预备会议，草拟各项人选项名单，此事拟由王洪文为主进行工作。

但是，选拔工农干部进入中央领导机构的设想，遭到了党内一些老干部的抵制、反对。这一方面是由于论资排辈的思想作怪，另一方面是由于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思想作怪。其中表现最为典型的就是许世友。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一日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议十大主席团领导成员名单。

主席团主席由毛泽东担任，没有任何异议。

当议到副主席人选时，会上先后提出四人，即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和叶剑英。这时，政治局委员许世友提出：“我看只要一个副主席就行了！”他所讲的“一个副主席”，是指周恩来。

后来，他又认为有三个老同志（即周、康、叶）就够了。

许世友的态度，表明他对迅速“进入”党中央核心并在十大筹备工作中身居要职的王洪文强烈不满。这种看法也代表了很多老干部的意见。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二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商定：十大主席团主席为毛泽东，副主席为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秘书长为张春桥。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三日晚，在周恩来主持下，召开了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进一步协商将在十大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名单。会上，周恩来讲：着重说明毛泽东选调王洪文到中央工作的情况，表示：主席讲的我要传达，因为主席给我不知说过多少次了。我们应该按照这一精神，重视选拔青年干部，不能看不起“儿童团”。他又说，我年纪大了，但我还是要为党鞠躬尽瘁的，我们是立党为公，不是立党为私。

到会的许世友仍很不服气，多次插话陈述自己的意见。

会上，张春桥批评许世友“反对主席的意见”，许世友当众对张春桥说：“你有什么了不起！”

轮到王洪文讲话时，包括许世友在内的一些老干部都没有像听了周恩来讲后那样鼓掌，而是用沉默来表示不满。

十大的政治报告，毛泽东已决定由周恩来作。当讨论由谁来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时，提议王洪文的人寥寥无几。

虽然会议最后还是通过了各项预选名单，但以上这些迹象，已显示中央内部在十大前夕存在的分歧。对王洪文的反感和不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许多人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

三、调整领导班子，建立新的领导机构。

十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二十一人：毛泽东 王洪文 韦国清 叶剑英 刘伯承 江青（女） 朱德 许世友 华国锋 纪登奎 吴德 汪东兴 陈永贵 陈锡联 李先念 李德生 张春桥 周恩来 姚文元 康生 董必武。

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共四人：吴桂贤（女） 苏振华 倪志福 赛福鼎。

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共九人：毛泽东 王洪文 叶剑英 朱德 李德生 张春桥 周恩来 康生 董必武。

从政治局社会构成来看：

元老级人物占八人：毛泽东、叶剑英、刘伯承、朱德、李先念、周恩来 康生 董必武。（与九大比较减少二人：林彪、陈伯达）

原老级人物占十三人：韦国清、江青、许世友 华国锋 纪登奎 吴德 汪东兴、陈锡联、李德生 张春桥、姚文元、苏振华、赛福鼎。（与九大比较减少七人：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李雪峰、谢富治；增加五人：韦国清、华国锋、吴德、苏振华、赛福鼎）

工农级人物占四人：王洪文、陈永贵、吴桂贤、倪志福。

从政治局政治构成来看：

左派人物占七至八人，约为三分之一强；

中派人物占八至九人，约为三分之一强；

右派人物占六至七人，约为三分之一弱。

与九大比较，左派力量削弱了，中派力量加强了，右派力量也有所加强。

有人统计：九届中央委员 170 人，其中工农 47 人；候补中央委员 109 人，其中工农 47 人。十届中央委员 195 人，其中工农 69 人；候补中央委员 124 人，其中工农 73 人。

四、十大以后立即着手筹备四届人大会议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决定成立组织工作小组，宪法修改小组，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小组，并决定三组工作，均需在十月五日前进行完毕。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四日，周恩来报告毛泽东：这些程序如果进行顺利，四届人大正式会议开五六天就能解决问题。毛泽东圈阅了报告。

一九七三年十月十六日至十九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四届人大会议筹备工作，并基本通过政府工作报告草稿。

这说明，中央对筹备四届人大会议的工作抓得非常紧，预计在一九七三年内就要召开。

可是，十月以后，筹备工作突然停下来了，一直拖延到一九七四年底，才又重新开始筹备工作。这说明毛泽东对当时的政治形势的判断发生了重大变化。

2009年12月14日初稿

2012年5月4日修改

第九章第七节 毛泽东批评外交工作

壹、 本节概述

一九七三年二月十五日至十九日，基辛格访华。

期间，周恩来与基辛格进行了六次会谈。

一九七三年二月十七日，毛泽东会见基辛格

毛泽东说：

你们的总统坐在这里讲的（手指基的座位），我们两家出于需要，所以就这样，（把两只手握在一起）HAND—IN—HAND（手携手）。

只要目标相同，我们也不损害你们，你们也不损害我们，共同对付一个王八蛋！实际上是这样。

是不是你们现在是推动西德跟俄国讲和，然后又推俄国向东进。我怀疑整个西方有这么一条路线。向东，主要向我们，而且向日本，也有一部分向你们，在太平洋和印度洋。

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如果有什么俄国人打中国，我今天对你讲，我们的打法是打游击，打持久战。他要去哪里，就去哪里，让他去。”

基辛格说：“如果进攻中国，出于我们自己的原因，我们也肯定会反对他们的。”

一九七三年六月五日，毛泽东会见越南领导人黎笋、范文同

毛泽东说：“我们外交部发过通报，说是美国的战略中心是在亚洲、太平洋。后来我得到这个消息，我说不一定。它在欧洲、中东、还有美国本土，问题不少。它总要抽一部分兵力走，不能老在亚洲、太平洋。它管的地方太多，要收缩一点。而且在你们那里，吃了亏了。”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日，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紧急约见中国外交部负责人

勃列日涅夫在访美期间与尼克松签订了《苏美防止核战争协定》、《关于进一步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谈判的基本原则》等文件。

布鲁斯面交尼克松致周恩来信的副本，并提出希望周恩接见的请求。

外交部据此起草了周恩来会见布鲁斯的谈话要点。报请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认为：口气太软，是右倾表现，批示道：“与资产阶级联合常忘掉斗争”。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周恩来会见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我们对美苏签订的核协定持怀疑态度，中国政府仍坚持中美上海公报的立场。历史表明，签订这类条约是靠不住的，现苏联领导人访美给人以两个大国主宰世界的印象。我们不怕孤立，首先我们不丧失立场，同时我们又是现实主义者。说许多空话，不如做一件实事。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六日，毛泽东看了周恩来与布鲁斯的谈话纪要

毛泽东说：这下子腰杆子硬了，布鲁斯就舒服了。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 356 页）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七日，在中国西部地区上空，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氢弹试验。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七日，外交部第一五三期《新情况》刊登一篇题为《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的文章，分析、评论了美苏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以后的世界形势，认为，美苏会谈“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

毛泽东对外交部第一五三期《新情况》提出批评意见。

一九七三年七月三日，周恩来致信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

周恩来从王海容处得知毛泽东对外交部的批评后写信给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要求撤回该期《新情况》。并检讨说：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望你们也应以此为鉴，发挥钻研商讨的积极性，有时也可要求我召集短小的会来交换意见。

一九七三年七月四日，毛泽东同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

毛泽东说：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

美、苏两家开了两次会。外交部的观点，不如几个大使馆，驻法、驻瑞士、乃至驻叙利亚，其他还有许多，都比外交部的意见高明。外交部有一个什么《新情况》，先说大事不好，一说欺骗性更大，又说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大概是铀——235，浓缩铀吧。大家都说好，都说此文写得不错。我一看呢，也许我的是错的，你们贵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比如说，中央总是说国内外形势大好。一个大好，也不是中好，也不是小好，更不是不好。而外交部说大事不好，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这样浓下去，浓到明年，欺骗性变为更大，要升级了。这个欺骗性的问题闹了一年多了。

对于越南问题，美国战略重点东移，我就提出重点西移。欧洲年嘛！人家自己讲的嘛！人家自己要撤兵，有一个国家死也不让撤，说是世界革命风暴在亚洲，亚洲革命风暴中心在越南。如果不打了，就不得了了。就是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咱们就是那号人物了。我是讲我，我这几年名声不好。世界上唯一的马克思、一盏明灯是在欧洲。那个地方放一个屁也是香的！奉为圣旨啊！我就不理！你奈何得了我吗？鄙人是右倾机会主义。“明灯”是用我的名义写的。我就没有看。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究竟重点东移，还是西移，你们讨论一下。我看多少西移一点吧。人家要走路，死也要拖住。“革命是不能妥协的。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妥协的。”这是哪一条马克思主义？

又是外交部一个什么屁司（亚洲司），说是田中不能上台，上台也不能改善中日关系。

又说是美国不行了，腰杆子硬不起来了。

经常吹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

专门勾结美帝、日本、西德、英国这些坏人的是我。

关于革命不能有妥协这个学说，不是马克思主义。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一九七三年七月五日，周恩来在得知毛泽东七月四日谈话后，在外交部长姬鹏飞为此写给毛泽东的检讨报告上加注：“这些错误与我的政治认识和工作方式有关。”

一九七三年七月五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给外交部的信上批示此种顽症，各处都有，非个别人所有，宜研究改正办法。

一九七三年七月十五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信上批示周恩来将将部起草的《〈新情况〉一五三号错误何在？》一文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将外交部文章中“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一句中“严厉”二字删去。周恩来附信提出：关于错误的检讨，我当另写报告。毛泽东批示：检讨不要写了。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 357 页）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日，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抵达北京。基辛格在十一月再次来华，打算在上次访华的基础上，再就中美双方的战略意图、军事技术合作等具体问题同中方沟通，并达成默契。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二日下午，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基辛格。基辛格说：“对于今天世界上主要的危险是谁，我们并无怀疑。”“我们同苏联的交道中，没有什么你们不知道的东西。你们可以指望将来也会如此。”毛泽东说：“你们跟我们观点差不多一样，就是苏联要打中国，有这个可能。”基辛格说：“我原来认为，这在理论是可能的。现在我认为，有更大的现实可能性。我已经公开对你们总理和大使讲过，我认为他们特别要摧毁你们的核能力。”“正如我多次讲过，上次也向主席先生讲过的，我们认为，如果出现这种

事情，将会对我们大家都产生严重后果，所以我们决心加以反对。我们已经决定不允许中国的安全遭到破坏。”

毛泽东说：“它那个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

毛泽东说：“只要你们跟台湾断绝外交关系，我们两国就可能解决外交关系问题，就是说，像日本那样。”

基辛格说：“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我们是要同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我们的困难在于，不能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这同我们国内形势有部分关系。”“或者我们还是等待一下，因为从技术角度来看，联络处的工作是管用的。”

毛泽东说：“可以嘛，就是这样下去也可以嘛。你们现在还需要台湾。”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十三日，周恩来、叶剑英等与基辛格就“共同关心的双边问题”举行多次会谈，进一步探讨中美两国在各方面进行合作的可能性。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晚，基辛格举行告别晚宴

告别晚宴结束时，基辛格突然提议，希望再和周恩来举行一次单独会谈，继续讨论一下中美双方的军事合作问题。

当基辛格提出临时动议后，周恩来因事起仓促，来不及请示毛主席，而作为东道主也不便回绝客人的提议，便同意与基辛格就中美双方军事合作的问题又举行了一轮会谈。当时只有中方的翻译唐闻生和美方的温斯顿·洛德在场。会谈结束后，周当场并没有表态，只是表示要请示报告中央，在基辛格早晨登机前再给予答复。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夜，周恩来同基辛格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谈。

会谈只有中方的翻译唐闻生和美方的温斯顿·洛德在场。

关于战争问题，周恩来说：对中国来说，不能不设想最坏的一种情况，作最坏情况的准备，即在一个时期内孤军奋斗，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作战思想；即使包括美方在内的几个方面同时向我们进攻，我们也准备了。

基辛格还提出在中美之间建立热线联系问题。他说：以美国的卫星系统向中国提供早期预警，以便及时采取措施，保护中国的防空、防御系统（轰炸机、导弹等），或者在中美之间签订一个有关意外的核战争的协议（美国已草拟了文本）。

对于基辛格提出的建议，周恩来表示：“有些东西可能对我们会有所帮助。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

十三日夜与基辛格的单独会谈刚一结束，周就挟着皮包匆匆离去。打电话向毛泽东请示，但被告以“主席正在睡觉”。周恩来在办公桌旁走了好几圈急步，认为事情很急，不能等。最后，周恩来下决心承担责任，拍板作了决定。第二天在给基辛格的答复中表示：中美双方指定专人对此继续交换意见。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基辛格离京的当天晚上，毛泽东与王海容、唐闻生谈话并让她们立即整理出周恩来与基辛格的谈话记录，为此，王、唐二人找周本人核实了谈话记录。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经中美双方商讨、修改的基辛格访华公报。

这份公报的草稿，毛泽东以及全体在京政治局成员事先都已圈阅。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听取了王海蓉、唐闻生关于中美会谈的汇报，她们认为：周恩来、叶剑英在中美会谈中的态度软弱了。总理在这次会谈中闯了乱子，被苏联的原子弹吓破了胆，没有请示报告主席，就向美国承担了搞军事合作的义务，接受了美国的核保护伞。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和外交部一些成员开会，毛泽东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讲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是错的，要打。在陕北时连那个小土围子，不打它就不投降。”苏联“野心很大，力量不够。”

他还说：“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也可以来，在后面排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

他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此次中美会谈中的错误。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晚，政治局会议

周恩来传达毛泽东对中美会谈的意见，并介绍同基辛格会谈的情况。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周恩来两次向毛泽东书面报告政治局会议情况

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对中美会谈的批评和进行讨论的情况，并尽量根据自己的认识作了检讨，说：“美国以苏向东吓唬我们，要我们当心，想套住我们，便于美苏争夺或暂时勾结中做筹码，我们不能受骗上当”，检讨承认他自己“在这次会谈中做得不够”。

信发出后，周恩来又补送一信，说：“应指出，目前的危险是防右，要号召和提倡从中央起，中、青干部敢于斗争老干部的修正主义思想和右倾错误，并养成一种好的风气；要防止和批判国内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对我们的侵蚀。”

承认自己犯了“修正主义”的错误，并完全接受对他的批评。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起，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批判周、叶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其中主要是批判周恩来在外交路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叶剑英在同美国军方人员会谈时“右倾软弱”。

会议一开始，江青就提出，要批判周恩来在外交路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和叶剑英在同美国军方会谈时的“右倾软弱”，

江青说：周恩来有时“左”了，“是霍查主义，主张两个拳头打人”，没有好好执行毛泽东的联美整苏方针。

江青还质问周恩来：在同美国人的会谈中究竟“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并批评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说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等等。

会上，有人严厉指斥这次中美会谈是“目无中央”、“蒙骗主席”、“卖国”、“屈膝投降”、“丧权辱国”、“投降主义”、“给美国人下跪”，等等。

周恩来当场对江青拍了桌子，说：“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但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会议由原来的政治局会议改为政治局扩大会议。

除了政治局委员外，外交部的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和王海容、唐闻生、罗旭、章含之参加，再加上中联部长耿飏和刚刚复出的邓小平。

会议地点从钓鱼台搬到了人民大会堂。

会议成立了一个“帮助小组”，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华国锋等六人组成。每次开会前，帮助小组连同王海容、唐闻生一起先在钓鱼台开小会，商量如何贯彻毛泽东的意图。

会议主持人由周恩来改为王洪文。

毛泽东指定王海容、唐闻生为联络员，随时向他报告会议情况。

扩大会议一开始，由唐闻生原原本本地传达了毛泽东在最近一个时期对周恩来及外交工作的批评，如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针插不入，水泼不入”；外交部不执行“山雨欲来风满楼，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外交方针，因此要对外交部“甩石头”。“有人对苏联怕得不得了，一旦打进来，他就要当儿皇帝呢！”等等。传达了八个小时。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五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

从十一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五日，会议进行了十天。

邓小平也在会议上发了言，他指出周恩来的问题的严重性：“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已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

会议后期，毛泽东指示：“要开成一个团结的会”。不能搞红卫兵上街贴大字报，打倒总理、叶帅的那一套，要内部开会解决。又要批评，又要工作，几个老同志和他自己，都是不久于人世的人了。

会议最后责成周恩来做检讨。

周恩来要求面见毛泽东当面做检讨，毛泽东回复：要检讨就在会上做。

周恩来在会议上就自己的错误作了检查。

毛泽东阅后批示道：“可以了。”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九日，毛泽东同周恩来谈话。

十二月九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亚。

在会见记录上有这样的记述：

毛泽东同周恩来“长时间热烈握手”，并且说：“总理啊！”毛泽东指着在座的曾向他汇报有关情况的几个人说：“现在的小将不好惹呢。”“把他们提起来，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总理啊，你挨整了，听说他们整得你不亦乐乎啊，说是你爱插我的话，弄得你现在都不敢讲话了，把我搞成了一言堂。”

（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亚时的谈话记录，1973年12月9日。）

他一方面肯定了批评周、叶的政治局会议；另一方面又指出：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指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等的谈话追记记录，1973年12月9日。）

对江青所提增补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要”。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九日，毛泽东与王洪文谈话

谈话内容与周恩来谈话大致相同。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九日，毛泽东与唐闻生、王海容谈话

毛泽东说：这次会开得好，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对总理可以批评，林彪就不行。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指总理）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指江青）才是迫不及待。

（注：《唐闻生、王海容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七日给华国锋写的材料》，此件是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提供的。）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三十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会议商定：

（一）将毛泽东十二月中旬以来几次谈话要点下发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口头传达至县团级领导干部；

（二）在中央政治局内成立读书班，自一月一日起开始学习毛泽东最近关于外交工作、政治局工作和军委工作的几次谈话，并联系当前实际斗争进行讨论。

贰 本节简论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十二月五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周恩来、叶剑英在与基辛格会谈中的错误，是党内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可惜，由于材料极端缺乏，人们对这件事的了解，只能凭网络上的一些道听途说。现在也只能根据一星半点材料来讨论一些问题。

据《晚年周恩来》的作者高文谦说：“有关这次会议的原始记录，已经全部销毁。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周恩来临终前，曾向邓颖超谈了对身后最不放心的两件事，一件是伍豪启事，另一件就是七三年批他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讲了这次会议给他加的种种罪名，要她留心。文革结束后，邓颖超和叶剑英联名向中央写信，要求给这件事平反，经由华国峰批准，胡耀邦出面查找到后全部销毁。这件事情的前后经过，作者是根据对有关当事人的采访，参考一些当事人事后的回忆或揭发材料以及相关档案综合而成的。”

这件事确实发生过，应该是有案可查。下面根据现有的材料讨论几个问题。

一、毛泽东对这次会谈的批评对不对？

《周恩来年谱》说：11月17日，毛泽东依据不可靠汇报，误认为，周恩来在与基辛格会谈中说了错话。周恩来违心地作了检查。

《毛泽东传》说：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检讨，表示自己在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

关键在于十一月十四日周恩来与基辛格的会谈。

首先，可以回顾一下周恩来与基辛格会谈的过程。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日，基辛格抵达北京。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二日下午，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基辛格。

毛泽东对基辛格强调中美靠近是美国为了保护中国不受苏联侵犯的说法不满意
毛泽东对基辛格强调美国不能与台湾割断关系的说法也不满意。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十三日，周恩来、叶剑英等与基辛格举行多次会谈。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晚，基辛格举行告别晚宴

按照预定日程，基辛格将于 11 月 14 日晨结束访问，启程回国。然而，告别晚宴结束时，基辛格突然提议，希望再和周恩来举行一次单独会谈，继续讨论一下中美双方的军事合作问题。周恩来向毛泽东作请示，被告知“主席正在睡觉”。周恩来以时间紧急为由，遂自行决定与基辛格继续举行会谈。

从会谈的内容来看，基辛格采取的这一行动，完全是预谋的，是事先设计好的，是为了摆脱毛泽东对会谈的干预。

其次，从会谈的内容分析。

基辛格首先强调中国面临着苏联武装侵犯的危险。

周恩来说：对中国来说，不能不设想最坏的一种情况，作最坏情况的准备，即在一个时期内孤军奋斗，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作战思想；即使包括美方在内的几个方面同时向我们进攻，我们也准备了。

基辛格接着提出在中美之间建立热线联系问题。他说：以美国的卫星系统向中国提供早期预警，以便及时采取措施，保护中国的防空、防御系统（轰炸机、导弹等），或者在中美之间签订一个有关意外的核战争的协议（美国已草拟了文本）。周恩来表示：“有些东西可能对我们会有所帮助。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

很明显，这是基辛格设的一个圈套。他是用苏联的威胁，引诱中国接受美国的核保护伞，成为美国的保护国。

周恩来的答复，没有一针见血地揭穿美国的阴谋，而是半推半就地接受了美国的建议。

这就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了。

早在尼克松访华前夕，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周恩来、叶剑英再次接见黑格。答复四日黑格转达的美方口信，其中一点是：美方对中国的生存能力表示怀疑、并声称要维护中国的独立和生存能力的说法，令人惊讶。中国认为，任何国家绝不能靠外力维持其独立和生存，否则只成为别国的保护国和殖民地。社会主义的新

中国是在不断抗击外来侵略和压迫的斗争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并定会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

这次基辛格提出的建议，只不过是变换了一个手法而已。

再次，从组织程序分析。

在中美会谈结束以后，美方突然提出与周恩来再单独举行一次会谈，这是外交活动中的一个重大步骤，必须上报毛泽东批准。不能以时间紧急为由，绕过毛泽东独自去进行。所谓时间紧急，根本不是问题。因为是美方突然提出的要求，我方完全可以种种理由推延时间。

由此看来，毛泽东提出批评是完全正确的：“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

二、周恩来、叶剑英在中美会谈中所犯错误属于什么性质？

《周恩来年谱》说：会上，江青等人对周恩来和叶剑英进行围攻，斥责这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周恩来违心地作了检查。江青、姚文元还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污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

《毛泽东传》说：会上，江青、姚文元等乘机向周、叶进行围攻，严厉指斥这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污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等等。

另一方面，也有人对会议表现出极度不满，有人说什么：“这哪是什么帮助总理啊？他们明明是整总理嘛！他们是想要打倒总理啊！”有人说：按照会上的调子，周恩来已必然要被打倒，只是时间问题了。

周恩来、叶剑英在这次中美会谈中所犯的 error，属于右倾性质的错误。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在与资产阶级斗争时，容易犯“左”的错误；在与资产阶级联合时容易犯右的错误。

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参加会议的人，批评了周恩来、叶剑英的错误，这是完全正确的。这决不像有些人说的什么是整总理、想要打倒总理。所以，毛泽东充分肯定这次会议开得好。当然，有个别人在发言中上纲过高，如“丧权辱国”、“投降主义”，“第十一次路线斗争”，“错误路线的头子”，“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等等。毛泽东也批评了这些提法是错误的。

会后的事实说明：周恩来的工作没有变，周恩来在政治局的地位和作用也没有变。那些污蔑、攻击这次政治局会议的右派论调，统统破产了。

三、周恩来这一时期在外交工作上的错误与内政工作有没有关系？

有人说：林彪事件之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实质上已经破产，毛泽东在精神上和身体上都受到了重创，不得不退居幕后。周恩来基本主持了国家日常事务。他利用批林整风之机，在全国发起了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并积极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各行各业进行了政策调整，同时解放了一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然而，毛泽东可以容忍周恩来对现行政策做一些有限度的调整，也可以为收拢人心而解放一批人，但毛泽东不能容忍对文革本身的质疑和改弦更张。在观察了一段时间后，毛泽东确信周恩来就是要系统地纠正文革，最后将毛本人架空。于是，毛开始反击。在此期间毛泽东对他并不满意，归根结底在于认为周恩来始终不是真心拥护文革，而是存有异心。加上毛泽东晚年对于功高震主者极为敏感，无论是刘少奇还是林彪都在这上面摔了跤，如今轮到了周恩来。

这种右派论调既攻击了毛泽东，又歪曲了周恩来。把周恩来与毛泽东对立起来，是右派一贯地宣传把戏。

在国际上三个世界的错综复杂斗争中、在文化大革命尖锐复杂的斗争中，任何人都可能犯错误。

毛泽东自己就多次说过，他在处理罗瑞卿、杨傅余、贺龙等问题上，偏听偏信了林彪的一面之词，所以也犯了错误。

周恩来同样也会犯错误。例如，在批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与内部存在的极左思潮的关系问题、文化大革命政策的调整与防止反文革思潮泛滥的关系问题、联美反苏与联合反美的关系问题，等等，他也有不少错误。这些都引起毛泽东对他的不满，并多次提出批评。毛泽东的结论是四句话：“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但这决不是周恩来要对文革本身的提出质疑和改弦更张，不是要系统地纠正文革，最后将毛泽东本人架空。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工作中也犯过许多错误。特别是在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毛泽东对江青多次提出批评，要她尽量少干预党和政府的具体事务，而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国家的大政方针上。这也决不是要把他们排除在党的领导机构之外，更不是把他们看成是野心家、阴谋家，要把他们打倒。

2010 年 1 月 11 日初稿

2012 年 5 月 5 日修改

第九章第八节 评法批儒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要注意抓路线、抓上层建筑、抓意识形态，要学一点历史，要批判孔子。

一九七三年七月四日，毛泽东同张春桥、王洪文的谈话

他讲到“批孔”问题，表示不赞成否定秦始皇，认为林彪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

（毛泽东同张春桥、王洪文的谈话记录，1973年7月4日。）

一九七三年七月十七日，毛泽东会见杨振宁时又谈到儒法斗争的问题，

毛泽东说：“我们郭老，在历史分期这个问题上，我是赞成他的。但是他在《十批判书》里边，立场观点是尊儒反法的。”“法家的道理就是厚今薄古、主张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的路线，要前进。”

（毛泽东同杨振宁的谈话记录，1973年7月17日。）

一九七三年八月五日，毛泽东向江青讲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情况，

毛泽东说：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他当场念了他写的一首题为《读〈封建论〉呈郭老》的七言律诗：

劝君少骂秦始皇，
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
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
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

莫从子厚返文王。

一九七三年八月六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江青在会上传达毛泽东有关儒法斗争的谈话及所写的七律诗，并要求将此内容写入十大政治报告。

周恩来表示：对此需要理解、消化一段时间，不必马上公布。

一九七三年八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杨荣国的《西汉时代唯物论反对唯心论的斗争》。

一九七三年九月四日，北京日报发表梁效的文章：《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

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发表施丁的文章：《“焚书坑儒”辨》

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发表罗思鼎的文章：《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一日，发表劲云戈的文章：《右倾机会主义和孔子思想》。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一日，红旗杂志第十一期发表罗思鼎的文章：《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三日，中央对外联络部长的耿飏在部核心小组会议上说：“听说总理一次看到《光明日报》送审的清样时说，看来批孔文章太集中了。中央还没有正式文件，批孔搞一、二、三次就可以了。”

（耿飏在中联部核心小组会议上的谈话记录，1973年11月3日。）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的谈话

红楼梦问题，主席讲过多次。主席要许世友同志看五遍。中国古典小说最好的是《红楼梦》。吊膀子是现象，本质是政治斗争，真事隐去，不好讲，恋爱是现象。过去评“红”文章多讲宝黛爱情反封建。争夺厨房，上次请你们读 59、60 回，主席提的。只有从阶级分析观点去看，否则看不出来，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处理阶级关系去看，才能看得懂。

主席指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招安，是两条路线斗争妥协的结果，是内部斗争。前半部斗争，是逼上梁上还是妥协投降？革命路线胜利。后半部是招安与反招安的斗争，错误路线胜利，革命失败，最后被搞死。

批孔，写进社论。批孔，苏修也叫，国民党叫得厉害，蒋介石新年文告有一半内容讲这个，反对批孔，如挖了他的祖坟，洪水滔天。国民党精神虚弱极了，不得了了，大叫大喊，说我们几十年搞批孔，五四从批孔起来。

贰、本节简论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以后，在党内外出现了一股反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潮流。毛泽东敏感地发现在一种倾向下掩盖着另一种倾向。他反复地提醒全党要注意这种倾向。毛泽东在党的十大召开前夜谈到中国历史上的儒法斗争，着眼点仍是针对现实生活中那些怀疑以至否定“文化大革命”、留恋和主张恢复“文化大革命”前许多做法的倾向，提倡“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这是毛泽东当时最关心的问题。

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要注意抓路线、抓上层建筑、抓意识形态，要学一点历史，要批判孔子。

一九七三年七月四日，毛泽东同张春桥、王洪文谈话，他讲到“批孔”问题，表示不赞成否定秦始皇，认为林彪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

一九七三年七月十七日，毛泽东说：《十批判书》里边，立场观点是尊儒反法的。”“法家的道理就是厚今薄古、主张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的路线，要前进。”

一九七三年八月五日，毛泽东向江青讲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

一九七三年八月六日，江青在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上传达毛泽东有关儒法斗争的谈话及所写的七律诗，并要求将此内容写入十大政治报告。周恩来表示：对此需要理解、消化一段时间，不必马上公布。

根据毛泽东关于批孔的指示，报刊上发表了几篇批孔的文章。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三日，中央对外联络部长的耿飏在部核心小组会议上说：“听说总理一次看到《光明日报》送审的清样时说，看来批孔文章太集中了。中央还没有正式文件，批孔搞一、二、三次就可以了。”

这种情况说明，周恩来对当时党内的路线斗争、社会上的意识形态斗争，反映比较迟钝。这种情况大约就是毛泽东批评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吧！

2010年1月4日初稿

第九章第九节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说：“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个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你（指叶剑英）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

他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几年了，主要问题是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政治委员不走。”

他提议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说：“步调要一致，不一致就不行。”他接着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追认。”

他又说：“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我毫无办法，我无非是开个会，跟你们吹一吹，当面讲，在政治局。”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讲话记录，1973年12月12日。）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政治局成员转到人民大会堂，在周恩来主持下继续开会。

会议一致同意邓小平列席政治局会议和参加政治局工作，并作为政治局成员将提到十届二中全会批准。同时，同意邓小平补为军委委员，参加军委和军委办公会议的工作；同意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周恩来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12月14日。）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央军委办公会议部分成员会议。

周恩来参加。

会议讨论召开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扩大会议和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准备工作，并提出初稿方案。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毛泽东与政治局几个人谈话。

毛泽东一开头就问：“你们议了一些什么，行得通吗。”

接着说：“在一个地方太久了不好。相互调动，又不开除你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军区司令员，照样做官嘛，照样革命嘛，换个地方革命嘛。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而且要议政。不议政，军队政治思想工作就提不起纲来。”

（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谈话记录，1973年12月13日。）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四日，毛泽东找政治局有关同志再谈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的问题。

他在这次谈话中两次提议大家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他说：“大军区司令员调动，你们商量了吗？看有没有这个必要？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做久了，就不大好了。调动也有问题。比如，‘辽联’、‘八三一’（辽宁省的两派群众组织。——引者注）就会批你（指陈锡联。——引者注），那也不要紧。……各省都要做工作，分两派的地方要打一点招呼。我看呢，要招呼各地的政治委员，要欢迎呢。机关干部，找来一二百人，不要太多，军事机关。总之要欢迎。”他又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了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指邓小平。——引者注）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至于德生同志走了，还兼不兼总政治部，我说，不要兼了吧！”

（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谈话记录，1973年12月14日。）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周恩来传达毛泽东关于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邓小平任职等指示。

根据毛泽东意见，会议商定了来京参加中央军委会议成员名单，并研究了大军区司令员在地方一律不要兼职等问题。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同政治局有关同志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

他一开始就说：“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也不太好。要革命，哪个地方都可以革命嘛。”

他说：“从一个地方一走，有一派就要贴大字报。这个事情要好好研究。你要贴，何必贴得那么早呢？” “老吹不是一个好办法，要少吹多批。有些同志专批人家，人家批他一句都不行，像挖了他三代的祖坟呢！动不动就说人家是‘三反分子’、‘五一六’。真是三反分子也不要紧么，让他去吧，人民会管他们的，有什么要紧。犯点错误，改掉就好。” “互相对调，这个办法就是河南人发起的。这个军分区呆不了，就调得远一点去，那个军分区就欢迎。那个军分区调到这里也欢迎。” 毛泽东指挥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他说：“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林彪步调不一致，所以不能胜利。什么大舰队，小舰队。” 他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他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不做工作，就不会犯错误。一做工作，总要犯错误的。不做工作本身也是一个错误。” 他说：“现在好多人看不起儿童团。我也是儿童团过来的，你们都是吧。你们那个青年时期，二十几岁，就那么高明，我就不相信。”

最后，他说：“要准备打仗！”

（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记录，1973年12月15日。）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同济南军区负责人谈对调问题。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同武汉军区负责人谈对调问题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各大军区负责人全部到京。

根据安排，由中央政治局成员分别同他们就对调事谈话。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成员，

共四十三人，花了一小时二十分钟。

他先同到会人一一握手，

毛泽东对韦国清（中央军委委员、广州军区政委）说：“老朋友，你不是韦国清吧！样子变了嘛，胖了嘛。你要多帮助许世友同志。他到那里，人生地不熟啊！”

毛泽东对秦基伟（成都军区司令员）说：“你刚到四川吧，所以你不能调呢，刚到的人都不认识。”

毛泽东对徐向前说：“向前同志，身体还好吗？你是好人啊。”

毛泽东对聂荣臻说：“荣臻同志，你是好人啊！”

毛泽东对朱德说：“老总啊，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他们。我说是红司令，还不是红了吗？” 他说：“你陈（锡联）司令，济南的杨得志同志，南京的许世友同志，这几个同志呢，在一个地方搞得太久了。这个李德生同志、曾思玉同志、丁盛同志倒是搞得不那么久呢！你们带个头呢。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就会照样去做。”“到一个新地方有很多困难呢，不熟人，不熟地方，不熟党，不熟军，党政军民都不熟。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许世友：有党，有同志们，可以学习。）慢慢来，就会顺手。”“你们呢，要交好班呢。有困难啊，人生地不熟。有些人就批你们。大多数呢，舍不得你们走呢。”

他对韩先楚说：我不是跟你讲过嘛，这个世界上这类事啊，心放宽些，胆子壮些。心要宽，胆要大。无非是做官嘛，革命嘛，一个不撤，一个不批吧！你们想一想，总是有些缺点，十个指头有一个指头的缺点。一切错误都是我。我错误大呢，比你们大，所以屡次想辞掉这个主席。八大我还设了一个名誉主席，就是为着我想当个名誉主席，让别人当主席。” 他对许世友说：“许世友同志，你现在也看《红楼梦》吗？（许世友：看了，自从上次主席批评我，就全部都看了一遍。）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呢。（许世友：那没有看那么多，我还刚看一遍呢。一定坚持看下去。）他那是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所以有两个人，一名叫甄士隐，一名叫贾雨村。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吊膀子这些是掩盖它的。”“中国古代小说写得好的是这一部，最好的一部，创造了好多文学语言呢。你就只讲打仗。（许世友：主席讲的这个话，确实打中要害。）你这个人以

后搞点文学吧。‘随陆无武，绛灌无文。’汉书里边有汉高祖和陆贾的传，那里边说的：‘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许世友：应该搞点文。）你能够看《红楼梦》，看得懂吗？（许世友：大体可以。）要看五遍。（许世友：坚持看五遍。）

《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绛是说周勃，周勃厚重少文。你（指许世友）这个人也是厚重少文。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许世友：把它消灭！不怕，那有什么关系！）不怕啊！你就作周勃嘛。你去读《红楼梦》吧！”毛泽东说：“我向基辛格讲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其实只有一句话：当心！北极熊要整你美国！一整太平洋的舰队，第七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他对朱德说：“朱毛啊！你是朱（猪），我是朱（猪）身上的毛啊！”

他说：“我看对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当时我对他讲了：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保护他呢。不过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周恩来：一支小手枪，后来交了。）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有几次听一面之辞，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S e l f c r i t i c i s m，自我批评。”他对朱德说：“红司令，现在没有人骂你了吧！（朱德：没有了。）那好些了。这位同志跟我们一起几十年了。（朱德：四十年了。）我跟你，四十年了。”

他又指着邓小平说：“这位同志也是。邓小平同志现在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了。他呢，我喜欢他，有些人有些怕他。打起仗来呢，此人还是一个好人啊！姓邓，名小平。”周恩来看会见的时间很长了，说：“唱个歌吧！”

毛泽东说：“就散了啊！”

这时，由李志民（福州军区政委）指挥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唱了第一段。

毛泽东说：“不错，就是这一条要紧。还有八项注意，第一注意，第五注意。第一项注意，说话要和气，第五项注意，是军阀作风不要呢！”

他又亲自指挥大家唱完了这首歌，宣布：“散会。”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邓小平任职（即日起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的通知。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命令。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召集在北京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

由王洪文传达毛泽东关于各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和邓小平任职等问题的几次谈话要点。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三十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会议商定：通知所调任的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均出席年底或元旦军民联欢会，并由新华社公开报道；

贰、本节简论

关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

毛泽东说这个事已经考虑几年了。

他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几年了。”

为什么想了好几年才作出决定？可见这个问题牵涉面很大、影响度很深。

第一，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就油了。认为情况已经熟悉，不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第二，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就往往容易偷懒，认为反正是那一套，不再解放思想，大胆创新。

第三，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就往往容易形成以个人为核心的关系网，认为下面的干部都是自己人，不讲原则，只看关系。

第四，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就往往容易把自己管的地方看成自己的领地，认为自己的事自己说了算，不尊重中国央的统一领导，搞独立王国。

第五，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拍板就算。

一个大军区司令员，如果再加上地方兼职，那就是这个地方的党政军民学由他一个人统管，而中国的一个大军区，比欧洲的任何一个个国家都大。如果形成一个个独立王国，那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总之：

第一，文化大革命以后，大军区司令员的权力已经大大地扩充了，不仅管所属的部队，而且还管所属的地方的事务。

第二，这时大多数大军区的司令员，都已经在现岗位上任职多年。

第三，林彪事件发生后，暴露一些大军区存在不少问题。

这种局面不解决，有可能形成某种地方割据、中央指挥失灵的形势。

2010年1月18日初稿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十章 批林批孔

第一节 新阶段新任务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四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元旦献词》

一九七三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一九七二年增长百分之八以上。农业连续十二年丰收。粮、棉、麻、糖、烟的产量达到了新的水平。工业生产大幅度增长。钢、钢材、有色金属、原油、电力、木材、机械等重工业产品，棉纱、棉布、化学纤维等轻工业产品，化肥、农药、农机等支农产品，都完成和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

在新的一年里，首先，要继续深入搞好批林整风。要继续搞好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要抓紧有利时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人民解放军要继续学习和执行毛主席的建军路线。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批判林彪宣扬的孔孟之道，才能进一步批深批透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这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坚持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为什么他拚命鼓吹孔孟之道呢？就是因为孔孟之道是复辟之道。他和孔孟的反动思想体系是一致的，都要复辟旧制度，妄图把历史拉向倒退。

林彪在九大以后多次鼓吹“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充分暴露了他迫不及待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野心，把复辟资本主义作为万事中最大的事。

林彪把反动的“天才论”作为反党的理论纲领。他自比天马，以“至贵”、超人自居，狂叫“天马行空，独往独来”，阴谋篡党夺权，妄图实行独裁统治。

林彪叫嚣“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用儒家的语言，恶毒攻击革命暴力，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林彪叫喊中庸之道“合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攻击反修斗争“做绝了”，妄图投降苏修，把我国变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林彪说他是“勉从虎穴暂栖身”，“随机应变信如神”，不打自招地道出了他是睡在我们身旁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他使用的是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段。

林彪攻击“五·七”道路，污蔑干部下放劳动“等于变相失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妄图破坏毛主席制定的反修防修，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伟大战略部署。

林彪教子尊孔读经，还把奴隶主头子周文王临死前对武王传授的统治经验，作为“教子经”抄录给他的儿子，梦想建立林家世袭王朝。

凡此种种，都证明批孔确是批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挖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老根，是为了更好的批林。批林批孔是我国当前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彻底革命，是对封、资、修的宣战，是对帝、修、反的沉重打击，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

要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坚持革命，反对倒退，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满腔热忱地支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

要经常研究批林批孔斗争的新动向，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广大工农兵是批林批孔主力军。工农兵起来了，批林批孔才能批深批透。

一九七四年三月三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批林批孔 搞好春耕》

批林批孔，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随着这个运动的深入发展，我国几亿农民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必将进一步提高，革命精神必将进一步发扬。

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认清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

批判林彪鼓吹的“生而知之”的天才论和“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学习奴隶们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

批判林彪贩卖的“中庸之道”，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我们要紧紧抓住批林批孔这个头等大事，从根本上提高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提高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使批林批孔成为推动春耕生产和各项工作的强大动力。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抓批林批孔 促工业生产》

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批林批孔运动正在全国各条战线上健康地、胜利地发展着，革命和生产的形势都非常好。工业交通战线上的形势也是一派大好。

当前，工业交通战线批林批孔运动，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重要内容之一，同样是解决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揭发批判林彪及其死党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这样，抓住了党的基本路线这个纲，就能更好地解决工业交通战线的具体路线和政策问题。要牢牢掌握批林批孔这个中心，防止纠缠于某些问题而转移斗争的大方向。

工业交通企业要继续批判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破除崇洋迷外思想，高度重视群众的伟大创造力，支持广大工人、技术人员在技术革新和科学研究方面所作的努力。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四日，李先念华国锋对参加抓革命促生产座谈会的各省市负责人的讲话

李先念说：

“这次会议是中央政治局批准召开的，总理知道，主席也知道。我们要你们多开两天是为了等社论和 12 号文件。多留几天值得。”

“车皮总是调度的不大合理。昨天晚上我在政治局讲了，津浦、京广两条干线不够畅通，只好把大同、开滦的煤绕道由大连上船运往上海。看起来不合理。但按目前情况，还是合理的。看起来不合经济核算，但总比在那里停着好。山西煤运不出去，可不可以把北京的汽车抽出几千辆去山西运煤，行不行？这个现象是暂时的，会很快改变。通过现象看本质，批林批孔运动的形势好的很”。

你们湖南要支援广交会一下嘛！

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回潮，主要来自中央部门，一机部长春会议就反映了这个问题。一机部来人了没有？请打电话找来。上海工人同志提的意见是对的，我也有责任。有的批评不那么准确，不要紧，基本精神是好的，应该欢迎。如果要求人家的批评一点出入都没有，那就不要人家批评就是了。大概秋里同志讲了一些错话。在怎样办好企业问题上，贯彻《鞍钢宪法》，依靠工人阶级，坚持群众路线，加强党的领导，还没有解决好。

天津市有个工厂规定心跳 200 次、血压 >90、发烧 40 度，才给病假。还规定工人一天只能小便两次，每次不能超过十分钟。这不是管、卡、压吗？这是那里规定的？这个问题揭的好，让他自己（指厂领导）先执行好了。有的同志就是喜欢压工人，根本没有群众观点。制度还是要的，但要依靠党的领导，依靠工人阶级，提高工人觉悟，不能光靠你的那个制度。

有的省看来很乱，但乱不能怨群众，还是领导的问题。有的对群众说不服就压，压不服就抓。阶级敌人是有，斗争是复杂的，要按政策办事。

12 号文件发到县团级，可以向广大群众传达。但不能张贴。

12 号文件的基本精神是强调加强党的领导，放手发动群众，搞好批林批孔。

第一段说，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联。不要认为不要这、不要那。这样可好了。不要借此压群众。不要光看第一段，主要在第三段。

第二段讲，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在三支两军中作出了巨大贡献……，要揪军代表。当然支左中有部分同志犯了这样那样错误，也不要揪回去。揪回去有什么好处。不是给光荣、伟大的解放军抹黑吗？有的部里就提出要这个回来，要那个回来。有的批评意见可以送到所在部队的领导机关。部队各级党委和被批评的同志应当欢迎。在那个形势下，解放军起了伟大作用。当然，也有林彪的死党，那就不同了，要肯定三支两军的伟大成绩，要讲三支两军的伟大成绩。

第三段说：应强调指出，批林批孔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批林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批孔比批林更困难的，怎么理解？有人说：读古书困难，董仲舒和历代儒家代表人物，都把孔孟之道加以发展，成为系统的东西，读起来比较困难一点，不只是这样，主要是从政治上讲的。这个问题要好好研究一下。孔老二要恢复奴隶制度，以后的封建制，同样用孔孟之道作为他们反动统治的思想武器。

12号文件总的精神是加强党的领导，放手发动群众，搞好批林批孔。党的领导就是要执行正确路线，你领导群众犯错误，大家不干。

有个工厂有些人要求增加工资，去找党委书记，党委书记就带着他们去造劳资的反。这怎么算党的领导？武汉有个银行，还是个很小的银行，他们对闹经济主义的就是不给开支，顶得好。中央打电话支持这个银行。你不合理，闹经济主义，就是不该发嘛！

加强党的领导，就要执行正确路线，执行正确的政策，人家本来不是反革命，你把他打成反革命，他怎么高兴？本来是反革命，你一风吹，这怎么行？有的一说加强党的领导，就不发动群众了，这也不对嘛！有极少数干部挑动群众斗群众，不批林、不批孔，又不联系实际，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煽动经济主义，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个县委书记就是这种人，跑了四个月，每月拿工资，煽动经济主义妖风，北京就有他的联络站。还有一种情况，运动来了，干部病号特别多，有的运动一来就搁担子。本是病了应该住院，有的不是这种情况，温度37℃，脉搏70到80就住院了。一个共产党员，这样行吗？

搁担子的，群众批一下也应该。批林批孔运动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上贼船的，用江青同志话讲，要用一百二十吨的吊车往下吊。人民内部矛盾，就

是要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要搞串联，一搞串联，分成两派，就把林彪、孔老二放掉了。

城乡交流有点不畅，现在不是没有猪，没有鸡，主要是没有很好的抓，对人民生活也有影响。要沟通城乡关系，加强收购工作。你们管工业的也要管管商业，

经济领域修正主义回潮，强调制度多了，制度还是要的，但问题是制度建立在什么基础上，不能搞管、卡、压，要靠群众自觉地执行。

还有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冶金部有个高扬文，他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对群众有刻骨仇恨，高扬文的材料可以每人发一本，有个按语，江青同志、文元同志看了，认为写的还可以。

农村的资本主义倾向不可低估，极少数地区有人煽动农民进城。对银行正确的东西要支持，围攻银行不是一个地方，要说服群众。是不是群众自发干的？不是的，背后是有走资派支持的，还有阶级敌人破坏。唐钢家属工二百多人闹经济主义，到冶金部、中南海闹，查了一下是支部书记的老婆，还有几十个共产党员的老婆。我们就通知了河北省委，唐山市委连夜赶来。我说一定有后台，这个话说的厉害了些，共产党员动员老婆闹，不好嘛！这些人就回去了。一定要把坏人揭露出来，如果现在都搞临时工转正，附加工资等，就冲淡了批林批孔大方向。

要坚定不移地贯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对进口的东西要审查，如造船工业我们有基础，可以搞，就不要进口运输船，要立足于国内，该进口的还要进口，为了抢时间，港口工程船要进口，把货单审查一下是必要的，港口堵塞，外轮老罚款，影响很不好。

华国锋说：

主席讲了，不搞串联，不搞战斗队。

山西陈永贵同志传达了，北京倪志福同志在中央发文件前也用自己的话讲了。

主席还讲了，“批林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批孔比批林更困难些”。

为什么主席提这个问题呢？是不是孔孟的书，语言文字难懂呢？恐怕主席讲的不只是这个意思。历史上，一切反动派都是用孔孟之道麻痹人民，作为统治人民的思想武器。先是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来宋朝的朱熹又发展了一

下，更系统了。到元朝把孔老二吹的更高了，到了清朝就加了“大成至圣先师”等头衔。后来连不读书的袁世凯、宋哲元、张宗昌等也都尊孔，蒋介石也是把孔子抬出来搞什么“新生活运动”，现在台湾还在祭孔。盖孔庙，不仅是中国历代统治者利用孔孟之道统治人民，就是外国人侵略中国，也是用孔孟之道麻痹人民。日本要在中国建立什么“王道乐土”，就是如此。林彪搞“克己复礼”也是用孔孟之道作为他的反动思想武器，历史上一切反动派都是如此。批孔比批林更困难些，过去儒法两家一直斗争。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主席评价很高，毛主席一直是反孔的。在毛选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批孔。这篇文章点了戴季陶，戴就是尊孔的。第二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讲到“温良恭俭让”，讲到“四权”，这些都是批判孔孟之道的。主席从民主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很多文章是批孔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中，也都提到批孔。我们应该认识到，批林批孔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孔老二的流毒是很深、很广的。听说日本也有孔庙，他们也读过四书五经，朱熹把孔孟之道编成课本，读书必须读它。从上层领域里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来讲，批孔比批林更困难些。是不是这样理解，请同志们研究。

有人提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当时条件还不能全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就有这个条件了，批孔是批林的关键，是挖林彪的根子，要好好理解。

十二号文件，总的精神就是加强党的领导，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各级领导干部要站在运动前列，大胆领导运动，如果压群众，捂盖子，就会犯错误。如果跟在群众后面跑，有人闹经济主义，人家一说增加工资，你说行，就领他们他到劳资科那里去，你非犯错误不可。

已经回部队的三支两军人员，不要再回支左单位参加批林批孔。对群众提的意见，要持欢迎态度，即要听群众的意见，纠正错误。又要坚持原则，大讲三支两军的业绩。

这次运动的矛头，是指向林彪、孔老二，批的好，大家都有提高。不好好学习钻研，你的话就说不深，说不到点子上。比如“人之初，性本善”，如何用马列主义观点去理解它，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柳下跖骂孔老二骂得好。我们现在

报纸上登了女大学生嫁给农民，本来是表扬的，有的同志提出为什么要写嫁给，这不是孔老二的男尊女卑吗？你写个女大学生和农民结婚不是很好吗？这也是孔老二的流毒。

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同意并批转国家计委《关于 1974 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

报告中拟订的 1974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要求是：

工农业总产值 4210 亿元，比上年预计增长 7.1%。

其中工业总产值 3000 亿元，增长 8.3%；

农业总产值 1210 亿元，增长 4.3%。

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国务院批转国务院科教组《关于内地支援西藏大、中、专师资问题意见的报告》的通知

一九七四年五月一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调整国防工业管理体制的决定

一九七四年五月四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纪念五四运动五十五周年》

五四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战斗口号，把批孔同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结合起来，对孔孟之道进行了猛烈的冲击，对尊孔复古的反动顽固势力，展开了英勇的斗争。正如毛主席说的：“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

当前正在进行的批林批孔运动，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对国内外敌人长期斗争的继续。

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以及五四运动以来的历史都告诉我们，批判孔孟之道是一个需要反复进行的艰巨的斗争任务。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反孔与尊孔的斗争，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阶级内容和政治内容，但都是当时阶级斗争、党派斗争的一种形式，是政治思想领域两条路线的

斗争。尊孔复古，总是代表着倒退和复辟的没落阶级的利益。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我们要坚持党的基本纲领，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就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批判孔孟之道，在上层建筑领域中一步一步地清除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

毛主席曾经指出：“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还缺乏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没有把儒家和法家的斗争看作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他们反对儒家是很对的，却没有对法家的进步作用给予必要的历史的肯定，对法家的著作也缺少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分析，因而也就不可能彻底打败儒家思想。

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以工农兵为主力，包括广大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在内的几万万人的大军，朝气蓬勃，英勇战斗。大批的批林批孔的先进人物不断涌现。大批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在斗争中成长。

一九七四年六月三日，国务院关于恢复和新建一些高等院校的通知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五日，国务院批转国务院科教组《关于 1974 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请示报告》

一九七四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党是领导一切的》

在运动中，根据“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原则，党委内部开展正确路线对错误路线的斗争，正确思想对错误思想的斗争，对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党内生活的正常现象。它使我们党的组织更富有战斗力，能够更有力地来领导运动，而决不意味着可以削弱党的领导。

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对于群众运动中出现的某些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要坚持原则，加以引导。牢牢掌握批林批孔斗争的大方向，大胆地领导运动。

一九七四年七月一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国家计委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当前工农业生产问题的汇报提纲》

农业方面，全国夏粮总产量预计 840 多亿斤（实际是 922 亿斤），超过了上年。

二、工业方面，1974 年上半年工业生产不少地区和部门没有完成国家计划。“主要问题是煤炭和铁路运输情况不好，钢铁、化肥等产品和一些军工产品也欠帐较多，对整个国民经济和战备影响较大”。

铁路运输方面。由于发生动乱，很多路段不畅通，所通过的列车比正常情况少 1 / 3 左右。

财政收支方面，1 至 5 月份，全国财政收支比上年同期减少 5 亿元，财政支出比上年同期增加 25 亿元，出现财政赤字 5 亿元，而上年同期是收大于支 27.4 亿元。

一九七四年七月一日，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

1974. 07. 01；中发 [1974] 21 号

毛主席已圈阅

一、批林批孔运动已经在全国城市和农村普遍开展起来，正朝着深入、普及、持久的方向发展，人民群众发动起来了，形势很好。在批林批孔的推动下，全国夏收作物又一次获得丰收，总产量超过了去年。工业生产有了新的增长，幅度较大的是北京、上海、天津、辽宁、黑龙江、河北、河南、广东、广西、陕西、甘肃、宁夏等省、市、自治区。总的来说，生产形势是好的。完全可以相信，随着批林批孔的不断深入，工农业生产的形势将会越来越好。

二、从上半年的工业生产情况看，还有一些地区和单位没有完成国家计划。当前突出的薄弱环节，一个是煤。一个是铁路运输。一至五月，全国重点煤矿共欠煤炭八百三十五万吨，其中山东、安徽、江苏三省，河南平顶山、河北峰峰两矿，欠产煤炭七百六十万吨。尽管开滦、大同、阳泉等不少重点煤矿，超产甚多，贡献很大，但三省两矿的大幅度减产，拖了全国的后腿。铁路运输多数单位是好的。主要是徐州、长沙、包头、贵阳等少数区段，经常堵塞。使津浦、京广、京包、贵昆四条干线不能畅通，严重影响了全国的货物运输。造成不少企业停工减

产。钢铁、有色金属、化肥、水泥等产品的计划和军工生产计划，都完成得不好。这里有缺煤和运输的问题，也有企业本身的问题。武钢、包钢、和武汉重型机床厂、太原重型机器厂，成都一三零二厂等企业，大量减产。主要是内部因素。这些情况必须引起我们严重注意。

三、有些省、市、区和城市以及一些企业单位的减产，最根本的原因，还是革命没有搞好，批林批孔没有搞好。林彪修正主义路线没有得到认真的揭发和批判。领导的思想 and 政治路线不端正，党的政策不落实，群众不满意。运动一来，有少数领导干部又不是积极的站在运动的前面，领导好批林批孔，纠正错误，落实政策。许多人有错不认错，使矛盾激化。有少数领导害怕群众，不打自倒，一轰就跑；擅离职守，放弃领导；甚至躺倒不干，有少数领导干部，不坚持原则，违反党的政策，随意表态，造成了思想混乱，影响了群众的团结。还有少数的领导干部，捂盖子，保自己；支一派，压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煽动经济主义，以破坏生产来破坏革命。在这样一些情况下，党的路线、政策贯彻不下去，群众团结不起来，一小撮阶级敌人，乘机兴风作浪，进行破坏和捣乱。

四、八年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又一次证明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中央希望所有革命的领导干部，都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一系列指示，焕发精神努力工作，同群众一起，搞好批林批孔。在工作中犯有错误的领导干部，要作认真的自我批评，为上级和群众承担责任，取得群众的谅解。同时也教育群众和干部，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不准抓人打人。要认真落实党的政策，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把广大干部和群众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五、凡是擅离职守的领导干部，在听到本通知传达的半个月內，必须返回工作岗位。逾期不归的，停发工资。情节严重的，要经过群众讨论，给予必要的纪律处分，直至撤销他们的职务。其他擅自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的人员，要动员他们迅速回到本单位，搞好革命和生产。经过说服教育，仍然不回来的，也要按照旷工处理。

六、经济主义是腐蚀无产阶级队伍，破坏批林批孔的修正主义思潮。各级领导同志和革命群众，都要提高警觉，坚持原则，坚决煞住经济主义妖风。中央

重申：当前为了集中力量搞好批林批孔，对于群众中提出的有关劳动工资和经济政策方面的问题，一律放到运动的后期，经过调查研究，具体分析后，统筹解决。

七、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项原则。什么是正确的潮流，什么是错误的潮流，要作阶级的分析。我们要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马列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那种不作阶级分析，笼统地讲什么：“只要造领导的反，就是反潮流”的说法，是错误的。有的人不批林、不批孔，不上班、不劳动，违背中央一九七四年十三号文件的规定，继续搞跨地区、跨行业的串连，拉山头，打内战，还把这种行为说成是反潮流的革命行动，这是对反潮流的严重歪曲。还有人散布什么“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谬论，公然煽动停工、停产，对于这些错误言论，必须给予批驳。对于幕后操纵者，要发动群众揭发批判。

八、充分发动群众，发挥专政机关的作用，坚决打击破坏批林批孔、破坏工农业生产、破坏交通运输的阶级敌人。对那些盗窃欺诈犯、杀人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必须实行专政，对于贪污分子和投机倒把分子也要进行打击。

九、中央号召所有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要充分发挥作用，和广大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团结在一起，模范的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要就地闹革命，严格遵守劳动纪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夺取批林批孔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各地的党组织和各地的报纸、刊物和广播，都要表扬这些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批林批孔搞得好的，促进了生产的模范人物。宣传和推广他们的经验，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为国家做出新的贡献。

十、各级党委都要深入学习中央今年以来发布的一系列文件，分析当前的革命和生产形势，在抓好批林批孔的同时，于最近时期，认真检查一次国家经济各项计划的执行情况，发动广大干部和群众，订出增产节约的有效实施计划。完成得好的地区和单位，要继续努力，做出更大的成绩。完成得不好的，要迅速赶上来。

本通知发到县、团级，传达到广大群众。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将讨论和落实的情况上报中央。

一九七四年八月，毛泽东指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一九七四年八月四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不得擅自翻印、转抄、散发毛泽东和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讲话及中央文件的通知

一九七四年十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前进》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复辟资本主义，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内四次大的路线斗争，都是围绕着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进行的。党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这样的斗争，今后还会长期进行下去。在经济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并没有因为所有制的改造取得基本胜利而结束。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占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努力使社会主义的江山永不变色。我们要继续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在群众性的清查工作已经初步告一段落的单位，应当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到学习和批判上来。

我们要坚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认真总结和推广那些革命和生产搞得好的先进单位的经验，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第四个五年计划。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

1974. 10. 11；中发 [1974] 26 号

毛主席已圈阅

中央决定，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毛主席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中央已经发了几个通知，传达了毛主席各项指示精神。在毛主席指示的指引下，批林批孔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各条战线的形势越来越好。在国际上，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不断取得重大胜利。天下大乱的国际形势，正朝着越来越有利于我们而不利于敌人的方向发展。

根据国内外的大好形势，中央认为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适宜的。中央希望各单位抓紧做好下列准备：

继续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要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这是运动深入的关键。要进一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发挥工农兵在运动中的主力军作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做好培养、壮大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工作。各级领导同志要注意保护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正确对待在运动中给自己贴过大字报的广大革命群众。决不容许打击报复，“秋后算账”。

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抓紧专案清查工作。全国在清查与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方面，经过三年的时间，总的来说，除个别单位和个别人以外，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清查大致差不多了。应当对清查出来的人和事加以分析，要坚持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严格区别、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对于极少数属于敌我矛盾的林彪死党，要继续清查、批判。对于少数犯了错误包括严重错误的同志，如问题已基本查清，要按照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作出结论，把他们解放出来。

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把社会主义的各项工作做得更好。要继续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表扬那些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批林批孔搞得好的，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的先进单位、先进集体和模范人物，总结、宣传和推广他们的经验。今年还剩下最后一个季度，要努力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全国军民务必提高警惕，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捣乱和破坏。人民解放军和广大民兵，要为保卫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作出新的贡献。

中央希望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进一步加强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发展当前大好形势，以实际行动迎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

这个通知可以传达到广大群众，但不登报、不广播、不贴大字报，在中央宣布召开人大以前，对外保密。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毛泽东与李先念、汪东兴谈话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严禁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自行到农村采购农副产品的通知

据反映，最近不少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不顾中央三令五申，不顾国家政策法令，直接到农村社队和农村集市采购粮食、油料、肉类、食糟、水产品以及药材、皮张等农副产品。有的抬价收购；有的用化肥、煤炭、机器设备等国家统配物资换购；有的用公车代社队运输，换取农副产品；有的同投机倒把分子勾结起来，进行非法套购，甚至围攻殴打市场管理人员，扰乱市场秩序。严重的是，某些单位的领导人对这种不正之风和违法乱纪行动，不仅不去纠正，反而支持纵容。这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在市场上的一种反映。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势必严重地冲击国家计划，破坏社会主义统一市场，使国家本来应该收购的东西收购不上来，能够供应的东西供应不足，造成人为的紧张。而且还会腐蚀我们的军队，腐蚀我们的干部队伍，影响工农联盟，助长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大开方便之门。必须引起我们严重注意。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毛泽东与周恩来、王洪文谈话
凡有两派的地方，民兵不要搞进去。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公安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关于边防检查站人民武装警察实行义务兵役制的请示报告》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传达毛主席指示

主席讲，国际形势，革命和战争因素都在增长，还是这个估计。主要倾向是革命这个提法，根据主席指示，最近没有多讲。会谈记录都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燕子忙，飞得低，雨要下了。总的是这个精神。打，最近几年还打不起来。天天讲缓和，因为有战争的危险。

主席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主席说：列宁为什么提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要专政？这个问题要写文章，要把列宁的话摘出来。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成修正主义。

主席上次接见丹麦首相哈特林讲过一个问题。有这么一段：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度变了。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要靠无产阶级专政加以限制或者调节。列宁说，小资产阶级时时刻刻都在产生资本主义。工人的一部分，党员的一部分，也会有这种情况。过去列宁说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会滋长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有的人会沾染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因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林彪上台，搞修正主义，搞资本主义复辟，是很容易的。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要读马列的书，要写文章。要使全国人民都知道，都能懂得。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上海开展计划生育和提倡晚婚工作的情况报告》等文件的通知

毛主席已圈阅。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各地的计划生育工作有了较大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从一九六五年的千分之二十八点五，下降到一九七三年的千分之二十一，预计一九七四年将下降到千分之十九左右。上海、北京、天津、江苏、河北等五个省、市，提前完成了“四五”人口规划指标。今年可能还有三、四个省达到规划要求。但是，发展很不平衡，到一九七三年底，除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外，仍有十三个省人口自然增长率

还在千分之二十以上。这些地区要实现“四五”人口规划指标，还需要作很大的努力。

上海等先进地区的经验说明，搞好计划生育，关键在于各级党委要把这项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切实加强领导，经常抓，抓得紧。要充分发挥妇联、工会、共青团等群众组织和政府有关部门的作用，做到各级有人抓，层层有人管。实行计划生育，是一场破旧立新、移风易俗的深刻的思想革命。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要抓好计划生育工作中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认真地反复地宣传毛主席有关计划生育的指示和党的政策，批判刘少奇、林彪、孔孟在家庭、婚姻、生育问题上的反动谬论，肃清其流毒，提高群众实行晚婚和计划生育的自觉性。要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在群众自觉的基础上，把生育计划落实到人，不要强迫命令。要普及节育科学知识，把避孕药具送上门，方便群众。医疗卫生部门要提高节育手术质量，加强妇幼卫生工作。各地要认真总结和推广先进单位的经验，把计划生育工作搞得更有成效。

贰、本节简论

一九七四年年初，毛泽东批发了江青等人组织编辑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

一九七四年上半年，江青等人抓紧在中央及各条战线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兴起。

各地的革命群众，特别是那些在九大以后受到错误打击、压制的原造反派，更是兴高采烈、闻风而动。有的人甚至认为，这是毛主席领导我们进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中央及时采取措施加以引导，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形势。

一九七四年下半年，中央的主要注意力就转到筹备四届人大上来，特别是四届人大常委会正副委员长、国务院的正副总理等人事安排上来。

一场复杂的斗争，在党内高层中进行着。

2010年1月25日初稿

第十章第二节 发动批林批孔

壹、 本节概述

一九七四年一月三日，人民日报发表唐晓文的文章《孔子杀少正卯说明了什么？》

公元前四九八年（鲁定公十二年，《左传》），孔子担任了鲁国管理司法、刑狱的司寇，并代行宰相职务。他上台不久，就利用职权，杀了革新派人士、法家的先驱少正卯。

孔子为什么杀少正卯？

孔子这个没落奴隶主贵族思想家，顽固地站在奴隶主阶级的立场，反对新兴封建势力的任何改革措施。孔子猖狂攻击“税亩”制，说什么“初税亩，非礼也。”（《左传·宣公十五年》）。在孔子看来，按田亩征税，承认封建土地私有制，这是违反了“周礼”。

当时法家先驱者们的主张和孔子的倒行逆施是相反对的。代表新兴封建势力要求的，在郑国有邓析，在晋国有范宣子等，他们主张实行同孔子完全对立的政治路线。他们提出了“法治”思想，反对孔子的“礼治”思想，主张用“法治”代替“礼治”，也就是用地主阶级专政代替奴隶主阶级专政。在鲁国，少正卯也是主张这条政治路线的。他和孔子同时讲学，唱对台戏。孔子的学生几次被少正卯吸引过去，造成“三盈三虚”的局面。可以看出，当时这场意识形态的反复斗争，是非常尖锐的。因为少正卯的思想，正是反映了当时时代发展的要求，因此，孔子对少正卯的思想极端害怕和仇恨。所以，当孔子一朝掌权，就残酷镇压新兴的封建势力，杀了政敌少正卯。

孔子杀少正卯的事件，反映了春秋末期奴隶主阶级和新兴封建势力之间严重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它说明了当时保守和革新、复古和反复古、倒退和反倒退的尖锐斗争；说明了在阶级社会里，“群而不党”是骗人的鬼话，任何思潮和学派，从来都是有强烈的阶级性和党性的，腐朽反动的旧思想、旧意识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在历史上是这样，在社会主义时期也是这样。尊孔与反孔的斗争，作为上层建筑领域内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部分，仍然要在相当长的时期

内进行下去。资本主义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修正主义思想回潮和马列主义反回潮的斗争也要长期进行下去。我们一定响应十大的号召，继续深入批判林彪，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肃清孔孟反动思想的流毒，深入开展上层建筑领域的阶级斗争，夺取更大的胜利。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二日，王洪文江青就印发北大清华汇编《林彪与孔孟之道》给毛泽东的信

主席：

我们看了北大和清华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这份材料，觉得对当前的批孔有很大帮助。各地也迫切需要有这种简要的材料。我们提议，可否转发各省、市、自治区、各军兵种、各大总部、国务院各部，作为当前批林批孔的参考。现将材料呈上，妥否，请批示。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某日，毛泽东对王洪文、江青报送的《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批语

同意转发。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第 371 页）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载哲军的文章《孔子的中庸之道是反对社会变革的哲学》。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四日，王洪文在中央读书班的报告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给大家吹一吹，最近接触一些情况，有些省老大难解决不了，主要是路线没有搞对头，有些地方嘛，除少数坏人外，多数是领导人的路线没有搞对头，主要是没有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没有正确对待群众，没有正确对待运动。初期的冲击，如四川十二个厂的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带有普遍性，今天吹一下，希望起这个作用，就是大家能把毛主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指示重温一下。同志们正在学习毛主席最近五次

指示的重点，学习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这个问题已经涉及到了。抽点时间学习讨论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很有必要。

（一）为什么要正确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义

（二）无产阶级的伟大胜利

有的同志直到今天对文化大革命还像七、八年前那样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有的甚至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个别的甚至把文化大革命描绘得一团漆黑，简直像洪水猛兽一样；有的说，一搞文化大革命就毛骨悚然。

有的说文化大革命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今后也不要再搞了。特别是高中级干部，说法是各式各样。

有的说“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取得了伟大胜利，但是在我们这里看不到”。有些人不分青红皂白；有一些单位的坏事归罪于文化大革命，或者说是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最近我们解决四川十二个厂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没有深入批林，关键在这里。大同坦克厂，闹了八年，这次两个月解决了；主要是原来的路线搞错了。

江西省就有人在干部会议上传达反革命谣言：“打扫庙宇，请进真神，老师归位，小兵回营”。这个谣言是从部队里的两个高级干部哪里传出来的。江西省当作毛主席的指示，在几百万人的干部会上传达。毛主席严厉的批判了这个反革命谣言，把它改成“打扫庙宇，请进真神，老师归线，小兵提升”。最近看到一个电报，现在小兵都造反了，搞两个头头，弄得“不亦乐乎”。我同江西的一些同志说过，你们那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还有人说，文化大革命好是好，但形式是不是非要这样搞？

有些人“称赞”文化大革命，说文化大革命群众不听话，动不动就贴大字报，开会七嘴八舌；这很对嘛！

有人说：“老干部过去南征北战，文化大革命七斗八斗”。

还有一种人，对文化大革命打倒了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个关系到国家不变颜色的事，根本不想，对群众的冲击，总是耿耿于怀，解放了、上台了、一有机会就想整群众，江西省的干部就是如此。

有人说：“文化大革命被揪斗，账总是要还的，不拿利息就不错了，出口气有什么不可以？”

还有一种倾向，认为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是极“左”实质，不久前有个大学有人说：“极左不批，是非不明，最大的证明，是十七年的功过，谁人评说？”

有人说这个“中央下发的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不灵了，说这个“纪要”是极“左”思潮的产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的争论还没有结束，二中全会以来有一股右倾思潮在各地时隐时现，如新疆的龙书金、四川的梁陈、河南的干部都是这样的人物。他们转移批林斗争的大方向，企图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攻倒算。有的地方在讨论修改宪法、党章时，就不同意写上走资派。少数人现在还对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甚至说造反派没有好人！一场文化大革命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不分，造反派中混进了少数坏人，这有什么奇怪呢？有人骂我们是造反起家的。他们有套说法：“老干部回岗位，新干部回单位，支左人员回部队，文化大革命是场大误会”。

毛主席最近还说“中国要出修正主义，同志们要注意呀”。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也不议政。毛主席这些指示，适用于政、军、学。东南西北各个地方，就是告诉我们要抓大事，值得同志们议论。今后出修正主义，还是在上层建筑领域。

毛主席最近指示，并亲自要我们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就是要我们牢记步调一致才能得到胜利。我们对毛主席的指示要有正确的认识和理解，以便更好地贯彻“十大”精神，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三日，江青给空军领导人写信，要求他们开展批林批孔。

江青找迟群等人谈话，将他们派往海军、空军等单位点火放炮。

江青致信国务院文化组负责人，提出：我希望文化组的批林批孔运动能开展、深入下去，开花结果。材料不免，你们可以翻印。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三日，江青看了解放军报内部参考上刊登的关于二十军军直防化连在批孔问题上的反映后，亲自给防化连全体同志写了信：

“二十军防化连的全体同志，当我看到军报《内参》上有关同志们在批孔问题上有困难时，我正好收到了北大、清华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和《名词

解释》，这两个材料对你们会有帮助的。请谢静宜和迟群同志到你们那里宣讲，并送去二百份供批林批孔参考，有什么问题，可请谢迟两位同志转告我。

江青一月十三日

附送：1.《五四以来反动派、封建地主阶级学者尊孔复古文章摘录》；2.《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3.《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4.《孔子的中庸之道是反对社会变革的》；5.《读柳宗元的〈封建论〉》。”

一月十五日，谢、迟二人到部队后，连夜向防化连全体同志宣读了江青的信，发了江青赠送的学习材料。

一月十六日，军区党委接到二十军报告后，除连夜派员赶到防化连，请谢、迟二人转达我们对江青同志的感谢外，并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三日，江青给空军马宁写了一封信。

“据说空军机关对批孔有些困难，特请苏元勋同志送上北大、清华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及《名词解释》100份，可能有助于批林、批孔。请指定一个连队，由苏元勋同志去宣讲。”“请指定一个连队，一定请苏元勋同志参加座谈，有什么问题，请苏元勋同志转告我。”

江青七四年一月十三日”

（苏元勋在空军机要部门工作，九·一三前是受林彪一伙压制的，还被关进了监狱，九·一三以后，才受到了重视。）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三日，江青给吴德的信。

“吴德同志：我请谢静宜和迟群同志代我向你们问候春节好，此外，请他们带去北大、清华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二百份《历代反动派、封建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文章摘录》和《名词解释》各二十份，材料不够，可翻印，我希望文化组的批林批孔不断深入下去，开花生果。”

江青一月十三日”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三日，叶剑英致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

就江青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联系实际批林批孔点名批评自己一事，表示接受江青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对他的帮助。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五日，北京卫戍区、公安部门两系统破获苏联派遣特务李洪枢案，人赃俱获。

十七日，周恩来将案情及处理办法报告毛泽东。

十九日，外交部副部余湛召见苏联驻华大使，向他面交照会就此事向苏联政府提出抗议。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七日，解放军报刊登文章《既要讲批评，又要讲谅解》。

一月二十八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召集有关新闻单位开会，批评：这篇文章很坏。并布置写批驳文章。

解放军报发表文章，批评一月十七日的文章：离开批林批孔的大方向，来讲团结的问题；貌似全面，实则片面强调谅解，倒很像是折衷主义，很像是中庸之道。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会议提议：中央军委成立以叶剑英牵头，有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参加的五人小组，讨论处理军委的大事及紧急作战事项。

一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正式向毛泽东提议时，将五人小组增至六人（加苏振华），并确定：军委六人小组大事视情况或直接报主席或中央政治局讨论后再报主席。对内对外不行文，一律以军委名义下发。

一月二十日，周恩来、王洪文联名向毛泽东报告此事，毛泽东表示同意。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通知及附件

1974. 01. 18；中发 [1974] 1 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转发。

中共中央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

现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发给你们，供批林、批孔时的参考。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选编的这个材料，对于继续深入批林，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会有很大帮助。

这个材料的传达方法，请你们按照中发 [1972] 3 号文件的范围，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进行。传达以前你们要首先学习讨论，进行试点，训练骨干。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文章《略论秦始皇的暴力》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补充通知

1974.01.22；中发 [1974] 2 号

中央决定，在传达、学习、讨论中发 [1974] 1 号文件时，增加以下学习文件和文章：

一、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

二、《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

三、《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

四、九大和十大的政治报告

五、《鲁迅批判孔孟之道的言论摘录》

以上为学习的第一单元。

六、《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之二、之三）

以上为学习的第二单元。

七、《五四以来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辑录》

八，《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杨荣国）

九，《两汉时代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先验论的斗争》（杨荣国）

十，《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唐晓文）

十一、《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罗思鼎）

十二，《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冯友兰）

十三，《孔子维护哪些奴隶制》（高亨）

十四，《〈封建论〉的尊法反儒精神》（北京师范大学史众）

十五、《孔子的中庸之道是反对社会变革的哲学》（北京大学哲军）

十六、《反动阶级的“圣人”——孔子》（杨荣国）

以上为学习的第三单元。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二日，江青给海军苏振华的信，

“现请谢静宜和迟群两位同志到海司去搞试点，并送上《林彪与孔孟之道》二百份，其他材料以后再送。

七四年一月廿二日”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二日，江青同志给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的信

“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的同志们，为了使你部的批林批孔更好更深入地发展，特请谢静宜和迟群两位同志送去北大、清华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二百份，《五四以来反动派，封建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文章摘要》和《批林批孔文件汇编》各廿本，到你们那里宣讲批林批孔文件，希望你们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直接关怀下，将批林批孔运动取得更大胜利。

江青一月廿二日”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四日，江青致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邓小平的信

首先代我问候全军同志们春节好！相当长时间了，从许多材料看来，全国范围内的批林整风运动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批孔更是深入不下去。而林彪的思想体系与孔老二的关系更是不清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搞的《林彪与孔孟之道》

是可以帮助全体同志们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我特请谢静宜和迟群二同志向全军指战员宣读中央的通知。他们已下过连队取得经验，可能对全军有所帮助。批林批孔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这是使国内外帝修反惊恐的事。全国党、政、军、民、学，通过这个学习，可以取得更大的团结和胜利。

现送上《林彪与孔孟之道》《名词解释》各二百份和《五四运动以来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辑录》二十本，《鲁迅批判孔孟之道言论摘录》和《反动阶级的“圣人”——孔子》各一份供同志们参考。文件，文章的份数是不足的，但可以翻印。有什么问题报中央，我们也要和同志们一起学习。我们将努力解答同志们提出的问题。我相信同志们会努力学习保持我军光荣传统，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知难而进。没有攻不克的堡垒，只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将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但也是光荣的。毛主席说能文能武，长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学得文武双才，才能完成毛主席，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四日，中央军委召开驻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周恩来江青迟群谢静宜姚文元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周恩来：

同志们，现在开会了，请王洪文同志领头唱一段“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全体起立，唱歌）

中央机关、国务院机关和所属单位的同志们，今天在这里开个动员会，进行批林批孔动员。我们中央和国家机关已经落後了。昨天在这里军队已经大动员了。我们晚了一天，但是现在我们赶上去。中央对批林批孔问题已经发了两个通知，第一号已经发到你们手里了，第三号还没有到大家手里。

去年“十大”以后，国务院科教组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迟群同志向各省传达了准备批孔的问题，指出批孔是批林的组成部分。批孔在北大、清华两个学校是很早就进行了，最近又搞了一个材料，就是已经附在中央七四年一号文件上的

这个材料。所以总是一步一步前进的。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江青同志的帮助和指导，把林彪是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方面的材料综合成几个问题，就是《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说明林彪是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真忠实信徒。这个材料受到了主席的称赞。

今年初，王洪文同志和江青同志向主席写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是这样写的：“主席：我们看了北大和清华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这个材料，觉得对当前的批孔有很大帮助。各地也迫切需要这种简要的材料。我们提议，可否转发各省、市、自治区、各军兵种、各大总部、国务院各部，作为当前批林批孔的参考。现将材料呈上，妥否，请批示。王洪文、江青一九七四年元月十二日”。

毛主席批示，同意转发。主席还指示，由中央起草一个通知，一道发下去。但是发得晚了一些，开始时耽搁了一下。我有责任。这是一件大事，本来还可以更早一点。现在我把两个通知念一下。（念通知，略）

第二个通知也念一下：中央决定，在传达学习中发七四年一号文件时，增加以下学习文件和文章：一，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二，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一封信……（略）

在报告了毛主席并经主席同意转发后，印发的过程中，江青同志也是注意抓这个问题。

第四封信就是江青同志给军委几位负责同志的（洪文、剑英、小平）。

军委收到此信后，昨天在这里已经召开了动员大会。我今天早晨得到了这个消息，向政治局几位同志建议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同志今天开这个会议，

这是六封信的情况。除此以外，江青同志还直接作了试点，一个是卅八军，一个是警卫一师，再一个是江青身边工作的一个直属单位。这些单位都已经作了试点。我们现在收到各地的简报，在批林批孔中，广大群众已经开始发动起来了，我们也要求新华社，人民日报，军报的记者，要把方面先进的经验。好的典型，及时推广出去。刚才说了，我们中央机关和国家机关是落后一步，今天补上这一课，请政治局在北京的同志也出席一下，开个动员会，我的介绍完了。

谢静宜：主席就说，那里面可是指了郭老的名字的，别批郭老啊。所以后来等到报纸发表的时候，郭老的名字，郭沫若的名字去掉了，连书的名我们都没有登呢，这是主席保护郭老哎。

江青：对郭老，主席是肯定的多，大多数是肯定，郭老的功大于过。郭老对分期，就是奴隶和封建社会的分期，是有很大的功劳的。他有一本书，《奴隶制时代》。郭老对纣王的翻案，郭老对曹操的翻案，这都是对的，而且最近还立了一个功，就是考证出李白是碎叶人。碎叶在哪儿呢？就在阿拉木图，就是说，那些地方原来是我们的。郭老的功勋是很大的，这点应该同志们知道。他这个《十批判》是不对的，听说，郭老今天来了。

谢静宜：我想补充一句。就是这个材料印出来以后了，就是《林彪与孔孟之道》印出来之后了，江青同志有一天晚上突然找我们去了，所以当时我们莫名其妙，是怎么回事？后来看了，江青同志给我们看了一个军报的一个内参，就是讲了二十军的一个防化连的批孔批不下去了，遭到了一些抵制了，叫我们去了解一下情况。其中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说到河南去，有一个马振扶公社，唐河县的马振扶公社，有一个中学，出现了一些问题。

迟群：那个地方在反攻倒算，就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在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姚文元：“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他把这个“趋身”改为“栖身”，“栖身”就是暂时住一住。鸟啊栖在树上，就是说他是这里讲的对啊，分析得很好啊，不打自招地告诉他是睡在我们身旁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他是“栖身”嘛，栖身之后到一定的时候他就要杀头啦，就要谋害毛主席，谋害党中央。运用什么手段呢？“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就是你看到什么气候要变，随机应变，这样子混过去之后呢，到一定的时候呢，他就搞反革命的政变，这又暴露了他是野心家，阴谋家，又暴露了他搞野心家，阴谋家的手段，是反革命两面派。我这个理解对不对啊？

江青：对。

江青：这里搞错了一个字，“韬讳，操之论英雄，胸有大志，腹有良谋，就是范蠡，春秋战国。”是一九七零年三月十三日。同志们，那是什么时候？那就是林彪搞《“571工程”纪要》的时候。《“571工程”纪要》，大家在座的同志都有了，这个你们没有，所以我想这要说一下。实质上不是“韬讳”，是“韬晦”，他要把自己藏起来，藏起来，反革命，所以他搞反革命两面有很多东西我们都不知道，还欺骗我们，伪装。

迟群：他就是说把我们社会主义的祖国作为一个虎穴了，栖身嘛，藏起来，搞了许多画皮了。

周总理插话：七零年是关于设国家主席问题，七一年是他们搞《“571 工程”纪要》。

江青：七零年他搞国家主席，就是这个“名不正言不顺”这一段，这七一年三月搞《“571 工程”纪要》，就这个小讳，刚才讲错了，历史背景。

迟群：还有些问题要不要联系实际呢？有的人成天在那儿讲批林批孔怎样联系实际啊，其实有的实际就在他的身上，就在他那个单位，那个地区，就在他的脑子里。

举一个例子，河南的南阳地区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一个中学所发生的事情，逼死了一个小女孩，十五岁，完全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逼死的，每天几乎是一次考试，考的那个学生简直是昏头胀脑。家长们都提出意见，说这样势必把学生身体搞垮，他们完全违反了主席的指示，不要把学生当作敌人，不要搞突然袭击，不要搞闭卷考试，要开卷，可以交头接耳，他们不，搞 A、B 题，要互相背着答题，每天考一次，所以这个女孩她就有反潮流精神，她就写了一些个意见上面，结果就给逼死了。

谢静宜：全校批判。

迟群：全校来批判人家，还，还把人家家里还诬蔑人家。说他们家里人有跳井、跳河、跳坑的习惯，这么样诬蔑人家。

谢静宜：贫下中农老大娘说，这是对我们贫下中农的诬蔑，根本没有这回事。

迟群：没有那么回事嘛，所以，

江青：这个材料是人民日报的内部参考，人民日报的记者有一功。

迟群：那里完全是在反攻倒算，体罚学生，扎针，有一个教师学会了针灸，那是本来是治病的，后来发展成什么呢？就是谁要所谓他们讲的调皮捣蛋，就说给他针灸针灸，就扎得你，反正是叫你难受。

谢静宜：说扎一个好了三个。

迟群：因为有几个，他因为那几个调皮，扎他一个，那几个……

谢静宜：吓的就赶快跑了，是这样的，扎跑了三个。

迟群：不得了，完完全全是法西斯专政，象这样一个问题了，所以江青同志批了以后，我们去了，去了，这个我们也实事求是的摆事实讲道理的，也到了他们小队、大队、学校、公社、县里，地委都去了。

谢静宜：到了他们家里进行家访。

迟群：到了，见到她父亲，她母亲，以及他的其他的一些亲属了。那里从县里头，当然教育部门还是主动反映了这个问题，教育部门，但是县里头在处理这个问题上，也还是有些问题的了，公社里的第一书记，事情发生了半年，没有到这个人家里去，没有去看看人家的父亲，母亲，就隔了那么三，四里地，所以这一次他们都作了一些表示了，当然还要看下一步了。说是中央领导同志在北京这样忙，还看到了这件事情，派人来。直接到了公社去，到了大队，小队，到了本人家里去，我们就离得那么近没去。我说那不光是个领导作风问题，查一查你们里头有没有什么背景，因为我们去，还让那一个逼死学生的人给我们带路，这事就莫名其妙了，事到如今还没处理这个人，而且给了人家五十块钱，县里头说，那从教育经费挤出一百元钱，加起来县和公社给了一百五十块钱，人命逼死了，只值一百五十块钱。这是路线斗争问题。

还有那个走后门问题，批林批孔不要联系吗？那完全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对毛主席思想的背叛，所以当时江青同志要了一份关于南京一个大学生走了，叫钟志民，就是一份申请退学的书了，大家可以再看一看，我们是在路上听到了广播发表了这个消息，那个按语说得很好。讲了两条，根本问题就是说，要搞马克思主义，还是要搞修正主义的问题，那批孔，孔老二就是嘛，学而优则仕嘛，我们把自己的孩子看成是私有财产，看成是商品了，有的人。

江青：叫钟志民。他的父母现在接受儿子的意见，作了自我批评，我们也准备在人民日报发表。

姚文元：这里顺便说一下，请人民日报把新华社的一些清样，就是关于父母接受批评，请你们把这些东西，采访的东西编一个报道，加上一个按语，加以支持。顺便插一句。

迟群：当时关于钟志民的问题，总理也有批示。就是当时他们叫说是退学，但是省里头决定，说是还保留他，在学校里学习，保留，就是继续学习。后来我们给他们打招呼，你既然申请退学，要造反你就彻底造反，不要人家造反，还不

让人家造反。至于走后门问题，不只是这一个问题了，现在还有的单位，问题比较严重。譬如说，外交部、一外（北京第一外国语学院），很值得检查，那里首先就有一个清华大学的党委常委的一个孩子，是走后门进去的，所以我们首先作了自我批评，开了常委会的，在书记当中也专门作了研究，坚决退回，从一外退回来。但是，不光这一个人。所以，要想到我们的教育战线现在有一亿七千多万人，你开了这样一个口子，就不得了，它关系到上山下乡的问题，关系到一些人参军、招工、上大学等等，我们接班人的培养的问题。希望错了纠正，纠正的越快越好。

谢静宜：我念念这个屁话吧。总政宣传部一个负责人在战备教育座谈会上关于批孔问题的一段讲话。关于批孔的问题，最近中央报刊发表了一批文章，军队怎么搞？总政宣传部根据总政首长的指示，拟了一个意见，已通知下去了。主要谈了三点，一是批孔的意义。二是批孔的位置，要把批林摆在首位。三是批孔的方法。对批孔再提两点，请大家注意。一是批孔的口径，批什么问题，批到什么程度，一定要以中央报刊为标准，不要乱批，不要乱提口号，不要乱点名。二是批孔的位置和声势，一定要按“十大”精神办。实际上他没有按“十大”精神办。“十大”强调一定要把批林整风放在首位，批林可以联系批孔，揭露林彪利用孔子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连队可以讲讲孔子是个什么人，批孔的意义，引导学习中央报刊的批孔文章，不能把批林和批孔并列，整个这一点，就是不能把批林和批孔并列，不要把批孔搞成运动。军队的小报要注意掌握，不要登载部队批孔的活动，发表批孔的文章在数量上也要控制，不能搞多了，内容也要很好进行审查。

江青：屁话！就是主席讲的屁话。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转发《南京军区党委关于学习江青同志给二十军防化连的信的报告》，《中共陆军第二十军委员会给江青同志的来信》和《二〇八一部队防化连全体同志给江青同志的来信》

1974. 01. 25；中发 [1974] 3 号

现将南京军区党委给中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报告以及中共陆军第二十军委员会和防化连全体同志给江青同志的来信二件转发你们，供全国党、政、军、民、学批林批孔时的参考。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成员接见中央读书班和记者学习班的代表。

周因来就批林批孔问题发表讲话：

批林批孔要结合，批孔是批林的重要组成部分；

批孔是挖四旧的根子（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社会根子，故必须多做社会调查，履广大工农兵群众；

批林批孔是一场长期、尖锐、激烈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故必须参加试点；

对运动中出现的每一事物，要有分析，要分主从，要看方向，要区别领导与群众；

报道要符合实际，要全面，不能只报喜、不报忧，或只报忧、不报喜；

军队分社和记者在新闻工作中要有勇气承担调查和报道任务；

批林批孔可与目前城乡正开展的批林整风、进行基本路线和社会主义教育结合进行；

要注意民族政策，不要涉及民族宗教的风俗习惯；

要警惕国内外反动派造谣污蔑和挑拨离间。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七日，姚文元转述毛主席历次对批孔的指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毛主席同波兰共产党的同志谈话时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重要任务之一，是清除孔子在各方面的影响。”

（一九六八年）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主席针对林彪所说“孟子的王道还好一点吧”的谬论，说：“我这个人有点偏向，不那么喜欢孔夫子，我赞成孔夫子是代表奴隶制旧贵族，而不赞成孔夫子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说法，要给韩非子、申不害、商鞅，要给法家应有的历史地位。人定胜天是荀子第一个提出来的。”

（一九七三年）“十大”以后，九月二十三日主席接见沙菲时谈到：“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史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第一个统一中国，统一了文字，修筑了广阔道路，不搞国中有国，而用集中制，由中央派人到各地，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主席指出秦始皇二十二项功劳，粉碎了林彪的进攻。）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江青给河南郑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下乡知识青年的信

我看了人民日报今天对于你们批林批孔的报导，十分高兴！为了使你们早日得到阅读材料，更为了使你们知道毛主席、党中央对你们的关怀，我特请浩亮同志和一名新华社记者同志前去探望你们，祝你们坚持乡村的伟大胜利！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也会得到更大的胜利！

送上《林彪与孔孟之道》及其附件二百份；《批林批孔文章汇编》（一）、（二）各二百份；《鲁迅批判孔孟之道的言论摘录》二百份；《五四运动以来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辑录》二百份。其他材料中央将来会发给你们。

要重新学习毛主席的以下著作：一，《我的一点意见》；二，《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三，《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四，十大和九大的政治报告和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新党章。这些文件你们可能还有，如果没有请河南省委帮你们解决。致

无产阶级革命的敬礼！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江青致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苏振华的信

请代我向广州军区全体指战员，海南岛，西沙群岛全体军民，同志们致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敬礼！祝贺西沙群岛全军，民兵，渔民同志们与敌周旋，取得维护祖国主权的伟大胜利。

我身在北京，心逐南海汹涌澎湃，虽不能与同志们一块持枪战斗，但在思想上，政治上正在进行着一场大斗争。这场斗争是大是大非，是路线斗争，是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一场持久的斗争——批林批孔运动正向纵深发展，势若燎原。我们是心连心的，我们都要打倒帝修反，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各自在党分配的岗位上战斗着，为了表示我对同志们的祝贺，特请作家浩然同志，诗人张永枚同志，记者蒋豪济同志代表我前去看望坚持在前线的英雄们并送给你们

——《林彪与孔孟之道》500 份

——《五四以来反动派和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言论辑录》500 份

——《批林批孔材料（一），（二）》各 500 份

——《鲁迅批判孔孟之道言论摘录》500 份

学习的第一单元是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第二单元是《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一封信》，第三单元是《毛主席视察南方时和沿途负责同志的谈话》以上三份文件请世友，紫阳同志为你们准备。中央的通知还会告诉你们其他读物。

致

无产阶级革命的敬礼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评意大利摄影师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纪录片。

一九七四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讨论批林批孔问题。

鉴于运动开始后发生的一些情况和问题，会议提出：在党政机关、军队系统、生产部门和大中学校等应早一点规定一些政策界限，报经中央和毛主席审批后，下达全国试行。其中有：

各野战军和军委、各军区的作战、机要、通信、情报、运输、供给等部门不搞四大；

党政机关则应集中在一个易于观看的地方贴大字报，机关的学习初期可定半天，其他时间仍搞业务；

学校、工厂都不放假搞运动，学校可分出一定时间学习和批判，工厂可在生产外的时间搞，农村公社亦然。凡学习时不任那个单位，都要有值班员，不致误紧急事件。

会议还决定成立由周恩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华国锋和汪东兴等七人组成的小组，代表中央处理批林批孔日常事务。

军队系统则根据李先念的建议，由军委六人小组负责处理有关问题。

一九七四年二月一日，周恩来、王洪文联名致信毛泽东

汇报政治局会议情况。

毛泽东圈阅了此信。

一九七四年二月一日，《红旗》杂志刊登罗思鼎的文章《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论战的演变——读《王荆公年谱考略》》

王安石是北宋时代一位比较进步的地主阶级政治家。长期以来，他一直是自命孔门正统的道学家们的眼中钉。资产阶级阴谋家林彪所奉为至宝，并用以作为他搞阴谋、搞政变的立论根据的那篇托名伪造的《辨奸论》，就是当时道学家对王安石进行造谣、诬蔑和中伤的一篇代表作。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了清代蔡上翔写的《王荆公年谱考略》（以下简称《考略》）。这是一本为王安石及其变法辩护的著作。它驳斥了宋朝以来道学家对王安石的攻击，为研究王安石变法过程中的儒法论战，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结合批林批孔来研究封建社会的这场儒法论战，有助于我们深入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其阴谋手段，有助于我们揭露林彪反动世界观的根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儒家思想的反动性和儒、法两种思想斗争的历史演变过程，吸取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

一九七四年二月一日，《红旗》杂志刊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林彪与孔孟之道》

在党的十大精神的鼓舞下，批林批孔运动正在深入发展。列宁指出，在无产阶级与剥削阶级的激烈搏斗中，“剥削者愈是千方百计地拚命维护旧事物，无产阶级也就愈要更快地学会把自己的阶级敌人从最后的角落里赶走，挖掉他们统

治的老根”。当前蓬勃兴起的批孔斗争，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正是深挖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老根的一场战斗。在林彪居住的黑窝里，到处充斥着儒家的思想垃圾，散发着孔学的霉烂臭气。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反动的孔孟之道是林彪修正主义的一个重要来源。林彪一伙无论在政治上搞资本主义复辟，在思想上篡改党的理论基础，还是在组织上招降纳叛、结成死党、拼凑反革命队伍，在策略上大耍反革命两面派、搞阴谋诡计，无不乞灵于孔孟之道。剥开林彪的画皮，暴露在我们面前的，正是一副地地道道的孔老二信徒的丑恶嘴脸。

效法孔子“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用孔孟反动哲学反对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玩弄儒家权术，结党营私，大搞阴谋诡计

修正主义头子林彪为什么乞灵于孔孟之道？

一九七四年二月一日，中共河南省委通知

省委决定，立即把《江青同志给郑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下乡知识青年的信》，印发给全省下乡知识青年同志们，并发到全省城乡党支部，向广大群众宣读。我们要认真学习讨论，坚决贯彻执行，象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公社的下乡知识青年同志们那样，当批林批孔的尖兵，做革命的促进派，迅速在全省范围内掀起批林批孔的新高潮，坚决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下，一场群众性的深入批林批孔的政治斗争，正在各个方面展开。

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派。半个世纪以来，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同中外反动派作斗争、同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的同时，反复地批判孔学，批判尊儒反法的反动思想。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批判林彪宣扬的孔孟之道，才能进一步批深批透林彪反革命

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这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坚持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林彪这个政治骗子，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是个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大军阀。他在见不得人的阴暗的角落里，在他的死党中间，甚至在公开场合，狂热地鼓吹孔孟之道，并且题在壁上，记在日记上，当作“座右铭”。为什么他拚命鼓吹孔孟之道呢？就是因为孔孟之道是复辟之道。他和孔孟的反动思想体系是一致的，都要复辟旧制度，妄图把历史拉向倒退。

批孔确是批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挖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老根，是为了更好地批林。批林批孔是我国当前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彻底革命，是对封、资、修的宣战，是对帝、修、反的沉重打击，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

在批林批孔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是积极还是消极，对每一个领导者都是一个考验。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我们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要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搞武的要学文，搞经济基础的要懂得上层建筑。要害问题是批不批。要批，就能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知难而进。

各级领导都要站在斗争的前列，把批林批孔当作头等大事来议，当作头等大事来抓。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批林批孔的一系列著作和指示，带头批林批孔。要发动群众，把孔孟的反动论点同林彪的反动谬论和反革命罪行加以对照，逐条地批。要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坚持革命，反对倒退，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满腔热忱地支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要通过批林批孔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要深入基层，进行试点，训练骨干，抓好典型。要经常研究批林批孔斗争的新动向，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广大工农兵是批林批孔主力军。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农兵群众，最敢同旧的传统观念决裂，批林批孔最内行。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要积极参加这场斗争，努力改造世界观。一些受孔孟之道毒害较深的知识分子，在这场斗争中进行自我教育，工农兵对他们的进步是欢迎的。

一九七四年二月四日，毛泽东关于一篇文章的批示

“此文似可发表。毛泽东 1974 年 2 月 4 日”

（对读《王荆公年谱考略》一文的批示。来源：姚文元 1974 年 2 月 16 讲话）

一九七四年二月五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讨论批林批孔运动问题。

会议认为：目前各地各单位运动处在发展不平衡状态，经验还不够多，如果过早地规定政策界限，可能对群众的发动定了框框，不如先看一看，搜集更多材料，多积累些经验，才好提出问题谋求解决。

会议对军队系统要害部门不搞四大、由党委统一大业领导运动，以及野战军部队不另成立战斗队、不搞外出串连等问题作了布置。

一九七四年二月五日，《人民日报》刊登唐晓文的文章《“克己复礼”与野心家、阴谋家林彪》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效法孔老二，把“克己复礼”作为自己的最高信条和搞反革命复辟的纲领。林彪和他的死党互相赠送的条幅里反复互相嘱咐：“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说世界万事中，“克己复礼”是最大的事，也就是说复辟资本主义是最大的事。这充分暴露了他们迫不及待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野心。

一九七四年二月九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讨论七日外交部关于几个开放城市（杭州、武汉、郑州、沈阳、上海）最近大字报上街情况的报告。

一九七四年二月九日，毛泽东在江青来信上的批语

江青在一九七四年二月六日给毛泽东写信，将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给她的一封信及反映批林批孔问题的材料转送毛泽东，请求审阅。

毛泽东在江青的来信上批示：

除少数外大都未看，近日体温升高两度，是一场大病！一切人不见，现在恢复中，你有事应找政治局。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第 372 页）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关于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对外宾、外交官员和在华外国工作、学习人员有关“四大”的几项规定（草案）

《规定（草案）》提出：各单位、各地区张贴的大字报，除中央另有规定外，一般不许抄贴中央文件，大字报和大辩论均不许泄露国家机密。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日，江青给国防科委情报资料研究所恽仁祥的信

你一九七四年一月三十一日的信，我今天早上才收到。我很抱歉，未能及时收到你的信。

你们的材料那么困难，我很惊讶！国防科委的批林批孔运动搞不起来，必有原因，得你们自己找。我相信只要按毛主席的教导去做，总会冲破障碍而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现送上：

《林彪与孔孟之道》

《五四以来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辑录》

《批林批孔文章汇编》（一）（二）

以上材料各 100 份。如不足，我可以再送，请告我数字。

这封信可以给国防科委所有愿意参加批林批孔的同志看。不愿参加批林批孔的人要，也可以看。

不要再闹资产阶级派性了，敌人利用派性挑拨离间，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批林批孔是路线斗争，要抓住批林批孔路线斗争这个纲，这就是目前我国党、政、军、民、学以及其他各界的头等大事。

胜利是会属于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同志们！

致以

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敬礼！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六日，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传达毛主席指示

“此文似可发表。毛泽东 1974 年 2 月 4 日”（对读《王荆公年谱考略》一文的批示）

排了三份清样，随杂志送，主席四日批，五日登报。

我领会：为什么三篇选这篇，是否这样几点：

1. 紧紧抓住批林批孔这个中心。这篇文章，从批孔一直挖到林彪的思想根源，不是一般的，而是搞政变经的思想根源。主席过去说，林彪靠伪辩奸论起家。紧紧抓住这个中心。

2. 抓住政治问题，路线问题。这篇文章从路线提出问题，讲两条路线斗争，分析尊孔反法思潮代表的什么阶级利益。

3. 说明在革命大批判中，要搞些扎实的、有分析的文章。此文虽讲古代问题，但是有分析的。

文章对各阶级、集团思想面貌，政治立场，分析得比较清楚，对王安石也有批判。主席早就提出这个问题。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批“克己复礼”——林彪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纲领》

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一个大规模的批林批孔运动，正在全国蓬蓬勃勃地兴起。

当前，许多地方的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首先集中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效果较好。

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克己复礼”。他把孔老二复辟奴隶制的这面破旗，视为至宝，称为万事中的大事。在九大以后，从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九日到一九七〇年元旦，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林彪及其死党就写了四条“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的条幅。这充分暴露了林彪反党集团迫不及待地妄图从根本上改变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野心。

林彪“复礼”的政治纲领，是坚持设国家主席。他对抗毛主席的多次指示，叫嚣“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被粉碎了的反革命政变，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名正言顺”地复辟资产阶级专政。

林彪“复礼”的理论纲领，是“天才论”。他把自己吹成“生而知之”的“天才”，以“天马”自居，自比文王，为他篡党夺权制造理论根据。

林彪“复礼”的阶级内容，就是把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重新扶植起来，建立林家法西斯王朝。他接过孔老二“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反动口号，狂妄叫嚣要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

林彪这条“克己复礼”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集中反映了地、富、反、坏、右和帝、修、反在中国搞反革命复辟的愿望。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林批孔七人小组和中央军委六人小组举行联席会议

讨论各地、各部门批林批孔运动问题。

一九七四年二月至三月间，王洪文、江青、张春桥相继在军队系统批林批孔汇报会、军队文艺单位负责人会议上，批评军队领导机关对批林批孔消极应付，右倾手软。提出要整一整军队，该夺权的还是要夺，要在军内搞放火烧荒。

一九七四年三月五日，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谈批林批孔及毛主席与卡翁达布迈丁的谈话。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一日至十五日，周恩到三〇五医院作全面检查确诊为癌症复发。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五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再批“克己复礼”》

目前，全国人民集中批判林彪“克己复礼”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林批孔运动正在健康地发展。

党的九大以后，正当全国人民响应毛主席提出的“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号召，把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向前推进的时候，林彪及其死党，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写了许多条“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的条幅。据《后汉书·李杜列传》的李固传中记载，东汉质帝被害，朝廷没有皇帝，太尉李固等联名上书大将军梁冀说：“今当立帝”，“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国之兴衰，在此一举”。林彪把“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和“克己复礼”连在一起，多次地大书特书，充分暴露了他迫不及待地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复辟资本主义的野心。

孔老二“克己复礼”，就是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恢复灭亡了的奴隶制国家，把丧失了世袭地位的贵族世家扶植起来，让被打倒的旧贵族重新上台。林彪想当“皇帝”，搞“克己复礼”，也是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

林彪“兴灭国”，就是要把中国重新拉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上去，建立林家法西斯王朝，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国”在中国复辟。“继绝世”，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继”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的“绝世”，恢复他们已经失去的天堂。“举逸民”，就是为地、富、反、坏、右鸣冤叫屈，为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翻案，让那些牛鬼蛇神重新上台。

判林彪的“克己复礼”，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解决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揭发批判林彪及其死党阴谋复辟的罪行，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是巩固和发展这场革命的伟大成果，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倒退回去，搞资本主义复辟？在这些原则问题上，我们的同志，一定要旗帜鲜明。林彪反党集团疯狂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妄图开历史的倒车。中外反动派，包括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包括蒋介石集团，包括一小撮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都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他们现在又在极力攻击、诬蔑、破坏批林批孔运动。对于阶级敌人的诬蔑和攻击，我们要给予有力的回击。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日，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担任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并告以外交部名义将此意写入送审报告中待批。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

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第 372 页）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一日以后，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讨论外交部送审报告。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七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

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第 373 页）

一九七四年四月一日，《红旗》杂志刊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文章《孔丘其人》

孔丘其人，顽固凶狠却又十分虚弱，阴险狡诈而又极端腐朽。这是他所代表的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本性，也是一切行将灭亡的反动阶级代表人物的共同特点。今天，彻底揭露孔丘的反动面目，对于识别王明、刘少奇、林彪这一类政治骗子，反击开倒车、搞复辟的逆流，很有意义。

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

虚伪狡猾的政治骗子

凶狠残暴的大恶霸

不学无术的寄生虫

到处碰壁的丧家狗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日，中共中央关于当前运动的几项规定

12 号文件发到县团级，可以向广大群众传达。但不能张贴。

12 号文件的基本精神是强调加强党的领导，放手发动群众，搞好批林批孔。

第一段说，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联。

第二段讲，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在三支两军中作出了巨大贡献……，不要揪军代表。有的批评意见可以送到所在部队的领导机关。部队各级党委和被批评的同志应当欢迎。

第三段说：应强调指出，批林批孔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批林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批孔比批林更困难的。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七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

江青：

两信收。前后不一。党的大势不错，悲观不好。不要动摇。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不要主观片面（面）。千万注意。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要请假。钱可略增。无限风光在险峰。

毛泽东 74，4，1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第 373 页）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七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

江青：

两信都收到，并收到春风杨柳。后信打退堂鼓，不妥。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可主观片面。多休息好。似不宜请长假。

毛泽东 74，4，1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第 373-374 页）

一九七四年五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政策问题的通知

1974.05.18; 中发 [1974] 17 号

毛主席已圈阅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

中央最近根据毛主席指示，讨论了批林批孔运动的几个政策问题，通知如下：

一、几个月来的运动，冲破了种种阻力，排除了一些干扰，群众已经发动起来，正在深入发展。当前，要注意掌握党的政策，注意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利于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争取批林批孔的更大胜利，争取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新胜利。

二、在运动中，广大群众揭发批判了许多同林彪反党集团有关的人和事，这是完全必要的。继续把这方面的问题搞清楚，也是完全必要的。但是，领导上必须注意清查的范围应限制在同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问题，不要扩大化。在时间上，应当以毛主席一九七一年八、九月巡视各地打招呼为界；以听到传达中发（1971）57号文件为界。在这以前的事，包括犯了严重错误，只要向党讲清楚，同林彪反党集团划清了界限，就不要再算这些老账。中央重申中发（1971）57号文件宣布的政策：“中央对于坚决同林彪划清界限的同志，不论他过去是否受过林彪的影响，是否犯过错误，都是同样爱护而不会轻易怀疑的。”中央希望在林彪问题上犯了错误，但是已经交代了问题的同志，放下包袱，振作精神，同广大群众站在一起，投入批林批孔，将功补过。也希望那些隐瞒了某些问题的同志，把问题讲清楚。凡属好人犯错误，都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各级党组织应当为这些同志创造条件，使他们有改正错误的机会。

三、确定陆、海、空军的军（省军区、警备区、科研单位、军事院校不含，野战军含）以下领导机关和部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一律坚持正面教育。这样做，有利于集中力量把军以上单位的运动较快地搞好。请各大军区、各军兵种照此方案安排自己的工作和学习，并随时总结这方面的好坏经验报告中央军委。

四、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把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深批透，把孔孟之道批深批透，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哲学、历史、教育、文学、艺术、法律等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领域，还需要我们全党作极大的努力。批林批孔运动中，

涌现出了一批搞革命大批判的积极分子，应当注意培养，并且团结一切愿意批林批孔的知识分子，推动他们同广大工农兵群众结合起来，逐步地造成一支宏大的理论队伍，使全党全军能文能武。各级党委都要把这个问题当作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百年大计认真抓起来。

五、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证明了毛主席历来的估计：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是比较好的，我们的党、国家机关、人民解放军基本上是好的，是经得起风浪的。经过八年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巩固的。各级党委应当结合学习毛主席、党中央的历次指示，认真地总结自己的经验，分析形势，加强领导，争取批林批孔运动和各项工作的新胜利。

一九七四年六月五日，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的谈话

中央 17（号）文件下达后，各地进一步据此分析情况，布置工作，落实政策，全国运动情况很不一样，提出问题也不一样。运动继续深入，有各类不同情况，有的已在揭发批判，要注意区别两类矛盾；有的未深入揭发批判，有问题；有的搞到邪路上，南京搞经济主义，未全解决。全国形势好的。18 号文件讲涉外，不完全是涉外。云南发生外宾去参观，一派贴大字报，军区派人包围，不让贴，说是破坏。这就没信心，文化大革命中那么激烈的外宾也看到。

17（号）文件下达后，问题：①军以下提正面教育，什么叫正面教育，要不要联系实际？②提清查林彪集团阴谋活动，反复辟还搞不搞？那些问题仍存在，好好联系起来贯彻就能解决，和林死党有关的，很少，文件中说不算老账，有一条线，要交代清楚，主席打招呼，57 号文件为界。③领导和基层关系，重点领导机关如何搞，军队正面教育，不搞四大，地方如何？不存在这个问题，可以搞四大。④革命大批判如何进一步深入？个别地方发现压群众情况，说过去搞错了。

生产，农业总的好的，有的有灾，前几天下雨旱象减轻，甘、新有灾，新疆麦收减产，定了。全国整个夏收不比去年低，工业仍钢、煤、运输问题多，轻工尚好，石油始终好的。钢计划 2700，欠产很多，国务院正想办法抓。还是革命形势决定的，武钢最近全部停了。有一些干部，少数，用破坏生产压革命。总要经过一个过程。多数人抓生产的，搞坏生产不得人心的。工业生产也要抓一下。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四日，江青在批林批孔座谈会上的讲话

现在的文章有个毛病，很少提现在的儒。现在批林批孔，除林（彪）、陈（伯达）外，不提现在的儒。现在有很大的儒，蒋介石就是，苏修也是，还有。不然搞这么长的批林批孔干什么？党内就有，刘、林就是最大的儒。中国长期伴随着儒法斗争，前期一定有儒，后期一定有儒，现在一定有儒。要不为什么批林批孔？

尽管有人反对，我还是坚持有现代的大儒，蒋介石、林彪就是现代的大儒。现在的批孔文章，一是不讲古代的无神论，二是不讲现代的大儒。

儒法斗争，从历史到现在都是贯穿着这个斗争，贯穿着复辟反复辟的斗争。当前，还有人搞复辟，搞复辟就把儒家抬出来。

批林批孔要深入、持久、系统、普及，必须把批林批孔放在儒法斗争中来批才能深入，只是单纯的批儒不能深入。单纯批儒，没有对立面，不能从路线高度来看，看不到路线斗争的规律。

批判儒家宣传法家不能只限在知识份子和上层，是广大群众的事，全党全民干，与工农兵结合。……要搞得通俗易懂，对当前有用的东西，使全党全国要懂得儒法斗争的现实意义。这是百年大计，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要用马列主义总结儒法斗争经验，总结对当前有用的问题和经验。古为今用，不是单纯搞历史。这是百年大计。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八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在斗争中培养理论队伍》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九日，江青在“天津市儒法斗争史报告会”上的讲话

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江青信上的批语

江青在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写给毛泽东的信中，汇报了她自六月十七日到天津之后召开批林批大会和讯问宝坻县小靳庄大队的一些情况，信中说：我看了胜利油田后即回北京，如果能多给我些天当然更好。

毛泽东在信上批示：

可以延长时间，做些调研工作，你太不懂群众生活了。

毛泽东

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第 374 页）

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北京市委报送的首钢炼铁厂批林批孔的材料

一九七四年八月一日，《红旗》杂志刊登罗思鼎的文章《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

一九七四年九月八日，《人民日报》刊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赵高篡权与秦朝的灭亡》

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刊登唐晓文的文章《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 研究儒法斗争史》

一九七四年十月一日，《红旗》杂志刊登梁效的文章《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继续搞好批林批孔》

形势大好，还要不要把批林批孔运动当作头等大事来抓呢？要。继续搞好批林批孔，正是毛主席、党中央历次指示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才能巩固和发展大好形势，夺取新的胜利。

贰、本节简论

一九七三年毛泽东提出评法批儒以后，江青等人组织一些人研究批林与批孔的关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汇编了《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

一九七四年初，毛泽东同意向全国转发这个材料。

江青等人抓紧在中央及各条战线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兴起。

批林批孔如何联系当前的实际？

一个是一九七四年一月三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唐晓文的文章《孔子杀少正卯说明了什么？》，提出了如何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问题。

一个是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二日王洪文在中央读书班作的报告，提出如何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列举了九大以后领导干部中对待文化大革命的种种错误思潮。

这两个问题是紧密联系的。这也就是批林批孔面临的最大、最紧迫的实际问题。

可惜，如何开展批林批孔？如何联系实际？这些重大问题在中央政治局没有展开充分地讨论，也就不可能在领导层中取得一致的认识。

当时，突出了一个上大学走后门的问题。

关于上大学“走后门”的问题，一九七二年五月一日，中共中央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 1972.05.01；中发[1972]19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在当时的的大学生及有关的干部中已经引起了震动，反响非常强烈。

江青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走后门”问题点了叶剑英的名。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三日，叶剑英抓住这个问题，以检讨为名向中央和毛泽东发难。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迟群、谢静宜又在中央机关批林批孔动员会上，联系实际，提出上大学“走后门”的问题。

一九七四年二月六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如果只研究走后门一个问题，这又太狭窄了，不正之风决不止此，而走后门又要分析，区别处理，才能收效。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五日，毛泽东给叶剑英回信：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我的意见如此。

然而，如何开展批林批孔、如何联系实际的问题并没有因此解决。

党内外的保守势力一计一成，又生二计，制造舆论说什么批林批孔是影射周恩来。企图把水搞混，转移斗争目标。

2010年2月1日初稿

第十章第三节 各地区的批林批孔运动

壹、 本节概述

山东省的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三年冬到一九七四年春，运河市区革命造反派首先成立了“批林批孔批袁汇报团”、“批林批孔批袁指挥部”。

强烈要求：

- 1、给被打被压被迫害的假 5·16 平反伸冤；
- 2、给因清查 5·16 再次受株连的所谓“孙、孔、王右派集团”平反，马上释放孙铁民、孔宪美、王锡山（已死去）；
- 3、清除混进各级革委会中的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 4、增加革委会中革命造反派的力量，把造反的干部、群众代表补充进去。

各县各单位各系统的革命造反派，也积极行动起来，在革命委员会的组织安排下，纷纷集会，声讨袁升平！召开各种形式的控诉会，讲演会，把一肚子苦水倒出来，把满腔的愤怒喷射出来；发表声明，书写讨袁檄文，张贴公开信，决心把批林批孔批袁斗争进行到底。

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四日，运河地区滕县革命委员会 28 名成员发出的“致县委和全县人民的一封信”。

题目：一切行动听毛主席党中央的指挥

信的开头说：“正当我县批林批孔批袁运动深入开展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 1974 年 12 号文件和党中央关于解决山东问题的重要指示下达了。喜讯传来，全县人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这是毛主席党中央对山东人民的最大关怀，最大爱护，是正确解决山东问题的根本方针，是推动我县批林批孔批袁运动胜利发展的强劲东风。我们坚决拥护，坚决贯彻执行。”

全信共有七条。

“二、牢牢掌握批林批孔批袁斗争的大方向。狠批‘克己复礼’，狠批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狠批林彪死党袁升平的反革命罪行。紧密联

系我县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实际，彻底揭露和批判林彪及其死党袁升平疯狂地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破坏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阴谋复辟倒退的罪行，迎头痛击右倾复辟思潮。”

三、“党的一元化领导，最根本的是正确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领导。县委必须立即改变不批林，不批孔、不批袁、捂盖子，怕群众的被动落后状态。”“欢迎犯错误的同志，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转变立场，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要发动群众揭发批判混在干部队伍里进行破坏活动的个别坏人。对我县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马启廷（文革前的县委书记——抄者注），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以养病为名，借故逃跑，长期擅离职守，对抗批林批孔批袁运动的严重错误和罪行，必经彻底揭发批判。坚决按照中央 12 号文件的规定，切实把我县县委、县革委机关的批林批孔批袁运动作为重点，认真搞好。”

四、周克玉是“袁升平的私党”，是“破坏我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支左工作的罪魁祸首，必经彻底揭发批判。”

五、要求全县革命造反派应做工农业生产的模范，“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六、革命造反派要继续促进革命大联合，要增强党性，反对派性，记取走资派利用派性，“挑拨离间，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深刻教训。”“要把千仇万恨集中到林彪、袁升平身上。”

七、我们必经清醒地看到，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解决山东问题的重要指示，深入批林批孔批袁，纠正错误，落实政策是一场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要提高警惕，坚决揭露和打击破坏批林批孔批袁运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克服左右干扰，特别是右的干扰。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让我们乘党中央解决山东问题重要指示的强劲东风，继续发扬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深入放手发动群众，冲破一切障碍和阻力，把批林、批孔、批袁的斗争进行到底，达到更大的团结和胜利！

这场斗争一直持续到一九七五年，虽然没能取得全面胜利，但又一次显示了革命造反派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江西的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涂烈给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写信揭发省委一些领导人的“反攻倒算”行为，点名批判了某些省委领导人。

一九七四年二月初，万里浪、张羽等人到抚州、吉安、赣州、九江等地，进行革命发动，揭发省委某些领导人搞右倾复辟的行为。

一九七四年二月中旬，蔡松林等人组织“省、地、市上访团”，三次与省委领导人谈判，省委同意释放在一打三反中被关押的“杀人犯”、“打砸抢分子”二百二十四名。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八日，周恩来批示中央办公厅

中央办公厅信访处转来江西省乐平县发生八名群众在县委静坐绝食、要求解决问题的材料。

周恩来批示：要求中办负责人即与江西省委、乐平县委取得联系，劝说群众停止绝食，不可消极自毁；同时，靠乐平县委应按中央有关政策妥善解决群众所提合理意见要求，对不合理、不合中央政策的部分，提要求者也应自动改正。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日，王洪文在北京单独会见涂烈，谈话三个多小时，指出：“斗争从你的信开始”。

涂烈一回到南昌就召集群众组织代表广泛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四年四月四日，李九莲在赣州公园女墙贴出第一张公开申辩大字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日，在省“三全会”大组召集人会上，对省委书记余积德、白栋材、黄知真揭发批判。会内会外结合。

报——《反林彪无罪》，

引发社会极大关注。随后陆续贴出《一评反林彪有罪——斥反林彪是唯心论的先验论》、《二评反林彪有罪——谁是反林彪的英雄》、《关于我的日记》、《血泪控诉》、《乱讲一通》……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三日，赣州地区中级法院、公安局、工代会张贴《联合声明》

称“李九莲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无产阶级大革命，确确实实构成了反革命犯罪，”“当前批林批孔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对于一小撮阶级敌人捣乱破坏、翻案活动，必须坚决打击。”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四日，冶金十三队工人刘庭荣张贴《评三家“联合声明”的反动性》大字报，公开支持李九莲翻案。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四日，地区公安局、地区工代会印发《李九莲有关罪行材料》，公布了影印的李九莲的“反革命匿名信”和“反动日记”供批判用。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六日，下乡知青康为民张贴署名“李九莲辩护士”大字报《掀翻现行反革命李九莲一案》。

气压机厂工人管佑龙张贴声援李九莲大字报《路遇不平，拔笔相助》；……群众不平之鸣越趋强烈。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七日，应地区工代会强烈要求，赣州地委常委会议决议重新逮捕李九莲。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九日，李九莲在最后一篇公开申辩《我的人生态度》中写道：“为了真理，我不惜再度失去自由而入铁窗！”“人民起来了，一切妖魔鬼怪统统都会被消灭！”“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日，晚十点 在地区工代会人员参与下，李九莲再次被赣州市公安局拘捕，当晚押往兴国。

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二日，朱毅、舒北斗、曾传华等三十余众署名张贴《众手掀翻独霸天》大字报，称“李九莲精于学习，勤于思考，勇于实践，敢于探索，充满献身真理的精神。李九莲以对林彪的及时洞察表明了她是立志献身革命、酷爱真理、关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敢想敢为、无私无畏的好青年！”抗议地委和公安局重新逮捕李九莲。

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五日，赣州地市二百五十九个单位签署要求立即释放李九莲的《联合声明》。

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五日，赣州三百民众乘车前往兴国县营救李九莲。最初曾得到兴国县革委会和公安局的支持和理解。

下午 赣州地区公安局、工代会、红代会紧急汇报赣州、兴国情况，江西省委书记陈昌奉下达“五点指示”：

一、李九莲是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跳出来翻案。

二、赣州某些人争论李案，实际上是为现行反革命翻案。

三、冲击兴国监狱是起严重的政治事件，必须立即制止。

四、某些领导干部和公安干警在李九莲问题上严重丧失阶级立场，实际上是向反革命投降。

五、对于在李案问题上立场坚定、坚持原则的同志，应予表彰。

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六日，省军区政委、省革委会主任陈昌奉派秘书召见舒北斗，同日赣州地委工交办主任杜昭约见舒北斗，“苦口婆心”深入反复地动员他和“现行反革命”李九莲划清界限。舒北斗退出李调会。

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赣州地区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成立”。宣告：“还李九莲以本来面目之日，就是调委会自行解散之时。或者走向真理的光明，或者走向牢狱的黑暗。”

李调会建立广播站、宣传组、材料组、动态组。创刊《战旗》、印行《动态》。

一九七四年四月三十日，江西省委书记陈昌奉在省委三届八次全委会上斥责赣州有人为现行反革命李九莲翻案。

一九七四年四月三十日，李调会在市体育馆召开第一次万人大会宣讲李九莲案真相。

李玉莲交出姐姐未被搜走的思想提纲和文字草稿。

景凤山小学教师钟海源参加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成为李调会广播站主播人员。

一九七四年五月二日，李调会在赣州公园门外设立讲坛，让民众自由发表对李九莲问题的看法。这一讲坛持续数月之久。

严金禄、刘挺荣、管佑龙、林锋、吴文甫等人发表讲演。

一九七四年五月九日，江西省委下达有关李九莲问题的“三点指示”：

一、赣州地委常委陈万兆同志支持现行反革命李九莲翻案，严重丧失阶级立场、省委责成其停止工作，反省交待问题。

二、兴国县委、兴国县公安局主要负责同志支持不明真相的群众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李九莲翻案，严重丧失阶级立场，责成作出深刻检查。

三、赣州市公安局批林办 4 月 24 日的声明是向阶级敌人投降，责令立即收回，挽回影响，并作出深刻检查。

一九七四年五月十日，李调会发表《关于不准利用李九莲问题打击陷害革命领导干部的严正声明》。

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一日，李调会林锋写《西安还是延安》。

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一日，管佑龙在大字报中提出“我们的法律，甚至宪法中对当前不适应的问题也要修改”。

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二日，省委电话指示省领导决定召见赣州李调会负责人。

指名朱毅、刘庭荣、曾传华、黄智荣和赣州地区农林系统代表五人前往南昌解决问题。朱毅拒绝前往。

省委书记陈昌奉接见了刘庭荣、曾传华、黄智荣和赣州地区农林系统代表，调委会代表始终坚持李九莲的革命本质。

一九七四年五月十八日，李调会大字报提出：“取消公安六条，不能用法律保卫领袖！”“阶级斗争扩大化，百扩不灵！”

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省委秘书组给赣州地委打电话，传达省委“关于李九莲问题”四点意见。

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生物农药厂李冰姜写大字报《赞李调会》。

一九七四年六月二日，李调会由一百八十四各单位签名的《联合声明》：省委的五点指示和两次三点指示，不仅是地委某些人片面汇报所骗取的，而且是省委分工负责李九莲问题的涂烈一手泡制的……

一九七四年六月七日，生物农药厂李冰姜写大字报《赞李调会》。

李调会刘庭荣、李冰姜一行五人驱车前往福建省寻找新华社记者戚休反映赣州李九莲案件情况。未能如愿。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日，夜，原赣南日报总编辑、九二盐矿党委书记方道球在公园门前发表演讲，支持公开争辩李案。

接着，1969年带领武装民兵第一次拘捕李九莲的冶机厂宋德恒公开演讲，揭露事实真相，公开支持李九莲翻案。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一日，国家公安部对李九莲案件作出批示：“按省委意见办理。”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三日，李调会廖树才写《登龙术浅谈》，对趋炎附势的小人进行解剖。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四日，机床厂谢明写大字报《官官相护》。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七日，夜，朱毅、方道球、孙成璋邀请地委书记田启松激辩李九莲案性质。

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九日，李调会主持纪念“六·二九”死难者七周年大会。钟海源主播《祭文》。

一九七四年六月三十日，李调会李抹照、黄志荣、郭宗秀、路扬、陈富等十二人就李九莲案赴京上访。

一九七四年七月四日，李调会孙成璋、徐声扬等四人再次就李九莲案赴京上访。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日，李九莲辩护士（康为民）写《坚持革新办李案》、《斩断按着李案的黑手》。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二日，刘庭荣写《法治者专政也》。

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三日，赣州地区工代会、红代会为批判李九莲攻击李调会开办了刊物《投枪和匕首》，李调会小报《野草》创刊。

一九七四年八月，李调委连续三次就李九莲案继续派员赴京上访。上访人员赣南纸厂林锋、地区外贸公司吴文甫和地区土产公司刘文锋。

一九七四年八月八日，《野草》七期刊登曾小舟讽刺性杂文《调委会者该杀乎》。

一九七四年八月二十日，汇众思写《李案争论的根本和归宿》、《李案争论的实质和要害》等理论探讨文章。

一九七四年八月二十一日，继《静夜扪心录》九篇之后，朱毅开始写《九吐心丝》，全面为李九莲的真理执著、革命理想、人生态度，爱情观及在禁区中勇敢探索的人格力量和精神勇气等辩护。

一九七四年九月十五日，朱毅发表《九吐心丝之九·并非最后的话》动员解散调委会，以避免招致大规模镇压，但遭到李调会大多数人反对。

一九七四年九月三十日，朱毅、廖树才、康为民、罗汉进等李调会人员就李九莲案的第六次赴京上访。

一九七四年十月中旬 赣州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徐承中，对李调会调查其在瑞金“三查”中滥杀数百无辜事件中的责任不满，借口李调会人员“无理”强求其解决停发工资事，赖在李调会交际处北院办公区不走。

据此，地委以李调会“绑架”地委领导为由密电中央。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二日，江西省委陈昌奉等在京常委通过对李九莲问题的“四点决议”：

- 一、李九莲反革命案不能翻。
- 二、调委会是非法的，要立即解散。
- 三、阶级敌人正利用李九莲案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四、李九莲案件长期得不到解决，一定有阶级敌人破坏。希望地委做好工作，发动群众，揭露和批判，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三日，赣州地委提出取缔李调会的“八点意见”。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五日，朱毅写《告全省人民书》，并将管佑龙、林锋、廖树才、卜谷、谢明、康宏垠等李调会骨干派往南昌。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九日，上午，朱毅贴出《仍然并非最后的话》，说：“我们和赣州人民及其思想的女儿共同创造和度过了一段这样难忘的岁月……既然需要经过牢狱的黑暗，才能到达真理的光明，人民会相信面对铁窗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是坦然的……”。

深夜，赣州地区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主任朱毅被拘捕。

一个小时之后，曾传华、孙成璋、李抹照、刘挺荣……纷纷被保卫干部和武装民兵从家押出。

一九七四年十月三十日，凌晨 数百干警和五个武装民兵连查抄捣毁李调会广播站及有关场所。调委会负责人员和骨干被强制办班审查。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一日，赣州李调会的《告全省人民书》和为李九莲辩护的大字报在南昌八一大道旁贴了一里路长。赴昌人员在樟树被捕押回赣州。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一日，江西省委针对赣州李调会问题下发（74）四十六号文件。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李九莲在狱中遭遇审判高潮。

李九莲在狱中无数次的反复吟诵臧克家的《吊屈原》：宇宙这样宽大/却容不下一条身子/天地如此广阔/思想却无处安放/只好抱着贞节去追踪彭咸/D带一颗眷恋的心跳下了汨罗江/（生命就是这样/不能去碰死僵冷的社会/就只有

碰死在它身上！——这三句显然是李九莲自己加上去的）泪罗江的水/为诗人流了二千多年的清泪/到如今/上官令尹/依然在人间充沛……（所有这一切都被视为李九莲的罪证列入起诉。）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李调会广播员钟海源、刘华英、肖国涵等四人在赣南采茶剧团散发《强烈抗议》和《紧急告全市人民书》传单，4人被当场拘捕。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日，赣州地委副书记吴清明在地市直属单位干部大会上作《关于处理李调会问题的报告》，

李九莲是个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她的思想是极其反动的，而且有言有行，通过写反革命匿名信和反动日记等手段，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罪行是严重的，罪证是确凿的，定性是准确的，处理是宽大的。但她不思悔改，反而趁批林批孔之机，窜回赣州市，接过“反潮流”的口号，以“反林彪的英雄”出现，公布反革命匿名信，张贴反革命大字报，大肆进行翻案，气焰十分嚣张。为了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保卫批林批孔，我公安机关将她重新拘留，这是及时的、必要的、完全正确的。现已查明其翻案罪证确凿，决定逮捕法办。

李九莲的所谓“反林彪”的问题。其实她是把文化大革命污蔑为“毛林派”与刘少奇的所谓“宗派斗争”，并认为对刘少奇的批判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这完全是攻击毛主席，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鸣冤叫屈，怎么能说“反林彪”呢？当然有一两句怀疑林彪的话，其实她是把林彪与毛主席联在一起反的，从根本上看她是攻击毛主席的。她的全部反动言行，正是按林彪的反动观点、反动路线行事的。

李九莲跳出来翻案，公布反革命匿名信，张贴反革命大字报，这就是破坏批林批孔！

关于李九莲调查委员会问题

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看，调委会究竟搞的是什麼名堂！

（一）先看调委会的纲领。现在查出，调委会从非法成立那天起，到我们宣布解散为止，前后共发表过十五份像“声明”、“公告”一类的东西（其中由朱毅一手泡制的就有十三份）。

朱毅四月份写的《众手掀翻独霸天》是调委会纲领性的宣告，他们把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说成是“独霸天”，这和林彪“571”工程纪要中污蔑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为“独裁”是一个腔调。他们叫喊“让我们扭转乾坤的双手，众手掀翻独霸天吧！”调委会叫喊要掀翻“独霸天”，就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他们的要害！

他们在六月二日《联合声明》中又写道：“李九莲的再次被捕是右倾复辟势力新反扑的信号弹”；李九莲问题的争论，“是复辟势力压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捂盖子、保林彪死党的烟幕弹”；他们说：“不调查就无以争论，不放人就无以调查。”这个声明是在所谓“反潮流”、“反复辟”的口号下为反革命翻案，这里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后来朱毅又露骨地说：“现在要讲就讲翻案，过去讲重新审查是运动的策略，李案现在不翻，更待何时？”他们还说：“翻李九莲的案不是我们的根本目的，而是突破口”，“要把千千万万个李九莲的案翻过来，这才是根本的目的”；并扬言什么“凡是过去被你们搞臭了的，我们今天就要把他们搞香来”，“要翻个底朝天”等等。这就不难看出，调委会的某些人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为一小撮阶级敌人鸣冤叫屈，为地、富、反、坏、右翻案，要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变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他们的活动是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

（二）从调委会的组织活动看。调委会的幕前幕后是有阶级敌人的。当然，参与支持调委会活动的，坏人是极少数，多数是不明真相的群众，他们是受骗上当的。还必须指出，参加和支持调委会活动的还有我们某些领导干部，有的领导干部在这方面的错误是比较严重的，有的给钱给物，甚至在背后出谋划策，支持李九莲翻案。

（三）调委会散布的反动观点。

1、攻击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调委会会有一个骨干说：“毛泽东思想不是救世主”，“公安六条第二条是形而上学的，是机械唯物论，不能用法律保卫

领袖”，“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第一把手要负责”。还狂叫不能喊“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等口号，胡说这些口号是唯心主义的，错误的。（纯属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编者注）还有的“调委会”骨干多次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说这个是“右倾复辟势力的总代表，”“5.16”的黑后台，那个“对造反派没有感情”，是“马林科夫”，“要下台的”。

2、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咒骂公安机关是“法西斯”，叫喊要“踏平人间地狱”，还叫嚣“制度要变，法律要改”。他们全部否定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和肃反成果，多次叫喊“江西的三查、一打三反大方向错定了”，“凡是过去被你们搞臭了的，今天就要把他搞香来”，要给所谓受迫害的“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说“贺龙能平反，李九莲也一样能平反！”

3、污蔑我国的大好形势，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调委会的一个重要成员用毛笔写着：“大局不宁，宁戡乱；人心所向，向九天：以放为好，以放为妥。”方道球在他的演讲报告里，把省委关于陈万兆同志停止工作进行检查的决定说成是“转嫁”政治危机。朱毅在他的《野草》中更是篇篇充满对我们的的大好形势、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仇视和诬蔑。他在《野草：发刊词》中第一句就说“今天，我们的野草在投枪的啸响和匕首的寒光里萌出了第一片嫩叶。”在《野草》第十二期里他胡说：“今天，‘无权即无钱’的公式和‘反潮流即反革命’的公式一样流行时髦，这已经是政治常识了。”在《野草》第十三期里，几次引用爱伦堡的话污蔑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是荒淫和无耻！”

4、朱毅把我们党的各级干部污蔑成“争乌纱帽戴”的官僚了：把党培养新生力量，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说成是“争乌纱帽戴的好时机”；胡说“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提出以后，戴乌纱帽的天地就更加广阔起来”；污蔑我们的干部状况是“胆大的造反，胆小的生产，胆子不大不小的偷懒”，“表面信仰共产主义，内心的信仰是十五号万岁（15号领工资）”。有的甚至骂我们的干部是一群“狗”：什么“天狗”、“小狗”、“看门狗”、“哈叭狗”等等。

5、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破坏批林批孔活动。朱毅在他的《野草》中说“运动运动就是要乱要动”，“要大着胆子骚动下去”，污蔑党中央强调批林批孔运动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进行，是“给大大小小老老少的官们祭起了一块‘一元化’的禁牌”，“插在群众面前曰：‘不许动！’”还胡说：“李案之

辩具有儒法斗争的鲜明特色”，“李九莲的人生态度鼓午年青的当代法家抛弃私利，冒顶风险，献身革命”。

6、反对稳定，把矛头直接指向党中央。中央 26 号文件下达后朱毅说：“地委不解决李案问题，休想安定！”“你们不要高兴太早了，赣州的局势稳定不了！”另一个调委会成员说：“现在以安定为好……我吃饭都有点包袱。”方道球在他的所谓演讲报告中歪曲我们经过八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大好形势，叫喊“批林批孔运动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还说：“运动越深入，阻力越大”，现在只能“放”。

7、污蔑、歪曲和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疯狂叫喊“李九莲是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他们对（把）李九莲的反动观点说成是“真理”，把她的反革命活动叫做“追求真理”，把她的反动的人生观，恋爱观，都说成是“马列主义的”，“共产主义的”，这是对马列主义的歪曲和污蔑。他们还说：“李案之争是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之争”。还胡说：“中央不同意李九莲翻案就不是马列主义！”有的公开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还说：“中央批林批孔文件都应批判”。

方道球还说什么我们不准李九莲翻案，不同意成立调委会是“怕打开缺口，对许多冤案、假案、错案不纠，保林彪路线”。

1975 年 1 月，江西省委下发关于赣州李调会问题处理的（75）六号文件，以党的正式文件形式重申了在京学习班 10 月 22 日讨论通过的四项决议，在全省范围内宣布李九莲的反革命性质和李调会的非法性质，并且强调进一步坚决取缔李调会转入地下的活动。

1975 年 5 月 以华国锋为部长的公安部党组讨论批准了赣州地区公安局关于李九莲问题的报告。

1975 年 5 月 22 日 李九莲开始长达七十天的绝食，靠强行鼻饲得以存活。

1975 年 5 月 30 日 兴国县人民法院对绝食中李九莲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1975 年 5 月 30 日 全南县公安局对朱毅正式逮捕。

1975 年 7 月 3 日，仍在绝食中的李九莲被从赣州的江西二监狱押送到位于赣北鄱阳湖畔的珠湖劳改农场劳动改造。

例行检查时发现李九莲写于绝食前的绝命书——《投降书》：

“不知何人，劝我投降，似真似假，为此写出‘投降书’。是的，我有‘罪’。

我的‘罪’就是为党出过力，效过劳，动过太多的脑筋。真理是个美丽的字眼，吸引了无数的年轻人，我为她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原则，我做到了不怕开除厂籍，不怕解除婚约，不怕坐牢，不怕杀头。

凡真理，都有三种遭遇：用得着时，便奉为至宝；用不着时，便贬为粪土；非但用不着而且有‘害’时，就象狗一样关进笼子里——这就是现实，这就是真理的遭遇。谁准备用真理的花环装饰自己，谁就得同时准备用粪土包裹自己纯洁的灵魂！”

1975 年 9 月 27 日，赣州地委决定对李调会人员第二次大抓捕，

刘庭荣（后被判刑 15 年）、管佑龙（后被判刑 15 年）、钟海源、康为民（后被判刑 7 年）、林锋（后被判刑 5 年）、罗斌（后被判刑 15 年）、邱彩云（后被判刑 10 年）等 16 人被拘捕。

1975 年 12 月 20 日 朱毅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1976 年 5 月 钟海源坚持为李九莲鸣不平，被加刑五年至十二年，押往南昌新建服刑。

其他被捕调委会人员，在反击右倾翻案风高潮中被判五至二十年不等。

浙江省的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三年十月，张永生同翁森鹤、贺贤春，组织“控告团”、“上访团”。先后以释放张全千和杨金林为“突破口”，带头掀起了一股全省性的风潮。

据不完全统计，被释放了的在押犯有一百七十四名。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日，周恩来将一份材料批给王洪文

有关单位上报一份反映浙江省造反派头头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要求批省委领导的材料。周恩来将此材料批给王洪文，要他处理此事。

王洪文表示：此事可以再看一看。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一日，周恩来致信王洪文、张春桥

下面报来反映浙江温州地区发生抢夺武器、扰乱生产的几份材料。周恩来致信王洪文、张春桥，要他们酌处。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电告浙江省军区
命令收缴被抢武器。

一九七四年四月，召开省“三全会”。

铁瑛在省三全会上作《我的检查》）

他说：1972年的“批林整风”运动，“因个人问题出气，纠缠历史旧帐”大搞支一派，压一派，并以清查“5·16”和“反党乱军”分子对张永生等干部群众大肆整理黑材料，大翻“两个改组”（即周总理直接主持下改组省军管会和省军区领导班子）以及萧山、诸暨问题的旧案，“这就把矛头指向了”张永生和部分干部群众。“在我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省革委会四大组和许多地区、一些省属工厂、院校以及一部分县都成了‘清查重点’。”（以上加引号部份均摘自铁瑛本人在省三全会上作的《我的检查》）

张永生同翁森鹤、贺贤春向向省委建议提干五十余名。

以浙江美术学院为点，成立样板，

一九七四年，张永生同翁森鹤、贺贤春提议，经省委批准，在全省五十九个县市(区)建立了民兵第二武装。

一九七四年，翁森鹤为首策划和指挥了攻打解放街招待所、延安招待所、省事务管理局临时招待所，冲击展览馆广场的群众集会等。

大搞“请财神”、“砸破庙”。翁森鹤说：“把他们的脚骨、手骨都打断”、“打死活该”，“把打死的人抛进锅炉里当柴烧”。

(据说，有一百二十名干部和群众被关进私设的监牢，遭到严刑拷打，有的被搞成终身残废。)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张永生到金华、巨县等地，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收缴武器指示。

该地帮派头头私藏武器，继续打砸抢。仅金华县城关镇一地，被砸抢的就有三百多户，打伤二百多人，打死二十九人。

山西省的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一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讨论山西问题。

决定王谦代理山西省委第一书记。

并商定约山西省委常委来京开会，讨论解决山西问题。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八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山西召开省委扩大会议，批判谢振华的错误。

解决山西问题。山西省党政军负责人十二人参加。

会上，王洪文批评省革委会负责人谢振华主张批极左思潮，实际上是批文化大革命。

中央罢免了谢振华在山西省的一切职务。

四川省的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周恩来批示

重庆市杨家坪半工半读技校发生学生绝食事件。

周恩来批示：以国务院名义打电话转告绝食学生，指出绝食的做法是消极的、错误的，应该吃饱饭振作起精神，来与市委一起讨论，谋求解决问题。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日，周恩来批示

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报来关于重庆市“十大”宣传队抢夺枪支车辆的材料。

周恩来批示：只告现象，没提如何处理意见。如果群众已动公愤，能夺回他们抢去的武器，救了他们抓走的民兵，他们在群众中已渐渐孤立了，正是做好工作的机会。

福建省的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日——四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讨论研究福建省委、军区批林批孔运动问题，并通过中央给福建省委、福州军区的复电。

吉林省的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四年三月八日，周恩来批示

中共吉林省委办公厅转来通化某厂有人贴出针对周恩来的大字报的材料。

周恩来批示：建议给吉林省委打一电话，对此人不要事先批斗，不要施以压力。

甘肃省的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日，中共甘肃省委、兰州军区召开深入“批林批孔”动员大会，18 万多人参加。

一九七四年五月二日，省文教局长座谈会宣布兰州二中一学生自杀等 23 起事件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复辟的严重事件”。

在此之前，全省教育系统按照上级部署，大抓“马振扶事件”（即河南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所谓“走回头路”的问题），批“代表人物”。

河南省的批林批孔运动

兰考县的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四年二月九日，郭小川谈兰考县的批林批孔运动

兰考县已掀起批林批孔新高潮。这里的壁垒分明，焦裕禄生时为兰考人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今年五月十四日，是他逝世十周年，十年来的实践证明：焦裕禄同志真正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彻底执行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在这里呆了十几天，使我建立了充分的信心：谁想在这块土地上，搞资本主义复辟。至少是十分困难的。焦裕禄同志生前用毛泽东思想培养了一大批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的“硬汉”。

十次路线斗争中，林彪死党王新曾在兰考大肆摧残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和群众，但是，几乎没有一个人屈服，一直坚持到胜利。焦裕禄同志的战友——张钦礼同志仍是兰考的第一把手，他的事迹足可写一部史诗。当然，现在还不是写作的时候，只能放到以后。

一九七四年二月上中旬，郭小川谈兰考县的批林批孔运动

我们学习了中央一号文件和江青同志的信，又初步了解了兰考县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情况。我深切地感到，正在展开的批林批孔的斗争，将是十分尖锐、复杂的。一场极其深刻的、规模巨大的革命风暴很快就要到来。这场斗争，对于每个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包括知识青年）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从一九七〇年七月起，林彪、王新路线在兰考搞了一次大规模的反攻倒算，对坚持正确路线的干部横加打击迫害，踢摊子，换班子。县革委会原有四十七人，

其中，除调走七人外，其余四十人无一不被批判斗争，全县九社一镇的革委会主任全被撤职，副主任三十二人撤换了二十九人。十个公社共有革委会委员二百五十五人，罢官、调离、撤职二百三十人；他们还以“整党建党”为名，大整基层干部，在八十二个整建党大队中，支部书记被批斗后换掉七十八人。所有这些情况表明，从一九七零年到一九七二年，林彪、王新路线已经基本上控……（原信后面遗失）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四日，郭小川谈兰考县的批林批孔运动

批林批孔斗争大快人心，兰考人民马上动起来，开大会，游行，又有点像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气势。张钦礼同志回来，传达了中央及省委的精神：

一、批林必批孔、挖根，批翻案妖风，批王新，批否定文化大革命和反对新生事物的右倾思潮；

二、要在农村反对资本主义道路，巩固集体经济；

三、要纠正“走后门”等不正之风；

四、要训练骨干，试点，要有深度，从世界观的高度来解决问题；

五、运动要由各级党委领导，不能抛开党的组织，对各种错误倾向要揭、批，但要分清不同性质矛盾，特别要解决好人民内部矛盾。关键是发动工农兵群众，工农兵群众是主力军，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要积极参加斗争，努力改造世界观（这是我根据钦礼同志谈话和报告随便写的，不是原话）。

群众非常听毛主席、党中央及各级党委的话，前两天，群众想把那些闹翻案的人示众，经县委一说服，就不揪了；调查的人可以把揭发材料转去处理。

我深信，林县也是一样。砍红旗渠的是林彪、王新等反党集团。现在的县委、公社党委，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武阳、艾生等同志都是好的。要维护正确的领导。

你们那里怎样？知识青年应当在批林批孔中起作用。

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七日，新华社记者报道：《兰考的春天》

现任中共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第一书记的张钦礼，是当年同焦裕禄并肩除三害的战友。今年春节，他带着县委的五、六名干部，拉着架子车，把一千四百

多斤春小麦良种送到红庙公社双杨树大队。然后，他们同大队干部和社员一道学习毛主席关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伟大教导，狠批林彪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热情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成就，研究如何消除农业生产薄弱环节，更好地打井修渠，平整深翻，植树造林，加快实现农田水利化、园田化、园林化。

县委副书记杨捍东，原是一九六七年毕业的大学生。几年来，他在老干部的带领下，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迅速成长。一九七二年冬，他担任县委副书记后，坚持深入基层，到阶级斗争比较复杂、自然条件较差的王茂店大队蹲点。他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坚持对干部、社员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狠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在他的帮助下，大队党支部建成了一个密切联系群众的朝气蓬勃的战斗指挥部，保证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推动了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去年，大队粮棉产量都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为了夺取今年农业新丰收，杨捍东又帮助王茂店大队进一步改变生产条件，掀起打机井，深翻土地，积肥和植树造林的新热潮，为全公社抓革命促生产树立了好榜样。

一九七四年八月十三日，新华社报道：《遵照毛主席关于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教导 兰考县委大胆选拔和积极培养新干部》

从工人、贫下中农、基层干部和回乡知识青年中，选拔了二千二百八十多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充实到县、社、队和所属单位的领导班子中。

回乡知识青年孟宪芝在去年担任仪封公社党委副书记后，党委立即派她到阶级斗争比较复杂的代庄大队蹲点。

县委副书记兼生产指挥部部长杨捍东，是一九六七年的大学毕业生。一九七二年冬天，他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以后，县委书记张钦礼经常向他讲述当年焦裕禄的英雄事迹。杨捍东以焦裕禄为榜样，坚持徒步下乡搞调查，为建设兰考积极贡献力量。他通过认真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做到胸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各项工作搞得很出色。

大学毕业生吕何生去年冬天担任红庙公社党委副书记后，就到地处黄河故道的管场大队蹲点。为了改变这个队的面貌，他甘当小学生，走村串队，问干部，访群众，察看地形，寻找办法。他根据社员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紧紧抓住水利和肥料两项关键措施，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效。

文化大革命中还是红卫兵的李军芝，去年担任了焦裕禄生前树立的四个红旗队之一的张君墓公社赵垛楼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在工作忙、时间紧的情况下，她仍然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拉垫糠搞积肥，她和男社员一样，拉起装满黄土的架子车飞跑；到附近的林场去扫树叶，她总是头顶晨星去，脚踏月光回；麦收季节，她坚持在田间劳动，收割、拉运从不落后。社员们劝她休息一下，她总是劲头十足地说：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不是等来的。今年春节以来，她平均每月劳动二十五天，自己分担的工作也搞得很好。社员们称赞说，她是贫下中农的好闺女，革命事业的好接班人。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四日，新华社记者报道：《兰考在前进》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报道：《身不离劳动 心不离群众》

湖北省的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四年初，曾思玉说这个事情搞错了，向被整的人赔礼道歉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曾思玉临走前在洪山宾馆召开军队师级以上干部、地方省革委会常委以上干部会议，说：“湖北清查‘北、决、扬’、‘五一六’搞了几十万，不该斗的斗了，不该批的批了，不该抓的抓了。我心里也很难受。很对不起，这个事情搞错了，向被整的人赔礼道歉。”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日，胡厚民被从监狱里放了出来。

胡厚民放出来后，主持制定了湖北武汉批林批孔运动的“放（人）、平（反）、补（台）、提（干）、纳（新）”五字方针。胡厚民被补台到省总工会任副主任。

一九七四年三月，武锅的造反派偶然在厂党委档案室发现毛泽东关于湖北省清查“五一六”搞过了一点，要刹车、纠正，并注意政策的讲话。刘丰在文件上批示“暂不传达”。

钢工总的四大柱头武重、武船、武锅、电信局，马上召集一些人到武汉军区门口静坐要求接见。新调来的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领着政委王六生、副政委张玉华在武昌炮校接见了造反派代表。

群众代表将刘丰封锁毛主席的指示，对抗中央精神，长期整群众的事当面向杨司令员作了汇报。

杨得志问张玉华：有没有这件事情？

张玉华当时内心极为惊恐不安，他把眼镜取下来，又戴上去，又取下来。杨得志拍案追问，最后张玉华哭了，承认有这件事。

一九七四年三月三十日，钢派的人把军区围着要“两清一批”的黑材料。新派头头张立国就要顾建棠牵头去找市委查封军区搞的黑材料。

当时钢新两派关系并不融洽，但都意识到不联合不行。胡厚民赶到市委，对新派查封黑材料的革命行动表示坚决支持。

市委书记王克文在市委党校一号楼小会议室接见新派的人说：“曾思玉不是解放军，是军阀”。王克文还专门对胡厚民的所谓罪状进行了驳斥，说是“栽赃”。

根据一定的组织程序，经王克文书记同意，群众代表留了借条，将 3 万多份“两清”材料运回。过了一周，市委秘书长栗栖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运走和抢走的材料要全部送回来。”代表将材料一份不差地运回了市委。

凡是 1974 年到军区去抢了“两清”档案材料的人后来都判了 4 年徒刑，这些人当时办了手续，留了借条，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

付廉回忆：这个事情后来被定性为抢机密档案，其实都是军区三办整理的“清查五一六、深挖北决杨”的整群众的黑材料。

材料取出来之后，第二天我们就觉得事情很重大，因为东西是在航运局的船上，如果散失了有责任。我就到省里面找张立国，通过他找到姜一。我打电话过去是姜一的秘书接的，他说姜一马上来，过了一会，姜一、王克文和陈克东一

起过来了，都没有带秘书。姜一进门就拿指头点着我说，叫你们不要动手。我就说材料在我们手里，我来是准备与省委协商共同派人去整理，如果省委不派人我们就不谈了。陈克东抢着说派人派人。姜一问我有没有我的材料，我说我没有看材料，但是肯定有省委领导材料。

我提出三点要求：第一是省委派人去领导整理材料，这个人最好是清办副主任房昭义；第二是省委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开展材料整理，我们也派人参加；第三是参加整材料的人由省委发给会议补助。他们三人在出去议论了一下，就进来对我说：省委没有合适的地方，整理材料就在船上进行；双方各派四人参加材料整理工作，群众这边应该是政治上可靠的人和党员；房昭义去领导，会议补助是当然的。

后来他们就被接到船上，在那里进行整理工作，武钢的杨玉珍是省革委会常委，代表省委参加了，我们这边李苏明和彭勋参加了这个工作。后来过了两天，薛坦找到我，说中央领导同志电话指示，取走的材料必须一律归还，问我怎么办？我说那还不好办？材料本来就在房昭义带人整理，你们叫他拉回去就完了，当天下午就运走了。

湖北省的材料取走之后，姜一说我们不听招呼，我和几个去市委找王克文，要签字把市委档案室的清查材料拿出来，王克文说是不是非要他签字不可，我说省里姜一书记说我们不听招呼，现在我们来找你，当然你要签字，最后他就签了字，这样凭王克文签字的条子打开档案室拿出军区整的黑材料。这个材料拿出来之后，还没有来得及整理，中央的电话就来了，又原封不动地交回去了。

（摘自老田：《文革亲历者访谈录(付廉)》）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七日，省委姜一书记找我（谢某）谈话：准备补台任命你当共青团湖北省委书记

说你们都是文革中的新生力量，在农村这么多年，中央有精神，省里也有个安排，你们是青年当之无愧的好代表，准备补台任命你当共青团湖北省委书记。当时我连团员都不是，我到团省委直接由毛局元和张立国做介绍人，拿了一张表给我现场填好，搞火线入团。这个时候，长江日报也找我约稿，以纪念文化大革

命 8 周年的契机，要我写一篇纪念文章，配合补台的舆论。王克文还找我谈话，要我好好干，说省市委对我们寄托了很多希望。我们当时也不是想要当官，更不是要夺权，后来说是我们要抢班夺权，这实际上是黄袍加身，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回城。在我去东北支左的时候，实际上造反派内部已经开始进行大联合，开始搞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的时候，我对这些没有兴趣。后来军区张玉华主持筹备省市革委会叁结合的事情，在滨江饭店、德明饭店谈判，我父亲说最好要内敛一点，我就没有继续参加，当时杨道远和方保林还对我有意见，说不打招呼就跑了。我在农村呆了七年，当时别人已经是谈婚论嫁，我们当时回武汉连 5 分钱的车票，都要向家里伸手。实在是因为在农村那么多年出不来，有这个补台机会就接受了。

1974 年的时候，大学生们也都回来了，省委补台不考虑补他们，大概是要单纯一些的、好盘的人。我们也是不识相的，每次见了书记们，就要谈为杨道远翻案的事情，这个问题最让他们头痛。省委组织部长薛坦召见我们的时候，他的秘书跟我做手势，我不吃他那一套，照谈不误。我们还在水塔那个地方出了一大版，要他们还我杨道远。此外我还在武汉的几个主要的中学召开了多次会议，如武汉一中、叁中、实验中学、华师一附中，组织全市性的中学生游行，呼喊口号“还我杨道远”。游行之后，宋侃夫找到他在车站路 15 号的家里去谈了一次，他对我说：小谢，不要再这样做，这搞得我们很被动；关于释放杨道远的事情，总理的联络员来电话有记录，有总理的话在那里在，我们对总理要有个态度；你要听我的话，别老是跟省市委将军。他没有说个所以然出来，这个思想工作就没有效果。

省市委领导多次打招呼，叫不要跟杨道远搞在一起。可能是我们表现的冥顽不灵，所以关于补台的文件——湖北省委 9 号文件，已经上了印刷机，仍然是撤消了，我们仍然要回到原来的农村去。

（摘自老田：《文革亲历者访谈录（谢先生）》）

一九七四年五月底，武汉市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偃旗息鼓了。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准备谢某补台至武铁分局当革委会副主任

谢某从农村回来之后，省委书记赵修把他带着，到铁路各个局站介绍说，这是小谢，省委准备要补台，把他安排在武铁分局当革委会副主任。

（摘自老田：《文革亲历者访谈录(谢先生)》）

一九七五年初至一九七五年底，胡厚民、张立国、朱鸿霞、夏邦银被省委分别安排到罗田、麻城、大悟和通城县挂职锻炼。任县委副书记和公社党委书记（朱不是党员，任县革委会副主任和公社革委会主任）。

当时结合到省市革委会常委的造反派头头绝大部分都派了下去，对外讲是根据邓小平指示，新干部要下去锻炼，将来好工作；省委、省革委会对下面的内部指示是：这些派头头在武汉会闹事，放下来监督。

实际是和贫下中农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用这种方式把“三结合”中群众组织的代表赶走。这几个人在基层工作很积极，与基层干部关系处理得较好。

广东省的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三日，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等人共同起草了一份文章：《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问题

新的问题就是刘少奇集团特别是林彪集团要搞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政。

（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训

一九六八年夏季，社会主义的法治“突然不灵了”，“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灵了起来。在范围广大地区内，到处在抓人，到处在镇压，到处是冤狱。社会主义法制跑到那里去了呢？据说，它没有用了，因为这是旧人大的宪法，而新人大还没开，现在是无法无天了！

这是在我国进行的一场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演习，

把林彪体系当作正统的毛泽东思想来崇拜，这是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不可避免的历史错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人民的大民主不能离开正确的路线；

（三）关于林彪体系

（四）关于批林批孔以来的形势

林彪垮台以来民主精神的普遍高涨，更形成了他们的群众基础，他们大多数是林彪体系的受害者，他们对林彪体系有着切齿之恨，他们要求继续革命，要求人民的革命大民主，要求恢复社会主义法制。

一九六八年以来，没有见过人民群众“这样的兴高采烈”。“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这是把多少人民群众压抑在心里头的对林彪法西斯主义的仇恨的呼声喊出来啊！

但是，兴奋很快就过去了，伴随而来的是对李庆霖式的信件大肆的封锁、恐吓和镇压，

林彪的垮台，并不等于他的体系的完结。林彪体系确立的过程造成了一个文人既得利益的势力，他们害怕汹涌起来的人民群众。

把一派热气腾腾的批林局面打了下去。他们骂人民群众是“复辟派”“回潮派”，

他们无原则地吹捧秦王朝的封建专制，这实际上是在为社会法西斯主义作舆论

那些“既得利益者”骂所谓“复辟派”“回潮派”要复旧，是的，人民群众中也许有不少人在林彪体系面前产生了一种怀旧情绪，但这只是因为当前林彪体系直接损害了他们，

当前批林的主要危险，是在“反复旧”的旗号下维护林彪体系的错误潮流。

（五）谈反潮流

他们要求民主、要求社会主义法制、要求保障人民群众的革命权利和人身权利。

我们必须对谁是革命派，谁是假革命派，谁是反动派，谁是被打成“反动派”作认真的分析。分析的标准只能是看谁的社会实践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不是对待所谓“天才”的态度。

反映这个阶级斗争的双方都应当有民主的权利。一派压一派是不灵的。这种后遗症至今难道还少么？于是，它使我们懂得，若不把革命队伍内部现在可称之为“潮流派”和“反潮流派”之间，过去那种压制与被压制，甚至镇压与被镇压的关系，改变成基于团结的批评与反批评的关系，阶级的民主是不会存在的。人民民主专政将变成派别专政，这个专政派别若是“正确”，它不能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它若是错误的，便将是社会法西斯的开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幽灵，时常在他们的身边徘徊，他们不止一次地想到了恢复革命大字报的权威。但是，林彪体系压迫着他们，“忠”字化的森严礼仪在束缚着他们，镣铐、铁窗、皮鞭和子弹在等待着他们。

一九六八年以来的中国现实就这样严酷地向人们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死”了么？

（六）对四届人大的希望

一、要法制，不要“礼制”

一九六八年以后的多次运动，也总是要打击文化大革命中起来造反的人们，简直把他们非打下十八层地狱不可。正是把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镇压下去之后，林彪体系才得以确立，他们才能把封建宗法性的字句塞进一九七〇年的“新宪法”（草案）中。

这个基本事实说明了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

刘少奇，特别是林彪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封建性和宗法性，难道还不足以证明，反封建依然是我们继续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吗？

还有甚么能比“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的原则更能成为维护林彪体系“礼治”的神圣支柱呢？名为树人，实为树己。如果林彪能够名正言顺地上台的话，岂不是谁反对林彪就打倒谁了（实际上他是已经实行了）吗？而且任何一个大人物只要他宣布自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化身，他便从此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了，而“那一小撮”竟敢冒犯了他的尊严的革命群众，便决不能成为法律的保护的对象了！

这是一个极大的矛盾，一方面党的一元化领导决不可动摇，一方面“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而这些走资派恰恰是他们把持的地方和部门的一元化领导的具体体现者。

二、限制特权

文艺、教育、“五·七干校”、上山下乡、吐故纳新、上大学、培养接班人等等，几乎每个被人们称之为“新生事物”的地方，都可以成为特权显圣的场所。

特权本身是和老百姓的利益根本对立的。为甚么我们要那么回避对于特权的批判呢？为甚么要用所谓“好人”“坏人”的问题去偷换“走后门”反映在路线上的大是大非呢？

三、保证人民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权

一九六九年的“新党章”、一九七〇年的“新宪法”（草案），把林彪这样一个法西斯魔王法定为接班人的事实，使中国人民看到了一个极其可怕的阴影。

广大人民群众非常反感的是那些充满宗教情绪的“活学活用”（即投机取巧）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制裁反动派

事实上都是经常不能保障，却是经常“准”对革命干部和群众实行法西斯专制，关的关、杀的杀，制造假案，甚至大兴野蛮的肉刑就是“严禁”不了！

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革命纲领，在反动派的手里就变成为对群众的革命意图的讽刺，从而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手中最利害的杀人武器。

五、落实政策

一九六九年“九大”就已经提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落实（政策）”，至今五年了，林彪垮台也已经三年了，为甚么许多重要的党的无产阶级政策落实不了？

同时近年来，政策的多变，甚至“朝令夕改”（有认识上的原因但主要是反映了路线斗争的激烈）加上土政策层出不穷，造成了人们的思想混乱，甚至对党怀疑。

六、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我们在看到特权膨胀的同时，同样清楚地看到了工农劳动群众在所谓“共产主义”的口号下，他们许多合理的经济利益遭到了剥夺。工人多年没有提高工资了，而且还取消了曾作为他们工资一部分的合理奖金；而农民群众在无偿的“忠”字粮，高征购以及“割私有制尾巴”的运动中，遭到了更大的损害。这个林彪的极“左”路线所带来的危险性，现在越来越充分地显现出来了。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日，以“李一哲”的署名，在广州闹市区北京路口张贴了题为《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的大字报，长达 2 万字，从头至尾长度约 1 0 0 米。

不久，这张大字报流传到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应。

江青说它是“解放后最反动的文章”。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七日，李一哲《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

我们不妨回忆一下林彪体系“鼎盛”时期的情景吧！

我们没有忘记代替一切，奖懒罚勤的突出（空头）政治，念经式的“天天读”，越搞越虚伪的“讲用”，越闹越荒谬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鼓励政治投机的“表忠”，不伦不类的“忠字舞”，不胜烦琐的忠孝礼仪——早祈祷、晚赎罪、集会、集队、上下交接班、买卖东西、写信、打电话，甚至吃饭等等，都涂上、罩上激烈的宗教色彩和气氛。总之，让忠字占领百分之百的时间，百分之百的空间，而这个“好”那个“好”的运动，则是“左！左！左！”的比赛，“……最……最……最”的竞争，不计其数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实际上假、恶、丑行径的博览，“一本万利”的赌场。

我们也没有忘记那损害工农群众基本利益的“公产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党风，鼓吹“有用就是真理”“立竿见影”的学风，提倡讲假话的“新八股文风”，“小节无害”论所鼓励的腐败恶棍的作风，以及“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

我们更没有忘记那些公式化的阶级斗争说“教”、“渣滓洞”式的牛栏比之历史上的“三·一八”“四·一二”、“五·卅”、“六·二三”等有过之

而无不及的屠杀——仅广东一省被杀害的革命群众、干部就近四万人，被关、管、斗的革命干部、群众上百万人。

然而，有人却闭眼不承认林彪体系曾经确立的这个有八亿人见证的事实，厚着脸皮硬说“时时处处”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这岂不等于说，血腥的屠杀，长期不能翻的案都是“革命路线”决定的么？

如果不曾有林彪体系的确立，为什么落实政策的号召发出五年多，经过三十次申、五十次令，才落实到贺龙同志那里呢？

如果不曾有林彪体系的确立，为什么会发生“庐山大笑话”呢？

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发誓不让被他们打下去的共产党人再从地上爬起来。为此，他们找到诀窍，就是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对他们危害较大的革命同志打成“反革命大黑手”、“反革命坏头头”、“五·一六”“现行反革命分子”、“叛徒”等等，长期监禁、肆意虐待。到甚么也打不成的时候，就把本来很清楚的问题，弄得似乎永远也搞不清楚，以此籍口，长期挂着，等待时机，卷土重来，难道大量的事实不正是这样么？

林彪体系的产生，乃是中国社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我们中国是直接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脱胎进入到社会主义的，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使它的意识形态根深蒂固。不仅在旧民主主义时期，而且在新民主主义时期都没有给予摧毁性的打击。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深中于群众乃至一般共产党员的头脑之中，难道不是这种情况才提供了林彪体系以风靡一时的条件，以至把毛主席“逼上梁山”的么？难道不是这种情况，使得林彪党徒在其势力所及之处，以镇压人民民主来宣告“全面胜利”的么？

我们说林彪体系，我们同时还指出“天才史观则是其理论纲领”即思想上的纲领。为什么呢？几百、几千年出现了一个“天才”，无限崇拜“天才”，绝对忠于“天才”，一切照“天才”意志办事，谁反对“天才”就打倒谁，这不是一条极其完整的思想政治路线么？不准思想、不准研究、不准探索、不准对任何一个问题“问一个为什么”，“天才史观”简直取消了八亿个大脑。

现在，人们看得很清楚了，他们从天才史观出发，搞了那么一套“体系”，这是一套现代的“礼”。他们就是拿了这一套“礼”来“治”党、“治”国、“治”军的，这就必然把我们的党“治”成君臣父子党，把我们的国家“治”成

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的国家，把我们军队“治”成袁世凯北洋军那样的军队。可不是么？林彪在北京有他的冯、段，在地方也有他的督军，那些“大将”、“督军”除了没有来得及带兵打到北京以外，别的几乎样样他们都干出来了。

人们会问：既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完成其自身任务反而曾经确立了林彪体系而且至今未被清算”，那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有甚么积极成果可言呢？

我们回答说：不！我们说林彪体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得到了确立，但这并不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绝对地被它所取代。我们说那时候似乎是出现了一种暂时的二元状态（这是两个司令部的存在决定的），就好像董仲舒确立了儒家的地位并没有马上停止了汉武帝的法家路线一样。而且，在我们断言林彪体系曾经确立了的同时，已经指出：“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方面是它造成了它的反面，即造成了一个新兴的社会力量”。

“九·一三”事件后，全党、全国人民根据他们的切身经验和毛主席批判林彪一伙的一系列指示，批了林彪这个“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左”派朋友。他们批了林彪“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宗派路线，批了“政治冲击一切”，批了“公产主义”，批了“顶峰论”和“绝对论”，这一批，批到了林彪体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那些人头上了。于是有人出来说，不许批了，“批了群众了”。

群众整整挨了三年批，挨了三年斗，没有人出来说一句话，保护一下。现在突然有人说，不许批极“左”了，群众一下子有了保护了，真是受宠若惊！这里，我们倒确是很想和这些保护群众不挨批的理论家们讨论讨论。

理论家们问，“林彪路线的实质是‘左’还是右呢？”这一问真是荒唐得郑重，党内机会主义路线无论其表现形式是“左”是右，其实质都是右，因为它们结果都必然导致革命的损失甚至失败。这里是没有“左”和右的区分的，难道我们的理论家们真的连这点常识都没有？

可是，历史上那个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没有表现过时“左”时右呢？

理论家们，林彪不是宣扬孔孟之道么？怎么说极“左”呢？可是从1960年到1971年的报纸和文件上，我们怎样才能查到“最高、最高”的林付主席号召我们学习孔孟之道的指示呢？他们要使人们学董仲舒，也要人们将毛泽东思想

当作宗教来礼拜哩！我们认识林彪的封建性，难道不正是以新的礼教原则——谁反对毛主席思想就打倒谁来表现的么？作为刘少奇、周扬一类非常仇恨毛泽东思想的人的对立面，林彪不是“左”得很么？

鲜血淋漓的杀气腾腾的复辟行动是开始于一九六八年下半年，并以一九六九年法定林彪为接班人达到高潮。（这便是某些人“热血沸腾”的东西）经过一九七〇年八月至一九七一年八至九月的决战，随着林彪垮台，这种复辟行动恰恰是到一九七二年才大致上全面停止下来，从而开始人民群众的反攻。某些人正是把这种人民的反抗说成是“复辟”，因此，他们“反复辟”，实际上是反反复辟。显然，高呼“反复辟”的口号有两种人，也是截然相反的内容。

他们十分留恋林彪体系达到顶点时的那些“光荣的日子——成千上万的人民人头落地的日子”，他们在“全面胜利”中得到的一切——地位、特权……乃至驱打奴隶的鞭子，全都是闪着圣光的宝贝，不容许奴隶有一点亵渎，那时候中国的社会是他们的“天堂”，天堂里的社会关系丝毫不可改变，如果林彪不允许“右派势力抬头”，那么他们也不允许。

因此，一九七二年后，当宝贝的圣光越来越暗淡，奴隶们的态度越来越放肆，“天堂”里的社会关系越来越不稳，念“紧箍咒”也越来越不灵（“金箍”在“全面胜利”时套在奴隶们头上）的时候，他们急了。于是，他们口中念念有词，祭起了非常革命的法宝，叫做“反复辟”！

在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看来，九届二中全会后，特别是“九·一三”后，是一年不如一年。正是他们开历史倒车，先是想开回七〇年八月以前，后来想开到七一年九月以前，现在无可奈何开到七四年三月以前。当然，他们是绝不甘心放弃倒退四年的目的的。可笑的是他们却指斥人民为“复辟派”、“回潮派”。这里，我们倒要问问他们：难道被林彪一伙破坏了的党的、军队的、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不要恢复吗？难道被林彪一伙破坏、抛弃了的“三大作风”，我军的优良传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要恢复吗？被林彪一伙歪曲得面目全非的党史、军史要不要恢复其本来面目呢？被林彪一伙用压、抓、打、杀代替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与“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要不要恢复？被林彪一伙“从客观到主观”的模式篡改了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艺创作方针要不要恢复呢？被林彪一伙“政治冲击一切”代替了的“德、

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要不要恢复呢？被林彪一伙破坏践踏了党的一系列政策——依靠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政策、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上山下乡政策、华侨政策、各项经济政策……要不要恢复呢？被林彪一伙天才观压抑下去了的“五敢精神”要不要恢复呢？难道林彪一伙炮制的从中央到地方成千上万的假案翻不得、平不得吗？难道大批虽然犯过这样或那样错误但经过长期考验证明是对党忠诚的老干部就不应该再使用了？邓小平、赵紫阳这些同志根本就不应进入中央委员会是不是呢？即使给他们出路也要把帽子拿在“群众”手里，随时准备给他们再戴上是不是呢？

林彪一伙的思想、政治路线是反动的，他们的教育路线、文艺路线也不会是革命的。如果说张玉勤事件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表现，不如说是林彪路线在教育战线的反映。难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是以死人为基本特征的吗？被林彪路线整死的人何止万千，年过半百，久经风霜的老革命干部尚且被逼死，何况十五岁的女孩子？黄帅的老师整黄帅的那一套，是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那里继承来的，还是更多的从林彪路线那里来的？后来，“黄帅”对革命同志王亚卓的不同意见那样无限上纲，气势汹汹，把他骂成“复辟势力”，又是从哪里来的呢？难道谁反对我就给人家扣个帽子然后加以“打倒”的霸王作风是一个十来岁的女孩子身上固有的吗？

谈到教育路线“反潮流”的问题，我们提到过张铁生，张铁生反的是甚么潮流呢？据说是所谓“智育第一，分数挂帅”回潮的潮流。说实话我们从他的答卷除了能够找到他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妥协的证据外，是找不出挑战的证据的。而且他的白卷本身就迎合了一股“空头政治冲击一切”在教育战线的表现的潮流，虽然这个潮流走向反面也出现了一些“智育第一，分数挂帅”，但它还远远没有形成潮流呢！于是张铁生之所以成了幸运儿，不过是某些人为了可以利用来作为一九七二年后“复辟”“回潮”的活证据罢了。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初，中共广东省委认为这是一张“反动大字报”，决定在内部组织批判。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一日，李一哲《吓人战术——评某些权威的批判》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六日，李一哲《请君入瓮——二评某些权威的批判》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李一哲《杜岗的把戏——四评某些权威的批判》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广东省政府领导人在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宣布“李一哲”是反革命集团。

一九七五年一月，广东省、市有关部门按照上级布置，在许多机关、学校、工厂大张旗鼓地开展批判李一哲大字报的活动。

一九七五年某月，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分别被判有期徒刑。

江苏省的批林批孔运动

无锡市的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四年初，钢球厂工人们首先发难。他们贴出大标语质问当局，“深挖五一六究竟镇压了谁？”。

王晏等人召开各级会议统一口径，他说：“深挖五一六大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有文件有批示，深挖的大方向不容怀疑。谁要是抓住一点点细枝末节不放，就是为阶级敌人翻案”。“认真观察阶级敌人新动向，五一六翻案风在哪里一露头，就在哪里狠狠地把它打下去”。

一九七四年三、四月，市革会报导组和《无锡日报》编辑部一批年青人冲出来了，而且还带动了一部份机关人员和共青团组织，矛头直指王晏等权要人物。主要内容是揭发王晏等人与林彪的关系，并且把“挖地三尺”着重提出来列为王晏等人一大恶行。他们指出王晏等人搞的“深挖”那一套根本没有政策法律依据，并指出这是蓄意残害人民。

接着又有许多政宣理论界人士也纷纷站出来揭露这些权要的言行。

一九七四年四月，王晏、张文治等人偷偷涂改市委常委会议记录。这事很快被市委档案保管人员揭发。王晏、张文治被停职审查。

一九七四年四月，在城中公园举行了数万人参加的控诉大会。会后群众涌入市委并提出了几项要求，

（一）市委必须明确态度，彻底查清“深挖五一六”的问题并向全市人民作出交代。

（二）市委必须给所有被屈打成“五一六”的干部群众平反，及时落实政策、赔偿损失、医疗伤病。

（三）对那些在“深挖”中行凶打人、致死致残、民愤极大者交付司法部门依法处理。

（四）现尚因被“五一六”罪名尚被关押的人应予立即释放。对前此在“红色台风”“一打三反”中被拘压的市革会委员匡建中，原“红总”中心组成员陆渭文二人应按“有罪定罪，无罪释放，错了平反”的原则立即解决。

当时市委常委们的答复大体如下：

王晏、张文治破坏清查，搞了扩大化，打击了很多干部群众。市委支持同志们结合“批林批孔”狠批“克己复礼”，揭发批判王晏、张文治的问题。关于平反的问题要慎重，不能搞一风吹，要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也不能漏掉一个坏人。

关于在清查中违反政策打人的事，同志们应从大局观念出发，按毛主席“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这一原则出发，不要纠缠在这些事情上，搞好团结共同对敌。

关于陆渭文、匡建中等尚在押人员的事，常委和请愿群众间是以一种“个别人对个别人”的非正式交谈方式许诺释放，并约定次日下午释放陆、匡二人。

一九七四年四月某日，市委匆忙召开常委紧急扩大会议，“讨论”了半个小时就“决定”了陆、匡二人问题的性质为“现行反革命”。

一九七四年四月某日，市委某领导干部与群众代表关于陆渭文、匡建中问题的对话

群众：“为什么王晏花了几年的功夫都定不了他们的案，而你们上午只用了一支烟的功夫就定了案？”

某常委：“同志们应该相信市委，现在不是王晏那个时候了，我们定案是很慎重的。这关系到人的政治生命嘛。”

群众：“既然是慎重，你们又怎么能一下子就忽然定下案了？”

某常委：“这个问题正说明王晏的问题，他是有意拖延混淆敌我界线。”

群众：“你们定性定案是依据什么材料？是王晏、张文治搞的《无锡五一六十大事件》里的那个《夏季阴谋》的旧案卷吧？”

某常委：“怎么，你们莫非是怀疑市委吗？怀疑一切是不对的，那可是极左思潮，是刘邓，陶铸和林彪的那一套啊！小心上当犯错误啊……”

群众要求他公布材料，他却含糊其词说：“以后会公布的，大家不要纠缠在这个问题上让阶级敌人和一小撮别有用心者乘机兴风作浪！”

借口有事扬长而去。

一九七四年五月，市委领导人召开各种会议，

说：“当前的重点是狠批克己复礼，联系本市阶级斗争的实际，揭发批判王晏、张文治忠实执行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问题。警惕有人用清查（五一六）的问题冲击干扰当前的大方向……”。“清查（五一六）大方向是正确的，中央发了文件，二十号文件是有批示的，由于王晏、张文治推行林彪极左路线，搞了扩大化伤害了一些干部群众。我们市委常委抵制不力也该深刻认识引以为诫。不过落实政策不能搞一风吹，那样是会漏掉一小撮阶级敌人……”

还在社会上放出一股风，说：“……为什么陆、匡二人不放？说明被搞到的人还是有反革命，不是五一六也是个五一七……别看有的人现在闹平反起劲得很，哭的日子在后面呢！现在是为了运动需要，让他们再跳跳，再暴露暴露……”

一九七四年五月，沈静园教授和某人为要求惩办凶手的事去找一位市委副书记

问：“x 书记，那些在运动中行凶致人死亡的凶手，难道不应该依法惩办吗？”

答：“这个问题嘛……要从路线的高度来看，要知道那些打你打得最凶的同志，其实心里最热爱毛主席……这个你们这个这个要有认识。”

问：“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只有林彪才说什么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好人误会。x 书记，现在批林批孔，你怎么还说这样的话啊？”

答：“同志们，你们怎么还不能站在路线高度看问题啊？这样很容易迷失方向上当受骗，到时候犯了大错误后悔可就晚了！像王晏就是个活教材嘛。”

问：“x 书记，你能给我们讲讲这个路线问题吗？”

答：“这个……这个你们想想，这个二十号文件可是中央文件啊，上面还有批示。所以我们市前几年搞的这个清查，大方向是不错的，出了一些偏差嘛。总不能搞翻烧饼。”

问：“x 书记，你说的这个中央二十号文件的完整文号是什么？是中发（中共中央颁发）还是什么中央部门发的？”

答：“这个……这个好像不是中发。文件是发到省军级，我也是听传达……”

问：“谁批示的，是毛主席批示的吗？批示内容是什么？”

答：“不是主席批示的……反正中央领导好像有一个批示……我现在记不清，不能随口乱说……”

问：x 书记，那二十号文件上有没有说可以打人，可以把人打死打伤了不负责任？”

答：你们还是要死死揪住这个什么打人啊，什么凶手啊的问题不放！照这样搞下去，今后再有运动，谁还肯出来当积极份子运动骨干了？

一九七四年五月，在基层搞了一些“试点落实政策”。找人个别谈话，将以前几年搞的几尺高的案卷一张张“核对事实”。然后给一张盖了大印的纸头，上面写着：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经人揭发对 xxx 同志进行审查，现已核查清楚

xxx 同志没有参加五一六兵团，现根据政策予以排除。有的还加上：该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些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言行。希该同志认真汲取教训，正确对待群众的批评和组织的审查。

一九七四年下半年，各单位都搞起什么“座谈会”“茶话会”甚至摆起酒宴，把昔日的阶下囚奉为上宾以示“诚意”。并且说：“千仇万恨都集中到林彪反革命集团”、“审查人的和被审查的都是阶级兄弟，不能再搞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了。”“紧紧抓住当前大方向狠批克己复礼。”有的地方还正式规定：“在平反过程中只能批判刘少奇和林彪反党集团，不能提到参加清查工作的同志”。

然后一阵风发下来数以万计的《平反决定》。其基本文字内容如下：

xxx 同志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由於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受到错误审查。今查明该同志没有参与五一六兵团的组织和任何活动。党委依照有关政策决定为该同志正式平反恢复名誉。

对于死难者则含糊其词加上一句：

审查期间，该同志於 x 年 x 月 x 日在错误路线下非正常死亡。

有人对这种“一风吹大平反”提出质疑，要求进一步查清死因依法惩办凶手，就被冠以“干扰大方向，破坏批林批孔运动”的大帽子。

作为“五一六”特大要犯，又被“王晏后”市委再次宣布为“反革命”的陆、匡二人，在“一风吹大平反”后继续被关押。

一九七五年，匡建中在广大群众的强烈呼吁下、在当时江苏省级领导的干预下才被平反，恢复其共青团组织生活和无锡市革委会委员的职务。

湖南省的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四年二月，唐忠富从北京回来后，向工代会的一些领导人传达王洪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的讲话

他说：“这次到北京把头上的角磨尖了，而且还淬了火，回湖南要摆它几下”。“要依靠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造反派，同走资派作斗争。”

同时，唐忠富与胡勇、雷志忠等人在湖南宾馆研究，由雷志忠负责组织写作班子，编写了《为革命造反派辩护》的传单，以“唐勇忠”名义铅印散发了六千份。强调指出：对于“敌人、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资产阶级右派。”要“把他们的权再夺回来。即算‘解放’了，也要再打倒，要给他们戴上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或资产阶级右派的帽子”。

一九七四年二月，唐忠富与胡勇、张厚等人在湖南宾馆研究进省委常委班子的名单，提出：唐忠富、章伯森当省委书记，胡勇、张厚、孙云英等为省委常委。

一九七四年二月，中央任命唐忠富担任中共省委常委，胡勇进入了省委委员的行列。

长沙港务局的造反派头头赵某，平反、入党后不久，即被任命为该局党委会副书记。

长沙市委、长沙市商业局党委发下文件，对××公司革委会几位正、副主任宣布予以平反、恢复公司革委会正、副主任职务，并且，将被贬到市里停车场守大门的章忠全调回公司，重新担任了公司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退还了在“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时整的那些档案材料。有部分档案材料，或在平反大会上当众烧掉。

一九七四年三月，唐忠富提出：关键要解决省委领导班子问题，“要解决亮相干部和造反派掌权问题。”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一日，省委批准，由唐忠富为首的湖南省总工会和长沙市总工会联合召开十五万人的批林批孔大会。

随后，唐忠富、胡勇、雷志忠三位省级造反派头头，还联合以“富勇忠”的笔名，在《湖南日报》上发表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篇幅文章。

不久，有人以“穷志诚”的名义（针对于造反派头头“富勇忠”笔名），在长沙市中心广场，贴出了反对造反派观点的大标语。这些标语，很快就为造反派

方面的标语所覆盖或撕毁。中共长沙市委，还专门召开全市领导干部大会，发文件，指责这些以“穷志诚”名义进行的活动。

一九七四年三月，省地市县及所有企事业单位的党委体制下，成立“批林批孔运动办公室”（简称“运动办”）

造反派便凭借这个“运动办”，作为与省地市县各单位党委交涉，要求达到上述目标而进行施压或讨价还价的指挥部，作为一个事实上的压力团体，在实际运行中与各级党委并行存在，而成为了党内建制合法的特殊机构。

一九七四年四月，为造反派的再次平反活动，以及几乎同时进行的大批造反派骨干分子加入中共党组织的活动，便如火如荼展开了。

一九七四年四月八日，已是公司革委会的副主任的陈益南，向机修厂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机修厂的党支部书记、全体支委，以至支部全体党员，都一致投票同意他入党。

一九七四年六月，唐忠富与胡勇、雷志忠研究，要陈大为对省委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和省计委、工交办、农村办、财贸办及大部分局的领导干部进行摸底排队，区分造反派和非造反派，为解决亮相干部和造反派掌权问题作组织准备。

一九七四年八月底，中央对湖南批林批孔运动的“八条”指示此后，对原造反派头头平反、提干、入党的活动基本上停止了。

云南省的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四年初，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云南全省，特别是昆明，出现了新的动向，形成了三大派：

“齐向阳”：以黄兆其和刘殷农为首，是原来的八派，是划线站队中的正确路线代表，是省市革命委员会中掌权的人物。这一派从上到下掌握着各级党委

的批林批孔办公室和民兵指挥部。组成的“八人核心”（即黄兆其、刘殷农、张奎林、徐宝兴、李树林、邹思浩、许少先、杜晨光），下设文班子、联络站、材料室等，与部份省级机关十多个地、州、市和昆明地区十多个大中型厂矿以及军内的同志联络，上下配合。他们在批林批孔中的方针是：狠批翻文化大革命案，层层揪复辟势力，解决权掌握在谁手里的问题。先后发动了三大战役：打蔡、马、雷、董（蔡顺礼时任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马杰三时任昆明军区指挥部主任，雷高远时任云南省军区政治委员，董占林时任第十一军军长）战役，打王必成（时任昆明军区司令员、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战役，打陈康（时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战役。

“大批判”：以杨树先为首，杨曾是八派的第二号人物，有名的武斗司令。这一派认为，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对权力分配不公，对他们的这些造反有功的人没有分配给应有的权力。他们认为，现在的主要矛盾是造反派同复辟势力的矛盾，并有针对性的提出了三大口号：反复辟、反回潮、反倒退。他们认为，掌握了实权的人物在搞复辟，在云南就是我们过去保过的人，有的还是我们过去的战友，这些人已经成了既得利益的维护者，有的成了新走资派。他们指的就是黄兆其、刘殷农、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张某某等人。

“反潮流”：以李毅、方向东为首，是原来的炮派。在划线站队中受到压制。这一派提出：批判谭辅仁，批判划线站队；为落实政策而斗争；为云南受害的人民伸冤。

一九七四年初，刘殷农同黄兆其编写《这是为什么》一文，

揭露昆明军区副司令员、省委常务书记陈康对革命路线“刻骨仇恨”、“支持赵健民组织政治土匪武装‘滇西挺进纵队’，到处残害人民”，提出要“冲破阻力”对付“残暴与横逆”。

同时又同黄兆其等向江青、王洪文写信揭露陈康是“林彪资产阶级司令部残余势力”、“翻案总代表”，“复辟势力的急先锋”。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五日、黄兆其给江青、王洪文、姚文元写信，

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运动期间，黄兆其与刘殷农、涂晓雷等共同商量，由涂晓雷、唐世华等人写了《发扬革命造反精神，彻底揭开省委盖子》、《把“云贵总督”王必成及其同伙押上历史的审判台》、《于无声处听惊雷》、《谁是刽子手》、《转嫁危机的新阴谋》等大量文章和传单，说云南省委是“毒蛇猛兽的巢穴”，“云南从上到下许多地方是走资派控制党委的局面”。还说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省委书记陈康等领导干部是云南省委内的“复辟势力”。并说：“云南省委主要有三股势力，一股来自‘云贵总督’王必成；另一股来自蔡（顺礼）、马（杰三）、雷（远高）、董（占林）的帮凶陈康和黎韦；还有一股来自社会上‘复辟势力’在省委内的代表人物”。提出大揪“复辟势力”，打“还乡团”，“向党內正在走的走资派第二次夺权”，“要从组织上把党、政、财、文大权夺回来，‘把现存的走资派思想体系和组织体系彻底摧毁’。‘现存的云南省委必须解体’，‘我们斗争的目的就是为了夺取这个政权’。

一九七四年四月，何立宽在昆明震庄工农读书班期间，向黄兆其揭发了原文山州委书记岳永喜“和十次路线斗争有牵连，和蔡、马、雷、董有联系”。布置刘玉净、童永昌，陆元明、陈伟、胡世康、何文忠等人收集整理和编写了《岳永喜克己复礼言行录》，布置刘玉净等人将此材料在文山地区进行传播、散发。

一九七四年四月，何立宽布置童永昌、刘玉净等人在文山以单位或支部的名义对岳永喜进行批判，提出：“对岳要打，打不倒要赶跑，赶不跑要搞臭”。在此期间，何立宽、胡玉珍确定了批判砚山县委书记贾齐帮。

一九七四年三至五月，黄兆其、刘殷农、叶秀锦等人多次在震庄商量策划，制定了“军队攻王必成为主，地方攻陈康为主，两个一起打”的方针，并决定“打三个战役”，第一个战役打“蔡、马、雷、董”，第二个战役打王必成，第三个战役打陈康。在全省掀起“打王”、“打陈”，层层揪“复辟势力”。

一九七四年六至七月，黄兆其、刘殷农、李树林、张奎林、徐宝兴等人，在近日楼昆明百货商店、西山华亭寺等处商量，确定“把活动转入内部”，根据

“提、补、纳、调”方针，调整省、地、市、县各级各部门和厂矿党、政领导班子。要“通过斗争”，“把黄兆其斗进省委常委班子，刘殷农斗进市委书记班子”，“上面有了样板，下面就照着干”，“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和可以影响做工作的都应积极解决”，能提一个算一个，解决一家算一家”。

一九七四年，刘光兴与黄兆其、刘殷农相配合，在楚雄地区大量翻印、散发传单、材料、发动打倒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云南省委书记、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

同时，在楚雄州医院等处多次召开串连会，要依靠老造反“揪”三派人物”（即文化大革命前的走资派、文化大革命中的反对派、文化大革命后的复辟派）。

在刘光兴的指挥下，批判了楚雄军分区司令员陈仁才，楚雄州委党校书记任永（原楚雄地委副书记）、和州委宣传部长马荣春等领导干部，

刘光兴与李国梁、赵××商议，提出一个二十余人名单、要把其中十八人安排到州属部份部、委、办、局的领导岗位。

国家体委的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四年三月五日，周恩来批示

请王猛同志在国家体委批林批孔运动中，采取提倡和欢迎群众批判自己的认真、严格、热情的态度，方可把体委的运动发动起来。

贰、 本节简论

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

各地的革命群众，特别是那些在九大以后受到错误打击、压制的原造反派和支持他们的革命领导干部，敏感地觉察到批林批孔运动是一次维护文化大革命成果的新的机遇。他们在各地迅速行动起来，联系本地否定文化大革命、打击革命派的实际，展开斗争。他们的革命行动，不仅得到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领导干

部的支持。中间派在批林批孔运动的革命形势下，也随声附和。而在九大以后犯有否定文化大革命、打击革命派错误的领导干部，则被迫作检讨。

可惜，这方面的材料，已经公布的为数极少。有的，也多数是革命派的个人回忆。从已有的材料来看，当时，山东、安徽、湖北、湖南、云南等地的情况，是有代表性的。

其中，广东省的材料特别有意思。

一九七三年，在批林整风中，潜藏的一股复辟回潮暗流，逐渐形成并浮出水面。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李一哲的大字报出笼在全国是有代表性的。有人评价说：“这张大字报抨击当时不完善的民主与法制，指出林彪反党集团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对江青一伙搞所谓‘反复辟’、‘反回潮’表示不满。”这正是一九七四年要发动批林批孔的原因所在。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初，中共广东省委认为这是一张“反动大字报”，决定在内部组织批判。

在批林批孔高潮中，李一哲们暂时收敛了一下。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他们看准了召开四届人大的时机，又开始大举反攻。

一九七五年在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宣布“李一哲”是反革命集团。

一九七五年一月，广东省、市有关部门按照上级布置，在许多机关、学校、工厂大张旗鼓地开展批判活动。这就是曾经轰动一时的“李一哲”案件。

后来，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还分别被判有期徒刑。

一九七八年广东省又为他们平反。

在一些地方，有人沿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经验，组织战斗队，离开工作岗位四处串连，把大字报贴到大街上，抢黑材料。有的地方，一些人甚至搞起了绝食斗争，包围银行强迫提款补发工资、奖金，打开监狱放走在押犯人，抢夺武器搞武斗。

显然，这种情况违背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

一九七四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批林批孔问题。

鉴于运动开始后发生的一些情况和问题，会议提出：在党政机关、军队系统、生产部门和大中学校等应早一点规定一些政策界限，报经中央和毛主席审批后，下达全国试行。其中有：

各野战军和军委、各军区的作战、机要、通信、情报、运输、供给等部门不搞四大；

党政机关则应集中在一个易于观看的地方贴大字报，机关的学习初期可定半天，其他时间仍搞业务；

学校、工厂都不放假搞运动，学校可分出一定时间学习和批判，工厂可在生产外的时间搞，农村公社亦然。凡学习时不任那个单位，都要有值班员，不致误紧急事件。

会议还决定成立由周恩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华国锋和汪东兴等七人组成的小组，代表中央处理批林批孔日常事务。

军队系统则根据李先念的建议，由军委六人小组负责处理有关问题。

一九七四年二月一日，周恩来、王洪文联名致信毛泽东汇报政治局会议情况。

毛泽东圈阅了此信。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下，一场群众性的深入批林批孔的政治斗争，正在各个方面展开。批林批孔是我国当前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彻底革命，是对封、资、修的宣战，是对帝、修、反的沉重打击，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在批林批孔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是积极还是消极，对每一个领导者都是一个考验。

一九七四年二月五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讨论批林批孔运动问题。

会议认为：目前各地各单位运动处在发展不平衡状态，经验还不够多，如果过早地规定政策界限，可能对群众的发动定了框框，不如先看一看，搜集更多材料，多积累些经验，才好提出问题谋求解决。

会议对军队系统要害部门不搞四大、由党委统一领导运动，以及野战军部队不另成立战斗队、不搞外出串连等问题作了布置。

一九七四年二月九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讨论七日外交部关于几个开放城市（杭州、武汉、郑州、沈阳、上海）最近大字报上街情况的报告。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关于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对外宾、外交官员和在华外国工作、学习人员有关“四大”的几项规定（草案）《规定（草案）》提出：各单位、各地区张贴的大字报，除中央另有规定外，一般不许抄贴中央文件，大字报和大辩论均不许泄露国家机密。

一九七四年五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政策问题的通知通知主要强调：在运动中，广大群众揭发批判了许多同林彪反党集团有关的人和事，这是完全必要的。继续把这方面的问题搞清楚，也是完全必要的。但是，领导上必须注意清查的范围应限制在同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问题，不要扩大化。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四日，江青在批林批孔座谈会上的讲话，她说：现在批林批孔，除林（彪）、陈（伯达）外，不提现在的儒。现在有很大的儒，不然搞这么长的批林批孔干什么？党内就有，刘、林就是最大的儒。现在一定有儒。要不为什么批林批孔？尽管有人反对，我还是坚持有现代的大儒，蒋介石、林彪就是现代的大儒。这个话也只是余音绕梁而已。

一九七四年七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要求各地：不准揪干部，不准打人抓人，擅离职守的领导和其他人员必须返回工作岗位，对把打内战、停工停产的行为说成是反潮流、不为错误战线生产的错误议论必须加以批驳，等等。

从各地的材料来看，中央的这个通知下达以后，各地的批林批孔群众运动基本上就偃旗息鼓了。

下半年的主要任务已经转到召开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上去了。

2010年2月8日初稿

第十章第四节 批判各领域的复辟回潮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四年一月五日，《人民日报》刊登文章《敢于同旧传统观念决裂的好青年——柴春泽》

编者按：这是下乡知识青年柴春泽给他父亲的复信，很值得一读。这封信，代表了我们的革命小将在思想领域里向老将的挑战：看谁敢于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柴春泽，还有千千万万的下乡知识青年，坚决走毛主席指引的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扎根农村，建设农村，与轻视农村、轻视农业劳动的旧思想、旧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我们的老将们，经受过革命斗争的多次考验，经过了党的长期教育，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更应该坚决地支持子女上山下乡，扎根农村。我们愿意看到更多的革命小将向老将挑战，也愿意看到更多的革命老将接受小将的挑战，带领小将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

调查附记

柴春泽，原是辽宁省赤峰市红代会副主任。一九七一年中学毕业时，他在学校最先贴出大字报，申请到风沙大、路途远、环境比较艰苦的翁牛特旗插队落户，锻炼成长。

到翁牛特旗玉田皋生产大队半年多，青年点出现了一股“转点风”，他的父亲也动员他转回赤峰县。柴春泽感到这场斗争的激烈，更需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实行《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两个决裂”，坚持实行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伟大教导。他给父亲回信说：“爸爸，我是响应毛主席的指示来到农村的，您是一个具有二十七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我建议您考虑一下您的意见是否符合党的利益。”不久，父亲来信做了自我批评，支持儿子扎根农村的决心。柴春泽感到很高兴，在农村干得更加出色了。

去年六月，柴春泽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公社党委副书记。八月三十一日，他突然接到父亲的一封来信，告诉他现在有一

个招工的机会，一定不要错过。他很不平静，觉得父亲思想上的反复，在一些家长中间很有代表性，便把父亲的信和自己写的复信在青年点拿出来公开讨论，鼓舞了战友们扎根农村干革命的雄心壮志。他父亲收到这封复信后，又受到很大教育，承认原来的想法是错误的，但因公出差，没有来得及回信，便嘱咐柴春泽的弟弟、妹妹向哥哥学习，并让柴春泽的母亲把他的想法告诉了春泽。

柴春泽所以有这样高的路线觉悟，敢于向旧的传统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是由于他在党的领导下，能够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积极参加农村三大革命运动，坚持认真看书学习，努力改造世界观。下乡两年来，他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学习了五遍《共产党宣言》，通读了《毛泽东选集》四卷，学习了《法兰西内战》、《自然辩证法》、《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选学了《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有关章节，写了许多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体会和学习心得笔记。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三日，叶剑英致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

就江青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联系实际批林批孔点名批评自己一事，表示接受江青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对他的帮助。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登朝华的文章《无标题音乐没有阶级性吗？》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登初澜的文章《应当重视这场讨论》

当前正在展开的关于无标题音乐是否反映社会内容、有无阶级属性问题的讨论，引起了音乐界和各级文化部门以及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注意。这个问题提得很及时，很重要，这是贯彻十大精神，抓好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是同继续搞好文艺革命直接有关的一件大事。

“大事要讨论，讨论才能引起注意”。我们应当关心这个讨论，并将这一讨论逐步引向深入。

为什么要展开这个讨论？仅仅是为了对某些无标题音乐作品作些分析评价吗？或者是为了对音乐的标题性或非标题性问题作学术研究吗？统统不是。这是文艺战线的一场大是大非的论战，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文艺观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世界观、文艺观在文艺的根本性质问题上所展开的又一次重大斗争。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登钟志民《一份退学申请报告》

编者按：南京大学政治系学员钟志民的这份申请退学报告，自觉地批判了自己“走后门”进大学的错误，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工农兵学员向地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展开了新的进攻，反映了教育战线生气勃勃的革命景象。

这份报告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一、革命干部的子女，是在三大革命运动的风浪中锻炼成长，还是躺在父母的“功劳簿”上享受“特殊照顾”？二、革命干部是教育子女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还是把子女当做“私有财产”，把“走后门”上大学作为成名成家的阶梯？建议大家读一读《战国策》上《触@① z h é（音哲）说赵太后》这篇文章，看看触@① z h é 规谏赵太后不要溺爱自己的小儿子长安君的故事吧！那是说的剥削阶级内部的事。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这是事关反修防修，事关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大问题，难道不值得我们严重注意吗？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刊登宇晓的文章《驳一种修正主义的音乐谬论》

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音乐理论，对“音乐”的概念，作了种种玄妙莫测的解释。特别是对无标题音乐，说得更玄，说是什么“纯音乐”，“绝对音乐”，是一种“超凡”的幻响，等等。这纯粹是骗人。当前出现的关于无标题音乐没有社会内容，仅是表现某种情绪的变换、对比的谬论，是资产阶级的欺人之谈，是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回潮的一种反映。对它的虚伪性、反动性与危害性，必须予以彻底揭穿，进行严肃的批判。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日，《人民日报》报导《无产阶级文艺革命形势大好 电影战线斗、批、改步步深入，一批彩色故事新片将在全国上映》

这是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新胜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丰硕成果，也是把革命样板戏的经验运用于故事影片的一次可贵的实践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九日讯 春节前夕，我国电影战线传来了喜讯：彩色故事片《火红的年代》、《艳阳天》、《青松岭》、《战洪图》等已经摄制成功，从一月二十二日起将在全国各地陆续上映。

《火红的年代》等四部彩色故事影片的诞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丰硕成果，是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新胜利，也是把革命样板戏的经验运用于故事影片的一次可贵的实践。它反映了无产阶级文艺革命形势大好，电影战线斗、批、改正在步步深入。

这批彩色故事影片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为纲，努力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具有强烈的时代感，洋溢着火热的革命激情。《火红的年代》，是中国工人阶级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曲壮丽颂歌。它通过炼钢工人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粉碎帝、修、反的封锁和破坏，炼出了“争气钢”的战斗过程，成功地塑造了赵四海这一具有高度路线斗争觉悟的工人阶级典型形象，生动地体现了党的阶级路线和我国工人阶级的伟大革命胸怀。《艳阳天》，是描写农业合作化时期，以萧长春为代表的贫下中农在党的领导下，同混进党内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展开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影片深刻地揭示了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反映了我国广大贫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强决心。《青松岭》的故事发生在偏僻山区的一个生产大队。影片围绕着由谁掌鞭赶车的事件，展开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描写了张万山这样一个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我国贫下中农的典型形象，歌颂了党的基本路线的胜利。《战洪图》叙述海河两岸人民战胜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水的英雄事迹，表现了贫下中农战天斗地的革命精神和顾全大局的胸怀，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

这四部彩色故事片，是由上海电影制片厂和长春电影制片厂分别摄制的。各摄制组接受任务后，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投入战斗。他们认真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深入开展批林整风，学习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并结合创作实践，不断开展文艺领域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这些影片的拍摄过程，生动地反映

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也是对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有力批判。摄制组里，党的一元化领导代替了过去的“导演中心制”。编剧、导演、演员、摄影、录音、美工、照明、服装、化妆、道具、制景、行政管理等人员组成了新型的创作集体，与广大工农兵相结合，打破了过去冷冷清清关门拍戏的局面。他们走出大门，把电影剧本交给工农兵群众讨论，对剧本的内容、细节，以至一句台词、一件道具，都认真加工修改，使电影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不断提高。他们扎扎实实地深入生活，和群众一起开展革命大批判，一起参加劳动，虚心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改造世界观，努力表现好工农兵的形象。广大工农兵和革命群众对影片摄制工作给予了热情支持，他们说：“拍好革命电影，我们也有一分责任。”在群众大力支持和鼓舞下，摄制人员的革命干劲更足。为了早日完成任务，《火红的年代》摄制组盛夏冒着高温，在钢花飞溅的平炉前坚持拍摄；《战洪图》摄制组赶拍雨中抢险的场面，寒冬也整天泡在水里坚持工作，从不叫苦。他们说：“党中央、毛主席寄希望于我们，工农兵寄希望于我们，早日拍好革命电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春节期间同时上映的新影片还有：彩色戏曲艺术片《沙家浜》（根据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移植的粤剧影片），彩色木偶片《小八路》，彩色纪录片《喜看农业大丰收》（一）（二）（三）号，《工农业生产的好后勤》，彩色科教片《新法制革》、《海带》，科教片《南京长江大桥——施工技术》，彩色科教片《修旧利废》、《地震》、《向炉龄要钢》。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日，《人民日报》报导上海乐团创作、演出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工农兵群众热烈赞扬这部作品革命气势磅礴，民族色彩浓厚，交响效果强烈丰富

据新华社上海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九日电 继革命交响音乐《沙家浜》之后，又一部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在上海正式上演了。这部作品革命气势磅礴，民族色彩浓厚，交响效果强烈丰富，博得了工农兵群众的热烈赞赏。

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是上海乐团创作和演出的。它以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的唱腔、曲调为基础，根据交响音乐的特点进行了再创作。全曲共分九个乐段。第一段《乘胜进军》，以雄壮的歌声和飞速的行进节奏，描绘中国人民解放军当年胜利进军势不可挡的情景。接着，根据京剧中的主要情节和

英雄人物的主要唱段谱写七个乐段，通过器乐合奏、合唱、独唱、二重唱、无伴奏合唱等形式和多变化的表现手法，反映了我国劳动人民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苦难遭遇和英勇斗争，展示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和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最后一段《胜利会师》，以气势雄浑的大合唱，表现战斗的胜利和继续革命精神，热情颂扬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威力，使整部作品达到了高潮。

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是一九六七年开始创作的。上海乐团的创作人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鼓舞下，认真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批判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决心进行交响音乐革命。经过六年多的实践，终于成功地把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搬上了交响音乐舞台。

这部作品体现了中国声乐的特点，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在西洋器乐演奏和伴奏中，增加了锣鼓、京胡、板胡、琵琶、笛子等中国民族乐器，使音乐形象增添了浓厚的民族色彩。作品运用变化多样的表现手法，展现丰富多采的艺术形象：有时高昂豪迈，有时细腻深沉；有时用以叙事，有时用以抒怀，有时又用以描写意境。《迎来春色换人间》这一乐段中，当杨子荣唱“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时，合唱队也唱出同样的唱词作为他的回声，这样既描叙了林海雪原的开旷辽阔，烘托出杨子荣穿越丛山峻岭、只身深入匪巢剿匪的英雄气概，又表现出“千百万阶级弟兄犹如在身旁”的深刻意境。这样虚实结合的手法，起到了丰富交响效果的作用。这部交响音乐还有一个颇具匠心的艺术构思：把京剧中的李勇奇改为英雄群象，采用合唱的形式演唱“这些兵急人难”和“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这两个唱段，表现出在党的启发教育下，千千万万个李勇奇正在觉悟，成长。“这些兵急人难”这一唱段，还采取了无伴奏合唱的形式，把西洋音乐的手法和京剧传统的唱法结合起来，并以人声呼应代替器乐演奏作过门，听来倍觉亲切感人。

上海乐团在创作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的过程中，精益求精，反复修改了十几稿，力求达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统一。他们对每一个乐句精雕细刻，严格要求。例如第四乐段《誓把反动派一扫光》中参谋长的独唱，原来是以合唱的形式演唱的，气势雄伟，效果很好，但这样参谋长的音乐形象压过了杨子荣的音乐形象。创作人员学习革命样板戏关于要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的创作原则，经过反复推敲，减少了参谋长唱段中的合唱部分，又在杨子荣的独唱中运用了合唱艺术的多种表现手法。这样，主要英雄人物杨子荣的音乐形象就显得更加高大和突出了。

几年来，上海乐团的文艺工作者把深入工农兵，接受再教育，不断改造世界观，加深对工农兵的感情，作为创作和演出的思想基础。

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的创作，得到了广大工农兵群众的热情支持和帮助。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刊登段文秋的文章《柴春泽能做到的，我也一定要做到》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刊登邓绪东的文章《为“扎根精神”叫好 读柴春泽的信有感》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解放军报》刊登钟志民同志在校党委常委一月十七日约见他时的谈话记录《珍惜革命前辈鲜血换来的革命成果 决不躺在父母的“功劳簿”上过日子》（南京大学党委办公室整理）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新华社报道：《热烈支持反潮流的革命精神 南京大学党委批准钟志民的退学申请；全校师生员工纷纷表示学习他敢于反潮流，敢于自我革命的精神，进一步搞好教育革命》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孔子是怎样利用教育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的？》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新华社报道《钟志民的父母积极支持儿子退学的革命行动 让孩子听毛主席的话，坚决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编者按：南京大学学员钟志民的《一份退学申请报告》在本报刊登后，钟志民的父母立即表示坚决支持儿子的退学要求，并检查和批判了自己“走后门”的错误。革命小将挑战，革命老将应战，值得欢迎。值得支持。

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当中，我们一定要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认真纠正“走后门”之类的一切不正之风。这是关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的大事，必须认真对待。那种明知是错，只要“下不为例”就可以了的说法，既是为资产阶级思想打掩护，也是广大干部、群众通不过的。钟志民父母的革命行动，鲜明地表现了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新风尚，应当加以发扬。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讨论由江青指派迟群、谢静宜调查后写出的《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

1973年7月10日下午，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初二（一）班进行英语考试，张玉勤交了白卷，并在试卷背面写道，“我是中国的人，何必要学外文，不学ABCD，也能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为此张玉勤受到班主任杨天成的批评，并要她作出检查。

1973年7月12日，学校负责人罗天奇在初中班学生大会上不点名地批评了她，要求各班对此事讨论批判。由于老师批评方式失当，加上其他原因，张玉勤当日称病请假离校后即投河自杀，

1973年7月14日在水库中找到她的尸体。

事情发生后，公社、县有关部门和学校都已做了调查并处理。

1974年1月，江青在一份内部刊物上看到此事后，派迟群和谢静宜带人到马振扶公社中学重新进行调查。

他们召开了两个半天的座谈会，于1974年1月26日写出《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

《简报》指出：马振扶中学学生张玉勤（张因考试不及格，受到批评后自杀）是被修正主义路线逼死的，该中学扼杀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其实质是复辟。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九日，周恩来起草中央通知

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周恩来为转发《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起草中央通知：

要求河南省委对此事认真复核，严肃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上报。

各地也应注意，检查有无类似的个别情况。

张春桥阅后批：个别二字建议删去，复辟现象不是个别的。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 通讯员《老一辈打仗干革命，我们也要革命： 钟志民同志谈申请退学的思想经过》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评意大利摄影师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纪录片。

一九七四年一月三十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恶毒的用心 卑劣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

一九七四年一月三十日，《人民日报》报导《狠批孔孟之道 深挖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老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联合召开批林批孔座谈会纪要》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冯友兰说：

林彪特别欣赏孔老二所讲的“克己复礼”。他写道：“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从一九六九年十月到一九七〇年一月，在不到三个月内，他和他的死党叶群，一唱一和，把这几句话写成了四个条幅，互相鼓励，挂在他们的卧室内作为“座右铭”。是哪一种人就有哪一种人的思想。林彪这个现代的复古主义路线的头子，真是抓住了古代孔子的复古主义路线的核心。

孔子所说的“礼”，就是奴隶主阶级的规章、制度、社会秩序。孔子“复礼”，是要复辟奴隶制，妄想把当时中国社会恢复到奴隶社会。刘少奇、林彪一类政治骗子“复礼”，是想复辟资本主义，使中国重新沦陷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

过去我的立场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立场。我的世界观和所走的路线，都是复古主义的。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尊孔。过去我在哲学战线上的写作和行动，都是同当时政治上的尊孔配合起来，为当时的复古主义的反动路线服务的。我是“五四”运动时代的人，可是我拥护孔家店。经过“五四”运动，封建式的拥护方式不行了，我就用资产阶级的方式，其具体的表现就是我在三十年代写的那部《中国哲学史》以及在抗战时期所写的宣扬儒家垃圾的那些书，这就同蒋介石的尊孔配合起来，为国民党反动集团的统治服务。解放以后，资产阶级方式又不行了，我就用修正主义的方式，其具体的表现，就是我在六十年代所写的那半部《中国哲学史新编》，这就同刘少奇、林彪的尊孔配合起来，为他们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服务。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育，以及参加批林批孔的斗争，我才逐步地对于现代和古代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以及其间的连贯性有所认识，对于我过去的中国哲学史工作的危害性之大有所认识。我们现在反对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必须从这两条路线的历史根源上，彻底批判以孔子为首的复古主义路线，宣传从法家开始的反复古主义路线。“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的要害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汤一介说：

林彪这个叛徒、卖国贼，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思想武器。孔孟的“德”、“仁义”、“忠恕”，就是林彪用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篡改党的理论基础的一个重要的反动思想武器。

正当我国各族人民欢庆国庆二十周年的时候，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在暗中干着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勾当。他给他的死党叶群写下一个条幅：“恃德者昌，恃力者亡”。这句话原是出于《尚书》，是战国中期儒家的信徒赵良用来攻击当时法家的代表商鞅的。事隔两千多年，林彪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为什么又搬出儒家“恃德者昌，恃力者亡”这一套呢？而且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刻提出这一套呢？这不是偶然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思想的一次伟大的革命实践。这一革命震撼了世界，把帝、修、反吓得要命，沉重地打击了地、富、反、坏、右以及他们在党内的代理人，大大地巩固和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因此，

这个隐藏得很深的反革命林彪实在按捺不住他自己，就用两千多年前儒家攻击法家的反动东西“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来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什么是林彪要行的“德治”“仁政”呢？《“571 工程”纪要》这个反革命政变纲领，是他要行“德治”“仁政”最好的注脚。林彪鼓吹“恃德者昌”，就是要对反动派“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把被我们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重新扶植起来，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林彪鼓吹“恃德者昌”，就是要使地主、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得到真正的解放”，把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变为地主资产阶级所有制；林彪鼓吹“恃德者昌”，就是要用孔孟之道代替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用孔孟之道的“德”、“仁义”、“忠恕”等反动思想来篡改党的理论基础。革命人民对林彪鼓吹的这一套是坚决反对的。我们对于鼓吹“德治”“仁政”、妄想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派，决不施“仁政”。伟大领袖毛主席说得好：“‘你们不仁。’正是这样。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一切要把历史拉向后退，反对革命的反动派，都逃脱不了必然灭亡的命运。孔孟鼓吹反革命的“德治”、“仁政”，没有能挽救得了奴隶制的灭亡。林彪乞灵于孔孟的“德治”、“仁政”也救不了他们的命。这个叛徒、卖国贼和历史上一切倒行逆施的反革命小丑一样，变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毛主席指出：“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古今中外的历史，完全证明了毛主席的这一英明论断是一个真理。无产阶级要把革命进行到底，就要镇压一切主张复辟倒退的反动派，揭露他们各种反动虚伪的说教，让他们的反动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对林彪、对孔孟的反动思想的批判，一定会使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使我们的路线觉悟更加提高。彻底批判林彪和孔老二的反动思想，坚决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周一良说：

从林彪这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信徒的鬼花招，可以看出他跟两千多年前的祖师爷孔老二是一脉相承的两面派。林彪长期以来千方百计地掩盖自己的反革命真面目。在他指使别人东拼西凑的卡片里，有不少条条是关于“忍耐”的。他早就写下了“忍耐”两个大字，告诫自己“岂可为了一区区小人，区区小事而耽误自己终身大事”。什么是林彪的“大事”？不就是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吗？

一生为复辟奴隶制而到处奔走卖命的孔老二，也叫嚷什么小事上不能忍耐就会坏了“大事”。林彪和孔老二隔了两千多年，可是都为自己的“大事”而号叫“忍耐”，正由于他们都妄图阻挡历史车轮前进，都要搞复辟倒退。他们是有共同政治需要的一丘之貉。“忍耐”这两个字，听起来多么善良而无辜，它背后却隐藏着把历史拉向倒退的复辟阴谋，掩盖着使千百万人头落地的血腥罪行。我们必须予以彻底揭露和批判。

林彪阴谋诡计的一根毒蔓上挂了两个黑瓜，“忍耐”以外，还有所谓“韬晦（晦）”。这是他从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上学来的。林贼的“韬晦”就是说，躲在阴暗的角落，把凶如尖刀利剑的狼子野心藏在套子里，忍耐又忍耐，掩饰再掩饰，一旦时机成熟，恶狼就立刻跳出来吃人，来搞罪恶滔天的“571工程”了。

“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反动派不可能认识这条规律，总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尽管林彪以一系列反革命策略来隐蔽自己，伺机而动，妄图拉历史车轮向后退，历史潮流照样奔腾前进。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深远的意义。林彪无论怎样以不变应万变，千方百计“忍耐”“韬晦”，都无损于社会主义一根毫毛。等到他反革命魔爪刚一露头，立即被抓住，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下，林彪连同他的“五七一工程”统统被粉碎。任何阴谋诡计都挽救不了这个叛徒、卖国贼彻底灭亡的命运。

一九七四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转发《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的通知

经毛泽东批准。

通知指出：“请河南省委认真复核，严肃处理这一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严重恶果，并迅速将处理结果上报。各地也应注意，检查有无类似情况”。

一九七四年二月，江青等人关于张玉勤事件的指示

江青在一次会议上说，马振扶公社中学的张玉勤事件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逼死了天真的女孩子，“要向全国控诉”。

王洪文也指示要给该校老师和负责人“判重刑”。

迟群把江青、王洪文这些话用电话通知了中共南阳地委。

当地政府对这一事件重新作了处理。罗天奇、杨天成被判刑 2 年。

唐河县层层办学习班，揪“罗、杨式人物”，共批斗了 280 余人。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也按文件精神检查、揭露修正主义路线回潮和复辟。在全国掀起“反复辟”浪潮。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日，国务院科教组在《教育革命简报》上登载一批教育系统批走后门的材料，并加编者按语：在批林批孔中，要抓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严肃检查、批判和纠正走后门这种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不正之风。

之后，一些高等院校开始揭发、追查走后门上大学问题。

一九七四年二月六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

汇报政治局会议情况。

并就一些地方和机关批走后门一事提出：如果只研究走后门一个问题，这又太狭窄了，不正之风决不止此，而走后门又要分析，区别处理，才能收效。

毛泽东圈阅了此信。

一九七四年二月五日至八日，国务院科教组召开教育系统第二次批林批孔座谈会。

会上传达了一月二十五中央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精神。

迟群在会上强调：不批孔，就是不批林；要求揪出各地复辟的代表，抓本地的马振扶典型。

一九七四年二月八日，《人民日报》刊登初澜的文章《抓住实质 深入批判——再谈应当重视关于标题音乐、无标题音乐问题的讨论》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王亚卓的一封公开信。

他们对人民日报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转载的《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及为此发表的编者按语，表示了不同看法。

人民日报加的编者按语说：教育战线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仍然十分尖锐。是前进还是倒退？是支持革命还是折衷调和？是扶植和发展革命的新生事物还是对它横加指责？这是进一步发展教育革命大好形势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五日，毛泽东给叶剑英的信

剑英同志：

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我的意见如此。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六日，周恩来约迟群、谢静宜谈话

周恩来指出：毛主席讲的形而上学猖獗，是批评江青的。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讨论毛泽东叶剑英的信上的批示。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六日，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传达毛主席指示

主席又批一件，关于走后门问题。

主席说：走后门问题很大，从支部到中央，牵涉到几百万人，批林批孔又夹杂着走后门问题，可能会冲淡批林批孔，（还是要紧紧抓住批林批孔）开后门进来的也有好人，走前门进来的也会有坏人，要防止形而上学片面性。（可能不完整）

我领会，还是要抓批林批孔这个中心，不要转移了，不能分散，要有分析，看稿注意这个问题。批林批孔还是路线问题，重点在领导机关。主席讲要抓住重点，不要片面，要一分为二。

大家反映，为什么经过文化大革命，走后门反而多了？知识分子也有反映。我说，文化大革命前不需要走后门，路线不对，搞修正主义路线，走前门，培养地主资产阶级接班人，前门就可以进去。文化大革命，学制改革，工农兵上大学，斗批改，前门无产阶级占领了，当然还不巩固，这样后门就突出了。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关于“走后门”问题的通知
1974.02.20；中发[1974]8号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不少单位提出了领导干部“走后门”送子女参军、入学等问题。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认真讨论了这个问题。中央认为，对来自群众的批评，领导干部首先应当表示欢迎。但是，这个问题牵涉到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需要具体分析，慎重对待。当前，批林批孔刚刚展开，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因此，中央认为，这个问题应进行调查研究，确定政策，放在运动后期妥善解决。

当前批林批孔运动已经展开，主流是好的。各级党委，首先是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党组织，应当继续努力，放手发动群众，加强学习，联系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认真地抓紧批林批孔。要注意不断总结经验，使批林批孔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深入开展起来。

附录：一九七二年五月一日，中共中央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

1972.05.01；中发[1972]19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初澜的文章《评晋剧《三上桃峰》》文章指出：，

一九六五年夏天开始，围绕着通讯《一匹马》和故事《三下桑园赎马记》，掀起了一股宣传热潮。主持宣传的人特意提醒说：这个“故事发生在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河北唐山地区抚宁县，更加引起人们深思。”

一九六六年一月，山西省的《火花》戏剧专刊，以卷首的显赫位置，发表了根据上述通讯改编的大型晋剧《三下桃园》。

事隔八年，在某些人的指使和鼓励下，《三下桃园》改名为《三上桃峰》，人们不禁要问《三上桃峰》的炮制者和支持者：既然明明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三下桃园》，明明知道这个毒草剧本的要害所在，为什么现在又为它改头换面，乔装打扮，迫不及待地搬上舞台？

《三上桃峰》的炮制者曾经说过：“要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戏早就红了！”一语泄露了天机：他们这个戏跟刘少奇是同命相连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刘少奇垮台了，他们如丧考妣，于心不甘。经过几年的炮制，他们认为时机成熟了，就明目张胆地把《三上桃峰》抛了出来，大喊大叫什么“《三上桃峰》是山西的代表性剧目！”“《三上桃峰》是经过七年锤炼的。别的戏不上，行；《三上桃峰》不上，不行！”当演员表示不愿排练这个戏时，他们竟威胁说：“是毒草也要演”，不演就“以破坏革命现代戏论处”。看，他们要用这个戏来为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翻案的气焰何等嚣张！可是，当革命群众揪住了他们的狐狸尾巴之后，他们又装出一副可怜相，说什么“没有看过原来的报道”呀，“不知道这个故事有什么政治背景”呀，等等。躲躲闪闪，支支吾吾。事实胜于雄辩。白纸黑字，铁证如山，《三上桃峰》是经过精心炮制，有人批准，有人支持抛出来的。《三上桃峰》为刘少奇翻案的事实，是任何人也抵赖不掉的！

一九七四年三月七日，周恩来批示

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中一则反映成都第四军医大学赏中高干子女走后门，并与其他工农兵赏对立情况的来信。

周恩来批示：责成总后勤部派一检查组协同成都军区对此事事先调查处理，要求该校加强教育、整顿工作，以改变四医大的校风。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四日，江青关于拍摄《太阳与地球》影片给王洪文李先念吴德的信

江青在科影厂关于拍摄《太阳与地球》影片的信件上的批语

洪文、先念、吴德同志：

这是件大事，不仅青少年需要。我们这样的人也需要学习这种知识。北京天文馆被外国人占领了，只有中国人一个画面。而天文学是中国最早发现的，并且有大量的历史记载，单是二十四史上就占有很大篇幅。

有些中国人不象中国人，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应该批判他们。我们建议支持拍电影，并组织一个班子专门整理、研究祖国的天文学。以上意见妥否？请批示。

一九七四年八月二日，人民日报刊登湘晖的文章《评湘剧《园丁之歌》》

一九七四年八月四日，人民日报刊登初澜的文章《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评湘剧《园丁之歌》》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一日，《红旗》杂志刊登“风庆”轮党支部的文章《扬眉吐气的三万二千海里》

《红旗》杂志编者按：这篇振奋革命精神的文章，很值得一读。一九五八年，毛主席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指出：“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这种精神面貌在“风庆”号船员们身上又一次表现出来。“风庆”号首次远洋试航成功，是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凯歌，它长了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志气，对于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之类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思想，是一个有力的批判。它的意义决不限于造船业和海洋运输业。“风庆”号的革命精神，我们应当加以发扬。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上海开展计划生育和提倡晚婚工作的情况报告》等文件的通知

1974. 12. 31；中发[1974]32号

毛主席已圈阅。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现将上海市《关于上海开展计划生育和提倡晚婚工作的情况报告》及河北省《关于召开全省计划生育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转发给你们。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各地的计划生育工作有了较大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从一九六五年的千分之二十八点五，下降到一九七三年的千分之二十一，预计一九七四年将下降到千分之十九左右。上海、北京、天津、江苏、河北等五个省、市，提前完成了“四五”人口规划指标。今年可能还有三、四个省达到规划要求。但是，发展很不平衡，到一九七三年底，除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外，仍有十三个省人口自然增长率还在千分之二十以上。这些地区要实现“四五”人口规划指标，还需要作很大的努力。

上海等先进地区的经验说明，搞好计划生育，关键在于各级党委要把这项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切实加强领导，经常抓，抓得紧。要充分发挥妇联、工会、共青团等群众组织和政府有关部门的作用，做到各级有人抓，层层有人管。实行计划生育，是一场破旧立新、移风易俗的深刻的思想革命。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要抓好计划生育工作中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认真地反复地宣传毛主席有关计划生育的指示和党的政策，批判刘少奇、林彪、孔孟在家庭、婚姻、生育问题上的反动谬论，肃清其流毒，提高群众实行晚婚和计划生育的自觉性。要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在群众自觉的基础上，把生育计划落实到人，不要强迫命令。要普及节育科学知识，把避孕药具送上门，方便群众。医疗卫生部门要提高节育手术质量，加强妇幼卫生工作。各地要认真总结和推广先进单位的经验，把计划生育工作搞得更有成效。

贰、 本节简论

在各条战线上，批判复辟回潮，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是，没有抓住要害。

教育战线主要抓了两件事：一是继续批判上大学走后门；二是河南省马振扶公社中学的张玉勤事件。

文艺战线主要抓了三件事：一是批无标题音乐没有阶级性问题；二是批评晋剧《三上桃峰》；三是批评湘剧《园丁之歌》。

新闻战线主要抓了一件事，即批评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纪录片。

交通战线主要抓了一件事，即批评风庆轮事件。

主要问题是批过了头。批评者反而遭到了批评。

2010 年 2 月 21 日初稿

第十章第五节 各大军区负责人到北京检查文革中的错误

本节概述

一九七四年八月，各大军区负责人被中央召至北京，检查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

王洪文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发言时别人不要插话，讲完了就完了，大家鼓掌。

这次会议涉及的重点事件是九届二中全会上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等人写信的问题。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六日下午，福建组传达、讨论了毛泽东关于对犯错误的人不要点名、揪人的指示后，韩先楚去江苏组看许世友，见许世友正在看什么东西。

“许老板”革命干劲冲云天哪。韩先楚笑微微地道，心情自然很好。

那个“鱗鱼眼”的寿数到了，我再给他补一枪！许世友也跟着韩先楚称张春桥为“鱗鱼眼”。

许世友是在审阅、签发江苏组的一封表态信。韩先楚看了一眼，道：我也给他补一枪。

福建组的表态信，与江苏组的差不多。一是拥护林彪的讲话，二是拥护毛泽东关于对犯错误的人不点名、不揪人的指示，三是建议犯错误的人要检讨，对错误要进行批判，要调离中央，下放到基层做实际工作，接受工农兵再教育。

表态信的抬头写的是“毛主席”，然后是“林副主席”，信封上写着“汪东兴同志转呈毛主席亲启”，交给了中办副主任王良恩。由王良恩转呈至周恩来，周恩来批给叶群：这些信到此为止，存留你处。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后，在林彪家中搜出了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等人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写的表态信，王良恩又把这些信呈送周恩来，周恩来批示：退

一九七四年，江青等人得知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等人在九中二届全会上写给毛主席、林彪的信，追查为什么隐瞒不报毛主席，为什么存留在林彪处。王良恩不愿意牵扯出周恩来，自杀了断自己。

一九七四年，周恩来委托李德生韩先楚去南京做许世友的工作。

李德生与许世友、韩先楚等人串通欺骗中央。

这次会议涉及的重点人物，一个是许世友，一个是韩先楚。

韩先楚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根据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后公开的材料，概括如下：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搞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韩先楚觉得有点不对劲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中旬，毛泽东也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接着又发表了“16条”，韩先楚嗅出点“史无前例”的味道了。

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公开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学生先是在学校内“踢开党委闹革命”，接着又杀向社会“破四旧、立四新”，冲击党政机关，揪斗“走资派”，省委、市委陆续瘫痪。韩先楚困惑了：这是怎么啦？！老蒋没来，我们自己打起来了！从来都是共产党号召人民起来推翻旧世界，打倒国民党，哪有共产党号召人民群众“踢开”、“炮轰”自己的党委的呀？这不是共产党打共产党吗？“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看街道、广场和省委、市委门前如痴如醉的人群。听着“炮轰”、“火烧”、“油炸”、“打倒”、“揭盖子”的吼声，他觉得这一切都是不真实的，连梦境都不是。这是那些被推翻、打倒的势力，被赶去台湾的国民党，才日思夜想，连做梦都想看到的情景呀！他痛苦地摇着头：我们这个党啊，刚过上几天好日子，为什么有些人要瞎折腾呢？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正是上海“一月风暴”期间，福建省委、省政府被造反派夺权的当天，一群造反派来到军区，要韩先楚表态。韩先楚接见了代表，明确答复：“我和军区党委一致认为，中共省委和省人民政府的权，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夺。只有经过毛主席、党中央批准才能夺权，不经批准夺权是错误的，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我和军区党委、全省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也是根本不承认的！”

一九六七年“七二〇事件”后，“逃难”到西山，韩先楚曾愤愤地对叶剑英说：说我是“三反分子”，拿出真凭实据呀，能让我心服口服，我自己背着行李去坐班房！叶剑英叹口气：如果需要真凭实据，还用搞“文化大革命”吗？叶仰天长叹，连呼三声：莫须有，莫须有，莫须有啊！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下午，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让韩先楚振奋不已。林彪毕竟还是个敢说话的、务实的人。仿佛阳光驱散云雾，他又看到了当年的那个“林总”，甚至有了3年前搞《福建前线部队公告》时的感觉，这回这“文化大革命”该结束了。毛泽东要收拾张春桥这帮人了，这“文化大革命”不就快差不多了吗？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四日，韩先楚在全省工作会议上，按照他自己“大造舆论，好好宣传一下林总”的指导思想，“非常系统地吹捧林彪”，“40多处吹捧林彪”，“比周赤萍的小册子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想用宣扬提高林彪声望的战法，来打击、压制一下这个“鲮鱼眼”（指张春桥）。

一九七一年三月出笼的《“571工程”纪要》中，把福州军区列为“借用力量”。

一九七一年八月，毛泽东巡视南方在南昌跟他打招呼的谈话，“不仅是让他找不到北了，而是令他毛骨悚然了。天哪，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心目中都是亲密如一人，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呀？！他觉得内凡深处有种非常重要而且牢固的东西，噼哩喀嚓地爆响着要碎裂了。他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提心吊胆，不知道中国要发生什么样可怕的事情，就不时冒出一种解甲归田、退隐山林的念头。”

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在北戴河仓皇出逃前，给韩先楚打电话，说“福州方面就交给你了”。韩先楚当即表示：“请林总放心”，并再三让林总保重，两个人足足通话了17分钟。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八大军区司令对调前，毛泽东对说你去沈阳吧。韩先楚说我是个大老粗，没文化，只会打仗。

毛泽东说你去广州吧。韩先楚说那是南大门呀？还是不想去。

毛泽东说那去兰州吧，你是个好同志呀。韩先楚说我去，我去，我服从主席命令。

果真要把党和国家的权力交给那几个“文革”新贵，那确是没几个人服气的，他韩先楚就不干。

一九七四年三月六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4]9号文件

文件指出：“……三、福州地区批林整风运动长期深入不下去，在批林批孔运动刚刚起来又开什么纠正错误大会，把群众镇压下去，这同有些领导人长期捂盖子是分不开的。你们应该严肃认真地对待自己的错误，在批林批孔斗争中把福州地区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盖子彻底揭开。”

9号文件后有关单位整理出《韩先楚十大罪行》，几十条罪状除“林彪死党”外，几乎全是反对江青的、张春桥等人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四日，韩先楚开始给毛主席、中央政治局写信。

韩先楚在信中提出：希望中央将福州军区和福建省委在“批林批孔”斗争中，在贯彻中央9号文件中，对我揭发的问题转给我。群众的揭发会帮助我回忆自己的错误，以便进一步检讨自己。

一九七四年第4期《红旗》杂志，发表郑磊的文章《评（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说：“林彪反党集团被揭露以后，在抛出这个小册子的地方，这株毒草并没有得到认真的揭发批判。1972年，我们也看到了一点轻描淡写的批判。这种批判，与其说是批判小册子，倒不如说是为了表白小册子的出笼是‘背着’组织，没有人批准，仅仅是由作者亲自下令搞的。事情真的是那样吗？这么大的一件事，没有人支持，没有人批准，办得到吗？由于这本书大量发行，流毒全国，关于这本小册子出笼的阴谋，现在到了彻底清算的时候了。”

郑磊的文章一出来，有人立即签发一封电报：“现已查明，小册子是韩先楚同意出版的。”

一九七四年九月五日晚，在中央召集的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上，韩先楚检查了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路线错误。

他坚决不念别人写好的稿子。那上边写着：我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写了一封支持林彪反革命政变动员令的表态信，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我错怀疑过春桥同志，在这里我向中央检讨，向春桥同志赔礼道歉。

他的心中认为：这个“鱗鱼眼”算个什么东西？不就是历史上那种屡见不鲜的狐假虎威、弄权作奸的丑类吗？却成了“春桥同志”，还要“道歉”？

有两个人来找他谈话，他还是那话：让我检查，可以检查，我也愿意认真检查我的错误。但我不能按照会议发给的《检查提纲》检查，因为我不能瞪着眼睛胡说八道。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李先念和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

李先念说韩先楚对主席可是忠心耿耿的呀！

毛泽东好像对这个 9 号文件一无所知：有这种事情呀？

中央下发 9 号文件时，毛泽东也不在北京。有人说 9 号文件是江青假借毛泽东的名义圈发的，毛泽东没看到，不知道。

一九八二年七月，政变后的中央决定撤 1974 年的 9 号文件

韩先楚说：江青说我和“许老板”是“党内两霸”，这是胡说！

贰、本节简论

这次会议涉及的人物众多，级别很高，关系复杂，毛主席作了淡化处理，有关情况严格保密，流露出来的材料极少。现在知道的大概情况是：

韩先楚等人在这个会议上作了一般性的检查。

王良恩在中央办公厅的审查中，“畏罪”自杀。

李德生不久辞去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常委等职务。

周恩来自始至终没有牵扯进去。

2012 年 5 月 13 日初稿

第十章第六节 筹备四届人大

壹、 本节概述

一九七四年七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

通知要求各地：不准揪干部，不准打人抓人，擅离职守的领导和其他人员必须返回工作岗位，对把打内战、停工停产的行为说成是反潮流、不为错误战线生产的错误议论必须加以批驳，等等。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

毛泽东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也是难改呢。”

又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毛两次讲：“她（指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会后，毛泽东离京赴南方。

一九七四年七月三十一日，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接见吕正操、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

周恩来代表中央宣布为他们平反，向他们传达毛泽东在一九七三年底关于八大司令员对调等讲话内容。

周恩来对吕正操等说：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不要记在心上！

周恩来转告杨成武关于他大女儿杨毅被林彪一伙迫害致死的消息，向杨表示慰问；并对自己一九六八年三月杨余傅事件时讲过一些过头话表示内疚。

周恩来告诉杨：你出来工作的事，我写了三次报告都不行，最后一次，主席发了脾气，才让你出来的。

一九七四年八月十日，周恩来进行第二次大手术治疗

一九七四年某月某日，邓小平与江青交谈

邓小平说，不得了了，总理的病怎么样危险，最重要的问题要有一个第一副总理呀。

江青说，那还不是你嘛。

一九七四年八月十六日，周恩来约王海蓉、唐闻生谈话

了解王洪文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情况。

有人反映：王洪文借批林批孔煽动打倒军内一批老干部。

一九七四年九月十七日，毛泽东对陈丕显来信的批语

洪文同志：

此人如何处理，请在政治局一议，为盼！

似可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第 404 页）

一九七四年九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1974.09.29；中发 [1974] 25 号

毛主席已圈阅。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贺龙同志原任党的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林彪要整贺龙同志蓄意已久，早在一九六六年就向中央提出，贺龙同志历史上曾向国民党反动派“收编”、和“阴谋篡军反党”等问题，要进行审查。中央当时认为，把贺龙同志的问题搞清楚也是必要的，于一九六七年九月予以同意。在“九·一三”林彪事件发生以前，对贺龙同志问题的审查，一直为林彪、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等人所把持。他们捏造事实，隐瞒真相，以欺骗和封锁中央，诬陷贺龙同志历史上“通敌”和“篡夺军权”。“九·一三”以后，中央直

接对贺龙同志的问题进行了审查。毛主席多次指示，要抓紧给贺龙同志作出结论，平反，恢复名誉。经中央查证甄别：

一、所谓“通敌”问题，完全是颠倒历史，蓄意陷害。事实是：一九三三年十二月蒋介石曾派反动政客熊贡卿“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贺龙同志发觉后，报告了湘鄂西中央分局，经分局决定，将熊贡卿处决，并于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七日，将此事经过报告了中央。

二、所谓“阴谋篡夺军权”和支持军队一些单位的人“篡夺军权”的问题，经过调查，并无此事。

三、关于所谓贺龙同志搞“二月兵变”的问题，纯系讹传。

贺龙同志已于一九六九年六月九日病故。

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作出重大的贡献。在他的一生中，无论在战争年代，或在全国解放以后，他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

因此，中央决定，对贺龙同志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中央的这个通知，印发到县团级，并口头传达到党内外群众。

一九七四年十月四日，毛泽东电告王洪文

并要王洪文告周恩来：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一九七四年十月六日，周恩来同邓小平谈话

一九七四年十月六日晚，周恩来与江青谈话

江青提出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意见，周恩来未表态。

一九七四年十月七日、八日、九日，周恩来先后与王洪文、邓小平、李先念谈话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准备召开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

通知中转述了毛泽东的意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三日，江青致信在京的政治局成员

《国内动态清样》有关“风庆轮”报道：“风庆轮”一九七四年出航罗马尼亚，国庆节前夕返回上海港。在出航过程中，一些人提出：国产万吨级轮船早该远航，就因为修正主义路线造成的阻力，致使万吨级轮船没有及早远航。交通部所派在风庆轮子上工作的两名干部拒绝将此事作为崇洋媚外、卖国主义进行批判。船到上海后，王洪文指示把交通部的一名干部留在上海进行批判。并责令交通部严肃处理。

江青看到报道后致信在京的政治局委员：

“我看了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三日国内动态清样有关“风庆轮”的报道后，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却有少数人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象李国堂这样的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从反映的材料来看，他连爱国主义者都不是。这种洋奴思想爬行哲学，不向它斗争可以吗？李国堂是钻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沾满了一脑子买办资产阶级思想，他怎么能够做中华人民共和国‘风庆轮’这艘万吨英雄轮船的副政委呢？政委，船长和广大船员抵制他是完全正确的，是值得赞扬的，应该鼓励的。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上意见妥否，请批示。”

王洪文批示：

“完全同意江青同志的意见。我已在十月十二日告诉交通部，上海市委，先将李国堂留上海发动‘风庆轮’职工进行彻底的揭发批判，然后再搞回交通部进行揭发批判。交通部必须对李国堂进行严肃的处理，并将处理的情况报中央。

洪文十月十四日”

张春桥批示：

“同意江青同志的批示意见。在造船工业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已经进行多年了。发生在‘风庆’号上的事是这个斗争的继续。李国堂不是中国共产党的代

表，而是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建议国务院抓住这个事件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使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在各个战线上进一步确立起来。

张春桥十月十四

日”

姚文元批示：

“同意江青、洪文、春桥同志的意见。根本问题是路线问题，李国堂代表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他仇视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对抗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反对革命文艺，批林批孔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的崇洋思想是由他买办资产阶级的立场决定的。建议交通部和其他经济部门，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通过这件事进行路线教育，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批判修正主义路线，使我国造船工业和整个社会主义工业能够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多快好省地发展。

姚文元十月十四

日”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四日，对江青关于风庆轮的信

邓小平圈阅了该信。

周恩来批了已阅二字。

周恩来先后同汪东兴、叶剑英谈话。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七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江青继续就风庆轮问题阐明自己的观点。

邓小平说：我要调查。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七日，晚，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共同商量决定由王洪文去长沙向毛泽东汇报政治局会议情况。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八日，王洪文向毛泽东汇报

王洪文说：为风庆轮的事，江青和邓小平在会上发生争吵，吵得很厉害。看来邓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邓有那样大的情绪，是与最近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周恩来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他们来往这样频繁，是和四届人大的人事有关。

毛泽东听后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回京后多找周恩来、叶剑英谈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要注意江青。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九日，周恩来先后同华国锋、纪登奎、李先念和邓小平谈话，了解十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及风庆轮问题。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九日，江青召见王海蓉、唐闻生

要他们向毛泽东反映国务院崇洋媚外的问题，并说：邓小平十七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是一次二月逆流。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九日，毛泽东与王海蓉、唐闻生谈话

他说：风庆轮事件并不像江青他们所说那样，而是他们预先计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好久了。还要继续做些工作，慢慢解决问题。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毛泽东与王海蓉、唐闻生谈话

毛泽东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且李先念已在解决，但江青还这么闹。

毛泽东要她们回京后向周恩来、王洪文转告他的意见：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办理。

毛泽东要她们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毛泽东建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毛泽东在江青信上的批示

江青十月十九日给毛泽东写信。

毛泽东在信上批示：

已阅。务望谨慎小心。注意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周恩来与王洪文谈话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周恩来接见王海蓉、唐闻生
听取她们转告十月二十日毛泽东谈话内容。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先后与王洪文、王海苏、唐闻生、邓小平、江青谈话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周恩来与叶剑英长谈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七日，周恩来与李先念长谈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八日，周恩来与王洪文谈话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一日至三日，周恩来先后分三批约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李先念、纪登奎、邓小平、华国锋、吴德、陈锡联、陈永贵、倪志福、吴桂贤等开会，解决风轮事件问题。

期间，还另约王海蓉、唐闻生谈话。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某日，邓小平到江青处面谈

邓小平说，两个钢铁公司碰到一块了，说话走火了，就算了。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六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

汇报四届人大各项准备工作及进展，提出：代表名单，宪法草案和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均可在十一月份搞出；人事名单估计十一月下旬可搞出几个比较满意人选。

我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

我的身体情况比十月十七日见主席时间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十二月能开人大，定能吃得消。即使照膀胱镜下烧不成，我还受得起再开刀，务请主席放心。我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领导好。

当日，毛泽东看信批：同意。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六日，周恩来与王海蓉、唐闻生谈话
托她们向毛泽东汇报病情及其他问题。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七日，周恩来与李先念长谈
李先念陪外宾赴长沙见毛泽东回京。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毛泽东的指示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七日，周恩来与王海蓉、唐闻生谈话
她们转达了毛泽东对江青的的批评。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八日，周恩来与李先念、纪登奎谈话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九日，周恩来与王洪文谈话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日，周恩来与邓小平谈话
邓小平准备陪外宾去长沙见毛泽东。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日，周恩来与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谈话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同邓小平在长沙谈话
毛泽东：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

邓小平：主席也知道了。

毛泽东：好！

邓小平：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

毛泽东：我赞成你！

邓小平：她〔指江青〕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

毛泽东：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她们（用手指王、唐）都不高兴。

邓小平：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的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讲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毛泽东：这个好。

邓小平：最近关于我的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

毛泽东：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罗。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毛在江青的信上批示：

“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

“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周恩来先后与叶剑英、邓小平和许世友谈话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九日，江青给毛主席的信

我愧对主席的期望，因为我缺自知之明，自我欣赏，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的正确对待，对自己也就不能恰当的一分为二的分析。一些咄咄怪事，触目惊心，使我悚然惊悟。

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江 青一九七四、十一、十九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

江青：

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

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之后，江青托人向毛泽东提出：由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

毛泽东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

毛泽东让人转告周恩来：朱德、董必武之后安排宋庆龄。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为副总理。其他由周恩来主持安排。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先后与李先念、纪登奎、邓小平、江青谈话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周恩来与叶剑英长谈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周恩来与邓小平谈话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六、二十七日，周恩来与李先念、纪登奎以及王海苏、唐闻生谈话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周恩来与王洪文长谈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日，周恩来与邓小平谈话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四日，周恩来同王洪文武谈话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五日，周恩来与纪登奎谈话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七日，周恩来与李先念、乔冠华谈话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九日，周恩来与王洪文、纪登奎谈话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周恩来与王洪文、纪登奎谈话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周恩来先后与王海苏、唐闻生和邓李先念谈话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周恩来审阅出席四届人大会议各类代表名额的分配方案后，致信王洪文和中央政治局，提议：在现有名单基础上，再增加老干部、外事和体育等方面的名额，并提交政治局审议批准。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周恩来与王洪文、纪登奎谈话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五、十六日，周恩来召集会议

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纪登奎参加。

十六日的会议增加了邓小平、李先念。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周恩来同邓小平谈话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讨论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草稿）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周恩来审阅经中央政治局讨论修改的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

致信王洪文、邓小平：我基本同意。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周恩来召开有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纪登奎参加的会议。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召开有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江青、姚文元、纪登奎、吴德等参加的部分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讨论人事安排问题。

会上江青、张春桥等人提出文化、教育、体育等部门的人事安排意见。

会后，周恩来同李先念、纪登奎交换意见，认为教育部以周荣鑫掌管为宜，文化部、体委可作些让步。

根据会议讨论酝酿情况，草拟出四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名单第一方案，并送叶剑英、邓小平及江青、张春桥等阅。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审阅四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名单第一方案，增加陈云、韦国清为副委员长。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对反映刘景范情况来信的批语此案审查已久，不必再拖了，建议宣布释放，免于追究。
送汪主任酌办。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召开有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陈锡联、倪志福、吴桂贤等参加的部分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讨论二十一日所拟两个方案名单。

会后，与王海蓉、唐闻生谈话。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周恩来与王洪文联名将四届人大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名单等三个方案送毛泽东参阅。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飞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各项工作筹备情况。

王洪文另机前往。

周恩来、王洪文飞抵长沙后，一起见毛泽东。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毛泽东在长沙听取汇报过程中，同周恩来、王洪文多次谈话。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的谈话

毛泽东：

（摇着手对王洪文说）不要搞四人帮！团结起来！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

（王洪文涨红着脸，点头说，以后不搞了。）

明年一月起，外宾我不见了。要求见。我也不见了。我吃饭、睡觉还好，游了五次泳。就是讲话、肺、腿。

（谈到邓小平时说）他（邓）政治思想强，Political（政治）比他（用手指王洪文）强，他〔指王洪文〕没有邓小平强。

我看小平做个军委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人材难。

[注：毛当时在纸上写了“人材难”三个字，写到此处，周恩来马上说出来：人材难得，毛就把笔放下了。]

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沉默片刻）我看是有。我比你们了解她，几十年。我对她做了工作。搞乱了，三件事，批林批孔批走后门，又不告诉我。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毛泽东在长沙听取汇报过程中，同周恩来、王洪文谈话要点：

毛泽东对王洪文说：“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又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我在做江青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内阁）。”又说：对江青要一分为二。江青等人要作自我批评，王洪文要在长沙写出书面检查。

毛泽东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材难得。”建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对周恩来说：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之后，你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让小平同志去顶。

毛泽东说：在四届人大会议前先召开中共十届二中全会。

周恩来提议补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或中国央副主席。

毛泽东提出以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兼政治局常委。

毛泽东提议由张春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职务。

毛泽东表示：当前仍要继续强调备战。并问：如果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要来谈，应如何做？

周恩来答：如苏联领导人真想来谈，可作考虑，但我方不主动去请他。

毛泽东表示赞同。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单独谈话

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

毛主席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毛主席说，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注：毛主席在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过，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下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中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晚，周恩来、王洪文飞回北京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举行会议

周恩来、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参加会议。

周恩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传达的毛泽东谈话要点

（一九七四年末至一九七五年初）

传达主席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七日四次谈话要点：

一、留三天谈谈。二十四日又说，你们留在这里谈谈，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二十五日说，你们还可再留两天。二十七日见面时说，现在没有什么要谈的了。

二、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在二十四日谈话中，主席又说在批刘批林运动中立了功，但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摔了跤，能爬起来就好。并举党内斗争历史为例。（洪文同志有回答，我与洪文同志谈了话）

[原稿不含三、四两点]

五、在二十三日谈到小平同志时，主席写了“人材难”三字和“强”一字，并指指脑袋，说小平是难得人材，政治思想强。在报告剑英以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小平以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时，主席说小平要担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三个职务。讲到副总理名单时，主席在听到我念邓、张、李时，又加了一个陈（锡联）字，念为邓、张、李、陈，并说张有才干，李较软弱。

六、主席说他自己也在做江青同志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组阁）。江青同志说，没有工作做，主席说看资料，研究国际国内问题，然后提意见，主席自己多少年来就是这样做的。对江青同志，主席说，当然要一分为二，她在批刘批林问题上是对的，说总理的错误是第十一次路线错误就不对了。（这一条，我们报告主席，只在政治局常委会上一谈，在政治局就不提了。）

七、主席说，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成了三个主题，就搞乱了。搞乱了，也不告诉我。我们说，在一、二月份，下达那些指示，开了那样大会，我们也有责任，政治局也没有认真讨论。所以七月十七日主席离京前约政治局同志谈话时，我曾说过，有些事是我们“怂”起来的。

主席说，说批林容易批孔难。世界上事，说起来难，做起来并不难，现在五经四书也批了，孔夫子是文圣打倒了，关云长是武圣也打倒了。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

八，谈到国际形势，主席认为越讲缓和越备战，现在可以不提当前世界主要倾向是革命，而强调备战紧张，各国人民对此要有所准备。主席认为要弄清苏修对我试探的真正意图。主席问，如果勃列日涅夫要来谈，应该怎样？我说，如他真想来谈，可考虑，但我们不能去请他。主席点头。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周恩来传达毛泽东在长沙的几次谈话内容和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

到会政治局委员一致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并通过周恩来二十五起草、经毛泽东审阅批准的四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两项名单。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周恩来与乔冠华、黄镇长谈

贰、本节简论

进入一九七四年下半年，毛泽东的部署发生了重大变化。总的指导思想，就是他说的这样一句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工作重点由批林批孔转入筹备四届人大。召开四届人大的关键是人事安排。重中之重是人大常委会的正副委员长和国务院的正副总理的人选安排。这是新老两股势力、左右两派争夺的焦点。

新的势力的代表是江青（表面上是王洪文）、张春桥；老的势力代表是邓小平、叶剑英。

老人们充分研究了形势，掌握了有利时机，利用新人们的缺点、弱点，制造舆论（如江青开了两个公司：钢铁公司和帽子公司；王洪文主持召开军委会议，

借批林批孔煽动打倒军内一批老干部。)削弱新派的影响,争取毛泽东、特别是周恩来的支持。

新人们猛打猛冲,不注意策略,常常陷入困境。如在批林批孔中又批评走后门;在政治局会议上抓住风庆轮事件要邓小平表态。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毛泽东离开北京赴外地前,约中央政治局成员谈话,批评江青:“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也是难改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她(指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一九七四年八月十六日,周恩来约王海蓉、唐闻生谈话,了解王洪文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情况。因为有人反映:王洪文借批林批孔煽动打倒军内一批老干部。

这些说明,攻击新人的舆论起了作用。

一九七四年十月四日,毛泽东电告王洪文并要王洪文告周恩来: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这个时候,毛泽东考虑的是,一旦周恩来不能工作了,谁来顶替他主持国务院。王洪文吗?显然,无论是政治经验方面,还是工作能力方面,都不如邓小平。而且,毛泽东希望培养他将来接班做“皇帝”,而不是“宰相”。为什么不是张春桥呢?看来,毛泽东还有其他方面的考虑。

一九七四年十月六日晚,周恩来与江青谈话。江青提出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意见,周恩来未表态。估计江青可能是提出王洪文任人大常委会正或副委员长、张春桥任国务院的正或副总理。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三日,江青致信在京的政治局成员:该报道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康生先后在江青信上批示:完全同意江青的意见,要求抓住风庆轮的问题,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对交通部事先彻底检查整顿。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四日,对江青关于风庆轮的信,邓小平圈阅了,周恩来批了已阅二字。周恩来先后同汪东兴、叶剑英谈话。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七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上，江青继续就风庆轮问题阐明自己的观点。邓小平同江青等人进行争论，拍了桌子并拂袖而去。这是老人们利用有利时机，进行的一次反击，火力侦查，看看各方面，特别是上面的反应。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七日，晚，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共同商量决定由王洪文去长沙向毛泽东汇报政治局会议情况。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八日，王洪文向毛泽东汇报说：为风庆轮的事，江青和邓小平在会上发生争吵，吵得很厉害。看来邓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邓有那样大的情绪，是与最近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周恩来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他们来往这样频繁，是和四届人大的人事有关。

毛泽东听后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回京后多找周恩来、叶剑英谈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要注意江青。

这说明，新人们是主张进行回击的。但由于时机并不成熟，毛泽东不支持他们。（一九七〇年九月庐山会议，江青领着张春桥、姚文元告林彪，毛泽东支持了他们。）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九日，周恩来先后同华国锋、纪登奎、李先念和邓小平谈话，了解十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及风庆轮问题。这是因为周恩来没有参加十月十七日的政治局会议。但他听说了那天发生的争吵。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九日，江青约见王海蓉、唐闻生，要他们向毛泽东反映国务院崇洋媚外的问题，并说：邓小平十七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是又一次二月逆流。这说明，江青在王洪文向毛泽东汇报后，并没有放弃她的看法，而且把邓小平的作为定性为又一次二月逆流。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九日，毛泽东与王海蓉、唐闻生谈话，他说：风庆轮事件并不像江青他们所说那样，而是他们预先计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好久了。还要继续做些工作，慢慢解决问题。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毛泽东与王海蓉、唐闻生谈话，毛泽东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且李先念已在解决，但江青还这么闹。

毛泽东要她们回京后向周恩来、王洪文转告他的意见：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办理。毛泽东建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毛泽东要她们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这说明，毛泽东仍然没有采纳江青的意见。毛泽东的这一步棋，一是表示对周恩来的信任和尊重；二是表示对邓小平的进一步支持；三是表示不要江青参与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江青参与了，不管怎么说她不代表我，别人总会以为是多半代表了毛泽东的意见。）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在支一派（老人）、压一派（新人）。实质上看，其中还包含有深意。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毛泽东在江青信上的批示：已阅。务望谨慎小心。注意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把这个批示与七月十七日、十月十九日对江青的批评，联系起来，才能正确了解毛泽东对江青的真实态度。

一九七四年十月下旬至十一月上旬，周恩来抓了两件事：一是解决风庆轮问题；二是筹备四届人大。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同邓小平在长沙谈话，支持邓小平开了一个钢铁公司，对江青的钢铁公司。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毛在江青的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毛泽东对江青提出的这“三不”，不就是要江青韬光养晦吗？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九日，江青给毛泽东写信说：自九大以后，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这说明江青一点也不理解毛泽东的苦心。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说：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毛泽东要江青看李固给黄琼书是什么意思？

之后，江青托人向毛泽东提出：由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毛泽东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江青提出由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建议，这应该也算是正常的。当

时不正在酝酿人事安排吗？江青作为一个政治局委员，她也有权力提出自己的建议。但是，反对江青的人一定会拿这件事大做文章。干脆，毛泽东自己先把那些人要说的话说出来，这样，就堵住了那些人的嘴。

毛泽东让人转告周恩来：朱德、董必武之后安排宋庆龄。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为副总理。其他由周恩来主持安排。这样毛泽东就提出了人大常委和国务院的主要人选：人大常委会的正副委员长是：朱德、董必武、宋庆龄；国务院的副总理是：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周恩来提出增加陈云、韦国清为副委员长。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毛泽东与周恩来、王洪文谈话

毛泽东提出：我看小平做个军委副主席。

周恩来提议补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或中共中央副主席。

毛泽东提出以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兼政治局常委。

毛泽东提议由张春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职务。

毛泽东提议增加陈锡联为副总理。

从最后定的这个名单来看：

最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

毛泽东的意思：让邓小平再升一级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这样他就成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总参谋长。

周恩来提出：让邓小平再升一级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或中央副主席。

毛泽东体会到了周恩来的意思，干脆提出：邓小平再升一级任中央副主席兼政治局常委。

这样邓小平就与王洪文处于同等位置了。

另外值得注意是张春桥。

张春桥原本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

现在又是国务院副总理，仅仅排在邓小平之后。

毛泽东又提议他担任军委总政治部主任。

这样，张春桥在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有了两个重要职位。邓小平是第一副总理，张春桥则排在第二；邓小平是总参谋长，张春桥则是总政治部主任。一右一左也可以说旗鼓相当了。

再值得注意的江青。

她在这次人大和国务院的人事安排中没有获得任何职位，但是她获得了毛泽东的全面评价。

毛泽东说：对江青当然要一分为二，她在批刘批林问题上是对的，说总理的错误是第十一次路线错误就不对了。

这里，在不经意间，毛泽东对江青作出了全面评价：对江青要一分为二，她在批刘、批林以及批周问题上都是对的，她的缺点是开了两个公司（钢铁公司和帽子公司），搞了一个小圈子（四人帮），说错了一句话（周恩来的错误是第十一次路线错误）。

这才是经得住历史检验的结论。让那些几十年来攻击、污蔑江青的谣言、混淆是非的昏话都见鬼去吧！

2010年3月1日初稿

第十章第七节 毛泽东论三个世界

壹、 本节概述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毛泽东同卡翁达、布迈丁谈话内容的通报

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较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

协议可能有，但是我看不那么巩固。一是暂时的，同时是骗人的。骨子里头还是争夺为主。我看会打仗。总而言之，将来总有一天会要打的。争夺的结果最后可能会武力解决，暂时还不会。现在都在讲和平。现在世界上的舆论我看要研究一下，就是不要真正相信所谓的永久和平。这个社会制度不改变，战争不可避免，不是相互之间的战争，就是人民起来革命。

这个世界上是有帝国主义存在。俄国也叫社会帝国主义，这种制度也就酝酿着战争。

至于打不打原子武器，可能打，也可能不打。

准备打仗！准备它们（美苏）在世界上闹事。绝不相信持久和平，或者说所谓一代人的和平。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同尼雷尔谈话主要内容的通报

我们对“持久和平”这样的口号要看一看呢。大概一段时间可以，太长了不行，因为社会制度没改变。总而言之，这个全世界是不安定的。

第三世界团结起来，使得工业国家，比如日本、欧洲和两个超级大国，都得要注意一点。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上的发言

当前国际形势对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各国人民非常有利。建立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基础上的旧秩序，遭到了日益深刻的破坏和冲击。国际关系激烈变化。整个世界动荡不安。这种状况用中国的话说，就是“天下大乱”。这个“乱”是当代世界各种基本矛盾日益激化的表现。它加剧了腐朽的反动势力的瓦解和没落，促进了新生的人民力量的觉醒和壮大。

在“天下大乱”的形势下，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经过长期的较量和斗争，发生了急剧的分化和改组。一系列亚非拉国家纷纷取得独立，在国际事务中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在战后一个时期内曾经存在的社会主义阵营，因为出现了社会帝国主义，现已不复存在。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西方帝国主义集团，也已四分五裂。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

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妄图称霸世界。它们用不同的方式都想把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置于它们各自的控制之下，同时还要欺负那些实力不如它们的发达国家。

两个超级大国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它们两家都拥有大量核武器。它们进行激烈的军备竞赛，在国外派驻重兵，到处搞军事基地，威胁着所有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它们都不断对其他国家进行控制、颠覆、干涉和侵略。它们都对别国进行经济剥削，掠夺别国的财富，攫取别国的资源。在欺负人方面，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超级大国尤为恶劣。它出兵占领自己的“盟国”捷克斯洛伐克，它策动战争，肢解巴基斯坦；它说了话不算，毫无信义，唯利是图，不择手段。

处于超级大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达国家的情况是复杂的。它们当中的一些国家，至今还对第三世界国家保持着各种不同形态的殖民主义的关系；象葡萄牙这样的国家，甚至还在继续野蛮的殖民统治。这种情况应当结束。同时，所有这些发达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着这个或那个超级大国的控制、威胁或欺负，其中有些国家在所谓“大家庭”的幌子下，实际上被超级大国置于附庸的地位。

这些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摆脱超级大国的奴役或控制，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的要求。

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长期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它们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都还面临着肃清殖民主义残余势力，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这些国家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这些国家受的压迫最深，反对压迫、谋求解放和发展的要求最为强烈。它们在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斗争中，显示了无比巨大的威力，不断地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它们是推动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革命动力，是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主要力量。

两个超级大国既然要争夺世界的霸权，就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不是你压倒我，就是我压倒你。它们之间的妥协和勾结，只能是局部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它们之间的争夺则是全面的，长期的，绝对的。什么“均衡裁军”，什么“限制战略核武器”，到头来都是一句空话，实际上，既没有“均衡”，也不可能“限制”。它们可能达成某些协议，但是这种协议只不过是表面的和骗人的东西，骨子里是为了进行更大、更剧烈的争夺。超级大国的争夺遍及全球。欧洲是它们争夺的战略重点，处在长期紧张对峙之中。它们在中东、地中海、波斯湾、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角逐正在加剧。它们天天讲裁军，实际上天天在扩军。它们天天讲“缓和”，实际上天天在搞紧张。它们争夺到那里，那里就出现动乱。只要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存在一天，这个世界就决不会安宁，就决不会有什么持久和平，不是它们相互之间打起来，就是人民起来革命。正如毛泽东主席所阐明的那样，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两个超级大国为自己设置了对立面。它们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激起了第三世界和全世界人民的强烈反抗。亚非拉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霸权主义的斗争不断取得新的胜利。印度支那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继续前进。阿拉伯各国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冲破了两个超级大国的控制和“不战不和”的局面，取得了反对以色列侵略者的巨大胜利。非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歧视的斗争深入发展。几内亚（比绍）共和国在武装斗争的烈火中光荣诞生。莫桑比克、安哥

拉、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阿扎尼亚人民反对葡萄牙殖民统治和南非、南罗白人种族主义的武装斗争和群众运动蓬勃发展。拉丁美洲国家带头兴起的维护海洋权的斗争，已发展成为世界规模的反对两个超级大国海洋霸权的斗争。第十届非洲国家首脑会议、第四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和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一次又一次地强烈谴责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和种族主义，表达了发展中国家加强团结、相互支援、同仇敌忾的坚强意志和决心。亚非拉国家和人民前赴后继的斗争，戳穿了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沉重地打击了它们妄图统治世界的野心。

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也激起了第二世界发达国家的强烈不满。这些国家反对超级大国的控制、干涉、威胁、剥削和转嫁经济危机的斗争，日益发展。它们的斗争，也对国际形势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无数事实说明，一切过高估计两霸力量，过低估计人民力量的观点，都是没有根据的。真正有力量的不是一两个超级大国，而是团结起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第三世界和各国人民。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既然能够通过长期斗争取得自己的政治独立，就一定也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加强团结，联合受到超级大国欺负的国家，联合包含美国人民和苏联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通过持续不断的斗争，彻底改变建立在不平等、控制和剥削的基础上的国际经济关系，为独立自主地发展民族经济创造必不可少的条件。

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同希思谈话内容的通报

美国人呢，就是手伸得太长了。你看，日本、南朝鲜、菲律宾、台湾、东南亚、南亚、伊朗、土耳其、中东、地中海、欧洲。美国人骂了我们多少年，二十多年。

难道苏联就没有困难吗？我看他们自顾不暇。它不能对付欧洲、中东、南亚、中国、太平洋。我看它会输的。我们准备它来。但是它来了，它就垮台了呢！它只有那么几个兵，你们欧洲人那么怕！西方有一部分舆论，每天都想把俄国这一股祸水流向中国。你们的老前辈张伯伦，包括达拉第，就是推德国向东。

你们欧洲强大起来，我们高兴啊。我们看欧洲、亚洲，包括日本，都不要吵架。要吵呢，可以，不要大吵。

你们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香港是割让的，九龙是租借的，还有二十四年。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

一九七五年一月三日，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关于国际问题几次谈话的要点
一九七四年毛主席在几次会见外宾时说，

我看这个世界不安宁，比较过去很不安宁，无论在什么地方，也包括中国在内。

现在到处讲和平，我看危险！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头几年，不讲和平，不要说要缓和紧张，而现在大讲特讲！现在地球害病，所以要讲缓和紧张，缓和国际紧张，要讲和平。现在给地球治病。我是持怀疑态度。国际会议这么多，美国这个国务卿到处跑，相当怪！

我是不赞成所谓永久和平的。对欧洲来的朋友，我总是劝他们要准备打仗。如果不做准备，将来要吃亏。现在讲和平，我听得一些人讲，是要争取时间。美国人就跟我讲，争取时间。我也觉得这是个严肃问题，现在全世界人民考虑的问题。

灾难是要来的，但是也是不那么可怕。现在设想，可怕得很。我看，真要打起来，没有什么大的可怕。因为战争的目的是要占领别人的土地和人民，如果把人民都打死了，那也就没有人民了。会打一些军事目标或者小城市。美国对日本打了两个，一个广岛，一个长崎。它决不打大城市。比如：东京就不打，大阪也不打。

未来总是光明的。要经过斗争。不斗啊，人家不听你的话！

我们是第三世界，我赞成第三世界的国家要互相帮助。第三世界人民要团结起来。人怕蚊子，大国怕小国呢。

贰、 本节简论

毛泽东在一九七四年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就是指：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

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

三个世界的理论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战略，它将团结全世界的人们，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争取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彻底解放。

邓小平虽然在一九七四年代表中国出席了联合国大会，作了阐述三个世界理论的发言，但是，一九七六年十月政变以后，他就彻底抛弃了这个理论，鼓吹韬光养晦。

2010年3月8日初稿